

# 抵抗的全球化：在实践中思考

刘健芝

每次看到弗朗索瓦·浩达(François Houtart)教授,我总隐约看到他额角上贴的一小块胶布。2002年,浩达获邀列席“亚洲交流”(ARENA—Asian Regional Exchange for New Alternatives)在吉隆坡召开的会员大会,那是我们初次见面;送行时,我们坐在旅馆大厅等出租车来,闲聊间,我问他额角上贴的胶布是怎么回事。浩达摸摸前额,笑说,伤口已经结疤了,只为美观,才贴上胶布。是怎样受伤的?他又是一笑,说,每次出去开会,他会带上两箱书去展示和售卖,在机场,顾得上拖着两个箱子,顾不上撞到一根柱子上。

屈指一算,浩达今年八十三岁了。这位比利时新鲁汶(Louvain-la-neuve)天主教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三大洲研究中心”(Tricontinental Centre)的主任,除了讲学著书立说,还长期奔走于拉丁美洲、亚洲、欧洲之间。浩达神父是解放神学的知行合一践行者,在古巴、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哥伦比亚、斯里兰卡、印度,到处都有他的足迹,到处都有他的门生。

初次与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教授见面,是多年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前秘书长费德里科·马约尔(Federico Mayor)在西班牙召集的“民间网络世界论坛”(UBUNTU: World Forum of Networks of Civil Society)上。在旅馆吃早餐,我们同桌,他问我从哪儿来,我说,香港。阿明教授很热切地对我说,那你一定要跟一

个组织联系,该组织总部在香港,是非常重要的亚洲学者组织,已有二十多年历史,叫“亚洲交流”。我说,凑巧我是“亚洲交流”的现任主席。阿明教授开怀大笑,然后紧握我的手。他总是不忘推进民间的思想与行动交流,尤其主张亚洲与非洲加强联系,认为它们的共通之处,是未被帝国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全面地深深地腐蚀。阿明教授于1973年在非洲成立了CODESRIA,一个积极介入社会实践的泛非洲学者组织,性质与“亚洲交流”类近。

浩达与阿明这两位令人尊敬的知识界运动的前辈,在1997年成立了“另类实践世界论坛”(World Forum for Alternatives),分别任秘书长和主席,努力推动对主流制度的批判和分析,对另类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和推广。1999年,他们参与了“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的策划。“世界社会论坛”的前身“另一个达沃斯”(Another Davos),在各国首脑云集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的同时召开,提出不同的声音;之后几年,在地球的另一面,在巴西的阿里格港(Porto Alegre)召开“世界社会论坛”,反对“世界经济论坛”只讲强国逻辑、经济利益,罔顾全球大多数民众的死活;再发展下去,“世界社会论坛”在亚非拉轮流召开,每次有十多万人参加,地区社会论坛也纷纷举行,是多元开放的平台,让各家之言碰撞切磋,让庶民力量显现激荡。

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浩达与阿明为推进知识分子与民间运动的联结、交流及对话,从2003年开始,每年出版《抵抗的全球化》文集,邀约全球各地的公共知识分子撰文,既介绍和反思各地运动经验,也寻求思想的汇聚与交锋。《抵抗的全球化》与一般的学术文集最大不同之处,是有意识地警惕知识界主流的欧美中心的话语体系,试图建构“亚非拉”视野——不仅由本地学者阐述以亚非拉为主的各地运动的抵抗历史,而且将欧美与亚非拉紧扣的、复杂的关系展现出来。

“亚非拉”这个词,在20世纪风起云涌的60年代曾盛极一时,

对于位处边缘的力量,“亚非拉”象征着抵抗——抵抗帝国资本主义的猖獗,抵抗其世界秩序的腐朽;它指认着一种新的能动主体——既是被殖民的民族国家摆脱被侵略被掠夺的命运,也是全世界被压迫者突破民族国家的框架,摆脱资本主义的逻辑,寻求全人类的解放。

可是,在殖民主义的霸权话语中,尤其在八九十年代新自由主义横行的年代,“亚非拉”几乎就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这个代名词并非一面反映现实的镜子,而是一种功能运用:通过对“他者”(“亚非拉”)的界定来确立中心(“欧美”)的位置;这种魔法倒果为因:亚非拉因为贫穷,所以需要发展,只有在已发展国家的帮助下,从欠发展状态中走出来,才能造福民众,共享繁荣安定。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冒起成为一般常识的“欠发展”的话语,是资本主义通过不是战争而是贸易的新扩张策略,以发展之名不断制造贫穷。所谓发展,一方面是对和民众息息相关的大自然进行掠夺和破坏,同时通过种种手段迫使民众成为发展所需要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又通过推销发达国家的文化优越性,以产生对“落后地区”的民众的同一化作用,同时摧毁传统的文化和社区,瓦解任何尊重生态、着重合作、相互依存以达到相对地自给自足的文化基础,为广度深度的商品化过程铺设高速公路。这里,代名词发挥它的第三个作用:掩盖同一化所不能消灭或压抑的所谓“落后地区”民众的多姿多彩的差异(heterogeneity),但恰恰是特定的、多样性的生态所生出的多姿多彩的差异,戳穿了同一化真正要掩盖的东西——本身的贫乏;也恰恰是在悠长的生活历练中开绽出来的多姿多彩的差异,打开了可能性,超越资本主义的逻辑——“确保同归于尽”(MAD, 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代号“疯狂”)。

的确,资本主义关系的广度扩张已伸展到全球每个角落,深度扩张则已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深层,把闲暇、信仰、家庭关系各种“私人”范畴通过商品化的手段纳入其日益庞大的监察操控之内。当

人们的欲望、嗜好、价值观经不起资本主义制造的匮乏和不公的蚕食，在不知不觉间被收编入资本主义的逻辑中，迷失于对“美国生活方式”的追求，成为物质至上、物欲横流的社会的生产者和玩物，当社会进步以量化的国民收入和金钱交易为首要指标，当社会生活各个层面被置于经济至上的权威之下，那么，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文化必然相形见绌，被视为落后低劣。

因此，对抗帝国主义的掠夺和蚕食，除了传统的经济和政治层面的抗争外，和生活中种种实践紧扣的文化价值也是激烈争持的战场，而实践总是在具体的关系和制度中，因此，和生活密不可分的关系和制度，是抗衡文化价值宰制的关键领域，不能约化为可以与“自我”(self:思想行为的结集)完全分割的“外在敌人”。

也因此，要有效地抵抗欧美中心主义，不能简单地以本质化的“亚非拉”主体来取代“欧美”主体，即不能简单地树立所谓欧美的对立面而自诩为反抗的代表。“欧美”跟“亚非拉”的关系，可说是既爱且恨的关系，不存在简单的否定；换句话说，就是对“中心”、“进步”、“成功”的既爱且恨的关系。要反思这种矛盾和张力，得从建构、维系“中心”的种种手段所力图掩盖的内在矛盾和张力上着手，即要从边缘位置质疑权力中心的运作，从亚非拉民众所谓“失败者”、“战败者”的现代历史经验，批判欧美所谓“成功”经验的血腥不仁，拒绝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

带着这种视野来细看亚非拉被殖民的历史，就会看到爱德华多·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的名著《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所详列的史实所昭示的境况——拉丁美洲的血管被殖民者切开，至今，血仍在汨汨流出。今天，资本主义许诺的发达国家带领欠发达国家逐步前进的神话，在亚非拉广大的贫困、战乱、死亡的土地上，成为极为残酷的讽刺。在科技如此“昌明”的年代，在资金、商品、劳动力、生产资料全部“过剩”的年代，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每天超过三万儿童因贫病死去，全球有五分之一人口、超过一亿人活在

赤贫的生死线上。只要我们不把这个数字看成是一个数字，只要我们睁眼直面数字后面一个又一个孩子、一个又一个家庭的苦难挣扎，只要我们把这些死亡贫困与亚非拉几百年来延续至今未息的被掠夺残害的历史扣连起来，我们便无法欣赏资本主义的神话，无法接受欧美中心主义的各种诡辩，无法称庆亚非拉部分国家的少数人群得以跻身中产阶级享受小康生活以及极少数人得以大富大贵、奢华挥霍。是的，如果我们不让心灵被殖民化，那么，我们就能看到殖民主并没有披上华贵的新衣，而是赤条条地站在抢掠来的财富堆上，贪婪地继续抢掠。

今天，资本主义三大危机——生态危机、粮食危机、金融危机——同时爆发。百年内，全球暖化和地球资源的破坏将导致大量物种灭绝以至地球大部分地区不适宜人类居住；随时随地，因生态破坏、水源短缺、土地流失、生物燃料抢去土地和食物，以至投机倒把，令粮食危机严重爆发，饥饿贫困的人群雪上加霜；严重泡沫化的全球金融体制危机爆发，资本主义体制苟延残喘，短期应对措施只是饮鸩止渴。

资本主义广度深度的不断扩张，打造了一环又一环的重重相互牵制又相互促进的网络，把自我、社会和自然不断卷进去，成为其扩张的力量；正是这样的逻辑，炮制了资本主义的多重危机，继续运作，只能让危机越演越烈，受害者却首先是贫苦大众，不仅是亚非拉的绝大多数民众，也包括欧美日增的底层。

无论是济燃眉之急或是解人类灭亡之忧，都需要提出有效的另类选择：既要资本主义几百年来历史和现状作深刻的批判，也要对百多年来试图突破资本主义体制的各种尝试——包括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作回顾反思；同时，建基在多姿多彩的另类实践上，提出本地的另类方案以及全面的合作方案。这，正是每年汇聚在“世界社会论坛”的十多万人的期望，也是“另类实践世界论坛”的努力所在。

在抗衡欧美中心时，“亚非拉”不是单一的运动。正如墨西哥萨帕塔原住民运动的口号：“我们的世界容纳多个世界并存”。反对资本主义的运动，不是简单地倒转资本主义权力世界，由另外的一个或多个权力中心取而代之，而是要重建新的人类社会的关系，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如切·格瓦拉所说，要“打造新人”。资本主义的野蛮统治，把大量族群社会、文化习俗毁灭或推向边缘，美其名为破旧立新、汰弱留强，实质是推动资本主义无忌惮地、无制约地、广度深度扩张的无边的欲望，永远不能满足，要把全世界吞噬进去。

另类选择，是要建构自我塑造的新人民的运动，要摆脱代号“疯狂”的欲望，要尊重多姿多彩的差异，既扎根特定的本土，又相互交流扶持，抗衡无边欲望对自我、社会和自然的不断侵蚀。尊重差异，就是尊重有不同的世界存在，尊重有不同的界限存在；这不表示执著于封闭的、僵化的、静止的界限，而是让不同的思想、行为、习惯所界定的界限，在相遇、互动、互通中产生变的力量，自我塑造走向新人民的运动。因为，界限从来都是在动态状况中互相界定、交流、碰撞以至转化的关系；不管谁企图通过僵硬的制度或严厉的规管，也不能否定界限的动的状态及其中蕴含的变的力量。对界限的尊重，是让无边欲望失去用力点，但却让差异在相遇中发生作用。界限是让变的力量得以生成的条件。

因此，抵抗的全球化，不是寻求建立另一个中心来对抗欧美中心，不是追求消除差异以求把所有力量统一起来，而是孕育本地行动的多多样性的生命力，促进新人民运动塑造众多不同的道路。

# 单极世界中的蓬勃社会运动

萨米尔·阿明、弗朗索瓦·浩达

伊格内西奥·拉蒙内特

多年来,我们见证了世界各地的社会运动的汇聚。从1999年末的美国西雅图,到2001年的意大利热那亚,从1999年的“另一个达沃斯”,到2002年的阿雷格里港第二次世界社会论坛,人民的诉求、汇聚与寻找另类实践的努力从未间断。各种社会运动仍然丰富而开放,而大方向则日益坚定。资本主义制度,尤其是其新自由主义版本,在社会、生态与文化等方面都被视为万恶之源;此外,关于另类发展的策略的辩论日益深化,也有长足的发展。

我们希望能够以本文集的出版为开端,介绍及分析世界各地社会运动的情况。其实,每年关于世界经济与社会状况的年报,或者大事年表都有不少,数据翔实,分析也有意思。但是,比较起来,我们这个文集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视角是从下而上的,支持人民运动在日常抗争中所捍卫的立场,以及使用其组织所生产的材料,并且以批判的角度,呈现他们的观点与由他们启动的另类实践。

参加“另类实践世界论坛”的个人与组织都有自己的立场,他们反对主流的新自由主义观点。我们在这里仅仅希望巩固民众的社会运动的团结,为此,我们可以展开各种层面的对话,使对经济、政治与文化现实的分析更加丰富。我们还希望,能够对那些资本主义制度的受害者在斗争策略中所遇到的问题与挑战,及其所引

发的讨论有所贡献。

套用世界社会论坛的口号“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我们会问，什么是“另一个世界”呢？这仍然是未知的，因为历史的演进——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我们都相信是由行动者创造的，而且主要是由社会关系的变革所创造的。可是，现在的社会关系却充满了不平等。简单来说，这是社会运动的实践需要解决的事情。这并不是说思想与理论是多余的，因为它们是塑造历史的物质条件的组成部分。理论与实践之间、思想与行动之间、启示与成果之间的互动，是所有想改变世界的人的重要条件。

在以往的经验中，我们已经意识到，反抗运动有重要的共同汇合点，即新自由主义的方案遭遇到了普遍的反反对。现在，我们要抓住反抗运动的另一方面，即这些反抗运动所面临的单极世界环境，而这种环境对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凝聚力有破坏作用。本文集收集到的有关这一主题的文章并不能覆盖全世界所有的情况，但它反映了当前的大趋势。这些文章均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实践者和思想者撰写。

要想有效地应对当今时代的挑战，必须懂得：历史并不总是依照经济法则有序运行的，历史往往由于非常规的社会力量的反作用而产生，这些反作用制造出真正的历史，包括资本主义积累的逻辑在内。

读者可以在这些文章中看到，各种社会与政治力量的利益和观点是多种多样的。国家是各种社会与政治力量互相冲突和协调的中心。今天，国家几乎成为在中心国家美国、欧洲和日本或其外围次要盟国中占统治地位的跨国资本的单方面的发言人。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国家把自己的作用仅局限于维护国内秩序，而只有超级大国美国才能独自发挥世界大国的职能。但是，各种社会斗争的发展也有可能把各种不同的争霸集团，通过在各种社会利益之间实行妥协的办法而推上执政的地位。这样，国家又重新获得



了开展活动的广泛余地。由此可见,各国内部的反抗运动在摆脱单极世界影响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性。

从前的全球性体系几乎都是多极的,同样也是相对的和暂时的。一直到1945年为止,多极世界的合作伙伴们差不多都是当时的强国。由俄国革命开创的,再由随后的亚洲和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所缔造的多极世界,则是属于另一种性质。1955到1975年,万隆会议时代,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在一段时期中有可能推行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所倡导的那种自主性的新型发展方案<sup>①</sup>。

而1945到1990年,战后年代的这一页很快就被翻过去了。目前推行的是美、欧、日三方共谋的帝国主义方案,而美国在其中发挥着霸权的作用。这一方案否定了南方各国的独立自主性,也大大削弱了各盟国的自主地位。这一方案是原来各资本主义中心地区的生产体系经过长期发展的产物,这种生产关系关心的是各国的卖方市场分享利益。尽管经济来往使美、欧、日三方之间相互接近,但是,它们各自推行的政策又使彼此之间产生了分歧,这种经济来往其实不过是资本主义要求的单方面体现。当然,目前的欧洲联合方案,只是一个大西洋主义的方案。然而,具有新自由主义和大西洋主义特性的欧盟宪法草案竟然遭到否决,再加上欧洲社会内部不断出现反抗运动,这再次证明社会性和政治性斗争具有可以改变局势的重大意义。俄罗斯、中国和印度是美国方案中的三个战略对手。这三个国家似乎认为,在不直接冲撞美国的情况下,它们拥有自由活动的余地,有时甚至可以在各类冲突中巧妙地利用自己与美国的友好关系。欧亚(欧洲、俄罗斯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相互接近,会带动整个亚洲、非洲,甚至拉丁美洲,这可以粉碎单一的想从经济上和军事上控制全球的计划。但是,它还

<sup>①</sup> 在同一时期,“拉美经济委员会”(CEPAL)推出了一种旨在替代进口并与社会公约挂钩的经济发展模式。

远不能结束欧洲的大西洋主义选择。本文集所描述的各种社会运动的纠纷都有它们自身的逻辑,但它们都处在这一单极世界的现实之中。

南方国家和地区能否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呢?当前,被侵略的各民族是唯一能够击退华盛顿的野心的积极反对者。但是,他们在斗争中所采用的方法的有效性却常常受到人们的质疑。而他们所采用的这些手段,往往使北方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对他们的正义斗争迟迟不敢表示支持。

南方国家和地区的领导阶级现在已不像万隆会议或拉美发展主义(1955—1975)时期那样都拥有自己的方案。当然,某些所谓新兴大国还是有自己的目标。它们想在全球化体系中尽量加快自己的经济增长步伐,而这样一个目标往往会在国内引起不少阻力。他们认为这种拥有谈判权的战略比与更弱的国家结成共同阵线更能使他们获得好处。

他们由此而得到收益,所以,对当前这种体系的总体框架不可能提出质疑。他们不能形成一种替代方案,他们对建立“民族资本主义”的幻想使之无法提出真正的社会方案。那些最弱勢的南方各国(第四世界)甚至提不出自己的方案,所以,现在只有北方国家和地区才有能力带头提出自己的方案。例如,欧盟和非洲加勒比海地区—太平洋地区的协定、欧洲—地中海对话、美洲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和以色列关于建立大中东地区的方案等等。而其中不少方案也正受到人们的反对。

目前的世界舞台上,只有美国一极在控制着全球。除了委内瑞拉提出的玻利瓦尔倡议在拉美推行之外,世界上没有看到过旨在限制美国活动的相反方案——欧洲至今还陷在自由主义和大西洋主义的全球化泥坑之中;南方各国形不成一个抵抗帝国主义的共同阵线;中国只想争取时间来实现一个自身尚模糊不清的目标,而在塑造世界的工程中,它不想主动承担一个积极的合作伙伴的

角色。所以要想建立一个真正的多极世界所面临的挑战,要比众多“另类世界主义”运动所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就当前来说,必须挫败美国的军事计划。而想要取得必要的自由空间,一定要实现这一条件。否则,任何社会或民主进步,任何走向建设多极世界的努力都将是一句空话。在和平主义运动以及其他形式的反抗运动中,提出反对战争(反对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就足以表达这个问题的重要程度。因为美国的军事计划是过分的,所以它注定要失败,但人类肯定要在在这方面付出沉重的代价。

一个真正的多极世界要有一个适合人民群众斗争要求的必需的框架,它应该实现下列四个条件:

1. 欧洲必须走上另一种欧洲社会化的道路(走向世界后资本主义的漫长过渡阶段),并且它应该与过去和今天的帝国主义性质划清界限;

2. 在中国,市场化的社会主义道路应该战胜试图建立一个民族资本主义制度的强大倾向,而民族资本主义制度由于把工人和农民这样的大多数群众排斥在外,所以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稳定;

3. 南方各国人民和政府应该重新建立起一个共同阵线,只有实现这一条件,人民大众才能有活动的余地,使他们有可能争取到对他们有利的让步,并且进一步有可能改变政权的性质,利用民族、人民和民主集团来替代占据统治地位的买办集团;

4. 在重新改组国内和国际的法律体系方面,应该朝着既要尊重国家主权,又要尊重个人和集体的政治和社会权利的方向前进,这是各类社会运动和反体系组织提出的要求。

本文集的构想颇为宏大,首先以世界为整体,包括了北方与南方。这样的安排是建基于一种信念,即新旧形态的全球化是在各地人民之间交织着不平等的互相依存的关系网络,因此,任何好的变革必须在国家、全球的各个层面推展。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认为,面对资本的全球化,一定要建立人民的全球化。这是唯一达

到另类全球化的方法,以有别于那种不可接受的、由新自由主义者提倡的全球化。本文集试图讨论现实中各个方面的议题——经济、政治、社会、意识形态、文化——因为我们不希望遗漏任何重要的议题。幸好对这些议题的分析已做得很好,我们不重复那些内容,只需要尝试把它们串联起来。

本文集是由许多人共同合作而完成的。目前,我们还没有能力涵盖世界所有的地方,也没有能力包揽所有交错形成的、影响人类的议题。在这里,我们将特别着重把事态置于其历史的脉络中来理解。

我们是乐观的。气焰嚣张的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的话语曾经妄自尊大。1990年代的后半期,像西雅图和阿雷格里港的事件终于使新自由主义的话语严重地丧失了公信力。人民不再相信那种主流话语所宣称的美德,也不再相信其强制推行的措施是无可避免的。撒切尔夫人曾经宣告:“没有任何另类。”我们今天却要说:“众多的另类是存在的”。“另类”是复数的、灵活多样的。我们不仅想避免学术的教条主义,还想强调构建未来的、多样性的正面特质,而且,像前面所说的,“未来”必然是社会运动之间互动的成果,但我们却不能预知其内容与本质。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网上([www.forumdesalternatives.org](http://www.forumdesalternatives.org))找到“另类实践世界论坛”计划的协作者更多的文章。在本文集中,我们尝试凝聚这些文章的精华。书中不同的观点并不一定为所有计划的负责人与编委会认同。我们并不尝试构筑任何为达成共识而设的平台或者共同的参照系,而是要提供让辩论延续的要素,使之保持开放。

总而言之,我们诚心感谢所有支持这个计划的人,同时强调文集中表达的观点,只属于“另类实践世界论坛”的负责人及其协作者,与任何组织或个人无关。

# 目 录

- 抵抗的全球化:在实践中思考 ..... 刘健芝 1  
单极世界中的蓬勃社会运动 .....  
萨米尔·阿明、弗朗索瓦·浩达、伊格内西奥·拉蒙内特 1

## 第一部分 总 论

1. 资本主义:已成为人类公敌的过时制度  
..... 萨米尔·阿明 3
2. 多样的社会运动与新历史主体 ..... 弗朗索瓦·浩达 11
3. 南方国家反新自由主义社会运动的动力与挑战  
..... 弗朗索瓦·波雷 16
4. 文明的抉择——另类全球化与全球命运共同体  
..... 黄钰书 31
5. 关于反全球化运动的政治经济学:一个尝试 ..... 刘振 82
6. 建构 21 世纪国际主义视野 ..... 薛翠 107

## 第二部分 五大洲的最新社会运动经验

### 一 亚太地区

1. 亚洲运动的关切:军事化、私有化、债务和移民  
..... 文诺·莱纳 121

2. 走向国际化的反对亚洲发展银行运动  
..... T·S·恩卡那逊·达邓 125
3. 日本的另类运动:制约与可能性 ..... 武者小路公秀 129
4. 韩国社会运动:劳动者的力量 ..... 裴俊范 135
5. 香港、台湾的社会运动经验 ..... 杰勒德·格林菲尔德 141
6. 东南亚复杂的抗争形势  
..... T·S·恩卡那逊·达邓、E·C·达邓 148
7. 东南亚的非政府组织与社会运动 ..... 罗国华 164
8. 印度尼西亚:穿越多变的新自由主义迷雾  
..... 奥莱·G·J·亚迪准祖罗 178
9. 印度尼西亚:组织基层 ..... 维迪·R·哈迪兹 185
10. 泰国的社会运动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挑战  
..... 查尼达·查努亚潘特·巴福德 189
11. 多数人的暴政与泰国军事政变  
..... 查坦拿·邦帕斯曹提、优陈·切安生 193
12. 菲律宾:人民力量的终结? ..... 瓦尔登·贝罗 200
13. 菲律宾社会运动面临民主挑战  
..... T·S·恩卡那逊·达邓 205
14. 马来西亚:民主战士面临镇压 ..... V·赛瓦姆 211
15. 尼泊尔的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运动的兴起  
..... 阿尔琼·卡基 214
16. 走向集中的斯里兰卡抗争运动 ..... 祖狄·L·费南多 219
17. 印度的经济改革与贫民的回应  
..... 阿肖克·米特拉、M·A·乌曼、拉米·梅菲 225
18. 印度社会运动的活动空间:世界社会论坛、选举和社会运动  
..... 文诺·莱纳 238
19. 印度的社会运动:多样的政治、共同的目标  
..... 文诺·莱纳 242

20. 新自由主义在印度:种姓政治与农民自杀  
 ..... 文诺·莱纳 253
21. 中亚和南高加索:美国的后方基地?  
 ..... 贝尔纳·德莱约诺 258
22. 南太平洋的国家和公民社会  
 ..... 尚马克·雷诺、塔马图亚·巴姆别 267
23. 澳大利亚和大洋洲反新自由主义的抵抗运动  
 ..... 维尔特·博吉曼、安德鲁·尤尔 275
24. 澳大利亚的反新自由主义的斗争  
 ..... 维尔特·博吉曼、安德鲁·尤尔 285

## 二 欧洲

1. 欧洲范围内开展动员工作的原动力  
 ..... 贝尔纳·德莱约诺 289
2. 欧盟与另类世界运动的“内部威胁”  
 ..... 本·海斯、托尼·布尼安 293
3. 欧洲社会运动面临的挑战 ..... 贝尔纳·德莱约诺 308
4. 同一化的欧洲与多元化的社会运动  
 ..... 贝尔纳·德莱约诺 328
5. 资本主义世界边缘的尴尬东欧 ..... 嘉芙连·萨马里 338
6. 德国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抵制 ..... 托尔斯腾·舒尔腾 350
7. 意大利的全球正义运动 ..... 马西米连诺·安德烈塔 355
8. 英国:垮在投票箱上 ..... 希拉利·怀恩韦特 361
9. 波兰:不满现状的潜在力量 ..... 达溜茨·扎莱加 366

## 三 中东与阿拉伯世界

1. 面对双重挑战的阿拉伯社会民间组织  
 ..... 萨米尔·阿明 370

#### 4 抵抗的全球化

2. 以色列社会的内部矛盾 ..... 米歇尔·华周斯基 386
3. 以色列:反对占领运动和社会斗争的联结  
..... 米歇尔·华周斯基 398
4. 以色列—巴勒斯坦:视角的缺乏 ... 米歇尔·华周斯基 401
5. 巴勒斯坦人民组织和社会运动 ..... 纳萨尔·易卜拉欣 405
6. 阿拉伯世界的社会运动 ..... 阿扎·卡赫里尔 410
7. 阿拉伯世界的反全球化团体 ..... 阿扎·卡赫里尔 429
8. 阿拉伯世界公民社会的发展与对民主的需求  
..... 萨拉·本·内夫沙 439
9. 阿拉伯半岛:社会的觉醒与石油君主的改变  
..... 法提哈·达兹—埃内 444
10. 埃及的公民社会和新社会运动 ..... 埃曼德·希亚姆 451
11. 埃及:对社会正义和民主的要求日益高涨  
..... 阿扎·卡赫里尔 460
12. 摩洛哥的社会运动、全球化与民主  
..... 卡玛尔·拉比卜 467
13. 摩洛哥:希望、恐惧与“静坐战” ..... 卡玛尔·拉比卜 471
14. 叙利亚民主运动的挑战 ..... 苏珊·赞克赞克 476
15. 阿尔及利亚:从社会的严密管制到新的大众运动  
..... 阿布德因埃瑟·德贾毕 480
16. 土耳其:另类替代世界议程、集权化遗产和身份认同  
斗争 ..... 埃尔迪·居林·勒朗代 488

#### 四 非洲

1. 非洲的反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斗争和运动  
..... 德恩巴·莫沙·德恩比莱 495
2.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危机与抵抗  
... 柏纳·福诺—德楚戈华、艾伯特·卡桑达·鲁门布 500



3. 非洲社会论坛:激进与改良之间  
..... 蒙得力·赫拉兹瓦约 514
4. 南非的新社会运动团体 ..... 戴维·考兹 521
5. 南非:种族隔离结束后的幻灭 ..... 费奥纳·怀特 531
6. 南非社会运动:索韦托电力危机委员会  
..... 费奥纳·怀特 536
7. 制约与机遇:东非的社会运动经验 ... 奥皮约·马克德 541
8.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斗争和生存  
..... 弗朗索瓦·李科耶尔 554
9. 面临萎缩的刚果公民社会 ..... 埃利·恩戈马-宾达 560
10.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政治改革和公民社会  
..... 西尔威斯特·甘巴萨 563
11. 面对国家和市场攻势的马里民众运动  
..... 塞古·迪亚拉 566
12. 马达加斯加:具有宗教色彩的民众动员  
..... 希亚里维罗·兰德里阿兰多昂德罗 570
13. 肯尼亚公民社会的发展与局限  
..... 戈德文·拉潘多·穆鲁恩加 574
14. 肯尼亚的社会运动和民主化 ..... 法兰克·K·马坦加 580
15. 尼日尔:政治变革及新社会角色的出现  
..... 马哈曼·T·亚劳 585
16. 博茨瓦纳的公民社会:软弱且处于威胁之下  
..... 伊恩·泰勒 590
17. 尼日利亚:社会运动的不明确性  
..... 费米·亚博里沙德 594
18. 喀麦隆:公民社会被玷污了? ..... 伊夫·A·舒亚拉 598
19. 塞内加尔:社会运动领导抵抗新自由主义  
..... 德恩巴·莫沙·德恩比莱 602

## 五 美洲

1. 拉丁美洲社会运动的汇聚与挑战  
..... 美洲社会科学理事会、“三大洲研究中心” 608
2. 新自由主义与社会冲突:拉丁美洲的群众运动  
..... 克莱拉·艾格朗奈提、浩舍·塞恩、艾米雷欧·泰德 625
3. 团结起来反对自由贸易 ..... 浩舍·塞恩 650
4. 从坎昆到马德普拉塔:沸腾的大陆 ..... 保罗·兹别奇 653
5. 阿根廷失业者运动的孤立危机  
..... 马里斯特利亚·斯班帕 657
6. 阿根廷:基什内尔的方法与庇隆主义的惯性力量  
..... 马里斯特利亚·斯班帕 660
7. 厄瓜多尔社会运动:在动员和政治之间  
..... 桑切斯·帕尔加 666
8. 巴西的社会运动和卢拉政府:紧张的关系与有条件的支持  
..... 埃米尔·桑德尔 670
9. 巴西:社会变革的困境和前景  
..... 马赛罗·K·席尔瓦、安东尼奥·J·F·利马 674
10. 委内瑞拉:社会两极化 ..... 玛格丽塔·洛佩斯·马亚 679
11. 委内瑞拉:工人运动与玻利瓦尔革命  
..... 埃克托·卢塞纳 682
12. 玻利维亚:原住民主义的崛起  
..... 巴勃罗·史蒂芬诺尼、埃尔维·多·埃尔托 687
13. 危地马拉:富有活力的原住民和面对巨大不平等的群众运动 ..... 马诺罗·加西亚 693
14. 乌拉圭:面对左翼政府的社会运动 ..... 保罗·兹别奇 698
15. 哥伦比亚:民主制度的民主化 ..... 毛里西奥·阿切拉 701
16. 墨西哥:社会运动新的动力 .....  
米格尔·阿尔瓦雷斯、希尔维托·洛佩斯·伊·里瓦斯 705

17. 正在拉美化的墨西哥 ..... 吉尔莫·阿尔梅亚 708
18. “9.11”后的美国新帝国主义及民间运动的发展  
..... 皮埃尔·博德 714
19. 美国:无产阶级抗争与资产阶级重组  
..... 皮埃尔·博德 726
20. 逆流而上:社会运动动员在美国 ..... 里克·范塔希亚 736

### 第三部分 全球社会运动专题:新挑战与新策略

1. 新的农业问题:受到威胁的三十亿农民  
..... 萨米尔·阿明 741
2. 石油:夺取经济控制权的关键 ..... 布鲁诺·卡顿 751
3. 水,全球未来的议题:私有化或是人类的共同财富?  
..... 弗朗索瓦·波雷 757
4. 债务危机 ..... 艾域·图森、亚诺·扎查里 764
5. 向贫穷开战:为世界新秩序服务的政治话语  
..... 弗朗塞恩·迈斯特劳姆 771
6. 为争取另类全球化的妇女运动  
..... 苏菲·查利尔、海伦·里克曼斯 786
7. 世界军事化和实现和平的新条件 ..... 纪耳伯·阿胥喀 796
8. 汇聚与反战运动:经验和教训 ..... 鲍拉·曼杜卡 805
9. 工会运动和社会运动:迈向新的对话?  
..... 皮埃尔·博德 816
10. 另类运动及其媒体策略 ..... 维克特·塞姆佩得罗 821
11. 警察针对新全球抗议的措施  
..... 唐纳泰拉·德拉·波特、赫尔伯行·雷特尔 837
12. 国际法:另类世界运动的关键问题  
..... 蒙利卡·彻米利尔-詹德鲁 855
13. 新的权力与新的抗衡权力 ..... 拉奥-马克·詹纳 864

14. 世界社会论坛:迈向反霸权主义的全球化

..... 博温吐拉·德·苏沙·桑杜士 869

15. 世界社会论坛:民主的另类选择

..... 弗朗塞恩·迈斯特劳姆 894

作者简介..... 914

后记..... 922

# 第一部分

## 总 论



# 1 资本主义:已成为人类公敌的 过时制度

萨米尔·阿明

## 一 非平等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历史形态

自古以来,地区的非平等发展成为全部历史的显著特征。然而,只是在现代,由于资本主义制度遍及世界,这种地区间的两极分化才已经无所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演变,现代资本主义的极化现象也呈现出不同形式。

在工业革命前的重商主义阶段(1500—1800),商业资本在大西洋中心区域处于霸权地位,美洲边缘区域的开拓则完全服从于商业资本积累的逻辑。

产生于工业革命的所谓经典模式因此被奉为资本主义的基本形态。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拉美以及亚洲(除日本外)和非洲逐渐被纳入成为资本主义的边缘区域,它们仍然以农业为主,根本没有实现工业化,只能以农业和矿产参与国际分工。此外,这种两极分化也具有另一重要特征,核心工业制度固定成为民族国家自主核心体系(national auto centred systems),与此平行的是发展出民族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综合分析,这两种特征就构成民族国家解放的主导意识形态,也是对两极分化所带来挑战的回应:(1)最终实现工业化成为解放的同义词,并且成为国家“从后赶上”的一

种方式。(2)建设民族国家的目标受到核心模式的极大影响。这就是现代化意识形态的主要内涵。从工业革命(1800年以后)到二战结束,这种两极分化的经典模式构成了世界体系的主要特征。

战后时期(1945—1990)见证了以上两种特征的逐渐消亡。在此期间,边缘区域工业化兴起,但可以肯定这仍是非平等发展。在亚洲和拉美新近取得政治自主的边缘区域,民族解放运动竭力加速工业化进程。同时,这一时期也见证了新兴民族国家抛弃自主型国家生产体系,进行结构重组,融入世界生产体系。这种双重侵蚀即是全球化不断深化的新表现。

这些转化不断积累,导致战后作为世界体系特征的那种均衡的崩溃。这种演变不会产生新的极化形式的新世界秩序,而是导致“全球紊乱”。我们今天面对的这种紊乱源于这一世界体系的三重失败:(1)这种体系没有能够满足全球化生产的新要求,发展出超越民族国家的新的政治和社会组织。(2)这种体系没有发展出一种政治与经济关系来调和亚洲和拉美这些边缘区域极具竞争力的工业化趋势,实现全球增长。(3)这一体系没有与非洲这一未加入工业化竞争的边缘区域确立某种关系,而是把其排除在体系之外。这种紊乱出现在世界各地,也表现在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危机的各个方面。欧洲发展的困难所在就源于此,同时也无法进行市场整合以及确立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结构。这也是东欧、半工业化的第三世界和新近边缘化的第四世界这些边缘区域产生动乱的真正原因。全球化的进程远非可持续,目前的紊乱已显示它的极端脆弱性。

目前的紊乱还将持续。即使可能存在不同的未来“世界秩序”,但这种混乱不应当阻止我们对“世界新秩序”的可能模式进行思考。我们应当留心那些认为全球化不可避免的议题,同时也应当关注全球化的不确定性。

我认为,我们的辩论应当首先深入讨论由于旧的世界体系消



亡而产生的世界新体系的特征。这一新体系存在两种因素:(1)自主中心(autocentred)民族国家逐渐被销蚀,再生产和积累领域的联系随之消失,作为自主中心民族国家主要特征的对政治与社会的控制被削弱。(2)工业化中心区域与非工业化边缘区域不再形成鲜明对比,两极分化呈现出新的形式。

竞争力是经济、政治与社会等因素的产物。在这场不公平的竞争中,中心区域使用“五种垄断方式”,对整个社会发展理论形成挑战。这“五种垄断方式”分别是:

1. 技术垄断。这需要巨额资金的支撑,只有富裕的大国才能实现。没有国家的支持,尤其是通过增加军事开支(这是新自由主义论述没有提及的),这种垄断将无法持续。

2. 控制全球金融市场。由于金融监察法规的自由化,这种垄断具有史无前例的功效。不久以前,国家大部分储蓄只能在国内金融机构流动。今天,这些资金通过金融机构主要在国际上运作。这里说的是金融资本:资本中最全球化的部分。

3. 对自然资源的垄断。对自然资源的开采不计后果,这种危险遍及世界。资本主义建立在短时理性的基础之上,无法克服这种不计后果的行为所带来的危险,只能使得发达国家强化它们对自然资源的垄断。他们所关注的只是,不要让别人插进来像他们一样不负责任地消耗自然资源。

4. 媒体与通讯的垄断。这不仅会导致文化的趋同,而且会带来新形式的政治操控。现代媒体市场的扩张是西方民主实践受腐蚀的一种主要体现。

5.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垄断。冷战后两极格局寿终正寝。与1945年相同,美国成为这一领域唯一的垄断者。假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存在“扩散”的危险,也是由于国际社会缺乏民主机制,“扩散”便成为打破这一无法令人接受的武器垄断的唯一方式。

这“五种垄断方式”构成全球化价值规律的运行框架。价值规

律是所有这些状况的浓缩表现形式,但绝不是所谓的客观的“纯正的”经济理性的表现。这些垄断方式在世界各地实施,取消了边缘区域工业化的影响,贬低了边缘区域人们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却过高估价了中心区域新型垄断活动的新增价值。其结果导致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一种新型的收入分配方式,而这种分配方式比以往任何一种方式都更加不公平,边缘地区要附属于核心地区,只能成为分包者。这便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两极分化的新基石,也预示了未来极化的表现形式。

然而,南方国家,至少是一些南方国家,所处的地位与1955年万隆会议时期不再相同。当时,所有南方国家都被剥夺掌握工业化发展技术的权利。今天,虽然北方国家拥有“五种垄断方式”,但是南方国家仍能掌握现代技术,甚至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发展技术。南方国家能够控制重要的自然资源,迫使北方国家调整其奢侈的资源消费方式。此外,南方国家能够置身于金融全球化以外,建立起自主的贸易网络,以及资本与技术转移体系,也能够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对抗北方国家的威胁与挑战。

## 二 一种替代性的人道主义的全球化模式

与主流的全球化思想不同,我坚持认为“通过市场的全球化”是一种反动的社会改良计划。我们必须提出一种与社会主义理念一致的、替代性的人道主义的全球化模式,以对抗当前主流的全球化思想。

与历史上所有社会制度相同,资本主义在上升阶段已经完成其进步功能。同先前的政治制度相比,资本主义把个人从以往制度强加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发展生产力,把多种多样的社会群体融合成我们所熟知的国家,并且制定了现代民主的基本原则。然而,所有这些成就都带有阶级本质的标记,并被阶

级本质所束缚。“自由个体”实际上不过是“富裕的男性资产阶级”，民主带来的利益为这些人所独享，而现行的政治制度却使得作为人类半边天的女性处于从属的地位。对自然界的开发总是与经济利益挂钩，并且通常只注重短期效应，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只有处于主导性中心区域的国家才享有国家权力，而那些被主导与被殖民的边缘区域国家却被刻意有计划地剥夺了国家应有的权利。全球化扩张不断取得成功，但是资本主义的局限性也在不断积累。今天，资本主义的这些局限足可以导致悲剧的产生。

当代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已经不再能够为个人与集体提供人类追求解放的合适政治架构。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以剥削工人(尤其是工人阶级)为基础的制度，而且已经成为人类的公敌。

现代帝国主义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提供给占世界总人口 80% 的亚洲、非洲和拉美的人民。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帝国主义继续发展可能对少数特权阶层有利，但是却要以多数人的贫困为代价，特别是以几乎占世界人口一半的农民的贫困为代价。帝国主义的众多行为有时具有种族灭绝的特性。资本继续在整个边缘区域占统治地位，而处于边缘区域的人们总是在不断地进行抗争。这些“风暴地区”(tempests zone)通常被系统的主子们称为“流氓”国家和恐怖分子的巢穴。因而，全球化也要求穷兵黩武，以镇压这些抗争。这一镇压过程排除了与社会进步相关联的真正民主化进程，抹杀了边缘区域人民社会进步的真实可能性。

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追逐利益的最大化，加快破坏地球生物繁衍所依赖的自然栖息地。非再生资源(特别是石油)的大量消耗，对生物多样性不可逆的毁灭，以及对生态系统巨大的破坏，最终将威胁这一星球上的所有生命。我们应当清楚的是，这些毁灭地球的方式只会带来愈加的不公平，只会给少数特权阶层带来短期“利益”。当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宣布“美国的生活方式无商榷余地”之

时,他的意思实际上是要排斥亚洲、非洲和拉美大陆上的人民,不让他们“赶上来”,把地球资源只留给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来挥霍(首先是美国,其次是欧洲和日本)。

精英阶层不断扩展自己掌控的新领域。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私有化,以及对水电、住房和交通等基本需求的控制,最终都将加剧社会的不平等,危害人民大众的基本社会权利。

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公敌。因此,这一制度应当被视为“过时的”制度。尽管资本主义的不断扩张获得了明显的成功,但我仍然认为这种制度已到“暮年”。保护人类需要我们走向基于基本原则的新道路,而不是这种强调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全球化的资本积累和再生产的旧体制。

### 三 有必要使人民斗争激进化

金融寡头控制的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扩张,遭到了全世界人民的不断抵抗,使人民可能展开反击。然而,这些抵抗与反击到目前为止仍然支离破碎。在资本主义中心区域的富裕国家,这些抵抗多是在维护自己现有权益,而新自由主义政治每天都在削弱这些所得。在一些边缘区域国家,这些抵抗以落后的文化主义形式表现出来,无法应对 21 世纪的挑战。多数运动反对当前的寡头政治,但是他们并不怀疑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而这些基本原则正是导致人民深受其害的社会悲剧之源。这些运动只是抗争资本主义带来的恶果,却没有充分意识到产生这些悲剧的制度根源。即使这些斗争在某些方面取得一些胜利,却无法转移权利的平衡,使人民大众获利。这便是其中的原因所在。

人民斗争的激进化——我是指人们突然认识到资本主义已经过时——将会决定人民有多大的能力去创造正面的另类选择。斗争激进化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尽管工人阶级及他们的国家投身当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的方式千变万化,但是全世界各族人民都渴望社会进步、真正的民主化与和平。今天,要变得激进,意味要整合挑战的不同层面,而不是分裂它们,这些层面包括:

1. 从最贫困的人开始,要把政治、经济、社会、家庭、商业、学校、社区,以及国家生活管理的民主化与所有的社会进步运动相联系。真正的民主化与社会进步密不可分。无论保护人权、工作权与“机会平等”多么具有合法性(也的确是),但仅限于这些范畴显然不够。我们应当在全世界发起一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运动。人们对未来的愿景可以有多样性,这值得尊重并能丰富人们的视野,但是这不应当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阻碍工人阶级的团结和世界各民族的相互协作。

2. 尊重国家与民族的独立和主权,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多中心的国际体系。这是减少资本主义发展不平等所带来利益冲突的前提条件,用谈判取代残酷的权力斗争,终止我们这一时代北方针对南方的无休止的战争。因此,我们一定要建立“联合阵线”,特别是要恢复不结盟运动和亚非拉联盟,为共同的目标努力奋斗,争取以另一种全球化管理机制取代现存的为金融资本服务的全球管理机制,后者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北约和欧盟,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区一类的区域性合作组织和影响欧盟与非洲、加勒比、太平洋国家关系的组织。在拉美(ALBA计划和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和亚洲(上海合作组织),人们已朝这一方向做出努力。即使当前国际机制在众人眼中已失去合法性,但是我们还远没有击败现存的机制。不幸的是,在帝国主义中心区域的富裕国家中(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西欧、中欧和日本),进步运动的许多激进斗士反对保护民族国家利益的理念,轻率地视之为侵略性的沙文主义。以我个人之见,不管他们是否喜欢,我都认为这些人已成为全球化帝国资本主义的同路人。

这样界定的激进化,与社会斗争的政治化同义,就是明确肯定社会主义的替代选择。政治化就意味着,我们应当了解,没有任何社会运动能够保持非政治性,即使这运动看来是对具规模政治力量和尤其是各党派的复苏逻辑(logics of recuperation)的合法响应,即使拒绝自命为先锋(很多大小政党都躲藏在这称号后面),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进步斗争的激进化要求我们首先击败为寡头全球化服务、旨在控制全球的军事行动。

(译者:官进胜,上海市委党校科社教研部)

## 2 多样的社会运动与新历史主体

弗朗索瓦·浩达

历史上,人类一直在对抗不平等和不公义。过去,社会运动发展于阶级社会中受排挤的社群里;这些社群包括了种族群体、奴隶、农民、宗教上的少数、受压迫的世袭种姓(castes)和随着工业资本主义发展而产生的劳动阶层。今天,社会运动变得多元化和复杂,这是由于全球性经济体系推进着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财富以可观的20%的速度增长,却把其余的人口压制于资本主义市场的逻辑底下,以其文化强加到全世界,损害着地球的环境气候,破坏了人类生活的质量。

目前出现的新现象是差异颇大的社会运动汇聚起来,而1999年在西雅图的联合反世贸运动,和2001年在巴西阿雷格里港(Porto Alegre)的第一次世界社会运动峰会,均把社会运动带进了新的纪元,代表了社会运动反全球一体化(globalization)的新时代;过去十年的努力所带来的一些主要成果便是各种社会运动出现了反全球一体化的认知与共识,并且人们之间也产生了互相联系的网络。有人说过去几年这方面的发展有点出现疲态,这也是对的,因为毕竟要干的已不再是一件新事情,但要投进去的时间和要花的力气都是沉重的,因此,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才把论坛的全球性会议定为每两年一次,而在没有会议的年份则在全球各地举行本地性的活动。

尽管如此,世界社会论坛的工作离完成的一天还很远,对抗世界领导层与决策力量的路途也还是漫长的:每年一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仍然在达沃斯举行会议,为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制定方向,也增加了地区之间接触的机会。故此,要在全球的层面上——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上——达成共同的社会意识还是非常遥远的事情,因政治与社会的现实状况不断演化,也不断地出现新的层面。

世界当前的危机——能源问题、气候异常、食物短缺和金融困局等——都并非偶然,都是当今世界体系的逻辑的一部分,就是为了经济发展无限地剥夺自然资源。这个逻辑,也造就着不公平的社会体系和模式,要扭转世界当前的困局便需要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的抗争。一组联合国专家的研究显示,如果全球气候变暖不被迅速控制,到本世纪的中叶,全球会有 20% 到 30% 的生物种类灭绝。而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特恩(Nicholas Stern)给英国政府的全球气候变迁调查报告也指出,在这一时期会有两亿的“气候难民”。根据联合国的数字,现在每年都有八十万人因为饮水、土地和空气污染而丧生。二氧化碳的加剧排放与全球气候急速变暖,跟 70 年代中期所出现的新自由主义资本经济方向息息相关。

新自由主义时代大大促进了世界财富的增加,全球约有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这令人瞩目的财富增长当中,但同时,世界上也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庞大的贫穷人口,八亿五千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这个现象也很合乎资本主义经济的逻辑,资本主义经济为那五分之一人口的财富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提供快速的发展,令这部分人口能消费高增值的商品和服务,也有助于资本的快速再生产和刺激资本积累。至于其余的世界人口,只有很小的购买力或根本没有购买力,对生产的增值毫无用处,被某些人称为“无用的一群”,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不起作用。因此,今天的阶级抗争是世界性的。



这也是抵抗是从下而上的原因。这个所谓从“下”到上的“下”，在今天已不再单是指传统社会运动中的工人阶级，而且包括了所有受资本的逻辑所影响的社会群体。包括各方在内的社会运动的汇聚也带出了一个全新的历史主体，这个新的主体，跟过去两个世纪不同，已不单是与劳动阶层有关，而是多元的主体：从小农到没有土地的农民、原住民、妇女、城市中的贫苦大众，以至那些受大型经济发展项目所影响的，或者那些因环境破坏导致自然灾害而受难的人们。他们不仅仅是庞杂的聚合群，他们也是群众的行动者，他们的共同意识和反体系态度与日俱增。

现今世界的体系出现了各种新的状况，尤其是在政治与文化上出现一些新特征：如全球文化一体化的问题、自然资源的争夺战（今天是石油，未来便是饮用水）、帝国主义对世界机构的控制等等。今天，社会运动的抗争及其对未来的希望，围绕着以下四个原则问题：

第一，是增长不应基于对大自然的掠夺，而应是在尊重大自然和与其共生共存的前提下，维持可持续增长。这种关于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的观念，非常不同于当今的普遍看法。资本主义注重直线或单向性的进步（linear progress），注重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在这个逻辑之下，很容易便把大自然的资源看成是取之不尽的。实际上，今天某些社会主义，尽管是为着一个整体的目标而不是为着私有利益，也折服于这个跟资本主义雷同的哲学之下。虽然在有关现代性（modernity）的讨论中，社会运动已不断地批判对自然资源的剥削和社会建制的结构。有些人甚至陷入后现代的态度，拒绝所有结构和系统。世界经济体系已建立了新全球一体化的物质基础（信息和通讯技术），对于这一世界经济体系来说，后现代主义是最好的意识形态。然而，我们还是需要把资本体制的逻辑与全球气候恶化的关系肯定下来并清楚地表达出来，这也就是为何我们的第一个原则便是要集体控制（collective

control)自然资源的利用,令这些资源的使用具可持续性。

第二个视角,是使用价值(use value)应比交换价值(exchange value)更为重要,这也正是我们反对农业的商品化和全球化,也反对公共服务的私营化的原因;资本主义的体系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在资本主义的体系中,交换价值便是唯一得到收益(earnings)和提供财富积累的途径,因此需要把一切东西也变成有买卖价值的商品或者产品;故重视使用价值,把资本主义的那一套扭转过来,其所能带来的转变则尤其重大,比如产品的寿命会被延长、产品的制造也会变得本地化以省掉过分的运输程序、有机农业能代替化学农业等等,这一切都意味着不同的经济模式和经济定义,就是说,生产不再是一个为着私人利益而作的简单货物增值过程,却重新地成为人类的活动——为全世界的人类提供物质上、文化上和精神上所需所用的人类活动,而这也意味着对主要生产资源的集体控制,但集体控制却不一定是国有或者是国营的,过去,伟大的社会主义传统在这方面曾有很重要的贡献,但后来社会主义体制开始把资本主义视为竞争对象,把国有化视为唯一的集体控制方法,便慢慢地迷失了原来的路。

第三个社会运动所要争取的,便是广泛性的民主(generalized democracy),不少社会运动都来自受从上而下的层级主义(verticalism)压制的群体,是阶层主义的受害者,因此他们一个很基本的诉求便是基层的参与,也就是说,选举性的民主应该辅以各种其他形式的参与性民主,这个民主概念也应该延伸到经济活动上和经济组织里,也应该实行于所有的社会机构,如卫生机构、教育机构、文化机关,以至宗教组织、工会和政党;最后,性别之间的关系也应建立在男女完全平等的基础之上。

最后一个原则是文化的多元性和文化互性(interculturality),就是不再视西方文化为唯一的现代文明前进方向,所有的人类文化、知识、哲学和宗教,都可能在不同的主轴上有所贡献,这些机

会应该受到保障。

以上四个当今社会运动的基本的方向,可被看做一个集体计划的正在操作中的乌托邦(operating utopia),这乌托邦不是一个幻想,却是一个尽管今天不存在,却能出现于明天的乌托邦。这些方向成为我们行动的动机。在这方面,社会运动的汇聚正面临另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去达成这些目标呢?单是有集体的意识确实是不够的,就算是为具体行动而组成的联系网络也还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有更进一步的联合行动,所以政治层面实属关键。

在这方面,我们得到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反对成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运动是一个例子,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ALCA,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mericas or Area de Livre Comércio das Américas)的概念是从阿拉斯加到巴塔哥尼亚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假如能够实施,便会把拉丁美洲的经济融合到北美的经济当中,但却会使拉丁美洲的经济处于弱势的一方。一个由各方组成的大联盟,包括各社会运动团体、活跃的非政府组织、教会、政党甚至某些拉丁美洲政府,一起成功地反对了这个计划的实行。而整合各社会运动使之成为实质政治结构的新倡议也正在进行中。就是“美洲玻利瓦尔替代发展计划”(ALBA, The Bolivarian Alternative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计划由三个会议组成:元首级、国家部长级和社会运动界。到目前为止,这一类政治性的社会运动联盟还只是出现在拉丁美洲,可是对于实现未来的目标,这些事件很重要。目前,似乎这类事情只是在局部的地区上才可行,但是下一步便是向全球层面努力。

全球化的抗争、阐释新的逻辑、整合具体行动、以民主建设新的机构,这一切都是全人类未来的挑战。

### 3 南方国家反新自由主义 社会运动的动力与挑战

弗朗索瓦·波雷

这部文集由全球各地的数十位作者撰稿,主要是对南方反对社会不公和政治独裁的社会运动提供全景式的概括。尽管并非面面俱到,我们认为它展现了当代民众各种抗争的形式、程度和影响。我们要求这些国家的作者准确清晰地报告他们国内社会斗争的推动和限制因素。

要理解南方社会运动的产生条件、策略和目标,必须考察这些社会运动形成的特殊社会政治背景以及制度和经济环境。

各个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别绝不可以忽视,比如,玻利瓦尔委内瑞拉共和国与海湾君主国家之间的迥异差别,这种差别甚至使我们无法对“南方社会运动”做出统一的概括。然而,所有的南方国家在关于公民社会的发展上都有共同特征,这不是没有意义的;它们都是响应国际社会的主流话语的两种大趋势的其中一种:政治民主和经济自由。当然,与所有的趋势一样,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在不同国家地区之间有着不同的形式。但它们全部是各种抗争形式的对象,也是各种内部与外部社会和制度行动者工具化的对象。

## 一 从民主浪潮到反恐战争

让我们回到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在这一时期南方国家(也包括东方国家)从集权体制普遍地向官方称为民主的体制过渡。不到二十年的时间,这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卷南方三大洲:拉美(1982 年阿根廷,1984 年巴西,1985 年乌拉圭等国)、亚洲(1986 年菲律宾,1992 年泰国,1998 年印度尼西亚等国)和非洲(1990 年贝宁,1991 年马里,1994 年南非等国)纷纷卷入了这一“民主化”的漩涡之中,只有阿拉伯国家成为了逃脱这一浪潮的例外。<sup>①</sup>

民主化趋势的蔓延与国际环境的改变有直接的关系。“冷战”结束以及围绕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原则建立话语霸权,促使西方国家重整他们与那些曾经受到他们强力支持,但在新的国际环境中令人生厌的政权的关系。<sup>②</sup>另一方面,许多国家独裁政权的衰落也是受一系列经济、财政与社会危机冲击的必然结果;这一系列危机冲垮了这些政权的最重要支柱之一:部分人口的相对富足。<sup>③</sup>最终,发轫于公民社会的民主化运动以拒绝政治专断、培育大众对民主的支持、组织社会动员等动摇权力根基的方式,瓦解了那些独裁政权存在的合法性。

但经过几年之后,我们应该审慎地认识这些国家的民主化程度。联合国计划与发展署 2002 年报告说,“经历民主化历程的八十一个国

---

① 尽管民主化受到阿拉伯国家当权者的持续抵制,但我们注意到萨拉·本·内菲萨(Sarah Ben Nefissa)的评论——这一地区的公民社会“主要建筑在激进人士和民间组织对于民主重要性以及在所有阿拉伯地区有必要进行深入改革这种广泛共识基础之上的”。

② 1990 年,密特朗在演讲中宣称,“法国将竭尽全力促进更为广泛的自由”。

③ 结构调整和金融自由化在某些情况下结束了独裁者的统治。在印度尼西亚,苏哈托三十年的强权统治被金融自由化导致的社会政治危机冲垮。

家中,只有四十七个被认为实现了真正的民主”。特别是在非洲,许多国家除了具有了自由选举、多党制和新闻自由等表面的民主形式之外,几乎全部的国内政治生活依旧受到严格的控制。<sup>①</sup>

若干研究显示,即使人们没有对民主进行彻底的怀疑,对民主的希望也开始幻灭。其重要的原因在于,政治的开放并没有带来人们所期望的社会进步。事实上,这一时期的民主化伴随着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统治,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发展上的两个“失去的十年”。当失业、不平等、社会缺乏保障到处肆虐之际,人们很难饿着肚皮去为政治转变鼓掌。

“9·11”之后的国际安全局势问题进一步掩盖了上述矛盾。国际社会不再关注那些在反恐战争中进行充分合作的国家的人权“内部管理”问题。这种变化改变了国内权力关系,损害了那些为拓展民主而斗争的团体;尽管这一变化本身并没有赋予当权者新的立法和司法手段来恐吓那些威胁到他们政治独裁的人,他们会称那些斗士为“恐怖分子”。

## 二 从结构调整到向贫穷开战

另一个使我们了解社会动员环境演进的全球性趋势的是发展中国家被整合进世界经济。那些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助的机构的政策主张广为人知:财政紧缩,公共部门私有化,自由贸易,向外资开放,实行资本自由流动将消除妨碍经济发展的社会负担,提高经济活力;在经历了初期调整的痛苦之后,所有的人就会从经济增长、新的创业与就业机会、价格更低的商品,以及教育、医疗公平的

---

<sup>①</sup> 之所以说是“几乎全部”,如萨伦(Zekeria Ould Ahmed Salem)揭示的那样,与通常的“转型专家们”对民主化转型成败的直线思维不同,在毛里塔尼亚,民主问题的突然出现,总会改变政治关系,并打开了前所未有的空间,让社会行动者与政治领导人协商。

扩展和改善之中获益。

今天,我们已经可以广泛地观察到理论与现实之间的显著差异。尽管我们不能脱离人口、环境因素以及国家战略来观察结构调整的影响<sup>①</sup>,但结构调整无疑是导致越来越多的非正规经济和生活条件不稳定的重要因素。社会动荡的首项征兆被人们忽略,或者仅被理解为陈旧的行为(*archaic behaviour*),造成这个现象的背景,是南方国家的社会精英或者因为信仰、或者因为投机,转而成为自由市场经济教条的笃信者。但社会毁坏的程度与不断增加的社会抗议终止了对结构调整的乐观预期。笃信结构调整教条并大力推销各种结构调整模型的世界银行和发展专家,现在不得不反思他们曾经开出的药方,重新认识他们强力推广的结构调整的后果——不仅是沦为全球化的“失败者”的人数远超乎预期(波及许多国家中的大多数人),而这状况似乎还要持续下去。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发展专家们关心的是造成社会危机相继出现的具体原因,而很少关注自由化政策与贫困的关系。是宏观经济处方有误还是制度框架的弊病导致了前述问题的出现?当今发展理论的主流见解是归咎于后者;因而他们认为要使最贫困人口从经济调整中受益,一方面必须有更好的制度结构,所以必须进行制度改革;另一方面,也要有相应的社会补偿方案。<sup>②</sup>

---

① 像许多非洲主义者一样,维耶尔(*Gauthier de Villers*)强调,地方掌权者对来自外部的压力有着巨大的诠释和化解的能力。“非洲当权者的困境迫使他们必须接受结构调整方案,他们没有权力、能力和动机软化这些方案以使它们与各自的国情相适应;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按照统一模式制定。但作为政策的执行者,当他们发现稳定手段没有给任何人留有余地却保证了他们自己的权力时,他们有办法改变结构调整的逻辑。”

② 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管理从起点上就必须受良好管治的标准指导:政府必须更有效率,学习私人部门的运作方式,拓展公民社会参与监督渠道以使政府更加透明、更富有责任意识,为私人投资者提供稳定可靠的司法、政治和社会环境。此外,政府必须建立社会项目以帮助因经济调整而利益受到影响的社会阶层。

这种所谓的“对改革的改革”，不过力图使结构调整从长期来说在社会与政治方面更为可行，而并没有触动种种结构调整方案的核心。伴随这种政策的，是在修辞上令人惊叹的反击：穷人并非结构调整的受损者，他们之所以受到伤害是因为管理者没有创造出有益于改革的制度环境；因此，以穷人的名义，并且在穷人的参与下，我们要追求“改进了的”改革。

“反贫困战略框架”和“千禧年发展目标”具体地表达了这一范式的改变。二者十分强调政府的拥有权与公民社会的参与，强调应该集中财政资源于减贫项目之中；它们声称调和了捐赠机构（尤其是世界银行）、政府以及代表贫困人口 of 的公民社会组织。这种妥协是那些失去合法性基础的机构故作姿态，还是发展群体的天真唯意志论的最新例证？无论如何，到目前为止国际社会在反贫困问题上的共识，掩盖了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存在的不平等，而没有弱化那些导致不平等和贫困的政策。

### 三 社会动员的条件

亚非拉国家社会经济条件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下面列举的共同性既没有任何特定的排序规则，也并非详尽无遗。这些国家在私有化过程中取消了对牛奶、面包、石油等家庭基本消费品的补贴，公共服务品价格上升导致了消费水平和城市人口生活水平的大幅度下降。公共服务与公共企业的私有化造成的失业严重地影响着中产阶级，被鼓励自己创业（是结构调整的一揽子政策中的“社会经济重建”政策的一部分）的成千上万的国家雇员，最终不得不接受门卫、出租车司机等工作岗位，或者只能在非正规经济部门中谋求生计。产业工人也面临相似的境遇，那些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企业不得不以解雇员工、业务外包等形式进行调整，有的不得不关门大吉。反对这一过程的社会专业人士如工会人士被污蔑为利



益集团分子；他们是为了固守他们的特权从而阻碍改革，特别是被认为是有利于穷人的劳动力市场化改革。

在农村，支持农产品生产和分销的公共机制的消亡，以及农产品市场开放导致的价格下降，给小规模的生产者带来了沉重的压力。由于不能按照合理的价格出售产品，他们被迫出售土地还债；失去土地之后他们或成为大土地所有者的雇工，或者成为免税区中外国企业（例如设立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上墨西哥一侧的美国企业）的雇工——如果他们并没有被逼到只有通过自杀才能逃避绝望的境地的话。<sup>①</sup>

在经济的“现代的”发展中必然出现的跨国公司、旅游景区和城市扩张，与用于掠夺森林、矿藏、石油等自然资源的水坝、高速公路、机场、石油管道等巨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起，不断地造成对乡村的掠夺。那里的人们承受了失地、污染和自然资源损毁这些恶果，却无法从中获取补偿。

所有这些生活条件的恶化激起了各种各样的广泛抗争。但与关于社会关系的机械论观点相反，人们不会自发质疑官方的政策。

每天为生存而挣扎，是直接的当下的，但不会促使人们加入到争取物质利益的社会抗争之中，目标看起来似乎是不确定，而且遥不可及。耶菲斯·楚瓦拉（Yves Chouala）对喀麦隆的观察同样适用于其他国家：“助己助人的观念极大地削弱了喀麦隆公民社会的能力与政治良知；这种态度和采取批判的方式来行动与质疑领导权力的做法完全相反。”

除了物质压力之外，还有等级分明的社会政治背景：在许多地区里流行卑躬屈膝的政治文化。我们要避免堕入文化决定论，但

---

① 文诺·瑞纳（Vinod Raina）在一篇研究印度的文稿中提到，印度粮食与食品部部长宣称，自1993年自由化政策实施开始到2006年7月，印度总计有一万零四百二十八名农民自杀。

必须考虑到这些地区敬畏权威的历史传统；这一点对于那些政治开放并非源于广泛的公民运动，而是来自于由上而下的民主化计划的国家尤为重要。通常，这些地区政治生活依旧把握在那些“所有者”和“大人物”手中，他们决定给谁多少庇护和好处，影响着大众的选票和政治行为。<sup>①</sup> 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议常常因部族或家族关系产生，并导致不同部族或家族之间关系的紧张。

但这种观点也需要另一方的观点来平衡。即使在利益表达与代表渠道缺乏或被严格控制的最专制的环境中，统治者的政治和政策行为也不能完全消除所有的民众抗争。与西方国家社会运动不同，这种抗争经常导致无法预计的不可控制的暴力行为。1978年突尼斯的“面包骚乱”、1984年摩洛哥“生活费上涨骚乱”、1989年委内瑞拉首都的“加拉加斯骚乱”是此类抗争的典型代表。或者，抗争可以通过日常形式多样的“超越政治的”抵抗：越轨行为，非法接入电力供应，抵制、损坏公私财物等。

在以集体行动提出要求之前，人们必须对民主体制整合社会需要有最低程度的信心。而在一些国家，这种最低程度的信心越来越少。许多国家给人们的深刻印象是没有什么改变，或者说这些国家“一切全都变了，以致什么都没有变”。民主不过是一个新的框架体系，同样的一伙人在这个新的框架之中争权夺利，妨碍了经济与社会变革。人们对民主的期望幻灭，领袖们的生活方式和人民愈来愈不稳定的处境形成鲜明对比，人们变得犬儒，他们抵制选举，忙碌于个人生计；他们更关注个人如何在社会向上爬、移民，又或者加入为争夺更大利益而组成的关系网络和政党。

在如此困难的现实环境之中，将个人与集体经验和政治决定

---

<sup>①</sup> 在与政府关系上，许多国家从未有过法律意义上的权利和平等概念，盛行的是利益输送和世袭逻辑：个人的家族背景和人脉关系是获取国家资源的决定性因素。

联结起来、将社会中最弱势群体组织起来等等政治活动,都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对于社会的不满要孕育结构化的抗争,运动斗士(真正的“动员企业家”)采取的行动就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sup>①</sup>

#### 四 战略与政治效力

社会运动用什么战略才能有影响力,才能使那些恶化生活条件的政策软化?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了解国内巨大不平等产生的原因:被发展政策侵害的群体常常在政治上被边缘化,这些群体的意见和利益要求无法反应到立法机构和政府的决策过程之中;另一方面,也要了解这些南方国家与国际组织、北方国家与跨国公司都对国内政策有着重要影响力的外部势力之间的不平等。

战略成功与否取决于多种因素:社会行动者对政治事态以及权力关系的观念,他们所能够支配的资源,斗争的结构方式,以及统治者引导或中和社会大众需要的策略,等等。社会运动政治效力特别依赖于两个方面的因素:其一,社会行动者的联合;其二,公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关系。

#### 五 联合的挑战

被动员起来的团体最具逻辑性和有利的策略选择,是将他们的力量和声音与国内具有接近和相似目标的社会运动整合为一体。这会使他们的抗议更广为人知,产生更大的政治共鸣。这看

---

<sup>①</sup> 但我们能够观察到激进号召越来越少。很多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政治运动领袖已经被整合进了国家机器之内(比如南非的非国大和巴西的劳工党)。年轻一代的社会运动领袖则无法抵御非政府组织或者国际发展组织提供的有空调的办公室和与发达国家标准一致的工资的诱惑。

起来很有必要,可是联合不会自然形成。实现这种联合首先要求参与的人们暂时从他们的处境中抽离出来,不管处境有多迫切,要从其他团体身上发掘大家共有的一致性。

这种“普遍意识的增强”一般通过象征性地建立一个共同的身份或者对手来形成。泰国“穷人议会”组织的形成说明了这种战略的演进。正如这一组织的活动家范尼达·坦体菲塔毗塔克(Vanida Tantivithapitak)解释的那样,“将针对不同问题的活跃网络整合在一起,我们提高了解决所有问题的能力。实现这一点,必须找到一个能够整合所有的问题并得到社会支持与同情的象征性标志。‘贫穷’这个词汇有助于解释政府和跨国公司对贫困的责任。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的持续不断的斗争和抗议得到了社会的理解并获得了合法性”(Prasartset,2004)。

有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社会行动者也很难走到一起,原因是意识形态和宗派分野分化了他们。这种社会斗士之间的分裂在阿根廷失业者运动(piqueteros)和印度的大规模社会运动中表现得特别引人注目。尽管他们出于共同的目的并肩地参加抗议游行,但不同派系的逻辑或教条常常成为阻碍他们联合行动的障碍。相反,在埃及,被称为“够了!”(Kifaya)的社会运动将纳赛尔主义者、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乃至穆斯林兄弟会整合起来,共同反对穆巴拉克政权;这种模式是长期克服传统上不同社会运动组织的分裂的结果,具有建设性,令人鼓励,之所以可能成功,是因为共同拒绝独裁统治。

社会运动联合的挑战,也涉及在不同国家社会运动之间搭建桥梁。当越来越多的社会行动者认识到,对国内生活造成影响的政策不断地受到诸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操控的时候,社会运动的国际化,以及另类世界运动的出现,就是必然的结果。除了引人注意的世界社会论坛之外,社会抗争已开始区域层面上出现并组织起来,尽管并不均衡。当

美洲大陆联合起来反对“美洲自由贸易协定”成为报纸头条的时候,同样不能忽视亚洲对亚洲开发银行所作所为的抗议,不能忽视非洲各种社会运动在非洲债务和自由贸易协议等问题上的共同行动。

跨国界的联合当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碍。正如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民族国家感情令某些公民社会不安<sup>①</sup>,世界另类运动对于“经济”议题的分歧和阿拉伯民主组织之间对于“政治”议题的矛盾,或者不同的国际社会论坛里缺乏代表性(精英主义?),都是阻碍社会运动跨国联合的因素。

## 六、与政治关系的挑战

社会运动与政界人物的关系是影响社会动员的另一个要素。对于大多数处于斗争之中的社会行动者来说,与能够为他们带来利益、对政策制定有直接或间接影响力的个人或政党结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特里萨·达邓(Teresa Tadem)在她的一篇对菲律宾的研究论文中引述了一个事例,班格特(Benguet)省的菜农与经选举产生的地方高官结盟,抵制住了中央政府的市场自由化政策,避免了低价蔬菜进口对他们工作岗位的冲击。

此类做法在任何的民主体制下都是微妙的;对于那些民主是历史上从外部输送进来的国家,这样的做法尤其微妙——在这些国家,党派在较少程度上代表了利益集团,或反映了意识形

---

<sup>①</sup> 国家主义者的反应在某些国家,比如土耳其,表现得特别敏感(见埃尔迪·居林·勒朗代的文稿)。但在另一些国家也出人意料地发生了同样的情况,比如最近阿根廷和乌拉圭两个国家对于在两国界河岸上修建造纸厂问题上的争吵,大多数阿根廷和乌拉圭的公民社会都彻底地被各自政府的民族主义的措词所掩盖。

态选择,而较大程度上是作为选举机器,是寡头不同派系之间公然制造出来的工具,是为了争权夺利。激进的社会运动人士面对的挑战,很难在这样的社会中找到值得信赖的支持力量,在这个领域里,程序化的浅薄(programmed superficiality)富于争议,它被用来掩盖决策过程中的缺乏透明度。同时,社会运动斗士还要小心避免被其所代表的社会阶层误导和工具化。

我们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对群众的理想化:不是只有政治人物才知道组织起来的基层大众在选举中的作用。领袖或者整个组织只为利益输送者服务,或者只顾讨价还价(这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这种情况并不罕见。例如,刚果公民社会中的精英通过参与刚果内部的对话得到了在公共机构中稳固的政治职位。在某些地区,“政治企业家”把大众的不满化为其“原始政治资本积累”的趋势更突出,为了要建立进入政界的社会资本,他们以此作为不可或缺的首要步骤。

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的国家里,左翼政党是社会运动“自然的”政治联盟对象,至少大家在语言、理念和主张方面一致。部分左翼政党,比如巴西劳工党,本身就是社会运动的产物,是广大群众运动在政治方面的伸延。在不同的国内条件下结盟有着不同的具体策略,一般视政党掌权的机会而有所不同;从斗争的动力以及制度的不稳定状况(比如,玻利维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到努力疏导社会能量以维持国家的管治性,都是影响这种联盟策略的直接因素。劳尔·兹别奇(Raúl Zibechi)指出,乌拉圭工会与“广泛阵线”(Frente Amplio)结盟,组织2003年反对国家石油公司私有化和2004年反对水务私有化公民投票,是这种结盟作用的典型代表。

社会左派和政治左派的关系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左翼政府的产生,拉丁美洲目前正是这样。而左派的“历史”计划与左派政府政策之间总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不一致,这种情况又不可避

免地造成左翼内部的社会左派和政治左派的关系高度紧张。<sup>①</sup>

这种紧张关系有时使联盟戏剧般地破裂,进而产生新激进群体,试图动员对于中间左倾政府的现实政治感到失望,或者受其政策伤害的阶层。例如,在巴西卢拉政府推出改革养老金政策之后,“激进工会联盟”(CONLUTAS)是脱离劳工党与“巴西工会联合会”(CUT)而形成的新工会;同样,墨西哥萨帕塔主义者马科斯领导的“另类运动”(Other Campaign)与洛佩斯·奥夫拉多尔(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领导的左翼“民主革命党”(PRD)分道扬镳,南非在非国大(ANC)执行私有化政策之后出现的“反非国大”社会运动,都是此类矛盾爆发的表现。

过去几年中,国际援助机构开始强调,发展战略与反贫困政策的制定必须有公民社会参与,这是否是决策者从受发展损害的人们发起的社会运动中受到触动开始觉醒的前奏?或许,这些参与性安排的未来自潜力,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公民社会的组织程度和权力掌控者的政治意愿。

非洲的经验表明,新的“磋商”空间主要向那些名声显赫、资金充裕的组织开放,还有那些和国际发展援助有同样的语言和愿景的人。结果是,它们边缘化了那些对主流政策坚持激烈批评的社会行动者,打造了一个顺从的公民社会;这种公民社会以作为人民大众和国际援助机构的中介而取得合法性,事实上是赋予政府以及发展专家以更大的合法性。

---

① 这种现象不仅仅在巴西、乌拉圭等公开走中间路线的国家存在。在玻利维亚,埃沃·莫拉莱斯领导的、被广大农民和激进的原住民当作是“政治工具”而不是政党的“争取社会主义运动”(MAS),在执政之后也和由区域性组织和激进工会构成的左翼社会反对派正面冲突。

## 七 抵抗的程度

反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社会运动的出现和扩大的影响当然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有所不同,这取决于动员的程度、政治背景、政府有多少边际空间可以调动反应(margin of manoeuvre),以及观察家的评价。

我们很难避免提及拉丁美洲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图景,委内瑞拉、阿根廷、巴西、乌拉圭、玻利维亚、智利(或许现在还有厄瓜多尔)等国相继出现左翼和中左政府,形成了一波“粉红色浪潮”;美洲自由贸易协定(FTAA)的冻结就是这种广泛持久的社会动员的直接成果。尽管如此,如果要评价这些左翼政府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看法会各有不同。<sup>①</sup> 左翼政府的执政政策确实存在着差异,在玻利维亚,莫拉莱斯总统坚持进行深度的制度变革,实行有利于穷人和土著人的经济社会结构调整,并且更强调国家的主权;而在巴西,尽管卢拉总统不断地试图扩大对最贫困人口 of 的援助计划,但他没有改变前任总统的经济教条。<sup>②</sup>

我们不能因拉美国家的这方面的重要发展而低估其他南方国家的社会运动。这些地区政治局势一般不利于社会运动,社会运

---

① 有关拉美国家左翼政府的差别,参见《拉美左派的运动与权力》(*Mouvements et pouvoirs de gauche en Amérique latine*),《另类南方》(*Alternatives Sud*)杂志 Vol. XII, 2005, 2。

② 巴西的激进运动人士对于“占据政府并不意味着掌握权力”有着痛苦的经验。然而是否存在政治调动反应的边际空间(在国会和地方政治之内)以及经济调动反应空间(外债情况以及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虽然有重要性,但不是进步政府采取某种策略的唯一解释。当权者做或者不做哪些决定,也可以由追求和意欲保持权力来解释,这种情况大大改变了这些政党的内部动力(政治计算和各种让步往往优先于寻求变革的渴望)。如果它们的选民基础愈广阔,联盟更广泛,它们与人民运动的联系就会减弱。



动的第一个贡献是帮助那些因为国家经济要整合到世界市场而深受其害的社会阶层,让他们从阴影中走出来,走到政治舞台的前面。他们的存在、他们的动力,迫使负责制定经济政策的当权者考虑其政策对不同的社会阶层具有不同的社会后果,并在国际层面上更为积极地维护不同阶层的利益。西非国家领导人与世界贸易组织在棉花争端上比以前强硬就是一个例证。这是因为他们受到了国内的生产者组织和欧洲非政府组织支持的国际“农民网络组织”(Network of Peasant Organizations)、“西非农民与农业生产者联盟”(ROPPA: Agricultural Producers of West Africa)的强大压力。

人民群众的抵制无疑阻碍了国际金融机构倡导的反社会的改革进程。让这些理论家不满的是,在激起了广泛的社会抗议之后,许多国家暂停、推后甚至取消他们倡导的改革方案。很多地方反对跨国公司掠夺自然资源的项目和忽视地方民众利益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的斗争也取得了胜利;在国家层次上精心组织的宣传运动使民众的权利得以超越商业利益。南非的“医疗行动运动”(TAC: Treatment Action Campaign),打破了药业跨国公司巨头们的专利垄断,使大众能够买得起专利的抗逆转录酶病毒基因药品,也打破了南非政府的惰性,这些成果的鲜明特征是集体行动协调得极其有效和富有智能。

虽然这些在政治和法律方面的成就令人鼓舞,但是成果能否持续,还不明朗,而且取决于国内与国际间权力关系的发展。两年前,文诺·莱纳(Vinod Raina)曾对印度国大党领导的中左翼“团结进步联盟”(United Progressive Alliance)采纳一系列社会运动要求(如保证农村就业)的法律提案深表欢迎,但现在则叹息由于联盟被新自由主义者主导操纵,这些法律现在被掏空了所有的实质性内容。在这些地方,制度机构的代表性存在疑问,那么政治领域的

社会和民主成就能有多长久,取决于社会运动在长时期内保持最低限度社会动员的能力。

(译者:陈弘,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

## 4 文明的抉择——另类全球化与全球命运共同体

黄钰书

我会尽量写一篇精简的导言,虽然不可能比画家达利更精简。有一次演讲,他说:“我会说得很简短,我说完了。”

我也希望能像达利般洒脱利落。不过,全球化是很复杂的问题,即使花一整本书的篇幅来探讨,也是不够的。既然是这样,我只能满足于在这里提一个很简略的架构,帮助读者较全面地思考这个特殊的历史现象。

我认为全球化目前正陷入困局。全球化把人类推到十字路口上。我们面临的是文明抉择。未来人类和所有生物体的命运,都将会取决于你和我今天的抉择。

### 一 谁是反全球化分子?

社会运动长久以来都以其对立面来自我界定(抱歉这有点黑格尔的气味):以资本主义为对立面,出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针对殖民主义,涌现了民族解放运动。19世纪末至20世纪70年代,这两种运动构成了全球社会运动最响亮的主调。到20世纪90年代末,出了反全球化运动浪潮。可是针对全球化的运动还没有产生一种新的身份认同。不仅没有产生统一的某种身份认

同,甚至没有因为反全球化而出现新颖的身份认同。<sup>①</sup>

反全球化运动之所以没有催生新的身份认同,与其说是因为什么“后现代性”,倒不如说是因为全球化本身是很复杂的现象,掩盖在重重迷雾里,以致连在反对它的旗帜下聚集的人,其实大部分也看不清楚它的面目。全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里最令人目眩的现象之一。

## 二 反全球化要针对谁?

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都是很复杂的历史现象,可是全球化却显得更混杂,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所谓的全球化进程,说到底正是几百年来世界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历史延续。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即是针对资本家,而民族解放运动反对殖民主义,正是针对殖民主义者。(必须说明:有清晰单一的敌人,不一定是好事<sup>②</sup>。)

那么反全球化,其实针对谁?首先是全球化各式各样的代理人: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会(IMF)、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与某些以促进发展和慈善为名的 NGOs 等等……而这些国际组织,很明显向富裕国家的利益倾斜,可是为什么贫穷

---

① 每次在某时某地的抗争里,聚集在反全球化旗帜下的松散队伍,是形形色色异质混杂已经存在的身份:农民、无政府主义者、各种派别的激进左派、环保分子、倡议免除第三世界债务者、工人、穷人、工会(保护)主义者等等,甚至包括右翼国家民族主义者。这种颇具“后现代”色彩的新型运动联盟形式的性质,也是《抵抗的全球化》一书后半部探讨的主题之一。

② 心怀暴烈的激情去对抗敌人,往往会不自觉把敌人内化在自己的心灵里。例如社会主义运动结果让国家成为单一的超级垄断资本家,国家社会主义沦为最糟糕的资本主义形式;而在民族解放运动里诞生的国家,往往长期处于后殖民状态:殖民时期的权力和意识/欲望形态,根深蒂固深植于政治、社会和文化里。这是很复杂的抗争心理学问题,我们要认真阅读尼采对黑格尔式奴隶意识的批判。

乃至较不富裕的国家领导者会屈服于这些国际组织开出来的苛刻条件呢？除了归咎于某些国家腐败无能的领导者之外，还有国内某些利益集团可以从中得益，此外最重要的当然是，大部分国家幻想接受这些条件可以让他们即使是匍匐着来进入全球化俱乐部，也总有一天可以爬起来有幸跻身最富裕国之列。而即使在富国里，不同的利益集团也会发生冲突。所以全球化代表的利益，是多层次的。如果反全球化运动连究竟要针对哪些主要的人、哪些问题，都不明确，更不用说应该有什么对应策略了。

《抵抗的全球化》这本书是对反全球化运动的初步总结，可是我们看到：对于聚集在反全球化旗帜下的人，全球化仍然只是一种模糊的直觉。反全球化运动，往往缺乏全球化视野。

### 三 什么是全球化？人们知道 GUTs 吗？

最简单来说，全球化就是全球不平等贸易 (Global Unfair Trades) 的扩张。而 GUTs 的核心，正是赤裸的自然资源掠夺战争。

自由贸易 (Free Trade)，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强大的普世宗教。它挂在各国政策制定者的口边来巩固自己无可置疑的权威性，被供奉在神圣的学术讲坛上，被亿万第三世界穷人日夜期盼着：希望那神圣的“看不见的手”能从贫困深渊里拯救他们。尽管政策制定者总是弄得国家一塌糊涂，学者始终无法自圆其说，穷人依旧那样贫困，我们对自由贸易的信仰仍然那么坚固，这正是这个宗教的强大之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神学，传媒是这个时代的教堂。）

这是希望的政治，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意识/欲望形态垄断了人类的集体希望。这种全球化的支持者所描绘的天堂仙境是：全球在科技和自由贸易体制下整合成统一市场，于是全世界的人都

可以分享那源源不绝创造出来的财富。<sup>①</sup>

也许某些社会阶层确实能受惠于国家投入不平等贸易,可是参与全球化的国家愈来愈陷入所谓的 M 型两极化。粗略划分,受全球化影响的人落入四种类别:

1. 全球化的主要玩家:金融资本家,跨国企业及其代理人(金字塔顶层);
2. 某国内直接受惠于全球不平等贸易的阶层及其代理人(数量愈来愈难以增加);
3. 因为所谓的 trickle-down effect 而间接和暂时受惠于经济发展的人(数量正在缩减);
4. 由于不平等贸易和资源掠夺而受害的人民以及其他物种的生命(一直以来乃至可见的将来都是大多数)。

20 世纪最后十年,全球化进行得如火如荼,但世界的绝对穷困人口并未减少。1990 年世银估计当时全球每天生活费在二美

---

① 这里没有篇幅去论述现行的全球化自由贸易不仅无法为大部分人类带来它所承诺的美好生活,反而令亿万计的人活得更贫困。可以参阅前世银首席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 Joseph Stiglitz 的《全球化及其不满》(*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作为一位有良知的专业经济学家,他虽然对 IMF 大加鞭撻,也指出背后牵涉到千丝万缕的政治利益,但基本上,在他的描述里,IMF 只是一群无视现实、倨傲僵硬的市场万能教条主义者。可是读了最近震撼西方的《经济杀手自白》系列(包括《自白》、*A Game as Old as Empire* 和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Empire*)后,就会明白,这些国际机构其实是严格称职地服务于经济侵略;此外可读 Michel Chossudovsky, *The Globalization of Poverty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贫穷全球化和新世界秩序》)和 Christian Aid, *The Economics of Failure: The Real Costs of "Free" Trade for Poor Countries* (《失败经济学:自由贸易对于穷国的真实代价》);较短的, Kema Irogbe, "Glob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of the Third World," *Journal of Third World Studies*, Spring 2005; Jerry Mander 和 Edward Goldsmith 编的 *The Case Against the Global Economy* 收集了多篇可读性很高的短文,从多方视野审视全球经济;还有许宝强《全球化不是什么》(《资本主义不是什么》第 5 章)。

元以下的人口有二十七亿。到了2001年,数目还是一样<sup>①</sup>。可是我们要小心,用货币收入来衡量贫穷容易具有误导性。即使全球的人每天都能有三美元的生活费(按国际标准全球贫穷问题就解决了),也不能保证一定是有尊严的生存方式。可是有些数字却是绝对的,现在每天还有两万四千人饿死,即每3.6秒就有一个人饿死,75%是孩子(假设你花十五分钟来读完这篇文章,这期间已经有二百五十人饿死了)。有八亿人长期饥饿。每年有六百万孩子在五岁前因营养不良而夭折。不是全球缺乏食物(美国每年抛弃的食物就足以喂饱加拿大),也不是我们没有能力解决问题。我们有能力从地球最偏远的角落榨取自然资源,却对蹂躏全球的种种人道危机坐视不理,这是人类文明的耻辱。

我们也不应该忘记相对贫穷。过去五十年间,国际财富增加了七倍,世界一半的人口却未能实际受惠。当联合国世银等机构量化出一条绝对贫穷线,高调向贫穷宣战时,实际上可能掩饰并继续推动造成严重相对贫穷的世界性体系(支撑掠夺性不公平贸易)。讨论贫穷,绝不能离开世界公义的理念。

有人会辩称:这是因为落后国家没有发展出科技和民主。如果美欧日由于科技发展仅仅利用本土的资源便创造出美好的生活,我们也许无话可说,可是它们所消耗的大部分宝贵资源却是来自世界各地。在西方历史上,科技进步和全球资源掠夺,一直是密不可分的双生过程。电脑技术也许是美欧日发明和改进的,但是

---

① 有人会辩称这十年世界人口增加了,即意味绝对困穷人口实际减少了。但我们也要考虑这两美元的购买力在这十年下降了。用货币收入定义贫穷易往往具有片面性和误导性。较好的指标应该是每日平均摄取热量和整体生活质素(卫生医疗教育等),也要考虑文化贫穷的问题,如果要每天工作超长时间来赚取这两美元,肯定是低生活质素和文化贫困。总之,关于贫穷的讨论往往带有严重的偏见和误导性。联合国世银等机构突然高调关注贫穷,可能只是绕一个圈来提倡 GUTs。参考本书麦斯旦《向贫穷开战:为世界新秩序服务的政治话语》。

缺乏了刚果的钽(tantalum),还有亚洲工人的劳动力,就无法制造电脑主板。全球化体系服务于美欧日在全球各地搜刮宝贵资源,不仅无法解决很多天然资源极丰富的国家的贫穷,而且是很多问题的根源。这是对人类文明进步的最大讽刺。<sup>①</sup>

我们别忘记:今天非洲因为长期战乱而导致的贫穷、饥荒和环境灾难,很大程度上是殖民统治遗留的问题。在当代非洲,造成数以百万计平民死亡的内战,不少是美英跨国公司,尤其是石油公司背后支持和挑拨的。曾任国会议员的美国社会运动领袖麦金妮(Cynthia McKinney)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数十年来掠夺非洲的财富,并且默许,甚至协助屠杀非洲人民……一方面不遗余力营造这个神话:非洲今日的问题大部分是非洲人造成的。我们都听过西方辩称:非洲问题源于腐败的政权、根深蒂固的种族仇恨、不成熟的人民。可是我们知道这是谎言。……非洲苦难的核心,在于西方,尤其是美国,意欲掠夺非洲的钻石、石油、天然气和其他宝贵资源。”<sup>②</sup>(前经济杀手帕金斯[John Perkins]就听过他的前辈说:“如果想[美国的]孩子活得好,我们就要控制非洲。”)

全球化的过程,也是全球媒体不遗余力在妖魔化贫穷国家,竭力掩饰富国为它们带来的苦难,然后大肆宣扬由美欧日主导的自由贸易将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答案的过程。

#### 四 全球化的不公平命运

国际贸易已经是进行了几百年的事情。到了今天,美国西欧日本

- 
- ① 从古希腊思想到马克思,我们很易读出一种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学偏见:物质和自然是没有价值的。愈远离自然,愈有价值。所以知识产权最有价值,工业劳动又比农业劳动有价值。可是悖论的是,这种精神主义实际上一直服务于物质掠夺。所以先进国家对自然资源丰富的弱国进行资源侵略,为后者带来苦难时,人们也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后者没有发展出科学精神。
- ② 2001年4月6日国会听证发言。



平均每人消耗的自然资源,是第三世界居民的三十二倍,产生的废物是二十二倍。世界上20%的人口消耗了全球80%的资源。最富裕的七分之一人口消耗了50%的石油。即使在美国内部,最富裕的5%家庭拥有的资产价值超越95%家庭的所有。全球排名前六位超级富豪拥有的财富超过世界上最贫穷的六亿人的全部所有。任何一个心智和情感正常的人都不禁会疑惑:这中间一定出了点问题。经济道德家说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彻底奉行自由市场政策。听起来好像很熟识?对!宗教家说:你受苦,是因为你不够虔诚。这个制度是平等的,但一小撮人比其余所有人加起来更加平等。<sup>①</sup>

这是不幸的异态吗?这仅仅是因为大家一直没有好好奉行自由市场政策吗?撇开作为道德形而上学的那种学院经济学不说,某些较严谨的研究者却认为极度不公平其实是全球化贸易的常态。既然历史上根本从来没有出现过经济道德主义者奉若神明的完全自由市场,我们只可以通过建构较严谨的理论模型来推测。所罗门(Sorin Solomon)研究队伍的理论模型显示:新自由主义式全球化难免导致不稳定性,即财富不公平地集中在某些地区,以及某些弱势地区的经济崩溃(《不公平的危机:全球化的不稳定性命运》)。<sup>②</sup>

经济物理学(Eco-physics)的模型显示:极端控制贸易和极度放任的自由贸易,都会导致财富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上或某些地区。这是比较符合现实的模型。<sup>③</sup>

① 人们的解释总是“受害者自作孽”(blaming the victim):你沦落到这个地步,是因为你没有掌握到那个秘密(看不见的手?),所以坊间有大量指导人成功发达的书籍,而国际上则充斥着经济发展顾问和经济杀手。

② *The Risk of Being Unfair: the Unstable Fate of Globalization*, Louzoun. Y. Mazurski. D., Goldberg. J. Solomon. S. (2003), *Artificial Life* 4(9) 357 - 370.

③ 参阅:Philip Ball, *Critical Mass*(《临界质量》)第8至10章。

## 五 全球化的病态心理学

无论如何,作为全球化某种程度得益者的我们,每天起床,总有清洁的自来水和电力供应,打开电脑,全球信息源源不绝,只要我们总能从ATM提取钱,总可以在附近的超市买到食物,自然会想:全球化的确是很好的东西。

为什么会有这种幻象?让我们看看支撑全球化的三大要素:全球信息网络、全球金融体系以及原材料(包括人员)运输(所谓的物流)<sup>①</sup>。资本、政治和军事活动皆依赖这三大要素。借用拉康(Lacan)精神分析学的三分法:象征(symbolic)、想象(imaginary)和实在(real),我们不妨把三大要素对应全球化的三大领域。全球信息网络象征了全球化的美好秩序,全球金融体系代表我们的财富想象,而全球物流网则处理实在的物质能量流动。

“全球化”这个符号之所以令某些人亢奋,是因为它代表某种升华了的欲望。只要我们小心排除来自实在领域(the real)的侵扰,活在象征和想象的世界里,就可以继续沉醉在某种升华的出神状态(sublime ecstasy)里<sup>②</sup>。象征的领域代表了理想的秩序,而想象的领域,是面对无可避免的冲突时,人们以想象的化解冲突矛盾方式来舒缓焦虑。可是象征和想象领域总会出现裂缝。金融市场总会一而再出现动荡,让我们想象的财富化为乌有,例如最近的次级房贷危机,就提醒我们全球金融的疯狂流动

---

① 而全球金融体系又依赖全球信息网络,事实上,绝大部分在全球流动的货币,都只不过是信息网络上的一连串数字。再简化,就是两大流动体系:信息和物质/能量。

② 这方面的理论先知是 McLuhan 的 *Understanding Media*。早在 1964 年他已提出全球村(global village)。这本经典著作的行文风格几乎是先知式的出神状态。

性。而且,实在(the real)是任何秩序都无法完全整合又无法排除的剩余(residue, the redundant, the others),总会一次又一次侵扰我们的好梦。

对很多人来说,全球化的实在物质流通领域就是体现了财富的商品络绎不绝在全球流动,还有人,起码有钱人可以去世界各地自由旅行。可是,我们总无法排除现实的顽固阴暗面:人员流动也包括人口贩卖和偷渡(我们欢迎容许资本自由出入,促进资源流向富裕国集中,却严厉防范穷国人员流向富国,仅仅是这个现实本身,不就足以让整个全球化乌托邦崩溃吗?);物质的流动,还包括资源掠夺和污染废料的偷运和倾倒排放。

不妨借用孔蒙拿(Barry Commoner)的四条生态学原则来说明:

1. 万物相连(Everything is connected to everything else.)
2. 万物皆有去处(Everything must go somewhere.)
3. 自然最适(Nature knows best.)

4. 没有东西白白而来(Nothing comes from nothing.)(《封闭圈》[*The Closing Circle*])

没有东西白白而来,我们能创造这么多商品和服务,是因为大量耗费了不能再生的自然资源;万物皆有去处,我们每消费一件商品,总会产生污染废料,它们最终会被排放倾倒在某处;万物相联,我们这样做,总会影响某时某地的人类和其他物种生命。这就是人们惊叹于现代全球物流系统的高效率,享受干干净净的物质能量的转换和流动时,另一种无法排除的事实。消耗大量不可再生资源而建设起来的超级城市,精心营造净化的假象,是全球文明的示范单位,可是通常就在大都会的不远处,人们就能感受物质和能量转换流动难以抹掉的烙印,例如大城市日益严重的空气污染。

## 六 与帝国一样古老的游戏:掠夺资源

把物质能量的来去流向重新带进视野,事情就豁然开朗:所谓全球化,不过是某些利益集团推行全球不平等贸易(资源集中流向富国);而所谓全球自由贸易的理想,实际就是毫无节制的国际资源掠夺<sup>①</sup>。那么全球化,说穿了,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情,而是已经进行了几百年的古老活动。如果不算古代地中海诸国对非洲的殖民侵略,那么今天的全球化进程,在五百年前哥伦布踏足美洲大陆旁的一个小岛时,就已经展开(以信息、金融制度和远程物流三者来界定)。它经历了野蛮的殖民主义、帝国资本主义年代,而全球化自由贸易,不过是它披上文明外衣的当代历史形态。<sup>②</sup>

于是,强国通过 IMF 等打手组织,抱着高高在上倨傲的白人救世主心态,以扶助穷国发展为名,慷各国纳税人之慨,“贷款”给穷国,强迫它们接受苛刻的条件。表面上不再是明刀明枪的侵略,而是看起来非常文明的援助、专业方案,以及由所谓的科学和数据堆砌的经济学真理。但是结果呢?感谢上帝,穷国终于得到贸易的权利,来自富国的跨国公司却控制了穷国的宝贵自然资源。所谓的援助款项大部分用来建设有利资源出口的设施,而不是改善民生,而且通常由美国公司来承建。而出口资源的收益,大部分成

---

① 全球化作为掠夺资源的进程,请参阅:Stephen G. Bunker and Paul S. Ciccantell, *Globalization and the Race for Resources*,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② IMF、世银和 WTO 这三大全球化组织,皆源于 1944 年美国的布雷顿(Bretton)森林会议。当时主持会议的美国财长说得很明确,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目的是创造一个活跃的全球经济,以确保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手段呢?就是要保证美国资本和产品能进入外国市场,而且能获取它需要的资源。后来加入来分享这特权的,还有西欧和日本。80 年代确立的所谓“华盛顿共识”,是当今全球化的意识形态武器。

了跨国公司的超级利润,一部分落入本地少数特权阶层的口袋里,部分要拿来偿还永远还不清的外债(有些国家的外债利息就超过国民生产总值),最后百姓们不仅分享不到可怜的一点儿,却还要承担开采资源所造成的生态破坏,还有政府自由化政策导致的社会和文化破坏<sup>①</sup>。如果说人性的历史真的进步了,那么由船坚炮利的殖民侵略,到了今天人道、专业的“自由贸易与经济发展”,由帝国主义年代的不平等条约,到现在的世贸协议和经济援助,新瓶旧酒的巧妙,令人惊叹不已。

全球化被誉为代表了人类文明在物质组织上的历史高峰,可是如果剥去重重的文明外衣,那么 21 世纪经历了信息革命的后现代全球化人(The Globalized Man),和四万年前灭绝尼安特塔人(Neanderthals)的克罗马侬人(Cro-Magnon),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用“全球化”这个新字眼来指涉这古老帝国游戏最近数十年来的新阶段,如果有意思的话,是因为全球化三大要素,近年来已经发展到某个程度,令资源消耗冲击整个地球的生态体系(包括人类及其他物种的栖息地),使后者达到接近大规模崩溃的临界状态(critical state)。三大要素让掠夺自然资源达致淋漓尽致的高峰。如果只着迷于令人心醉目眩的庞大全球信息网络和金融体系,很容易忘记了实际的物质能量流动:大量资源从边缘流向体系中心,无论是埃及帝国、罗马帝国、印加帝国、大不列颠帝国,还是今天的欧美和日本。

我们要很小心某些全球化的文化和社会学理论。例如沃塔斯(Malcolm Waters)把全球化界定为“地理对社会和文化安排的

<sup>①</sup> 以经济理性专业包装的糖衣毒药,最外层是美丽的外衣(援助、贿赂和社会进步的美好承诺),中层是令人上瘾的鸦片(消费主义),吃到最内层,却是致命的毒药。

束缚降低的社会过程,而人们也逐渐意识到这种束缚正在降低”。(《Globalization》第1章)可是实际上,在全球化进程里,地缘政治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重要。他又指出,符号交换(以价值、偏好和品味,而不是以物质不平等和制约为基础的关系),逐渐取代经济和政治领域中的物质交换和权力交换(同上书第6章)。可是现实上,全球化系统巩固而且愈来愈依赖物质不平等交换关系!

曾任经济杀手的帕金斯一针见血:“本质上,我们的经济体系是依靠人类农奴和奴隶剥削的现代版本。”(《与帝国一样古老的游戏》序)

当然,时代毕竟是进步了,原始奴隶制是奴隶主依靠暴力直接控制资源,包括奴隶的生命。而合理化这种暴力垄断的,是神授的权力。历史的发展是,随着向中心(centripetal)<sup>①</sup>的资源掠夺系统日益庞大,更大量的人口被卷进体系里,直接的人身控制不符合效率(对于行政管理而言),于是新的组织和意识/欲望形态不断演化。当代全球化资本主义体系的优越性,是两者的精密融合:“高效率的全球自由贸易能为全人类创造福祉。”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体系的合理性显得那么无懈可击,而同时在物质上能带给大量人口这么多希望<sup>②</sup>。以前的奴隶要服从帝王和贵族,因为那是神的旨意;今天的穷国拥抱自由贸易,是因为相信总有一天可以享受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可这是没有可能的幻想,美国和海湾国家的地球指数是五,即是说如果全球人类都过着美国的生活方式,以目

① 资源剥削体系组织方式的历史趋势大致是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可是资源流动的趋势,却总是向中心(centripetal)。当然,中心形态是复杂、多层次和恒常转移的。

② 某个体系能取得主宰权(hegemony),是由于它在某种程度上垄断了人们的思考/想象方式、感性模式(sensibility)、欲望形态,以及最重要的:希望和愿景(vision)。

前的资源损耗率,需要五个地球的资源!

电影 *Matrix* 第一集可能是关于我们时代的最出色寓言。不妨也用一个鲜明的科幻小说形象来描绘这个时代人类的处境:一台叫全球资本主义的庞大机械怪物,它的身体由各种科技成果构成,可是它的唯一动力来源,就像 the Matrix 一样,只能是靠亿万计的人类:我们的血肉、生命能量,还有贪婪、欲望和各种病态的情感。我们无意识地依附在它身上,为它注入源源不绝的动能,却又深信没有了它,我们就活不下去。这台机械怪物控制室是金字塔式层级:顶层是一小撮人,他们被国际组织和富裕国家的统治阶层包围着,让我们看不清他们的利益。一切都以“最符合大多数人利益”包装起来。而在下面的,是较不富裕国家的统治阶层。这台疯狂的怪物在地球上横冲直撞,吞噬自然资源,残害其他生命。这个过程叫国际自由贸易。有幸依附在这台机械里的我们,可以分享到部分资源,代价就是用我们的生命能量来喂饱推动它继续疯狂蹂躏地球,而被排除在这台机械怪物以外的人类和其他物种,就只有被踩踏得血肉模糊的份儿。

任何一个最富幻想力的小说家,都想不出比这更疯狂诡异的景象。

## 七 敢于直视现实的全球视野

理解全球化,要有真正的全球视野。让我们以五个关乎人类文明未来的视野来反省全球化。

### (一)全球规模的生态运动

到了今天,还可以听到类似的质疑:自罗马俱乐部提出“增长的极限”的警告,三十年以来,全球经济不是一直保持急速增

长吗？这一次，会不会又是反进步分子再一次空喊“狼来了”？这是因为很多人误解了“增长的极限”的含义。问题的核心并非经济增长的极限，而是地球生态体系对这种疯狂的经济模式可以负载的能力(carrying capacity)，已经接近大崩溃的临界状态。问题不在于这种模式的经济增长是否有极限，反正金融衍生工具玩的正是金融伏都巫术(financial voodoo magic)，能够无中生有变出经济增长数字。最近席卷全球的次级房贷危机正是鲜明例子：劣级的借贷(美其名为 sub-prime)，在金融魔术师手上玩点戏法，就可以变成新的财富，支撑号称全球最庞大、最先进成熟的经济体系繁荣了好一阵子(它的根本机制，正是下面要探讨的重点)。

从1987年开始，全球人类消耗资源的速率，已经超越了地球生态体系整体可以再生的速率。换言之，我们现在是靠生态举债(ecological debt)度日，到了2007年，消耗资源的速率，超越了地球可再生速率的30%，这样下去，全球生态系统将无法再生，而且会突然不可逆转地全面崩溃。例如，目前全海洋近80%的鱼类被人类所捕捞，势必导致海洋食物链崩断。<sup>①</sup>最可怕的是，作为复杂适应体系的生态体系的崩溃，不是渐进的，而是可能在无法预测的某一天突然爆发，然后一切再也不可逆转。也许今天我们醒来，还觉得美好世界一切如旧，可是到了明天，我们熟识的体系就开始分崩离析。

极限的真正含义是：生态系统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或者更准确地说：敏感性和不可逆性<sup>②</sup>。

---

① 不仅应该豁免所有穷国的债务，现在情况是发达国欠生态债，所以应该向南美国家缴付氧气税以保育亚马逊森林。

② 历史性，再一次进入科学理论的最前沿。参考：Mark Buchanan *Ubiquity, Why Catastrophes Happen?*



### 1. 生态和文明崩溃

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应该读一读戴阿蒙(Jared Diamond)的《崩溃》(*Collapse*)<sup>①</sup>。里面有关人类对于生态体系脆弱性的无知和滥用,有惊心动魄的描述。维京人首次踏足冰岛,玻尼利西亚人发现复活岛,或者近代的英国人登陆澳大利亚,都曾经满心欢喜以为到了资源取之不竭的天堂,可是经历千万年才形成的本土生态体系,一下子就被雄心勃勃的新移民破坏得无法恢复了;同样,如果我们引入《崩溃》缺乏的全球资本主义兴起的宏观视野,把地理向度换成历史向度,那么15世纪进入历史舞台的“资本主义人”,利用科技和新发展出来的资本主义体系,登上了“全球自然资源开发”的新大陆,不也是欣喜若狂,以为人类终于完全征服自然,可以无穷无尽任意剥削?

对于全球生态危险的关注,近年已经成为愈来愈强大的声音。然而令人惊讶的是:生态运动至今还普遍缺乏全球化的视野。缺乏全球视野,连最优秀学者的目光也会变得模糊,例如戴阿蒙以日本保护森林为成功的典范之一:日本是唯一全球森林覆盖率增加的发达国家。可是我们都知道:这成果的代价是蹂躏穷国的森林资源。日本人严格保护本土森林,却在印尼和马来西亚等地买下一片又一片森林来制造筷子供应日本。(更别提日本人虚伪地以科学研究为幌子,令人齿冷地屠杀鲸鱼,为的只是向这个已经过度丰裕的社会多提供一味珍馐。)不少先进国家的环保人士,甚至抱着倨傲的心态,认为穷国环境受破坏,是因为当地民智未开,却从来不质疑哪部分的地球人口消耗最庞大资源,哪些跨国公司直接或间接造成当地环境破坏,哪些强国的外交政策使这些穷国民不聊生,战祸连连,导致生态

---

① 这本在多方面都非常杰出的巨著,甚至包括了某种粗略的文化视野。可是作者欠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视野,令此书有重大缺陷。

灾难?①

人类这样肆意破坏环境,仅仅是因为愚笨,或者意识不足吗?我们必须质问:是哪种全球性体制,令人类像染了毒瘾般以自杀的速率虚耗不可再生资源而无法自拔?是哪种经济方式,驱使我们大规模摧毁生态体系,为的甚至不是要喂饱地球上每一个人,而只是追求无意义的经济增长数字,好让这个疯狂的体系运作下去,让少数人获益?如果不根本改变这个体系,仅仅期待人们意识的提升,改变一下生活习惯,减少一点能源消耗,多设立几个自然保护区,全球生态体系就能得救吗?②

反过来,反全球化运动普遍缺乏生态意识,也令人咋舌。世界各地反全球化运动的主要针对点,一般是本国政府为了进入全球自由贸易俱乐部,不顾国民利益而采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所以,反全球化运动的中坚分子是因为国家被迫开放市场而受害的农民,或者失业工人。于是,传媒里探讨全球化的争论焦点,几乎都是本土市场开放程度和步伐、产业补助,以及社会福

- 
- ① 我们要避免简单的马尔萨斯主义:把全球生态和资源危机只归咎于世界人口剧增。当然,目前人类已经耗用了超过一半的地球光合能力(photosynthetic capacity),即地球表面能吸收的太阳能,有一半给人类耗用了。全球人口再增长下去,将会严重威胁其他物种的生存。将责任推卸到穷国人口膨胀是种族主义的偏见。此外,人口增加还有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例如长期在死亡威胁下(例如饥饿),反而会促进繁殖的冲动;很多穷国因为战乱和经济危机而导致文化衰退,文化生活被破坏,性是唯一不用花钱的娱乐,也会导致人口激增。我们也要避免幼稚的浪漫想法:前工业革命的人和自然总是和谐共存,可作为现代人的模范。可是,《崩溃》指出,人类即使只用石器工具,已经足以彻底破坏周围的生态圈。这更加警醒我们要警惕现代科技对生态的严重冲击。
- ② 当然,绝对不是说节约资源不重要。任何活在大城市的人,都应该想办法在生活上节省最少一半的资源消耗。比如说,生产一公斤牛肉,要消耗八至十一公斤的谷物、一千五百公升的水。想一想很多人连果腹的谷物也缺乏,继续大量食肉,几乎成了剥削他人的行为。商业办公大楼消耗全球近90%的电力,即使暂时无法扭转全球不平等商贸体制,如果能节省一半的耗电量,也算是值得庆幸的事。

利制度改革等问题。

## 2. World Terrorism Organization

保护本土经济以及人民生计免于全球化冲击当然重要,可是对这抗争层面的压倒性关注和报导的客观效果,可能是转移了视线,让我们看不到更严峻的问题。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反世贸的抗争都倾向于局部的抗争。争论的焦点往往是国内市场开放程度应该是多少,本土产业应该受多少资助,政府政策应该向国际资本倾斜到什么程度,可是WTO的基本精神:所谓的自由贸易,却很少受质疑。当人们热烈争论时,WTO很多最可怕的规则却悄悄获得共识。例如关税贸易总协议(GATT)第十一条,实际上剥夺了成员国为了保护本土生态和资源而限制资源出口额的权利,国际贸易法凌驾于本土生态和资源保护法律之上(WTO被赋予权力可以裁定保护自然生态的法律和废除贸易保护主义<sup>①</sup>),于是,跨国资本可以肆无忌惮地控制和掠夺别国的珍贵自然资源。1999年西雅图部长级会议签订的《全球自由伐木协议》正是鲜明的例子<sup>②</sup>。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又可以借着“技术转移”之名,把污染性产业转移向穷国,甚至以自由贸易之名直接输出污染废料(估计每年达五千万吨!)。在世贸的专业术语里,它们统统被包装为“环保产业”。简言之,这是双向的生态侵略。

近十多年来,全球贸易自由化最重要的实质内容,是各国政府如火如荼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与本地人民未来生存息息相

① 例如为了保护海龟而禁止使用某种捕虾网,就遭WTO裁定违反世贸法;此外加拿大欲限制水资源的出口,也遭遇同样的命运。

② 林木业自由化使大量具有丰富生物多样性的原始森林消失。IMF利用贷款半威迫半利诱令全球多个穷国加速砍伐森林。这些国家同时因为IMF所规定的财政紧缩措施而削减环保经费。而得到的回报呢?对,正是垂涎这些珍贵资源的外国投资者。

关的大部分珍贵资源,愈来愈以改进经济效益之名,迅速私有化,落入大型企业之手。资本主义从封建主义的裂缝里发展出来,经历了一千年,绕了一个大圈,似乎可以预见:人类的未来,将回到某种半封建制度。本应是地球公平赐给所有生命享用的宝贵资源,愈来愈大部分落入少数人的手上。他们用不着直接控制穷人的人身自由(这在管理效率和道德上都不可行),可是垄断了人类生存必需的资源,世界上大部分人口几乎沦为他们的半封建属奴(semi-feudal serf)。

最近全球各地因粮食价格暴涨而爆发的危机,正是世银和IMF半威迫半利诱的“专业建议”的恶果。某些国家因为接受了经济发展专家的“优化发展策略”而放弃了本国的粮食安全,改为种植有利出口创汇的高价农作物(cash crop),或大量农田转为出口加工区,结果主要粮食反而要依赖从农业强国进口。一旦农产品因为种种原因而价格暴涨:全球暖化导致气候不稳定,大量农作物被用来生产生物燃料以满足发达经济体系的疯狂渴求,全球投机性游资炒卖(短期而言,这是最大的祸因)等,人民就连果腹的粮食也负担不起,从而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sup>①</sup>

如果说,恐怖主义的定义,是以威胁平民为手段,而且以平民为目标的准军事暴力行动,那么,要准确描述目前的全球掠夺性不平等贸易,我想不到比这更好的名词;世界恐怖主义。历史诡异的讽刺是:倒塌的双子塔,恰恰叫世贸中心。也许WTO的真正名字是World Terrorism Organization。它正洗劫着整个地球,大规模残害全球生命体。

德勒兹(Deleuze)曾经敏锐指出:福柯所研究的规训型社会(disciplinary society),已经属于过去,现代科技发展到让权力可以渗透人们的生活,直接控制人的生存模式。恐怕全球化的文

<sup>①</sup> 本土的粮食生产者,包括农民和渔民,也因为肥料、燃料价格暴涨而受害。

明外衣,也将会像时装一样,很快成为过去。接着而来的阶段,将会是更赤裸裸的军事掠夺。例如美国总统布什不惜一切政治和财政代价,也要军事入侵伊拉克,以武力控制石油资源。<sup>①</sup>

### 3. World Water Wars

在种种基本生存资源里,让我们看看一个被忽略的严峻例子:饮用水。目前全球有超过十多亿的人口无法获得足够的饮用水,或者无法享用洁净的饮用水。到了2020年,这个数字会增加至三十亿(估计到时全球人口达八十亿)。很多生活在大城市的人都会有错觉,以为地球是有源源不绝清水供人享用的蓝色星球。可是实际上能供应人类饮用的淡水,少于全球储水量的0.5%。随着地球人口增加,更重要的是随着非理性模式的经济发展,饮用水成为日益稀缺的宝贵资源。我们这些每天都能享受洁净清纯的食用水的人,大概嗅不出清水里的血腥和硝烟味。可是只要听一听饮用水争夺战(Water War)、滴滴皆拿来出售(Every Drop for Sale)等讲法,就会意识到问题有多严峻。最影响人类未来的不是万维网(World Wide Web),而是饮用水世界大战(World Water Wars)。<sup>②</sup>

① 踏在以十万计的平民伤亡和四千多名年轻美国士兵的尸体上,石油公司正急于分赃。美国正施压伊拉克国会通过所谓的 *Hydrocarbon Law*。三十三页的法律可以用两个字来总结:掠夺。如果法律通过,全伊八十个油田里,只有十七座由伊拉克控制,其余包括将来发现的,都会落入美英石油公司手里,条件优惠得美英石油公司无需投资多少来建设伊拉克社会,却可以享受三十五年的开采专利(别忘记世界目前已知的石油储备估计只能维持不到五十年)。这是赤裸的资源侵略。难怪美英法开始对下一个目标伊朗摩拳擦掌了。委内瑞拉也一直是美国觊觎的目标。

② 参阅《水宣言》(*The Water Manifesto*)[可从网上下载]; Vandana Shiva, *Water Wars*; Maude Barlow, Tony Clarke, *Blue Gold: The Fight to Stop the Corporate Theft of the World's Water* (<http://www.thirdworldtraveler.com/Water/Blue-Gold.html>); Vinod Raina, *War over Water: Water flows Uphill to Money*; 还有: <http://www.worldwaterwars.com> 和 World Water Council 等。

水资源,在全球是珍贵的自然资源私有化进行得最如火如荼的一个领域。这中间牵涉到无可估量的庞大利益(估计瓶装水很快会成为可口可乐公司最庞大的收入来源),也牵涉人类未来的生存。问题的核心不是全球淡水源的地理分布不均,而是目前人类经济活动近乎荒谬的根本不合理性。例如,欧洲每年的冰淇淋(主要成分是水)销售额达一百一十亿美元,估计比为全球贫困人口提供清洁饮用水和污水处理所需的经费还要多。在不少地区,人民无法享用足够饮用水,可是却耗费大量淡水来为当地高尔夫球场浇水!

在内华达沙漠、海湾地区这些最缺乏淡水的地区,人均耗水量却是全球最高。当地每一天的人均淡水消耗量,可能超过很多地区的全年人均淡水用量!我还记得站在拉斯维加斯著名的巨型喷泉前感受到的震撼,连我这个在大海旁长大的人,都看得目瞪口呆。我们惊讶和沉醉于这种文明的炫耀时,却不知道历史上这种悲剧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例如在复活岛和中美洲,当地资源消耗得愈来愈接近枯竭的时候,人们却不惜一切耗费更多资源树立更宏伟的巨大石像和金字塔,然后突然有一天,整个文明随着生态体系的瓦解开始崩溃了,留下的只有这些令后世惊叹的遗址,和人类到今天还未汲取的教训。

#### 4. 人类存活运动

关系到人类基本生存的资源:粮食、饮用水、医药,必须作为基本人权,牢牢由公众掌握,绝不能以虚伪的经济效益之名,落入国际垄断性资本手里,成为谋取暴利的工具。它们的管理必须具有高度问责性和可持续性,它们的使用必须非常谨慎。维护本土水资源运动<sup>①</sup>,提出了广义的人类生存资源问题,可以总

---

<sup>①</sup> 除了对抗水资源掠夺外,还包括其他严峻问题:例如地表(浅层)水质受严重污染,水坝、蓄水式水力发电等工程导致水生生态系统受严重影响,等等。

称为人类存活运动(Human Subsistence Movement),它关乎今天和未来大部分人类的存亡,应该是全球抗争的最前线。然而,这方面的抗争一直没有被主流媒体报导,也许因为它们没有反世贸示威那样具有感官刺激性,也可能因为这恰恰最触及全球少数特权垄断阶层的利益所在。实际上抗争一直持续不断,例如,印度民间对可口可乐公司侵略水资源的抗争,玻利维亚哥恰班巴(Cochabamba)的民众从美国公司手上夺回供水系统<sup>①</sup>,厄瓜多尔原住民保护亚马逊森林而抵抗石油公司的侵略,还有以农耕地使用权为核心的墨西哥萨帕塔解放运动等等,这些看似局部的本地抗争,是真正具有全球意义的运动。

到今天还会有人这样想:人类科技不是一日千里吗?相信不久就会出现新技术能解决生态危机。可是工业革命已经进行了近二百年<sup>②</sup>,人类经历了煤炭(蒸汽机)、石油(内燃机)、原子能年代,到了今天的虚拟化信息革命,我们看不到生态破坏有任何缓和的迹象,反而是变本加厉,把全球生态体系推向崩溃的边缘。我们能期待这种疯狂消耗资源的经济模式再进化二百年,而把所有希望寄托在突然有一天,某项伟大的科技创新降生,奇迹般地拯救全球的生命吗?<sup>③</sup>

没有人能预测未来,没有人能期望未来可以拯救今天。只有今天的行动才可以拯救人类的未来。我们只活在当下,只能从今天开始行动。

## 5. 再神圣化自然

---

① <http://www.thirdworldtraveler.com/South-America/Bolivia-WaterWarVictory.html>

② 早于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敏锐指出了资本主义发展对环境的严重破坏。参阅:John B. Foster, *Ecological Marxism*.

③ 别忘记经济利益对科技的制约。电动汽车早在1990年已经推出,却因为石油财团和汽车企业的压力而在市场消失了。参见纪录片: *Who Killed the Electric Car?*

人类的价值系统,跟生态系统一样,都是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sup>①</sup>。支撑不平等贸易的价值体系(一般被统称为新自由主义):消费主义、发展主义、资源和权力的垄断、排他性竞争主义等等,对于整体人类,以至于整个生态体系而言,将会被证明为缺乏可持续的适应性。如果我们认同全球七十亿的人类(包括未来的人类)以至所有物种的生命都有权在地球上生存和繁盛,那么人类社会必须演化出新的价值系统。

首先要放弃的旧范型,就是人类最终能控制生态体系的狂妄自大的幻想。即使是最专业的生态学家,也无法准确预测任何一种物种数量的增减对整个生态体系的影响。例如,英国在1970年代为了控制野兔的数量,引入只会影响兔子的多发性黏液瘤病毒。根据专家们的设想,这是完美的计划。可是执行之后,碰上牲畜价格下跌,农夫减少在草原上放牧,加上野兔锐减,于是草长得比平时高,令一种蚂蚁的数量也减少了,而依赖这种蚂蚁而繁殖的某种蝴蝶,也因此最终在英格兰几乎绝迹了。<sup>②</sup> 某个生态系统里的单一物种发生演化的质变或者量变,都会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的不稳定,直至系统演化出新的复杂平衡状态。

由旧约创世纪到17世纪的理性主义科学革命,直至今天的信息革命,人类文明最错误和不幸的观念,莫过于以为我们可以最终控制大自然。人类妄图把整个地球变成我们的后花园和农场。可是,当地球生态体系迫近大崩溃的临界状态之际,人类必须对自然抱持全新的态度。我们急需发展出一种新颖的、生态上可持续的全球价值观。为了方便,前文一直被迫用“资源”一词。可是,我所憧憬的新价值观,正是不能视生态体系为资源。

① 复杂性的含义是该系统不存在单一的平衡状态(不似新古典经济学思维所错误设想的)。复杂系统对初始值异常敏感,而且在多种暂时的平衡状态之间摆动,缺乏可预测性。适应体系的含义是体系会不断演化。

② 参阅:Mark Buchana Ubiquity, *Why Catastrophes Happen* 第9章。



所谓的可持续发展,不能简单归结为某种可持续的资源管理。把某种东西化约为资源,必然会隐含某种傲慢的暴力。例如两性之间一直难以取得真正的平等,是因为男性至今还未摆脱视女性为某种资源。女性不是男性的资产,地球也不是人类的大农场。

## 6. 理性化的疯狂

新古典经济学的严重的思维模式错误,是把自然作为一个次系统附属于统摄一切的总系统:经济。这是愚昧的颠倒。(我们对于开始建立的所谓生态经济学,要抱非常怀疑和批判的态度。)有些产权学派甚至认为,只要清晰界定了产权,就可以更有效地保护物种。我们不禁慨叹,经济学思维把这个时代最优秀的脑袋扭曲到多么可笑的地步。以牛为例,由于它的产权很清晰,因此以单一物种保护而言,可谓非常成功,只要人类存在一天,牛大概也不会有绝种之虞。可是当考虑到人类砍伐了多少森林来放牧,牛就成了生物多样性的灾难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绝不能依赖唯利是图的市场力量。生态系统应该具有近乎神圣的地位,不应屈服于经济理性的疯狂,不应该寄望于目光褊狭、冷酷无情的市场力量的恩惠。相反,我们不能忘记:任何经济体系,以至社会体系,都应该附属于生态系统。

经济理性的疯狂在于:它把人化约成目光褊狭的病态的人。这个经济人把某种东西割裂出来,视之为“稀缺资源”,却完全无视于这些东西在它原来的整体里所蕴含的更丰富、更重大的价值:文化、生态和精神的價值;然后,他本着表面非常“理性”的指导原则,力图以最少的投入,得到最大的产出。可是,他所关心的成本效益盘算,却只限于这狭隘的资源运用活动之内,这项活动对于社会、文化、生态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可以完全无须考虑。于是,这种让单位(无论是个人、企业抑或国家)最有“效率”运用“稀缺资源”的理性,却带来了整体资源(包括社会、文化和生态

的资源)浪费的灾难。

我们必须以谦虚和谨慎的方式,在地球上生存<sup>①</sup>,尽一切能力减低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冲击(ecological footprint),最大限度保护生物多样性。

在这个完全缺乏神圣的时代<sup>②</sup>,我们需要重新赋予大自然某种神圣的价值。不,我们无须再增添一种新宗教。但是,我们呼吁生态的神圣观:每一种存在都是深深联结在一起的,不妨称这种相互连结为神圣。

没有一个领域,比生态运动更急切地需要全球性视野和行动。

## (二)全球规模的另类货币运动

人类当前面临的生态困境,仅仅是因为人类打开了工业革命的潘多拉魔盒(Pandora's Box),释放了我们没有智能去控制的众魔——生产力和消费欲吗?当人们思考当前很容易只聚焦在生产和消费问题之上。例如《小是美好的》一书一开始就指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大的错误之一是相信‘生产问题’已经解决了。”这无疑是深刻的洞见。我们的疯狂是:自以为释放了无穷无尽的生产力,误把无法弥补的生态资源虚耗,看成是财富的创造。可是,在可持续生产力方面,人类文明还处于很原始落后的阶段。

仅仅是盲目的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失控,还不足以说明一切。我们必须更深入探索还有哪些机制驱使人类奔赴自毁的高速公

---

① 的确,地球史上从来没有永续系统这一回事。任何物种总会灭亡,任何生态体系也总有崩溃的一天。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就应该疯狂地毁灭其他物种。我们应该谦逊地守护目前的生态系统,直至它自然演化以至消失。

② 失去了神圣面向,却迷信某些可以创造奇迹的魔法,这不是我们这个年代深层的病态心理吗?风靡全球的哈利·波特现象,反映了这种深层文化心理焦虑。

路? 回顾全球化的历史, 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 当全球化开始加速成为势不可挡的进程时, 我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全球金融危机: 美国八九十年代的储贷危机, 87 全球股灾, 94 墨西哥比索危机, 97 亚洲金融风暴, 98 俄国卢布危机, 2000 年网络泡沫和 2007 年的次级房贷危机。奇怪的是, 人们甚至已经习以为常, 接受了全球金融危机, 是全球化挥之不去的副产品, 是繁荣的必需之恶。如果我们采取逆向思维, 不把金融仅仅看做全球化的附属工具, 而是全球化最重要的潜在动力, 就会打开全新的视野。

钱, 或者说货币, 很多人以为是最自然不过的东西。但实际上, 今天我们熟悉的货币形式(制度), 是历史上最诡诈的创造之一。货币, 也许是资本主义最大的秘密。

绝大部分人都简单地把货币仅仅是看做经济活动的工具(虽然有很多人以金钱为主要的的生活目标)。造成这个现象, 除了因为货币是复杂的现象, 更重要是由于高贝夫(J. K. Galbraith)所说: 在有关金钱的研究里, 复杂性并非用来揭露事实, 而是为了掩饰和逃避事实。<sup>①</sup>

要穿透重重谜团, 解开货币的复杂性, 揭露它的本质, 绝非易事。人们很容易相信货币是随着经济活动自然产生的交易工具。区域性货币也许如此, 但历史上中央货币的出现, 却并非为了方便和促进经济活动, 而是为了吸取社会资源和赋税。垄断性的中央货币, 跟少数特权阶层利益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到今天也不例外。最简单地说, 当前主流货币形式的扭曲性在于它的本质是“债务货币”(debt currency)。即是说, 当每一元的货币被创造出来或者进入流通时, 表示同时有一元的债务产生了, 也就

---

① J. K. Galbraith *Money, Whence it came, where it went*, NY: Penguin Books, 1975, p15.

是说有人背负了一元的债。

先从货币的发行说起。这不能不从全球最重要的货币美元开始。也许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美国政府没有发行货币的权力,而且美国联邦储备(the Federal Reserve)也并非政府机构,它是完全由私营银行拥有的机构<sup>①</sup>。美国政府想要花钱,并不是靠当前的税收,而是把未来的政府税收(即是未来美国人民的财富)作为国债,抵押给美联储,然后由美联储来发行美联储券,也就是我们熟悉的美元,并且要为此付出庞大的利益。而这笔账,要算在美国人民头上,而且最后要由全世界的人民来承担。<sup>②</sup>

说得通俗一点,情况就好像我在一张白纸上签名,把它变成“钱”,然后借给你。可是这张纸币本身,根本没有任何价值,是你借了钱以后所从事的经济活动,赋予这张纸价值。可是,你却要为了从我手上借一张纸而向我付出利息。就是这样,银行家秘密享受了专制帝王的特权,洗劫了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也间接坐拥整个国家。

这还不止,下一步就是货币的流动性(liquidity)<sup>③</sup>。银行每收到一百元的存款,只要预留部分作存款准备金,就可以提供借贷。假设存款准备金率是10%,银行每收一百元,只需留下十元,就可以借出九十元。于是这九十元再进入流通。但是这流通中的九十元实际上大部分又会进入银行账项里。于是银行体系收到九十元后,只需预留九元,又可以借出八十一元,如此循环不断。借着这种魔术戏法,于是在银行体系里,每一百元的存

---

① 参阅:Eustace Mullins, *Secret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http://www.apfn.org/apfn/reserve.htm>)

② 自由派经济学家会论辩:不应该让政府有货币发行权,以免他们为了政治目的而滥用这特权。这无疑部分是对的。但是,无论从理论和从实践来审视,都看不出把这特权白白送到以谋利为唯一目标的银行家手里,对人民有任何的利益。

③ 流动性的经济学定义是:某项资产再进入流通的容易程度及成本。本文的流动性所指较广义。

款可以变出近九百元的货币供应(实际上,在先进的经济体系里,准备金限制对货币供应几乎没有影响性)。银行所赚取的不仅是谦卑的息差,更重要的是这种流动性的倍数效应。流动性是金融资本家的利益所在,他们不惜一切也要增加流动性,一次又一次冲击全球的金融稳定性,日复一日摧残人们的生活,甚至最终毁灭地球的生态系统。<sup>①</sup>

正是债务货币的本质,根本支配了当前的全球化体制。它有两个最基本的恶果:

### 1. 对经济增长的永恒饥渴

垄断了货币发行和供应特权的银行家,依靠收取利息而牟取暴利。你向银行借了一百元的债,就要连本带利归还。那假设是十五元的利息从哪里来呢?除非有十五元奇迹地从货币流通的游戏中永远退出去,恰巧落到你手上,否则这十五元的出现一定是由于货币供应增长了的缘故。实际上,银行家一定要确保债务的偿还不会降低货币的供应增长和流动性。只要有一元的债务偿还了,从流动中退出来,银行的潜在利益就会受损害。所以,银行家务必要确保货币供应和流动性永恒增长,才符合他们的利益,于是,他们要推动社会不惜一切也要追求经济增长,以确保货币供应和流动性增长。

正是这个看似理所当然的游戏规则,主宰了近数百年来的资本主义,也同时主宰了近代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开始着了魔地追求经济增长,盲目催使经济活动膨胀,而不问这种增长实际上是否为人类的福祉服务。于是,先进国家的人们过着高生产、高消费的生活,虚耗地球资源,破坏全球生态系统。而且,这一切提升到道德价值的层次:“他们用尽一切方法,让我们相信:

<sup>①</sup> 参阅:Richard Douthwaite, *The Ecology of Money*. 下载: <http://www.feasta.org/documents/moneyecology/contents.htm>

购物是公民的义物,掠夺地球的自然资源有利于经济发展,从而实现我们更崇高的利益。”(《经济杀手自白》作者序)

这可谓是人类观念史上最大的因果颠倒,我们一直以为经济活动的增长,自然促使货币供应相应增长。但回顾历史,我们却发现,实际上是少数特权阶层,以大多数人利益的名义,片面推动某种褊狭的经济增长模式,即使这种经济增长结果不一定能让人民受益。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掩饰得最巧妙的特权利益,足以让高唱“特权神授”的法老王、教皇和君主们折服。<sup>①</sup>

又是必需之恶:当经济增长明显导致社会不公平,甚至整体人口生活质量下降时,教条经济学家提出了所谓的下滴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经济增长最终会惠及穷人。回顾全球化的历史经验,尤其是IMF强逼穷国推行的经济政策,实况却并非如此。当这种信仰无法服众时,就出现史蒂格里兹(Stiglitz)所指的下滴效应附加版(trickle-down plus):“增长是缓解贫穷的必要条件,也‘几乎’是充分条件”。<sup>②</sup>然而增长不一定能消除贫穷。我们也可以找到低收入低增长,而人民生活质量大幅提升的另类发展模式:例如印度的喀拉拉(Kerala)经验。<sup>③</sup>

当这种体制推到某个极端时,甚至会出现恐怖的后果。和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如影随形的,是高举民族国家的旗帜、规模日益庞大、伤亡也愈加惨烈的战争。而当史学家仔细审察近代每一场大战的背后,几乎毫无例外牵涉到银行家的频繁活动。每

---

① 一则有趣的逸事:据说德国绿党创立人一次主持电台节目,有听众打电话抱怨某个银行抢匪的判刑太轻了。这位社运家引用布莱希特的话说:最大的劫匪不是抢银行的人,而是开银行的人。

② 参阅: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 Penguin: London 2002, pp. 78—80.

③ 参阅: M. P. Parameswaran, *Democracy by the People*. Bhopal: Alternatives Asia, 2008.

一场近代大战的幕后,都牵涉庞大的集资活动和金融利益。大银行家从历次战争中所获得的利益,让军火商也会妒忌<sup>①</sup>。

## 2. 全球疯狂流动性的毒瘾

货币供应和流动性为了符合金融资本家利益而必须不断增长,可是实际经济活动的增长,永远无法追上符合金融资本家所渴求的速率。过多的货币供应和过剩的流动性找不到出路,必然会冲击实际经济体系,造成超级通胀,甚至经济崩溃。于是,必须有某个领域可以无穷无尽地吸纳超额供应的货币,同时又促进流动性。投资(机)市场,正是银行家梦寐以求的仙境。全球金融市场每年的总交易额超过六百万亿美元,是全球贸易额的五十倍以上,可见毫无实质经济意义的全球金融炒卖活动疯狂到何种地步。

金融资本家热衷于开发各种层出不穷的投资衍生工具来促进流动性。他们不愿意看见任何资产闲置一旁,不变成债务而进入流通(所谓的资产证券化)。甚至劣质资产,也可以通过金融伏都巫术,变成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最近爆发的次级房贷危机,正是最好的例子。这种近乎疯狂的流动性,将会制造一个又一个的泡沫,不断地周期性冲击社会,也促使人类沉溺于虚耗地球宝贵资源之中而不能自拔。

货币主要有三大功能,近代垄断性货币的理想是把这三大功能统一在一种普遍的货币里。可是对应于传统货币的三大功能,我们也发现了近代垄断性债务货币造成的三大扭曲:

(1)交易手段:本应作为交易工具的货币,因为其内在不稳定性而不断冲击经济体系;

---

<sup>①</sup> 在背后资助希特勒兴起的是英美银行家,几乎已不是秘密了。参阅:A. N. Sutton, *Wall Street and the Rise of Hitler*;还有经济史家、华盛顿大学副教授 Preparata 的近著 *Conjuring Hitler: How Britain And America Made the Third Reich*。

(2) 储存价值: 人们期望金钱可以储存价值而保存财富, 可是不负责任的牟利性货币供应导致永恒的通货膨胀周期;

(3) 价值量度单位: 本身不蕴含实质价值的货币, 造成扭曲的价值和决策系统。让我们仔细看看这一点: 财务学盛行贴现值的成本效益分析法。所谓贴现值分析, 简单来说, 就是把某东西在将来的估计价值, 转化为现在所假设蕴含的价值, 来分析某项经济活动的成本效益。我们都知道, 在复利率的复式增长下, 今天的一笔小数目, 经过多年, 会增长至庞大的数目。可是反过来说, 逆向的贴现操作, 也会把远期以外开始浮现的庞大成本, 缩小成小额贴现值。所以, 在估量一个项目的成本效益时, 不要说很多生态和人类成本没有被考虑, 即使计算了生态成本(当然这种量化本身已经值得商榷), 考虑了复利率的因素后, 在远期即使很庞大的成本(例如大型水坝的长期生态破坏以及处理核废料的成本), 它的贴现值都会变得很低。通过这种财务戏法, 能在短期内带来利益, 但长期却导致沉重的经济、社会和生态负担, 而在贴现分析之下, 却往往变得更具优先性(即显得更具经济合理性)。使盲目经济增长主义合理化的, 往往是这种理性化的疯狂。(德勒兹说过: 在资本主义里, 所有东西都是理性的, 除了资本或资本主义本身。)<sup>①</sup>

造成这种悖论, 是因为货币本身其实没有任何价值。计量价值的单位本身没有任何实质价值, 于是, 所有对人类(包括未来人类)整体生存有价值的东西(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文化等), 都通过财务预算的掩眼法, 量化和合理化成可以随意剥削的资源, 而且像戏法那样摇身一变成为“财富”。试想: 如果人类当代经济活动的计量单位不是美元、欧元、日元这些抽象而无实

<sup>①</sup> Chaosophy p. 54. *Capitalism: a very special delirium* (《资本主义: 一种特殊的疯狂》)。



质价值的符号,而是还能供未来人类应用的不可替代资源,或者是生物多样性,那么我们现在的经济方式,是在创造,抑或毁灭财富?①

以金钱来衡量自然资源(以及人)的价值,并且谁拥有金钱,谁就可以任意掠夺资源,而没有金钱的就遭受排斥,并且要承受生存环境(包括自然、社会和文化)受破坏的恶果,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扭曲、最野蛮的愚昧。我只希望未来的人类反观我们这种蒙昧的价值观时,会像我们今天反观古代很多怪诞不合理的价值观那样,只是一笑置之,而不是怀着怨愤的诅咒。②

如果世界不设法改变债务货币的本质,就无法建立在生态上可持续的经济体系。

由债务货币建立的金融体制,使经济活动不是服务于人类的福祉,而是填满超级银行家和金融资本家的欲壑。这个数百年来伴随着并且暗地里一直推动世界资本主义扭曲增长的体制,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终于有机会发展到它的最巅峰的全球化形态(如果不是因为它必然内含的自我毁灭性,那几乎可以说是最完美的形态),也终于把地球生态体系推向了崩溃边缘的临界状态。

### 3. 美元帝国主义(Dollar Imperialism)

打开货币的视野,就能够洞悉所谓的全球化,其实是美国金

① Douthwaite在 *The Ecology of Money* 里提倡设计一种和温室气体排放量挂钩的全球货币。我们对于任何全球货币的倡议,都要特别小心谨慎。然而,人类确实需要某种和最终极的实质价值: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等挂钩的货币价值量度单位。

② 让我们永记两个伟大的声音:史学家 Polanyi 在《巨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里指出,把土地(还有广义的自然)和人化约成资本来衡量价值,是颠倒的扭曲,也造成了时代的悲剧;Schumacher 在《小是美好的》中提醒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天真地以为生产问题已经解决了,而把消耗自然资源曲解为创造财富。

权体制的全球化。它的内涵就是确立美元成为世界货币,美国享受发行世界货币的特权,可以因此轻松地控制全球资源。

这个体制在1944年布雷顿(Bretton)森林初次展露它的全球愿景。IMF成立时订立的特别提取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是建立世界货币的第一步,世界迈向了美元本位制时代。到了1971年美国尼克松完全废除美元金本位制,美元终于挣脱了任何枷锁<sup>①</sup>。美国再无需保证美元能兑现定额的黄金,于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发行美元。最终支撑这种货币霸权的,当然是美国的军事力量。可是中间还需要一个重要的环节。世界各国对美元的信心,不能光建立在对美国经济的信心之上。美元必须确立成为世界贸易的垄断性货币。于是,美国通过经济杀手的地缘政治活动和军事部署,使全球贮油量最丰富的沙特阿拉伯不仅承诺用赚取的资金来购买美国国债以支撑美元,最重要是保证以美元作为国际石油交易的货币单位,以换取美国的军事力量来保护这个专制王朝稳如泰山<sup>②</sup>。于是,美国完成了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国都梦寐以求却从未实现的壮举。脱离黄金后,美元重新找到了一种实质的价值(石油本位),同时又不受任何拘束。依仗它的军事力量,美国多年来享受世界货币的发行特权和专税(seigniorage)。

向松祚对霸权货币体制的概括很深刻:一、强权国家拥有强权货币,霸权国家必定支配霸权货币体系;二、霸权国家必定最大限度利用其“货币特权”攫取铸币税收入,并以此掠夺其他国家的资源。手段包括:无限制发行货币以降低货币真实价值,掌控货币体系以控制他国产业发展和税收制度,掌控货币体系以推行霸权国

① 很多人以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强调汇率稳定,1971年废除美元金本位是它的结束。但从美元霸权的建立来看,这是必然的连贯过程。

② 参阅《经济杀手自白》第14章,《美元帝国秘史》第29、30章。

家的政治经济游戏规则；三、霸权国家之货币，必定是全球最主要的储备货币、支付手段、结算工具、价值储藏手段、计价单位、资本市场交易工具、外汇市场干预货币及信息发布的主要媒介。（《美元发行泛滥：全球流动性过剩根源》）

美国肆无忌惮地享受和滥用这项特权。二战后到1965年，美元的总供应量只是增加了55%，那是低通胀和稳定增长的年代。可是1970至2001年期间，美元的供应暴涨了二十倍！美元是近三十年来全球通货不稳定的根源。<sup>①</sup>

世界各国别无选择地接受美元作为主要世界贸易货币，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制于美国。各国都渴求美元作为主要外汇储备来支持本国货币<sup>②</sup>，而辛辛苦苦赚回来的美元，大部分再拿回去投资美国国债，反过来支撑美元，也即是纵容美国毫不负责、毫无节制地再发行美元。今天世界面对货币流动性过剩而导致全球金融系统长期不稳定，罪魁祸首就是美国滥发美元。

1987年美国物理学鬼才费曼(Richard Feynman)在一次讲课中开玩笑说：“全银河系有一千亿颗星，这在以前是很大的数字，可是现在还比不上国家赤字！我们以前称之为天文数字，现在应该称为经济数字。”任何经济学家，不管哪个流派，都坚信政府一定要量入为出。可是美国发行公债却到了超乎人的想象的地步。（截至2008年4月，美国联邦债额达9.5万亿美元。如果再加上没有着落的应付社会福利、医疗保险等公债，则可达59.1万亿！）以IMF的标准，美国政府早就应该破产了。可是当IMF扼住弱国的咽喉逼它们执行紧缩政策而使人民受害时，它的大老板美国却日

①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读 F. William Engdahl, *Crisis of the U. S. Dollar System* (<http://www.globalresearch.ca/index.php?context=viewArticle&code=ENG20061014&articleId=3482>)

② IMF 规定禁止成员国把本国货币固定金本位，实际上就是确保美元霸权。

益债台高筑,让美国人享受连昔日很多帝王也自叹弗如的生活<sup>①</sup>。这种双重标准达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sup>②</sup>

美国还常常拿贸易赤字来大做文章,仿佛自己是全球贸易的受害者。可是各国耗费了大量人力、社会、文化和自然资源,所得到的,不过是一大沓价值岌岌可危的绿色条子。美国通过超天文数目的公债和贸易赤字,来榨取宝贵的地球资源(美国人口不到全球的5%,却消耗了全球20%的能源、16%的淡水、15%的木材,生产10%的垃圾和25%的二氧化碳!)<sup>③</sup>,还俨然以救世主和受害者自居。历史上,也许再难找到比这更无耻赖皮的了。

所谓物质文明史上最伟大的阶段全球化,其真实名字是:美元帝国主义。它是由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政府和军队所支撑的,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资本和资源垄断资本所组成的全球金权军事集团。

简言之,当代全球化进程,是美国通过建立美元作为国际霸权货币而掠夺全球资源的进程。而IMF等国际组织,正是捍卫美元帝国主义的尖兵。

#### 4. IMF: I'm fucked up! (我被干得一团糟!)

史蒂格里兹(Stiglitz)不相信阴谋论,他倾向认为IMF的专家们基本上是僵硬得愚笨的教条主义者。可是他也不得不承认IMF的政策完全契合美国金融资本家的利益(见其书第八章),否则就不能解释IMF提倡的很多表面上荒谬得可笑的歪曲政策:盲

- 
- ① 为了避免被人标签为极端仇视美国者,让我重申:我不敌视普通的美国人民。相反,我至今所遇见过最可爱的人,几乎都是美国人。让我发指的是美国政府、超级金融资本和资源垄断资本。
  - ② 美国常指责其他政府管治不透明,可是史蒂格里兹却指出这些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组织是他出任公职以来所遇到的最不透明的机构。
  - ③ 人类历史上最臭名昭彰的言论,大概少不了美国老布什总统拒绝签署京都条约的理由:“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没有商榷余地。”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正是最需要全球人民去商榷的!

目推动急速金融自由化(向外国金融资本家开放市场);当金融危机出现时,不惜牺牲经济复苏也要保住汇率(保护外国债权人利益);援助款项要优先拿来还外债(又是保护外国债权人),而不是拯救信贷紧缩的经济;鼓励贱卖资产,而不是优化重组以振兴本土产业的活力(让外国资本可以平价吞并),等等。还有史蒂格里兹两次提及却不能理解的现象:IMF对相对廉洁有为但缺乏战略价值的非洲小国倨傲地以腐败为指责理由而拒绝贷款,可是对于俄国和印度尼西亚这两个世上最贪腐的政权,却乐于源源不绝提供大量贷款。只要想到俄国和印度尼西亚都蕴藏庞大的石油,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前经济杀手帕金斯把它的策略揭露得很清楚:笼络当地权贵贪婪地抵押国家资产来贷款以中饱私囊,让这些国家愈来愈依赖美国,最后趁机掠夺其资源。

而WTO呢?就是保证各国要向美元敞开大门,通过所谓的自由贸易,让全球资源持续集中流入以美国为首的富国。

最终保证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能掠夺世界资源的,当然是军事力量。但由IMF等组织推动的美元霸权主义,加上由WTO主导的全球自由贸易(组合成金融法律政治力量),辅之以新自由主义所提倡的意识/欲望形态(通过全球文化工业、全球媒体等),凡此种种,皆确保富国可以兵不血刃就可坐享地球的宝贵资源。当然,还少不了活跃于幕后的孜孜不倦的经济杀手,不成功的话,接着是从事暗杀的jackal上场,连他们也失败了,最后才轮到大部分来自美国中西部小州的年轻士兵(例如这一次入侵伊拉克)。可怜这些二十来岁的年轻人牺牲了生命,还搞不清他们究竟是在为谁卖命。

军事霸权支撑的世界货币特权,让美元多年来成为半垄断性的世界货币,纵容美国人滥用这种特权,大量消耗全球的自然和人类资源,同时向全球输出通货不稳定性,还有长期导致地缘政治不稳定。只要我们还容许一个超级大国继续可以不负责任地享有全

球霸权货币的发行权,全球规模的金融危机和社会危机就会永远和全球人类如影随形。这是文明抉择的问题。

结合了生态和货币的视野,我们不禁悲叹全球人类陷入一个多么荒谬的境况。当穷国弱国深受其害之际,还梦想总有一天可以享受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让我们牢记地球指数,除非短期内有科技奇迹出现,否则这是不可能的。)主流的霸权意识/欲望形态之所以那么强韧,让人们接受如此不公正、如斯荒谬的体制,除了教育、文化、媒体长期在不知不觉间支配了人们的意识和欲望形态之外,最重要是它们垄断了我们的愿景和希望。

我们要敢于想象新的愿景。

### 5. 呼吁全球规模的另类货币实践

由货币供应,到全球宏观的美元帝国主义,目前货币制度的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荒谬性。现行货币制度的表面上无可置疑的合理性,实际是由种种暴力、谎言、意识/欲望规训编织而成,是这个时代之中一种最蒙昧的非理性。

也许在现实世界里很难找到一种比现代货币更具垄断性的领域了。货币制度,恰恰是整个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意识/欲望形态彻底崩溃的环节。假如我们奉竞争为神圣的价值,为什么处于自由经济体制最核心的,竟然会是一种由暴力支撑着的绝对垄断?而且它导致的暴力,并不少于建立和维护它的暴力。世界的货币交换体系造成了竞争的假象,可是,如果这真正是根据某国货币的优良性而进行自由竞争的话,美元早就破产了<sup>①</sup>。

假如我们相信分工的奇迹,为什么不可以有多种功能各异的货币工具并行流通?如果不是为了少数特殊权力群体的排他性利

---

<sup>①</sup> 当然,我们也要小心那种以为在货币领域也放任竞争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想法,例如海耶克(Hayek)。

益,为什么会由充满弊端和矛盾的单一工具来垄断关乎大多数人的复杂经济功能?

我们很容易看出货币的矛盾性:因为绝对垄断,对于需要它的人群,货币成了稀缺的特殊商品,妨碍了草根层面的经济活动;可另一方面,因为这种只符合少数人利益的垄断性,货币发行和流动性却同时泛滥成灾。撇开别的不说,仅仅作为一种促进经济发展的交易工具而言,目前的货币设计就有根本的严重缺陷。

我们急需全球规模的另类货币运动<sup>①</sup>。可是别误会,我们期望的不是一种取代美元的新世界货币,也不是简单恢复任何类金本位的制度<sup>②</sup>。我们需要的是真正有利于生态可持续性和人类长远福祉的新型货币形式。这是很重大的课题,也许是人类站在当前的文明十字路口上最迫切的课题,需要几代人的智慧和实践,这里只能点出简单的眉目。

(1)非谋利性:另类货币的首要原则是并非为了谋利而出现。货币发行权,不应该落入以牟利为目标的机构手里。货币发行者应该代表货币使用者的福祉,而非追求暴利(正如现今的商业银行那样)。

为了确保货币是为经济服务的谦卑工具,防止货币异化成

---

① 参阅:Strohalm Foundation, *Poor Because of Money*. 这本小册子稍为欠缺组织,但是提供了很多另类货币实践的例子和概念,值得阅读。(下载: <http://www.strohalm.nl/data/uploads/16.htm>)

② 最近卖得很火的《货币战争》无疑惊醒了很多,给中国读者上了货币本质的启蒙一课。可是,先撇开种种阴谋论是否符合事实不说,作者的结论是呼吁恢复金本位制度,而且梦想人民币取代美元成为世界货币,这不仅是褊狭的民族主义,而且是扭曲的视野。即使恢复金本位制,也没有改变货币制度的根本权力本质。经济学家会担心世界黄金储备不足而引发通货收缩,阻碍经济。但我们更应该担心的是,开采黄金会严重破坏环境,而且引发一场大规模破坏环境的资源争夺战。

为冲击民生经济的怪物,另类货币的流通机制设计要让货币难以独立成为谋利的手段(所谓以钱赚钱)。这方面历史上已有一些经验,例如从古埃及的粮仓银行到1932年奥地利的沃格尔(Worgel)社区货币。其中一种可能机制就是,货币有一定的有效期限,让它不会出现囤积居奇的情况。

(2)货币多轨制:历次地区性金融风暴的最大教训是:过剩的流动性可以完全不受管束地自由进出蹂躏某地区。为了防止本应作为交易工具、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货币,异化成冲击地区经济稳定性的破坏力量,其中一种可能性是让货币生根:限制某种货币在特定的领域内使用,即局部货币(local currency)<sup>①</sup>。这可以是社区货币,也可以在某行业或商会成员之间使用的可转移信贷,例如瑞士的Wirtschaftsring合作社(WIR)是运作多年的成功例子。

当不同的社区或领域拥有只适用于自己领域内的货币,就可以避免货币集中流向某些地区(例如由农村流向城市),导致某些地区因为信贷困难而阻碍社区经济活动。社区货币只要设计恰当,就可以促进社区的经济活动。1932年奥地利的沃格尔社区货币,就是在全国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创造了高就业率的小繁荣奇迹,可惜在银行家的压力下,很快就被中央政府扼杀了。

在未来的经济体系里,应该有多种专门货币,每一种货币(或者可转移信贷单位)都为某专门的社区或领域量身定做,它们谦卑而有效地在各自的领域里为当地服务,不会像蝗虫一样,伺机到处肆虐为害。

---

<sup>①</sup> Robert Swann and Susan Witt, *Local Currencies: Catalysts for Sustainable Regional Economies* (<http://www.smallisbeautiful.org/publications/essay-currency.html>); Stephen DeMeulenaere and Luis Lopezllera - Mendez, *Towards an Economy in the Hands of the People: "Parallel Currencies in the Majority World"* (中译本即将出版)。社区货币实践,像前述很多抗争,表面上没有提升到全球化层面,可是他们的抗争却像全息图一样,在局部中反映了整体。



当然,在可见的将来,中央货币还是需要的,以方便税收和跨区域的长期贸易。中央货币应该由非谋利的独立机构发行,它应该有明确的宪法地位,独立于政治和金融利益之外,并且受人民代表的严格监督。

(3)创造性:在未来,当每一元钱被创造出来的时候,绝不应该是产生了一元的债务,而是应该出现了价值一元的创造性活动。这看起来没有分别,却有根本的革命性。不应该是某些人垄断了发行货币的权力,然后我们必须向他们借贷才有货币来从事经济活动。可能的设计是:当我们有了一项创造性的活动,或者大家计划进行一项创造性活动,有权向某独立机构申请发行某种货币以便进行活动。总之,要把货币的发行变成创造性活动,而非债务。

(4)重建人与人的关系:这是根本的问题。现行的设计让某些人垄断了发行货币的权力,最根本是因为他们垄断了社群内的信任(credit)。英语信贷与信任是同一个词,并非偶然。社区货币应该能促进群体关系和文化创造。以交换服务为核心的另类货币,效果上往往可以重建因为传统货币而受破坏的社区人际关系,意义远远大于经济本身。

(5)新的价值单位:我们亟须创造一种新的价值衡量单位。它应该和最终极的实质价值(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等)挂钩,以便衡量和推动生态上可持续的真正意义的人类进步。

我做过一个梦:那也许是在未来,有一个人,她也许是你的孙女儿,走进博物馆,参观一张印着特殊图案的绿色纸条,那叫美国联邦储备券,俗称美钞。她细读旁边的介绍资料,知道在以前有一个蒙昧的时代,这曾经是通行全球的世界货币,它代表了历史上一种非常扭曲荒谬的货币和权力制度,体现了历史上最显赫一时的帝国至高无上的威权。由此她也悟出其中隐藏着人类无数的灾难。她忽然感到一阵毛骨悚然,正如我们今天反观宗教裁判或走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那样。她走出博物馆,深深吸了一口清新的

空气,心里庆幸她的祖父母(也许就是你)投身了一项伟大的运动,扭转了人类文明的路向。她知道亚马逊森林的覆盖面积在她的妈妈那一代又开始扩大了,现在还在孕育着丰富多样的生命,北极熊仍在广阔的冰原上自由自在地行走……他们这一代人,不会把幸福寄托在这一张绿色的纸上。我看到她嘴里的微笑,然后我醒来了……窗外露出晨曦。我在想:和我做着同一个梦的人们,正在地球上的哪些角落里?

### (三)适度规模的生存体系(appropriate livelihood system)

现代经济建立在分工之上。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是规模经济(scale economy)。这两者,在当代的全球化远程贸易里,达到了巅峰的境界。

于是,采矿公司可以在巴西亚马逊雨林的最中心挖掘超级大洞开采铁矿,把原材料运到半个地球以外的日本炼钢厂,支撑它的庞大生产机器,维持它的全球经济领导地位。在这个采运铁矿的过程中,一切都是庞然巨物(larger than life),超大的机械、运输工具、港口、超级远洋货轮,堪称远程物流的典范。一切都是为了把单位成本降到最低,展现了现代规模经济奇迹般的效益。现代财务会计学也配合得天衣无缝。在财务账目里,一切都是那么合理。本应是不可补偿的成本(资源损耗),在经济概念的戏法下变成了收益,或者轻易被外化了(externalities):环境的破坏、生物多样性的无可补偿的损失,永远不会被算进财务损益表里。只要采矿公司继续利益输送,用复杂的财务计划书来包装本身的利益,巴西人及其后代,乃至未来所有的人类所蒙受的损害,所有将会在亚马逊森林永久消失的生物品种和多样性,都将隐设在规模经济的奇迹里而微不足道。

从资本主义兴起的那一天开始,世界便日渐被整合到一个极端复杂的全球资源流动体系里。这个体系复杂到这样一种程度:

我们赖以维持生存的东西可能是来自千里以外的地方。我们对全球化毫无条件地信任,令我们深信把这些东西送到我们餐桌上的复杂物流系统,总能完美运作。可是全球物流系统的复杂性,正是它的脆弱性所在。当世界面临愈来愈不稳定的社会和自然环境时,我们能排除物流系统大规模崩溃的可能性吗?

即使在全球最先进的社会体系美国,新奥尔良在飓风卡帖娜(Katrina)吹袭后差不多有一个星期变成了孤城。任何一个表面稳妥的大都会系统,一旦发电厂和输电网出问题,整个城市就会完全瘫痪,人们可能连饮用水也没有。

同样,在国际层面上,传统的农业国被诱使放弃国民粮食安全和自主权,改为购买产自几千里之外的“廉价”农产品,如今因为国际粮食价格暴涨导致社会动荡,更不要说在某些突发情况下因国际粮食网络中断而可能引发的人道危机。

全球化,也变成了一种全球层面的超级分工和超级集中化。经济理性是:既然几千里以外的美国以科技和规模经济的优势生产“廉价”粮食,你们就得接受国际分工,你们寻找自己的竞争优势好了(例如廉价劳动力和出口自然资源)。人们现在终于开始明白,这种思维模式是多么非理性,很多国家的人民正为这种歪曲的理性而忍饥挨饿。我们必须深切反思,近百年来现代化和全球化所推动的那种社会组织方式,是否能够持续。当全球的每一个社区、社会、国家都被整合到一个史无前例的超级全球体系中,而且试图在其中找到一个能够安身的分工位置时,这会不会是自残的行为?

我们也应该仔细审视:现代工业的大规模生产方式,是否真的具有高效率?例如说,如果我们仔细计算美国一个现代化农场,把它每生产一公斤粮食所消耗的电力、石油等资源都计算在内,那么它的能源效率可能实际上远远低于印度某个家庭农场。它之所以在财务会计上显得那么具有市场效益,是因为它有源源不绝的“廉

价”电力和石油供应。而美国为了确保能有源源不绝的石油和电力供应,费耗了多少资源(例如城市基建和军事),为另一个地区的人民带来了多少苦难,这些外化成本(externalities),永远不会算进美国农场的会计损益表。

站在文明的十字路口上,我们亟须新的愿景,需要想象新的社会组织方式。我们不应该浪漫化原始社会,也不是向往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方式。我们希望的,应该是某种具有适度规模和复杂性的社会组织方式。也许小不一定是美好的。较好的说法是:适度是美好的(appropriate is beautiful)。这种适度的社会组织,应该谨慎考虑对当地生态系统的冲击(ecological footprint),以生物区域(bio-region)为基础。它的适度规模让它在某种程度上保障这个区域内生活的居民生存的基本所需。

除了适度社会组织,我们也要大力开发适度技术(appropriate technology)。它们应该是相对廉价、高能源效益、生态上可持续、非垄断性,而非盲目集中化。例如收集雨水作为饮用水(rainwater harvesting)和自然降温的建筑设计(windcatcher),中东国家的古典建筑物是这方面的典范。

珍柯斯(Jane Jacobs)在研究城市发展时,提出了进口替代(import replacement)的概念<sup>①</sup>。她指出,历史上一个城市开始兴起时,会尝试在本地生产以前需要进口的产品,在这个过程中,本地生产能力提升了,而且所生产的东西比依赖进口更适合本地的需要。她认为,历史上能够做进口替代的城市或地区会更具活力,而不能成功替代一直依赖进口,则容易发展停滞甚至衰退。进口替代会促进服务于本土的产业。布雷蒙费(Hans Blumenfeld)指出,服务于本地的产业,比起服务出口需要的产业,长远来说更能

---

<sup>①</sup> Jane Jacobs, *Cities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促进发展,使地区更具多元性和活力<sup>①</sup>。一个地区内服务于本土的产业部门愈有活力,对变动莫测的经济环境就会愈有适应性,愈能应付经济衰退的风险。出口导向的发展范型是全球化的理论基础,可是它的效益愈来愈受到研究者的质疑。

现在吞噬全球的垄断性贸易体制,一直在压制能振兴本土经济活力的进口替代。WTO的主调是自由化,或解除管制(deregulation),可是对于知识产权的垄断,却愈来愈变本加厉<sup>②</sup>。1994年在乌拉圭签订的《关贸总协定知识产权协议》,确立了知识产权的专利垄断。在WTO的蓝图里,弱国只能永远依赖于强国的资金和技术,受制于依赖性的出口和进口导向而无法自给自足。

在我们的愿景里,世界将会由很多不同层次的适度规模生存区域所组成。这些区域有能力在不同层次上进行进口替代而发展本土的经济活力。进口替代不限于物质产品,也包括文化产品,促进社区的文化创造性。经济活动应该释放个体和社区的创造性。只有在本土经济具备服务于本土社区的活力和多元性的基础之上,区域之间进行的贸易才是健康的。它不仅促进平等的物质交换,也促进文化交流。活跃的技术转移,结合本土的文化创造,会促进社会的多元创造性。

我们希望的,是一种具有创造性、公平的贸易(creative trade with justice),一种真正促进人类自由和文化交流的贸易。我们期望的全球化贸易,应该是具有文化和道德内涵的贸易。

---

① Hans Blumenfeld, *The Economic Base of the Metropoli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 Vol. 21, 1955, pp. 114—132. Solomon 的模型得出相近的结论。

② 最高谱是生物掠夺(biopiracy),即是把传统的本土医药或农业智能垄断为专利。一个例子是美国某家生物企业成功把孟加拉某地区附近农民经数百年改进的某种优良稻米申请为专利。

#### (四)新价值运动:结合本土生态圈和全球视野的心灵运动

当前世界的危机,并不是使七十亿人温饱的问题,而是所有人都想过美式消费生活<sup>①</sup>。奴隶幻想的不仅是从奴役中解放,而且是有一天可以成为奴隶主。“既然他们能享受这种生活,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美日西欧的八亿多人口目前所消耗的资源已经把地球逼进死角。如果其他国家都以美欧日现在享受的生活方式为追赶的典范,即使最终没有可能成功,但这个过程所引发的生态灾难,也足够把地球推向第六次物种大灭绝的边缘。

所以说,目前的全球化造成双重损害:不仅让发达国家更变本加厉地消耗资源,而且间接诱导穷国一起投身于这疯狂的追求之中。西方认为自己的科技和民主理念<sup>②</sup> 堪称世界的典范,也让西方人自认比其他人优越。可是,全球化过程中西方掠夺和消耗资源的方式,却是对民主和科学的侮辱。目前的全球化所代表的价值系统,已经没有资格作为人类未来发展的典范。我们需要寻求新的价值范型。

前面说过,人类的价值观是一种复杂的适应系统(CAS)。生态体系也是CAS(肯定是最重要的CAS)。同样,经济制度也是一种CAS。全人类如果要有尊严地繁荣发展下去,就要这三大CAS能互相和谐配合。

首先,也许是最迫切的,我们需要全新的物质生产和资源消耗模式。我们需要革命性的可持续模式,它对全球生态系统的冲击(ecological footprint)必须减到最低,否则,将来的人类回首近三百年来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所取得的成就时,将不会再感到仰慕和

① 甘地说过:The world is abundant for everyone's need but not for everyone's greed. (世界富裕得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却不能满足所有人的贪婪。)

② 讽刺的是,以全球民主典范和捍卫者自居的美国,却是近代以来支持最多独裁者和恐怖主义者的政府,包括曾经支持和扶植萨达姆和拉登。

自豪。我也深信,人类三百年以至三千年来的智慧和心血,值得我们以更具有尊严的生活来回报。

至于经济制度,核心是资源配置的问题。前面已经说过,货币又是经济制度的核心。我们需要创立一种新的货币来重建经济制度。然后,与之适应的新政治制度将会出现。新的物质生产、资源消耗和配置范型,将会促使新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形态的出现。

可是,上述两个层面的变革,不会自动发生。即使是面对更严峻的种种危机,大部分人也不会觉得我们的生产、资源消耗和配置方式有什么问题。能推动前两个层面发生变革的,可能首先来自人类价值体系出现的深刻转变。

问题的核心是重新定义何为幸福。过去数十年最误导性的观念,也许是将物质享受(消耗)置于人类发展的核心。正如舒马赫(Schumacher)所说,现代经济学的最大扭曲是用消费来衡量生活水平,并假设能消费更多的人比消费更少的人,生活质素更高,即活得更好。消费被视为所有经济活动的唯一目标。可是消费(不管是物质抑或文化消费),不过是幸福中的一种手段。他提倡佛教经济学,即追求以最少的消费来达致最大的幸福。这是远比现今经济模式更理性的效益。

如果全人类都以美式消费标准来定义幸福,将会把地球推向灾难。我们应该怎样说服人类,包括正在享受过度丰裕物质生活的发达国家的人民,还有更值得追求的幸福标准?在保障七十亿人物质生活的同时,我们怎样去享受文化丰富,以及更具有尊严的幸福?人类的需要是多层次的,由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和温饱,到肉体感官的满足(例如性需要),然后是获得他人的认同(成就感)。主流价值往往以能赚多少钱来衡量一个人的成就。美式资本主义在这三个方面也许还可以提供一种模式。可是,更高层次的需要是爱,还有对超越的灵性层面的追求。在这

两方面,消费主义所推崇鼓吹的物质沉溺,也许反而会令人感到贫乏空虚。

相反,纵观人类文明,不管古今中外,在世界任何角落,都出现过追求超越灵性层面的智慧。不管是原始萨满教巫师(shaman)的出神状态,一神教与无限的神的融合,道家的齐物逍遥,瑜伽的三摩地(samadhi),或者是佛陀的涅槃解脱(nirvana),都说明了人类可以不依赖外在物质条件,而达致某种无限幸福的感受。这是人类无可压抑的潜能。当全球不平等贸易大量消耗自然资源而造成生态危机之际,我们需要重新开掘和发扬这些丰富的文化智慧,为人类提供更多元、更丰富、更具深度、更值得追求的幸福观。

我们无须统一的答案,甚至不应该追求单一的普世信仰。但是无论如何,面对扭曲和不可持续的全球化消费文明,人类需要全球规模而多元化的心灵运动。那可以是一位志愿者在为人们无私奉献时感受到的精神满足感,也可以是深入洞见存在奥秘的灵性修行。

伴随着这种人类心灵解放运动的,将是重新建立起对大自然的崇敬之心。<sup>①</sup>我们不需要再增添一种新宗教,或者超越的神的概念<sup>②</sup>。我们需要的,只是整全的生态智慧。例如大地之母理论(Gaia Theory):地球上所有存在,即使是无生命的矿石,也都在积极参与和影响地球整体生态体系的演化,因而可以视地球为一个巨大生命体。地球上所有存在都是她的细胞,所有生命、所有存在都紧紧联结在一起。我们不妨称这种相互联结性为神圣。

① 参阅:David Suzuki and Amanda McConnell, *The Sacred Balance*.

② 当然,我们也应该欢迎各种非压迫性、非权威性 & 非排他的宗教加入追求全球公义的同盟行列。



三大 CAS 的关键词分别是:生态,货币和心灵。我们的愿景是这三大系统的可持续协调,这也是人类和所有地球生命未来存亡的关键。

### (五)全球文化与存在多样性(existential diversity)

目前的全球化,是单一体系(主要由布雷顿森林体系主宰)的全球化,而且是片面的消费主义的全球化。通过无远弗届的文化产业,它几乎被化约为美国生活方式和价值的全球化。必须说明,我对美国生活方式本身没有什么意见,我不是道德主义者,不会从道德层面上说美国生活方式就是腐败。如果有一天科技进步到人们无须消耗大量资源,也可以完全享受美国生活方式,那没有问题,人有权自由选择。但是,如果只有一种选择,那将会是很可怕的世界。全球一体化的趋势是:真正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愈来愈少。

现在连地球上最偏远地区的生活方式,包括在亚马逊森林里过着最简朴生活的原住民,都被迫接受全球化贸易的规则。凡是阻碍全球贸易的扩张的生活方式,都会遭到无情碾压,或者是被迫演变成为一种能适应全球化的混杂(hybrid)生活方式,即所谓第三世界后现代性(third world post-modernity)。而这种生活方式的结果,往往是社区的文化活力的衰竭。

文化作为价值系统或者象征系统,必然以某种生活方式为根。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出现,必然伴随一种新文化的诞生;相反,某种生活方式消失了,以此为根的文化也将会死亡(即使它能以博物馆的形式继续存在)。我们无法离开生活方式来谈文化,否则就只能是一种不着边际的学院讨论。

正如地球需要生物多样性,我们也需要文化多元性。即使不把文化多元性视作如生物多样性一样具有独立自足的价值,然而

前者所蕴含的生存方式的多元性,也能让人类更能适应环境的转变<sup>①</sup>,如前所述,更以服务本地为导向的、更多元的经济体,也更具活力,更能应付经济周期的起伏。人类要在地球上具有尊严地繁衍生息下去,存在的多样性是不可或缺的条件。

综合上述所有视野,我们不禁要反省,即使不谈大部分失败案例,只谈所谓“成功”参与全球化的典范:赔上了宝贵的自然资源,令生态系统崩溃,还有人民因为激烈竞争和社会两极化而被迫生活在焦虑之中<sup>②</sup>,追求一种自欺欺人的幸福,结果扭曲了人际关系(经济学家所谓社会资本损耗),最终削弱存在多样性,换来的,只是一大堆基本没有价值,而且反过来不断冲击社会稳定的货币。这样的所谓进步,真的值得吗?说到底,这不是一种疯狂吗?

以消费来推动增长率,以此为高于一切的目标的病态发展范型,是该放弃的时候了。我们要敢于确立新的愿景:一种新的经济范型,在保护生态多样性的大前提下,满足整体人类生存需要(包括生存、情感和心灵的需要)和促进多元创造性。

这是文明的抉择。几百年的殖民帝国主义,以两次血腥的世界大战作为结束,我们又进入了美元帝国主义时代。如今人类文明又面临一个关口,我们都不愿意这个时代以第三次世界资源争夺大战来结束。爱因斯坦说得很好: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用的是什么武器,但第四次大战,肯定是石头和棒子。

### 全球命运共同体:基于人类脆弱性的全球伦理

全球化起码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意义:就是让大家明白一个生态真理:全球人类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随着全球化发展出来

---

① 例如《崩溃》提出移民新西兰的维京人因为死抱原有的生活方式,不肯向当地的伊努人学习,结果无法在新西兰立足。

② 所谓的 M 型社会,让作为社会稳定力量的中产阶级也惶惶不可终日,唯恐堕进穷困的一极,而底层可以向上爬的机会也愈来愈少。

的信息技术,令遥远某地的灾难,可以通过信息网络即时让全人类不同国籍种族的人感同身受;全球远程物流,让我们可以把物资运送到偏僻的地区帮助急需救援的受灾人群,这是人类文明发展了几十万年以来最珍贵的进步。我们应该全心拥护这种全球一体化。

作为全球命运共同体的一员,我们也分担着全球生态体系的脆弱(敏感)性,以及人的存在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如果有一种情感能把人类普遍联结起来,就是人的存在的脆弱性:人会受苦,人能感受他人的痛苦,而且会为他人受苦而伤心。不论是中国人抑或日本人,都经历过地震的灾难,这让我们在心灵的深处联结在一起。同样,不论是以色列人或者巴勒斯坦人,都感受过流离失所、亲人被杀害的痛苦,这应该让两个民族找到深深的共感(empathy),有可能找到更深刻的共同基础去超越仇恨。人的存在的脆弱性,既有普遍性,又具有无可化约的个体性,可以作为全球化伦理的基础。

面对扭曲人性的掠夺性不公平贸易的冲击,全球各地兴起各种身份认同来抗衡。很可惜,大部分这些身份认同的特征是高度的封闭性和排他性的(例如各种形式的原教旨主义,包括新自由主义)<sup>①</sup>。GUTs 提倡一种虚假的普世身份:自由贸易人,但实际上,它却通过政治、军事和文化暴力来压迫异己,结果促进了各种保卫性和排他性的身份认同,令全球陷入冲突升级的恶性循环。提倡身份认同的背后,总可以发现某种政治利益。另类全球化呼吁的,不应该是某种新的身份认同,而是这种全球化伦理:所有生命、所有存在,都在地球生态体系之内紧紧联结在一起;所有人,都无法逃避存在的脆弱性,而且能深深感受其他人的脆弱性。在这种脆

---

① 当然,身份认同本来就是通过某些排他性而建立起来。不同的局部性政治利益利用了人民对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厌恶反动,塑造了各种排他性的身份认同。

弱性之上,我们可以很谨慎地尝试建设联系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全球命运共同体。

人类的科技和社会组织终于成熟了,让我们可以建设一个真正的全球体系。问题是,科技和社会组织能力,目前被少数人垄断了来进行资源掠夺,延续几万年来的半野蛮模式。我们能否从垄断集团手上取回科技和社会组织这些宝贵的文明成果,建设基于慈爱和分享的全球命运共同体?这是人类第一次有能力和视野在这种规模上有意识地作出文明的抉择。问题是,有足够数量的人(critical mass)有魄力去承担和开创这个愿景吗?

全球命运共同体,也许是值得人类追求的全球化。不应该笼统反对全球化,相反,我们需要真正的全球主义者。

这篇过长的文章,终于完结了,但是思考/行动,才刚刚开始。<sup>①</sup>

---

① 关于行动,福柯说过要全方位思考,局部在地行动(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我认为是不够的。墨西哥资深社会运动家、另类货币运动推动者 Luis Lopezllera 结合全球和本土创造了一个新词:Glocal。我们要具备全球化视野,在本土行动;也要具备本土视野,在全球行动。我们需要的不是反抗全球化,而是如何让抗争全球化,当然不仅仅指利用某些情境把局部抗争推向国际媒体,而是真正在全球的层面上响应全球化的问题,也意味着创造性的全球化。每一种抗争运动(女性、原住民、农民、弱势群体、非单一异性恋……等等),都有本身的独特性和无可化约的歧异性。但是,无一可以超脱于全球化权力网络,置身于全球资源掠夺和生态危机之外。社会运动也要小心避免沦为局部利益的争夺,或者打着反全球化的旗帜,却是为了争取最大利益来参与全球化不平等贸易。

对于那些没有想过要投身社会运动的人,也总可以用自己的方式积极行动,例如减少不必要的消费、如果消费尽量支持本地社区的小经营者、关心消费产品的社会及生态冲击、抵制掠夺式垄断型企业的产品、支持符合公义及绿色原则的产品、参加开放而非权威性的灵性活动、参与正义诉求的示威等等。<http://www.earthhealing.info/fifty.htm> 等网站有一些启发性的想法。有些你也许不同意,不适合你的生活环境,但是,你可以由此想出适合你的行动方式。最简单的是,想办法在生活里节省最少一半资源消耗吧,别再用你的生命来支持消费主义,间接支撑全球掠夺性不平等贸易。

为了出版这样一篇长文可能要多伐一棵树，恳请未来的人类宽恕我。

2008年7月25日

## 5 关于反全球化运动的政治经济学：一个尝试

刘 振

### 一 快要到来的最后的胜利，还是又一轮的资本主义扩张？

今年是1968年运动四十周年。席卷全球的68年运动尽管在不同国家表现出很多不同的特点，但是正如沃勒斯坦所言，这个运动在各地都坚持两个共同的基本观点：第一，他们反对美国霸权以及苏联与这个霸权的共谋；第二，他们认为传统反体系运动如苏联式的修正主义的共产党、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和欧美的传统的工会等已经蜕化和变质，从而已经不是解决办法的一部分，而成为问题的一部分。正是这两点使68年运动虽然失败，但是却成为世界历史的转折点。

在这次运动后，一切看来强大无比的力量，无论是苏联的霸权还是传统的蜕化的东欧的共产党、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和欧美的传统的工会，要么退出历史舞台，要么力量逐步衰微，到今天正在经受生死存亡的考验。美国霸权似乎是个异数，它不仅逃过了68年运动的历史谴责，而且还卷土重来，利用苏联解体和世界左翼运动陷入混乱的机会，将自己的霸权在冷战结束后一度扩展到极致。而且，从68年运动爆发那天起一直想将这场运动从历史上抹杀的新保守主义，在三十年苦心经营之后，终于在布什政府时期主导美

国的内政和外交,并对美国国内外的 68 年运动的遗产进行最后的清除。但是,在布什短短的八年任期即将结束之际,我们发现我们的世界曾经爆发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全球性的反战运动,我们见证了以世界社会论坛为代表的反全球化运动日益壮大并转守为攻,我们还看到反全球化运动在拉丁美洲已经取得初步成就,拉美的新自由主义议程已经基本被遏制,而且运动正在推动这个大陆日益远离商品化和美国霸权,人们正在重建民生和社会。拉丁美洲的群众运动看起来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而在这样的未来中将不可能有美国霸权的地位。68 年运动在漫长的四十年后,正在逐一历史性地验证自己的伟大预见。

但是历史表明,无论是美国霸权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极大的通过改变形式又延续下去的能力。美国从越战的失败中挺了过来,并取得全球单极帝国的地位,同样美国也可能从伊拉克战争中挺过来,然后更大规模地在全球推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前的反全球化运动也因此处于关键的转折点上。在整个拉丁美洲,特别在左翼入主政府的所有国家,人们感觉到这些左翼政府都做出了太多的妥协,但是生产和生活却没有太大的改变,群众的热情正在消退。而对于世界社会论坛来说也存在类似的情况,这几年世界社会论坛显现出好像在简单地重复同样的事情。对于反战运动来说,虽然运动一直在坚持,但是美国的战争机器似乎并没有太大地受到运动的阻碍,美国更在乎的是在伊拉克和黎巴嫩面临的武装抵抗。布什曾经在面对大量的反战运动时,这样为伊拉克战争辩护:我们之所以在伊拉克发动战争,就是为了让那里的人们赢得这样的示威的权利。这对于当前的运动来说,可以说是一个讽刺。这表明在布什眼中,当前的运动如果像现在这样止步不前,就很可能改变不了什么,倒是可以成为世界不平等统治的一个装饰和狂欢,而时间长了的话,就会验证新保守主义对 68 年运动和此后的新左派运动的预言:革命和左派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就是一

个错误,它们注定只有狂热和破坏,将注定不能成就和建设任何一件有肯定意义的事物,——这将进一步打击已经沮丧的左翼的士气。这当然只是新保守主义的无知的自我期望。四十年来,新的反体系运动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它还有着巨大的未来的潜力,它已经并将继续书写自己的有意义的历史,——这不是新保守主义所可能抹杀的。历史将证明,看起来很新的新保守主义,其实是陈旧的,脱离时代和人民的。

但是,考虑到反全球化运动以前的几波反体系运动的失败,这次反全球化运动要取得更大的成就,需要我们比以前做得更好。那么,我们该注意什么呢?

## 二 理论思考的重要性

战后的旧的体制化的党派和运动,不仅在政治和经济上高度垄断,而且在理论研究上也高度垄断,对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失去敏感度,把理论研究完全变成了一种大而无当的宣传。因此,68年以后的运动就果断地和这种“宏大叙事”告别,而向种种新的思考和概念敞开,勇敢地投入反资本主义的行动。这当然扫除了此前的沉闷空气,使左翼运动重新焕发出巨大的生机和活力。左翼运动告别僵化的宏大叙事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却不恰当地基本放弃了对世界资本主义的整体和深入的研究。反资本主义似乎变成了一场从道德纯粹性出发的义愤行为。

60年代末以中国为中心的毛主义的新反体系运动,是对世界资本体系最大最实际的威胁。当时越南战争如火如荼地进行,而美国败局已定,毛主义在亚非拉广泛传播,看起来资本主义的失败和终结已经指日可待。但是,当时美国著名战略家布热津斯基说,美国一定能够通过推广现代化打败毛主义的农民革命热情。

当时美国采取的策略如下:对于日益增长的国际收支赤字问



题,美国发现由于美元是世界关键货币,出现大量国际收支赤字对美国是有利的,虽然长期来说对世界经济的平衡发展不利。因此,1971年8月15日美国全面放弃美元与黄金挂钩,美国从此开始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放任自己的国际收支赤字无限扩大。这迅速地解除了德国和日本对美国的经济威胁。同时大幅提高利率,治理通货膨胀。发展中国家此前借下了大量美元外债来进行进口替代性的工业化,现在在美元利率大幅提高的压力下,这些外债的利息不断翻番,导致它们背上沉重的外债,工业化努力失败。

对于中国毛主义在全球的攻势,美国利用1978年以后的中国改革,依靠毛时代打下的良好现代化基础,和美国推广的现代化方案很快实现良好对接(事实上,为了使中国过渡到新的发展模式,美国通过开放市场、转让特定技术和加大特定物资的出口等,给中国转型以巨大的主动的配合),使毛主义式的发展模式迅速退出中国经济发展,由中国发端的世界性的68年运动也顷刻间偃旗息鼓。时至今日,历史上的运动参与者对这次巨大的意外的失败的原因仍然不很了然。其实,这恰好反映68年运动一个重大的缺陷就是缺少对于资本主义的深入认知。

资本主义是一个高度技术化和高度知识化的社会,虽然我们可以判定其腐朽和对人类社会的巨大破坏性,但是我们却无法单纯依靠道德义愤来终结它。因为它能够摧毁一般的不是以深刻认识为基础的道德。因为一般的道德的基础是会被资本主义的发展连根拔除的。比如,你讲要艰苦奋斗、要节俭,但是短时期看来在技术的帮助下,人们很轻易地就可以获得大量商品,艰苦奋斗和节俭又有什么意义呢?笔者曾经就毛时代的发展模式采访过农村的老人,他们的回答是,对这种模式最大的冲击来自新技术的使用,78年以后大量农药、化肥和优良种子的引入,极大地提高了产量,使农民感觉以前在人民公社时期的艰苦奋斗似乎都是瞎忙活,认为还是技术厉害。这验证了马克思的一段话是极其深刻的:“它

(资本主义)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他还说:“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可见一切义愤或伤感甚至神圣,在资本主义的复杂的机制下面都是不管用的。那么,什么才能终结资本主义呢?只有认识了它才能最后超越它。列宁在苏联建立后,认为短期内对社会主义的威胁是政治和军事斗争,而长期来说是工人阶级能否掌握全人类积累下来的知识。毛泽东到晚年也开始认识到,学习和研究对于超越资本主义的极端重要性,因此他不断号召加强理论学习,而且主张打破官方对理论研究的垄断,让群众参与到理论的学习和批判运动中。但是即使那个时候的补救也已经太晚了,对于资本主义复杂机制的认识的落后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迅速弥补的。因此,对于资本主义最终的腐朽本质和最终的不足法,毛泽东说,即使在中国这个有几千万共产党员的国家,也没有几个人能够真正科学地认识到。回首当时的中国,人们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真是太肤浅了。但是国际上的左翼运动又有多少人在用全人类的知识武装自己,而看到美国复杂的世界调节机制,预见美国会通过哪种机制劫后重起呢?因此,70年代和80年代我们见证了毛主义和其他左翼运动的巨大幻灭。此后世界流行的主要是发端于发达国家的新社会运动,如生态运动、妇女运动、反种族歧视运动以及后来的人权运动。这些运动和19世纪的工人运动一样,最终只是

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促使了资本主义的完善。它们没有提出资本主义具有致命的矛盾，因此也没有真正缓解矛盾。过去的三十年我们见证的是，无论环境问题还是实际的不平等都在加剧。如果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曾经深刻地研究过资本主义（而后期却放弃了这种理论努力走入僵化），并提出过一套较完整的替代方案（当然这种方案还有诸多不足），但是却雄鹰折翅的话，那么可以说，毛主义以后的社会运动由于对于资本主义已经放弃了整体深入的理论研究，因之也不能提出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一定程度上导致他们总的说来没有取得人们曾经期望的那么大的成就。

### 三 与反全球化运动相关的经济背景

反全球化运动所在的历史时代最显著的特征可以这样概括：资本主义形成私有化、金融化和全球化的三位一体。具体来说，就是20世纪70年代国际资本积累了大量的过剩资本（这导致金融化），这些资本推动了苏东剧变，并收购了大量前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自然资源、基础设施行业以及地产（所有这些行业都具有垄断性）——这就是全球化和私有化。然后，利用这些行业的垄断性获得大量租金，这些租金主要流入金融、保险和房地产等组成的泛金融部门，使世界经济进一步金融化。

关于这一过程的具体进程，美国进步学者迈克尔·赫德森有很深刻的解释。他说，面对60年代末的危机，美国使美元和黄金脱钩，大力推动金融自由化，将危机转嫁给发展中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是美元和黄金脱钩以及金融自由化，使资本主义出现一个和信息化、后工业化并列的更根本的特征：金融化。1971年美国放弃美元和黄金挂钩，就已经为世界金融的不稳定埋下了伏笔，其后美国就开始越来越不受约束地发行美元。同时，此后美国放弃凯恩斯主义的很多规定，大力推行金融去管制化，使任何国家

对资本的跨境流动都日益缺少监管能力,本国货币极易受到恶意攻击,金融愈加动荡。而各国央行为了避免受到国际资本的恶意攻击,纷纷储备美元,这些美元又回流到美国,使美国可以再更多地发行美元,而美国本国资金可以大胆地流向资本市场,美国金融部门开始恶性膨胀。这就是金融化的开端。

但是,在赫德森看来,金融的爆炸性增长除了上述原因外,还因为金融部门和房地产部门结合在了一起。赫德森说:“西方经济体已经允许金融部门征收地租,并以之作为向该经济体的储蓄者支付利息的基础。这些利息又循环地回流为新的贷款,由于不断地抬高土地价格、垄断价格以及股市价格,从而制造出经济泡沫。”赫德森认为,由于房地产等不动产带有垄断性,而且占财富的比例极大,这一部门的金融化就大大地推动了金融部门的爆炸性扩大。由于房产的垄断性,泡沫不仅极大,而且还很难破灭。赫德森说:“现在金融、保险和不动产部门(FIRE)管理着经济体的储蓄和信贷:其管理方式就是把大部分贷款(美国和英国大约是70%的储蓄和贷款)用于房地产。剩下的大部分贷款都贷给了股票和证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

美国金融部门的爆炸性扩大,可以使美国的投资和消费获得融资,经济得到长期高速发展,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带给美国的好处。

但是,美国的金融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通过在国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推动房地产发展和私有化,购买这些国家的垄断地段的地产,垄断的资源公司和垄断的公共设施,如交通、供水、供电等设施。

赫德森认为,西方国家在通过金融化后产生了大量的虚拟金融资产,这些资产需要购买最能带来长期稳定收益的资产,它们最看好的是能够带来租金的垄断的公共服务部门和资源部门。

赫德森说:“金融部门开始认识到银行贷款的主要市场是能够

产生租金的资产——如按揭贷款抵押的土地和建筑、公共设施、煤矿、石油和天然气。几乎所有经济体的最大资本开支都是政府开支，特别是自然垄断行业的支出，这些行业包括交通——从19世纪的运河和港口到铁路、公路和航空，以及电力、水和煤气的输送、通讯系统，以及广播电视传播频谱，更不用说军事力量了。”

于是，主流经济学家和主流媒体就大力推动私有化，其说辞就是这些公有部门缺少效率，而事实上他们的目的是看中了其垄断租金。由此在这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后出现了私有化巨大浪潮。赫德森说：“近些年来这些资产（指公有的垄断部门的资产）转为私人所有是自五百年前欧洲占领美洲新大陆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财产转移。这一结果丰富了索尔斯坦·凡勃伦所谓的既得利益集团，它们集中在被美国国民所得账户称为FIRE（FIRE是金融[Finance]、保险[Insurance]和不动产[Real Estate]的首字母的缩写）的部门中。现在人们可能会把被私有化的垄断行业以及其他公用事业归入这个部门。”（上述赫德森的引文皆出自赫德森的《超级帝国主义》一书。）

可见，金融化首先使传统的金融部门从金融和保险部门扩大到房地产部门，使金融部门成为FIRE部门。而私有化导致金融部门进一步扩展到被私有化的垄断行业 and 资源行业。

私有化是国际金融资本推动的一场攫取垄断权和租金的运动，而不是什么为了提高效率的运动，这已经为近些年来事实所证明。

赫德森的解释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理解主导当前世界经济的金融化和私有化的本质。

另一位美国学者洛仁·戈尔德纳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和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史的关系。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末，资本主义已经面临生产过剩、利润率下降的过度积累危机，但是，垄断资本没有采取传统的熊彼特所谓的创造性破坏的解决方式，就

是没有通过强制性的危机使多余的资本破产,反而是采取使经济金融化的办法,通过使经济泡沫化令这场危机得以延长。他说:“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股票市场的繁荣,是应对1968—1973年危机所采取的复胀策略的一个继续,这一过程还在继续(如反复抵押融资),实际上是历史上最大的‘庞氏计划’(借新钱还旧钱的投机骗局——笔者注)。表面的繁荣,不像1945—1975年那样与真正的全球扩张相关联。”他认为,这种防止虚拟资本贬值的作法,损害了实物生产,使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一直迟迟不能到来,使人类和世界处于慢性死亡阶段。他说:在这一阶段,虽然“通过全球化打开苏联、中国和部分第三世界市场,提高了生产总量,降低了商品价格,创新了技术,并且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尽管比战后经济繁荣时期低些)。资本主义似乎可以扩张,但是它还没有使虚拟资产大规模缩水。相反,美国资本在拉丁美洲、非洲、东欧、俄国、乌克兰、中亚和中国农村带来了大破坏,在美国和欧洲也实行紧缩,使世界工人阶级和相对剩余人口饱受冲击。今天的美国世界霸权与全球资本主义健康发展的新阶段并不相容,就像英国的世界霸权在1900年表现的那样。……世界遭到大规模的破坏:美国工业化程度和规模下降,西欧大规模失业,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和东欧大部分地区,以及前苏联(俄罗斯和乌克兰及亚洲中部),还有‘中国奇迹’之外的九亿中国农民和工人生活水准的绝对倒退。这种表面繁荣给社会的破坏造成各种衰败迹象,包括世界许多国家蓝领阶层受到损害(即使在中国也有两千两百万工作岗位的净损失),食利的部门(金融—保险—不动产)的扩张(最近世界房地产一反常态地迅速发展,美国再次成为中心),环境的破坏(备受关注的全球变暖),国际犯罪的增多(如毒品交易),由于经济原因没有受到抑制的可治愈流行病的蔓延,六十多个国家成为‘失败国家’,产生了原教旨主义(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印度教)。很显然,在许多经济的‘长城’被摧毁的今天,这种虚拟美元的循环越

来越迫使日本和德国采取英美金融化的模式,这同样损害了实体经济,特别是影响到劳动人民的利益。这种世界经济的美元化、金融化带来的不稳定性已经显而易见:日本通货紧缩(1990年至今),美国经济衰退和不动产崩溃(1991年),墨西哥危机(1994年),亚洲金融危机(1997—1998年),俄罗斯政府推迟偿还短期国债和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基金崩溃(1998年),巴西危机(1999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2000年3月),阿根廷危机(2001年),以及2000年3月至2002年9月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35%,三万亿美元的票面财富在2000—2002年间化为乌有。从那时起,‘金融套利资本主义’(来自于道格·诺兰的术语,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扩展了其含义)加速发展,伴随重复抵押贷款融资的发展,‘美国消费者’成为世界经济的‘最后买家’。正像最近一个爱开玩笑的人说的,‘我终于明白了供给经济学的含义。就是其他国家供应商品,然后美国提供购买它们的钱。’”(《虚拟资本与资本主义终结》,《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6期)

为什么这次资本主义对危机采取的策略不同于二战前的资本主义?萨米尔·阿明认为,这是因为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形成美国独大,有力地调控欧美的集体帝国主义,其上层的资本高度融合,因此,这些资本之间的竞争不再采取你死我活、以民族主义为幌子的战争形式,而是采取金融化方式应对周期性出现的资本过剩的过度积累。

法国著名左翼学者热拉尔·杜梅尼尔认为,不仅西方国家的上层比战前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而且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上层也比战前更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他用拉丁美洲所有国家和美国之间的资本收益流动数据说明了这一点,1965—2005年间,自拉丁美洲流入美国的资本收益急剧增加,从20世纪60年代的0.2%升至70年代晚期以来大约0.7%的水平,中间还曾有过0.9%的高峰(这个比例看起来很小,但要知道美国公司平均的国

内税后利润,即其在美国国内的赢利,在1980—1985年间平均仅占美国GDP的4.5%)。这次增加主要发生在1972—1982年间,这种增加是美国资本大举流入拉丁美洲(值得注意的是著名的70年代晚期贷款),以及1979年后典型的新自由主义回报增加的结果。但我们也可以注意到自美国流入拉丁美洲的资本收益的急剧上升,在上述增加的大约六年后,即1978—1988年间,达到大约0.5%的水平。从美国流入拉美的资本收益大增,正是拉美国家上层阶级大量投资美国的结果。

上面的内容构成反全球化运动主要的经济学背景,这些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反全球化运动往往集中在反对资源和公用设施的私有化上,如上所述,这是因为资本主义金融化和私有化的一个基本的内容,就是占有带有垄断性的资源行业和公用设施行业的租金,而并不是为了所谓的提高效率。只有掌握了这些行业,资本才能稳步获利。

这些经济背景也有利于我们理解反全球化运动时代的阶级结构。这个时代的阶级结构的主要的特征是:出现了完全被抛弃的群体和国家;各国上层阶级互相融合并普遍受益,下层阶级普遍受损,但是民族国家的因素仍然存在,南方国家下层受损更大;正式工人阶级的保守化。这些都可以在上面所述的经济背景中找到原因。

由于全球化的本质是金融化而不是工业化,因此全球实体经济并没有扩张,即使像中国这样被认为是全球化的受益者的国家的制造业,就业人数也都有大幅下降。正如上文所说,在这一阶段“美国工业化程度和规模下降,西欧大规模失业,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和东欧大部分地区,以及前苏联(俄罗斯和乌克兰及亚洲中部),还有‘中国奇迹’之外的九亿中国农民和工人生活水准的绝对倒退”。这就必然导致一些国家在进口替代工业化努力受挫后,没有随着全球化而进一步工业化,而是出现了大规模的去工业化,因



此这些国家就出现了城市的退化,出现了大规模的贫民窟,大规模的非正式就业人口,这些非就业人口以及他们的国家(往往在国际上被称为失败国家)已经和全球经济没有重要关系,他们已经系统地被抛弃。

在这方面,美国学者迈克·戴维斯有比较多的论述。戴维斯在《新左派评论》2004年3—4月号上的长文《贫民窟的星球》,内容就是关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造成的去工业化的后果的。戴维斯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第三世界的强制推行,导致工业和农业倒退,导致大量农民流向城市,加上城市本来的工人失业,使第三世界国家的非正式就业人口占到总就业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他们大都居住在城市贫民区中,并形成宗教原教旨主义等运动。例如在肯尼亚,1989年以后的十年里,85%的新增人口进入了内罗毕和蒙巴萨的贫民区。一些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实际上变成了大规模的贫民区。2003年,在乍得和埃塞俄比亚,99.4%的人口是“贫民区居民”。当穷人被迫住进贫民区时,富人们在他们的住地周围修建了栅栏和炮楼。仅在南非就有二千五百家私人保安公司,几乎有三十万注册的私人保安保卫着这些围有栅栏的大院。

戴维斯还认为,城市贫民区的恶劣的生存环境,它所依托的非正式经济,并不能满足新增城市人口对就业不断增长的要求,是世界各地种族冲突和所谓的文明冲突日益增多的主要原因。他说:“发生这些冲突不仅仅是由于不理性的宗教信仰,也不仅仅是由于人们具有为一些芝麻小事便会互相争斗的性情。生存的物质条件变得恶劣,竞争更加激烈,这些才是深层原因。宗教隔离、种族认同或种族排斥,这些都只不过是些调控手段。”他说,在非正式经济中,在极度竞争下,在利润降到生存线左右时,人们往往以种族或宗教区分来进行激烈的冲突。因此经济崩溃是根本的原因。戴维斯批评那些将这种冲突神秘化的倾向,他认为,这些人如果受左翼

传统的影响,也能转变为进步力量。在工人阶级传统得到传承的地方,例如在玻利维亚奥尔托市说奇楚亚语的贫民窟,以前的矿工在动员中充当领导,结果是左派的再次兴起。

如此大规模的非正式就业工人也就是非正式无产阶级(戴维斯语),是反全球化运动的最坚决也是人数最多的力量。

在反全球化运动中,正式的工人阶级相对消极。由于这些国家的本土工业基本崩溃,正式的就业机会一般集中在正式的外资制造业公司或者是外资控制的能源、资源和公共服务业部门,一般待遇相对稳定和较好。当然,由于他们的家庭往往仍有非正式就业人员或失业人员,他们也有对全球化的不满的成分。但是和前两个世纪比起来,这个阶级已经相对消极很多。

在反全球化运动中,民族资产阶级总的来说是缺席的。全球化的进程本来就是发达国家的上层阶级和发展中国家上层阶级的合谋。发展中国家的上层在 20 世纪上半叶曾经主要是左翼的民族主义者,他们主要依靠国内的工农力量,赢得民族独立并进行独立的工业化努力。但是,这种民族主义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在外国面临国际资本越来越大的压力——后者对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努力可能动摇发达国家几百年来统治地位极度警惕,而在国内,通过普及主要是西式的教育和工业化,产生了对西方发展模式的认同,同时,从新的规模越来越大的新式教育中得到提高的分子和工农,要求更多的权利。而西方上层阶级通过战后的福利资本主义,也在国内提高了教育水平,不自觉地壮大了人民的力量,发达国家的人民也要求更多的权利。这正是 20 世纪席卷全球的 68 年运动的时代背景。面对 68 年运动,发展中国家原来的左翼民族主义的上层阶级和发达国家的加强规制的凯恩斯主义的上层阶级,都感到同样的恐惧,他们不管原来如何表面上大嚷大叫对抗,甚至不惜引爆核战争,但是在面对来自下层的威胁时,他们取得了默契,开始共同谴责国家干预和社会规制的问题,要求走向经

济的自由化。明白这一点,就知道民族资本在全球化中本来就是合谋者,他们不可能真正地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在全球化进程中,他们得到了大量好处,包括金融自由化使经济金融化,从而使中心和边缘国家拥有资本的上层阶级都获得大量资本收益,劳动和环境法规的放松,使中心和边缘国家的资产阶级都扩大了剥削程度和利润率。这些现实的利益当然使中心和边缘国家的民族资本都基本不会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有人会说,经济自由化带来的经济开放,会加剧竞争,损害各国资本;还有,金融资本的剧烈扩张将损害制造业资本。这些质疑只适合于中小资本,对于大资本来说,在自由化的早期,他们凭借自己的巨大实力,正好在发展中国家乃至国内大肆并吞中小资本,这对于他们是有利的。事实上,全球化正是发达国家垄断资本推动的。关于这一点大卫科茨说,由于经济形势的变化,原来推动美国垄断企业发展并受到这些企业大力欢迎的美国政府对垄断行业的各种“规制”,已经变成了妨碍垄断企业发展的桎梏,它阻碍美国垄断企业去“自由”地吞并国际和国内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大垄断企业从欢迎政府的“规制”转为反对政府的调节和规制,从而转向支持经济新自由主义,因为经济新自由主义历来反对政府对企业的调节和控制。(大卫科茨《新自由主义和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的经济扩张》,《国外理论动态》2003 年第 8 期)至于金融资本对实体资本的伤害,这也是只适用于中小资本。对于全球的大资本来说,金融和非金融企业的界限已经极度模糊。例如,美国《社会经济评论》第 3 卷第 2 期发表了美国学者格莱塔·克里普纳题为《美国经济的金融化》的文章,以系统的经验证明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美国企业(无论是金融企业还是非金融企业)的利润,已经越来越多并且主要地来自金融渠道,而非商品制造和贸易。像 IBM 这样大的制造业公司,现在收入的大部分也越来越主要是来自金融领域。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制造并利用金融业和实体经济的矛盾,是

一种不切实际的作法。

#### 四 反全球化运动充满歧途的未来

上述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大势也将对反全球化运动的未来产生重要影响。世界经济未来将出现哪些基本态势呢？

可以肯定的是,所有国家将走向更多的国家保护和更多的国家干预,在所有国家民族主义倾向都将会加强。全球化进程开始以来,世界经济确实更多地开放了经济的国家边界,对经济也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国家干预。但是,即使在全球化如日中天的时候,民族国家仍然是世界经济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所有跨国公司仍然以某一个国家为基地。跨国公司依靠所在国政权来保护和扩展它们的全球利益。因此在遇到贸易谈判(如WTO谈判)、货币汇率、政府合同分配、关税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收回债务等等问题时,每个跨国公司都期望国家(有时是国家组织,如欧盟)帮其争取利益。而且,发达国家处于全球等级体系的上端,它们依靠其政权力量,往往为其跨国公司争取到极大的优惠条件,这会对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形成巨大的压力。第二,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虽然消减了一些公民福利,但是大部分还是保存了下来,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因此有较强的向中心国家移民的动力,发达国家因而史无前例地遏制移民,这是最显而易见的民族藩篱。

这些民族国家之间分裂和争夺的因素在世界经济处于危机时期将进一步加剧。上面说到,在全球化前中期,中心和外围国家上层阶级互相融合并普遍受益,虽然两地的下层都受损,但是两地的上层努力将民族主义压制了下来。但是当世界经济进入危机阶段,中心国家的资本一方面面对利润率极端微薄的挤压,另一方面面对国内民众日益难以遏制的压力,它们转而利用国内的民粹主

义,向外围国家的资本和民众施压,民族主义将在中心和外围国家同时高涨。

民族主义的加强必然表现在国家对经济干预的加强上。在全球化的早中期,各国对经济的干预确实都有所减少。但是,各国具体情况又有很大的不同。发展中国家对国家经济的干预减少得最多,在非洲的一些国家,甚至是完全放弃了。但是在发达国家,国家对经济一直保持较强大的干预力度。这包括国家通过央行对经济的高度干预、军事方面的巨大投入和在社会福利方面的继续维持。英国《国际社会主义》2007年冬季号刊登的对考斯达斯·拉帕维查斯(Costas Lapavitsas)题为《信贷吃紧》的访谈录,这样谈论央行:“尽管在过去的二十年到三十年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放松管制,但央行对于最终支付手段的垄断一直都没有受到挑战。确实可能出现了极为不错的金融创新,但只有央行才被允许发行其他所有形式的、最终都要兑换成的法定货币。换言之,自由市场这一意识形态在所有的方面都想要自由的市场,但货币除外。这是新自由主义核心层面的最深层次矛盾。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如果你真的相信市场是这么伟大的一个东西,那么你也应该让它来组织货币,因为货币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关键商品。”该刊同一期的克里斯·哈曼的文章认为,过去三十年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是一场“私人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的经典作法是,通过国家财政扩大政府支出来刺激和推动经济走出萧条。而过去三十年资本主义的作法是,控制政府支出,但是每当经济放缓时,降低利率,从而刺激公司和消费者投资和消费,以此刺激和推动经济走出萧条。这事实上也是一种政府干预,不过不是政府的直接干预,而是间接干预私人来扩张经济。因此,他称这种作法是“私人凯恩斯主义”。这样的揭示让我们看到,19世纪后期一直到现在资本主义的一种具有连续性的趋势,就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趋势一直在继续,并且总的说来在加强。关于军事支出,美国不仅冷战时期保

持巨额的军事开支,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军事开支不减,反而在较快地攀升。

近两年以美国次贷危机为代表的金融危机以及石油、粮食危机等,似乎预示着70年代初以来被延缓、拖长的危机将进入最终大爆发的时期。这场被拖长的危机导致全球边缘地区和边缘群体长期处于慢性死亡状态,现在可能是进入剧烈冲突阶段。在危机时期,上述隐形的民族主义因素将进一步强化和放大。世界各国之间以及各国内部的矛盾冲突将剧烈加强。而国家内部的冲突和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可能互相加强,总之,未来一个历史阶段我们将见证民族主义的新浪潮。

反全球化运动如何应对这种新浪潮呢?有一类主要来自发达国家的反全球化人士认为,应该反对一切民族主义和激烈的行动。我认为,应该分清两种不同的民族主义。

首先是以委内瑞拉为代表的左翼民族主义。委内瑞拉国内,在广泛的群众动员和参与下,启动了对石油为主的资源行业的重新国有化,取消中央银行的所谓政治独立性,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广泛而深刻的改造,人民的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在对外关系上,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和委内瑞拉之间的关系,甚至是南美(拉美)和北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反对北方国家的自由贸易计划。同时,查韦斯开始创建更平等互利的国际政治经济组织,例如启动拉丁美洲大陆一体化计划(像拟议中的多边条约,如拉丁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同时建立拉美的国际金融组织——南方银行等等,他的雄心就是要打败美国所支持的自由贸易协定,以及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赶出拉丁美洲。在拉美,还有玻利维亚等国,近些年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北方国家拉开了距离,对资源和公用事业行业进行了重新国有化,通过这样的调整获得资金补贴和支持国内的福利事业。这样的民族主义正是对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的有针对性的正确的反应,反全球化运动应该大力支持。

其次,我们要警惕右翼民族主义。右翼民族主义在资本主义危机时期也是经常出现的现象。20世纪前期的德日意法西斯主义和1965年的苏哈托、1973年的皮诺切特都属于这一谱系。当前,陷入世界长期慢性萧条危机中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开始出现强大的民族主义潮流,他们怀疑美国和西方,推崇本土文化和宗教,保护本国利益。这些都是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正当反应。问题是,如果这种潮流拒绝对几个世纪以来反资本主义运动特别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有重大价值的遗产的继承,转而简单地认为中心和外围国家的冲突不过是文明的冲突,那么这样的趋势将很容易被导向右翼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到时候将会抽象地强调本国文明的独特性,并以此加强对国家一些经济部门的垄断和控制,但由于它是右翼的保守的,它没有也不可能动员国内大多数民众的支持,面对强势的国际资本和国内既得利益集团,它只能与之合作,那么国内基本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就不可能得到调整。这样以民族主义为幌子集中起来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只能是为国际资本和国内利益集团服务的力量,它所增加的力量的一用用处将是加大对民众的镇压。这样的右翼民族主义是我们要警惕和反对的。

## 五 反全球化运动如何走向深化

反全球化要走向深化,首先要找到我们自己的中坚力量。

1990年代,当反全球化运动开始产生以来,似乎表现出一种普世性的特征。1994年萨帕塔反新自由主义得到了全世界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人士的支持。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夕,全世界无论是中心国家还是边缘国家的人民都走上街头,抗议美国发动战争,全世界参加游行示威的人数和规模是几个世纪以来最多和最大的。于是西方反全球化的激进分子认为,反全球化运动的人员是由各个阶级、各种身份、各个阶层组成的民众(multitude),

他们从社会的最底层差不多一直延伸到社会等级的最高层。要将反全球化运动引向深化,这样的模糊认识是误导性的。

反全球化运动虽然有时表现出普世性的特征,但是对于世界反全球化运动的整体来说,欧美的反全球化运动不是核心和关键,以拉美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反全球化运动更有力量,历史意义也更大。国际著名左翼学者詹姆斯·彼得拉斯在《当代亚洲杂志》2005年第2期题为《反帝国主义政治学:阶级构成和社会经济行动》的文章中这样说:“北方的运动是各种力量的混合体:改良帝国主义的进步人士,反资本主义的激进分子,沙文主义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工会成员。而且,只是设置一些街垒、砸碎几扇窗户、烧毁几个垃圾桶,这对于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结构或者日常经济活动几乎没有产生任何持久影响,即使在事件发生国也是如此。与此相反,在拉美,反帝国主义运动通过持续的群众街垒战、占领公共建筑和举行反私有化的全面罢工,使全国范围的交通和经济活动陷于瘫痪。这些行动在迫使政府撤销私有化法令、限制美国的灭绝计划、反对美国军事干预并挫败美国组织的军事政变方面产生了一定的作用。总之,拉美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战术具有更多政治性而不仅仅是社会性的倾向,具有更多反资本主义倾向而不是改良主义倾向,目标直指政权而不是只进行象征性的抗议,更多的是通过政治领导者的实践来提供教育经验而不是由国外要人举办公共演讲。”

拉美的反全球化运动也不是所有阶级都同样地参加,运动的核心力量,是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伤害最严重的贫民区的非正式就业者,即非正式无产阶级。传统的产业工人阶级相对消极,民族资产阶级基本缺席。只有认识到第三世界的非正式无产阶级的主力军作用,才可能将反全球化运动推向深化。但是,中心国家的反全球化运动却吸引了人们过多的目光和资源,而发展中国家的反全球化人士却在默默地战斗和牺牲,他们中的很多人付出的是生



命的代价。对于北方国家的反全球化运动，我们不能寄予过高的期望。正如上文经济分析所显示的，发达国家的上层地位给它们公民带来的仍然大部分保留的经济福利，使这些国家的大部分的反全球化人士不可能真正彻底地反对资本主义。欧美的运动和知识分子的大部分仍与保守的工会力量联系在一起，它们总是不支持在发展中国家发生社会革命。他们中间很多人支持美国入侵南斯拉夫和阿富汗；不少人指责美国入侵伊拉克，但他们同样谴责伊拉克的抵抗；很多人批评美洲自由贸易区，但同时也批评反对它的主要拉美政权古巴和委内瑞拉。

找到了运动的中坚力量后，我们还需要能够引导运动的先进力量。这样的力量在当前的反全球化运动中尚处在缺席状态。在拉美，无论是查韦斯还是副司令马科斯都更多地通过发达的信息和媒体技术，直接和民众沟通，来动员民众。他们没有一个稳定的政党组织，但是他们所在国家都有发达的进步的公民社会。也许现代化的媒体和信息技术加上进步的公民社会，可以起到以前进步政党动员和团结、教育民众的作用。

反全球化运动要走向深化，还必须有一个较强大的可持续的经济基础。根据上面的分析，70年代初以来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使世界实体经济日益萎缩，很多国家和地区以及很多城市和人群，在被非工业化破坏后，都被正规经济抛弃了，资本也并不关注他们。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数据统计，1980—2004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只有三分之一流向“南方”，而流向南方这些国家的外国投资中的一半（或大约六分之一的全球投资）集中在三个区域——中国（包括香港）、巴西和墨西哥，而一百七十六个最穷的国家仅仅吸纳了不到8%的全球对外投资。这导致出口最多的十二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出口额的74.7%，而剩余的一百七十六个国家出口只占全球份额的25.3%。

当前世界经济除了使全球边缘地区和人群慢性萎缩和死亡之

外,还面临着环境和资源能源短缺危机。关于环境危机的原因论述很多,这里谈谈资源和能源短缺危机的原因。这是和美国的资源帝国主义的安排分不开的。

美国的金融政策是和它的全球资源政策相配合的,它的全球资源战略的核心是,不是在全球帮助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而是促使其长期停滞甚至是去工业化,这样,这些国家的资源就可以被转移到美国等发达国家。

美国害怕发展中国家提高生活水平并在国内消费大部分能源和原材料,其真实目标是通过摧毁这些国家成为竞争对手的潜能,把它们变为石油、天然气和其他原材料的出口国。

为了实现全球资源输往美国,而不是被资源国自己使用,美国除了用战争直接占领控制这些国家外,还有很多配套的辅助措施。

措施一,将资源出口国的资源以美元计价。70年代石油危机后石油大涨价,美国对这些国家说,你们大可以涨价,我不反对,只要你们的石油出口以美元计价。结果,这些石油出口国结余的大量美元都流向美国。措施二,推动世界经济的金融化和资源的私有化,使美国可以用自己不断投放的贬值的美元直接收购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行业,或者使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涨价,资源价格和国际市场接轨,但劳动力却不涨价,这样,这些国家的民众慢慢发现自己根本消费不起本国的资源。中国这些年来已经出现这样的端倪:我们挖的煤越来越多,但煤却越来越贵;我们发的电越来越多,但电却越来越短缺。这是因为资源是按被美国金融霸权控制的国际价格定价,而劳动力价格却没有国际化,工人工资相对于资源价格来说,反而越来越少,于是民生问题越来越严重。近几年的资源和能源价格大涨表明,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又增加了一个致命的障碍。

当很多人与西方奢侈的生活方式无缘后,一种新的超越资本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开始有了吸引力和发展的可能性。我认为,古

巴在苏联崩溃后的发展模式具有这样的新的发展模式的雏形。它有什么特点呢?第一,拥有适度的防卫能力,武装力量能够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有能力威慑入侵的军队。第二,注意满足公民的基本需要,绝大多数古巴工人和农民与拉美其他国家相比,境况好得多,并且享有社会福利。第三,为了抵制美国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制裁,古巴领导人成功地与前苏联和中国签订了有利的贸易、军事和经济协议。后来,古巴领导人在后苏联时期成功地重组了古巴的经济,发展了与欧洲、亚洲、拉丁美洲的经贸关系。古巴还与委内瑞拉发展了互惠关系,保证了具有战略意义的能源安全。苏联曾经以可能遭到致命的军事打击为由,长期超常发展军事力量,忽视民生,最后没有亡于西方的军事进攻,倒是亡于这种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必然导致政治和经济体制高度集中和军事化,不仅助长了官僚主义,而且忽视了对人民基本需要的满足。正是这两点动摇了苏联的政治基础。古巴近些年不仅突破了苏联模式的弊端,还避免了发展主义模式的弊端。这在古巴克服苏联崩溃后的农业危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文佳筠在《后石油时代的农业展望——朝鲜与古巴的启示》一文中揭示,在苏联解体和美国加紧其禁运之后,古巴的贸易损失了85%,以矿物燃料为基础的农业投入(化肥、农药、石油等)减少了50%以上。在随后发生的粮食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有些地区每天每人的粮食配给量就是一根香蕉和两片面包。但是由于早在1990年的危机之前,古巴科学家为了解决化学制品的大量使用而带来的负面效果,以及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就开始研发生物杀虫剂和生物肥料以取代化学制品的使用;这一基础使得古巴在20世纪90年代危机爆发的时候,能够快速大量生产出取代农业化学药剂的替代物资。而且,与绿色革命所提出的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法不同,古巴的农业生态学力图使耕作因地制宜。它设计出各种复杂的农业生态系统,这些系统采用互利的

农作物品种和适合当地的种子,利用地形学和土壤条件,保护土壤而不是耗尽地力。大型国有农场被重组成规模更小的集体农庄,以便于使用那些新的劳动密集型、地方化的农业方法。符合有机农业和永续农业原则的许多传统耕作方式一直在一些农民及其合作社中保持着,在向生态农业的转型中这些传统方式得到复兴,农民与农民之间的交流被广泛用来促进彼此的学习。

正是由于采取这样的超越发展主义的适当技术模式,不但古巴摆脱了农业危机,还使古巴现在可能拥有世界上生态和社会可持续性最好的农业。1999年,瑞典国会因这些成就而向古巴颁发了优秀民生奖,即人们所讲的“另类诺贝尔奖”。古巴这种模式,不求最高新的技术,而是将最适用的技术,与几千年传统的耕作技术和工业半工业技术结合起来;不是将一种技术标准推广到一切地方,而是因地制宜地使用各种技术;不是求农场大规模的标准化,而是该拆小的时候拆小。在古巴,甚至鼓励城市居民利用城市的小块空地种植蔬菜,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城市居民的吃菜问题。如果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能够这样对集体农业进行改造,也许这些国家的农业状况会比现在好得多。

古巴的适度国防、适度技术、发展民生经济等作法,可以作为反全球化运动的未来发展模式的参考。古巴这种适度发展的民生型经济,在反全球化运动中愈来愈有经济上的可行性和吸引力。在全球化的初始阶段,世界很多人都以为千年王国将普降于每一个人头上。但经过二三十年,金融垄断资本揭开了恐怖面纱,人们在被世界经济系统抛弃以后,古巴的福利保障开始为世界上很多人所向往。这是世界经济变化带来的转折。戴维斯在他的《贫民窟的星球》一书中谈到这样的景象:“金沙萨是一个至少有七百万人口的城市。当一切都瘫痪时,这个城市里的妇女挑起了管理城市的重任。她们在街道上种植玉米,那些从农村老家带来的技能又派上了用场。但是,这座城市最终还是衰退到它的极限,再没有

剩下什么东西可以维持人们生存了……那些无力养活家中所有孩子的家庭，只好将孩子丢在大街上。全市有数千名抛弃自己孩子的母亲。那么，满街五六岁弃童的情况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家庭的破裂，而社会是由家庭组成的。金沙萨已经超出极限。”当人们只能靠在大街上种玉米生活，不得不把自己的孩子抛弃在大街上时，资本主义肯定已经在这样的人群中失去了合法性和吸引力。对于这些人来说，古巴式的民生经济将是他们向往的一种选择。反全球化运动应该号召人们夺取已经荒废的工厂和农村，学习古巴那样的经济模式，求得可持续发展。这样的追求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抗拒。这些运动的主体既非“恐怖分子”，也非“流氓国家”，他们甚至也不是共产主义的幽灵，只是数百万的穷人为争取平等、公平和财富的重新分配而进行的示威游行，因此美国政府不知所措，它们不能轻易将这些人民和国家妖魔化，以使其成为酝酿中的攻击目标。

但是，古巴最大的问题是，整个国家的调节功能都依赖卡斯特罗，一旦他去世，那么社会很可能就会僵化。对于反全球化运动来说，从现在开始，就要注意保持公民社会和进步政权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委内瑞拉为例，该国的进步公民社会和查韦斯现在是互相促进。公民社会和查韦斯应该认识到，20世纪反资本主义运动的最大教训就是，很多国家的共产党取得政权后，解散和压制了其他人民团体和党派。最后当共产党退化后，人民没有推动党和社会继续革命的空间和平台。因此，委内瑞拉的公民社会和查韦斯现在都应该继续保持辩证的关系，而不是互相融合或者对立，这将保证委内瑞拉的进步政权在没有查韦斯的时候，也能够通过和进步公民社会的互动继续保持其民主性。

当然，反全球化运动未来面对的最大的挑战，是美国主导的不平等的世界经济结构，以及美国为了维持这个结构所建立的庞大的暴力机器。资本主义自从诞生以来并不是所谓的自由的深化的

历史,在面对社会反抗后,资本主义总的趋势是在不断加强其国家机器,这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的一个重要命题。由于反全球化运动所针对的很多问题都和这个不平等的世界经济体系以及维护这个体系的军事力量有直接的关系,那么,未来的反全球化运动在建立了初步的根基后如何面对美国的经济和军事霸权的压迫与颠覆,将是我们迟早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 6 建构 21 世纪国际主义视野

薛 翠

### 一 “另类实践世界论坛”

1997 年亚洲金融风暴那一年,在非洲,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和比利时神父弗朗索瓦·浩达(François Houtart)组建民间国际网络组织“另类实践世界论坛”(WFA, The World Forum for Alternatives),汇集及出版全球各地社会运动与另类实践的材料,包括委内瑞拉玻利瓦尔革命计划、墨西哥原住民萨帕塔运动、巴西无地农民运动、印度贱民运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斗争等,激发思路,联结国际阵线。1999 年,“另类实践世界论坛”第一次召开会议,邀请五大洲的社会运动界代表、社会活跃分子、知识分子等参加,借此抗衡同年在瑞士达沃斯召开的、昭显“经济/资本压倒一切”的“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

“另类实践世界论坛”是“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核心成员。踏入 21 世纪,“世界社会论坛”的口号“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响彻云霄。“世界社会论坛”被誉为左翼运动的重大盛会,从 2001 年开始,连续七年在亚、非、拉地区举行:2001—2003 年,巴西阿雷格里港;2004 年,印度孟买;2005 年,巴西阿雷格里港;2006 年,马里巴马科、委内瑞拉

卡拉卡斯、巴基斯坦卡拉奇；2007年，肯尼亚内罗毕。

1989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与其说世界左翼运动陷入低潮，勿宁说进入了反省与思索阶段，为开创未可命名的世界作铺垫。21世纪的“世界社会论坛”，树立“阿雷格里港”精神，反抗气焰嚣张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其说这是激活国际主义，勿宁说是呼应并超越19、20世纪的国际主义。

“另类实践世界论坛”编辑的《抵抗的全球化》正是这种努力的超前开端。该书主编之一刘健芝阐明：“抵抗的全球化，不是寻求建立另一个中心来对抗欧美中心，不是追求消除差异以求把所有力量统一起来，而是孕育本地行动的多样性的生命力，促进新人民运动塑造众多不同的道路。”

## 二 勾勒世界图景

中国曾经站在世界革命与社会运动的第一线，与亚、非、拉站在一起。1955年，二十九个亚洲和非洲国家在印度尼西亚万隆(Bandung)召开亚非会议(Asian-African Conference)。万隆会议是自下而上的革命运动最终以国族/政党的形式，鲜明地反抗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缔结亚、非建立的(党一国的)国际主义。中国曾经参加万隆会议，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对外投入世界革命，抗美援朝、支持越共等，都是站在第三世界的立场发言与行动。同时，国内掀起的文化大革命，其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培训赤脚医生，也实际上惠及农民。

可惜，当前亚、非、拉的抵抗能量却被战后的发展话语不断蚕食。墨西哥著名学者、草根活动家艾斯特瓦(Gustavo Esteva)批判说，美国总统杜鲁门所谓“四大计划”实际上是为冷战结束后美国的霸权量身定做的，而四十年后，即1989年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不过萧规曹随而已。



迈向千禧年,发展话语依然占据主流思想的地位。2000年9月,联合国举行千禧年大会,一百九十一个会员国同意为世界穷国制定八大《千年发展目标》(MGDs,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命名为《联合国千年宣言》(United Nations Millennium Declaration),并计划于2015年之前达到目标,此后,每年定期开会与检讨。

阿明尖锐地批评说,《联合国千年宣言》的前提是推行自由主义,确立西方主导的世界商业与金融系统,因此,美国中央情报局(CIA)顾问哥顿(Ted Gordon)负责草拟宣言,而“资本主义三合会”即美国、欧洲和日本,最为卖力,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则是“助纣为虐”。

阿明批驳《联合国千年宣言》的目标定义含糊,乃一纸空谈。他逐一做出反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1960年代便做基础教育,可是成效不大,但从不检讨主要的原因,像削减公共开支、取消补贴、教育私有化等问题。性别平等简化为上学的机会率,而赋权(empowerment)简化为赚取工资的女性的数字比例。即便触及生态危机或者“可持续发展”,也避而不谈制约美国霸权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可见《联合国千年宣言》其实维护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策略的合理性。《联合国千年宣言》对私有化、跨国公司权力膨胀、国家主权被削弱等重要问题,却有意回避。阿明指出,极端私有化的政策使城乡差距扩大,成千上万的农民因为土地被征用,被迫流落城市,出卖劳动力,搬进贫民窟。再者,国家管控被解除,使资本流动更快,投机资本更加猖獗,既掠夺本土资源像原油和水,又使本国货币加速贬值。南方国家被削弱主权,无法介入经济事务,更无力抵制跨国财团的无限扩张。跨国公司所谓“知识产权”、“结构调整计划”等只是给北方国家积累资本以借口,实际上削弱了南方国家主权及其介入国民生计的力度。

阿明指出,《联合国千年宣言》一文中,“发展”简化为“扶贫”与

“良好管治”，“扶贫”实际为贸易、资本转移、科技、专利等自由主义教条理念作铺垫；“良好管治”则是服从私人资本，采取美国庸俗的意识形态的、“非政治”的立场。阿明嘲讽世界银行是世界七大工业国(G7,也许说金融国更贴切)的宣传部，制定所谓《减贫战略报告》(PRSP,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y Papers)；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资本主义三合会的殖民金融权力机构，以贷款作诱饵，推行“结构调整计划”，诱使南方国家陷入债务危机；世界贸易组织就是各国殖民地的一个共同部门，负责处理北方国家商业扩张的需求。同时，南方边缘国家新生的买办阶级，拥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跨国公司合谋，共同掠夺本土资源。例如，“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NEPAD, The New Partnership for Africa's Development)仿效欧洲联盟(EU, European Union)，推动“泛非洲”的统一发展。1998年，塔博·姆武耶卢瓦·姆贝基(Thabo Mvuyelwa Mbeki, 1999年6月就任南非共和国总统)支持“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主张：“非洲人应该并且能够利用现代性”，呼唤非洲复兴，对发展抱有幻想。2001年在赞比亚，由非洲五十多个国家成立的“非洲统一组织”(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举行第三十七次会议，采用NEPAD基本文件，拥护新自由主义的理念，例如放弃《拉各斯行动计划》(Lagos Plan of Action)的工业自主规划，却制定采矿的发展模式，让外国投资者、黑社会、军阀等互相勾结，合谋掠夺非洲资源，像石油、矿产、木材等，等于延续过去的殖民关系。

“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将自身置于欧美中心话语所谓不文明、没受教育、落后的、欠发展之处，并且深信只要获得“进步”的“(西方)现代性”，便能够追赶甚至超越西方国家。埃斯科巴(Arturo Escobar)一针见血地指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正是要推进“自由主义现代性计划”(the project of liberal modernity)，而现代性总是挂着“进步”的旗帜，正如斯伯特(Jose Maria Sbert)所解释的，现代社会对“进步”深信不疑，认为通过科学与技术，人的理性

即可掌控现实。在进步的旗帜下,世界各地建国运动迭起,而又大都主张迎合经济规律及其法规,便体现了这种渴求进步的欲望,进步的信念逐渐成为现代使命。进步的信念,令人憧憬充满希望、丰足、自由、公平的未来,但这一美丽口号的核心却往往是种族中心和阶级的严格划分。换言之,是一堆抽象概念组成的乌托邦:单一、线性、科学、金钱。为抚平寻求进步而不落伍的焦虑,第三世界纷纷效仿西方国家,如巴西的旗帜便写着“秩序与进步”,墨西哥独裁者以“进步”作为巩固国族政权的口号,而“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也迷信“进步的现代性”。

在进步的信念下,古老传统被定为非理性、非科学,甚至一文不值。原来悠长的历史文化,本应能够使普通人在面对市场、工业、国家的时候,保留自尊与自信。但是,在各种的压力下,普通人逐渐与土地割裂,放弃祖祖辈辈留传下来的智慧,沦为工业的工人、市场的消费者、国家的市民。这些都是在“进步”的名义下完成的。

艾斯特瓦套用印度教神牛之说尖锐地指出,发展话语的基石乃被奉为现代三大“神牛”(sacred cows)信条:全球思想(global thinking)、普世人权、自我(individual self)。第一条神牛是全球思想的神话,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人拥护提高“世界少数人”的“生活水平”的经济制度,假设人人都要成为“经济人”(希腊语:homo oeconomicus),有理性地追求物质的最大化;假设人人衣食住行、言行举止都要划一,例如投票、上学、打电话、使用高速公路、抽水马桶、纸巾等等。第二条神牛是普遍人权,此乃全球思想的道德准则,即想象不论种族与阶级的妇孺老幼都有待“拯救”,实际上是变相重新殖民(re-colonization)而压抑异质的文化生活。第三条神牛是自我,只顾自己,目无“他者”,假设每一个人必须纳入“全球经济”,享受世界少数人的特权,换言之,崇尚个人主义与消费主义。这三大神牛的目的乃是打造唯一世界(One World)/唯一文化

(One Culture)。

于是艾斯特瓦呼吁埋葬新/旧殖民的神话：“一直以来大力宣传基督教，通过暴力的征服、支配与教育而传播，最终傲慢地划清界限：在全球编造欠发展(under-development)。”发展话语乃将全球分为发展与欠发展、落后贫穷与先进富裕，在这种界限划分下，全球三分之二人口属于欠发展地区。艾斯特瓦则以人民生活而非地理界限来描绘世界现象，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民(One/Third World)属于南、北半球的社会少数人，而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Two/Thirds World)属于社会多数人。新生的社会大多数，在理论或者政治上属于“渣滓的类别”(a residual category)，“不属于工会的、非正式的、没有社会保障、没被聘用的、非法的、不算在国家财政的、不是纳税人、不属于社会阶级的”。著名发展理论家萨克斯(Wolfgang Sachs)也说，南穷/北富的概念不能单从地理上来解释，像南方国家既有一贫如洗的马里，也有金融资本的新加坡和靠石油赚大钱的沙特阿拉伯，所以，应该关注的是南北社会中的失业者、老人、没有竞争能力的弱者，他们完全被驱逐于世界经济轨道之外。1950年代，在拉丁美洲，他们被称作边缘群体(marginality)，1970年代，在国际劳工组织(ILO)对肯尼亚的研究中，他们被称作非正式群体(informality)。

全世界三分之二的普通老百姓，无论命名为边缘群体，或者非正式群体，都在呐喊：“五百年的殖民，够了(Ya Basta!)!”“五十年的发展，够了!”最为响亮的声音乃1994元旦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圈的协议正式生效之际，萨帕塔民族解放军(EZLN, Ejercito Zapatista de Liberation Nacional)宣告：“受够了！就是受够了(Enough is enough!)”他们既不是夺取政权、要求独立，也不是搞政党政治，而是打响“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第一枪”！

由此，艾斯特瓦提出草根后现代主义(grassroots post-modernism)，眼睛朝向“卑微的群众”：“认同与命名那所谓文盲与

没受教育的、非现代的‘普罗大众’在文化上迥异的创举与斗争,他们领走在激进的、后现代的道路前沿,以走出现代生活的沼泽。”再者,艾斯特瓦呼吁“a common No and many Yeses”(共同的“不要”与众多的“要”),意即“不要”单一的思维,而“要”缤纷多彩的文化、生活、信念、价值观。

现代欧美中心的文明技术,只有一幅宏观蓝图,技术官僚不断想什么应该做、如何做,任何事都切合蓝图的规划,以一堆堆枯死的数字为度量单位,其基础是一种排他的知识系统。因此,学习欧美中心以外的文化生活,重新思考人类的生存状态,有助于直面现代文明的种种局限。

埃斯科巴针对发展话语的不断扩散,提出“南方”作为文化认知论上的空间(a cultural-epistemological space),展开批判世界的视野。他指出,发展乃“解—殖”问题(de-colonial question),主流的现代标准塑造的个人与集体的想象,强调个人、市场、专家知识、理性行动、消费,如果要“解—发展”(post-development),便需要超越自由主义现代性的范式,偏离“个人自由、西方模式的民主、市场主导的消费”等意识形态,正如威廉·奥弗斯(William Ophuls)批判自由主义(Liberalism)如何损人害己:“自由主义的政治范式是人类的意志和欲望的释放,但它并没有提供足够强大的对抗性的道德原则的来源,以便在长时期内保护社会免受伤害。因此,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以自我破坏的原则为基础的。”埃斯科巴也呼吁抗衡自由主义现代性的范式,也要尊重异质的世界与知识(worlds and knowledges otherwise),承认“另类(众)世界是可能的:众世界并存的世界”(another world[s] is possible: a world where many worlds can exist)。

中国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向亚、非、拉的窗口被遮蔽了,所谓与“世界”接轨的世界主要是欧、美、日。从1988年的六集电视纪录片《河殇》讴歌带来“真正的科学精神和民主意识”的蔚蓝色

海洋(西方)文明,到2006年十二集电视片《大国崛起》歌颂九个世界大国(一半以上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似乎还沉溺于“脱亚入欧美日”的幻象之中。

假如,我们没有忘记19世纪马克思勾勒的世界图景:“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那么,《抵抗的全球化》正是承接着马克思的世界图景,打开朝向亚、非、拉的窗口,续写20、21世纪世界各地人民斗争的历史,重新激活“亚非拉”所蕴含的抵抗精神。刘健芝说:“‘亚非拉’象征着抵抗——抵抗帝国资本主义的猖獗,抵抗其世界秩序的腐朽;它指认着一种新的能动主体——既是被殖民的民族国家摆脱被侵略被掠夺的命运,也是全世界被压迫者突破民族国家的框架,摆脱资本主义的逻辑,寻求全人类的解放。”

### 三 心存庶黎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的一年,在拉丁美洲,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就任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自命继承玻利瓦尔的革命精神,发誓构建21世纪的社会主义,反抗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潮流。西蒙·玻利瓦尔(1783—1830)曾经使南美五个国家(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秘鲁和玻利维亚)从西班牙的统治下获得解放。查韦斯深受玻利瓦尔的影响,他宣称:“我们要开辟另外一条道路,即社会主义道路,否则我们将被资本主义吞噬掉。”查韦斯希望委内瑞拉能与其他拉美国家一起,消除国家界限,建立新的统一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在哈瓦那召开的第四届反对美洲自由贸易区的会议上,查韦斯指出,要以“玻利瓦尔美洲”取代美洲自由

贸易区,所谓“玻利瓦尔美洲”是旨在消除贫困的互助计划。其措施之一是,弃泡沫经济取实体经济,以石油换古巴医生,推动跨国互助互惠。如果资本主义是以国际形式发展起来,那么能够牵制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必然有着国际的面向。

现在,委内瑞拉向古巴输送廉价的石油,每天高达九万八千桶,缓解了古巴的燃油危机。有反对者称:这样做不划算,委内瑞拉吃了大亏。

2007年9月30日,查韦斯在他的电视节目《你好,总统先生》(Aló, Presidente)中反驳道:“那些骂我拿石油给古巴送大礼的人其实很愚蠢。过去五年,有三万名古巴医护人员在委内瑞拉全国各地当志愿者,穷乡僻壤的老百姓得到免费医疗服务。五年之内,古巴专业的医疗队伍挽救的病人比本地医生过去救治的还要多。这是无价的。到底哪一样更值钱:人命,还是我们卖给古巴的石油?”

根据委内瑞拉卫生部的统计数字,古巴医护人员一共做了六千万人次健康检查,治疗了九百万病人。自从2005年推行“全国健康计划”(Mission Barrio Adentro),仅是2007年,便挽救了一千一百五十三名儿童的生命。另外,有一万五千名古巴医生和八百名本国医生到贫困地区的健康诊所出诊,提供免费医疗,根据记录,求诊人数已超过四百三十万。

查韦斯套用“父子”之名,饱含对古巴的感激之情,改写了这道算题:“菲德尔是我国人民的父亲,古巴是我们革命的典范,我国人民爱古巴人民,而且还欠他们一笔很大的人情债。如果要聘请三万名医生、护士、眼科医生、牙医在委内瑞拉全国各地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时,那要付多少钱呢?有人能告诉我吗?”面对“要钱还是要人?”的算题,委内瑞拉给出了朴素的答案:要人,更要穷人。

在妇女政策方面,委内瑞拉全力动员更多的妇女参与政治,并且鼓励贫困妇女自发组织起来,寻找民主/民生的另类实践。执政

党“第五共和国运动(MVR)”在全国大会、地区及市议会选举中,预留50%名额给妇女;2001年3月8日成立妇女发展银行(Banco de la Mujer or Banmujer),专门低息贷款给贫困妇女,帮助她们成立各种各样的“合作社”,借以提高妇女地位,推动社区发展及提倡集体互助精神。

据华格纳(Sarah Wagner)引用的委内瑞拉劳动局的统计,50%的劳动力属于非正式劳动力,其中妇女占大多数。她们一般工资低,没有福利,工作条件恶劣。妇女发展银行尝试寻找出路,正如银行主席卡斯塔尼达(Nora Castañeda,经济学家,争取妇女权益的活跃分子)所说:“我们知道社会不平等是全世界都有的问题,我们也知道妇女在政治、社会和经济等方面受到歧视,最贫穷的人群通常是妇女,她们要养家,既要担当母职,又要兼父职……为了解决贫困、就业不足和失业,我们必须转向妇女施救,在委内瑞拉,我们成立妇女发展银行,寻求出路。”

妇女发展银行提倡“民间经济”(popular economy)的理念,提供金融服务及非金融服务。妇女发展银行不设银行分行,却组成推广员之网络(a network of promoters),为贫困群体提供服务,推广员从早做到晚,一星期七天,深入一百四十九个最贫穷的、人口最多的社区,出没于穷乡僻壤、深山峻岭,以及亚马逊河和印第安社区。

自从2001年开始,妇女发展银行已批出超过四万宗小额信贷,创造七万五千个职位。妇女发展银行平均贷款给每一位妇女是十万至一百万玻利瓦尔(大约二百六十至五百二十美元),年利率12%,但跟农业生产有关的仅仅6%。妇女发展银行不接受个人借贷的申请,规定妇女必须成立五至二十人组成的合作社,共同决定做什么生意,然后由推广员协助她们申请借贷,批准后就地参加集训,学习如何经营。并且要签订协议,其商品必须使社区受惠,如果做得好,可再额外借贷50%。银行的理念是:“合作社不



剥削人,我们不希望妇女剥削妇女,而是人人共同生活和工作,团结在一起。”推广员如果发现有妇女不识字,便送她们到政府罗宾逊使命(Mission Robinson)扫盲运动,去学习认字。

妇女发展银行刚开始遇到重重困难,很多妇女会说:谁谁不付钱,谁谁不参加,银行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我们尝试通过合作社消除恐惧和自私的思想,共同合作的理念来自查韦斯,他渴望改变资本主义的模式。我们很明白,为了改变个人主义,我们必须改变价值观念,第一个要树立的价值观就是团结。”

妇女发展银行除了提供金融借贷服务,还有组织性教育、生育权益、家庭计划等工作坊,与健康局和“全国健康计划”共同合作,为妇女提供免费医疗服务、诊疗和避孕用具等。

根据 Sudeban(委内瑞拉银行监督机构)的报告,妇女发展银行头一年的贷款,有 41.57% 没收回来,如果按照商业规则,那是银行巨大的损失。怎样做到收支平衡,没有呆账、坏账,还有待于探讨。但是,妇女发展银行不是纯粹为经济利益,而是尝试摆脱把人只当作赚钱的工具的资本主义模式,并且推动以人为本的社会经济模式。她们说:“妇女从小额信贷的计划中培养力量……我们创造关怀的经济,为人类服务,而不是使人类服役于经济。我们不是建立‘银行’。我们建立的是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这样做是为了建立另一种价值观,另一种有别于资本的逻辑所鼓动的、无穷地追逐利润的欲望。

要做到这一点,唯有“心存庶黎”。

# 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数据量呈现出爆炸式增长。如何高效地存储、管理和检索海量数据，已成为当前计算机科学领域的重要课题。本文旨在探讨一种基于分布式存储架构的数据管理方案，以提高系统的可扩展性和可靠性。

在传统的集中式存储架构中，所有数据都存储在单一服务器上。这种架构存在明显的瓶颈，尤其是在数据量巨大且访问频率高的场景下。分布式存储架构通过将数据分散存储在多台服务器上，有效解决了这一问题。本文所提出的方案，结合了分布式存储与冗余备份技术，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和可用性。

本方案的核心在于数据分片和冗余副本的生成。数据被分割成小块（分片），并分别存储在不同的服务器上。同时，每个分片都会生成多个副本，以应对硬件故障或网络中断。这种设计不仅提高了数据的容错能力，还提升了系统的整体性能。

此外，本方案还引入了智能调度算法，用于优化数据的访问和写入操作。通过实时监控服务器的负载情况，系统能够自动将数据分配到负载较轻的服务器上，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系统资源，降低延迟。

在安全性方面，本方案采用了先进的加密技术，确保数据在传输和存储过程中的机密性。同时，定期的数据校验和备份机制，进一步增强了系统的稳定性和数据完整性。

综上所述，本方案提供了一种高效、可靠且可扩展的数据管理方案。通过分布式存储、冗余备份和智能调度技术的结合，能够有效应对海量数据的挑战，为各类应用场景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持。

## 第二部分

# 五大洲的 最新社会运动经验



## 一 亚太地区

### 1 亚洲运动的关切：军事化、私有化、债务和移民

文诺·莱纳

在这篇简短的文章中，笔者主要描述亚洲社会运动关注的问题，而不进行深入的分析。日本、中国和韩国这样的大经济体支配着整个亚洲地区，紧随其后的是印度、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其中，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军事大国能够决定世界未来地缘政治的发展方向。这样，在亚洲，各种鲜明的对照混合在一起。东南亚国家联盟和南亚区域合作联盟这样的经济社会合作飞地在激烈的经济竞争中共存。和平和非暴力的哲学，同伊拉克、克什米尔、斯里兰卡、阿富汗、印度尼西亚的亚齐、泰国南部、菲律宾、尼泊尔，当然还有西亚的巴勒斯坦的猛烈暴力并存。朝鲜和韩国之间以及中国和日本之间，处于持续的紧张中。其中，中日的矛盾，仅仅由于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以及教科书问题，就能够被点燃。朝鲜的任何行动都会使这一区域核战争的威胁升级。执政的日本自民党正在考虑修改宪法以允许日本拥有正规军队。不断上升的军事化趋势由于美军基地在亚洲许多地方的存在以及与之相伴的强烈的抵制运动（例如在冲绳）而进一步强化。混合经济的概念迅速被私有化进程取代，包括对水、电和自然资源的私有

化。大多数国家持续在财政上受到债务的沉重压迫,劳工流动成为亚洲最严重的社会和经济挑战之一。雪上加霜的是,亚洲还一直是各种自然灾害的频发区,例如,地震、台风、干旱、洪水。在去年,令人难以置信的海啸给了该区域数量巨大的人口以毁灭性打击,夺去了二十多万人的生命。

亚洲的区域性公民社会运动非常广泛,它们针对人权、妇女、劳工、渔民、和平与军事化、部落居民和其他种族群体、宗教之间的和谐、贱民(dalit)、成人教育、学生、债务和贸易、大坝和搬迁、水资源等等种种问题展开工作。许多这样的联合组织的总部设在香港或者泰国。它们得到诸如“聚焦全球南方”(Focus on Global South)和“亚洲区域另类替代交流”(Asia Regional Exchange for New Alternatives)这样的研究和资料网络的支持,以及亚洲一些以大学为基地的学术机构的支持。在亚洲建立一个社会运动同盟的第一次重要尝试是1989年通过的“21世纪人民计划”(PP21, Peoples Plan for the 21<sup>st</sup> Century)。第一次“21世纪人民计划”会议于当年在日本的水俣举行,水俣是1956年因窒素(即氮——笔者)工厂有毒排放而引发大面积汞中毒的地方。随后,会议分别于1992年、1995年在曼谷和加德满都举行。这些会议在结束时都发表了鼓动性的宣言,为亚洲人民建立跨边界的同盟关系提供了基础,也标志着人民淡化民族国家概念、缩小区域边界的意愿。这些宣言也尝试对以下问题做出了思考和追问:给流动工人贴上“非法”的标签,加强军事化以保障边境,跨国公司为降低生产成本而对劳工的剥削,通过不断增加的性交易对妇女进行的压迫,以及亚洲自然资源的商品化。由于一些复杂的原因,“21世纪人民计划”的进程未能持续到1995年以后。这使得该组织的指导者之一、日本的社会行动主义者和思想家武藤一羊非常懊恼<sup>①</sup>。“21世纪人

① 这一方面的许多情况2005年7月在汉城为武藤举行的特别会议上得到了讨论。

民计划”有关妇女问题的活动由一位勇敢的亚洲女性、日本的松井耶依(Yayori Matsui)领导,她于去年去世。正是她的坚忍不拔的努力,保证了审查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妇女所犯下的暴行,特别是探讨“慰安妇”的处境问题,以及针对此在日本建立一座博物馆问题的唯一一次审判的举行。

世界社会论坛的进程提供了下一个把亚洲的运动聚集到一起的机会。首先是有些仓促地组织起来的亚洲社会论坛,2002年在印度的海得拉巴举行,然后于2004年在孟买举行了世界社会论坛。这件事非常重要,因为亚洲的次区域,即南亚、东南亚、东亚、西亚(西方人称作中东)和中亚一直似乎是明显地互相孤立着的。尽管在东亚和东南亚的人民和思想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流动性,但是,其他三个区域则与这两个区域的人民处于严重的分离状态,反过来也是这样。南亚尤其对东亚和东南亚很少有了解或者联系。“21世纪人民计划”在一定程度上,世界社会论坛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它的集合地点在印度),有助于这些亚太区域之间建立起某些联系,尽管西亚和中亚的参与仍然很薄弱。我们希望2006年1月在卡拉奇举行的多中心的亚洲社会论坛将讨论这个问题,有意识地开展增强亚区域联系的工作。

在过去的一年里,受到人们特别关注的是战争和军国主义,以及债务、贸易和私有化的问题。继阿富汗战争爆发之后,这个区域又发生了伊拉克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个自发的组织亚洲和平同盟(Asia Peace Alliance),该同盟在过去两年里把各种行动团体和运动聚集到一起,包括马尼拉的一个大型和平议会(Peace Assembly)以及各种代表团和演说巡游团体,包括前往伊拉克的和来自伊拉克的。由于“亚洲区域另类替代交流”(ARENA)的倡议,2005年格雷格里港世界社会论坛上讨论的问题最后汇集在一本书中。

“南方债务大赦亚洲太平洋分部”(The Jubilee South Asia/

Pacific)——也称“亚洲太平洋债务和发展组织”(Asia Pacific Movement for Debt and Development),已经成为南方债务大赦国际(Jubilee South International)的一个积极的区域成员,并且已将它的研究和行动延伸到该区域的电力和水的私有化的问题。在过去几个月里,该组织积极参与了导致八国集团削减一些非洲国家债务的行动,并坚决反对八国集团宣言中为此提出的限制条件。

中国的小型团体和个人所作的推动公民社会进程的努力,以及与农村社区和流动劳工建立联系的努力,是相当值得注意的。这种努力的一个例子是在河北省一个小村子里建立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James Yen Rural Reconstruction Institute)。众所周知,乡村建设运动是由晏阳初在中国发起的,但是他在革命之前旅居菲律宾,在菲律宾,运动蓬勃发展起来,随后运动又发展到亚洲其他国家,包括尼泊尔,在那里,乡村建设运动至今仍是人们在为之奋斗的事情。在这座刚刚起步的乡村建设学院里,年轻的中国大学生和农民正在接受各种农村倡议行动的训练。

因此,今天的亚洲,各种运动和公民社会的主动精神并没有消亡。他们现在所面临的挑战给他们带来了坚实的理论,并建立了持久的、跨边境的同盟。



## 2 走向国际化的反对 亚洲发展银行运动

T·S·恩卡那逊·达邓

2000年5月,在泰国清迈举行的第三十三届亚洲开发银行年会上,全球社会运动(GSMs)首次与泰国的社会运动联合起来举行反对亚洲开发银行(ADB)的活动。这些活动被认为是历次抗议亚洲开发银行的行动中比较成功的一个。正如亚行一位官员承认的那样,这些运动迫使亚行真正去倾听人们的诉求,而仅仅通过对话是无法实现的。此外,它还导致了亚洲开发银行—非政府协调员办公室(ADB-NGO Coordinator's Office)的废除。该办公室被拥有更大资源的非政府组织协调网(NGO Coordination Network)所取代。一些人认为,这说明亚洲开发银行承认有必要接触并雇用民间组织的行动者。

亚洲开发银行的以下行为导致了抗议活动的加剧:强行征收水税,将诸如学校医院这类社会服务机构私有化,以及科隆丹(Klong Dan)村和其他村民指出的有大量腐败和环保漏洞的北榄废水处理工程(SPWMP)。这些事件都在反对亚洲开发银行的抗议中从两个主要活动里被提了出来,其中之一是由非政府组织在2000年亚洲开发银行人民论坛下组织的一次平行会议,另一个则是在由社会基层成员组成的三十八组织人民网(People's Network of 38 Organizations)领导下进行的反对亚洲发展银行的示威活动。

就人民论坛来说,泰国主要的非政府组织有非政府发展协调委员会(NGO—CDO)、实现生态恢复和区域联盟(TERRA)以及经济复苏工程(PER)。

国际的和区域性的社会运动给这次抗议活动提供了很多支持。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些运动就一直在质疑那些权威的国际金融机构,例如世界银行(WB)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但是,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程项目不同的是,亚洲开发银行的工程项目基本上几十年来没有受到过任何质疑。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88年才开始改变。当时,该地区各种非政府组织努力达成一致。非政府组织中的亚洲土地改革与农村发展非政府组织联盟(ANGOC),系统地对亚洲开发银行的工程项目提出质疑。亚洲土地改革与农村发展非政府组织联盟(ANGOC)和环境政策协会(现更名为“地球之友[美国]”)一起,强烈抨击亚洲开发银行的设计糟糕、甚至具有破坏性的工程项目。他们还注意到,政策改革之中对话缺失,以及需要更强透明性的公共问责制度(Quizon,1995)。

在清迈的反对亚洲开发银行的运动中,国际性和区域性的非政府组织都加入了进来,因为这些运动牵涉到了他们所拥护的工作的核心问题。例如,国际金融机构投资建设的发展性工程的腐败问题,就是总部在华盛顿的信息中心银行(BIC)以及加拿大探索国际关心的主要问题。而以环保为主旨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则主要有东南亚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 Southeast Asia)、国际江河网(the International Rivers Network)、国际环境法中心(CIEL),以及澳大利亚湄公河监测协会(Mekong Watch Australia)。由于亚洲开发银行工程项目具有典型的新自由主义特征,全球南方组织(Global South)关注的焦点是早已被国际非政府组织强烈谴责的国际金融组织的发展政策。像孟加拉国的环境与人类发展协会(SEHD),以及巴基斯坦的高效公平发展改革公

民同盟(CREED)等非政府组织,其所在的国家都是受到亚洲开发银行的政策和工程严重不良影响的国家,此次也都加入到在泰国举行的反对亚洲开发银行的运动中来了。日本的非政府组织,如对亚洲开发银行如何花纳税人的钱一直强烈谴责的日本湄公河监察会(Mekong Watch Japan),同样也加入到了此次反对亚行的运动中来。

具有如此广泛参与的“反亚行”运动,可以被归结为全球化趋势的加强以及国际金融机构(IFIs)实力的不断增强的结果。如此一来,地区和全球的民主化过程已经和国家内部的情况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了。“全球性问题的某项决定缺乏代表性,会和某国内部的民主化相冲突,并会损害人民对该决定的承担”(Boutros Ghali 1993)。因此,“在过去的十年里,人们见证了跨国网络以及致力于针对各种形态的‘全球化’的政治群体联盟的兴起”(Colas, 2002),也就不足为奇了。

反对亚洲开发银行的运动也是如此,这些运动为国际非政府组织联盟支持科隆丹(Klong Dan)村村民,以及泰国反对北榄的废水处理工程运动提供了基础。这些运动的主要目标就是把工程交给亚洲开发银行的监察官员,由他们决定亚行在实施建设工程中是不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政策和程序来进行的。这些运动从地区和国际两个方面给泰国政府以及亚洲开发银行官员施加了压力。例如在华盛顿,一场写信运动也是由国际社会运动联盟发起的,旨在质疑亚洲开发银行,并要求亚行对科隆丹(Klong Dan)村民提出的问题做出相应的处理。与泰国的非政府组织一起,他们给亚洲开发银行的行长写信,呼吁亚行在正式的银行监察实行之前,停止为北榄的废水处理工程提供贷款。

北榄废水处理工程论坛也在主办亚洲发展银行主管人员年会的国家举行,就像2001年在夏威夷。科隆丹村村长达瓦姆在一个多国主办的非政府论坛上发表了讲话。在论坛上,来自美国、澳大

利亚和日本的代表也在观众席中就座。日本也举办了北榄废水处理工程论坛,目的是引起计划通过日本国际合作银行(JBIC)为北榄废水处理工程提供资金的日本财政部的注意。国际非政府组织联盟也支持村民们批评亚洲开发银行为北榄废水处理工程监察委员会设定的授权调查范围。所有这些努力都有了可喜的结果。监察委员会关于北榄废水处理工程的最终报告发现,亚洲开发银行在2002年3月实施该工程的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与其政策和程序相悖离的情况。一年之后,也就是在2003年6月,日本国际合作银行要求泰国政府立即偿还所欠下的一百六十万泰铢。泰国政府于2003年2月在移交了二百亿泰铢之后,撤销了与NVPSKG签订的协议。

## 参 考 文 献

Boutros Gali, Boutros. 1993. "An agenda for democratizing" in Holden, Barry Holden, 2000, *Global Democracy: Key Debat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Colas, Alejandro. 2002. *International Civil Society*,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Kongrut, Anchalee. 2003. "Creditor comes knocking: Japan Bank wants money back at once". Bangkok Post, 17 June.

Quizon, Antonio and Violeta Perez - Corral. 1995. *The NGO Campaign on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Manila: Asian NGO Coalition for Agrarian Reform and Rural Development.

### 3 日本的另类运动:制约与可能性

武者小路公秀

#### 一 日本的公民社会与非政府组织

作为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公民社会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在世界各地。日本的例子很有趣,乍看之下,日本公民社会似乎燃起了人们对另类社会的希望。可是,再细看却会发现,另类政治与经济计划的发展实际上是被约束的。那么,事实上,是什么样的另类思想正在日本渴望创新思想的干旱土地里孕育呢?

1980年代是日本繁荣的“泡沫经济”时代。那样的繁荣带来了许多堕落性的后果,例如昌盛的全球化的性工业。不过,与此同时,非政府组织(NGO)也如雨后春笋一样发展了出来。在像日本这样的由“国族—技术官僚”机制统治,被某些人界定为“全面战争国家”的国家,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是有趣的现象。“非政府组织”这个名称,原来是联合国界定一些组织的身份的方式,以便其参加成员国家的讨论。但在日本,“非政府组织”却指所有海内外的志愿机构。对于一切均由政府控制与指导的国家来说,这样的组织是创新的。因为是“非政府”,故而,非政府组织的出现也被看做是公民社会的诞生。

撇开一些人们关心的议题与活动,实际上,所有这些非政府组织只专门处理一个议题,并且专心投入其所选择的具体工作,及其

特定的服务群体。但是,他们大多没有从批判的角度分析要解决的难题的成因,或者其所服务的民众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的原因。非政府组织因为没有能力确切地阐述这些结构上根植于全球政治经济中的难题,所以也就难以发展出反主流的运动,更不用说另类的计划。而这种情况的形成则深深植根于1980年代发展起来的日本公民社会的去政治化。

## 二 公民社会的去政治化

日本的非政府组织一般是“非政治”的,即只是处理眼前的一些专门问题,却不提出重要的政治问题。“非政治”这个名称自从1980年代便开始在日本流行,指那些不会采取否定当权者合法性的、不与政府敌对的活动。这种态度源于1950年代反建制运动的斗争立场,当时正是完全依附美国的自由民主党执政。当《美日相互合作与安全保障条约》(简称《安保条约》)续约的时候,国内“和平”被人民一浪接一浪的“起义”中断。1960年的斗争成功阻止艾森豪威尔访问日本,但是,却无法阻止《安保条约》的自动续约。1970年各大学掀起反《安保条约》斗争的高潮。结果,反建制运动失败了,分裂为互相敌对的派系。因此,对反建制运动的幻灭,造成了1990年代最活跃的社会运动而变得去政治化。

继1970年代的学生运动之后,全国开始陷入由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再加上反《安保条约》的失败,导致政治的发展一直停滞不前。社会的普遍冷漠,一直到反越战人民运动出现才得以改变。1980年代,日本进入经济泡沫时代,政治上则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日本化”:批准更多的自由企业,鼓励更多的民间活动——这两者又同时受制于政府严格的指导。这段时期是日本的黄金时代。但是接下来,1990年代的日本却陷入了“后泡沫经济”的混乱时期,经济上奉行消极的新自由主义,政治上则实行积极的新

国族主义。

日本的新公民社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工会与民众运动的对抗性阶级斗争,要适应石油危机引起的震荡局面,又要接受与对手合作,条件是后者尽力避免裁员,把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外包部门。大部分运动采取了去政治化的立场,只有少数年长的知识分子继续组织群众集会和签名运动,反对官商勾结。

所谓的石油危机在塑造日本“公民社会”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让人民认识到,要团结起来才能重建经济、建设繁荣昌盛的国家。而此后的泡沫经济,被公认为是抗拒了反建制政治斗争而得到的成功,也是资本与劳工长期和平共处的成果。与1960年代反建制与反美国的和平运动截然不同的是,1980年代的非政府组织就是在这样的去政治和经济至上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

### 三 走向新政治化的公民社会

在国内社会计划及国际援助方面,奉行新凯恩斯主义、技术官僚的日本政府开始衰落。一方面,在国内,技术官僚与工业界曾经的紧密关系开始产生问题,特别是在曾经被称喻为日本经济成功秘诀的建筑业中更是如此。在这个背景下,旧有的社会景观被打破,市民反对各种污染丑闻的声音被允许发出。同时,为了迎合国际新自由主义的竞争,政府开始对传统的寡头政治进行检讨。为了获得更强的竞争力,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修改税务制度、分化教育制度、将福利制度私有化,这些措施导致了更多的社会不公平。公民社会不得不自我组织,以寻求另类的社会资源再分配,以及教育和社会福利制度。各式各样的运动如雨后春笋一样出现,例如,消费者运动、工人合作社、市民运动组织的终身教育课程,以及照顾长者、外国人和少数民族群等的运动。

公民社会无法忽略日本在海外的经济活动所带来的负面影

响。日本与财团的技术官僚联手抑制邻国在技术上的能力,加上廉价劳动力,也为日本转移其分层生产系统之外判承包,甚至几重外判承包,提供良好的条件。官方的发展援助,以及各种各类的贷款都用作让日本资金涌入的基础建设。日本的泡沫经济,由政府与财团联手掌控,不但导致生态环境恶化,东南亚国家的劳动条件越发苛刻,还有贸易不公平、“非法”劳工和拐卖人口等问题。公民社会尝试组织不同的非政府组织以遏止不良的后果,例如处理日本公司大量伐木引起的问题,发展“另类贸易”,还有建立庇护所,协助被拐卖的亚洲妇女。

在寻找另类的社会组织动员方法的过程中,广大的非政府组织很少能对已经去政治化的公民社会产生影响力。在经济方面,消费者与工人共同寻找另类的组织、生产、消费方式的意识的发展空间。可惜,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很少数的非政府组织和支持他们的知识分子采取了批判的立场,他们认识到,泡沫经济就是由政府的技术官僚和大财团以隐形之手造成的。但是,这极少数的批判力量,必须克服弥漫于日本公民社会中的去政治化氛围。

#### 四 反建制运动的兴起

正是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已去政治化的社会中,少数带有另类想法又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反建制运动,开始在非政府组织圈子内外出现。他们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反建制运动,因为他们没打算要推翻现存的统治体制。他们的反建制在于提出重要的议题,诘问制度的可持续性与合法性。一些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幸存者”担当起了运动的催化角色,由联合国资助的非政府组织论坛系列为这些运动的串联搭起了桥梁。已去政治化的非政府组织,开始逐渐承认有必要批判地审视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他们开始正视全球化所引起的问题。这份觉醒是由三代反建制的知



识分子共同孕育的,他们从1960年代日本政治的变化中冒出来。

第一代反建制的知识分子有两种运动。一个是小型运动,叫“全国自主、和平、民主联盟”(The Broad National Alliance for Autonomy, Peace and Democracy),以共同的前线策略为主,集结了工人、小商人、农村组织、市民,甚至无家可归者。该联盟除了反对美日军事联盟,也谴责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威胁着运动中各个社会阶层的生计。另一个群众运动是部落民解放同盟(BLL, the Buraku Liberation League,)它把被日本社会蔑视的部落民(the Buraku people)组织起来,成功地建立起不同的少数民族运动网络。在第二代反建制运动中,“亚太区资源研究中心”(PARC)以及所有这种人民力量运动的分支,都致力于建立跨界的市民运动,推行另类的政治经济计划。第三种非政府组织,以联合国会议的两个后续网络为代表,即巴西里约热内卢首脑会议之后的2001年人民论坛(the People's Forum 2001)和北京世界妇女大会之后的“日本监察核心组”(Japan Accountability Caucus)。两者均包含批判性的另类方向,由第三类知识分子,即非政府组织之组织者致力推动。

他们蕴藏着另类思想的种子,作法也跟海外另类运动不一样。他们的目标虽然以本土为主,可是他们的经验也值得日本以外的另类运动汲取。

日本的另类运动有什么特色呢?他们是对世界开放,还是囿于自己的社区呢?

第一,日本另类运动不像世界大部分的另类运动那样推行未来的计划,他们对未来不抱有另类的幻想,反而与过去紧紧相连,竭力去克服糟糕的过去,而非给出美好的未来。第二,他们的执意延续与改变是有其历史背景的,有时公开言明,有时则暧昧不明,他们要克服的是日本现代化的历史。第三,那些另类计划实际上全是关注和解,包括社区内外、日本内外的关系。

与那些寻求个人自由、平等与权利的另类运动不大一样,日本的另类运动着重和解。和解意味着社会界别与群体的思想发生变革,而非用武力来消灭某些惯常的作法,即使这些作法本身是通过武力而强加在人们身上。为了和解,推动由下而上的结构变革的另类运动被赋予特别的意义。日本另类运动重视理论上的清晰程度,但是更加注重担负变革与和解的能动者之间的团结,他们并不想构建一个抽象的另类社会去代替现存的社会,而是期待在公民社会中产生“滚雪球”的效应,就是把越来越多的维护现存社会秩序的市民纳入,从而改变公民社会。他们不抽象地去谈社会结构,反而在受这些结构影响的人民与影响他们的人之间缔结联盟,从而建立不断扩大的共同阵线。

## 4 韩国社会运动：劳动者的力量

裴俊范

### 一 国家政策之分析

自从2003年6月朝韩高峰会之后，韩国和朝鲜之间出现了一片和解的气氛。由于韩国独特的历史背景，统一的议题在最近的政变中压倒一切。这肯定会对朝鲜半岛人民有着长远的影响，而这些影响无疑有一部分会是正面的。但是，我们还是有必要对统一过程的方向进行小心的分析。

虽然，韩国的进步人士对于南北之间当前趋势的重要议题存在分歧，但是普遍都认为，以后的交流差不多完全在于资金流通问题上面，因此会排斥任何进步组织对于两种社会制度关系的意见，而那些让真正的和平与和解扎根的议程和议题也会遭到拒绝。另一方面，商界在双方交流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韩国三大企业之一的现代集团，在前往和朝鲜接触的队伍中一直打头阵。该集团的创建人兼荣誉主席郑周永（已去世），甚至曾经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日会面。

在韩国，工人和其他社会弱势群体受到了残酷的打压。自从1990年代开始，政府强制推行的国家政策是由教科书式的新自由主义所主导。尤其是1997年末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订协议后，更是加快了新自由主义的发展速度。以提高国家竞争力为名，政

府发起推出了一系列重组计划,包括劳动市场的弹性化、公营部门的私有化、撤销管制、国家与地区市场的自由化等。而这些政策的后果是毁灭性的,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新自由主义重组计划,使得韩国经济更加依赖外国经济和国际形势,从而使本国经济恶化,裁员、工作不稳定、失业、贫富悬殊等问题凸现,社会和谐受到破坏,人民的生活水准整体急剧下降。尽管社会普遍反对,但是政府却一意孤行,继续推行结构性重组计划的下一个阶段,并宣布进一步私有化和把公营部门卖给外资的方案。

## 二 反 抗

亚洲金融风暴之后三年,韩国社会上受压迫的人民,为了捍卫历年抗争所获得的基本劳动权利,坚持进行几乎是无穷尽的斗争。工人、农民、穷人、进步的活跃分子发动了一连串的抗争,组织了多次大罢工、无数次的示威抗议,并和其他社会运动团结起来,共同抵抗国际金融机构、政府、财团联合执行的结构性计划。

韩国左派提出以下的要求:减少工作时间,扩大社会福利,取消临时雇用制度,保障工作安全稳定,工会参与管理决定,为无家可归者与被强制驱逐者提供住所,放弃将公营部门私有化的计划,终止将妇女降至从事临时工的雇佣政策。

以下简单地综述过去几年社会运动所策动的历次斗争的荦荦大端。

### (一)韩国民主劳总大罢工

2000年5月,工人认为政府没有诚意展开对话,或履行其在金融危机时扩大劳动权利和缩减工时的许诺,便组织大罢工,发出反对政府立场的声音。

之前几个月,韩国民主劳总警告政府,如果政府不答应他们三

大要求,便发起大罢工。那三大要求包括:减少工时(从四十四小时减到四十小时),一星期工作五天;赔偿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造成的损失,实施中断重组过程,改革税制使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拨归社会保障;取消所有对临时工的歧视,将临时工转为全职正式员工。等到5月30日,韩国民主劳总认为政府不愿意履行责任,便按照计划发动罢工。当天早上,韩国民主劳总领导层宣布四天全国罢工,从第一天开始,便动员了全国约七万名工人参与。

罢工使韩国民主劳总取得了一些胜利:与管理层达成协议,工会工人的工资平均增加10%;政府同意考虑一周工作五天(尽管仍然没有具体安排);在罢工期间,韩国航空公司飞行员成立工会;韩国民主劳总里有两个中型工会与管理层达成协议,一周工作五天;另外,很多工会都说服管理层履行责任,同意把临时工变为全职正式员工。

不过,罢工也不算完全成功,那些有影响力的工会,像韩国电讯工会、首尔地下铁路工会、主要的汽车工会都没有参加。比起以往的罢工,这次罢工的社会影响范围也很有限。

韩国民主劳总的要求以工人的需要为主,但也反映了大部分人的需要,他们承受着亚洲金融危机与全球化导致的重组过程的苦果。那几年,韩国人民被迫体验到了隐藏在“自由贸易”、“增加投资”、“自由化”等口号背后的残酷现实,因此他们坚定地支持工人的行动。他们开始认真地地质问金大中政府对基本议题的立场,并且要求另类的出路,例如一周工作五天,把更多的财政预算拨入社会保障。但是,政府继续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与日本、美国继续谈判双边投资条约,同时,宣布重组财政部门与公营部门的新措施。

## (二)亚洲/欧洲会谈期间之动员

2000年9月布拉格行动之后的一个月,韩国人民运动组织了

另一次大型反全球化斗争,响应在首尔举行的亚洲/欧洲会谈。高举“从西雅图到布拉格到首尔”的口号,韩国左派在世界进步运动的格局下行动起来。

19号晚上开始动员,活跃分子集结在首尔大学,整夜举行反全球化文化节。20号早上,行动变得更为明朗,“韩国人民反对投资条约与世贸行动”(KOPA)和“人民集会委员会”的领袖尝试递交信件,抗议亚洲/欧洲会谈中新自由主义的议程。但是,被警察使用暴力阻止。

这次动员的结果却给韩国进步运动提出了一些非常基本的问题。动员取得的成就是卓越的,超过两万人参加了不同形式的行动,在北半球启动了西雅图、华盛顿、布拉格的抗争,展示了全世界人民反对新自由主义运动的力量,并且韩国人民介入了关于全球化的效应和什么可能是另类实践的讨论。可是,分析运动的不足却并不容易。其实,抗争对亚洲/欧洲会谈本身并没有产生直接影响,公民运动与工人运动的关系仍是难题,还有组织委员会里民主的决策过程也有待探讨。

### (三)现代汽车女工的抗争

现代汽车工人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运动,在社会运动历史上是最激烈的斗争之一,但也是工会歧视女工最恶劣的例子之一。1998年,重组浪潮冲击韩国,且被视为解决经济危机的唯一可能的方法,现代汽车也不例外。

那年8月,现代集团和工会进行长期谈判,讨论在重组的情况下哪些工人首先要被削减。他们的结论是公司自助食堂的女工将首当其冲。最后二百七十七名工人被辞退,有一百四十四名是女工。她们的年龄大都在四五十岁,而且是家庭的经济支柱。但最令人羞耻的,不仅仅是因为占全体劳动力约0.4%的女工中有一半以上都被辞退,更在于工会竟然对此袖手旁观。事实上,工会利

用女人去“拯救”男人,后来甚至压制这些女工的抗争,她们抗争了差不多两年才得以复职。

有人会认为这个例子显示的只是大工会的官僚制度如何与资本家合谋,但是也清楚显示了在大工会中对女性的那种深层的、广泛的歧视一直掩藏着,因为这些女工突如其来的抗争才暴露出来。她们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去争取自己的基本权利。

这种歧视并不仅仅存在于工会中,女性活跃分子在别的地方也会遇到,从草根组织到大联盟中都有,可见男权思想也存在于进步运动之中。

很多女性都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并不是因为她们只占组织的一小部分,而是她们被认为太情绪化和缺乏逻辑。女性因此仍然处于层级金字塔的底层。有一批女性活跃分子离开运动,是因为她们觉得自信心被别人滥用或者被性骚扰。因此,假“运动之名”,她们被男人消音了。她们曾经相信那些男人是同志,而且是真正“进步”的同志。在传统儒家思想仍然作祟的社会,人们既性别歧视又讲究尊卑,要求社会运动在性别立场上跟在阶级立场上一样进步,也许是太不切实际了。当韩国运动的成功是建基于以层级制度与独裁主义为主的严密统一之上的时候,要求有那样的改变,也许是太不切实际了。但是,现在很重要的是我们要问:这样的胜利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胜利?抑或这样的胜利是不是由于女人的牺牲才取得的?女人被纳入了社会改革的计划,还是只需要她们“服务”时才被召唤过来充当支持者而已?

#### (四)大宇汽车的抗争

或许大宇事件最能证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给韩国人民带来的毁灭性影响。两年前,大宇汽车管理层曾经辞退超过一千七百名工人,而且政府还派防暴警察冲进工厂,打击工会罢工。大宇汽车工人、被辞退工人的家属、隶属于韩国金属工人联合会和韩国总工会

的工会分子、学生、社会运动活跃分子，全都投入到了反对削减工人和反对警察镇压的斗争中。这次斗争可能是过去几年中工人阶级最激烈的暴力反抗。这是继1999年首尔地下铁路工会罢工之后，第二次有人使用莫洛托夫燃烧弹。成千上万的抗议者定期参加示威，即使遭到了政府和警察的残暴镇压，斗争也依然继续坚持。

“反抗大宇汽车联合斗争委员会”由不同的社会与民间组织建立，负责协调和组织各界力量，以支持斗争。斗争委员会积极组织示威，应付政府的镇压措施，同时推动全国与国际的斗争。还成立了“独立媒体联合小组”，报道斗争委员会的动员，抗衡主流媒体的歪曲报导。大宇汽车工会隶属的韩国总工会，发表宣言说，这次斗争是工人阶级的整体斗争，目标不只对付大宇汽车管理层，也针对政府的新自由主义的重组计划。

这次斗争又一次体现了金大中政府残暴的、反工人阶级的、反人民的立场。警察的镇压剥夺了工人的基本公民权利。在大宇汽车工厂周围和附近的地下铁路车站，上百、甚至上千名的防暴警察进驻当地，禁止抗议示威。这一切都使人联想到1970、1980年代的独裁统治，那时曾发布戒严令，任何集会都被粗暴地驱散，数十名工人受伤被送进医院。这次斗争具有更广阔的目标，规模也比以前大，参加者来自四面八方：独立媒体、来自国际的活跃支持者、学生、被辞退工人的家属、进步政党的活跃分子、电讯工人、工会工人，以及社会斗争人士。

以上任何斗争及其所面临的困难，既不是孤立的存在，也不是湮没无闻。这是进步力量结合动员策略的战场，但是背后的困难和社会结构问题仍然有待解决。

很难说过去几年的斗争取得了成功，因为运动几乎仍然处于被动，并没有什么突破。但是，韩国人民为更加人道的社会而斗争的历史，仍然留在人民的心里，尽管他们经历了那么残暴的镇压。



## 5 香港、台湾的社会运动经验

杰勒德·格林菲尔德

### 一 前言：危机与延续

1997年到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宣告了二十年来新自由主义的辉煌正在走向终结。生活水准急速下降，贫困者更加贫困，失业者日益增加，这些都暴露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方案所存在的内在的矛盾。一瞬间，繁荣的许诺让位于大部分工人之中产生的一种强烈的脆弱感。这些矛盾一再暴露，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取攻势，推出新自由主义的“解决方案”时，情况变得更加严峻，并引发曼谷与首尔千万群众走上街头抗议。而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这些年里，这些地区的政府仍然推行其深化全球化的经济政策方案。与此同时，弥漫于大部分工人之中的脆弱感变得更加强烈。

### 二 香港：贫富悬殊加剧

截至1999年底，香港成为世界贫富不均比例最高的地区之一。香港最富裕人士的平均收入比最贫穷人士高二十三倍。

全港最富裕的10%人口拥有香港总收入的36%，最穷的10%人口则只拥有不足2%的财富。失业率是导致贫穷与不平等

的一个因素。1999年,当失业率达到历史性的顶点6.3%时,几乎五分之一的贫穷户直接受到影响。大部分贫穷者(包括金融危机前后)虽然有工作,但是收入却不足以维持合理的生活水准。

截至2000年底,估计有二十五万工人赚取的收入在平均线以下,而有一百二十万的“贫穷工人”占香港人口的四分之一。“贫穷工人”已经陷入了贫苦与不平等的危机,但是不久,其生计又面临新的威胁。1999年初,政府宣布私有化措施,主要将公共服务——例如公共房屋的管理与维修——外判给私人承办商。这样不单增加了市民的生活成本,更使很多市民无法享用公共服务,进而影响到十九万公共机构工人的薪酬、工作条件和就业稳定。

反对私有化与公共服务外判的斗争,成为二十年来最大规模的示威之一。1999年3月23日,房屋署工会大联盟、香港职工会联盟、社区劳工与社会福利团体共同组织的二万三千人游行示威,穿越香港金融中心的街头。可惜,私有化与公共服务外判仍然按照计划实行,因为工会与社区组织无法组织有效而又有群众基础的运动。

### 三 香港:超越脆弱感

造成上述结果的原因之一是在工作岗位与社区里动员集体力量非常困难。除了少数的例外,大部分抗议示威都是在周末举行,而这个时候政府部门是关闭的,因此其服务也没有受到影响。此外,公共房屋居民的组织无法串联,即使他们是直接受影响的人。与此同时,工会的一个根本弱点在于,其政治立场由资本的反对派而变为仅仅针对私有化、要求限制裁减职位的数目,以及维持现存的薪酬与公积金。

反对私有化运动的衰落,主要归咎于工会运动本身的限制。个别工会的内部出现动荡,工会之间组成的联盟又很脆弱,这都容

易使政府有机可乘。如果没有以社区为基础的联盟去教育市民对私有化的效应确立批判的意识,如果没有一个与以往不同的纲领,工会运动是没有办法持续地得到人民的支持的。尽管有那么多的示威抗议,关于政府政策的辩论依然囿于经济理性与市场的话语中,对此,劳工与社区组织仅仅能够提供道德上的论据。

除了工会运动本身的限制之外,反对私有化的运动与其他社会运动都有共通之处,即都更着重象征性而非变革性的集体行动。因此,这些抗议的设计基本上是吸引媒体来关注一项突出的议题。由于这基本是象征性的行动,所以,不管人民力量有多强,甚至有多少人参加,都不会受到重视。

脆弱性的政治在塑造与限制社会运动中起着关键的作用。许多社会活跃分子与社区组织者(尤其那些与教会组织相关的)觉得应该关注社会上最受迫害与最边缘的群体,因此集中精力为弱勢少数寻求公义。一般来说,这种脆弱性不被视为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而只是政府施政失败的结果。正因如此,社会运动倾向被阐释为弱势群体寻求援助的要求,而非规管资本与市场,以及财富的再分配。

大多数工人中仍然弥漫着一种强烈的脆弱感。虽然大多数工人还不至于赤贫、失业和无家可归,但是他们觉得很容易就会变成这样。人民明白有限的储蓄不足维持生计,而欠债也足以赔上性命。全球化的效应之一是加强这种脆弱感,以至资本家乘机利用,强迫施行更多规范去控制工人。因此,这是一种强大的、消弭人民动员的效应。

很不幸,许多活跃分子误解了这种脆弱感,从而视之为冷漠,或缺乏动力与兴趣去寻求社会变革。这种表面上的冷漠,合理化了集体行动的象征性质,被认为是代表“人民”。实质上,此时最需要的是批判性的人民教育与自我组织能力的培养,这才能彰显工人的集体力量。集体力量的感觉是唯一的能够克服那无处不在的

脆弱感的工具。只要社会运动依然忽视或者误解这种脆弱性,那么它还将是政府与资本家手中一种有效的利器,来消弭人民斗争。

#### 四 台湾:新的经济危机

伴随着中国大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台湾也加入了世界贸易系统。台湾加入世贸不是以“国家”的身份,而是作为“台湾、澎湖、金门及马祖个别关税领域”,与香港的会员身份相似(香港1995年加入世贸)。台湾当局为了符合世贸的入会条件,实施一连串经济自由化与私有化政策,这使台湾经济一蹶不振。台湾躲过了亚洲金融危机,却在四年后(2001年7月)陷入了二十多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2001年5月,台湾失业率二十三年以来首次超过4%,官方证实原来四十一万一千名受薪工人属于失业行业。如果将临时工人、非正式部门工人、自雇工人也包括在内,那么失业率实际是两倍以上——高达9%(《北京青年报》2001年5月27日;《大公报》2001年4月4日)。大部分工人失业的原因是工厂倒闭,而工厂倒闭则是由于破产、离岸搬迁,并以此作为不给工人欠薪与积累的福利的手段。工厂离岸搬迁使台湾工人更感到生活不稳定,大批工厂的生产程序都搬到对岸的福建省、江苏省、上海市,台湾在中国大陆的投资上升至超过四百五十亿美元。现在台湾本地的工业资金聘用大陆工人超过八百万,比全台湾受薪的劳动力还要多。

尽管台湾工人陷入重重困境,民进党当局却仍然在急速地推行“自由市场”政策,以确保台湾加入世贸。这些措施带来的社会与经济影响是非常明确的。2001年4月,台湾“农委会”主席陈希煌宣布,台湾加入世贸后头四年,农业部门有超过十万个职位流失,而工业部门也损失十五亿美元(《台北时报》2001年4月9日;《台湾经济新报》2001年5月3日)。台湾当局预计,加入世贸头

十二个月,制造业部门的工业产出会平均下降13%。此外,由于跨国公司施以政治压力,台湾已完全无法掌控电信、电力与能源工业。

## 五 台湾:私有化与抗议

第一家采取私有化的“国有企业”是“交通部”的中华电信。中华电信是台湾最大的电信公司,亚洲第五,世界排行第十五。中华电信也是台湾最大的雇主之一,有三万五千名员工。中华电信工会代表三万五千名工人,是台湾最大的工业工会。从而,其私有化已经导致广泛的政治与社会后果。

2000年8月16日,中华电信工会摆开斗争的阵势,带领一万名工人及家属,抗议私有化计划的条款。工会领导层要求在私有化过程中,承认工会权利,并且确保不会削减工资与强制提早退休。当天抗议快结束的时候,工会领导层宣布与政府官员及管理层达成协议。但是三项协议只包括:一、承认中华电信工会与管理层谈判的角色;二、承诺在特殊的政府人力监督下,考虑管理层与劳工关系以外的议题;最重要的是第三项,同意承认私有化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部分。其实,从8月16日或者以后,工会领导层并没有公开反对私有化,显而易见,放弃了过去三年所采取斗争的政治策略。

其实,这样的转变早已露出端倪。2000年3月,工会举行选举,亲管理层派夺取了领导权。1999年12月,在国民党政府官员教唆下,中华电信管理层挪用公司财政资源,又进行行政干涉,借以铲除具有战斗力的领袖。三个月后,将当时在任的工会主席张绪中罢黜。他们的作法实在是明目张胆,“行政院”劳委会不得不对管理层发出警告,指责其干预工会选举与压制工会自主。尽管有警告,管理层还是成功夺取了工会的领导权。结果,新的领导层

完全放弃斗争行动,并且公开支持私有化,以及有条件地给予会员福利。后来,在私有化的计划下,员工原来占有的股份由5%减至3%,加上就业稳定性与退休金又重新修改,所以工会在8月组织起来,抗议示威。

被罢免的中华电信领导层,曾经在1999年6月,与台湾电力公司(台电)及中国石油股份有限公司(中油)建立的“全台湾产业工会联盟”中扮演重要角色,代表十六万多名工会会员。因此,中华电信被亲管理层派接管,之后放弃激进路线,对台电和中油工会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影响。后来,台电和中油工会与陈水扁政府合作,继续推行私有化进程。这种立场的转变也影响到刚成立的全台湾产业总工会,该工会核心会员都属于全台湾产业部门。

## 六 台湾:反抗与逆转

反对台湾建立第四核电厂(1980年第一次公布要建立)的斗争也经历了类似的逆转与利益冲突。自从1980年代开始,环境激进主义日趋盛行,以社区为基础的抗争此起彼伏,如反对有毒废料、工业污染河流、核子反应堆意外和其他生态危机等等。这些抗争也出现在全台湾地区。反对运动容纳四面八方的利益,从生态问题、渔民生计的影响、文化遗产的破坏,到原住民的土地权,而最严峻的问题是核子反应堆排放的废料。

台湾政府为了安抚民众的恐惧感,宣布计划将六至十四万桶核废料送往朝鲜。但是,此举反而将事件提升到了国际层面,巩固了台湾民间与日本、韩国的反核活跃分子在东亚地区建立的联盟。台湾活跃分子进一步将反对第四核电厂运动提高到国际层面,提升公众意识,关注兴建核电厂的泰国劳工的工作条件,以及针对那些出口核子技术的跨国公司。

陈水扁当选后,在2000年10月,宣布价值五十六亿美元、已

完成三分之一工程的核电厂停工。2000年11月12日,为了响应停建的决定,超过十万名市民在台北和高雄上街游行。抗议的规模之大,让活跃分子重新唤醒公众对核能在台湾与海外造成的危险的关注,但却无法恢复早年的环境激进主义。1980年代以社区为基础的活跃运动,像反对河流污染、水库工程等社会运动,到了1990年代却发生逆转,从直接行动(包括接管工厂、占领土地)变为请愿和游说。

民众支持下降的原因之一,是台湾每况愈下的经济环境,商业与主流传媒都利用这种形势。对台湾商业行政人员的意见调查,和商业联合会发放的新闻稿,均将取消兴建第四核电厂与重新部署海外投资的决定直接联系起来。

反对跨国企业损害工人健康、社区环境的抗议运动,是台湾反全球化斗争的前线。这些运动不但挑战了个别跨国企业的利益,而且对抗以出口导向增长与以市场为逻辑的发展政策。本土的活跃分子指出,每年生产的一百五十万吨有毒废料,大部分都是由半导体工业——台湾高科技出口的发动机——生产的。因此,“苦劳网”的社会活跃分子联盟声称,现在最需要的是彻底地对经济发展进行反省:“台湾的经济仍然以大量出口为主,本土的生产大部分不是为了本土的消费,而是为了外国的市场。台湾从外国输入原材料,由本地工人加工制造,然后再卖到国外。台湾虽然赚到硬货币,但是要为岛上的污染付出代价。我们或许有95%出口的各式各样的工业产品,正如政府自豪地告诉我们一样,但是我们却要100%承受生产过程中的污染。”

其实,更大的挑战是台湾的社会运动在中国大陆的发展非常薄弱。挑战合资企业对生态与健康带来的影响的可能性,显然因为政治的敏感和政府的打击而减少。再者,台湾社会运动的组织受制于台湾“统/独”的复杂政治,跨界团结大陆的工人与社区的力量仍然不足。

## 6 东南亚复杂的抗争形势

T·S·恩卡那逊·达邓、E·C·达邓

东南亚国家一直被国际金融机构视为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与贸易流通的典范。但是现在,他们却仍然承受着1998年金融危机的恶果。其实,从社会和生态角度看,它们二十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基本上都是盲目的。幸亏爆发了那次经济危机,经济危机转化为政治危机,使得社会运动在反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争取独裁政权民主化等论题上已经取得更大的进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被动员起来,人民运动的社会主旨——就业、取消私有化、合理的工作条件——与妇女状况、环境与民主化的要求的新社会运动的主旨渐渐吻合。东南亚的社会运动也加入了反对亚洲银行和世界银行的国际运动,同时寻求另类的、进步的发展。

1980年代,美国和欧洲经济一片萧条,亚洲地区却被讴歌为“依靠市场摆脱贫穷与欠发展之路的、活生生的证据”(H. P. Martin and H. Schumann, 1996:143)。而1998年的金融危机终于暴露出了亚洲奇迹的黑暗面。马田(H. P. Martin)和舒文(H. Schumann)指出,与经济繁荣“手牵手的是贪污、政治镇压、大规模环境破坏,以及没有任何权利可言的劳动力的极度被剥削”。几十年来,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发展格局以全球化的表象高歌猛进。虽然有“在野之声”批判这种发展,但他们基本上被社会所忽略。



在菲律宾,尤其是马科斯独裁政权时期(1972年到1986年),在农村和城市,公民自由权利被剥夺,人权被践踏,造就了有利于外资的环境。所有这些只会壮大农村共产党起义的力量。反抗者与其他异见运动,不仅质疑跨国贷款代理机构,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政策与计划,而且通过共产党军队——新人民军(NPA)以军事形式对其进行强烈的反抗。不同的左翼团体发动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反对被他们称之为的“马科斯—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独裁统治。

许多中产阶级,甚至有些上层阶级,也提出了相似的议题与忧虑,他们已经对马科斯的经济政策感到幻灭,同时对人权被当权者践踏感到震惊。所有这些力量会合在一起,最后成功地推翻了马科斯独裁政权。这场革命被命名为“1986年人民力量革命”。

与此同时,其他东南亚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并没有像菲律宾那样发生如此动荡的社会运动(特别是在左派阵营中)。看上去,这是因为强悍的独裁者如苏哈托、马哈蒂尔和泰国军人行之有效地牢牢掌控着国家政权。其实,这些国家没有出现强大的社会运动,更大的原因是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普遍得到了改善,特别是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早期的经济高速增长时代。

因此,在这些国家,那种反对由外来势力——例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结合本土的新自由主义精英而带来的资本主义发展与剥削的立场,似乎已经被边缘化。例如,泰国在1991年变成“第五只老虎”,其经济在1985—1995年得到快速增长(Walden Bello et al,1998:55)。

泰国被世界银行作为一种发展模式,向国际社会兜售。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并没有落伍,与泰国一样,同样被喻为“亚洲新老虎”,象征着加入了新工业化的国家(NIC)。在这些国家,中产阶级成长起来,同时,针对着环境、人权、妇女与消费主义等议题的

新社会运动(NSM)也发展起来。

新社会运动担忧经济快速发展会导致工业污染,对生活质量构成威胁。同时,尽管职业妇女的数量越来越多,可是性别不平等依然存在。东南亚国家的极权统治或多或少容忍这些社会运动,因为它们还未威胁到其统治地位。其实,那些社会运动似乎忽略了阶级问题,也没提出民主化的议题。

但菲律宾并不如此,菲律宾的社会运动高举阶级议题,并将其与新社会运动的议题连在一起。这些议题扣紧民主化,又联合反独裁统治与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这些联系在1992年5月的泰国才成为重大议题。那年泰国发生军事政变的企图,遭到了很多泰国人民的反对,带头反对的是城市的中产阶级。此后,民主化运动逐渐壮大,社会运动走上了争取民主的不归路。

可是,对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来说,当1998年金融危机侵袭亚洲,社会运动推动民主化的问题才变得重要和突出起来。经济危机引发政治危机,导致亚洲政治强人苏哈托下台,而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也同样面临严峻的困境,这为日后的社会运动铺平了道路。虽然,数十年来这些社会运动对抗着资本主义带来的自然生态与社会恶果,但是要等到爆发金融危机,其远见和影响力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

这些社会运动质疑全球化作为发展道路的合法性。与殖民主义或者帝国主义不同,全球化作为“敌人”是很抽象的,这主要是因为其快速的自由化、私有化,及其他新自由主义政策所带来的最初的“利益”与经济增长。但是,经济危机却揭穿了全球化的真正本质。

“已全球化的”东南亚经济受制于不稳定的外来力量的“冲击”,因此,面对变幻莫测的国际金融和贸易,显得非常脆弱。这些国家面对外来力量,已经失去了“国家主权”。更残酷的事实是,危机导致上百家公司倒闭,大量裁员和失业。而在社会层面,所有阶

层的整体生活水准都开始下降,患上抑郁症,甚至自杀的人也不在少数。在印度尼西亚,经济问题引发一连串的人群骚动、政局不稳,最后导致上百名市民死亡。

1999年西雅图抗议示威之后,在东南亚涌现出多种针对全球化的主要代理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亚洲发展银行的社会运动。重要的是,这些社会运动不只批判全球化,而且提出了另类的发展要求。

本文第一部分探讨社会运动反对全球化的原因,第二部分聚焦他们所强调的有别于国家全球化经济政策的策略,最后一部分则检视他们所提供的另类实践经验。

## 一 社会运动及其对全球化之批判

全球化推动者提出一个有趣的论点:全球化带来民主。基于西方国家发展模式的经验,东南亚已全球化的社会被认为,可以凭借其经济发展造就的进步的中产阶级,挑战国家的独裁政权。

这种模式似乎适用于泰国,但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社会的“经济成功”却为独裁政权施行高压政策提供了合法性。因此,这两个国家的那些挑战独裁政权的社会运动遭受到残酷的迫害,他们的倡议空间也被压缩。相反,泰国的经济发展确实造就了一批中产阶级,被认为带头去实践民主化进程,可是,走中间路线的特质却使他们只想到自己。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中产阶级与低下阶层的差距越来越大。故此,泰国的社会运动,例如“穷人议会”<sup>①</sup> (The Assembly of the Poor)非常关注农村的穷困与低度发展问题,但是,中产阶级则基本上忽略了这些议题。

---

<sup>①</sup> “穷人议会”是泰国的一个受到国家与工业发展计划影响而组织起来的城乡人民网络。

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泰国中产阶级终于听取了社会运动反全球化的呼声,参与社会运动者主要包括基层团体、非政府组织、学院的活跃分子、社会批判家等。2000年5月亚洲发展银行在清迈举行第三十三届年会,泰国的社会运动借机示威游行,同时赢得了中产阶级的同情。

泰国和菲律宾的中产阶级不肯承认的事实是,经济增长并没有惠及普罗大众。菲律宾的社会运动指出,新自由主义缺乏资源再分配的面向,因此,并没有收入平等可言。正如有人批评的,全球化使富国更富,穷国更穷,而且,在每个国家中,富者越富,贫者越无立锥之地。

在东亚、东南亚的国家,国家领导的新工业化国家(NIC)模式和自由市场模式都在自然生长。尽管亚洲资本主义模式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却加剧了社会不公平的现象。其实,高度的经济增长必然使收入上涨,但却不会将财富进行再分配。

在马来西亚,反全球化的推动者面对的挑战是总理马哈蒂尔。很多马来西亚民众要好好“感谢”马哈蒂尔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可是,经济危机却也揭露了马哈蒂尔的重大过失,例如裙带关系、腐败无能等。因此,社会运动认为需要继续推行改革,或者推动民主化。马来西亚反全球化运动因而分为两派,一派认为问题的症结是全球化,而非民主,另一派则相信反全球化运动一定要与推动民主的运动共同进行。

在印度尼西亚,反全球化运动似乎为其他紧迫的课题所阻碍。苏哈托下台,分离主义活动猖獗,种族与宗教暴力冲突迭起,使政局非常不稳定。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带来的应急贷款和经济援助项目,被视为印度尼西亚经济的“拯救者”。但是其实,印度尼西亚受制于这些机构开出的条件,只能继续以新自由主义的方法来应对当前的经济危机。故此,反全球化运动面对的挑战是,上述条件将会给印度尼西亚人民,尤其是工人

和农民,带来严重的后患。

### (一) 压迫的反劳工政策

泰国发生反亚洲开发银行运动,他们反对的原因是那些苛刻的贷款条件影响工人的生计(Dita Sarit,2001)。他们特别指出,亚洲开发银行迫使政府限制最低工资的增长,使本土劳动力讨价还价的力量被削弱(《曼谷日报》,Achara Ashayagachat,2000.4.7)。泰国非政府组织也指出,银行支持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必然导致大量削减国有企业工人。1997年经济危机之后,亚洲开发银行提供贷款的条件,就是要改变泰国社会与经济体系的结构,于是他们开始更加密切地监察银行的政策(“泰国监察亚洲开发银行的影响工作小组”资料文献,2000)。

马来西亚严禁罢工,那些为社会所需要的非法劳工也受到恶劣的对待。由于全球化,外来劳工也因自由化而变得高度商品化。这是关注外来劳工的东南亚社会运动的重大议题。很不幸的是,工作与金钱的承诺伴随着严酷的剥削。

再者,因地制宜的全球化使资本主义社会在当地兴起。在很多国家,因为家庭制度仍然大致完整,所以到现在为止仍没有社会保障制度。当问到老弱病残的保障制度时,亚洲的政客一般都会这样回答:“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是家庭”(Martin and Schumann,1996:149—150)。

2002年7月,菲律宾宣布,今后五年,社会保障体系,即政府为私人企业员工设立的退休保障代理机构,已经没有足够基金解决退休员工的福利。这就是政府官员受到当时的总统埃斯特拉达的压力而做出投资的严重恶果。

### (二) 反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运动

社会运动之所以反对新自由主义所设计的发展道路及其全球

化的意识形态,因为它持续地剥削人民。当前的全球反资本主义运动,都是“反对把所有东西都无限商品化”的社会运动,商品化正是被新自由主义霸权所推动,并被走第三条道路的政府所巩固的(Alex Callinicos, 2001:110—111)。再者,这样的商品化被社会运动视为对东南亚文化的破坏。

早在1960年代,泰国社会运动已提出这样的问题:资本主义的发展被认为是改变了原来社会的规范与价值,城市犯罪、卖淫、贩毒及其他问题不断增加(Suthy Prasatset, 1984:116)。社会批评家思瓦那沙(Sulak Sivaraksa)谴责这段时期为泰国的“美国化”,其特征是追求物质的富裕(Pasuk Pongpaichit and Chris Baker, 1995: 385)。泰国非政府组织也看到了资本主义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强烈对比,吁请政府在经济上施行“更多的自给自足的国策”,以摆脱外部环境的压力。

### (三)将“新社会运动”议题与劳工运动结合起来

反资本主义运动也认同“新社会运动”的议题,像妇女解放、保护环境等,并将其与传统的劳工运动结合起来(Alex Callinicos, 2001:115—116),例如,把基本生机议题与妇女、环境问题联系起来。在妇女议题方面,全球化促使东南亚妇女移民到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欧洲、中东等地当家庭雇工,而菲律宾妇女则到日本从事娱乐行业与卖淫,很多例子证明她们遭受了雇主的虐待与性虐待。

拐卖与迫使妇女和儿童从事卖淫已经成为社会运动的重大议题,例如“终止童妓协会”(ECPAT)便集中关注这个议题。妇女因为家里贫穷,被迫离乡背井,移民外地。她们为了赚钱养家,无奈地离开家乡、丈夫和孩子。在菲律宾,海外汇款成为赚取外汇的最大来源。

另一方面,环保议题最初被认定是中产阶级的问题,但社会运

动却揭示出低下阶层为此承受了最大的苦难。南菲律宾的奥尔莫克(Ormoc)的悲剧,就是由于过度伐木造成河水泛滥,淹死上百人,摧毁了低下阶层的房屋和财产,这只是低下阶层因为生活环境破坏而受害最大的例子之一。

有些非政府的环保组织得出结论,保护环境就是挑战资本主义。例如在泰国,市场、商界、国家政策共同造成了两个巨大的生态灾难:过度伐木和水源严重污染。这已经严重影响东南亚贫民居住的农村社区。因此,市场、商界、国家这三方面要共同为农业的危机负责。

## 二 东南亚社会运动的“反全球化”的策略

全球化贫富不均的现象,威胁社会和谐,也促进了市民运动的兴起,从而进一步界定基本的民主权利,巩固社会团结(Martin and Schumann, 1996: 149—150)。社会运动在国家和本土层次上处理问题,但是承认国际层面的运动也一样重要。因此他们也积极组织国际反抗运动,每年都会动员反对亚太经合组织(APEC)与亚洲开发银行会议的运动。在社会抗争中比较有组织的作法是,举办地区集会,像“人民 21 世纪计划”(PP21),1992 年便在泰国曼谷举行两星期以上的会议,超过五百名参加者,代表了亚洲国家的社会运动和非政府组织。

### (一)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贷款条件的运动

1997 年经济危机之后,反全球化的社会运动明确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实行迫使穷国重整经济结构的贷款条件。例如在泰国,愤怒的社会运动把矛头指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反对他们强行推行贸易与投资自由化,认为他们应该为本地的畸形经济增长负责,也应该为未能预见 1997—1998 年的经济

崩溃的失误负责。

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一样,亚洲开发银行的贷款条件也被认为应对本地的贫穷加剧与低度发展负一部分责任,尽管亚行有减少贫穷的策略,但那些措施仍被视为非但没有减少贫穷,反而在迫使本地与国家经济快速融入全球市场,导致亚太地区的人民进一步的贫困化(Shalmali Guttal,2000:5)。亚洲开发银行的其他贷款条件包括了社会服务私有化,例如教育、医疗,还有征收水税。

菲律宾的社会运动着重相同的议题。他们反对把国家电力发动公司(NAPOCOR)私有化,担心电费涨价。但是,亚洲开发银行却坚持在给菲律宾政府提供有关电力的贷款之前,一定要满足这个条件。

在印度尼西亚,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引发了严重的后果,首先是大批学生与工人上街示威,社会动荡不安,苏哈托最终在1998年下台。另外,印度尼西亚变成了乞求外债的乞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趁机开出苛刻的贷款条件,遭到了印度尼西亚社会运动的反对。

## (二)与国际反全球化运动结合起来

东南亚社会运动的另一个重要的策略是,与世界各地的反全球化运动联合起来。因此,菲律宾反全球化运动参与了象征反资本主义抗争浪潮之始的1999年西雅图之役。之后,他们陆续参加了一系列国际社会运动,为抗议在华盛顿、布拉格、曼谷、首尔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八国峰会(G8)、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

例如,1999年2月在曼谷举行的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期间,反全球化活跃分子举行了抗议示威。运动的焦点之一是美国的活跃分子罗伯特·奈曼(Robert Naiman)代表一个反全球化的面



包师非政府组织,将奶油饼扔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米高·康德苏(Michel Camdessus)的脸上。

早在1995年,马尼拉人民论坛之亚太经合组织(MPEC)已经成立,反对亚洲与太平洋国家的领袖开会,后来组成亚太经合组织论坛。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成员包括美国、日本、中国、加拿大以及大部分亚洲与靠近太平洋的南美国家,目标是加快贸易与投资自由化。马尼拉人民论坛之亚太经合组织有超过五百名来自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的社会运动和非政府组织者参加;影响与其相伯仲的,还有主要由菲律宾左派组织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全球化的国际会议”。有上千名本地社会各阶层的活跃分子参加了这两大活动,并且试图在亚太经合组织会场搭起篷车集会,但政府出动军队阻挡了前往会场的道路。

### (三)“反全球化”的地区运动

早在十多年前,东南亚社会运动已经与其他地区的反全球化运动结合起来。1988年,地区的非政府组织,包括亚洲非政府组织联盟(ANGOC)共同合作,有系统地地质询亚洲开发银行的项目。亚洲非政府组织联盟与环境政策学院(现为“地球之友—美国”)一起批评亚洲开发银行的设计糟糕的、破坏性的项目。他们也谴责政策改革缺乏与群众的对话,还强调更多的透明度与公众问责的重要性。

最近,介入多边金融机构(MFIs)的策略被其他东南亚团体与学者拒绝。例如,著名的激进知识分子贝洛(Walden Bello)是菲律宾一个左倾政党的领袖,他认为多边金融机构执行分裂的行动,将所谓的“理性的”非政府组织从“非理性的”非政府组织中分出来。他批评监察世界银行的非政府组织委员会,将世界银行合法化,并且淡化非政府组织社区的象征角色。由于多边金融机构“根本无能”,有人提议另类出路,“取消多边金融机构而创立全新的机构”

(Walden Bello, 2000)。

地区非政府组织与重要的东南亚的支持团体也持续反抗全球化,反抗其对亚洲人民与社会造成的损害。“亚洲交流中心”(ARENA)是亚洲杰出的学者和活跃分子的联网,致力于促进地区之间进步知识分子的交流,尝试构建另类发展观,以抗衡财团主导的全球化。

贝洛领导的著名组织“聚焦南半球”(Focus on the Global South),在泰国曼谷的朱拉隆功大学(Chulalongkorn University)从事研究、出版、串联、倡导等工作,成绩卓越。“亚洲移民中心”(AMC)集中探讨工人的贫困,尤其是外地的合同工人。“亚洲监察资源中心”(AMRC)开始时是监察跨国公司的团体,现在则倾向劳工事务。以曼谷为基地的“亚洲文化发展论坛”(ACFOD)主要处理人权和社会议题。“亚洲学生联合会”(也在曼谷)与以马尼拉为基地的“天主教学生国际运动”(IMCS)主要关注青年与学生议题。

“ISIS 国际网络组织”总部在马尼拉,关注性别与妇女议题。“亚洲妇女委员会”(CAW, Committee for Asian Women)组织研究课题,以及举办关于性别议题的座谈会。许国平(Martin Khor)在槟城(Penang)成立“第三世界网络”(Third World Network),现在已成为国际运动,分支遍布世界。以马尼拉为基地的“东南亚社区教育资源机构”(SEARICE, South-East Asian Resource Institute for Community Education)积极推动反生物科技的运动。另一个以马尼拉为基地的机构是“亚洲社会监察”(Social Watch Asia),是国际非政府组织联盟成员之一,该联盟监察参加“哥本哈根社会峰会”(Copenhagen Social Summit)的政府所推行的政策。此外“国际绿色和平组织”也在曼谷设立了东南亚支部。

有宗教背景的地区机构也代表全球化受害者,积极介入倡议活动与联合不同的社会运动。基督教青年会(YMCA)秘书处之亚

洲联盟,虽然一向以奉行保守主义著称,但是在这方面积极介入,在前两任秘书长 Tan Chi Kiong 和巴·夏哈(Bart Shaha)领导下更是如此。“亚洲基督徒评议会”(CCA)同时衍生出两个地区组织:“记录亚洲行动团体”(Documentation for Action Groups in Asia)与“亚洲人权委员会”(As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泰国捕鱼区 Klong Dan 村民抗议亚洲开发银行在其社区推行北榄废水处理计划(SPWMP, Samut Prakarn Wastewater Management Project)时,当地关心相近议题的社会运动组成了联盟,鼎力帮助该村村民,而国际社会运动也源源不断地进行援助。这些东南亚社会运动在全球与地区的实践经验,构成了南半球非政府组织跨国化的一部分。

#### (四)利用国际媒体

东南亚社会运动的另一种策略是使全球媒体关注他们的行动,例如威达多(Nurina Widagdo)所观察到的:“1999年西雅图之战,见证了反抗世界贸易组织的暴力示威,之后,主流媒体大肆报道类似的反对金融机构(IFIs)——例如亚洲开发银行——的会议的游行示威与相关活动。”(Nurina Widagdo,2001:8)

2000年5月,亚洲开发银行在泰国开会期间,由全亚洲的非政府组织与基层组织组成的“评议亚洲开发银行之非政府组织论坛”,通过示威活动有效地利用了全球传媒。泰国社会运动乃该联盟成员之一,他们认为媒体是推广反亚洲开发银行运动与教育群众的重要工具。

泰国国立法政大学(Thammasat University)讲师特贾皮拉(Kasian Tejapira)指出,示威活动吸引了全球媒体的注意,因为这是国际会议。他又说,泰国政府只能装作没有看见(Kasian Tejapira,2000)。泰国《国家报》(*The Nation*)引述一位泰国反全球化活跃分子的话说:“媒体将亚洲开发银行之贷款政策影响泰国

人民的信息,传给泰国公众以及世界其他国家。”(Kamol Sukin, 2000)

### 三 有别于全球资本主义之另类实践

社会运动不只批评全球化,而且还积极界定全球化、新自由主义,以及当前资本主义的特质。正如“聚焦南半球”(Focus on the South)的主席所说:“在过去的几年中,当地的精英捍卫亚太的发展方向,或是追随自由市场路线,或是国家支持的资本主义,许多非政府组织、人民运动、进步的学者都大力批判这两种发展方向。其实,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或者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说到底都是破坏生态,不可持续的发展。”(Walden Bello, 1997)

与新自由主义辩护者的看法不同,社会运动并不从书面上理解全球化。像世界其他运动一般,他们捍卫一种比较讲求社会正义、环境保护的全球政策,并由此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推行决策结构的民主化。他们呼吁将经济决策权下放到社区、地区或者生态区,使国家规划变成由下而上的过程。

反抗亚洲开发银行的斗争经验表明,地区非政府组织集结的力量,迫使亚洲开发银行与各政府展开比较有系统的、开放的对话。非政府组织获邀参加亚洲开发银行行长会议(ADB Annual Board of Governors Meetings),他们借此机会积极介入大型游说活动,挑战亚洲开发银行整体的“发展优先”政策,即以中央集权的经济发展为主的模式。同时他们呼吁在亚洲开发银行决策过程中,提高公众的问责度、透明度和参与度(Antonio Quizon and Violeta Perez - Corral, 1995:2)。

有人提议非政府组织与社会运动应作为政治经济制度的第三支柱,以平衡国家与商界的权力。其实,早在1997年经济危机之前,在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讨论,例如1991年人民论坛,便出现过这

种观点。对人民论坛的参加者来说,推动财团主导的全球化的地区机构,必须接受在地区层面广泛涌现的社会运动的挑战。他们强烈要求:“深化发达地区的另类实践,有别于亚太经贸(APEC)的自由贸易和东亚经济发展(EAEG)的思路。同时,必须把日本和美国排除出去,主要的目的之一是挑战弱国与超级经济强国之间的权力关系。”(Bello,1997:158)

社会运动之地区联盟与非政府组织必须正视由全球化所造成的问题,并以此为社会改革之主要议程。这意味着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议程,另立人民议程。

地区整合的另类策略并非要扫除财团之间的贸易障碍,而是要正视那些紧迫的跨界问题,例如削减人民福利、破坏环境等问题。跨国财团给各个国家出了一道难题,他们威胁说若不服从,便将营运工序搬到工资更低、环保法律不严格的国家去,从而使各国之间互相竞争、拆台(Walden Bello,1997:159)。

面对以上困难,社会运动在地区层面提出解决方法,即保护工人阶级的公民权与政治权,以及确保经济生活条件。正如鲁柏特(Mark Rupert)指出的:“创立共同的保护环境的严格法规,以及共同的劳动法规,承诺劳工的组织权利与合理的工资;这都是以人为本的地区合作的重要步骤,为全球化的反资本主义的抗争运动打开各种新改革的可能性。那些实践并不限于地域,也不像惯常的那样把政治跟经济分割开。”(Mark Rupert,2000:153—154)

1996年3月,印度喀拉拉邦举行“综合亚洲另类发展力量”会议及工作坊,东南亚地区报告了数个由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运动推动的另类发展实践的例子:从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的有机与社区耕作活动,到菲律宾与日本非政府组织的另类贸易,从印度尼西亚社区林学,到菲律宾农村社区之农业规划,还有泰国妇女生计与贷款项目等等。该工作坊组织者是亚洲交流中心(ARENA)、喀拉拉人民科学运动(KSSP)和城乡另类实践(RUA)。

由神父 Edicio de la Torre 领导的菲律宾生活教育基金(ELF)展开另类教育实践,在地区层面,则由亚洲交流中心分别在印度尼西亚巴利(1998)和菲律宾马尼拉(1999)举办两次工作坊。生活教育基金的策略以丹麦民间高中学校的经验为基础。

其他由社区与非政府组织推行的另类反全球化的实践,包括合作社发展、小型电力发动项目、小额贷款、本土市场体系、综合地区发展、自治体系等等。在泰国东北,当地社区曾实践另类货币体系,可惜后来被当地政府所取缔。

这些本土的力量,虽然实际上还未能直接挑战财团主导的全球化,但本质上却逆转了现存的范式,它们更着重于本土实践、为本土市场消费的生产、民间经济关系,以及本土力量的培养。

全球财团内部开始把可能叛逆的分子,收编于自由主义视野之下。菲律宾政府推出“反贫穷计划”,国内社会运动视此为介入改变政府贫穷政策的机会,但是,反贫穷计划并不足以解决自由市场所引起的问题。不同于自由市场那种偏袒城市工业的发展思路,社会运动倡导农业优先,启动以农村社会为发展过程的核心内容。同时,不同于那种资本密集的高级工业技术和高度使用化学的农业技术,他们还提倡使用适用的工业技术与有机的、非化学的农业技术(Walden Bello,1997:158)。

## 四 总 结

整体来说,那些视全球化为低度发展国家的万能灵药的人,在金融危机面前已碰得焦头烂额。东南亚反全球化运动的人们相信自己并不孤立,而且信心倍增。1999年11月,他们参加西雅图抗议世界贸易组织活动,用激烈的行动成功迫使该市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西雅图的行动启发了全世界的社会运动。以伦敦为基地的世

界发展运动(World Development Movement)记录了2001年全世界二十三个贫穷国家频频发生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抗议活动,结果造成七十六人死亡,数以千计的人受伤和被捕。那一份名为《动荡不安之状态Ⅱ》的报告显示,反对那些机构及其政策的人,并不像有些政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故意宣称的那样,局限于富裕国家有特权的学生和无政府主义分子,而是世界最贫穷的人民。

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指出,“反全球化力量正在逐渐升级”(Walden Bello, 2001)。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的后遗影响延续到今,而地区统治精英既不能、也不愿脱离“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的那些扼杀其经济的政策与计划,再加上挑战现存霸权范式的社会运动的蓬勃发展,这三个方面对界定和改变东南亚的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景观举足轻重。

## 7 东南亚的非政府组织与社会运动

罗国华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早期,东南亚国家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快速的经济增长。这种增长归功于“发展型”国家的角色,即采取经济自由化、政府管制放松和私有化的政策。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发展型”国家的角色受到攻击并被压制,一些国家不得不通过结构调整来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另一方面,由于金融危机之前的发展,东南亚社会已经开始转型,结果是出现了更为稳固的中产阶级和大规模的政治动荡。尽管公民自由受到限制,以及国家不情愿与公民社会分享权利,民主政治还是在金融危机前后出现了(或者说又再涌现出来)。

本文将首先讨论东南亚四个国家(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运动的崛起与发展过程,并评估他们对深化民主和平等发展所作的贡献。其次,本文将讨论社会运动与政府的合作,与其他地区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运动的联合,对全球经济与政治秩序变更所产生的促进作用等问题。最后讨论就“9.11”时期,在美国对世界事务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单边主义倾向的情况下东南亚的发展,以及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运动最近是怎样评估自己的角色的。



## 一 东南亚非政府组织的崛起

20世纪70年代非政府组织首先出现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当时,相对民主的政府被军事法或军队统治,选举和议会统治中止了,政党、工会和学生运动被禁止,反对派人士与活跃分子被关押,于是,中产阶级的主要团体都转向了非政府组织以继续参与另类发展和公民自由的活动。在马来西亚,一些中产阶级人士组成的非政府组织成为以社区为基础的政党的替代选择。

东南亚非政府组织的另外一个形成动因来自西方的“新社会运动”。这些组织包括了妇女、环保、少数民族权益、和平运动与社区邻里“直接行动”的团体。接下来二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使得有着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阶层更加稳固,从而进一步导致了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东南亚的非政府组织可以分成四种主要类型:(1)慈善型:提供福利服务;(2)改革派或“另类发展”型:推广强调自力更生的项目;(3)更加公开宣扬政治权利和人权型:强调人民增权(empowerment)和社会制度变革;(4)话语工作型:着力于研究、出版和辩论,推广另类观点,与官方叙述和主流的话语对抗。

可是,只有少数的中产阶级追求民主。大多数团体主要沉浸在“发展主义”之中,即推崇依赖快速经济增长、培养消费习惯来推动社会发展,并因此产生对政治稳定的依赖,哪怕是诉诸权威主义的手段。换句话说,这些发展主义新论调是20世纪80—90年代发展型国家成功实行经济指挥主义(economic dirigisme)的副产品。例如,即使在金融危机中,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大多数中产阶级都选择逃避民主改革的要求,而恢复经济增长则被认为是更重要的。只有在相对欠发达并且实行更威权政体的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更早之前,80年代中期的菲律宾也一样),有相当大部分的中产阶级

群众有政治改革和政体变革的诉求。在这后三个国家里,金融危机之前,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运动就已经非常活跃。下文将通过分别介绍这四个东南亚国家的情况,来对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运动的角色进行对比分析。

### (一)菲律宾

据估计,1995年菲律宾大约有七万个各种类型的非政府组织(NGO),它们大多数从事的是为农村和城市贫民提供卫生、教育、临床和财务等的基本服务援助。有些组织还协助组织合作社。许多从事这种福利工作的非政府组织都和天主教教会有联系。

其中,关于公民自由与人权、妇女与和平、文化与剧院,以及环境与原住民问题的团体,数量多而又活跃。还有一些 NGO 开展研究,出版宣传手册、书籍和期刊,并组织论坛。

同时,还有 NGO 联盟与网络。有一些以群众为基础的联盟,例如人民耕地改革议会、全国渔民与水资源改革委员会、某些地区的劳动力中心、城市贫民协调网络、国家合作社联盟以及人民媒体网络。通过这些网络,NGO 与工人阶级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有时与工会密切合作。特别是在 1986 年马科斯政权垮台后,这种联系变得更加稳固。

此外,跨界别又具有鲜明议题的联盟包括:无债自由联盟与和平联盟;包括了菲律宾若干最大的 NGO 网络的 NGO 网络发展小组(Caucus)。在菲律宾,这些联盟、网络和 NGO 小组通常与“人民组织”(PO)有明显区别。人民组织从事的是草根基层工作。NGO 和 PO 一起,通过不同类型的群众行动动员群众,在推翻马科斯政权及其后的民主建设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开展各种社会经济项目的过程中,这些 NGO 承担政府的功能,为穷苦大众提供设施和服务。事实上,阿基诺政府实施的宪法肯定 NGO 和 PO 的作用。阿基诺任总统期间颁布的本地政府

1991 法令,进一步地认可 NGO 在本地事务中的角色。其中有条款规定:妇女、农民、渔民、工人和其他特殊团体(包括少数民族和城市贫民)的代表在区、市、省级的议会任职。1991 法令还明确地规定,从乡村(barangay)到省级的议会,四分之一的成员都应该来自 NGO。NGO 更是渗透到本地学校管理局、本地卫生管理局、本地和平与秩序议会以及投标委员会,以监测腐败。

最近,NGO 和 PO 又通过建立联盟支持某些候选人,或组建他们自己的政治党派,来参与政治选举。在菲律宾,如何将 NGO 所带来的影响和支持,转化成影响政府政策和推动政治变革的更有效方式,是当前的重要课题。

## (二)泰国

截至 1997 年,泰国至少有四百六十五个 NGO。他们许多都建立在 1973—1976 年的“民主时期”。经历过军事政变后,一些 NGO 销声匿迹。但 20 世纪 80 年代,他们又重新复苏了。

现在最为著名的 NGO,是曼谷的“农村发展协调委员会”(NGO-CORD)。该委员会的附属 NGO 发展单位有二百家左右。总体上来说,他们有自己的另类友好发展战略。与 NGO-CORD 相关的著名 NGO 是“泰国发展支持委员会”,该委员会同时开展社会调查,并出版《泰国发展通讯》。

还有一些 NGO,关注山区少数民族部落、妇女、工人和儿童的遭遇问题。还有一些 NGO 从事反对性旅游、反对剥削妓女、为性工作妇女寻找其他工作和艾滋教育等工作。在曼谷,“贫民窟协调委员会”联合大约十家基层 NGO,致力于为城市贫民窟居民提供住房保障和基本服务。通过泰国“基础医护治疗协调委员会”,有二十多家小型 NGO 互相合作。

在当地律师、大学法律学生和讲师的支持下,很多民权(civil right)团体也建立起来了。1979 年,在人权 NGO 领导下的许多

NGO 和 NGO 协调委员会,推行了“人民民主运动”(The Campaign for Popular Democracy),并吸引了政党、工会和包括“宗教界推动发展委员会”、“社会宗教协调小组”在内的宗教组织。这两个团体都与极有声望的活跃分子斯瓦让萨(Sulak Sivaraksa)有联系。因此,1992 年军方试图夺取政权而酿成“黑色 5 月”(Black May)时,曼谷和其他城市均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运动。

这次抗议运动成功地恢复了民主政治,从而再次鼓舞了 NGO 的信心,促进了他们的团结。当前泰国 NGO 面临的挑战似乎主要是民主改革的深化,以及推广文化上更合适的方法。由瓦斯(Prawet Wasi)领导的“本地发展协会”发起了关于“更道德的资本主义伦理”的争论,即尝试在推进农业发展和商业活动之间取得平衡,以给大多数人带来利益。

1997 年,尽管受到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泰国的 NGO 仍倾力缔造主张民主的联盟,并进而推动了新宪法(泰国的第十五个宪法!)的起草。1997 年议会通过新宪法后,时任总理的朝瓦立(Chaovalit)因站在保守派一边,反对宪法改革而被迫下台。宪法中的新条款有:议会两院和本地政府都要通过选举产生;建立独立的选举委员会、独立的宪法法庭和国家反贪污委员会,以及保证新闻自由。虽然,经济问题还在继续困扰危机后的泰国社会,泰国的民主却因其有史以来最民主的宪制改革而得到了巩固。

### (三)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 NGO 只有几百个。较之菲律宾与泰国,马来西亚 NGO 的成绩不大。严格的法律本身并不能解释这一差别,主要原因在于执政党“马来国民组织”(UMNO)对马来西亚农村的霸权统治。UMNO 的霸权取决于两个因素:多民族现状(导致族群政治的产生),以及相对成功的农村发展项目(为 UMNO 的马来支持者改善了生活条件)。结果,很少有 NGO 能参与到农村发

展中。马来西亚 NGO 主要还是立足于城市,总体上只解决中产阶级关注的问题。而且,直到 90 年代末,许多 NGO 活跃分子以及相应的支持者都是非马来族人。

马来西亚有许多成功的消费者组织,其中最重要的当属“槟城消费者协会”(CAP)。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该组织就开始活跃于各界,多次代表贫苦农民、渔民和建筑工人开展运动。还有一些诸如“马来西亚环境之友”、“马来西亚自然学会”和“环保学会”等环保组织,也成功实现了其运动诉求。在一些场合,环保主义者还诉诸法庭。其中有一次,就是控诉政府在没有做出适当的环境影响评价的情况下,就在沙捞越仓促推进巴昆水电站项目。

妇女 NGO 包括“全妇女行动协会”(AWAM)、“伊斯兰姐妹组织”(Sister in Islam)、“妇女援助中心”(Women's Aid Organization),以及“妇女改革中心”(Women's Center for Change)。这些组织通过自身努力,以及与执政党的妇女组织的合作,于 1996 年成功制定反家庭暴力法,并修订了其他若干歧视妇女的法律。

人权组织主要包括了成立于 1977 年的“国民醒觉运动”(Aliran)及 20 世纪 90 年代成立的“人民之声”(Suaram)和“大马人权协会”(HAKAM)。在反对党派和联盟的支持下,他们领导运动要求废除强制法,特别是臭名昭著的《内部安全法令》(ISA),该法令允许不经审判即可进行扣押。他们对因 ISA 或其他因为政治原因而被关押的人员给予法律援助,并举行了教育运动以唤醒民众的维权意识。同时,由于“建筑工人支持委员会”的努力推动,带来了月工资制度的改进。同时其他 NGO 还与“城市先锋”(Peneroka Bandar)一起抗议开发商的驱逐。有一些 NGO 还开展运动,为岛内的沙捞越(Sarawak)和沙巴(Sabah)原住民群体争取权益。

在双重危机(1997 金融危机和 1998 政治危机)之后,副总理

安华(Anwar Ibrahim)被执政党开除,并拘留。NGO 运动因此迎来了 20 世纪 90 年代末的又一次发展。安华的支持者们起初只是为他的安危而战,但是,很快就转向“法治治国”和“全民正义”的运动中,强烈要求废除 ISA 和强制法,打击“腐败、裙带关系和任用亲信”。结果,安华的支持者们都团结一起,并经历了一场 NGO 改革运动,最终建立了新的多民族政党,导致了新的多党派反对联盟“替代阵线”(BA, Barisan Alternatif)的形成。

然而,改革运动和 BA 与工人阶级的联系很少。事实上,有组织的劳工自 20 世纪 50 年代左倾独立工会被解除后,就被政府招安了。工会和政治活动之间的分离也被进一步加强。马来西亚工会议会(The Malaysian Trade Union Congress)也因为政府支持独立的国企员工组织和日本式的内部(in-house)工会而变得顺从。相反,“回教青年运动”(ABIM)和伊斯拉(JEMAAH ISLAH)等伊斯兰运动对执政党越来越持批判态度。与过去相比,现在的 NGO 运动变得更加多民族和多宗教化,从而预示着好的前景。

#### (四)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的改革运动同样始于 1997 金融危机之后。早在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新秩序时期(1967—1998),NGO 就已推动了当时的政治热潮。而在 1990 年代,NGO 变得更具政治色彩,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印度尼西亚几千个 NGO 主要为农村地区的边缘团体提供服务。他们的项目包括提供饮用水、卫生服务和社区教育。还有一些像 DIAN DESA 和 BINA SWADAYA 等 NGO,倡导自力更生、集体合作及适用科技。其中有些 NGO,包括比较高调的 LEMBAGA STUDI PEMBANGUAN,还动员当地社区抗议某些特定的社会不公现象。

人权组织也有一定的数量。最著名的是雅加达的“法律援助

协会”，专门监督和出版人权状况的报告，并为不公正制度的受害者提供法律服务。在改革运动之前，已经有了一些有名的 NGO，包括出版《棱镜》(*Prisma*) 杂志的“社会经济调查和教育与信息协会”(LP3ES,)、“印度尼西亚消费者论坛”和由几百个小型 NGO 组成的印度尼西亚环境论坛(Walhi)。此外，还有建于 1990 年的“印度尼西亚穆斯林知识分子协会”(ICMI)。该协会的初衷是捍卫新政(New Order)期间因资本增长而被忽视的伊斯兰利益。而最大的穆斯林团体是由瓦希德(Aburachman Wahid)领导的 Nahdatul Ulama 和莱斯(Amien Rais) 领导的 Muhammadiyah, 这两位都是著名的知识分子活跃人士。所有这些组织虽然对政府许多方面的政策持批判态度，但是他们总是能够被容忍并有充足的经费，这也许是因为这些 NGO 的领袖和某些部长或将军有着个人交情的缘故。

那些成千上万经费不足、制度化不够的 NGO 在新秩序时期保持低调，却更带有政治色彩和批判精神。他们对城市劳工、贫民、商贩、因水坝或其他发展项目而被驱逐的人们，以及无地农民进行维权训练，并动员他们。正是这些 NGO 首次组织起另类的政党，如人民民主党和类似印度尼西亚 Seikat Buruh Sejahtera(由律师帕巴汉[Muchtar Pakpahan]成立)的独立工会。可以理解的是，这些努力都遭受到苏哈托政权的严酷镇压。

在这些激进 NGO 的激励下，90 年代的 NGO 变得更具批判性。例如，由具良好基础的 NGO 支持的社会名人，呼吁成立“宪法政府”(negara hukum)，实质上是对政府对待军方的政治角色的双重政策的批判。1991 年，由瓦希德和其他著名人士领导的“民主论坛”的成立，成为迈向民主化进程的重要一步。1994 年，“信息和行动网络中心”(PIJAR)成立，将寻求宪法改革的团体都团结起来。1996 年，另外一个 NGO“印度尼西亚大选监察委员会”(KIPP)成立，该组织是专门为 1997 年的大选而预先成立的。独

立记者联盟(AJI)的建立则是由于独立于官方的印度尼西亚记者联盟。1997年金融危机后,NGO、工人和学生之间也建立起了联系。

1998年5月,苏哈托被废黜,NGO阵线发生了快速的变化。最大的变化莫过于 Nahdatul Ulama 和“民主论坛”的领袖瓦希德被任命为总统,Muhammadiyah 的莱斯被任命为人民议会的主席,一些前 NGO 活跃分子被选为政府重要职能部门的领导。

这些领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一系列改革,包括巩固议会统治和压制军方角色的法律引进工作,将权力下放到地区和农村,为现有党派、工会和其他自由组织恢复权利等。但是,由于经济表现持续低迷,迈向社会正义的进展一直很慢。例如,独立工会发现保持团结很困难,因为工人们关心的只是保住饭碗,而不是改变低工资和恶劣的工作环境。

而且,经过三十多年的专制统治,民主机构和行动还很薄弱。不仅军方分子试图逆转民主进程,国家还受到分裂运动及穆斯林极端分子(其中有些被认定参与2002巴厘岛和2003雅加达爆炸案)的威胁。再次引进强制法来压制极端分子的诉求,给包括很多温和派伊斯兰团体在内的 NGO 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通过对以上四个国家的分析可以看到,NGO 和社会运动的力量在区域内得到巩固,但同时他们对各自社会的影响是复杂的。他们在菲律宾和泰国显然比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要成功得多。不管怎么样,在东南亚国家,政府仍然主导着公民社会。甚至在经历了1997年金融危机,“发展型”政府大部分解体后,情况亦是如此。结果,大多数人的福利都受到影响,特别是在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他们不得不采取国际货币基金的“结构调整”计划。自此,深化民主和实现平等发展又成为急切的目标。但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使得平等发展变得更为困难。在这些情况下,两种趋势值得注意:一个是与政府合作处理全球系统,另一个是与其他



NGO 进行区域性联合。

## 二 国家—NGO 汇聚

1993 年维也纳联合国世界人权会议上,东西方国家在人权的普适性问题上出现冲突。事实上,亚洲政府提出了两个其他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注“发展的权利,那是普遍和不可剥夺的权利,是基本人权的整合部分”。他们认为,“在创造一套普遍的人权标准时,应该同时致力于建设一个公正平等的世界经济秩序。”第二个问题是关注“急需使联合国系统民主化(1993 曼谷宣言)”。较早前在 1993 年 3 月的亚洲地区政府会议上,也提出过这些主张。虽然亚洲的 NGO 对于他们的政府的人权记录持批判态度,但是也支持政府对不公平的全球秩序提出批判。在曼谷,来自亚洲 NGO 的二百四十名与会者提出了如下宣言:

我们是 NGO 的代表,促请:

1. 北半球的强大工业国和全球财经组织免除南半球受贫穷蹂躏国家的外债。提倡“具有经济增长的调整”应该改为提倡“具有人性的调整”。

2. 全球各国应该使联合国的结构民主化,让发展中国家更多参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并提高联合国大会的效用。

亚洲的 NGO 坚持这些条款应该被纳入两千个 NGO 参与的维也纳会议的议程,这导致他们和北半球的 NGO 发生了冲突。

1992 年 6 月里约热内卢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亚洲和北半球的 NGO 再次发生冲突。“地球峰会”上南北半球政府之间的冲突,差不多同时出现在同步举行的“全球峰会”上。后者共有一万七千名来自 NGO 和其他组织的与会者参与。亚洲的 NGO 和他们的政府一样,提出需要把“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与北半球国

家主导全球系统的现象联结起来。

亚洲的 NGO 和政府在全球事务上还有其他联系之处。正是在这些方面,近期的反全球化和以前的有所不同。因为西雅图之后,尤其是在波图举行的“世界社会论坛 2001”后,发展中国家所承受的发展苦难渐受关注。于是,亚洲 NGO 和其他西方 NGO 也出现了另一方面的汇聚合流。

### 三 区域联网

在这一汇聚变得明显之前,东南亚 NGO 大体上实现了区域联网。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一些涉及人权和社会问题的 NGO 联盟成立起来。其中包括“人权和发展亚洲文化论坛”(曼谷,《亚洲行动》的出版者)和“第三世界网络”(槟州,《第三世界崛起》出版者)。“土地改革和农村发展亚洲 NGO 联盟”(马尼拉的 ANGOC,出版 *Lokniti*)和“亚洲人民进步中心”(香港 ASIA LINK)常规性地监察亚洲发展银行项目,而“亚洲新另类交流中心”(ARENA)则组织运动抵抗全球化及其对亚洲人民的不利影响,同时提出另类的发展视野。

人权网络包括“亚洲人权委员会”(香港,出版《亚洲人权委员会通讯》[*AHRC NEWSLETTER*])及“人权区域议会”(The Regional Council on Human Rights)。劳工联盟则包括“亚洲移民中心”和“亚洲监测资源中心”。

妇女组织包括“亚洲妇女委员会”(香港,出版《亚洲妇女通讯》[*ASIAN WOMEN WORKERS NEWSLETTER*])、“亚太妇女”、“法律和发展论坛”(吉隆坡)等。青年与学生议题则由“亚洲学生协会”(曼谷)和“天主教学生国际运动”(香港)协调。

此外,还存在一些针对全球化主义的联合抗议组织。1995 年,“马尼拉人民论坛大会”(MPFA)成立,他们抗议亚太经济合作

论坛的领导集会。MPFA 聚集了来自 APEC 成员国的约五百个社会运动和 NGO。另外,反帝国主义全球化论坛也组织起来了。反全球化活跃分子还在 1999 年 2 月举行的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期间组织抗议行动。亚洲发展银行在泰国清迈会议期间,他们也曾组织抗议活动。

#### 四 具有社会正义的和平

2002—2003 年之间,两个重要的区域会议召开了。其中较大的会议是在 2003 年 1 月于印度海得拉巴(Hyderabad)召开的“亚洲社会论坛”。另外一个是在 2002 年 8 月下旬,在马尼拉召开的“亚洲和平联盟”成立大会。在这两个场合中,我们都有机会来重新评估 NGO 在最近的国际安全发展事态中的角色。

2001 年 10 月 7 日,美国发动对阿富汗的空袭后,亚洲 NGO 和其他国家的 NGO 一样开展抗议活动。一些亚洲政府也曾表示抗议。但是,在美国宣布针对恐怖主义的全球战争,并制定旨在保护美国安全的爱国者法令后,许多亚洲国家的政府也开始使用强制法。

在印度尼西亚,麦格瓦蒂(Megawati)政府推行了强制性法律(perpu),即《政府管制法律》(*Government Regulation in Lieu of Law*)。关于铲除恐怖犯罪行径的(2002)1号法令赋予警察 7 日里搜查和逮捕恐怖嫌疑分子的权力,并可以不用起诉,即可对嫌疑犯扣押六个月。该法令还允许运用电话记录、邮件监察和情报报告作为证据。在巴厘岛爆炸案后,(2002)2号法令通过,该法律赋予政府进一步的权力。在这些法律下的惩罚非常严厉,包括死刑和终身监禁。此外,2003 年 3 月,一部基于这两个法律的《反恐恐怖主义法》也在议会通过。

2001 年,泰国南部的城镇发生几起爆炸案后,他信政府也推

行了强制性法律。穆斯林激进分子也因此遭到逮捕。引进《反恐怖主义法》的计划被反对派议员、法律讲师和 NGO 否决。但是, 2003 年 8 月 5 日, 在不需要议会批准的情况下, 他信政府宣布执行《反恐怖主义法》。

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已经有《反恐怖主义法》, 即 ISA。ISA 刚开始是由英国人四十多年前用来打击共产主义的, 但实际上被大范围的滥用, 包括拘留活跃分子、工会人员、学生领袖、反对派政治家, 甚至造伪者, 而不是恐怖分子。美国制定爱国者法令后, 这两个政府骄傲地宣布他们的 ISA 是受到拥护的, 并迅速地开始拘捕穆斯林激进分子, 称他们有些人与阿尔盖达(al-Qaida)在该区域的代理人有联系。

在菲律宾, 反恐战争是基于反穆斯林沙文主义的, 是对争取自主主权的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MILF, Moro Islamic Liberation Front)发动战争的借口。结果, 棉兰老岛的穆斯林受到空前的骚扰, 包括因战争所受的折磨、随意关押、歧视和颠沛流离。(现在反恐怖法即将延长拘留的时间。)可恶的是, 美国军队重返菲律宾, 并利用为菲律宾军队提供军事训练的借口, 参与“联合军事行动”。

正是由于美国军事冒险主义的提升及亚洲地区的民主腐蚀, 亚洲十二个参与和平工作的组织建议成立“亚洲和平联盟”(APA), 并在马尼拉召开成立大会。大会聚集了来自亚洲的一百多名和平活跃分子, 他们来自孟加拉国、柬埔寨、香港、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斯里兰卡、泰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美国。APA 大会的主题是“和平与团结”(Kalinaw)。大会最为迫切的辩论议题是: 全球反恐战争及其在亚洲产生的反民主影响。同时, 大会还探讨了人类安全、多民族和多宗教矛盾、性别与暴力, 以及社会运动的角色等问题。此外, 大会还讨论了如何通过和平另类途径来达到社会公正和民主, 以人民为中心的安全, 以及在缅甸、亚齐、斯里兰卡和棉兰老岛

的公民中发起和平行动等问题。这些在大会的成立宣言和采纳的行动计划中都有表述。

自马尼拉大会后,APA 还曾开展联合活动。最为重要的一次活动,可能是 2003 年 2 月 15 日的国际反美伊战争抗议日。该组织在亚洲区域协调与世界其他各地的相关组织及其开展的有关运动。

APA 大会和海得拉巴社会论坛是亚洲团体和运动互相联系与合作的产物,旨在推进可持续与公平发展和民主。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越来越主宰亚洲的发展方向,比如 1997 年的金融危机,NGO 和社会运动必须推动跨越边界的努力。最近对于美国单边主义及其全球反恐战争的关注再一次证明,不仅保护地区安全必须强调社会公正和民主参与,而且需要跨越边界的行动。

## 五 结 论

现实世界受到世界经济、美国的地缘政治与其他西方强国的支配。这在全球化时代变得愈加明显。在尝试带来另类发展的同时,NGO、社会运动与政府一起参与国际论坛。但是,这样的合作明显是有限的。因为这些政府本质上是反对参与性民主的,而且他们也没有在国内推广平等发展。事实上,在美国发动反恐战争后,他们也抓住机会引进反民主的法律,羁押并非恐怖分子的评论家。

因此,NGO 和社会运动的区域联系变得特别急迫和重要。他们与西方 NGO 的合作也变得更有必要,因为后者支持深化民主、实现平等与可持续发展。过去几年里的反全球化运动的出现,是南北半球联合团结的好征兆。

## 8 印度尼西亚:穿越多变的 新自由主义迷雾

奥莱·G·J·亚迪准祖罗

近年来,印度尼西亚的社会运动存在三种发展趋势。首先,大多数的社会运动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还是被中产阶级所左右;第二,大多数的社会运动,特别是环保运动,都关注新自由主义政策支持的大型国内或跨国集团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第三,这些社会运动不得不面对来自印度尼西亚国家和社会内部日益增加的敌对势力。

自从印度尼西亚政府 1998 年 1 月 15 日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条件妥协以来,苏哈托(Suharto)以及他的继承者就通过把许多具有战略价值的印度尼西亚国有企业卖给国内外私有集团的方式,把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向私有集团开放。这通常伴随着统治精英成员拥有的或参与的私有公司的快速扩张。这其中包括总统苏西洛(Soesilo Bambang)、副总统卡拉(Jusuf Kalla)、社会福利协调部长阿布里扎尔·巴克利(Aburizal Bakrie),以及军人出身的政客班尼可罗(Arifin Panigoro)、在麦德克集团(Medco Group)拥有股份的国有企业部长苏及阿多(Soegiarto)。与此同时,总统本人与一个名叫汤姆·威那特(Tomy Winata)的年轻华人领导的准军工集团关系密切。很有趣的是,拜科瑞(Bakrie)、潘尼构(Panigoro)、卡拉(Kalla)和印度尼西亚国会副主席的小舅子阿斯卡·穆罕默德

(Aksa Mahmud)以及汤姆·威那特(Tomy Winata),按照亚洲福布斯排行榜(2006年9月18日)的统计,都属于印度尼西亚富人前四十名之内,他们分别拥有12亿美元,8.15亿美元,1.05亿美元,1.95亿美元以及1.1亿美元。

这种财富在统治集团内部的集中现象使得这些公司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以至于公司可以肆意进行危害社会和生态的活动而免于处罚。以东爪哇为例,成千上万的村民由于拉宾多公司(PT Lapindo Brantas)的开发所导致的失控的泥石流而被迫转移,受灾面积有一百八十公顷。拜科瑞(Bakrie)家族集团和潘尼构(Panigoro)的麦德克集团是这家公司的主要股东。2006年5月29日失控的泥石流开始爆发,估计造成约十亿美元损失。泥石流将被引导流入爪哇海。成千上万来自附近马都拉岛(Madura)的渔民集体反对这个解决方案,而受灾最严重的波龙(Porong)地区的居民向拉宾多的设施投掷石块并放火。几个非政府组织也准备把该公司告上法庭,而绿色和平组织的成员已经在社会福利部长阿布里扎尔·巴克利的办公室门前堆了超过六百四十公斤的泥土。

农民对法国跨国合资企业达能(Danone)瓶装水公司扩张的抵制活动不那么激烈,但是却也同样重要。该公司逐渐侵占了当地农民的灌溉水源。由于新出台的《水管管理法》削弱了农民的地位,他们的抵抗没有取得大的胜利。这部法律由美国国际发展中心(USAID)提供资金支持的专家团起草,得到印度尼西亚议会的法律认可,它鼓励对以前一直是公共所有的水源进行私有化。

相对来说,环保人士和村民们对大坝建设的抵制就激烈得多了。这些反对建设大坝的团体得到了来自全球反对大坝建设运动,特别是日本和美国反坝运动的支持(Khagram 2000),因为财政支出和承担大坝建设的公司主要来自于这些国家。此外,居住在连接发电站和偏僻工业中心的高压线附近或是高压线下的村民已经被学生积极分子组织起来了。在爪哇岛,这些电磁污染的受

害者已经向国家电力公司 PLN 要求几十亿卢比的赔偿。仅在 2006 年早些时候,村民和学生中的积极分子还抗议政府忽视成千上万电缆受害者的安全和健康,以及在经济利益的活动中保持缄默。

在中苏拉威西岛(Central Sulawesi),对在波龙河(Poso)上建设七百八十兆瓦水力发电大坝的抗议,间接导致了 2006 年 9 月 22 日来自弗洛勒斯岛(Flores)的法比纳斯(Fabianus Tibo)、马里鲁斯(Marinus)以及都命格斯(Dominggus da Silva)的三个农民工被判处死刑。弗洛勒斯岛的三个人因被错误指控策划了波龙河地区公众的斗争而在通往死刑的路上等了五年。尽管有来自 16 世教皇班尼迪克特(Benedict)的求情,他们还是被执行了死刑。这个不公平和不人道的死刑判决激起了中苏拉威西岛和这三个人的家乡东努沙登卡拉(East Nusa Tenggara)民众的反抗。

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对省警察局局长的袭击,在波龙河地区小城镇焚烧警察办公室和警车,以及基督教徒和穆斯林日益紧张的局势,都导致中苏拉威西岛又新部署了几百名士兵和机动警察部队。但是,他们实际的目的是保护不得民心的波龙水力发电工程。该工程正是由同意对弗洛勒斯岛的三个人执行死刑的副总统卡拉主持兴建的。

近期印度尼西亚另一个对新自由主义妥协的例子,是国家开放对石油和天然气产品的直接市场运作。壳牌公司目前已经在雅加达开设了四个超现代化的加油站,而马来西亚石油公司也已经在首都开设了一个加油站。在同样新自由主义精神之下,爪哇最大的油田即炽布油田(Cepu Block),已经被送给同样在苏门答腊岛北端的亚齐国(Atjeh)开采油气资源的美国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公司。因此,在五百多口旧荷兰井采粗制煤油达两代的炽布村,村民们当前正处在被驱逐的边缘。

印度尼西亚国家石油公司(Pertamina)对福布斯 2006 年美国



五百强企业最大的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公司投降,背景是一连串险恶的活动。在1998—1999年间,二百多个穆斯林领袖在东爪哇的外南梦(Banyuwangi)遭到杀害。这些谋杀被统治者说成是反对黑巫术师的运动(dukun santet)。但事实上,那是为了威吓地方领袖,以防止他们反对开发自然资源。大公司以军事力量对东爪哇土地的接管,才是主要的目的。博佐内格罗(Bojonegoro)现在被来自美国的埃克森美孚公司、孟山都公司和台湾的中石油集团所控制(Marut 2003)。

这些公司通过高级别的外交支持,接管了博佐内格罗的土地及其周边事务。美国驻东爪哇泗水(Surabaya)总领事以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相威胁,来劝说当地政府不要妨碍国外投资意向。与此同时,由于草根阶层处于权力真空状态,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控制了东爪哇最大的香烟制造公司本托·普来马(PT Bentoel)的大部分股票,并且在基本没有受到当地烟农抵制的情况下,在东爪哇引入了杂交烟草种子。

就像东爪哇的情况一样,几乎所有苏哈托(Suharto)时代之后发生在印度尼西亚的冲突的结局都是:在国内有丰富自然资源 and 良好投资潜力的地方建立起新的权力结构和统治结构。换句话说,地区的争端反映了资本利益、军事派系和准军事组织之间的相互勾结,它是全球化势力采取的一种新策略。

## 一 中产阶级激进主义

来自工人和底层民众<sup>①</sup>的活跃分子,形成于苏哈托统治的后十年,并在他下台之后迅速增加。他们加强了工人、农民以及本土人民运动的力量。与此同时,很多来自中产阶级的、年轻的、受过

<sup>①</sup> 底层民众的概念来自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 subordinate group 概念。

大学教育的人也加入到这场运动中来。其原因有如下几点:第一,司法仍然还在富人和有权势的人的控制之下,工人、农民以及其他因发展而受害的人即使赢得诉讼,也没有任何的帮助。因此,社会运动主要依赖于新闻媒体和出版社来拥护支持他们的运动。第二,不断增加的政党数量没有能够对行政机构起到控制作用。事实上,政党(它与大的商业企业勾结)都被政府、民间和军队的武装所控制。第三,社会运动组织的推动工作具有反主流文化的吸引力,它提供不同的另类选择,而不是只成为机器人似的公务员,或加入贪婪集团。这股反主流文化潮流也受到国外理想主义者的推动,他们为海外旅行和研讨会提供支持。

对激进主义不断增加的反对与阻挠,并不是年轻中产阶级激进分子所面临的主要障碍。事实上,面对危险就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民权分子慕尼尔(Munir Said Thalib)2004年9月6日在乘坐揭路茶(Garuda)航班从雅加达飞往阿姆斯特丹途中遭到暗杀,这一事件并没有吓倒那些活跃分子。

## 二 印度尼西亚社会运动所面临的危险

那么,印度尼西亚社会运动所面临的主要危险是什么呢?归结起来,至少有五种:第一,军队对政府官僚和商业部门持续不断的军事控制,根据部队驻地结构,从雅加达向各个村庄延伸。第二,分散发展政策允许地方政府领导人以及他们的军事亲信来推动国家商业集团向边远的地区扩张。这些地方领导人往往充当国家的以及跨国商业利益的保护伞,因为当前关于地区政府的法律给予了地区政府以同意或拒绝在其管辖范围内任何一桩投资的权力。第三,国内日益严重的宗教矛盾以及由新地区政府法律鼓励实施的、划出的新省和地区的政策,导致了日益严重的种族沙文主义,引起了一场不分种族、民族和地域为所有公民争取正义、

人权和幸福的社会运动的反对运动。第四,在印度尼西亚当地政府和位于华盛顿或其他地区总部所制定的规则之下,在印度尼西亚工作的国际金融机构往往把它们上级的愿望强加在它们的接受者的身上,这就限制了印度尼西亚社会运动积极分子所拥护的工作。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连续两任美国大使向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施压,迫使其减少对两个印度尼西亚非政府组织的资金支持,原因是这两个组织对美国采矿公司如弗雷波特公司(Freeport McMoRan)和纽蒙特(Newmont)进行了批评。这两家非政府组织是印度尼西亚环保论坛(WALHI)和反采矿拥护网(the Anti Mining Advocacy Network)(Leith 2003:182—4)。去年,美国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在雅加达的官员们向笔者施加压力,要求我在由该基金会出版的纪念其来到印度尼西亚五十年的《印度尼西亚环境和发展》一书中删除上述案例。我拒绝向福特基金会妥协,于是退出了该书的编写组。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很多以社会行动为专业的社会运动活跃分子依然带有某种中产阶级的偏见。应给予支持的案例是如此之多,又都很依赖媒体和出版社,以至于许多社会问题仅仅只能暂时引起公众的注意。

## 参 考 文 献

Khagram, Sanjeev(2000). "Toward democratic governanc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ransnational civil society organizing around big dams." In Ann M. Florini (ed). *The third sector: 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 civil society*. Tokyo & Washington, DC: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pp.83—114.

Leith, Denise (2003). *The politics of power: Freeport in*

Suharto's Indonesi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Marut, Donatus K. (2003). Globalization and conflicts among the poor in Indonesia. Keynote and Column Speech in the Groenlinks (Greenleft) Party Conference, Groningen, Netherland, 25 October.

## 9 印度尼西亚:组织基层

维迪·R·哈迪兹

苏哈托“新秩序”下高度中央集权化的专制主义统治的三十年(1966—1998),如今仍然影响着较为民主化的环境里的社会运动的发展方式。在当时的新秩序下,一切形式的社会和政治组织都遭到严格的审查和管理。只有包括执政党“专业集团党”(Golkar)在内的三个政党允许存在,而工人、农民、妇女、青年和其他社会团体全部都只能在官方批准的组合主义的框架中进行组织。印度尼西亚的“建国五原则”(Pancasila)<sup>①</sup>——一套表述含糊的五项原则——被以下述方式宣传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把冲突和异议说成是与倾向于合作与和谐的印度尼西亚人民不相容的。因此,劳工罢工、农民骚动、学生抗议以及其他类似事情通常遭到印度尼西亚安全部队的残酷镇压,因为这被说成是相异于印度尼西亚的民族文化,受到来自外国的“自由”思想或残余的共产主义的影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新秩序建立时被摧毁以前,曾是世界第三大共产党。苏哈托为了把它从社会和政治事业中清除掉,屠杀了八十万以上的印度尼西亚人,另有几十万人未经审判而遭到长期监禁。

---

<sup>①</sup> Pancasila是印度尼西亚的国家原则,来自两句梵文,“Panca”即五,而“Sila”即原则。Pancasila即作为印尼宪法基本精神之一的建国五原则:1.唯一的上帝;2.公平与文明的人性;3.统一的印度尼西亚;4.智慧的协议(代表性)民主;5.印度尼西亚全民的社会公正。

如果说印度尼西亚社会运动能力有限,如果说印度尼西亚社会运动在利用民主化的环境来争取那些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被边缘化的人们的利益这一点上能力有限,那么 1965—1966 年的创伤是很难忽视的。

尽管如此,在今天的印度尼西亚,新秩序的专制主义结构已然不复存在,社会运动拥有了比以往大得多的政治空间。然而,一个大的问题是,印度尼西亚的行动主义分子不得不重新学习一整套的有效的组织艺术,尤其是在草根层面。整个印度尼西亚——该国拥有二亿二千万人口,由位于东南亚和澳大利亚之间的数千个岛屿组成——开展各种工作的组织尽管分布不均,但数量庞大。很大一部分组织在严酷的专制主义新秩序时期就存在了,其中还包括一部分当时非官方的政治反对派。而其他组织则是最近才建立的。它们在组织能力、捐赠、策略技巧,以及战略、意识形态或政治倾向方面,各不相同。

这些社会运动组织有的与源于各种伊斯兰教思想变体有关——特别是在讲究平均主义和社会公正方面,但是他们大多数并没有屈从于狭隘的原教旨主义,有的则受到有关权利和公民自由权或社会民主概念的吸引,还有的仍然表现出新秩序之前的激进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痕迹,有的甚至力图复活早已被击败的过去的左派传统。一些社会运动组织拥有资金支持(通常是从国外非政府组织获得),具有严密的组织结构;而另一些组织则非常不正式,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没有定形。最近的发展情况是,建立了同全国或地方政治精英有或多或少明确联系的非政府组织,这些政治精英在争夺国家政权方面常常进行着非常激烈的争斗。

最知名的社会运动组织大都积极参与人权领域的行动。许多组织站在行动前列,要求后苏哈托时代的政府解决过去和当前的侵犯人权的问题,这些侵犯人权的案件很多是由军方犯下的。另一些组织则投身于土地和环境问题——这些问题在政治上具有爆

炸性,因为有关转移农民或者“土著”、“部落”人民的边缘化问题的政策很有争论性,同时追逐利润的贪欲,导致这个具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的的环境急剧退化。印度尼西亚的民主化也导致了数不胜数的正式和半正式的劳工组织团体的出现,而在新秩序时期,它们是遭到安全部队的特别镇压的。值得注意的是,鉴于印度尼西亚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为腐败的国家之一,该国的反腐败监督组织发展得很快。尽管大多数知名的此类组织都集中在雅加达,但是,在各省各地区也有一些组织致力于同地方政府和议会的腐败作斗争。苏哈托统治晚期,已经出现了新的记者组织,它们为争取新闻出版自由和保护记者的权益而斗争。尽管印度尼西亚的新闻出版现在在东南亚属于最自由的,但是人们仍然存在着挥之不去的忧虑,担心对印刷媒体和电子媒体的严格控制政策会卷土重来。

前面已经提到,由于印度尼西亚社会在新秩序时期实行了系统的去政治化政策,社会运动现在面临的一大问题是如何重新学习在草根层面进行有效组织的技巧。其他的问题还有:社会运动行动者之间的分散,以及它们之间的内部冲突。这种分散和冲突又由于彼此纠葛的社会精英企图将某些社会运动当作自己选择性的群众动员工具的一部分而进一步恶化了。例如,学生运动因其在苏哈托的垮台中的作用而广受赞誉,但马上就分裂了,现在实际上处于静止状态。比过去好一些的是,现在社会运动行动者中对国家安全机构的恐惧,相对来说已经小多了,因为国家安全机构处于严格的国际监察之下——尽管由于美国进行反恐战争这种监察有松动的迹象。然而,2004年9月著名的印度尼西亚人权行动主义者穆尼尔(Munir)被毒死在他从雅加达飞往阿姆斯特丹的飞机上。穆尼尔是军方和情报机构的眼中钉,是一位坚定的批评家。军方侵犯人权的行為仍然在发生分离主义运动的省份亚齐(Aceh)和巴布亚(Papua)继续着。而且,印度尼西亚社会运动的行

动主义分子还面临着不断升级的以暴力形式出现的危险,这些暴力案是由各种与精英有瓜葛的打手和暴徒团伙犯下的。这些人通常组织成民兵或者与政党有联系的准军事团体,或者是一些与军方有联系的青年/帮派组织。



## 10 · 泰国的社会运动和新自由主义 全球化的挑战

查尼达·查努亚潘特·巴福德

社会动员在泰国的历史比较短。第一次比较重大的事件是1973年由学生领导的对军事独裁的抗议。自1932年从绝对君主制变成立宪君主制后,泰国经历了几乎没有间断的军事独裁。随后发生的进步的民主化运动在1976年被军方支持的效忠派镇压下去了。

在经历了一系列军方支持的政府后(其间夹杂着成功或失败的政变),进行军事独裁的最后尝试在1992年曼谷中产阶级发动起义后失败了。一个选举产生的宪法起草委员会领导进行了全国范围的协商之后,这场主要由曼谷领导的支持民主的运动在1997年达到高潮——颁布“人民宪法”。

促成新宪法压倒反动阵营的现实事件是1997年6月在泰国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这场危机被认为是现存统治制度的失败,在这个统治制度中,政治家与政府官员相勾结,从不断涌入的国外投资中渔利。新宪法的颁布被认为是对人民被排斥于政治之外——一直是该国统治的特征——的历史性胜利。然而,争取更加民主、反应迅速和负责任的政府的动力,比争取新经济制度的任何运动都要强大。

在农村地区,政府控制的为出口而进行的农业商业化使得农

民被边缘化并遭受剥削。在1973—1976年的民主间歇期,农民试图建立农民联合会,并推进土地改革和农业价格支持措施,但遭到镇压,几十位领袖被暗杀。

社会动员只是在上个十年才重新发动起来。有几个农民领袖按照传统方式建立了一些团体,以在谷物价格方面向政府施加压力。同时,出现了新型的以社区为基础的对立运动,他们通过偶尔的直接行动和游说活动,反对那些直接损害农村社区生计的政府开发项目。这些项目主要有:把居民从退化的森林地区驱逐出来,以给商业种植让路,或者把居民从大坝地区、不断扩大的国家公园、电站建设区域驱逐出来。1992年,成千上万受到驱逐威胁的村民联合起来进行了历史性的长距离游行,成功迫使政府搁置了一个大型项目。1995年,一些以社区为基础的类似的抵抗团体建立了一个名为“穷人议会”(Assembly of the Poor)的联盟。1996年和1997年,穷人议会组织人们在曼谷政府大厦前集会达几个月之久,成功迫使政府启动正式诉讼程序来解决一百多个申诉。

由于司法程序的拖延以及政府的频繁变更,原来的大多数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但是穷人议会此后赢得了好几个同盟者,因为更多的社区受到由地方、国家和跨国企业为获取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而进行的大型基础建设工程的威胁。直到今天,以社区为基础的抵抗,仍然是同支持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模式、争取在全球化经济中增强竞争力这种主流经济发展政策进行斗争的主要形式。

非政府组织出现于1980年代初,它们多是国际慈善团体及以北美和欧洲海外开发援助团体提供的帮助的接收者,这些团体把这些非政府组织视为替代性的开发援助渠道。多数非政府组织是没有党派属性的社会正义行动主义分子组织,它们为提高农村社区自给自足的能力,加强农村社区同自上而下的等级制政府官僚体系进行谈判的力量而工作。除了包容和公正的原则,他们极少

有别的意识形态。

1985年,大约二百个基于社区或基于问题的非政府组织联合成为“非政府组织农村发展协调委员会”(NGO-CCRD, NGO Coordinating Committee on Rural Development),以增强它们倡导政策的能力。非政府组织的网络在基础广泛的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在促进穷人议会和其他以社区为基础的抵制运动的动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非政府组织参与社区组织和能力建设的几十年里,产生了社区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的众多网络,促进了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可持续农业和地方经济的自给自足,以作为对主流商业和出口导向型发展的替代。1997年的金融危机和泰国国王倡导的“充足经济”帮助增强了这些网络和它们的意识形态框架。作为保护村民免受政府官僚错误引导的发展模式之害而进行的一些工作,现在被看做是对私有部门新自由主义的一种替代。在声音上居于少数的部分学者已经在帮助人们对这些替代模式进行清晰的表述。

劳工运动长久以来被看做是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威胁,所以一直是限制性管制、渗透和拉拢的目标。工会工作把重点放在职业健康和安全以及劳动法的公正实施上。国有企业工人的工会在政治上则更加积极。在遭到国家的十年压制之后,它们目前成为反对私有化的主力。

泰国的很多社会运动是作为对政府当局造成的威胁的反应而形成的,易于更换同盟者,因此具有很大的临时性和分散性。替代方案网络的实践者和支持者持续较为长久,它们培育了农村—城市之间的纽带,围绕能够吸引地方智慧、佛教和德高望重人士的支持的一套原则而发展起来。

同与占支配地位的经济结构作斗争的力量相比,支持民主的力量通常要广泛得多、强大得多。考虑到军事独裁的历史和在诸

如教育系统等机构中的根深蒂固的专制主义,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公民社会包含的因素,如中产阶级、城市“公民”团体等,针对诸如信息自由、透明和公民权利等政治问题开展活动,但在挑战经济现状方面很少表现出兴趣。

目前,他信·西那瓦总理的政府,由于具有极端的商业主义倾向,并且持续损害宪法规定的权利和自由,可能会被证明是刺激泰国的反新自由主义情绪的重要因素。

## 11 多数人的暴政与泰国军事政变

查坦拿·邦帕斯曹提、优陈·切安生

2006年9月,泰国的一场军事政变推翻了“他信体制”<sup>①</sup>——人们这样称呼他信总理领导的政权。他信在2005年第二次被民主选举成为总理。但是他的民粹主义的、权威式的行政方式及其新自由主义倾向,使国内社会和民主运动动员起来了。

自从2005年大选后“他信体制”被确立以来,泰国国内的社会政治就一直很混乱,并且伴随着民主的倒退。仅仅在他信初次执政两年后,也就是2003年,泰国部分舆论就注意到民主自由持续被加强了限制。事实上,泰国的政权正朝着“威权主义民主”的方向迈进。在威权主义民主之下,泰国的总理是整个国家的统治者,由他来制定国家大小事务的规则。但是,他信独裁所造成的政治紧张是逐渐形成的,因为尽管采取了反民主的措施,政府本身毕竟是民主选举出来的。最重要的是,他信民粹主义的经济政策,即给每个农民家庭三十泰铢的医疗补贴,及强硬的禁毒政策<sup>②</sup>都为他赢得了大部分泰国人的支持:他们很愿意用某些民主价值来换取政府稳定和经济回报。这就是他信为何能建立“他信版的”代议制民主,将国家主义和企业管理相结合的原因。

<sup>①</sup> 他信2001年选举获胜,2005再获选,2006年被军方推翻。

<sup>②</sup> 政府的反毒品政策导致两千五百起法外处决。

这场军事政变给这个以前是商人的总理的统治画上了句号。然而,这场仓促政变的面目不是很清晰。该政变的背景是:他信的反对者和支持者之间的政治关系极为紧张,同时,曼谷的中产阶级由于被不断被揭发出的腐败丑闻所激怒而日益不满。他信及其自从2001年起就卷入了许多商业丑闻,他信政府内部的利益冲突也司空见惯,以至于“腐败政治”这个词被专门造出来描述他信政府的运作方式。

## 一 社会运动起来反对他信政府

他信的政党泰爱泰党(TRT)是依据1997年宪法赢得民主选举的第一个政党。由于在1973年和1976年的民主化运动中,原来的学生战斗分子担任了党内某些重要职位,他信政府和一些社会运动组织的关系有了比较好的开端。这些组织中最著名的就是穷人议会<sup>①</sup>。这些社会运动组织也因此期望能参与政府的决策,因为这些运动在泰国政治体系民主化过程中所起的领导作用,使它具有明显的民主参与倾向。

令所有的人失望的是,由于政府民粹主义政策,新政府的声望刚一建立起来,与社会运动组织的关系就迅速恶化,以至于到了任何谈判都不可能举行的地步。由于有1997年宪法创造出来的政府稳定局势,以及他信在电信行业的资产和企业界的壮胆,总理他信毫无忌惮地操控政治议程。他信给予选举出来的代表最大的权力,排斥社会运动(组织),并使泰国公民变成政治舞台外的被动旁观者。这种威权式统治导致了泰国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出

---

<sup>①</sup> 穷人议会是人民组织与NGO的联盟,他们关注弱势社群。联盟在1995年成立,建设新的“穷人”身份认同,让他们的声音被人们听到。在各种运动里,联盟的反水坝运动最活跃(Suthy Prasartset 2004)。

现了许多严重的后果。

首先,充当社群中间人的非政府组织被孤立,并且被批评为缺乏代表人民的合法性。泰爱泰党称其为“贫穷的朝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样反而帮助了那些组织和民众网络强化了其独立性。非政府组织和民众组织的关系变得更加清晰了:在运动中,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仅仅局限在技术支持方面,他们不参加社区的组织和领导。

其次,泰国政府的民粹主义政策分化了民众运动。大学成员宋奇亚(Somkiat Pongpaiboon)是社会运动中的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采取了泰爱泰党使用过的方法,通过“直接销售”来聚合贫苦的农民,后来,农民变得彻底依赖于政府资金和国家首脑了。最终的结果就是,农村受到严重的削弱。

最后,通过把公民社会的进步部分妖魔化,泰国政府再度唤醒了一些极度保守的势力。都瑟·斯瑞万(Dusir Siriwan)和萨迈克·苏查威(Samak Sutraravei)是与1976年10月6日那场血腥政变有关系的两个人。他们通过媒体漂亮体面地回到了公众的舞台。更令人吃惊的是,一个叫“反对非政府组织俱乐部”(Anti NGO Club)的非正式网络被创造出来,用以诽谤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并要求对非政府组织采取更加严厉的限制措施。这种动向可以视为是对非政府组织的主导战略的反动:通过本质上以国家(政府)为导向,他们忽视了公民的教育以及和社会其他成员的交流,因而也就逐渐失去了公众的信任。

## 二 穷苦的农民

在上次游行示威遭到镇压之后,穷人议会的成员已经有两年多时间没有参与社会运动。他们建立了一个永久的人民委员会来监督政府的民粹主义政策。他们的策略也发生了变化:放弃了以

前那种集中针对曼谷居民,并组织论坛,来提高公众意识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然而,并没有妨碍他们组织较小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其中之一是在议会前(2005年3月15—17日),另一个则是在农业部之前(2006年3月20—25日)。持续下降的政府声望使这些运动与政府重返谈判桌成为可能。这些运动巧妙地利用了这种情形,从而迫使内阁发布一条停止两个大坝建设工程的法令。大坝之一在纳克斯瑞马拉(Nakornsrithammara)省的克隆克来(Klongklai),另一个在查不恩省(Chumporn)的拉不罗(Ruproh)。

通过选择与他信政府谈判,泰国农民债务网(The Farmers' Debt Network of Thailand)也使政府作出了很多让步。泰国农民债务网由负债的农民组成,像一个以施压、游说和谈判等方式与政府直接交涉的利益集团。他们还迫使政府在1999年实行农民恢复与发展基金法案,来帮助农民应付债务。在2006年9月,该基金以二千万泰铢买断农民所欠商业银行的四百项债务。之后又有措施惠及四万五千名农民,为他们解决了六十亿泰铢的债务。

### 三 反对新自由主义:私有化以及自由贸易协定

尽管私有化问题是2001年大选的主题之一,而且泰爱泰党一如既往地炒作经济民族主义游戏,以及工人的权利和消费者的利益,但是没有一个选出的代表信守其原来的承诺。这就是在两届他信政府期间反对私有化问题,成为工会运动特别是国有企业工会反复谈论的话题的原因。最重要的抗议运动是控告他信政府企图私有化国有企业泰国国家电力局,他信政府不是要提高它的效率而是要提高它股票的价值。在2004年,由几千名公共事业的工人参加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要求停止公共事业的私有化,废除有关国有企业的法律,以及就私有化问题举行全民公决。

在2005年,由消费者基金会和消费者组织联盟发起的消费者



运动,接过了运动的接力棒。该运动的方法和理由与那些工人运动不同,更能为大众所接受。他们成功地为反对私有化的斗争赢得了更加广泛的支持。各种社会部门的联合以及公民社会和部分政治团体——参议院的合作,最终于2006年在行政管理特别法庭结出了硕果。法庭的最终结论是,在泰国国家电力局私有化的过程中存在不规范操作,泰国国家电力局被迫退出了股票交易。

不过,反对自由贸易协定的运动,是组织得最好,也是最为复杂的运动。一个名为“FTA 监察”的自由贸易的监测机构被建立起来,以协调各个组织对贸易和发展影响的研究。这些组织包括艾滋病患者网络、四个地区的贫民窟居民网络、替代农业网络、北部农民联盟、消费者网络,以及众多学生组织。

2006年1月10日,泰国和美国在清迈举行贸易谈判期间,由这些广泛的网络组织的游行示威活动吸引了八千多人参加,迫使谈判人员中断了讨论,并离开他们开会的旅馆。这个网络主要关心的问题是,拒绝专利,特别是针对有机生物体专利所规定的在商业上无法接受的条件。此外,议会在2006年2月24日解散,以及他信无数次解决政治危机的尝试,都使得泰国与美国、日本的贸易谈判被迫推迟。

#### 四 人权和民主

泰国的公民社会发起了很多次重要的立法提案权活动,来处理在禁毒以及平定南部穆斯林叛乱运动中的践踏人权行为<sup>①</sup>。对人权和媒体的维护是相对来说比较近期的事情,但是从开始到现

---

<sup>①</sup> 泰国的穆斯林南叛乱是南部的分离活动,三个小省份人口主要是马拉人(Pattani, Narathiwat 和 Yala)。他信政府2004年在该地区颁布军法,自此陷入暴力浪潮,暴乱和本应要平定局势的军方都煽起暴力。

在已有了很大的发展。穆斯林法学家协会主席和泰国法学家协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宋猜(Somchai Neelapaijit)的失踪,让人们更加清楚人权战斗分子的作用以及他们所面临的危险。作为对马来西亚穆斯林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以及某些可疑的离奇失踪案的回应,一个非正式的名为“正义和平”的工作小组在2006年年初成立,并开始对法律程序进行调查。考虑到泰国民主所面临的威胁,最近的调查法律程序和机制的活动可以被认为是民主的一个巨大进步。曾经不得不默默承受不公平待遇的受害者,现在可以做出反应并进行诉讼了。

成效最显著的运动要算是反对他信的运动了。他信把他在信集团(Shin Corp)电信的股份卖给新加坡的淡马锡(Temasek)公司。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信犯了最严重的错误,因为正是由于他的这个错误,使他所有的敌人都联合了起来。事实上,就是他的错误导致“已成历史的”民主运动,即人民民主运动(CPD)<sup>①</sup>,决定加入到由颇受争议的记者桑地·林桑库(Sondhi Limthongkul)领导的已经进行了几个月的反对他信的运动中来。桑地·林桑库要求国王介入,来罢免他信。

反对他信运动后产生的人民民主联盟(Alliance of People for Democracy)社会成分比较单一,因为其成员主要都是曼谷中产阶级。但是它的政治成分是多种多样的,因为它把保皇分子和进步分子都聚集到同一示威活动之中。这种人民民主运动(CPD)和桑地军队的妥协使得国王也介入进来。紧随其后的政变,导致了民主力量内部关于途径和目的的新争论。一些声名显赫的民主人士在期望更好的民主的同时,却选择打破民主的秩序,这难道不是一

---

<sup>①</sup> 人民民主运动是激进学生、工会分子、NGOs和专业组织的网络,1975年成立,1991政变后再次活跃。它是人民动员的重要力量,导致国家在1997采纳民主宪政。

个奇怪的悖论吗？

## 五 结 论

2006年9月19日的政变,发生在一个他信的拥护者和反对者之间横亘着鸿沟的国家,它把泰国的民主交给了民主的魔鬼。难以想象的事情再次发生,而且更甚于以往。承认并接受泰国政治的复杂性是很必要的。政变、多数人的暴政以及国王作用的困境,无疑不会对社会运动的日常活动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但是,对将来的影响却是深远的。为了克服混乱和矛盾的局面,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对泰国社会运动的性质、这些运动与泰国政府的关系,以及运动对人民权力和愿望的实现潜力这三个方面的综合考察与理解。

## 12 菲律宾：人民力量的终结？

瓦尔登·贝罗

通常，人民力量与菲律宾是同义语。

1986年2月，菲律宾人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冲上街头支持一场军事政变，驱逐了铁腕人物费迪南德·马科斯。

十五年后，2001年2月，他们再次拥向街头，使总统约瑟夫·埃斯特拉达垮台，因为他被认为从非法赌博活动中收受了几亿比索的钱财。

然而今天，当又一位总统受到选举舞弊的指控时，菲律宾人却没有行动。

总统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同选举官员之间在2004年5月大选时的电话内容被截获，该电话表明总统试图影响选举结果。由于不能否认录音带上的声音是自己的声音，阿罗约公开为“判断力的疏忽”进行道歉。阿罗约的承认不但没有缓和局势，反而引发了要求她辞职的普遍呼声，并导致了一个包括政治反对派、倒台总统埃斯特拉达的追随者、前总统科拉松·阿基诺和多数重要左派团体在内的广泛联盟的形成。

2005年9月初，大约在丑闻爆发三个月后，阿罗约指挥她在国会的集团挫败了一个对她进行弹劾的提案。尽管阿罗约获得了自有对总统进行舆论调查以来最低的信任率，但是她仍然掌握着政权。这些数字并没有转化为街头人群的数字。反对阿罗约的势

力能够召集到的最大力量是7月中旬的四万人。与此形成对照的是，1986年和2001年，数十万人阻塞了通往马尼拉的主要道路，即众所周知的“EDSA”<sup>①</sup>。

究竟怎么回事？作为马尼拉的街头行动主义分子的老兵发出了疑问。为什么人民不再站出来抗议总统的如此明目张胆的选举舞弊呢？这位总统早在被截获的电话浮出水面以前，就因为不称职的、毫无个人魅力的领导水平而非常地不受欢迎。

事实的真相是，尽管人民对总统不满，但是他们对政治体制深深失望，这个政治体制下的政权被人们称为“EDSA 国家”。为什么不出来抗议呢？问中产阶级和一般的人为什么不上街，总是得到相同的答案：“唉，无论谁取代她，都会一样糟糕，甚至可能更糟。”

我发现，我在行动主义的传统温床菲律宾大学念政治社会学的本科生当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参加了政治集会，我就向他们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个民主制度还值得拯救吗？”三分之二的学生说：“不，不值得拯救”。

人民——包括以前我的一些学生——不但不上街，反而大量跑到欧洲、美国和中东去了。现在，菲律宾10%的劳动力在海外工作，并且每四个菲律宾人就有一个想移民国外。据估计，现在至少有30%的菲律宾家庭依靠八百万移居国外的菲律宾人寄回的汇款生活。

中产阶级和一般人对于重建1986年的民主制度持愤世嫉俗的态度很容易理解，他们认为这个制度只是精英集团疯狂争抢政治职位的工具，同时使这些精英结成一个联合阵线来反对社会和经济变革。一些菲律宾人尖锐地指出，专制的越南努力将它生活

<sup>①</sup> EDSA是马尼拉最繁忙的高速公路，也是两度推翻在任总统的“人民力量运动”的代名词。在这两次运动中，抗议者都聚集在那里，并最终推翻政府。

在极端贫困中的人口比例从 1990 年的 51% 减少到 2000 年的 8.4%，而民主的菲律宾却处于停滞状态，2000 年 15% 以上的人被划在极端贫困中。他们谴责这样的事实：用以测量不平等的最可靠的数据“基尼系数”在菲律宾为 0.46，在东南亚是最糟糕的。

伴随着这些统计数字的是马尼拉贫民窟的蔓延，在那里，穷人的生存条件是这个区域中最差的，总有一天要赶上班加罗尔和孟买的贫民窟。

一些分析人士指出，尽管选举进程成为“精英的战利品”，并导致了 EDSA 国家的失败，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关键因素。他们认为，由于外部因素的影响，其命运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在这种观点看来，美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 80 年代中期毫无顾忌地取消了它们对名誉扫地的马科斯的独裁统治的支持，因为他的政权已无力推行为向大商业银行偿还所欠的二百六十亿美元外债所需的政策。新的民主制度拥有了独裁统治所缺乏的合法性，并成为华盛顿用以推行严酷的稳定化或者说“结构调整”方案的合适工具。

偿还债务成为科拉松·阿基诺总统羽翼未丰的政府的优先国家经济目标，并为每年偿还债务所需的完全数量的“自动拨款”进行立法。在若干年里，多达 50% 的政府预算被用来偿还债务，剩下的又被行政开支和工资吃掉了，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剩下来进行资本支出，这必定导致国家停滞不前。毫不奇怪，到 2004 年，外债攀升到六百亿美元以上，多达 80% 的政府收入被用来还债，这使得连续几届政府在财政空洞中愈陷愈深，而且看起来没有爬出来的希望。

就这样，在精英把选举进程当作战利品并从外部引进强加的经济政策之时，EDSA 式的民主制度几乎没有成功的机会。

菲律宾的情况并非特例。确实，菲律宾展示了萨缪尔·亨廷顿庄严命名的民主扩张的“第三次浪潮”的轨迹。当时，从 80 年代初

开始,从东南亚到拉丁美洲,镇压性的政权纷纷被赶下台。军事独裁末期的巨大希望在新千年开始的时候已经变成痛苦的失望。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2004年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拉丁美洲54.7%的受访者认为,如果民主政权变成专制政权能够解决他们的经济灾难,那么他们就支持这种转变。一些分析人士指出,实际上,对第三次浪潮的逆转已经随着佩尔韦兹·穆沙拉夫将军2000年对巴基斯坦民主的破坏而开始了。这一行动得到中等和下等阶级的大力支持,他们因为贝娜齐尔·布托和纳瓦兹·谢里夫两位竞争者治下的民主政府的腐败和无效率而对其丧失了信心。

由于没有经历过独裁统治的年轻一代用玫瑰色眼镜来观察已经远去的马科斯时代,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危险:在这个国家,专制主义可能在未来回归,如同巴基斯坦那样。不过该国军界软弱而分裂,事变也许不会像巴基斯坦那样通过军界来进行。

产生这种关切的一个原因是,能够防止专制主义回归的政治力量处于极为糟糕的境地。“内部精英”和“外部精英”陷入一场剧烈的消耗战,同时全部的中间地带几乎都消失了。

左派是分裂的。一派是年迈的毛主义运动,他们在差不多四十年后仍然坚持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另一派是刚刚出现的多元主义的、民主主义的左派,他们争分夺秒,力图给离心离德的群众提供一个新鲜的替代制度。

菲律宾的公民社会一度是这一区域最有生机的,并被认为是希望在新的民主制度下充当国家的伟大的监督者。但是二十多年来,不同的公民社会行动者参加了精英支配的政府,政府一方面运用他们的“人民授权”和“可持续发展”的辞藻,另一方面把他们吸收进来——在某些场合甚至将他们变成了政府最死硬的辩护士。约瑟夫·埃斯特拉达和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的追随者中的头面人物有一些就曾是公民社会的著名人士,曾积极参与人权和社会正义活动。于是,“公民社会”不再是一个意味着正义、公

平、清洁的政治运动的参加者认同的词汇。的确,公民社会现在被一些人讽刺地看做是通往政界的台阶。

因此,当 EDSA 民主国家进入它的第二十个年头的时候,这个国家只能孤独地跛足而行,看不到前景,没有灵感,被剥夺了捍卫者,等待着宿命的天谴。而总是憎恶真空的老天爷,是不会忘记这个国家的。



## 13 菲律宾社会运动面临民主挑战\*

T·S·恩卡那逊·达邓

在军法统治时期(1972—1986),马科斯独裁主义政府所奉行的经济政策受到了来自菲律宾社会运动的挑战。这些社会运动主要由左翼力量领导:菲律宾共产党(CPP)及其军队新人民军(NPA),以及它的统一战线组织全国民主阵线(NDF)。马科斯的经济发展政策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来推动。世界银行极力支持以自由化、外国投资、出口导向为主要特色的资本主义发展政策,以此作为经济进步的支柱。这种发展轨道的主要代理就是国家的技术官僚。他们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并被认为是在发展决策时有最终决定权力的专家精英团体。(Bello et al, 1982:28)

同时,技术官僚的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厌恶政治,他们认为政治是非理性的,是与“科学的专家意见”相对立的。因此,这些技术官僚反而推崇独裁主义政府,罔顾所有形式的政治权利、公民权利,使政府能以经济方便的名义,尽情地不受阻碍地推行自己的政策。然而,这些经济政策却加速了国家的贫穷,增大了贫富

---

\* 更详细分析请参阅:Teresa Encarnation Tadem《菲律宾技术官僚和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收于 Shiraishi Takashi 和 Patricio N. Abinales 编 *After the Crisis: Hegemony, Technocracy and Governance in Southeast Asia* (《危机之后:东南亚的霸权,技术官僚与管治》),日本京都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之间的差距。因此,菲律宾社会运动示威抗议的矛头就不仅仅指向国家的独裁者,还包括被视为支持军法统治政权的第三股力量:技术官僚。其他两股力量是军队和马科斯独裁主义政府的亲信及密友。因此抗议者的口号是:打倒美国/IMF/世银/马科斯独裁,而技术官僚被视为 IMF/世银在国内的化身。

随着 1986 年的“人民力量”(又称为“艾沙革命”)事件的爆发,那些技术人员、科学专家一下子变得声名狼藉。此时,民间组织者和社运动有望能对后军法统治政权的经济发展决策产生一定的决定作用。1987 菲律宾宪法的第十三章第十六节甚至明文规定:“不能剥夺人民及其组织有效、合理地参加各层次社会、政治、经济决策的权利”(Ariate, 2005: 91)。尽管有这么好的政治环境,现今体制中仍然有很多因素,阻碍着社运动对政府决策进行干预,尤其是很难反对全球化带来的不利影响。

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在起决定性作用的决策者中,新自由主义思想处于主导地位。在军法统治时期,自由市场思想基本上只是技术官僚的专利,但在后军法统治时期,情况已经开始不同。“随之出现的,是人们执著地坚持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宗旨,并且,志趣相投的理论专家、智囊团以及与政府联系密切的咨询公司,都在不断地培养并发展着新自由主义思想。”(Quinsaat, 2005: 32—33)<sup>①</sup>甚至菲律宾的政党和国会成员都忠实地坚信私有化和新自由主义思想。

另一个因素是,菲律宾政府的经济决策的跨国界的特征。此时的菲律宾政府是“对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及在这些组织中行使领导权的国

<sup>①</sup> 菲律宾大学经济系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的堡垒。至于智囊方面,最拥护新自由主义的是经济自由基金(FEF),它的名誉主席是马科斯的主要技术官僚 Cesar E. A. Virata。

家负责,而不是对本国公民负责”(Quinsaat,2005:33)。

而政策环境本身是第三个因素。“在法律有效且社会进步的同时,政府的环境管理和决策对民间参与的接纳和友好态度,也是非常重要的”(Brillantes,1997:49)。

因此,以“不自由的民主”为特色、由经济政治精英继续统治的后军法政权对社会运动者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个挑战要求他们为了使政府能够更透明、更负责任地进行经济决策而寻找不同的方法和策略。于是,社会运动本身造就了一批具备了科技能力、懂得同专门的技术官僚打交道、也懂得同政府打交道的社会运动者。其中,非政府组织“免债联盟”(FDC)在行政和立法方面提出了有效的措施,促使政府重新考虑了负债的问题。另一方面,社会运动同时也寻求与立法者建立联盟。例如,免债联盟就设法与有独立思想的立法者建立密切的联系,他们起草的议案、确立的法律成为债务政策改革进程的重要战场(Ariate,2006:15)。

对于不具备技术和组织能力的民间组织者来说,实现目标的一个途径就是与政府决策者,例如官僚、立法者以及对他们的要求能给予同情的当地政府官员们建立联盟。班贵特(Benguet)的蔬菜业的农民们就是这样,他们与当地政府官员合作以保护自己在市场中的生存地位免受全球化带来的廉价蔬菜进口贸易的重大冲击(Quinsaat,2005:50)。虽然有些立法者支持新自由主义,但是公众对某些政策的反对所带来的压力让他们不得不屈服。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政府对手机短信征税企图破产。该议案的提出引起大规模的反对运动,其中还包括海外菲律宾工人运动(OPW),这些工人都是出生于穷苦家庭,并且由于长途话费昂贵,手机短信成为他们与国内家人的主要联系方式(Molmisa,2005:177)。

同时,在身居要位的经济官僚中,也有对社会运动者抱有同情之心的人。考虑到国外进口的廉价服装会对国内市场造成重大冲击,来自贸工部(DTI)、劳工就业部(DOLE)、服装和纺织品出口委

员会(GTEN)的高级官员曾经给予服装工业,特别是纺织工人们以支持。

此外,社会运动的另外一个联盟就是商业团体成员和相关的商业部门之间的联盟。就像在军法时期一样,他们也反对侵犯他们的经济利润的自由主义政策。而在后军法时期,他们极力反对自由贸易政策,尤其是反对进口国外廉价商品的政策。这时,社会运动者与商业团体的联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2001年时就曾有这样一个联盟出现在猪肉业,社会运动者与菲律宾农业部紧急部门(ASAP)联合抵抗从国外进口低于国内市场价的廉价猪肉,以降低其对国内经营者的冲击(Ariate,2005:94)。

最后,社会运动者在国际上得到了那些同样怀疑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人们的大力支持。一个例子就是,在2003年初,通过国际纺织服装皮革工人联盟(ITGLFW)的努力,菲律宾召开了关于超越《多种纤维协定》的劳工论坛<sup>①</sup>。这次论坛的目的是:“评估《多种纤维协定》终止给服装工业发展带来的问题,让工人为限额终止做好准备”(Lopez Wui,2006:133)。这些联盟还一同举行了抗议行为——包括抗议游行、讨论会,还有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的方式进行的宣传战——以唤起广大群众对蹂躏大多数人生活的政府政策的觉悟。所有这些都是有效的反对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方法。

综上所述,菲律宾社会运动在民主时期对新自由主义思想进行挑战的经验表明:尽管没有昔日的军法政权那种高压政策,精英式民主和经济全球化还是为社会运动参与经济决策设置了种种障碍。然而,菲律宾社会中仍然存在着菲律宾社会运动组织者可利用的渠道,例如组成联盟,特别是和关键决策者联盟,以挑战当前造成菲律宾社会贫困和经济不平等问题继续恶化的主导性发展模式。

---

<sup>①</sup> “多纤协议”让菲律宾有优惠的出口配额,可是随着国家采纳世贸的规条而在2005年到期。

## 参 考 文 献

Ariate, Joel F. Jr. 2005. "Pork, Pigs, and Profit: State - Civil Society Relations in the Philippine Swine Industry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1995—2004" in Lopez Wui, Ma. Glenda S. and Teresa S. Encarnacion Tadem. Eds. *People, Profit and Politics: State - Civil Society Rel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Quezon City: Third World Studies Center,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Diliman. Published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UNDP), Manila, pp.73—110.

Ariate, Joel F. Jr. 2005. 2006. "More Than Debt Relief: Two decades of Freedom from Debt Coalition". Research on "Global Civil Society Movements: Dynamics in International Campaigns and National Implementation". Sponsored by the Philippine Research Team -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PRT - UNRISD), p. 1 - 26. Unpublished.

Bello, Walden, David Kinley and Elaine Elinson. 1982. *Development Debacle: The World Bank in the Philippines*. California: Institute for Food and Development Policy.

Brillantes, Alex Jr. B. 1997. State - civil society relations in policy - making: Civil society and the executive. In State - civil society relations in policy - making, eds. Marlon A. Wui and Ma. Glenda S. Lopez, 21 - 31. Quezon City: Third World Studies Center.

Lopez Wui, Ma. Glenda. 2005. "Engaging the State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The Case of Civil Society Groups in the Garment Industry" in *People, Profit and Politics: State - Civil Society Rel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pp.111—153.

Molmisa, Ronald. 2005. "State - Civil Society Interaction in a Liberalized Market: State - Civil Society Relations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同上, pp. 155—195.

Quinsaas, Sharon. 2005. "Mobilizing against Importation: State, Civil Society and the Benguet Vegetable Industry" 同上, pp. 19—71.

## 14 马来西亚：民主战士面临镇压

V. 赛瓦姆\*

马来西亚社会主义党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1998年的时候申请注册成为一个政党。虽然这次申请遭到拒绝，但是马来西亚社会主义党仍然在继续为其成为一个正式的政党而奋斗。赛瓦姆(Selvam)说：“我们已经将总理送上了法庭，我们正在等待上诉的听证会。”这限制了社会主义党的活动，赛瓦姆说，“只有注册过的政党才可以竞选”，“事实上，法律根本不允许我们开展工作，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一直在工作，而且还要继续工作。结社的自由是受宪法保障的，但在实际情况下却不是的”。

赛瓦姆解释到，“本党的工作是在工人、工会、年轻人、学生、城市开拓者、种植园工人以及农民之中开展的”。他还说，城市开拓者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住房问题，“他们被强制地赶出他们的家园，他们原来的房子都被拆了。他们也可见到替代性的住房，但是住房的支出比他们的收入还要高”。那些城市开拓者们一直在举行阻止强制搬家的抗议活动。现在有一个为他们提供住房的斗争。他们中的有些人已经举行了保留他们土地和房子的斗争。

---

\* V.赛瓦姆(V. Selvam)，马来西亚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人，马来西亚工会大会总理理事会成员，应社会主义党的邀请于2006年2月早些时候参观了墨尔本。《绿色左翼周刊》的克里斯·斯里(Chris Slee)与他交流了马来西亚当前的斗争以及马来西亚社会主义党的工作等问题，本文是作者谈话的主要内容的摘录。

赛瓦姆还描述了种植园工人的边缘化问题。“种植园产生于一百多年前的英国殖民时期。工人们已经在种植园里生活工作了三代甚至更长。尽管也有一个工会,但他们的报酬还是很低。种植园都位于很好的土地上,现在那些土地正在为了再次开发而出售。种植园工人正在被剥夺工作和住房。有时候,这些工人会得到一点失业的补偿,但是失去住房就没有补偿了。斗争主要就是为了得到新住房,同时也为了得到一个合理的补偿和遣散费。”这些斗争已经给工人们带来了一些胜利。

按照赛瓦姆的话来说,马来西亚的工会都相当软弱。“《工会法》没有给工会充分发挥作用的空间。工会首先要在工会注册部登记注册,然后还要从雇主那里得到认可证。”雇主通常会把这事儿推托到注册部那里,而这件事情也就到注册部为止了。很多年没有结果的认证使工人们十分沮丧。当期盼已久的认证通过的时候却已经太晚了。到那个时候,工会已经无力回天了,很多任务人早已离开了工作的地方。工会根本没有能力再进行有效的谈判了。如今还在工会中的工人已经不足10%了。“我们举行了运动要求政府废止工会法案并给予我们自动的认证。但是政府对此很不合作。”

马来西亚社会主义党也同非政府组织一起围绕着环境破坏举行了抗议活动。赛瓦姆指出东马来西亚的木材砍伐和水污染是两个最主要的问题。他还描述了马来西亚社会主义党在“正在因为快速发展而被逼迁徙的小农”问题上的工作。农业用地通常都是因为发展的原因而被逐渐蚕食,而农民却往往没有得到其他补偿用地来进行农业生产。

赛瓦姆认为马来西亚的学生受到很大的压制。《大学和大学学院法》不允许学生举行足够的活动。最近还出现了很多关于学生不能自由选举的抱怨。学生也不允许参加竞选运动,不能为自己支持的政党投票。学生们正在进行废除《大学和大学学院法》运



动,“不过我们并没有看到什么进步。学生们还是处于被压制的地位,而且当他们抗议的时候,他们就被勒令退学。”

尽管马来西亚社会主义党不是一个正式注册的政党,但是它也推举了四个候选人参加上一届选举,其中两个人在联邦选区,另外两个在州选区。“由于本党没有注册,我们不能以我们党的名义来提名候选人。尽管在竞选运动中我们也提出了我们的计划、原则和主张,但是我们不得不作为独立的候选人或者是列名其他政党中来参加竞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过借其他反对党的票竞选。在这种情况下,马来西亚社会主义党获得约 30% 票数。赛瓦姆说,尽管左翼受到压迫,社会主义党在进行群众行动方面已经取得了成功。“我们在动员和组织不同的社会部分方面成效相当显著。”

## 15 尼泊尔的政治经济形势和 社会运动的兴起\*

阿尔琼·卡基

本文旨在对尼泊尔业已出现的各种社会运动产生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背景进行分析,包括毛泽东主义运动,并对尼泊尔的政治经济形势与要求变革的激进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

尼泊尔人民同当权者的斗争贯穿了尼泊尔现代史的全过程。这些斗争包括:同拉纳家族长达一百零四年独裁统治的斗争(1846—1950),同所谓的多党派政治体制(1950—1959)、同无党派评议会(Panchayat)政府的斗争(1960—1990),同君主立宪制下的多党民主制政府的斗争(1990—2005),最后是同绝对君主制政府的斗争(2005—2006)。1990年的第一次人民民主运动,促使尼泊尔实行多党民主制,尽管发生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变革,但是尼泊尔国家政权的基本结构仍然没有改变。概言之,国家政权仍代表着尼泊尔土地贵族和政治精英的利益。政府始终扮演着维护国内安全的角色,以及对农民和下层阶级横征暴敛榨取剩余,以此来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和统治精英对政权的长期控制。

---

\* 本文摘编自阿尔琼·卡基博士的论文《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运动》以及他和大卫·赛登博士合编的著作《尼泊尔的人民战争:左派的视角》。

自1990年以来,新的政体和历届政府并没有给尼泊尔人民带来真正的民主和广泛的发展,因此,尼泊尔共产党(毛派)认为,只有通过革命的武装斗争,推翻和取代腐败和无能的统治阶级,才能为建立代表尼泊尔工人和农民利益的人民民主共和国奠定基础。于是,他们在1996年2月发动了人民战争。政府和政治党派的双重失败,是导致激进的社会运动从社会底层逐步地发展起来的真正原因。

尼泊尔社会基本的经济基础,是81%的劳动力从事农业,接近9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尼泊尔农业中的生产力仍旧是落后和原始的,在土地、人力、农畜以及原始设备上的投资,几乎占到全部投资的99%,而在现代生产资料上的投资仅占1%。

尼泊尔的土地生产关系是十分复杂的,大体上可划分为农民的、半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由于尼泊尔人口中拥有土地、牲畜和农业工具等生产资料的农民占多数,农民的生产方式就成为解读尼泊尔阶级关系和政治经济形势的关键。尼泊尔的农民主要包括,拥有小块土地、自给自足、主要依靠家庭或在部落内进行劳动交换的自耕农、佃户和佃户兼自耕农。有时,他们也临时雇佣或长期雇佣劳动力,甚至与各种职业阶层,比如铁匠、裁缝,有时也包括鞋匠等,保持着庇护者—顾客关系。而完全无地的穷人则主要依靠有偿劳动维持生计,尽管租佃和共同耕作分成,有时也是他们谋生的手段。

半封建的关系依然在低度发展的尼泊尔农业和国家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几乎三分之二的佃户仍然在分成制的基础上耕种土地,而其余的人则要以现金或实物的形式交纳固定租金,或以其他方式的土地使用协议作为租种土地的条件。大多数佃户被迫在大地主的土地上耕作,剩余产品无法像资本主义生产那样进行积累和再投资,他们的所得仅能勉强糊口。而且,那些有机会掌握一点土地的佃户也因为高利贷和依附的劳动条件而不得不依附于

地主。

尼泊尔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建立在对临时的和完全雇佣劳动的剩余价值进行剥削的基础上的。然而,参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为市场进行生产的人,只占少数。

大约8%的尼泊尔人完全没有土地,而那些拥有土地的人中,贫苦农民虽然占到了65%,但他们拥有的土地仅占土地总量的10%。1959年“比尔塔”(Birta)制度的废除(“比尔塔”制度是昔日国王出于政治、宗教或其他考虑而赐予某一机构或个人土地的一种土地占有形式——笔者注)和1964年颁布的土地改革法案,虽然减少了土地集中的状况,但是,一些不居住于产权所在地的地主仍然秘密地持有大量土地。在特莱(Terai)平原或其他平原地区,每个大地主都拥有超过十公顷的土地,这导致了上述地区一半以上的土地都为他们所控制。

上述分析表明,尼泊尔农村地区社会运动兴起的主要推动力,是一些重要但不占压倒多数的农村群体,他们缺乏土地所有权和有保障的土地权益。正是这些群体构成了各种社会运动的核心。虽然控制大量土地的人只是极少数,但由于农村参与社会运动的人数也不占绝对多数,这就使得他们的动员工作面临着特殊的挑战。

甚至在1990年人民民主运动之后,贵族阶级在各个方面仍继续操纵着国家政治和政府事务,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还占据着警察、军队、官僚机构、司法部门的重要职位,并且控制着包括贸易、工业和旅游业等几乎所有经济机会。新的政治结构未能确保权力和资源,在诸如无地和少地农民、贱民或低种姓居民、妇女、少数民族和其他被系统地排斥和边缘化的社会阶层中进行公平的分配。如前面所述,毛派成功地利用了人们的这种不满情绪,发动了人民战争。

导致尼泊尔危机四伏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尼泊尔社会的异常发

展:即封建的、买办的和官僚的资产阶级控制下的国家机器对人民进行剥削和压迫,而人民群众则为此进行不断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普遍认为,整个国家机器是腐朽的,普通百姓获得公平、公正和可持续的生活保障的希望十分渺茫。除了国家机器外,国内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也是十分活跃的。成功的非政府组织在实现权力下放到社区、支持社会底层人民的斗争,以及反对政府对农村社会运动的镇压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1990年之前,评议会制度禁止独立的和自治的非政府组织的存在,然而,在多党民主制恢复之后,国内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开始有了大幅度的增长。

国际非政府组织、联合国机构和捐助国的作用,是以实施无效的和不可持续发展的计划为特点的。这是因为它们在实施这些计划的过程中,并没有认识到造成尼泊尔长期贫困和不公正的真正原因。此外,国际金融机构不仅没有实现它们所宣称的发展目标,反而加剧了国家主导的腐败、债务和不平等。虽然如此,由于尼泊尔严重依赖于外国援助,甚至要用它来满足每年的基本开支,所以,外国援助仍然构成了国家摆脱低收入、低储蓄率和低投资困境的一个重要手段。

总体而言,印度对尼泊尔的政治经济形势有着重大影响,因此,它的关键作用是不能被忽略的。例如,拉纳家族的独裁政权是以英印政府为后台的,1950年尼泊尔大会党领导的反对拉纳政权的运动是由已独立的印度支持的,1990年、2005年、2006年的政治变革也是受到印度的主要政治势力影响的,甚至包括毛主义者的斗争在内的不同的社会运动也是以印度作为庇护所的。印度的影响力不仅体现在政治方面,而且,由于在尼泊尔的外国总投资中占有36%—40%的份额,它在金融和贸易方面也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印度不仅在确定尼泊尔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议程方面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而且在决定从社会底层发起的各种运动的成败方

面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回顾 2006 年的 4 月起义,尼泊尔经历了从社会底层发起的第二次人民运动,这次运动引发了不寻常的社会运动,这包括公民社会组织的兴起,毛派和民主政治势力联合起来废除了独裁的皇室政权,结束了历时十年的人民战争。而且,它还再一次唤起了尼泊尔人民大众实现真正变革的希望。

2007 年 4 月 1 日过渡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毛派加入到主流政治中来,从那时起人民又对新的政治联盟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然而,新政治联盟的拙劣表现使得民众再次失望,这又导致了各种新的社会运动从社会底层兴起。由于和平进程从一开始就是自上而下推动的,并且是以资本为中心的,这个根本性的缺陷使得自下而上的和平建设没有任何发展的空间。那些被系统性的排斥和边缘化的尼泊尔普通百姓群体,现在已经开始以各种社会运动的形式组织起来,他们的要求是建立民主共和国,一个没有种姓、阶级、性别、民族、宗教以及地区歧视的包容性的和良性发展的民主国家。因此,即将到来的制宪议会选举是重建尼泊尔国家的一个历史性机遇。新宪法的制定将为共和制的尼泊尔绘制蓝图,这也是对当前新政府的一个严峻的考验。而在尼泊尔社会底层发起的社会运动将来是否还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仍有待于观察。

(译者:袁群,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 16 走向集中的斯里兰卡抗争运动

祖狄·L·费南多

在后殖民地时代的非西方国家中，“民族国家”的模式被人们看做一种保护解除殖民国家主权的理想选择。然而，民族国家的中央集权体制（其本身是殖民的产物）以及帝国主义的国际金融机构（以消除贫困和促进发展为名）的干预，加重了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一方面，主导的民族国家模式导致长期的种族宗教冲突，并造成了数以百万计的难民；另一方面，国际金融机构的发展模式也造成了成千上万的生活在贫困线下的穷人。斯里兰卡有一千二百万泰米尔穆斯林难民（尽管独立五十年的民族国家声称要保证在统一的国家内所有群体的权利），同时还有二百万家庭生活贫困线以下（尽管世界银行五十年来一直在进行干预），而这些数字就是危机状况最鲜明的实例<sup>①</sup>。

而更深层的问题是，这个由僧伽罗语（Sinhala）主导的国家正在经历的政治危机（泰米尔争取自主和自治的运动）是与其经济危机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危机首先根植于对于殖民经济结构的高度依赖，而殖民经济结构则建基于商业资本以及国际金融组织的连续不断的结构调整计划。

---

<sup>①</sup> 斯里兰卡的冲突造成六万八千人死亡，整个北部和东部地区受害，五万名儿童成为孤儿，四万妇女成为寡妇，超过二百万株扇叶树头榈（palmyra）被毁灭。

在独立后的斯里兰卡,大多数政治系统寻求以“厚此薄彼”的歧视性机制,来补偿不满的社会阶层日趋增加的对社会经济的怨恨。在这些系统中,在人口中占多数是的“民族宗教主导议会”。斯里兰卡独立以后,政府在东北部泰米尔地区为僧伽罗农民实施了再定居计划,因此避免了没有土地的僧伽罗农民对那些从殖民经济中谋取利益的地主的反抗暴动。《僧伽罗语唯一法案》使得多数人的语言成为这个国家唯一的官方语言。这为有教育背景的僧伽罗语中产阶级保留了进入国家和公共部门工作的空间,而同时却剥夺了讲泰米尔语的雇员的工作机会。政府在尝试补偿僧伽罗农村青年对高等教育机会方面的不满的同时,却通过标准化计划减少了泰米尔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配额。

由于开始于1977年的市场经济的冲击持续加大,声势浩大的私有化过程在“还给人们应得的经济权”的口号下发生了。结果,斯里兰卡20世纪80年代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八万公共和国家部门职员的下岗,此后他们的罢工,造成六万人丧生的对农村中产阶级起义的严酷镇压,以及最终对整个东北部泰米尔地区的军事化管理。这个时期的背景是:在1983年反泰米尔人暴乱以后,泰米尔人争取自主和自治运动进入到了军事斗争的阶段。这些暴乱夺走了三千人的生命,导致五十万泰米尔人流离失所。政府遵从国际金融组织的指示,削减了农业补贴、福利开支、医疗和教育预算,并利用宽松的税收和劳务法促进国外投资,向大众发誓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完整的民族国家,决不向泰米尔人自治的要求妥协。于是,国防预算和经济自由化的比率同时增加。

在1971年和1979—1989年间两次发动反对殖民和新殖民经济政策起义的“人民解放阵线”(JVP),继续坚持“单一的国家”的观念,尽管该观念中存在着对少数民族,特别是泰米尔人的歧视。当1994年初人民解放阵线开始参与选举政治时,他们在原则上仍



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sup>①</sup>，但是却把保护整体的单一民族国家免受“泰米尔分裂主义的威胁”的需要放在了首要地位。由人民解放阵线领导的僧伽罗中产阶级运动，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经济权利与泰米尔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治权利之间的联系。受到国际金融组织提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威胁而感到不满的各社会阶层，却成为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温床，后者构想着一个僧伽罗佛教的单一民族国家。在过去的十年中，由佛教僧人领导的“僧伽罗僧侣党”（JHU）的出现就清楚地反映了这一事实。

到2001年，在泰米尔地区对斯里兰卡政府不断升级的军事行动，以及由领导泰米尔运动的“泰米尔伊兰姆猛虎解放组织”（Liberation Tigers of Tamil Eelam）进行的反击，动摇了这个日益依赖国外投资的国家的经济。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斯里兰卡政府和泰米尔伊兰姆猛虎解放组织签订了停火协议（CFA）。依据和平谈判的过程，捐助国承诺给予总额达四十五亿美元的资金，用于斯里兰卡经济的恢复和重建。“和平”被附加在“发展”之后，关于发展模式和权力移交的问题都没有得到深入的讨论。

由于来自人民解放阵线的压力，中央集权的国家结构仍然原封未动。同时，由于来自捐助国的压力，新自由主义政策依然得到进一步的推行。由于JVP和JHU两党采取的法律行动，为重建海啸灾区而在斯里兰卡政府和泰米尔伊兰姆猛虎解放组织之间建立的联合人道主义机构被迫停止运作。这个机构本来是可以减少冲突并为两个民族的共同联盟铺平道路的。但是，由于美国政府在华盛顿召开了除泰米尔伊兰姆猛虎解放组织之外的斯里兰卡捐助国会议，和平谈判由此停止。

---

<sup>①</sup> 1971年的叛变明确反映了国家建设者无法克服不适应国家需要的殖民经济和教育系统。1987—1989年的叛变则反映了经济自由化以及经济结构调整所导致的社会经济不稳定。这种经济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外衣下，实际上是新品种的殖民主义。

在2005年,由人民解放阵线和僧伽罗僧侣党支持的“民族主义联盟”的胜利,曾经被认为是人民授予了政府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权力。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也被看做是取消停火协议的命令,并因此启动了一个针对民族争端的军国主义解决方案。在领导民族主义联盟的总统制下的政府,到现在为止没能平息工人阶级、农民和渔民的不满。给他们提高补助和工资的承诺,也因违反了国际金融组织设定的条件没有能够履行。取而代之的却是,在人民解放阵线和僧伽罗僧侣党的压力下,政府加强了在泰米尔地区的军事行动,在八个月内造成了一千多平民死亡和二十万人流离失所。在三十年战争中,总计六万八千人死亡,一百二十万人成为难民。由于捐赠国家对两个政党施加压力,要求双方坚持履行停战协定并开始和平谈判,人民解放阵线和僧伽罗僧侣党威胁,如果对泰米尔有任何让步的话,它们将取消对政府的支持。

正如科伦坡大学政治科学系主任乌彦德瓦(Jayadeva Uyangoda)所说,由泰米尔伊兰姆猛虎解放组织领导的泰米尔运动建立了一个泰米尔地区的“小国家”,这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联邦制系统模式。

斯里兰卡统治集团发现,在他们之间关于对泰米尔地区的任何一点权力的转移都很难达成共识。美国、欧盟、挪威和日本是捐赠国委员会和监督斯里兰卡和平进程的国际金融机构的共同主席。欧盟、挪威和日本的加入是为了其在该岛的经济利益,而美国则是出于其在东南亚军事战略的考虑<sup>①</sup>。表面上来看,斯里兰卡的民族主义联盟政府选择的是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但是,事实并

<sup>①</sup> 世界七条主要海运线里,有四条经过印度洋。世界上第三大自然港(Trincomalee)位于斯里兰卡,该海港所在地区位于北部和东部泰米尔区。关于斯里兰卡在目前全球“能源政治”和伊拉克战争背景下的日益重要的地缘政治位置的分析,参阅科伦坡 Hiru 组和 Dharmaratnam Sivaram 在科伦坡《每日镜报》的文章,以及 [www.tamilnet.com](http://www.tamilnet.com)。

不是如此。民族主义联盟和之前的政府一样在支持全球反恐战争的同时,在对抗泰米尔地区的战争中也依赖于美国的技术支持。不仅如此,它还继续通过将罢工妖魔化为“比恐怖袭击还要恶劣”的行动,来镇压工人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抵抗。

当关于斯里兰卡暴力升级报告日益增多的时候,世界进步力量却并没有认识到来自僧伽罗工人阶级、渔民和农民,以及泰米尔和穆斯林团体的新一轮抵抗运动的出现。泰米尔和穆斯林人反对斯里兰卡军方侵占土地(大部分是农民的稻田和渔民的海滩),并制造诱拐、失踪和杀戮事件,示威在泰米尔地区持续高涨。与此同时,农民组织、渔业工会的民众再次对国家主义的政府(该政府寻求对民族冲突采取军事解决的方式)以及国际金融机构大失所望。国家部门工会都开始了抗议。政府的群众基础受到了动摇。这些运动酝酿了巨大的潜力,以形成更广阔的联盟,反对新自由主义政策和以僧伽罗为多数(Sinhala majoritarian)的国家体制。

港口和铁路工人发动的反对私有化的罢工曾经遭到了民族主义联合政府的镇压,并被诬蔑为“比恐怖袭击还要恶劣”,从而受到了政府借助法律力量的制止。但是,工会却没有停止反抗,也没有对政府向泰米尔和穆斯林发动战争的意图给予任何支持。相反的是,他们形成了一个新的、更加广泛的反抗政府联盟,这个联盟争取到了五十多个工会的参与。据说这是在该国历史上最大的工会行动之一。反对派中有超过五个政党以关闭所有科伦坡商业机构的威胁,来抗议政府对泰米尔人的绑架。而“全锡兰渔业工会”则已经有能力发动海岸地区的群众,以要求对油价上涨提供补偿。在抗议活动中,他们还突出强调,要维护在发生战争地区的泰米尔人和穆斯林人的权利。

“全国农民大会”和“全国土地和农业改革运动”(MONLAR)成功地策划了与世界银行官员的会面,并通过展示经济结构调整是如何导致贫困恶化的状况,明确表达他们反对这些措施的态度。

他们还综合了泰米尔运动的要求,强调土地、水和生存的权利。帝国主义的全球霸权及其金融机构的行动,以及那些捍卫斯里兰卡单一经济结构的作法,已经带来了越来越多的贫穷、暴力和冲突。很明显,他们的政策确实没能带来和平与发展。

斯里兰卡进步运动要求将不同社会部门中出现的抵抗活动联合起来,从而组成一个共同的联盟。现在的政治经济危机造就了一个历史性的机会,使新自由主义政策和由多数人主宰的民族国家的受害者之间有可能形成共同的联盟。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其他进步社会运动的责任是对这些运动提供明确的支持和帮助,并利用国际平台要求终结斯里兰卡政府的压迫。

## 17 印度的经济改革与贫民的回应

阿肖克·米特拉、M·A·乌曼、拉米·梅菲

独立之初,印度曾经尝试采取自主的经济发展模式。但是,从1990年代开始,印度进行经济改革,目标是向外资开放市场,将所有公共部门私有化,并将银行与金融部门进一步自由化,简言之,就是要更大规模地融入世界经济。这些改革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成果,却反而凸现了贫穷与地域之间的不平等,导致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整体下降,特别是社会上出现了最赤贫的群体“贱民”(dalits)。独立之后,印度经济曾经保持持续增长,贫穷大幅度减少,民主化进程得到扩展。可是,在加入全球市场之后,这些成果却被摧毁了。对此,政府撒手不管,社会运动(工会、非政府组织、基层团体)则重新组织起来。他们改变斗争策略,发展新的协同合作,深化另类创新的实践经验,以抗衡新自由主义政策对赤贫人民所造成的灾难及后遗症。这些经验预示了一场彻底的印度社会变革。

### — 世界体系中的印度

在印度社会的脉络中,全球化错综复杂地与独立前的种种矛盾关联在一起。从18世纪中期开始,英国对印度实施了残酷的、近两百年的殖民统治,大肆掠夺印度的天然资源,又强制推行不平等贸易,大举倾销英国的工业产品。印度争取自由的斗争致力于

扭转局面,一旦胜利便推行自给自足的经济发展模式,同时,消除社会阶级的不平等。独立之后,头两个五年计划中,印度对外国势力都十分警惕,力求在最少的外来援助之下加速经济增长。任何外资,特别是私人外资,均被视为危险。直到1980年代初,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高产量的种子取得成功,导致强大的地主阶层(kulak)发展起来。执政党,即国大党(the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被上层乡绅、刚出现的工业阶级与商界所掌控。由于农村还很落后,到处是文盲,所以执政党仍然自称获得了广大贫穷农民的支持。不过,因为深受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影响,国大党心理上开始逐渐忘记独立之前的那种抗争的感情,而养尊处优的中上层阶级也都开始厌倦反帝国主义的情感,连在越南战争之初那种反抗美国的情绪也渐渐淡化了。

自从1985年甘地夫人被刺后,她的儿子拉吉夫·甘地接任总理。他扭转了整个局面,外来势力介入印度经济和政治越来越明显。社会上人欲横流,追逐进口的奢侈消费品和科技产品。还出现了如下舆论压力:放弃自独立建国后执行的规管体系,包括对外汇与进口的管制,对垄断与大工业公司活动的限制,以及对外资流入的管制。由于自由进口奢侈品、机械、前沿技术等,对外贸易的平衡不可避免地难以维持。

之前,进出口贸易只占印度国民收入的5%,但在拉吉夫政权的自由主义政策下,进口攀升至国民收入的9%到10%,而出口则维持在5%左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一包包金融“棒棒糖”,换取了印度政府巨大的让步,宣告印度进入了全球化。1994年印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贸自由化程度十分显著。

这些经济发展产生于特定的政治背景。1991年初,政府正式接受全球化,执政党仍是国大党。国大党领袖相信全盘经济自由化会直接引进大量的外资,大约一百亿元,而到了第二阶段,便会达到中国的水平。其实,他们永远不明白,中国是因为经济高速增

长才吸引了外资,而不是因为外资的涌入导致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与此同时,印度保守主义右翼政党印度人民党(BJP, the Bharatiya Janata Party)成为主要反对党。该党获得工商界大力支持,都拥护偏袒私营部门的全球化。可是,该党对向外界作巨大让步的态度却有所保留,所以阻碍世界贸易组织条约,包括印度专利法之建议修正案,该专利法从本质上迎合《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马拉喀什协议》(*Marrakech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人民党与很多所谓的“伊斯兰教政党”,如“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s)十分相似。他们拥护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并且将本土产生的、深刻的矛盾和冲突(例如全球经济资本扩张与人民利益的对立)转移为“文化”问题。事实上,国大党和人民党就像前阿拉伯各个政党与伊斯兰教组织那样,在社会重要领域中争权夺利。

印度国会中最主要的左翼政党是印度共产党(马克思派),他们当然强烈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其他新政党像社会主义党(The Samajwadi)和全国人民党(The Rashtriya Janata)也反对全球化,但是他们现在力量主要集中在基层,而非全国最高议会机构。前苏联的解体对印度左派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所有第三世界国家都趋向保守,所以印度政府相信,要生存就要站在西方国家的一边——这是现实政治。

让我们回顾一下全球化对印度经济造成的实际影响。全球化并没有促进经济增长,1980、1990年代跟1950年代之后几十年的发展速度是差不多的。问题的关键而且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就业率的增长,农村就业率年均复合增长是0.67%,城市就业率年增长速度是1.34%,但是,人口年均增长率却高达1.7%。在过去的十年中,印度重要部门的经济非但没有增长反而下降。同时,就业率也急速下跌。被寄予厚望的外资也没有好转。因此,我们确实要

质疑“华盛顿共识”所开的灵丹妙药是否有效。实际上,如果富裕阶层坚持继续过着奢侈的高消费的生活,而国防部门继续坚持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军费开支神圣不可侵犯,那么,印度将会陷入绝境。

## 二 内部民主与贱民议题

印度经过漫长的斗争,获得独立已超过了半个世纪。人们期望能够改变贫穷、朝不保夕的生活,解决政治经济不稳定等基本问题,而广大穷苦大众更是对此寄予厚望。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追求没有种姓和阶级差别的社会是终极目标。后来在宪法中,也清楚地列明了这项条款。民主能够在印度保存下来是很了不起的事。很多人认为,由于印度社会有多族群、多宗教、多语言、多文化的特性,民主不可能植根。确实,印度社会存在很多分歧、隔阂,民主仍然很脆弱,贪污腐败随处可见,罪案频发,民不聊生。下议院(The Lok Sabha)依然被乡绅与商人所把持。国家议会(The State Assemblies)代表中产阶级的利益,而非广大贫苦人民。

回顾过去五十年,印度社会最惊人的发展是出现了庞大的中产阶级,其人数现在已超过两亿!据统计,全国人口中20%的上层拥有全国60%的农田,并获得50%的收入。他们在政治上有影响力,在社会上又有地位。他们不完全世俗,很多人受到印度教(Hindutva)主流文化的影响。这种社会结构状况解释了为什么宣称平均土地的土地改革,忽略了无地农村劳工——大部分是不可接触种姓(Scheduled Castes)或者不可接触部落民(Scheduled Tribes)<sup>①</sup>,这不仅指贱民,还包括小农和不同种类的农业工人。而

<sup>①</sup> 在印度,不可接触阶级(Scheduled Castes),包括传统的贱民,又称被压迫者(Dalit);不可接触部落(Scheduled Tribes),指居住在无人烟罕至的森林或山地,不接受种姓制度的土著。



农业上,所谓“绿色革命”的好处——在技术上改良种子、灌溉、肥料等——也没有惠及这些群体。

尽管阶级剥削和种姓压迫继续存在,在印度农村反抗的力量也日益强大。像南方的喀拉拉邦地区,左翼政党和进步的社会改革运动已经改变了封建的生产关系。最近,令人感到鼓舞的是,被压迫的群体——特别是贱民——逐渐觉醒起来要争取公民与民主的权利。

变革中的社会政治场景的另一个重要特色是“落后阶级”(backward classes)运动的兴起。该运动要求低下阶层应该在公营部门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接受更多的专业培训,以及享有更大的政治权利等。1989年执政党人民党政府决议立法接纳“曼德尔委员会”(Mandel Commission)的建议,将政府公务职位预留给“社会上和教育上落后的阶级”。在像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和卡那塔卡邦(Karnataka)等地区,已经在这些方面取得了进步。

此外,第七十三届和第七十四届的宪制修改包含了一项令人鼓舞的条款,即允许邦政府立法,在乡村和市级机构预留职位给“落后阶级”,并且规定必须预留给不可接触种姓和部落。因此,这些“落后阶级”现在可以拥有更多的社会流动和经济机会,并且有可能达到更高阶级的位置。但是,这并不是所有贱民都能享受到的,贱民几百年以来依然承受着阶级剥削和种姓压迫的双重奴役。

### 三 经济发展与贫穷问题

印度经济增长飞跃,现在粮食出口有二亿吨,常备储粮是五千万吨。同时,经济机构和公营部门已经建立了强大的多元化工业基础。但问题是,这能够消灭贫穷与减少社会不公平吗?

前三个五年计划公开宣称,解决庞大的贫穷问题只能依靠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策略,推行此策略时,以彻底的政策为背景,并

建基于体制改革。在目前的结构调整政策之下,这种策略仍然继续着。可是,强调“反贫穷计划”是为了获得社会底层的选票。尽管措辞动人,消灭贫穷方面的成效却很一般。所有社会指标均显示,印度落后于世界其他地方,超过四亿四千万的人,日收入不到一美元。印度从1991年追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制定的“稳定与结构调整计划”而推行经济改革,期望市场力量会促进经济的增长,并期待获得的利益会“点滴地流到社会最底层”。可是,其实际效果却有待检验。

### (一) 贫穷与失业之趋势

印度的贫穷通常以人均购买力作为计算单位。“贫穷”的定义为,在农村每人平均热量摄取少于两千四百卡路里,城市少于两千一百卡路里。全国抽样调查(National Sample Survey)从1974年开始至1999—2000年度的全国农村与城市家庭开支调查显示,贫穷问题在1989—1990年是得到了明显缓解的,但是,开始推行IMF和世银的结构调整计划之后,却变得严重了。不仅如此,几份研究报告都指出,最近临时工与短期工的数目突然急升。在印度,几乎91%的就业都属于非正式部门,例如自雇、农业工人、临时工等。1998—1999年,十四个邦的非技术农业工人中,有七个邦工资正在下跌(2000年政府的经济调查)。这种情况令人十分担忧,因为从1958到1997年,印度各个邦中,贫穷与不公平所造成的地区差距一直在扩大。

### (二) 对人类发展(human development)的影响

婴儿死亡率(IMR)是衡量人民身心健康状态的重要指标。根据注册处报告,在印度的二十二个邦中,婴儿夭折率从1998年开始上升。社区人民的健康和粮食保障与营养紧密相关。根据第五十届全国抽样调查中的一份详细的开支考察报告显示,在农村,三

分之二的人口平均摄取少于两千四百卡路里,而最贫穷的人,甚至少于一千三百二十七卡路里。城市的情况即使最近几年有所改善,但也好不了多少。

而粮食保障主要和购买力相关。经济改革之后,在公共分配制度下,粮食价格上涨,但粮食的总量却在减少。根据记录,常备储量增加至五千万吨,但是,最新的国会粮食公共分配制度与消费委员会的报告显示,超过两百五十万吨粮食由于储存不当而被迫销毁。可想而知,在这样有上百万人民挨饿的国家里,其反贫穷计划究竟有多少成效。有一点应该注意,改革期间,中央与邦政府的教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整体下降,从1993—1994年间的2.74%减少到1997—1998年间的2.49%,而到1998—1999年间则仅仅升至2.75%。

### (三)金融部门改革与穷人

在新的分配制度下,过去金融中介机构要为社会服务的金融管理原则被抛弃了。利率几乎不受管制,资助贷款大大减少,限制私人银行进入与扩张的障碍则被扫除。尽管如此,银行的信贷/存款比率由1991年3月的65.2%下降至1999年9月的49.7%。不仅如此,信贷/存款利率城乡之间的差距也很大。因为银行分支服务减少(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前动员农村储蓄和推动农村小额贷款),加上小城镇和大城市中心的商业银行的增加,地域的差距无可避免地上升。

随着1969年银行国有化,规定商业银行将40%的存款借给所谓的优先借贷者,即小额贷款者和社会最贫穷的人。但是,透过一连串的金融改革,例如重新界定优先次序与种类等,新政策放弃了扶助穷人的目标。不难发现,“反贫穷、贷款兼资助计划”(即综合农村发展计划,IRDP)的受益者在1993—1994年间曾高达两百五十四万,但在1998—1999年间却跌至一百二十六万人。

银行放弃多种扶助弱势社群的措施,按逻辑推算,结果自然是小额贷款者的存款量(两万五千卢比以下)减少了。这类小额存款由1990年3月的95%下降至1998年3月的87%。在同一时期,他们的未偿信贷比例下降得更急剧,由23.1%急跌至12.5%。原因是印度金融市场越来越融入全球金融体系,换句话说,即国际金融机构对印度金融市场的影响力日渐强大。

#### (四)对受压迫的贱民的影响

贱民有二亿三千万人,其中一亿六千万人是不可接触种姓,其余是不可接触部落民。贱民占全国人口23%。

贱民比其他社会群体,更深地体验着贫穷、不平等和失业的痛苦。这就是印度宪法要保障他们的利益,特别是在教育机构预留职位给他们的原因。但是,随着教育部门私有化,这些措施日渐失效,私人部门没有职责聘任贱民。在私有化过程中,贱民失却了那些哪怕是只要较低学历的工作。在公营部门,贱民的受雇用率不断下降,在1991年是1.52%,1996年开始便降低为负数(数目实际减少了)。

受到教育、卫生商业化影响最大的社会群体莫过于贱民,贱民被踢出了市场之外。改革的财政修正政策方针是削减公共开支,即削减教育、卫生、社会福利、少数族群与部落的援助计划、反贫穷计划等,贱民承受了这些措施的苦果。首当其冲的是,这些弱势群体的粮食保障受到影响,官方的粮食定价高,公共分配制度下的资助又减少,使得粮食的价格不断上涨。

## 四 政治敌对与反抗

同时,印度的政治局面已经改变。在最近的国会选举中,印度国大党已经退居第二位,印度人民党自从1998年开始掌权。印度

人民党毫不犹豫地宣誓拥护华盛顿共识,而且自豪地自诩为“第二代改革”之旗手。他们现在主要的力量用在捍卫“专利法”的修改方案,该方案得以通过是靠国大党的帮助。国会之内,只有两个共产党和地区政党——如社会党(Samajwadi Party)和全国人民党(Rashtriya Janata Dal)——坚持反对全球化政策。那些地区政党特别担忧开放政策会给农民和小工业工人带来苦果。国会之外,少数毛派团体积极组织反全球化的抗争。最近,国大党似乎正在深刻反省,害怕那些缩减投资与消除国有化的计划迅速发展,从而导致大量失业,人心惶惶,那样便会丧失选票。这就是国大党在全球化议题的立场上渐渐靠近左派政党的原因。但是话说回来,如果国大党能够夺回政权,大概仍然会全面支持全球化。

不过,抗争依然以不同的方向和形式持续下去。有趣的例子是,执政党印度人民党的非官方的智囊团(SJM, Swadshi Jagaran Manch)坚定不移地相信自给自足的发展模式,鲜明反对全球化。但是,由于政客对其施压,SJM的声音虽未被消音,但听起来含糊不清。另外,不可不提的是,与左翼政党有关的文化团体在其活动中,非常积极地反对危害国家荣誉与利益的全球化。几个科技团体也反抗全球化的浪潮,例如新德里的尼赫鲁大学经济研究与规划中心,以及加尔各答的独立经济学家和科学家。

有一批非政府组织也制造舆论,反对那种过分急于加入全球金融经济的门户开放政策。设于新德里的印度科学工人联合会,与加尔各答的科技人员联合会(FOSET)表现最为活跃。同时,新德里的“基因运动”竭力提醒公众注意转基因食物的害处和秘密出口微生物。另外,科技与生态研究基金会(以新德里为基地,分支设在班加罗尔)则不断警告公众,未在食品安全方面采取预防措施的转基因技术,是危害食品和农业的。

最有希望的抗争来自工人阶级。政府和雇主常常以关闭工厂和裁员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但工人却只能通过罢工和反抗来保护

自己。的确,全球化及其引发大规模企业倒闭,使劳工运动处于低谷。尽管如此,反对私有化、缩减投资与过度吸引外资的罢工,仍然在众多行业中频频爆发,例如银行、保险、电讯、能源、铁路、石油化工、民航等等,这些行动既分散又短暂,但是却点燃了民众的希望。

此外,还有其他抗争。起初,农民很欢迎全球化政策与自由国际贸易,以为可以出口更多的农产品。但直到最近,农民痛定思痛,才认清这是妄想。他们原来期待以高价把农产品卖到其他国家,却发现结果是海外的廉价农产品倾销到印度国内市场。同样,工业资本家刚开始也被自由化的措辞蒙蔽,赞扬消除工业与交易限制和价格管制的措施,现在却非常担忧进口比如汽车等工业品,严重影响他们的产品在国内的销售。这就是工业出口增长率下降的主要原因。现在,开始有包括主要的工业家团体,即印度工商业联合会(FICCI)等团体开始抗议进口产品。

时机正成熟,全印度纷纷响起反抗全球化政策的呼声,可惜那种有系统的大型抗议活动在组织结构上仍然有缺点。不同的组织已经展开抗议行动与群众活动,但是他们之间欠缺真正的协调,常常未能采取统一的策略。因此,有必要将各种敌对与异见力量团结起来,然后,进一步将全国抗议活动转化为国际反全球化运动。

## 五 底层的回应与抗争

由此可见,印度宪法追求的平等、社会公正仍未充分实现。那么,民间社会特别是志愿者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有什么样的反应?他们各有不同的规模、目标、操作方式、功能形式、支持来源等等,广义来说,大体分为两种:一种关注慈善与社会福利的议题,另一种处理发展问题,着重社会公正、人民参与等等。后者又包括几种社会运动,比如妇女运动、环保运动、农民抗争等,以下主要介绍

两个例子。

### (一)自雇妇女协会(SEWA)

众所周知,在印度尤其是农村的最贫穷的人口,确实需要既可申请得到利率又能负担的信贷。印度抛弃了再分配政策,采取有利于市场发展的范型,在这种社会经济及政治背景之下,任何促进自雇和小额信贷的努力,对于改善贫困者的生活,都会有很大的贡献。自雇妇女协会(SEWA)的工作在这方面是成功的范例。

SEWA 成员包括所有非正式部门工人,从小贩到手推车夫都有。1972年,SEWA 成立于古吉拉特邦(Gujarat)的阿默特巴德(Ahmadabad),刚开始规模一般,现在妇女成员已超过二十五万人,遍布全国。SEWA 通过“斗争”与“发展”的双重策略,组织妇女,帮助她们进入主流社会。“斗争策略”指贫困妇女要与数不尽的制约拼搏,而“发展策略”指就业,有收入,有食物和营养,有医疗、财产和住房等等。SEWA 筹集非常微薄的储蓄,把存款借给成员,用于生产或者购买生活消费品。成员很快还款,加上利率合理,保证了存款可循环借用,以更行之有效。由此可见,SEWA 致力于穷人自己团结起来,集结力量,自力更生,战胜贫穷。

卡拉拉邦政府推广这种小额金融业务。一方面,公共部门的银行,例如国家农业与发展银行(NABARD)注资商业银行,将借款给予推广小额金融业务的机构。另一方面,非政府组织像米索安置与发展机构(Mysore Resettlement and Development Agency)及专业援助发展行动(PRADAN)动员市民存款,以提供借贷。的确,印度解决贫困最成功的例子之一,就是由自雇妇女协会组织的小额金融业务。

### (二)反纳玛达水库运动(The Narmada Bachao Andolan)

从领导的素质和为穷人的决心来看,没有一个抗争运动比得

上反纳玛达水库运动。萨达尔萨罗瓦调水工程(Sardar Sarovar Project)要在古吉拉特邦(Gujarat)纳玛达河谷(Narmada Valley)兴建水库,这是世界上最具野心的发展计划之一。该计划的目标是,在长达七万五千米的运河上兴建一座座水库。从一开始,反纳玛达水库运动就开宗明义,反对兴建水库,保障被迫迁徙的人民,特别是传统的边缘者,例如部落民和不可接触种姓的权利。根据世界水坝委员会的统计,过去五十年,印度由于兴建大型水库,导致大概五千六百万人被迫离开家乡。从任何标准来看,这数字都是极为惊人的。虽然受影响的人民起来反抗,也取得了成绩,但是强迫迁移还在进行着。

反抗运动中遇到最大的挫折是,印度最高法院2000年10月18日取消了禁建水坝的法令。对最高法院来说,只要妥善安置被迁徙的人,便不算违反法律,其裁决以世界银行的数字为依据:“该工程能够养活两千万人,同时供国内市民饮用及工业用水,受益者大概有三千万人。受惠者与受影响者的比例是一百比一。”

这样的裁决与民主权利与发展权利等基本命题息息相关。例如,本土居民有什么权利来掌控自己的生活资源,以抗衡政府强制推行的发展命令?对承包商、官僚和政客来说,这些工程通常都是“金矿”,他们做出发展的决策,他们是决策者。相反,直接受工程影响的却是原住民,可惜他们说的话却没有人听见。说妥善安置被迁徙者等漂亮话是很容易的,其实,十四年前纳玛达水源纷争仲裁法庭已提出来,但没有任何措施给予真正落实。工程已上马动工了,斗争也会持续下去。

## 六 对人民斗争的评论

议会民主不能代表边缘者的利益。各敌对政党只把边缘人群视为票源,为一己私利而争相操控这些票源。因此,毫不让人感到



惊讶的是,在过去的数十年间,社会运动新浪潮尝试提出捍卫穷人的利益,并展示了他们的力量。

虽然印度独立运动主要由中上层资产阶级领导,但是妇女也曾经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独立之后的一段时期,妇女却在大众视野中消失了。但是,从1980年代开始,妇女开始重新在很多议题上站在第一线,包括停止残害妇女的暴行的运动、扩大权利(例如生育权、财产权等)、增加女性在下议院(Lok Sabha)的代表,等等。自从乡村自治体制(Panchayati Raj Institutions)和城市议会选举确立后,印度妇女的力量已经壮大起来。1994年,通过第七十三和七十四次宪法修改方案,地方议会把最少三分之一的议席预留给了妇女。

贱民在全国南北各地,继续争取新的社会身份与地位。他们受安培多伽尔(Bhimrao Ramaji Ambedkar, 1893—1958)的影响比印度国父甘地还要多,安培多伽尔本身是贱民,是众所周知的印度宪法的制定者。事实上,安培多伽尔相信,只有完全摧毁印度教社会结构,才能够把低级种姓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而甘地只想让他们在印度教社会中恢复为“神的子民”(hari jans)。

印度推行改革,迎合全球资本主义,结果使很多社会群体被边缘化。除了工会组织的斗争外,也有原住民的反抗运动。典型的例子是喀拉拉邦几个村庄发起的抵制外国棕榈油运动,当地农民因为印度实施世界贸易组织的农业协议,饱受农产品价格下跌之苦。从这个例子可见,抵制外货是斗争的厉害武器,也是打击外资最有效的办法之一。

的确,很需要把这些发展议题政治化,并将其摆在政治计划的议程上,借此扩大政治范畴。很多时候,“政治”被看做“流氓”、犯罪和贪污的同义词。“政治”不会使广大群众产生亲切感。但是,除非人民通过志愿机构和媒体,成功地改革公共机构和政治程序,否则便不可能达致可持续的进步。

## 18 印度社会运动的活动空间： 世界社会论坛、选举和社会运动

文诺·莱纳

2004年发生的两件大事,对印度的社会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个是2004年1月在孟买举行的“世界社会论坛”,另一是2004年4月的中央议会选举——结果是右翼—原教旨主义的政府被中左联盟取代。

2004年在印度举行世界社会论坛的决定是极其大胆的。考虑到世界社会论坛的主要宗旨是建立一个反帝国主义、反新自由主义力量的宽广平台,那么选择印度看来是很自然的,因为印度的社会运动和群众组织组成了一支有明确奋斗目标的巨大力量。只是它们有些分散,甚至是宗派主义的,这就与世界社会论坛“宽广平台”的理念直接矛盾了。但是这个选择看来是正确的,因为各种社会运动显示出强大的政治敏锐性和社会责任感,这些人克服了传统的差异,成立了一个基础广泛的组织委员会。他们使得那些最易受到影响和伤害的人们,大规模地、令人印象深刻地参加了孟买的世界社会论坛,而所花的成本却比此前的历届世界社会论坛低得多。这届世界社会论坛进程本身的影响,在2005年阿雷格里港的世界社会论坛上可以看出来,例如用帐篷式的开阔的场地来取代昂贵的PUCI营地,这个具体的做法还可以把不同肤色的人们容纳进来。

很多人会问到的一个明显问题是:“2004年世界社会论坛的影响是否会导致印度的社会运动长时期地走到一起,或者这种影响只局限于该事件本身?”这真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我们必须明白,在印度的各种社会运动之间,在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甘地主义、贱民(dalit)、环境保护、部落、妇女运动,以及其他各种运动之间,存在着根本的、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差异。更麻烦的是,这些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运动在内部又四分五裂并且互相争执。如果认为走到一起来举行世界社会论坛会神奇地消除所有这些意识形态的和历史的差异,那就太理想化了。然而,在印度举行世界社会论坛也并没有变成一个孤立事件。帝国主义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在印度是一种现实,下面这些情况就是证据:农民自杀,贫困人口被强制迁移,收入、教育、健康和其他社会指标的差距不断扩大,农村发展退化,等等。因此,社会和群众运动在上述领域积极活动,同这些剥夺行为后面的国内的和全球的因素作斗争。世界社会论坛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向印度的许多运动揭露了全球范围的类似处境,由此展示了联合起来向共同的敌人展开战斗的需要。在2004年的世界社会论坛以后,这一点看得很明显:来自这一趋势之外具有特殊政治倾向的其他运动表现出比以前更强的团结精神。这种团结精神也许不完全是世界社会论坛顺利举行的一个结果;2004年议会选举的结果也应当用来解释这种通过团结一致的行动走到一起的趋势。

在大约十五年的时间里,印度的进步运动主要与两股孪生势力进行斗争,它们是帝国主义全球化和基于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宗教不宽容主义。后者主要由印度教团体和机构推动,总体上称为“同盟家族”(sangh parivar),印度人民党(Bhartiya Janata Party)是其政治机关。通过一场印度教原教旨主义者发动、导致1992年捣毁一座穆斯林清真寺的狂热运动,印度人民党在1999年的议会选举中以最大单一政党的面目出现,结果在印度历史上第一次成立

了非世俗的(non-secular)中央政府。在其将近五年的统治期内,印度人民党领导联盟政府积极推行新自由主义,同时使这个国家的最大宗教人口——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处于持续不断的对抗之中,破坏了在这个国家逐渐得到人民信奉的世俗价值和制度。因此,进步运动被迫在阶级、种姓和性别之外,又把身份认同作为他们斗争目标的一部分。

印度人民党利用其执政近五年中通过新自由主义政策取得的所谓“进步”,作为2004年4月大选而推行的“闪亮印度”(India Shining)运动的竞选素材,同时也受到主流媒体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印度人民党被普遍认为能够通过这次大选增强在中央的权力。这个党对自己取得一场胜利是如此信心十足,以至于把大选提前了六个月。因此,选举的结果甚至对那些获胜的人——国大党和增强了力量的左派——来说都是一个大意外。广大人民群众给出了明确的判决:拒绝以宗教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和通过“闪亮印度”运动推进的新自由主义。由此,一届得到左派政党支持的国大党领导的政府在2004年5月执掌政权。包括2004年在印度举办世界社会论坛在内的进步运动的诸多努力在这场令人吃惊的判决中所起的所用,是一个可以深入思考的问题。

尽管国大党的主体坚定信仰新自由主义模式,但是也意识到,那个把它推上政权的判决包含了对新自由主义很多方面的拒绝,特别是伤害到穷人和被剥夺者的那些方面。在支持国大党政府的左派政党的推动下,国大党被迫采纳了进步运动一直为之奋斗的许多政策,如“知情权利”(the right to information)的立法,针对无工作的农村人口制定的《就业保障法案》(*the Employment Guarantee Act*)和《免费和义务教育权利法案》(*the Right to Free and Compulsory Education Act*),等等。正在讨论中的,还有关于部族对森林的权利(Tribal Rights to Forests)的立法,允许为妇女保留33%的席位的《妇女保留席位法案》(*the Women's*

Reservation Bill)等等。尽管这些政策中的大部分遭到政府、官僚和媒体中的新自由主义者的激烈反对,但是进步运动还是在过去的一年里开辟了一定的空间,这在印度人民党统治时期是受到严重阻挠的。从此,在过去一年里,很多这一类从社会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各种运动——例如,“知情权利的立法”、《就业保障法案》、《信息权利法案》等等——促使大家以各种形式的行动团结一致地走到一起。显然,2004年他们彼此在世界社会论坛期间的接触,也对这些运动的发展大有帮助。

然而,目前执政的脆弱的政治联盟是否能够坚持到五年任期结束?进步运动将以何种方式利用它们开辟的狭小空间,来与宗教原教旨主义和帝国主义全球化这对孪生魔鬼作斗争?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这两个阵营都非常强大,而且意识明确。印度随后几年在这些领域所走的路线不仅将极大地影响南亚的地缘政治,而且也将极大地影响整个亚洲的地缘政治,因为主要是印度和中国都处于这种关键的位置。因此,社会运动需要走出狭窄的群体和视角,以推动形成地缘政治,建立大规模的跨越边界的同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世界社会论坛将促进一个大的同盟的形成。

## 19 印度社会运动： 多样的政治、共同的目标

文诺·莱纳

在方法论上,要辨别和界定社会运动,总是有难度的。在亚洲,这个问题就显得特别复杂。考虑到多民族、多语言、多政党的现实,加上区域内社会运动令人目眩的多样性,这就不那么奇怪了。毕竟,社会运动必须深深地扎根于某个国家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现实中。对于运动的描述仅仅是收集信息,并对其进行系统陈述。而分析运动的“扎根性”,以及其与更广的社会政治发展的联系,则是更为艰巨的长期任务,亚洲的情况尤其如此。这个区域是如此之大,简单的归纳根本不可能完全捕捉其多样性。对此,本章将聚焦于印度的社会活动,以阐述问题的复杂性,并假设这个分析的大部分结果可以拓展到亚洲其他地方。

虽然没有准确的定义,要探索社会运动的复杂性,我们仍然需要某种指导准则。因此我们这样界定:社会运动是非制度化团体通过明确清晰或者隐含的诉求,以尝试改变“系统”的某部分来获得公众利益的行动。即:1. 社会运动是从社会结构外部尝试改变制度;2. 改变可能限于改革,即改变体制的某一作法或政策,但体制本身依然完整;3. 所诉求的改变也可能是激进的或是革命性的,要求现存社会/制度的结构和关系做出根本变化。

显然,亚洲的大量社会运动至少要属于上述类型中的一类。

许多运动可能包含以上三大特点。

一般而言,我们可以说亚洲地区社会运动的范围和问题与其他地区没有多大不同。自从亚洲许多国家从殖民统治中独立出来以后,很多具有历史性的工人、农民和原住民运动被一系列运动所补充,包括妇女、环保、人权及和平运动。而南亚社会运动的某种特色则是贱民(dalit)运动、宗教改革和宗教原教旨主义运动。

任何人在尝试论述社会运动时,宗教原教旨主义运动总是个特殊的问题:它应该包括在内吗?从涉及的人数来讲,是大型运动;但从其目标来讲,则缺乏和上述社会运动的指导准则或定义相符的内容。宗教原教旨主义运动大多数颇激进,甚至直接要求改变制度本身的结构——从世俗化国家转变为基于某种宗教的国家。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可以被视为是宣扬不同宗教信仰人民之间的敌意和暴力,因此将其囊括到任何一类社会运动里,都值得质疑。如果上述定义中的“公益”可以被诠释成“被压迫的和面对不公平对待的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那么将宗教原教旨主义运动包括在内就不恰当,因为他们推崇的只是某个特殊身份人群的“公益”。可是,他们在社会中的渗透以及与国家政治的联系是不能轻易忽视的,特别是在当前的印度。

## 一 国家独立运动

在讨论亚洲的社会运动时,必须考虑区内众多国家反殖民侵略的各种民族解放运动。如果不能辨明这些解放运动的元素里,哪些仍然延续,哪些已经改变,我们就无法真正地理解当代社会运动。在印度,这种状况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突出。

众所周知,印度民族独立运动深受甘地的影响。从1910年到1947年印度获得政治独立,无数群众参与到了独立运动中。独立运动深深地影响了当时全印度的三亿人口。至今,还影响着印度

的十亿人。除了获得独立外,其影响遍布政治和生活所有领域。除了非暴力和坚持真理(satyagraha,即不合作主义)的主要特点外,甘地的思想渗透到管治、分权、政治伦理、道德、教育、农村、民族发展、自力更生、志愿精神、种姓制度和贱民制度等众多领域。

印度独立后,甚至在1948年甘地被印度教狂热分子刺杀后,他的思想仍然延续至今,并广泛地推动着甘地运动和印度公民社会的形成。在“非甘地主义运动”、环保运动、原住民运动(adivasi)及本土自治运动等当代社会运动中,都能看到甘地思想的坚韧和活力。还有更直接的甘地主义运动,包括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sarvodaya运动,他们曾经试图重新分配土地(现在已经沉寂了)。此外,还有乡村自治(本土自治)运动以及遍布全国的一系列甘地机构,例如,德里的甘地和平基金会、沃尔塔的Sewagram Ashram、泰米尔纳德省的Gandhigram、甘地大学和古吉拉特省的Sabrarmati Ashram都是其中比较著名的机构。印度政府弘扬甘地自力更生的思想。亲手编织的本土布织及生产本土产品成为甘地思想的象征。本土布织和农村工业委员会就是一个通过广大的零售网络来推广手工制作的土布和其他农产品的庞大组织。

对于那些希望在人类活动与自然之间建立更具伦理道德的和谐关系的组织和运动,以及那些寻求避免政治力量与经济生产集中化的“另一个世界”的人们来说,甘地的思想是有重大意义的。因此,根据甘地思想,似乎需要更多强调社区产权,以对抗和抵制私有与国有资本。

## 二 主导的政治趋势

简要概括主导印度政治体的趋势,将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独立运动的持续影响,也更有助于为印度其他当代运动定位。引导印度群众走向独立的是国大党(印度国民大会党)。通过国大党,



甘地得以组织并巩固独立运动的发展。但当印度要实现其目标时,国大党对甘地关于权利、治理和发展的信念却并没有什么信仰。

现代主义者尼赫鲁虽然没有减弱对导师甘地的尊重,但是在意识形态上却与甘地非常不同。尼赫鲁和国大党内的“进步分子”的想法相似,就是苏联式的工业现代化,再结合世俗的(secular)社会主义道路。甘地的愿景被认为是乌托邦,甚至他自己组织内成员的看法都是如此。尽管甘地在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与要求国家独立的穆斯林分子之间努力斡旋,印度还是最终按宗教分裂了。1947年,印度分裂成印度和主要由穆斯林组成的巴基斯坦。这预示了日后基于宗教原教旨教义与宗教不容忍的政治。

另一方面,甘地及其思想曾经受到另一个社会阶层的批评和反对,而且这种批评一直持续至今。这就是所谓的贱民阶层,他们视安贝卡(B. R. Ambedkar)为真正的领袖。他们认为,甘地对不可接触者(甘地称为 harijans,“神的子民”)的关心只是来自上层种姓的怜悯,而非真正认可他们作为印度平等市民所具有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权利。左翼人士对甘地更持批判态度,批评他没有清晰地阐述阶级。更糟糕的是,他所宣导的“不合作主义”的抵抗方式和阶级斗争的理念是不一样的。因此甘地的思想与贱民运动和左翼都有差别。

左翼在印度一直是很具有说服力的政治力量,但从来都没有占据过主导地位。印度民族独立运动是由国大党主导的。独立后,印度共产党和其他许多民主党派一样,分裂为三个派系:印度共产党、印共(马克思主义)和印共(马列主义)。印共(马列)在其他国家被称为“毛派”,它本身内部又分为多个派别。印共(马列)成立于1967年,与60年代末的校园造反同期发生。印共(马列)鲜明地倡导使用暴力夺取国家权力,吸引了许多学者、知识分子和学生的加入,他们在边远地区和农民一起工作。另外一方面,印度

共产党和印共(马克思主义)加入政治选举,而印共(马克思主义)在邦州和中央都获得了更大的成功。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印共(马克思主义)一直统治着西孟加拉邦,并与国大党更替治理喀拉拉邦。除了这三个左翼政党外,印度还有其他许多左翼非政党团体和组织,积极介入到多种多样的问题之中。

然而,国家权力一直掌握在国大党手中,他们尊奉甘地,却把国家引向了远离甘地理想的方向。最大的例外发生在1994年,拉吉夫·甘地时任印度总理,国家宪法做了修订,为甘地一直宣导的本土自治(乡村自治)铺平了道路。国大党在高层种姓人口中的领导大多很稳定,采纳中间派的行政方式,有时会稍有左倾,例如在银行国有化问题上。可是,也正是国大党在20世纪90年代初将印度引入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时代。在最近的几年里,国大党的主导趋势有了两大发展,大选中低层种姓和印度教民族主义力量得到崛起。这些发展完全改变了印度的政治格局。

在国家政治中一直不是很突出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主要通过其“社会运动”(RSS印度国民志愿团)在社会上获得强烈的响应。而近年来,由于印度教狂热分子的一系列行动,如摧毁历史悠久的巴布里清真寺(Babri Masjid)引起的社会紧张,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崛起,以及持续敌视巴基斯坦穆斯林,都为印度人民党(BJP)在中央和一些州邦的执政开拓了道路。同时,低层种姓人口和贱民也开始组织自己的政党(包括大众党、平等党和联合党),逐渐远离了国大党的“庇护”。他们在比哈尔、北方邦和哈里亚纳邦等邦的竞选获得成功,并开始影响国家政治。

逐渐地,政治的两极化不再是基于阶级、贫穷和发展等问题,而是向基于身份认同的问题发展,即宗教、种姓和种族的问题。印度的社会运动正在这种政治、宗教、种姓制度、贫穷和文化多样性所构成的极度复杂的体系里开展,并试图实现社会的变革。

### 三 运 动

印度最容易辨认的运动是那些与政治党派相关联的运动。三个共产党都有联合会、学生/青年团体以及妇女运动。但这种趋势和其他党派相似,包括那些在州邦而不是中央占主导地位的其他党派。国大党和右翼人民党也都有工会、学生/青年团体以及妇女运动。这种现象因政党的附属专业人员联合会而得到进一步强化,如中小学和大专院校教师组成的联合会。这些运动对党派高度效忠,受到高度控制,同时也反映了他们所属党派之间的竞争。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运动之间没有共同的议程或合作。统一团结的需求是对他们的共同限制,特别是对于那些担心分裂和因此而产生政治力量弱化的人。

但是,一旦所属党派当权,矛盾便会出现。当这些联盟运动所属的党派之间产生对立时,他们不得不高声叫嚣;当党派当权时,他们又不得不保持缄默以支持自己的党派,从而否定本文开篇时社会运动的定义——“系统之外”。与党派联盟的运动因此不能称为独立的运动。

除了这些“传统”的运动,现在也有一些“新型”的、“独立”的运动。这些运动倾向于和传统党派划清界限,在组织结构、领导角色及其接近边远地区受压迫的人民等方面有所创新。首先想到的例子是环境保护运动。

### 四 抱树运动(Chipko Andolan)回顾

Andolan在印度是运动的泛称。著名的 Chipko Andola 在字面上的理解是“拥抱树木运动”,源于1972年发生在喜马拉雅山雷尼村的事件。事情的背景是这样的:当地村民和一个经许可在该

村附近伐木的伐木承包商产生纠纷。一天,村里的大多数男人都去离村较远的地方与政府谈判。他们走后,伐木商的工人出现在森林并开始工作。结果村里的妇女都毫不犹豫地冲进树林抱住树干,阻止工人砍伐。工人们被这种场面震住了,不得不离开。

这个事件的消息如同野火般通过社区群众和媒体传播开来,迫使拥有森林的政府与当地群众谈判,而群众的代表大多是妇女。之后,这些妇女开始在这个地区设立委员会,并作为政府与社区之间的伙伴,很快地开始处理一些大的问题,如生态发展。虽然这个运动经历了起伏,最终还是成为重要的环保运动,鼓舞着印度和其他地区的人民。

印度的精英阶层和西方社会的很多人总不能理解是什么促成了这样的运动。很多人倾向于将这个运动和美国的西拉俱乐部(Sierra Club)一起作为保护环境的光辉典范来引用。但是环境保护只是妇女运动背后的要素之一。她们所要表达的第一要素是她们的“使用权”。因此,这个问题好像是使用权的竞争,在这个事件中,是国家批准的承包商和当地群众的竞争。事情的关键并不是妇女抗争,然后树木就保留下来。事实上,她们需要树木来生火,需要树叶来做饲料。承包商则需要砍光树木来做木材加工生产体育运动用品。妇女们提出问题是:“谁的需要占第一位?是我们做饭的需要重要,还是体育用品厂的需要重要?”在这场对自然资源控制权的争夺中,维护可再生资源是最重要的问题。而问题是使用的方式,而不是是否停止使用。承包商可能将树砍光,永远地毁掉森林。而村民们则是按照传统,裁剪树枝和采摘树叶,然后让树木随时间自然恢复。

因此,“拯救树木运动”在表现政府与社区之间争夺自然资源使用权力的紧张关系上,以及体现新型的大众行动和组织形式(性别方面最为突出)上,为未来的社会运动提供了蓝图。

在另一个背景下,印度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反水库运动则表达

了类似的关注:在关乎本土居民生计和财产资源的决策时,社区权利和政府之间的角力。从“拯救那玛达河运动”(NBA, Narmada Bachao Andolan)开始,印度的反水坝运动通过彻底再定义何谓“发展”,将环保运动推向了中心舞台。NBA 成功迫使世界银行撤回对兴建水坝的资助,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并大大促进了世界水坝委员会的成立,还在 2000 年出版了一份令人信服的报告。由于 NBA 的大部分工作,成百上千的从事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的运动都联合到了全国人民运动联盟(NAPM, National Alliance of People's Movement)的大旗之下。

## 五 贱民的议程

种姓制度是与印度教密切联系的古代传统,曾盛行于印度和其他南亚社会以及日本。这是个由四个阶层组成的制度,即婆罗门(Brahmin:精英、智者和地主)、刹帝利(Kshatriya:武士)、吠舍(Vaishya:商人)和首陀罗(Shudra:平民和最底层的人)。最底层的就是贱民,即“不可接触者”。印度左翼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无法将种姓制度和阶级问题包容到同一个政治议程之中。在其他政治组织中,至多是表示怜悯和同情,包括之前提到的甘地,他们都不支持在政治上让贱民获取政治权利,以实现自立自强。在这方面,两位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和领袖来自于贱民内部,也就是普勒(Jyotirao Phule)和安贝德卡尔(Ambedkar)。

旧的贱民政党(即共和党)的影响力逐年下降,并最终被更为成功的大众党(BSP, Bahujan Samaj Party)所取代。共和党以前只是活跃于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但大众党则扩张到了印度北部大部分地区。事实上,大众党还在印度人口最大的北方邦(Uttar Pradesh)执政。政府官方所谓的落后种姓也改变了另外一个人口众多的比哈尔邦(Bihar)的政治格局。他们的执政党

Rashtriya Tanata Dal 至今已执政多年。相似的是,另外一个推动落后种姓运动的 Samajvadi 党如今已在北方邦执政。

“贱民”的社会和文化运动在民间一直保持强劲的活力,并汲取着普勒和安贝德卡尔带来的力量。但对于左翼运动来说,相互分歧的不同发展浪潮却发生了。多年前,印度政府拒绝将贱民问题纳入南非杜尔班国际反种族主义大会议程,左翼运动在会议上的激烈抗议吸引了国际关注。于是,他们成为 2004 年孟买世界社会论坛的重要成员。

## 六 抵抗全球化

自 1990 年后,印度所有的政党几乎都奉行私有化、自由化政策,并大力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推广市场政策,受贫困和边缘化所害的人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随着许多老工厂的关闭,农业生产成本的增加以及国内农产品价格的降低,工人和农民首当其冲地受到了这些新自由主义政策带来的影响的冲击,而城市中产阶级则收获了所有新自由世界能带来的好处,城乡差别进一步拉大。

印度有大约三亿四千万劳动力,其中只有三千万是有组织的。这意味着有超过三亿的人口在无组织领域,他们大多是农民。工会运动因此无法顾及大多数印度的劳工,他们大多是贱民、妇女和原住民。因此他们通过自己组织的社会运动(可能是关注环境、原住民、农民或贱民)来表达想法。在过去的十五年中,这些运动应对着越来越多的全球化问题。然而,国家媒体受到新自由主义利益的强力控制,他们的声音被遮蔽并趋于无形。他们在新闻媒体中显得无足轻重,因此鲜被提及。

甘地的志愿者精神传承并促进了许多志愿者机构的发展,特别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毛派起义的高峰期之后。许多城市专业人

员迁居到农村地区,通过志愿者机构与当地人民一起工作。成立之初,这些机构只有非常有限的经费,他们都发扬志愿者精神和群众一起工作。但到了80年代早期,中央政府意识到了他们对于农村发展的重要促进作用,开始给他们拨款。海外的资助使得志愿者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发展成类似于非政府组织的形式,特别是在数量上。据估计,印度约有二十万个非政府组织。

由专业人士组成的非政府组织资金充足,与缺少资金但分布广阔的大型社会和群众运动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两类组织经常在同一地理区域内就一些问题开展合作,但是他们之间有时关系紧张,有时几乎是相互不信任。各类运动都觉得非政府组织不十分激进,并且受制于资助的要求来做决策。全球化的到来似乎加剧了这种紧张感,因为非政府组织深受世界银行等机构的垂青。

自1994年宪法修改后,本地政府机构“村委会”(Panchayats)的成立使形势变得更为复杂。因为村委会是合法选举的五年一期的组织,社会运动和非政府组织在其工作的同一领域里经常会和他们发生冲突。政府常常对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运动的存在感到恼火,而倾向于通过借助民主选举的组织来提高民间组织的合法性。而许多非政府组织则要么忽视村委会机构,要么直接和他们发生冲突。同时,虽然村委会可能不是很有效率,但有些组织还是认可他们的政治重要性,并在各个方面尝试与之合作。

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人民科学运动”。在世界上它好像是独一无二的,很明显,在印度之外找到这样的组织是不大可能的。该运动由大量的科学专业人士组成——工程师、医生、科学家和许多教师,他们与当地群众和社区一起工作,很多时候也和村委会合作。全国大约有三十万专业人士参与这种工作。这个运动,融建设和抗争为一体,涉及教育、扫盲、水资源、卫生、农村生产、能源和本地管治制度,并运用不同形式的抗争来抵抗新自由主义的蹂躏。只要可行,该运动都会与政府合作,但如出现争议,就会与政府发

生对抗。该运动带有明显的左倾色彩,努力将从中央到左翼的所有政治观点的人都联合起来,并尝试融合马克思主义和甘地思想。该运动还和村委会合作,与本地人民积极试验计划方法,以抵抗新自由主义模式的集中化趋势。

印度社会运动中的主要变革发生在2004年1月,他们要面对孟买世界社会论坛带来的挑战。在巴西阿雷格里港举行三次论坛后,世界社会论坛希望在印度召开第四届论坛,很多人质疑在印度社会运动和非政府组织高度多样化和分裂的状态下,会议是否能保证其包容性。在印度,即使拥有共同意识形态的运动都有分裂,再加上左翼、甘地派、贱民派、共产主义者、环保主义者,以及新旧妇女、工人和农民运动的历史分歧,这种质疑就丝毫不奇怪了。最终,拥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大约二百多个群众运动、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共同组成了印度工作委员会,共同协作推动了2004年世界社会论坛的召开。这是史无前例的。有趣的是,在巴西,他们的成员组织只有八个。

但是,世界社会论坛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的场合。因为该论坛排斥相信暴力手段的团体。加上印度社会运动总体上对国际资助机构极其不信任,一些团体和运动便与其他国家(如菲律宾)走到一起,举行和世界社会论坛平行的活动,他们称之为“孟买抵抗2004”。他们的反帝国主义的议程与主张,比世界社会论坛更为激进。

不过,只要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运动准备进行更广泛的社会动员,世界社会论坛就不会主张或试图成为唯一可操作的平台和空间。这也是印度所有社会运动的鲜明态度。他们第一次以如此多的数量聚集在印度世界社会论坛上。这表明社会运动开始意识到始终保持主要目标的价值,而不是争吵应该由谁做主。如果世界社会论坛之后,这种态度在印度能够仍然继续下去,那么将对印度社会运动产生积极影响的。我们只能希望如此。



## 20 新自由主义在印度： 种姓政治与农民自杀

文诺·莱纳

近年来的发展经验表明，普通民众和社会运动界对“联合进步联盟”(UPA, United Progressive Alliance)所寄予的希望，从根本上是没有根据的。在2004年大选中，由于联合进步联盟(UPA)掌权，人们的希望被点燃。没有人会想到掌权的右翼“国家民主联盟”(National Democratic Alliance)会在竞选中失败，该联盟以“闪亮印度运动”(India Shining)进行选战。他们的失败意味着在闪亮印度运动中处于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受到了坚决的抵制。普通民众都确信，印度的国家形象将会在《泰晤士报》、《经济学家》周刊以及国内媒体上被大为宣扬。但是普通民众却史无前例地饱尝农业债务、糟糕的教育、粮食、工作机会、被迫迁移和腐败等问题带来的痛苦。

至少联合进步联盟(UPA)的一些成员或者支持者，尤其是左翼党派意识到，民众迫切要求解决这些问题。当大量来自社会运动的人士以及支持他们的知识分子和学术界人士，受到咨询或要求组成委员会研究这些问题时，这一点就更加明显。这些委员会包括：国家咨询委员会(National Advisory Council)、中央教育咨询委员会(Central Advisory Board for Education)、无组织劳动委员会(Commission for Unorganized Labour)、国家农村卫生委员会

(National Rural Health Mission)。在联合进步联盟(UPA)掌权的一年内,随着《知情权法案》(*Right to Information Law*)以及《农村就业保障计划》(*Rural Employment Guarantee Scheme*)的通过,民众的希望被点燃了。

但是一系列的挫折却又使刚刚燃起的希望破灭了。新自由主义利益集团以一种近乎报复的姿态归来。让我们以农民自杀为例。就在几天前,食品和农业部长向议会报告说:自从1993年印度的经济被自由化和私有化以来,有大约十万零四百二十八名农民自杀。这实在是令人震惊的数字!就在总理视察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农民自杀最集中的地区之一的威沙巴哈(Visharbhha)当日,在邻近地区又有三起自杀事件发生。甚至在他宣告减轻农民负担后,还有其他自杀事件发生。

死去的农民已经高声并清晰地喊出:减负并不是他们需要的,他们需要的是包括信贷、定价和农业投入在内的系统的、结构性的农业经济法和计划,而不是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允许的某些措施。世贸组织的多哈谈判的失败并不太令人吃惊,因为除了其他原因,印度是反对就农业进行谈判的,农民的自杀问题说明了印度做出此项抉择的原因。

然而,由顽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领导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和财政部,在本人就是筹划开放印度经济的经济学家的总理的支持下,坚决反对系统的、结构性的有利于农民的改革,因为他们坚信全球化的农业。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大会上所持的农业方面的立场还能持续多久呢?

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也是如此。印度拥有巨大的依靠公共资源如土地、水、森林和其他自然资源生存的人口数量,一旦被剥夺了这些资源,他们没有其他的选择来保证其生存。大坝、道路的建设、城市化、采矿业、飞机场、游乐园和圣堂的建设需要大规模的迁移居民,这就必然导致许多人失去赖以生存的资源从而被边缘化。

在这些论题上开展斗争的著名例子是“拯救纳玛达运动”(NBA, Narmada<sup>①</sup> Bachao Andolan)。该组织由那些因纳玛达大坝建设而搬迁的人组成。在最高法院的干预下,一项法律出台了:只有当迁移人口都得到重新安置后,即将建成的萨达尔萨罗瓦(Sardar Sarovar)大坝的高度才能增加。由于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大部分因先前工程而迁移的人并没有得到重新安置,NBA与政府交涉,要求停止2006年3月批准的工程的进一步建设。他们的要求被政府忽视,促使NBA在德里持续进行绝食和静坐行动。此次行动得到包括左翼政党在内的民众的空前支持,当然还有媒体的大力关注。

政府派遣了由三个中央部长组成的委员会去了解被强制搬迁者的要求。这个委员会认可了他们抗议的理由,并且要求总理采取行动。但是总理却逃避责任,要求法院去干预。在这场规模空前的运动中,最高法院推翻了自己先前的判决,以太草率为由撤销了三个部长的报告,并允许建设继续进行。法院的这个决定和总理的姿态,使全国各地被强制搬迁的民众,以及争取公平而战的社会运动对他们彻底失去信心。

当纳玛达的抗议还正处于骚动中时,一次不寻常的抗议又发生在德里的大街上。领导者不是贱民、原住民或是任何被迫搬迁的人,而是中产阶级的医学学生!他们抗议政府宣布的在高等教育机构为一部分下层的印度种姓增加27%的预留名额的计划。这一计划得到国家议会的支持,于是地狱之门打开了。由于数以千计的出生于印度上层种姓和中产阶级的医学学生将会受到这一计划的影响,于是他们成为新自由主义媒体和大公司知识分子眼中的英雄。他们认为,基于种姓的名额预留计划将损害印度高级种姓的品质,将损害印度在信息技术、管理和业务流程外包

---

<sup>①</sup> Narmada 是一条河的名字,该运动以反对在该河上修建水坝而得名。

(BPOs)上的竞争优势。

没有比这个“预留名额事件”更能尖锐地反映出印度社会内部的在世袭种姓问题上的分歧了。这一事件也暴露了新自由主义者的双重标准。仅一个月前,他们还在为在德里逗留了将近一个月的博帕尔(Bhopal)毒气受害者和纳玛达迁移者进行街头抗议活动而抱怨。新自由主义者认为,那些被边缘化了的人们正在给城市生活造成负面影响并降低工作效率。但是当他们自己的人走向街道的时候,他们的这些论调都不见了。他们被同样的媒体和利益集团所赞扬。结果,掌权的联合进步联盟内部的巨大分歧对外暴露无遗,而“预留名额事件”也远远没有得到解决。

正当前边提到的两个社会运动取得胜利的时候,《农村就业保障法案》(REGA)和《知情权法案》(RTI)却开始变质了。前者被马马虎虎地执行,后者干脆被彻底淡化了。《知情权法案》本可以有力遏止猖獗的腐败,并且有助于明确职责,要求政府人员履行应尽的责任,因为它给予每一个需要的人接触政府文件和资料的权利。由于害怕因政府档案公开而被问责,官僚机构开展了一场悄无声息的斗争:他们努力使他们的档案不在法律管理的范围之内,这样一来,政府官员个人的行为将不为人所知。政府不顾社会运动的气愤和反对,通过了一项修正案,这项修正案现在正受到来自印度各地反对抗议者的质疑与挑战。

为消除社会运动对政府的不满,每个州得以自行处理《教育权利法案》,它是具有重要地位的第86号修正案的结果,赋予六至十四岁的儿童受教育的权利。该法案本拟提上议会日程讨论通过,现在却停止作为中央立法,而降低到每个州去自己立法。多年的抗议活动致使议会通过了第86号修正案,但是中央政府深知宪法所支持的权利将会对政府开支造成不必要的限制,并且它也不符合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利益。

联合进步联盟政府依靠左翼党派的支持。然而,去年包括印

度与美国的核协议、机场私有化、出卖公共部门财产等行为，已经导致了原有意识形态分歧的公开化。社会运动现在发现新自由主义在联合进步联盟内部占统治地位，并开始公然与之敌对。不仅社会运动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现在又第一次出现了对于联合进步联盟能否存在下去的忧虑。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右翼宗教原教旨主义者也正在周围伺机反攻，广大民众和社会运动的选择犹如被夹在中间进退维谷。

## 21 中亚和南高加索： 美国的后方基地？

贝尔纳·德莱约诺

当高加索和中亚再次成为世界争霸赛的中心时，让人不禁想起出自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笔下的 20 世纪初俄、英帝国主义覬觎下的阿富汗。不过这一次的局势却是由美国所主导。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之后，伊朗仍然是布什嘴里的邪恶轴心国成员。从黑海到里海，再到中国边境的天山和帕米尔的整个地区，都被认为是战略要地。这个地区有大量的能源资源，靠近阿拉伯/波斯湾石油黄金国，也是欧亚大陆的中心平台。在这里，可以监视莫斯科、北京、德黑兰、麦加和伊斯坦布尔。

但不幸的是，居住在这个地区的人们并没有吸引国际媒体的注意，也没有获得足够的寻求另类世界的活跃力量的支持。可这里的一切，还不至于完全在帝国地缘政治家的计算和操控之内。

### 一 中亚和反恐联盟

根据密切观察中亚的恰泰瑞安(Vicken Chetarian)的看法，中亚越来越像是“美国的后方基地”了。自阿富汗战争以来，美国军队在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与哈萨克斯坦已经占据永久性据点。在石油资源丰富的塔吉克斯坦还没有美国军队部署，但是

他们很乐意接受美国的援助。

这些国家的原住民大都欢迎美国人的到来。吉尔吉斯斯坦国家贫穷、闭塞,一直期望获得经济利益。处于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之间的福尔加纳山谷(the Fergana valley)的居民希望和平与稳定,该地区是冲突的中心地带。年轻学生寻求奖学金去美国留学,知识分子希望民主进步。

撇开繁荣和和平,民主进步问题其实是令人失望的。该地区 NGO 的增多(大多是美国的)有时确实可以作为保卫人权的武器。但是,像卡里莫夫(Uzbek Islam Karimov)之类的独裁者及其他像吉尔吉斯斯坦这样的腐败政府却另有盘算。美国期望他们稍为离俄国监护远一点。但俄国在这三国还有大量的军队部署,并且在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及其他地方还有无数俄裔少数民族。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希望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建立共同的保安军营,即中亚军营(the CentrAsBats)。但是从没实现过。毫无疑问,这样会给每个国家太多机会来相互监视。与西方军事部署同时发生的,还有2002年前苏联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STO)的制度化。目前,美军并没有提出反对。但该组织到底会成为 NATO 的辅助抑或对手,还需要时间来判断。

至于安全,“反恐”才是关键观念。对莫斯科来说,这显然意味可以在车臣自由行动,而美国则有权永久干预。对于中亚国家的统治者来说,后“9·11”反恐联盟的最大好处是可以让他们将内部反对派称之为“伊斯兰”来进行压制。该区域来自前苏联的圣战战士、乌兹别克斯坦战士和塔吉克斯坦战士这些激进团体在阿富汗战斗。但是,主要的伊斯兰运动,伊斯兰解放党和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运动(伊斯兰分子参与的1990年代初的民族宗教内战)是反对恐怖主义的。

伊斯兰的幽灵对统治者来说是很有用的,特别是对乌兹别克

斯坦的总统卡里莫夫来说。他将所有反对党冠以“伊斯兰分子”之名,而事实上,像自由民主党(Erk)和民族团结党(Birlik)都是抑制伊斯兰威胁的。民主党由苏里哈(Muhammad Solih)建立。苏里哈是前总统候选人,败给了卡里莫夫,现在流亡挪威。2003年6月,已被废除的该党自1993年后第一次在塔什干(Tashkent)召开会议。参会人员包括来自民族团结党的成员。这是政府变通的迹象吗?不幸的是,2004年春天,在据报道的伊斯兰分子发动袭击后,卡里莫夫终止了这场运动。

美国容忍土库曼斯坦总统萨帕尔穆拉德(Saparmurat)的独裁统治表明,对美国而言,民主并不是先决条件,因为他们想要的是,从土库曼斯坦境内的丰富天然气资源上获利。

据美国观察家费沙(Jonathan Feiser)表示,短期来看,美国在伊拉克的部署需要“足够的地区支持以及中亚的基地”。长期来看,这样的部署将遏制俄国,使其成为中等地区国家,同时监视中国。为制衡这种威胁,俄国和中国与中亚共和国建立了区域组织:上海合作组织。2003年6月,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召开会议,中国、俄国、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国都参加了,上海合作组织希望成为真正的区域合作组织。

但是,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竞争区域霸权。当年,沙皇曾经计划将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塔什干定为中亚突厥斯坦(Turkestan)的首都。在苏联解体前,当时的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Noursoltan Nazaribaiev)将首都从阿拉木图(Almaty)搬到被称为大草原的巴西利亚(Brasilia)中部的阿斯坦纳(Astana),就是因为阿拉木图与塔什干太近。

哈萨克斯坦和俄国保持紧密的经贸合作,俄国的主要航空基地也在该国境内的拜科努尔(Baikonur)。虽然乌兹别克斯坦处于该地区的政治中心,但是其内部混乱的经济形势和由咸海(Aral Sea)干涸引起的生态灾难,使其无法大展宏图。塔吉克斯坦相对



脆弱,它刚刚从血腥的内战中恢复过来,一直小心地关注着阿富汗局势,因为北部联盟的塔吉克斯坦人控制着喀布尔。吉尔吉斯斯坦曾经被称为中亚的瑞士和区内最民主的国家,但要维持令人羡慕的声誉变得很难,因为其强大的邻国的胃口越来越大。独裁的土库曼斯坦政权仍然在旁边虎视眈眈。

还涉及中俄两个大国的区域合作(更不用提经济活跃的日本),要在短期内创建和平与繁荣的共享区域还很遥远。

## 二 南高加索

南高加索地区(包括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遭受着相似的创伤——过去的战争和今日的冲突。在高加索北部山脉地区,已经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亡和流离失所的车臣战争灾难还在继续,使得整个地区动荡不安。在南部,两大主要战争目前处于暂时缓和但仍保持对立的状态:在阿布哈兹(Abkhazia),穆斯林少数民族已将占大多数人口的格鲁吉亚人驱逐;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Nagorno-Karabakh)飞地,主要人口是亚美尼亚人,他们对斯大林带来的阿塞拜疆人持敌对态度。其他冲突也处于潜伏状态,例如南奥塞梯和遍及南北高加索的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此外,这些国家都为腐败和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公正所困扰。社会问题和基本人权的保障问题缠绕在一起。

目前,美国人已经进入该区域,他们努力增强自身影响力,同时暗地里让俄国人难堪。阿塞拜疆有大量的炭氢资源,对俄国乃至整个区域都有战略意义。同时,该区域对美国国防部也很重要,因为靠近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

格鲁吉亚自1991年宣布独立后,一直试图摆脱俄国的压力,而美国正好趁机渔利。俄国主要靠阿布哈兹冲突和奥塞梯问题对格鲁吉亚施压。在阿布哈兹,俄军公开支持分裂分子,虽然他们应

该去做调解。尽管在南奥塞梯并没有真正的战争,但这个格鲁吉亚省份并非由首都第比利斯的政府所控制。奥塞梯人信奉基督教,他们的语言属波斯语系。在俄联邦的北高加索也有奥塞梯人。连接南北奥塞梯的十字通路是高加索山脉的主要中心通道。

车臣战争也是俄国干预的借口。莫斯科指责第比利斯允许车臣武装人员在其境内行动,特别是在潘基思峡谷(the gorges of pankisi)。而华盛顿则以该地区有圣战组织踪迹作为借口,派驻军事顾问。这个狭小的潘基思峡谷靠近高加索北部,为车臣提供通路。2002年8月底,俄国轰炸该地区的村庄,并公然向格鲁吉亚派驻精英部队追击车臣分离分子(boivickis)。这是冲突的热点,俄国人的理由是有需要时合理动用“向外的侵略”,而多于地区军事的原因。这也是对格鲁吉亚施加压力同时试探美国人的方法。针对此事,格鲁吉亚议会投票决定从独联体国家联盟退出,撤除格鲁吉亚国土上最后的俄国军事基地,并申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前总统谢瓦尔德纳泽立刻宣布这些措施不适用、不成熟。贫困的格鲁吉亚因此而陷入动荡,并被腐败进一步削弱。这也解释了谢瓦尔德纳泽政权为什么会在2003年11月的玫瑰革命后倒台。

在阿塞拜疆,尽管美国曾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为争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飞地发动的战争之初支持亚美尼亚而受到过冷遇,但美国军队在此还是部署稳固。瑞士社会和政治研究中心的麦当格尔(James MacDougall)认为,1997年是美国在该地区战略改变的转折点。在这一年,美国认识到里海盆地的地缘战略意义,并开始相应改变其外交政策。他们的石油公司已经到达该地区,其影响力仅次于英国石油公司,而其他公司(挪威、法国、俄国和伊朗)所占的份额则极少。虽然已故的阿里耶夫(Haydar Aliyev)<sup>①</sup>和普京的关系密切,但他也不能扭转俄国在巴库地区影响力的衰

<sup>①</sup> 前苏联 KGB 的全国主管,直至 2003 年 12 月死前都是阿塞拜疆的总统。

减,而只能拱手让给强大的美国。

从里海及中亚(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运输炭氢到消费市场是一个大型项目。俄国人希望石油和天然气像过去一样可以通过管道输往北高加索,从俄联邦境内流到黑海的诺伐拉斯易斯克港口(Novorossyisk),或通过俄国与欧洲连接的天然气管道,但那意味着要更新整个系统。车臣战争和印古什(Ingush)及达吉斯坦(Daghestan)的骚乱成为其障碍。美国人从俄国与其前殖民地之间的争吵中渔利,他们提议建立一条穿过南高加索和巴库—锡汗<sup>①</sup>(Baku - Ceyhan)的输油管,以及从巴库连接到埃尔斯伦(Erzurum),这个土耳其市镇连接着欧洲天然气输送系统。这条著名输油管道的建设旨在阻止俄国对中亚炭氢出口的控制,同时遏制伊朗任何类似的企图。在政治格局上,在摩尔多瓦、乌克兰、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乌兹别克斯坦五国的政府间合作组织古阿姆(GUAM),乃是在美国的支持下绕过俄国的东西核心轴。但美国最交好的两个国家,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的形势远远没有稳定。在格鲁吉亚,亲西方的新领袖萨卡什维利(Michael Sakashvili)已经和平地将南部省份阿德贾里亚(Adjaria)分割出去。该地区一直是俄国用来敲诈新政权的筹码。但是,那里的经济形势却是灾难性的。在阿塞拜疆,阿里耶夫的继承人伊尔咸·阿里耶夫(Ilham Aliyev)既没有个人魅力,又没有他父亲的经验。

至于亚美尼亚,该国仍然效忠于俄联盟,并与德黑兰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因此形成一种北—南、俄国/亚美尼亚/伊朗的轴心,来抗衡亲美的东—西轴心。这样的姿态使得亚美尼亚在对抗中首当其冲,一方面受到来自俄国的压力,俄国没兴趣解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飞地及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和土耳其的关系正常化,这使

① 土耳其在地中海的港口。

得俄国失去给埃里温(Erevan)<sup>①</sup>施压的主要筹码。另外,近年来,由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支持的,或通过明斯克小组(MINSK GROUP),或通过美国组织的关于卡拉巴赫地位的谈判,都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对于普京来说这无疑是个好消息。

这可能与现任总统科恰良(Robert Kotcharian,他曾在战争期间自称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飞地的领袖)的短期利益是一致的。卡拉巴赫地区的阿塞拜疆少数民族已经被驱逐,亚美尼亚占领了阿塞拜疆的战略地区,以维持亚美尼亚与卡拉巴赫的关系,以及控制位于伊朗边界的阿拉卡斯(Araks)河岸北部地区。但是,任何一个协议都可能改变这一形势。随着唯一能给卡拉巴赫带来和平妥协的阿塞人阿里耶夫似乎要下野,最近几个月,卡拉巴赫前线多年来首次紧张有上升趋势。科恰良肯定认为现状对他是有利的。但是长远来看,亚美尼亚的境况可能会变得非常糟糕。经济形势已经令人担忧,国家贫困,精英相继离开。伊拉克战争之后,该地区正经历着重新洗牌,而埃里温显然没什么王牌。

从国内政治来说,亚美尼亚看起来似乎比两个邻国要好点,但这却是假象。科恰良确实成功地(有俄国支持?)打败了他的前任——独立之父彼得罗相(Levon Ter Petrossian)。虽然存有争议,科恰良的党派在达切拿克苏提昂(Dachnaksoutioun,即1880年成立的亚美尼亚革命联邦)的民族主义者的支持下,还是赢得了总统大选和立法会大选。但亚美尼亚并不能免于暴力,这可以从1999年总理和议会主席在议会上被刺杀看出来。“山区共和国”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也面对暴力事件的困扰,科恰良的继任者古卡申安(Arkady Gukassian)把巴布安(Samuel Babauan)将军关进监狱。“没有实现自主权”是国际人权联盟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描述。同时,个人的权利在这里似乎也没得到什么保障。

<sup>①</sup> 亚美尼亚共和国首都。

### 三 阻止公民社会出现的阻碍

在中亚或南高加索地区,社会政治条件对有活力的民主公民社会的发展都非常不利。为吸引西方援助而建立的 NGO 通常是带有政府性质的 GONGO,或者是国外组织的 FONGO(由外国的赞助机构组织,在这一地区通常是美国发展署 USAID)。欧洲和美国的赞助机构(如索罗斯基金)确实支持该区域需要的项目。但是整体上,自主的原住民运动组织起来非常困难。这种情况在中亚(特别是塔吉克斯坦)特别明显,虽然各种捍卫公民权利和妇女权利的组织已经相继建立起来。

从这点来看,南高加索的情况要好多了。在阿塞拜疆,小型人权组织在各个领域都十分活跃,涉及难民权利、军人权利和少数民族权利等领域。这可以从 2002 年他们介入巴库外围的拿尔达伦(Nardaran)中看出。在那里,警方残酷镇压了社会运动,杀害一个游行人士,并逮捕了当地领袖,而其罪名又是“伊斯兰恐怖分子”。在这个特别贫穷的地区,近年来的宗教狂热成为一个逃脱的途径。这是一种挑衅吗?接近温和伊斯兰圈的“宗教信仰与良心自由保护中心”是这么认为的:“对那些希望强调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威胁的人,以及那些希望西方对缺乏合法性的政府的腐败金字塔视而不见的人来说,拿尔达伦是一个很敏感的地方。这种情况下,激起人民的宗教情绪并使之升级,进而创造混乱,是非常简单的事。”

由于国家的种种缺点,各种形式的社会自治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开来,特别是在格鲁吉亚,以及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青年组织、生态运动、合作社,以及其他另类经济活动都在尝试发展。

另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是关于难民的,包括捍卫公民和经济权利以及抵抗被操纵的侵害。对于来自格鲁吉亚的亚布卡赛(Abkhazai)的三十万难民和来自阿塞拜疆的卡拉巴克(Karabakh)

的六十万难民来说尤其如此。另外还有很多,如亚美尼亚的阿塞拜疆难民、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库尔德难民,以及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的车臣难民。

南高加索的三个国家(如果加上自称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就是四个)完全可以归入克罗地亚作家马特维耶维奇(Pedrag Matvejevitch)笔下的“democratures”,一种处于可容忍的某种程度多元性的独裁和异态民主之间的状态。这几个国家中有反对党的存在,媒体也有一定的自由,但是却很少有欧洲式的渐进左翼政治力量。不过,真正为民主而战的人还是存在的。据国际人权组织联盟观察,全国的民众都在努力打击欺诈性大选(例如上届亚美尼亚总统大选,在该国北部的温达索尔[Vandazor])以及阿塞拜疆总统竞选运动期间,即使阿里耶夫(Aliyev)政权“封锁”公民社会与司法制度。在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和阿塞拜疆,小型团体都在努力推动表达自由,以及成立独立媒体来挑战本地政府机构。

更重要的是,在格鲁吉亚举行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就阿布哈兹共和国的和平对话,南高加索国家的武装分子希望聚在一起共同展望未来。例如,2000年11月赫尔辛基公民大会国际网络在巴库会面,吸引了来自亚美尼亚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很多亚美尼亚代表。除此之外,还有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失散亲人团聚,以及“丝绸之路”国家儿童大会。尽管有来自西欧、俄国和加拿大的外部活跃分子,但大多都没有后续活动。这些NGO都处于封闭状态,除了来自北美基金的协调人,他们再没别的支持者。这可以说是好事,也往往是坏事。尽管在巴西阿雷格里港举行的第三届世界社会论坛上有“阿塞拜疆争取和平与人权组织”(Arzu Abdullayeva)的参与,高加索的公民运动与世界公民运动之间的联系还需要进一步的建立。

## 22 南太平洋的国家和公民社会

尚马克·雷诺、塔马图亚·巴姆别

西方思想家将公民和政治社会与父系威权或自然国家对立起来,他们认为那样的社会不可能存在于古代社会中,因为在那些社会里,一个人不被认为是现代意义上的个体,即具有天赋自由,并且是社会化的基础的个体。卢梭、托克维尔和哈贝马斯都同意现代社会创造了两种公共空间:国家和公民社会。就前者来说,个人同意将自由让渡给能够保证自身和其他人自由的统治者;而对于后者来说,个人是自己利益的主宰者。“每个人的价值都是相等的”(不是实际上,而主要是象征意义上)这种平等观念,是西方社会的价值观之一。

而基于南太平洋的岛屿上的经验,这样的历史哲学根基受到了来自三方面的挑战。这三个方面分别是:1. 实际的经验调查;2. 对国家和公民社会建立认识论基础的反思<sup>①</sup>;3. 由此带来的西方历史的相对化。(Chiba, 1993; Capeller and Kitamura, 1998)

首先,传统社会不将个人束缚在社区的紧身衣之中<sup>②</sup>。弗斯(Firth, 1965)在托克比亚(Tokopia)、奥地诺(Ottino, 1972)在仰基

① 参考太平洋认识论会议系列,最近一次在斐济南太平洋大学举行,2006年7月3—7日。

② Cohen(1994); Sahlin(2000); Hau'ofa(2000); Hooper(2000); Belgrave et al(2005)。

(Rangiroa),以及纳帕尔(Naepels,1998)在新喀里多尼亚(New Caledonia)的研究已经说明,家族关系体系强烈地提升了个人决策的自主权。在这种情况下,个人自由恰恰解释了传统社会的延续以及社会结构中发生的变化。

第二,“古代—现代”对立的观点已经让位于二者的对话。部落氏族和大家庭的社会组织被置于殖民的背景下、宗教的影响下,以及与全球化、新的信息和交流技术的使用下加以研究。根据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观点,传统社会被视为一个在现代性里构想出来的社会概念(social construction)。

第三,有大量研究来分析一个人所有的横向成员资格(社会阶层、年龄、宗教所属、部落)以及纵向成员资格(家谱、传统法定的等级),并且有多种多样的成员身份,而且它们之间互有矛盾。这些研究表明社会不是静止而是在迅速演变着的。(Hu'ofa,2000;Hooper,2000;Belgrave et al,2005)

以此为出发点提问,关于岛上国家和公民社会的两个主要问题就浮现出来了,即:考虑到大洋洲国家民族的流动性特点,当地的国家建设是在什么基础上进行的?当地的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又如何?

## 一 多元而非一元的国家

在《国家对社会》中,皮埃尔·克拉斯特(Pierre Clastres)指出“国家出现在传统的多元的社会中”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例如在太平洋有一条“社会内于国家”的公式(Weittersheim,2006),瓦努阿图(Vanuatu)就是一个重新考虑太平洋社会的历史的很好例子(它们与国家间的关系充满问题)。

在太平洋上,如同在非洲和亚洲一样,国家作为外部支持而出现,首先是服务于传教而后为了殖民主义。正因为如此,国家管治



被人们强烈地反对,因为它象征着不可忍受的统治,而不是基于社会契约。

1960年代随着各国从殖民主义统治下独立出来,那里的国家机构与社会组织开始合并。但是,与西方社会对其作用的期待相反,岛上的居民并不要求国家垄断合法的暴力手段。那种韦伯式的(Weberian)垄断甚至被激烈地反对。其他传统和习俗的制度能够保障个人拥有一定的法律安全。而村庄、部落和家族,联合在一起发挥着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的作用,如社会福利、土地所有权、粮食安全等等。习俗也成为许多岛屿国家宪法的来源。

法国宪法本身就认可“个人地位”(第75条款,1958年),而沃利斯(Wallis)、福图纳(Futuna)两个岛的海外领土认可习俗并把其看做法律程序的一部分。在斐济、汤加、萨摩亚群岛、瓦努阿图和法属波力尼西亚开展的法律人类学的工作区分了官方和非官方的习俗<sup>①</sup>。其中,官方习俗是由国家建立的,并受到了那些继续发展其传统习俗的社会组织的强烈反对,因此导致国家不能垄断公民的法律安全。在萨摩亚群岛、瓦努阿图和巴布亚新几内亚,部落在公民的法律安全方面被赋予了比国家更多的权力。

在那里,基督教与一种将不可见的神灵与祖先世界相联系的精神共同存在,从而孕育了多种融合和对话的可能性。个人不再像西方社会那样被视为有天生的自由和社会化的基础。个人被视为家谱链上的一环,是一个非常密集的、多种形式的、多中心的家庭关系网络中的一个成员(Bonnemaizon,1985,1992)。

该地区国家中多元主体的、惯例的,以及社会的制度形成的这些特点,对其公民社会的发展特点有深远的影响。

<sup>①</sup> 参考 Lamour (1997); Bambridge (2007)。

## 二 一个多元的公民社会

在西方,个体之间象征性的平等使面对同样社会问题的组织之间建立横向关系成为可能。社会动员有时会反对国家,有时则谴责不可接受的、不平等的情况。

但是,在大洋洲,对于贵族政治原则的挑战并不被看做是必须的(Crocombe,1992,1995)。公众意见似乎更关注贵族政府的缺乏变化。西方意义上的民主之所以能够占有一席之地,首先要归因于外国政府(尤其是法国、美国、澳大利亚)的压力和国际的民主援助(Huffer,2000)。在这些地区,东加(Tonga)有图普四世(Tupou IV)、沃丽斯岛(Wallis)有拉维露亚(Lavelua)、萨摩亚群岛有图瑞(Tui o Manu' a Tele ma Samoa)、毛利有大酋长(Arikinui Te Atairangikaahu),这种古老的大酋长(ariki nui)制的延续表明:其他家庭、酋长或者部落争夺王权,标志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而远不是一个体系的终结。

理解大量的横向和纵向的社会意义和成员身份是很重要的。自从20世纪50年代年以来,岛上居民就一直在大规模地流动。半数以上的汤加人、萨摩亚人和来自托克劳群岛的人居住在新西兰、澳大利亚和美国。在法属波利尼西亚,一百二十个岛上的三分之二的人口集中在塔希提岛。瓦努阿图和所罗门群岛同样经历着类似的人口运动。在新喀里多尼亚,有着庞大数量的来自沃利斯和福图纳的人,比在他们各自的岛屿上的数量还要多。大洋洲是唯一有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的地区,而且这种人口流动在这里似乎不是一个例外,而是一个规则。

四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口的循环移动导致了位于太平洋岛屿外围的中产阶级的出现,同时还导致公共空间内出现特殊的干预方式。许多关于社会问题的争论并不是发生在岛内,而是

在奥克兰、斐济和夏威夷发生。2006年发生在汤加的反对贵族夺取国家政府的罢工抗议游行就主要是由奥克兰的团体筹划的。

早在20世纪60年代,阿尔伯特·温特(Albert Wendt)教授就曾经在萨摩亚群岛抨击殖民主义。自从90年代以来,他开始谴责领导人的腐败和他们利用职权垄断经济。他在奥克兰发表讲话,然后是在他教书的夏威夷。他在这些地方讲话是因为,这里对理解他的批评在大洋洲知识分子和社会人士中引起的回应具有决定作用。地方化的批评呈现出的是区域性的批评,这些批评在网络中传播,而且对整个太平洋地区都适用。

在这种情形下,公民社会肯定不会是同质的。它显现出去领域化(de-territorialized)的特征,即社会不再是局限于特定的海岛界限中。散居在外的人们不仅推动了国家反对力量的出现,还巩固了其原有社会权力的多样性,并接受了对公共空间<sup>①</sup>的某些特殊的干预形式。广大散居在外的人士与家庭的联系,以及他们得到的再分配(他们认为这归功于他们的村子或家族),有助于他们在祖居的岛屿上发展传统习俗典礼,这种进行习俗典礼的规模和频率,甚至在前欧洲时代也未曾出现过。<sup>②</sup>

最后一点,在政治主宰的背景下,毛利人和原住民将文化权利用作有效的社会工具。不像西方那样,他们对环境保护的主张不是源于将人道主义延伸到环境,而是源于应用1840年制定的《外坦基条约》(Waitangi Treaty)时对原住民权力和义务的认可。

在人口流动和大洋洲国家的稳定不变的背景下,“领土小的国家”和无边界公民社会的对立,只有包括以下因素才可以理解:维系他们的社会和祖国的多样性的个人和团体行动,以及他们网络

① 理解为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中介空间(intermediary space)。

② 这有时会变成问题:如何远离岛屿和人民而又继续做首领? 参考:Tui Atua Tupua Tamasese Taisi Tupuola Tufuga Efi (2004)。

的发展。我们不妨采取并修改克拉斯特(Clastres)的公式:在社会有助于维持大洋洲国家社会的多样性上,社会就是国家。

澳大利亚,一个当今的超级大国已经成为了“大洋洲警察”。在乔治·布什(George Bush)的压力下,它正在逐渐取代那些对入侵伊拉克不支持的太平洋国家和社会的权力。过去几年的混乱(Reganault,2005)毫无疑问是源于澳大利亚人对其后院的重视。而新的发展则可能使人对现存的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分析产生疑问。

## 参 考 文 献

BAMRIDGE, T. (2004), *Mobilité et Territorialité en Océanie*, *L'information géographique* n° 68, pp 195—211 (forthcoming 2007); *La terre dans l'archipel des Îles Australes (Pacifique Sud)*, Editions de l'IRD - Aux Vent des Iles.

BELGRAVE, Michael, KAWHARU Merata, WILLIAMS David, (2005), *Waitangi Revisited. Perspectives on the Treaty of Waitang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ONNEMAISON J. (1985), The tree and the canoe: roots and mobility in Vanuatu society, in CHAPMAN M., *Mobility and Identity in the Pacific islands*. Special edition of the Pacific Viewpoint, Wellington (1992); *Le Territoire enchanté. Croyances et territorialités en Mélanésie*, *Géographie et cultures*, n°3, pp 71—88.

CAPELLER Wanda and KITAMURA Takanori (1998): *Une introduction aux cultures juridiques non occidentales. Autour de Masaji Chiba*. Académie Européenne de Théorie du Droit de Bruxelles, Brussels: Editions Bruylant. p. 289.

CHIBA Masaji (1993), *Droit non - occidental* in Arnaud, André - Jean, *Dictionnaire encyclopédique de théorie et de sociologie du droit*. Paris: L. G. D. J.

CLASTRES Pierre (1974) *La Société contre l'Etat*. Paris: Les Editions de Minuit, p. 186.

COHEN Anthony P., (1994) *Self Consciousness. An Alternative Anthropology of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CROCOMBE Ron (1992)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in the Pacific Islands", in *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the South Pacific*. Institute of Pacific Studies. University of the South Pacific: p. 261.

FIRTH Raymond (1965) *Essays on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values*.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Monograph on social anthropology n° 28. The Athlone Press.

HAU'OF A EPELI (2000), "The Ocean in us" in HOOPER A. (eds), *Cultur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Pacific*, Canberra: Asia Pacific Press, pp 32—43.

HOOPER Antony. (eds), (2000), *Cultur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Pacific*, Canberra: Asia Pacific Press.

HUFFER E., and SO'O, A., (2000) (eds). *Governance in Samoa: Pulega i Samoa*, Canberra: Canberra: Asia Pacific Press and Suva: Institute of Pacific Studies, University of the South Pacific.

LARMOUR Peter (1997), *The governance of common property in the Pacific Region*, Canberra, National Center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and Asian Studie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Series: Pacific Policy Papers No. 19, 223.

NAEPELS Michel, (1998) *Histoires de terres Kanakes*.

*Conflicts et rapports sociaux dans la région de Houaïlou (Nouvelle-Calédonie)*. Paris: Editions Belin. p. 380.

OTTINO Paul, (1972) *Rangiroa : parenté étendue, résidence et terres dans un atoll polynésien*. Paris: Editions Cujas, p. 530.

REGNAULT J. - M. (2005), Une zone d'instabilité méconnue, le Pacifique insulaire, *Le Monde Diplomatique*, June 2005, p. 26—27; Vers la rupture des équilibres entre coutume, État, Église?, in *Relations Eglises et autorités outre-mer* (forthcoming) Paris : Les Indes Savantes.

TUI ATUA TUPUA TAMASESE TAISI TUPUOLA TUFUGA EFI (2004), "Resident, Residence, Residency in Samoan Customs", *Symposium on Concepts in Polynesian Customary Law*, University of Waikato, New Zealand.

SAHLINS M. (2000), Identités et modernités du Pacifique, vol. 1, n°1, pp. 19—25, *La Nouvelle Revue du Pacifique*,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WITTSERSHEIM E., (2006) Des sociétés dans l'Etat. Anthropologie et situations postcoloniales en Mélanésie, Editions Aux lieux d'être, p. 198.

## 23 澳大利亚和大洋洲 反新自由主义的抵抗运动

维尔特·博吉曼、安德鲁·尤尔

2000年9月,世界经济论坛亚太经济峰会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召开。而从9月11日开始(被称为S11),连续三天都有抗议和拦截活动。这些活动为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社会抗争注入了新的动力。这次抗议不仅在规模上(墨尔本街头聚集三万多人)引人注意,而且激进性质浓厚(《澳大利亚人报》报道说抗议者以暴力围攻峰会),可能会成为澳大利亚当代政治的转折点。这多方面非凡的活动到底是标志着澳大利亚出现挑战新自由主义计划的激进活动,还是仅仅表明只是无可暂缓的发展大势暂时出轨?还需要研究才能确定。

在世界的另一面,整整一年之后,发生在美国的恐怖袭击带来了转折。迫使运动暂时放弃矛头针对新自由主义,进而集中反对政府参与极不受欢迎的反恐战争(先是在阿富汗,继而伊拉克)。总理霍华德(John Howard)称澳大利亚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代理。继1980年代和1990年代社会民主反对党派之后,澳大利亚政府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深入地推动着新自由主义进程。

在战争背景下,新的高压反恐立法、福利社会的持续倒退,造成了社会不公更加尖锐、环境污染日益恶化。随着与美国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的签订,以及反对党在中央政策上与政府的立场基本

相同,澳大利亚变革的前景似乎颇黯淡。但是,S11反战运动以及此后兴起的捍卫公民自由、难民与劳工权益的各种运动,加上日益得民心的澳大利亚绿党(Australian Greens Party),还有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即认为新自由主义从根本上与平等民主价值相左)的再度兴起,都表明一个全新的政治与文化对抗时期的到来。这将给新自由主义带来日益加强的压力,也为针对澳大利亚资本主义基础的进攻开拓了空间。

本文将探讨澳大利亚从这些主要运动开始的反全球化运动的历史,并尝试在所谓的“反恐战争”背景下确定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发展时期。这是澳大利亚继越南战争以来首次不是被动地被拖进,而是积极投入战争(尽管遭到同样强烈的反对),这次是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对于那些参与到反自由主义社会抗争中的人来说,反恐战争带来巨大的不稳定,而且将会改变许多抗争的方向(如果是暂时的话)。通过强权式的反恐立法(明显为政府增强力量来打击那些被认为是代表恐怖主义威胁的国家),以及营造效忠政府及其计划的政治气氛,已经成为政府驯化各种质疑澳大利亚政治和经济中心动力的运动的强有力工具。

这里不可能全面勾勒出阻碍澳大利亚的反对运动的各种问题,以下介绍其中最重要的几点:

第一,澳大利亚对寻求庇护的难民采取的是压制方式。各种运动一直反对政府通过边界控制为这些“非法的非市民”建立集中营。

第二,由于澳大利亚经济结构的改变,劳工运动不断从破碎中演化出来,而政府则致力于控制那些可能孕育从根本上削弱自由主义教条、提出替代选择的元素。

第三,为保持批判性公共空间的文化抗争,从中激发所有能够与反新自由主义项目抗争中获益的社会力量。



## 一 澳大利亚城堡(和其他难民的避难地)

澳大利亚政府曾经明确地要建立白人澳大利亚(该教条于1972年被正式废除)的理想国。澳政府最近试图隔绝和控制那些对澳大利亚领土完整性构成威胁的中东国家难民,由此可以看得出其悠久的排外历史。2001年6月,总理霍华德在议会的演讲充分展示这种“保护领土完整”的渴望。为了粉饰澳大利亚军队强行占领并控制载着四百多名难民(从一艘快沉没的船上救下)的挪威货船MS Tampa的行径,霍华德说,“任何国家都有权利控制其边界,并决定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进入自己的领土。澳大利亚不会放弃这样的权利。”不管全球化批判者对政府权力受腐蚀有什么样的疑虑,至少对澳大利亚总理来说,入境权是绝对属于政府的。

对寻求庇护者的强制拘留政策,最初由工党政府执行,就如许多澳大利亚的政治文献将新自由主义经济教条扭曲地描述成经济理性主义一样,在目前联盟政府的领导下,这项政策的推行或许已经达到顶点。

很多国际网络组织普遍认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使资本日益自由流动,而人的流动却受到了制约。新自由主义的成功实施需要建立更强硬的边界政策,也就是更强权的政府,而不会构成任何矛盾。成千上万聚集在澳大利亚拘留营里的人,以及那些被锁在外面的不幸的人无疑体现了这种观点。确实,澳大利亚政府将寻求庇护者拘留在太平洋岛屿的“太平洋方案”,也许正暗示新秩序的建立需要对新的种族隔离的劳动分工提供新的解决方法。

因此,反对拘留难民已经成为反新自由主义运动的重心。最

显著的是2002年的Woomera和2003年的Baxter<sup>①</sup>这两种形式。针对“国内”形式的难民营的更广阔的抗议也同样聚集了众多同样的反对力量。在世界经济论坛上,抗议运动曾阻止倡导的主要知识分子和政客自由出入。令人感到讽刺的是,以前围绕在皇冠赌场外的统治阶层的运动,如今被整体的国家围堵,并将其视为保护国家的边疆。说得更准确一些,抗争运动在尝试质疑或颠覆国家决定谁有权进入这个或那个国家的权威。而反新自由主义运动遇上了最强大的障碍——国家民族主义。尽管国家民族主义不是新现象,但是构成反抗运动的不断转变的网络如果想超越这一障碍,并进而强调“我们的抗争要像资本一样跨越国界”这句口号,就一定要成为有基础的现实,而不仅仅是文字游戏。事实上,一个全新的跨国社群,应该是这项计划的中心,而不只是流于想象。

总的来说,新自由主义之战的疆域因为难民战争而变得更为广阔,丝毫不亚于反恐战争的影响。这也暴露了反全球化运动的相对薄弱。另一方面,反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抗争也展示出了反对现有经济政治格局,迫使政府诉诸更强更彻底的措施来控制那些危及政治与领土完整的力量。反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抗争在过去的几年里发展出了重要的新形式,具体表现在来自不同力量的辩论和分歧。

在政治领域,澳大利亚工党的支持度下降,而绿党得到的支持明显提高。澳大利亚工党过去曾经历过这种相似的意识形态危机,但这一次可能会失去一些曾经大力支持工党的进步力量。工人运动也处在危机之中,在工党推进新自由主义政策和敌对的联盟政府的背景下,他们要挽回逐步丧失的成员,就不得不采取议会领域外的新的有效行动。这样,工人运动和其他社会运动,特别是

---

① Woomera 是位于南澳的重要军事试验基地,也建立了难民拘留营。Baxter 也是拘留难民的中心。

环保运动的目标变得日益明确,即阻止工人应得的社会财富流失,从而有效地解决越来越可能发生的生态崩溃。

## 二 “全部带回家”——作为新殖民主义的新自由主义

在这方面,较之澳大利亚来说,新西兰的奥特亚罗瓦(Aotearoa)地区给了相反的经验。在许多方面,奥特亚罗瓦一直处于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前沿。作为“后殖民”社会,全球化在这里被许多原住民(毛利人)理解为殖民计划的拓展。对代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跨国集团的抗争,则被理解成反殖民主义的延续。根据奥特亚罗瓦教育家组织的解释,Tino Rangatiranga 的最接近的英语译文是自治权,虽然有很多人将其当成“绝对主权”或毛利独立。这样的概念将毛利人与“大地母亲”的联系表达出来,也是原住民追求自治权的国际推动力的一部分。

原住民对自治权的强烈渴望并非偶然,因此,在反自由主义的抗争中,原住民在将其推向社会的过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原住民对进入世界市场的抵抗体现了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也体现了他们几百年来反帝国主义抗争。至于虚构的“无人居住的大陆”(terra nullius,<sup>①</sup> 英国荒谬地宣称澳大利亚为无人的大陆,所以纳入大英帝国而无须顾及据称是虚构的原居民的权力),除了法律裁决外,原住民一直坚定争取应有的权利,也把它轰得落花流水。

另外,削弱澳大利亚反新自由主义力量对政治影响的局限,主要在于批判者无法提出令人信服的另类方案。正如“反资本主义”的名字所揭示的那样,针对这种运动的批判在于缺少一幅完全不同的世界秩序的远景。这是有明确反对目标的运动,但是缺乏明

---

<sup>①</sup> 1992年6月澳大利亚最高法院裁定推翻1788年英国抵达时声称澳大利亚是无人大陆的法律虚构。

确的另类出路。这时,原住民的抗争变得格外有意义。第一,他们使得非原住民团体将批判植根于反资本主义视角,这种视角在非西方国家源远流长。在澳大利亚,原住民社会发展虽然复杂,但有很精确的地权概念。在这种概念中,人们与从祖辈继承的土地(也是他们自己的出生地)有着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代表着一种职责和义务,要求保卫这土地、物种和人民,以免其遭受破坏和滥用,并且尽一切努力来耕种、使用、收获,以让土地保持生产力。正如葛波尔斯(Heather Goodballs)解释的,原住民的土地概念和西欧的地权概念(土地是私人财产,可以买卖和获利的商品)是完全不一样的。尽管经历了白人企图种族灭绝、持续的歧视和剥夺,原住民对白人控制的回应是发展自治的社会运动,提倡自力更生或自我管理,以及政治自决。这既反映了在更广泛白人社会内的新兴运动,亦以某种方式(即已发展亦未完全发展)巩固这运动。

祖德里(Aziz Choudry)极具说服力地指出:特别是对于生活在像澳大利亚和奥特亚罗瓦/新西兰殖民地国家的人民来说,当代反全球化、反新自由主义的运动首先要替这遗留的问题找出和解方法:

我们不能忽视几百年来,很多国家的原住民一直抵抗殖民政府。我们不能忽视我们所在国家的殖民基础。这样做等于掩饰我们社会的真正本质,及其背后殖民和剥削的历史。

当然,许多团体和抗争运动都在追求着揭示这样的现实。

### 三 反全球化作为替代国家和资本统治的激进选择

正如凯利(Aggy Kelly)和布萨(Andrew Blussat)所指出的,最近几年北半球社会反资本和企业全球化的运动有较大发展,并且在这些运动中形式又从层级和官僚的组织模式转变为更为去中心

和参与型的模式。在这种趋势下,澳大利亚和奥特亚罗瓦—新西兰也不例外。“S11—AWOL”的存在和PGA—Packifika的建立印证了这点。正如卡斯亚费卡斯(George Katsiaficas)所描述的,试图超越而非攻占政府的运动得到越来越多新生代活跃分子的共鸣,当代新自由主义似乎和以前形式的资本主义主导形式一样,正在制造自己的掘墓人。从政府政治结构中获得更多自主权的趋势并不局限于反全球化抗议活动。

#### 四 新自由主义和劳工运动

对于劳工运动来说,反新自由主义抗争直到最近还一直是防守型的战斗。1998年海事争议对工人来说可能是一次真正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阻止重要行业的去工会化),但这只是保持而非扩展工会的影响的斗争。进一步说,西雅图的例子证明,工会官僚与其他社会运动活跃分子之间的关系往往是既矛盾又合作的。在S11期间,一个本地官员曾吹嘘工会强加给抗议者工人阶级纪律的能力。

这不仅体现在本地高层工会拒绝支持采取类似西雅图游行的堵塞道路策略,更体现在工会小心地保持距离不让工人直接参与方面。维多利亚工会委员会(The Victorian Trades Hall Council)支持9.12游行更有这种明显的意图。然而,众多坚定的工会分子以小组为单位,绕过官方工会的政策(工人阶级纪律),参与堵塞道路的行动。新自由主义也许是可以让工会分子激动的问题,但S11的例子证明,澳大利亚劳工运动的工业与政治派别之间的关系变得史无前例的紧张。这为自主工会运动的重新建立提供了新的重要机会。

## 五 营造与维持异议的文化

能够给反新自由主义抗争带来力量的、捍卫和扩展批判公共领域(不管是真实或虚拟的空间)的需求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威胁。对于国际受众来说,警员对反峰会抗议的反应日益暴力化。我们很容易联想到2001年6月的哥登堡(Gothenburg)枪击事件,或者2001年7月在热那亚(Genoa)警察谋杀乔里亚尼(Carlo Giuliani)的事件。以及不久前,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至少有三名(最多可能是六名)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手无寸铁的学生被警察枪杀。澳大利亚的抗议者更无法逃脱这样的命运,政府已经效仿其他国家推出惩罚性法律措施。

和其他地方一样,澳大利亚的新立法使得市民更容易被监视,也使政府更容易召集武装力量来对付抗议市民,以及取缔他们所认为的“可能危及本国或其他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的组织,让ASIO可以拘留市民,不许他们和其他人接触,让政府给一些工会活动贴上公民抗命的标签,而甚至指其他活跃人士是恐怖分子,并以终身监禁作为可能的惩罚手段。霍京(Jenny Hocking)最近展示了像安全立法修正案法令等反恐措施,是如何以先发制人的控制对付政治异议者的。这些措施可能无法保护个体市民,但肯定保护政府,这些措施几乎引起所有组织的注意和反对。

在另一个层面上,思想战斗即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之战正持续进行。这场战斗的背景是政府对公共教育系统的攻击,不仅在传媒上敌视激进思想,而且也敌视对当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提出的温和的改良措施。资金充足的新保守主义智囊团与美国机构关系密切,企业资助对澳大利亚的政治历程影响巨大。辩论涉及原住民抗争、黑人和白人的历史关系、包括全球变暖在内的环境危机,以及工作关系重组和工人阶级(包括在日益竞争性的劳工

市场里无法找寻工作的人)分享越来越少的社会财富比例等问题。

然而,利用互联网作为国际联络的战略工具,也许可以颠覆这些企图。在这方面,由悉尼的“社区活跃技术”(Community Active Technology)的澳大利亚活跃分子开发的 Indymedia 建立的软件支持全球网络,是值得注意的。“‘活跃’组织支持大多数 indymedia.org 和所有的 active.org.au 网站,‘活跃’帮助确定了公共出版的概念。这是个免费软件,没有版权,完全可以在免费服务器上使用……”自 1999 年在西雅图建立以来,Indymedia 已经发展成为真正的全球网络,在五大洲一百多个城市都有活动中心。计算机连接的社会运动变得空前的重要。这不仅展示了新型社会运动的丰富资源,并且指出了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运动并不反对文化的全球化。

## 六 其他岛屿

在大洋洲的其他地方,反新自由主义的抗争主要集中在环保方面,特别是海平面上升的灾难性危害。这是一场岛屿人民决不能输掉的战斗。可是要禁止温室气体突然而惊人的排放程度,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要失败的,特别是美国和澳大利亚都拒绝签署京都条约。2003 年 7 月,在所罗门岛,经过长期的动荡后,澳大利亚对所罗门岛进行了军事干涉。但结果和东帝汶一样的徒劳。和伊拉克战争不同的是,这场军事干涉没有引起多少公众的抗议。澳大利亚战略政策中心的怀恩韦特(Ellie Wainwright)在 2002 年 10 月的采访中表示,所罗门岛“长期以来几乎是无法无天”,“恶劣的”经济环境,“混乱的社会治安”,为特别是那些针对澳大利亚的恐怖分子提供了肥沃的发展土壤。但是罗里马(Doug Lorimer)指出,自 1997 年 12 月开始,所罗门政府在澳大利亚和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货币基金的威迫之下,开始实行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项目,其

中涉及政府服务的私有化,大量的公共部门裁员……并对教育和卫生服务收取高昂费用。

换句话说,深入研究新自由主义历史的人都会发现这种熟悉的模式:通过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稳定化”和“结构调整”方案强加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导致经济、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有些发展甚至还需要军事干预。在其他地方,东帝汶也许从印度尼西亚的控制中获得独立,但是原荷兰殖民地西巴布亚(West Papua)的血腥抗争还在继续。“自由选择法令”(1963年将主权送给印度尼西亚)被西巴布亚的异议者讽刺地称为“无选择法令”。该省的独立团体仍然在坚持抗争。虽然澳大利亚政府反应冷漠,但是这些抗争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本地、区域甚至全球网络的关注。

## 七 结 论

正如本文开头所言,澳大利亚和大洋洲区域的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抗争正面临着因战争引起的众多额外障碍。这些障碍包括传统的激进性质、难民和流亡劳工,以及反恐和反异议的战争。只有时间能证明“9.11”事件为澳大利亚政府提供的额外的专制操控空间是否能够将这些抗争在可接受的限度内解决。虽然五角大楼和世贸中心受到的攻击给政府加强他们所在领土的控制提供了借口,但全球化的资本毕竟要靠劳工获利。因此,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很可能还要继续若干年。



## 24 澳大利亚的反新自由主义的斗争

维尔特·博吉曼、安德鲁·尤尔

保守的自由党—国家党联盟霍华德政府 2004 年 10 月 9 日的再次当选,给了澳大利亚的反新自由主义斗争当头一击。然而,即使是工党获得胜利也同样不会终结新自由主义规划,因为工党并没有提出严肃的、批判性的替代方案。在 2004 年,该党没有反对美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这一协定就是一个新自由主义议程,它给予公司以巨大的权利并威胁到公共的补贴、管制和财产<sup>①</sup>。工党在选举期间代表的政策与执政联盟的政策相比只不过是稍多支持对公共部门的补贴,尽管选民最为关切的两个问题是公共医疗和教育体系增加资金投入<sup>②</sup>。

因此,这次选举巩固了绿党作为工党左翼的议会党的角色。和德国绿党类似,该党的主要原则有:生态可持续性、社会和经济的公平与正义、草根民主、裁军和非暴力。百分之七的选民投票支持绿党,现在有四位绿党参议员。绿党得票和议员数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以下原因:工党的选民因工党不愿意挑战新自由主义而心灰意冷,不再支持该党。

---

① Linda Weiss, Elizabeth Thurbon, John Mathews, *How to Kill a Country. Australia's Devastating Trade Deal with the United States*, Evatt Foundation Papers, April 2005, <http://evatt.labor.net.au/publications/papers>

② Morgan Poll, 17/04/04, [www.roymorgan.com/news/polls/2004/3730/](http://www.roymorgan.com/news/polls/2004/3730/).

不过,真正的战斗是在议会之外进行的。“不要枪口下的全球化”(No Globalisation at Gunpoint),这是2003年9月世贸组织坎昆会议期间的“重大城市动员行动”的口号。随后,反公司的情感在小型的团体活动而不是在大型抗议活动中表现出来。例如,2004年5月在墨尔本,反资本主义的斗士们要求重新获得市内的仓库式收容所,他们组织讲习班、论坛和其他活动,在四天里突出揭示了自“9.11”事件后澳大利亚政府所宣布的“紧急状态”的虚伪:“对于那些受剥削的、贫穷的、个别的、被剥夺了选举权的人来说,什么也没有改变。资本主义一直……在剥削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创造力,以及我们生活的星球……紧急状态不是例外,而是通则。”那些更受到人们尊敬的反对人士在诸如“现在我们人民”(Now We The People)<sup>①</sup>这样的进步组织内提出对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sup>②</sup>。支撑着当前反资本主义动员的能量也被调整方向来进行其他紧急活动。

和平运动从反资本主义网络发展而来,也吸引了非常广泛的支持。2003年2月16日,一千九百万澳大利亚人中的五十万举行示威游行,抗议澳大利亚参与对伊拉克的入侵。2003年10月23日,布什总统访问澳大利亚。由和平运动组成的团体在首都堪培拉组织了一次“全国聚会”。当布什向议会发表演说的时候,绿党参议院鲍勃·布朗(Bob Brown)和凯利·内特尔(Kerry Nettle)突然插话并被带离议院。反布什抗议行动的主题有:军队撤出伊拉克;不要自由贸易协定;打碎霍华德—布什同盟;给予巴勒斯坦正义;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运动谴责美国政府支持给予富国压榨穷国的特权的全球贸易规则,拒绝签订东京温室气体议定书和核

---

① [www.nowwethepeople.org](http://www.nowwethepeople.org)

② [www.nowwethepeople.org](http://www.nowwethepeople.org)

不扩散条约,支持顺从它的独裁统治<sup>①</sup>。

通过上述方式,和平运动清楚地提出了一份广泛的激进议程。整个2004和2005年,他们组织了一系列重要的示威游行、会议和集会。持续进行的和平活动影响了舆论。当霍华德在2005年3月向伊拉克增派四百五十名士兵的时候,63%的澳大利亚人表示不赞成这一增兵行动,51%的人则根本不赞成在伊拉克驻扎一兵一卒<sup>②</sup>。

同样从反资本主义的环境中发展起来并依赖于广泛支持的,还有“难民权利运动”。该运动反对政府实行的对“非法”移民予以强制拘留的政策。尽管政府对关押在营地中的移民进行妖魔化,该运动开展的活动还是使得公众对难民的同情增加了。政府对难民的惩罚方式扩展到停止一切实际形式的支持,特别是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支持,所以“难民权利运动”的行动主义分子为难民建立了支持中心,以多种形式向难民提供支持。进步律师替被拘留者辩护,争取释放他们。全国范围的社会运动中的典型团体“难民行动集体”(Refugee Action Collective)的要求有:废除强制拘留;关闭营地;取消临时签证;允许船只靠岸;同种族主义诬陷作斗争。该组织宣称,当它为那些逃来的受迫害者争取权利的时候,“这不仅仅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因,而且也是为了理解和改变造成目前这种局面的深层次的政治、社会、经济问题”<sup>③</sup>。

2004年12月中旬,澳大利亚的难民支持者举行了一次周末抗议,要求为寻求避难的人提供正义,要求结束强制拘留。2005年2月1日,他们举行了一次全国性的行动,反对各大城市的阿联酋国际航空公司办事处允许移民部使用他们的航班强制运走寻求

① [www.cat.org.au/lists/leftlink/](http://www.cat.org.au/lists/leftlink/) accessed 16/09/03; [www.stopdubya.org](http://www.stopdubya.org)

② Morgan Poll, 11/03/05, [www.roymorgan.com/news/polls/2005/3842/](http://www.roymorgan.com/news/polls/2005/3842/)

③ [www.rac-vic.org](http://www.rac-vic.org), accessed 28/04/05

避难的人。2005年3月23日,来自澳大利亚全国各地的抗议者聚集在移民部部长阿曼达·万斯通(Amanda Vanstone)的住宅外面,然后朝位于南澳大利亚沙漠的巴克斯特拘留中心(Baxter Detention Centre)前进,继续进行针对政府移民政策的周末抗议活动。

霍华德政府还对土著澳大利亚人推进行进攻性的政策,这种政策受到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凯思·温德舒特尔(Keith Windschuttle)从理论上的支持。温德舒特尔认为,白人定居者对土著澳大利亚人的虐待被“具有明显的左派信念的大学教师”夸大了。温德舒特尔的观点遭到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的反驳,这在2003年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切,并被称为“历史战争”<sup>①</sup>。2005年霍华德政府取消了土著居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委员会(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Commission),该委员会由土著澳大利亚人选举产生,职责是向政府提出建议,规划与土著澳大利亚人相关的政策,以及监督这些政策的执行。

政府在2005年立法禁止大学强制从学生那里为学生联合会收取会费。全国的大学生在4月28日举行抗议,反对这种对他们支持自己校园组织的能力和他们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能力的压制。政府还签署了在劳资关系方面完成新自由主义议程的立法,该法案将增加雇主任意雇工和解雇的权利,破坏工会的作用和工人集体谈判,而不是接受单个合同的权利<sup>②</sup>。因此,工会运动正在准备一场更大的对抗。

---

① Stuart Macintyre and Anna Clark (2003) *The History Wars* (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② Warwick McDonald, *Curtailing Worker Rights*, Evatt Foundation Papers, April 2005, <http://evatt.labor.net.au/publications/papers>

## 二 欧 洲

### 1 欧洲范围内开展动员工作的原动力

贝尔纳·德莱约诺

如果观察一下欧洲的各类社会运动,人们就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欧洲现在已经成为各种政治力量的角斗场,在这里人们似乎看不到多少社会运动取得轰动效果的余地。

一提到欧洲,人们就要分成好几个层面进行分析。首先,从传统意义的层次上讲,欧洲国家之间的“欧洲平衡”仍然是各国政治的考虑范畴。其次,在流行的政治语言中,“欧洲”这个词指的却是“欧盟”。同时,在上述两个层次之间还存在着一个欧洲的公民社会,即欧洲的各类社会运动。最后,欧洲作为世界上的一个地区,是全球化多种表现的场所之一。

所以,欧洲范围内的社会和政治动员工作的全景画面就变得万分复杂。就欧洲公共舆论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这件事来说,总的反映看起来是一致的,但是各地群众的动员情况却并不相同。在几个参战的国家(如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示威行动的规模很大,要比一些非参战国家(如法国、德国、比利时)的规模大得多。但是,在某些由亲美政府执政的国家(如丹麦、荷兰、波兰、匈

牙利等),群众动员工作仍然很弱。此外,西班牙在2004年举行大选后争取到了把该国部队从伊拉克撤走,这一行动对英国和意大利来说至今仍有激励作用。但必须看到,支持伊拉克和中东人民的思想工作与行动开展得还远远不够,而且当地的局势目前也还在变化。

全球化对社会运动产生了消极的后果,包括明显削减支持其他地区的团结性项目,并对社会保障体制持否定态度。这种情况虽然在很多国家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对情绪,但形势至今仍未得到扭转。例如,2003年奥地利和法国的争取退休者权益的罢工,2004年德国反对削减福利的哈茨计划的斗争,以及法国教师、研究人员和艺术家的行动,荷兰运输业工人的斗争,意大利群众性的总罢工都属于这类情况。同时,意大利的总罢工也加强了反对贝尔斯科尼政府的政治抗议。

虽然这类运动的倡导者经常说,必须在欧洲范围内共同行动起来。但是,要达到这样大的规模,实在是很难做到的。这不光涉及什么样的问题才能在全欧洲范围内把各类斗争汇合起来的问题,而且还涉及如何才能在全欧洲范围内促进人民大众的共同觉悟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着眼,对21世纪初在欧洲举行过的几次群众性大型集会进行研究,就显得很有意义。从数量上来讲,这些大型集会都取得了成功,无论是反对欧洲峰会(特别是2001年在尼斯和2004年在萨洛尼卡)的大集会,还是其他(2001年在热那亚反对八国集团会议,2003年在拉扎克和2004年在日内瓦—阿纳马斯)的大型集会,当然还有2002年在佛罗伦萨、2003年在巴黎—圣德尼,以及2004年在伦敦召开的欧洲社会论坛,情况都是如此。但当这些群众性的大集会以欧洲问题作为中心议题时,群众集会的规模就会变小,不如讨论专业或世界性问题那么激烈。例如,欧盟各国政府领导人在尼斯讨论基本权利宪章和在佛罗伦萨举行欧洲社会论坛时,正是开始起草欧洲宪法条款的时候,大多数

社会运动都没什么反应。而关于服务业自由化的“博尔斯坦法令”，在伦敦的社会论坛则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关于在法国把带伊斯兰面罩的学生开除出校的问题更引起了戏剧性的讨论。

当欧洲的舆论和社会运动讨论“欧洲宪法条款”时，尽管在欧盟二十五个成员国中已有十个国家把这样一个重大问题提交人民公决，但2005年欧洲群众的讨论气氛（除在西班牙积极投票外）还是很不够的，而在荷兰甚至遭到了否决。在讨论中占统治地位的还是那些民粹主义者和排外主义者的观点。幸亏当时法国是个例外。那时候，法国掀起了一个群众性的大辩论。在法国投票否决的这一胜利中，否定该条约的新自由主义性质，在人们心中发生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在欧洲范围内，所有反对新自由主义倾向的人们，在下列问题上的意见并不一致：是否需要否决这样一部“宪法”？毕竟否决“宪法”后会加大竞争的局面；那么是否应该接受这部“宪法”？可是接受以后，它会提供政治干涉的手段。

然而在90年代中期，即“欧洲一体化进程”开始时期，在马斯特里赫特条款签订并进一步讨论阿姆斯特丹条约的时候，有好几种在欧洲范围内开展动员的工作开始发展起来。欧洲工会联合会在“法国雷诺汽车工厂事件”这样具有象征性意义的纠纷中表示出某种积极性。在阿姆斯特丹欧洲高峰会议期间，“欧洲的反失业进军”曾经动员了大批示威群众。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网络随后就把欧洲问题传播到各类社会运动之中，然后再把各类运动的要求提交到各个欧洲机构中去。这两方面的努力收到的效果虽然很有限，但事情毕竟已开始发生变化。

2005年3月19日，在伦敦的“社会论坛”上决定下来，并得到“欧洲工会联合会”及其下属各会员组织支持的游行示威，是否可以看做是欧洲范围内动员工作的一次真正的创新呢？法国和荷兰否决“欧盟条约”而引起的欧洲危机为这一次创新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条件。一方面，布莱尔代表英国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担任欧盟

轮值主席,他竭力利用这一点来推动自己的新自由主义和大西洋主义立场;另一方面,欧洲各类社会运动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感觉到提出应对欧洲方案的各方面深刻危机的具有进步意义的建议的重要性。这些社会运动需要克服自身的分歧和力量分散,并且在欧洲各国间的稳定公约以及经济和货币政策危机、预算危机,欧洲各国间的相互支持,欧洲扩大条件的危机,与邻国的联合,欧洲独立意志的危机等等问题上团结起来。



## 2 欧盟与另类世界运动的 “内部威胁”

本·海斯、托尼·布尼安

国家在面对大型民众示威时主要有三种应对方案：一是满足抗议群体的要求，或至少通过对话和辩论予以承认；二是判定示威者有犯罪动机和犯罪行为；三是镇压实际的示威、政治活动乃至抗议权利（布鲁尔等，1988）。在这三种之外，我们可以再加一种：遏制。这是各国政府针对 2003 年早些时候的全球大规模反战示威采取的一种更温和的做法。实际上，当各国面对持续的政治抗议时，采取第一种方案的是凤毛麟角，大都采取第二和第三种方案。最近，欧盟就是这样，针对增长中的反全球化运动，采取“遏制”的做法也越来越少，越来越多地施以“镇压”和“定罪”。

### 一 申根(Schengen)信息系统

2001 年哥德堡和热那亚发生高调的示威之前很久，申根国家和欧盟的成员国已就关于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的警察合作措施达成协议<sup>①</sup>。可能其中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建立申根信息系统(SIS)，

---

① 《申根协议》于 1985 年签署，《申根实施公约》于 1990 年签署。《阿姆斯特丹条约》于 1999 年生效，将申根协议纳入欧盟框架。本章引用的所有申根条款都已写入 1990 年《公约》。

这是庞大的数据库,1995年上网,目前覆盖十五个国家<sup>①</sup>。参与国向 SIS 提供关于以下人物的数据:应予以逮捕的和被通缉的人员、应予以羁押的人员、应予以监视的人员、应予以特别检查的人员、应拒绝进入边境的人员(无论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或者是移民方面的考虑),还有丢失或被盗的物品资料<sup>②</sup>。根据“国家安全”条款第九十六条,关于抗议者和政治活跃分子的数据已经被输入 SIS<sup>③</sup>。输入内容包括一项法律惩罚条款——不许进入某些特定国家(或者,非欧盟国民不许进入整个申根区域),这等同于准犯罪记录,尽管有数据文件的人实际上还没有被宣判有罪。我们可以以斯蒂芬尼埃·米尔斯案为例说明这个“最显而易见的政治性警察监控(political policing)”。斯蒂芬尼埃·米尔斯是“绿色和平”组织的活跃分子,由于法国政府将他的名字和“绿色和平”组织许多其他人员的名字输入 SIS,他被拒绝进入整个申根区域。<sup>④</sup>

公众不知道 SIS 里有多少抗议者的资料,因为经过分类的统计资料从来没有公布过。1998年以前,每年会公布基本数目,但在申根被并入欧盟框架以后,有了“非正式的”决议,就不再这样做了<sup>⑤</sup>。国家观察(Statewatch)得到的几份未发布的文件显示,2003

① 英国和爱尔兰是欧盟唯一没有加入 SIS 的国家,不过,目前正在计划纳入警察合作行动。挪威和冰岛根据一项协议加入《阿姆斯特丹条约》。加入欧盟的国家将加入 SIS II。

② 详细分析 SIS 和欧盟其他的数据库,参见 Mathiesen (1999)。

③ 根据第九十九条,抗议者可能被监视,或者受到特别检查,例如特别搜查。

④ 法国对“绿色和平”组织的敌意要从该组织抗议法国在南太平洋进行核试验说起,之后,法国对该组织进行鱼雷攻击,击沉该组织的旗舰“彩虹斗士”(参见 1998年9月至10月《国家观察公告》[Statewatch Bulletin]第8卷第5期)。另外,臭名昭著的案件是布尔兄弟案件。他们两个是威尔士的足球球迷,姓名被英国 NCIS 发至比利时后,被比利时驱逐出境。后来,他们的姓名又被发到卢森堡当局,卢森堡当局声称他们在安全检查时“破坏秩序”。他们被拘留十六小时后戴着手铐被驱逐出境。两兄弟等了六年时间,名字才被从国家记录和申根记录中除去(皮尔斯,2000:188;1996年7—8月《国家观察公告》第6卷第5期)。

⑤ 《国家观察新闻线上》,2001年4月,<http://www.statewatch.org/news/2001/mar/07accountab.htm>。

年3月5日,SIS总共收入877655人的资料<sup>①</sup>。其中89%被记录在第九十六条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将被拒绝寻求庇护。关于数据保护的申根联合监督管理机构正在编写一份有关将抗议者资料输入SIS的合法性的报告,让我们拭目以待。

## 二 1997年欧盟联合法案(Joint Action)和阿姆斯特丹示威

欧盟关于社会治安的第一项实质性措施,是1997年关于“法律、秩序和安全”的联合法案<sup>②</sup>。这项措施是由荷兰倡议的,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该法案的协议恰恰是在1997年6月阿姆斯特丹欧盟峰会期间的五万人“Eurotop”大示威之前达成的,阿姆斯特丹逮捕了三百一十七人。所有示威活动总体上是和平的(虽然为了不让国家首脑们安睡而显得有点嘈杂),但是,所有示威活动都依据立法受到了控告。他们被宣告有罪,因为他们是“旨在犯罪的组织的成员”。显然,在之后的一年,针对“犯罪组织成员”的欧盟联合法案的模式被协议通过<sup>③</sup>。阿姆斯特丹峰会期间的治安工作为未来的政策和操作行为定下了基调<sup>④</sup>。

关于法律和秩序的欧盟联合法案延伸了1996年欧盟理事会

① 官员们估计,十五个国家有将近十二万五千个终端可以进入SIS。

② 联合法案 97/339/JHA,OJ 1997 L 147/1, <http://www.statewatch.org/news/2001/aug/japubord.htm>。

③ 联合法案 97/733/JHA,OJ 1998 L 351/1。

④ “为了干扰希拉克和布莱尔安睡,抗议者付出的代价是不菲的……一百多名(抗议者)被立即驱逐出境,根本来不及向法院提出对拘留作裁决(对欧盟的自由行动法的违反程度令人瞠目),其中有些人被驱逐出境时甚至没有带上随身物品;丹麦领事被禁止探望被拘留的本国入,其中有些人被一架军用飞机送回了丹麦,该军用飞机有荷兰一架战斗轰炸机护航;被指控人员的资料被至少交给某些警察情报机构,尽管在进行指控时严重滥用公诉人的酌处权。不知道有多少人的资料被输入欧盟不同的数据库,或在欧盟公众治安专家的特别会议上被传阅过。那些没有被驱逐的人拘留三天后被释放,其中有些人声称遭到警员的虐待,被拒绝打电话的权利,但这些行为没有一项曾被定罪。”(皮尔斯,2000:225)

关于合作打击足球流氓行为的建议条款。足球流氓行为经常被当作政策的试验场,而这些政策此后将被应用于一般的公众治安问题中。这样一来,欧盟的每个成员国都有义务互相提供信息,“如果一定规模的团体对法律、秩序和安全构成了威胁,并试图前往另外一个成员国参加活动。那么,中央机构有关成员国将按照请求或者主动提供信息”。

### 三 第二条第二款:通过边境控制抵制抗议活动

由于欧盟各成员国政府关注对抗议活动的镇压,所以,《1990年申根公约》中一条很少被提到的条款也有了用武之地。《公约》第二条贯彻了各成员国关于废除内部边界的基本承诺,尽管其远没有成为现实<sup>①</sup>。而第二条第二款允许申根国家“在公共政策或国家安全需要时……在限定期间内”重新启用边境检查措施。比利时政府是第一个使用该“例外条款”的,那是2000年早些时候实行一项移民规范化计划期间。该条款的首次使用是为了阻止抗议者参加法国轮值欧盟主席期间的示威活动。当时,法国和西班牙为2000年12月的比阿里兹(Biarritz)峰会都重新启用边境控制措施。从那以后,截止到2003年早些时候,为了抑制国际峰会期间的示威活动,该条款至少曾经被用过十四次<sup>②</sup>。这项条款不只意味着在限定期间内进行身份检查,而且意味着数以几百计(有时是数以千计)的人会被拒绝进入他们要去的成员国,从而惊人地约束了人的流动自由这一最基本的行动自由。例如,在热那亚八国峰会的预备阶段,意大利边界有大约二千零九十三人被拒绝入境<sup>③</sup>。

① 2003年1—2月《国家观察公告》,第3卷第1期。

② 2003年2月《国家观察欧洲监视器》,第3卷第4期。

③ 2001年5—7月《国家观察公告》,第11卷第3、4期。

法国埃维昂(Evian)八国峰会期间,从会议前十天开始,有六个国家重新启用了边境控制措施,为期两个星期<sup>①</sup>。

#### 四 哥德堡、热那亚和“9.11”:判定左翼是罪行

2001年6月14日至16日期间的瑞典哥德堡欧盟峰会使抗议活动受到了媒体的关注。当时,有两名示威者遭警察枪击,大约五十人被长时间拘留,大约四百人的名字据说被加入了SIS。在一个月后的热那亚抗议活动前,欧盟法官和国内事务部长们已经就“欧盟理事会会议和其他类似活动的安全”协议通过一项广泛的战略<sup>②</sup>。该战略旨在加强警察合作、情报搜集和交流、内部边界检查、司法合作和联合组织措施。欧盟层次的“行动控制”工作被委派给欧盟警察局局长特遣队。该特遣队是1999年10月在芬兰坦佩雷(Tampere)峰会期间建立的,目前还没有进行活动的法律依据,既不受充分的民主控制,也没有任何的公共问责性。这些特点可以从下面这个事件中看出来。

在热那亚,卡罗·乔利亚尼(Carlo Giuliani)被保安人员的卡宾枪手近距离射中头部。仅仅过了不到两个月,这可怕的场景就被在美国发生的恐怖袭击所掩盖了。“9.11”事件对欧洲各国的国家政策和欧盟政策有着直接而持久的影响,当然也直接左右了抗议的框架。一个星期之内,欧洲委员会提出草案,制定出关于打击恐怖主义的框架决定<sup>③</sup>。仅仅六个星期之后,该草案决定就被“政治上通过”。这是欧盟决策中史无前例的一次快速决定。对比欧

① 欧盟理事会文件,9537/03,2003年5月23日。

② 欧盟理事会文件,10916/01,2001年7月16日,<http://www.statewatch.org/news/2001/jul/109116en1.pdf>。

③ 《国家观察新闻线上》,2001年9月,<http://www.statewatch.org/news/2001/sep/14eulaws.htm>,参见 Mathiesen (2002)。

盟在协调刑法上的记录,这次实在快得惊人。

抗议活动被直接包含在“恐怖主义”的定义里。该定义还列举了许多严重程度较低的犯罪行为,包括偷盗、抢劫和“非法占领”“公用场所”或“国家或政府设施”。“毁坏”这些场所的行为也被算作恐怖主义。不过,这些犯罪行为只在其具有恐怖主义意图时才能被算作恐怖主义行动。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委员会提出的“恐怖主义”定义竟然还包括了以下行为:“个人或团体针对一个或多个国家、公共机构或人民的有意犯罪,旨在恐吓人民、严重改变或破坏国家的政治、经济或社会结构。这些行为将按恐怖犯罪论处。”

像几乎任何政治抗议、工业行动或环保抗议活动一样,哥德堡和热那亚的示威活动可以很容易地被说成有明确的“严重改变或破坏政治、经济或社会结构”的目的。欧盟理事会(十五国政府的代表)对该定义进行了扩展,将“改变”一词改成“影响”,这样一来,该定义几乎是无所不包<sup>①</sup>。该委员会还在“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之后加上“国际组织”。最终,在2001年12月6日达成政治协议中,正式通过采用的恐怖主义定义是这样的:严重恐吓某国人口,或无端强迫政府或国际组织履行或放弃任何行为,或严重扰乱或破坏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基本政治结构、宪法结构、经济结构或社会结构(第一条第一款)。<sup>②</sup>

协商期间,欧洲议会和欧盟一些成员国国家的议会对这一定义过宽的范围的表示了担心。但是,由于他们没有权力“共同决定”(codecide)、修改或否决政策,他们的担心被忽略。实际上,在正式协商以前,各国政府已经就该定义的正文达成了行政协议。

① 《国家观察新闻线上》,2001年10月, <http://www.statewatch.org/news/2001/oct/08counterr.htm>。

② 《国家观察新闻线上》,2001年12月, <http://www.statewatch.org/news/2001/dec/07terrddef.htm>。《框架决定》出版于 OJ 2002 L 164/3。

在“9.11”事件所造成的政治气候中,持不同意见的人无权置喙。不过,对抗议过宽定义的民间社会团体、律师和议员,有三个明显的让步<sup>①</sup>。“占领……公共场所”被换成“造成公共场所……广泛损坏”。另外,导言中加入一条陈述内容:

“本框架决定中的任何内容都不可以被解释成有意减少或限制人民的基本权利或基本自由,如:罢工的权利、集会的自由、联合的自由、表达的自由,包括每个人为了保护个人的利益与其他人一起组成工会或加入工会的权利,以及相关的示威权利(第十条陈述)。”

欧盟少数成员国政府曾想直接指明反全球化运动,但是,非常重要,这没有被包括在内。取而代之的是,对基本自由的尊重只有在这些自由与工会工作有关时才得到保证,显然,当这些自由与较为广泛的政治抗议活动有关时是不能得到保证的。最后,欧盟法官和各国国内事务部长的一个声明被加入框架决定:

“(恐怖主义的定义)也不能被解释成为将执行合法权利表明个人意见的人按恐怖分子论处,即使这些人在执行这些权利的过程中有犯罪行为。”

然而,这个明显的让步并不意味着任何具体的保证。政治声明只是声明而已,没有法律效力。因此,尽管公众相信与此相反的可能性,欧盟成员国还是已经留下了把恐怖主义法案套在抗议活动头上的可能性。对欧盟来说,严峻的考验就是,将有多少成员国在实践中应用这个界定。

2002年2月,西班牙政府说明意图时多少更加清楚一些。当时,西班牙在轮任欧盟主席时建议将“进行关于恐怖主义事件的信息交流”加入欧盟理事会决定。这项听起来无伤大雅的措施一开

---

<sup>①</sup> 《国家观察新闻线上》,2001年11月, <http://www.statewatch.org/news/2001/nov/26appeal2.htm>。

始就声称：

“(欧盟恐怖主义)工作组已经注意到,各种不同的欧盟峰会和其他活动期间,由激进的极端主义分子团体制造的暴力和犯罪破坏行为正在逐渐增加,这些团体显然是恐怖团体……这些行为是松散的网络行使的,这个网络隐藏在不同的社会阵线后面。我们的意思是,有些组织利用合法地位通过这些行为来帮助实现恐怖主义团体的目标。”<sup>①</sup>

另外,西班牙人还主张:欧盟应该对此做出反应,将这些行为写入关于打击恐怖主义的框架决定的第一条。

按照西班牙的提议,欧盟的各成员国应就以下信息进行交流,这些信息涉及“有与恐怖主义相关的前科记录的个人”,显然要提到其刑事犯罪记录(即使只是情节较轻的扰乱公众秩序的行为)。但是,该提议又这样说,对于国内法律允许“情报”(猜测或推测)交流的国家来说,这项要求并不必要<sup>②</sup>。结果,许多政府公开保持与西班牙提议的距离。因此,第五份草案目前已经是一项没有约束效力的欧盟理事会建议。该草案声明:“在其他一些代表团的支持下,荷兰代表团认为,对决定所涉及个人的描述过于模糊。”<sup>③</sup>

西班牙的这项提议措施最终于2002年11月被通过,并仍然指出存在“这样的风险:恐怖主义组织利用较大型的国际活动进行恐怖主义犯罪活动,后者是由打击恐怖主义的框架决定第一条所界定”,还有“各种松散恐怖主义网络”的活动,以及“分析与提早主动监视的必要”。<sup>④</sup> 根据这项没有约束效力的委员会建议,那些想

① 欧盟理事会文件,5712/02,2001年1月29日,<http://www.statewatch.org/news/2002/feb/05712.pdf>。

② 《国家观察新闻线上》2002年2月,<http://www.statewatch.org/news/2002/feb/07protest2.htm>。

③ 欧盟理事会文件,5712/5/02,第五次修订本,2002年4月9日。

④ 采用的建议,见<http://www.statewatch.org/news/2003/apr/spainterr.pdf>。



要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名来交流抗议者资料的国家就可以恣意而为了<sup>①</sup>。这些条款被以建议的形式通过,也就意味进行交流时,没有必要征求欧盟议会或欧盟各成员国议会的意见。

欧洲刑警每年在欧盟做的恐怖主义形势报告也主张,抗议群体与恐怖主义分子之间存在这种编造出来的联系。2002年2月的报告首次新加了两类行为:“无政府主义者—恐怖主义”和“生态—恐怖主义”(eco-terrorism)<sup>②</sup>。尽管报告没有定义或举例说明“生态—恐怖主义”,但是它却主张:“激进的环保主义者和动物权利运动虽然一直保持着一定限度,但是,他们造成的物质损失却是巨大的。”关于“无政府主义者—恐怖主义”,报告提到“左翼恐怖主义复苏”的可能性,并提到“欧盟南部”出现的一连串恐怖袭击。实际上,以上所有恐怖袭击都发生在意大利。其中至少一起,即G8峰会之后在威尼斯正义(Giustizia)广场外面发生的爆炸案,是右翼极端分子所为。但是,欧洲刑警的报告根本没有提到“极右”。通过欧洲刑警的“威胁评估”报告,我们发现,西班牙政府努力地将越来越多的巴斯克激进行动分子(如:青年和囚犯支持团体)与ETA联系起来,并通过这种手段指控他们有罪。

## 五 镇压抗议活动:“麻烦制造者” 数据库、旅游禁令和准军事治安措施

哥德堡和热那亚示威游行之后,欧盟法官和各成员国国内事务部长要求各国建立“麻烦制造者”数据库。但是,这不是以刑事

① 2002年3—4月《国家观察公告》,第12卷第2期。《国家观察新闻线上》,2003年4月,http://www.statewatch.org/news/2003/apr/16spainterr.htm。

② 欧盟理事会文件,5759/02,2002年1月31日,5759/1/02,第一次修订本,2002年2月20日,全文见2002年2月《国家观察新闻线上》报导,http://www.statewatch.org/news/2002/feb/10anarch.htm。

程序为基础,而是以猜测和推测为基础的,而且不参照关于数据交流的法律标准或数据保护规定<sup>①</sup>。他们还希望各国立法机构允许欧盟成员国通过相关法律,阻止被记录在案的人员或已被指控犯有轻微破坏公众秩序罪的人员参加在其他国家举行的抗议活动。托尼·布莱尔将抗议者描述成“无政府主义的”巡回马戏团<sup>②</sup>,欧盟的七个成员国政府——德国、瑞典、葡萄牙、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和英国都随声附和。他们想更进一步,建立欧盟数据库,对欧盟所属范围内可疑的“麻烦制造者”实行旅游禁令。<sup>③</sup>

“9.11”袭击一个月后,比利时轮任主席时提出的一项建议反映了七国的愿望:扩大 SIS 范围,将“潜在的危險人物”都包括进去,阻止他们进入举行“体育、文化、政治或社会活动”的国家。根据该提议,SIS 的范围应该扩大,从而“警惕”按照《申根执行公约》(*Schengen Implementing Convention*)第九十九条,警察部门确认的已经进行过公认扰乱公众秩序行为的人”。<sup>④</sup> 根据该计划,警察部门目前可以将这些人的姓名输入 SIS,要求对他们进行“秘密监视或特别检查……如果有真实的迹象表明,有关人员有意进行或正在进行大量和极端严重的犯罪行为……”

根据该提议,《公约》的第九十九条应得到延伸,这样一来,SIS 将包括这样一些人:他们“有旨在威胁公众秩序或公共安全的组织、制造、参加或煽动麻烦的意图”。

“警惕”这些“麻烦制造者”就意味着,“在活动之前和之后的限定期间内,这些人会被禁止进入举办活动的国家”。

① 欧盟理事会文件,10916/01,2001年7月16日,http://www.statewatch.org/news/2001/jul/10916en1.pdf。

② 《卫报》,2001年7月21日。

③ 《国家观察新闻线上》,2001年8月,http://www.statewatch.org/news/2001/aug/12poreport.htm。

④ 《国家观察新闻线上》,2001年11月,http://www.statewatch.org/news/2001/news/2001/nov/19sis.htm。

2001年4月,这些提议被纳入SIS II计划。SIS II是“第二代”的SIS系统,范围延伸,职能扩大,吸收加入欧盟的所有国家<sup>①</sup>。尽管有关的讨论显然还在进行<sup>②</sup>,但是,可见的前景仍是根据各国(警察和国内安全机构)搜集的信息,针对“已知的个人”。假定在欧盟某成员国举行的某特定活动受到“威胁”,该国的警察和国内安全机构将进入SIS掌握的可疑“麻烦制造者”数据库。这样一来,就剥夺了人们在欧盟自由活动和进行抗议的权利。正如先前建议的,将建立准刑事记录。而且,国家建立“已知个人”记录,意味团体和组织十分普通的和日常的政治活动都将经常被监视。

## 六 欧盟防暴警察

意大利热那亚示威游行之后不久,德国内务部部长奥托·施利在意大利内务部部长克劳迪奥·斯卡约拉的支持下,要求成立欧盟防暴警察部队。尽管人们认为这在短期内不可行,但还是提出了这样的期望:未来建立在欧盟内部使用的快速反应部队<sup>③</sup>。在施利·斯卡约拉提出要求之后,德国正式提议建立“针对进行暴力行为的旅行罪犯”执行“联合协调措施”的“特别部队”;建立“共同战术框架”;进行“大规模(紧急)局势”培训,从而将抗议活动与“紧急事件”联系起来;配置“具有指挥、控制和作战手段(如:电台、武器、

① 《国家观察新闻线上》,2001年4月, <http://www.statewatch.org/news/2002/apr/01sis.htm>。

② 引起较少争议的提议正在计划,立法通过这些提议后将扩大目前SIS的权限(欧盟理事会文件,10054/03,10055/03,2003年6月24日)。最近没有人讨论SIS II的范围和职能问题,包括“麻烦制造者数据库”的问题。当正在讨论技术能力和招标事宜时,这些问题似乎被搁置(8989/03,2003年5月3日)。

③ 欧盟的快速反应部队对外用于镇压“破坏法律和秩序的暴力行为和破坏和平的行为,这些行为正在增长”。

特别装置)的标准共享装备”;确定前提“是使某成员国可以请求其他成员国的特别部队予以支持”。<sup>①</sup>

成员国之间的双边和多边约定同样重要,各成员国越来越要求在本国出现抗议活动期间邻国的警员能够到场援助。这些实践可以及时导致正式系统的形成:特训国家部队的行动部署系统,是为了控制东道国的社会治安。麦巧洛赫(Jude McCulloch, 2002: 56)注意到有关国家“越来越多地使用军事手段对付示威游行”,认为抗议者没有被当作可能违法并可能被逮捕和控告的公民,而是被当作“内部敌人”,要使用铺天盖地的武力予以痛击。

## 七 行动事宜(Operational Matters)

2002年12月,欧盟公义和内部事务委员会提到国际峰会“保安手册”的制作<sup>②</sup>。该手册将情报交流工作正式化,要求在抗议活动的预备阶段每个月、每个星期乃至每天向东道国提供关于“预期出游的潜在示威者和其他集会成员”的“个人数据”,“陆地边界预防性的巡逻和控制”以及关于“快速有效”驱逐有关人员的“必要安排”必须到位。情况又是一样,这种合作的法律基础十分不清楚<sup>③</sup>。在欧盟理事会总秘书长安全办公室的支持下,欧盟警察局局长行动特遣队(PCTF)保留修改保安手册的权力。PCTF没有正式的法律基础,不受正式的民主控制。不过,关于欧盟宪法的审议提出,PCTF将被给予中心角色,帮助成员国的永久官员委员会

① 《国家观察新闻上》,2001年10月, <http://www.statewatch.org/news/2001/oct/01paramilitary.htm>。

② 2003年1—2月《国家观察公告》第13卷第1期。

③ 德国人先前提出的建议提到1997年关于法律、秩序和安全的联合法案(见上文),但是,这只为交流信息提供法律基础,而非行动事宜。

“协调和监视警察治安行动事宜的全面情况”，包括公众治安<sup>①</sup>。“立法”事宜与“行动”事宜之间的可疑区别，意味着各成员国议会和欧洲议会将继续被排除在外。目前明显存在这样的可能性，欧盟的政策或实践（由各国机构实行）将导致抗议者的基本权利被剥夺。结果，将可能没有清晰的民主或司法问责性原则。

2002年4月欧盟理事会关于“建立收集和交换恐怖分子信息的特别小组”的建议没有任何保证抗议者基本权利的条款<sup>②</sup>。讨论表明，这些特别小组的目的不是为了逮捕或起诉可疑人员，实际上是以西班牙和意大利为首的一小撮欧盟国家将建立由警察、国内保安官员和特工组成的无问责性的秘密行动小组，将可疑人员和团体置于监视之下<sup>③</sup>。关于欧洲刑警的角色也存在疑问。尽管没有受命处理社会治安问题，有很多事实表明，在“9.11”之前，该机构一直以恐怖主义的标签来看待抗议者<sup>④</sup>。尽管很少人会反对建立打击真正恐怖主义分子的队伍，但是，这要有严格限制性条款，他们必须根据法律规定行动，按照程序规则办事，行动要有法律和民主的问责性。

这种理念表明，面对政治抗议的政府还可以采取无须明言的政策选择——包括对示威者政治干扰、大众媒体的抹黑、监视、情报搜集、渗透、告密者、挑衅、骚扰、恐吓、扰乱活跃团体。国家使用的诡计是活生生的、遍布世界的，包括在西方民主体制里。意识形态上，而且往往在战略上，反抗议和反颠覆是同一件事的正反两面：就是“代表政府针对想要使政权不安的人采取的行动”

① 《国家观察新闻线上》，2003年4月，<http://www.statewatch.org/news/2003/apr/TBART.pdf>。

② 欧盟理事会文件，5715/6/02，2002年4月22日。

③ 2002年5—7月《国家观察公告》第12卷第3期。

④ 《海耶斯(2000)》，10。“9.11”之后，欧洲警察局的大部分资源转向打击“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

(Kitson, 1969)<sup>①</sup>。这样,欧盟的立法和政策与欧盟成员国中比较激进的政权的努力是相辅相成的。

## 八 结 论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意大利开始任欧盟的轮值主席,而贝卢斯科尼政府对示威活动的态度一直很明确。交流抗议者数据、建立入境黑名单、拒绝球迷进入、建立联合调查小组、建立恐怖分子数据库等事宜都被推上日程<sup>②</sup>。关于上述提议的工作将继续在幕后进行。尽管委员会和议会的许多成员国和群体对此明显感觉到不舒服,但是他们是少数。主导的方式与自由结社、示威以及隐私的基本权利也是矛盾的<sup>③</sup>。不管欧盟采取什么公众治安政策,除非欧盟政府花时间和资源解决导致人们走上街头的根本问题,否则,抗议活动不可能平息。问题仍然是,欧盟的麦卡锡式打击内部敌人的方法,将会使公民社会激进到什么程度。

- 
- ① 受群众示威反对越南战争启发,基特森不只发现军队的新作用,而且发现军事战术在维护国内秩序方面的作用。他的观点不是以反越战示威活动为基础的,而是以以下需要为基础:在核扩散、摆脱殖民主义的独立和“常规”战争可能性的减少可能致使局势缓和时,有必要重新考虑武装部队的作用。不过,他担心的根本问题是足够清楚的:“如果出现真正严重的苦难,如:生活水准的明显下降所导致的苦难,那么,现在以众多理由进行抗议的所有人都可能集中力量制造一场超出警察处理能力的局面”(1969, 25)。
- ② 欧盟理事会文件, 10874/03, 2003年6月25日。
- ③ 《欧盟基本权利宪章》、《欧洲人权公约》(ECHR)和《联合国人权全体声明》(UNDHR)都规定了这些权利。《宪章》保证了每个人“和平集会的自由权利和结社(各种级别的社团)的自由权利,特别是在政治、工会和公民问题(civic matters)方面”(第十二条[同时参见ECHR第十一条和UNDHR第二十条]),“表达意见的自由权利……(包括)不受政府当局干涉的保留意见的自由和接受、传播信息和思想的自由”(第十一条,同时参见ECHR第十条和UNDHR第十九条),“尊重个人及其家人生命的权利”(第七条,同时参见ECHR第八条)和“保护个人资料的权利”(第八条)。

## 参 考 书 目

布鲁尔(Brewer)等《警察、社会治安和国家》，伦敦麦克米兰出版社 1988 年版

海耶斯(Hayes)《欧洲警察局的活动与发展：将成为没有问责性的欧洲联邦调查局(FBI)》，伦敦国家观察出版社 2000 年版

基特森(Kitson)《低强度行动：颠覆、起义和维和》，伦敦费巴尔出版社 1969 年版

麦铁臣(Mathiesen)《关于全球控制：将成为欧洲一个综合监视系统》，伦敦国家观察出版社 1999 年版

麦铁臣(Mathiesen)《扩大恐怖主义的概念》，P. Scraton 编《超越 911：异议文集》，伦敦冥王星出版社 2002 年版

麦巧洛赫(McCulloch)《你要是不与我们一起，就是恐怖分子》，战争的国内前线，P. Scraton 编《超越 911：异议文集》

皮尔斯(Peers)《欧盟公义和国内事务法》，伦敦朗文出版社 2000 年版

### 3 欧洲社会运动面临的挑战

贝尔纳·德莱约诺

欧盟东扩,开始了新的历史阶段。东扩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不仅对欧洲自身,对世界也是如此。新自由政策是欧盟官僚的一切,尽管在多个国家遭遇强烈的社会抵抗,但仍未改变。伊拉克危机表明了欧洲政府与美国的分歧,也显示出某些政府与国民之间的裂痕。法国哲学家保罗·提鲍(Paul Thibaud)在思考“裂痕”有多严重:“可以看出裂痕——但到底能有多深呢?”由“欧洲制宪委员会”及其主席瓦雷利·吉斯卡·德·艾斯塔(Valery Giscard d'Estaing)起草的“欧洲宪法”,计划重铸统一的欧洲,为新的历史阶段打下坚实的基础。就如欧洲议会副主席菲利普·赫尔佐格所评价的,似乎这“更像是一场无法解救自身的社会动力危机”。

欧洲正处于十字路口,各国政府似乎只向国民暗示所选择的道路。但所有西欧大城市,以及部分东欧城市都发生了群众抗议,来捍卫和平和以往所取得的社会保障成果,希望开辟一条新的道路。但各社会运动团体发现很难掌握“欧洲”的全貌,因此也就无法提出适合解决当前问题的另类方案。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一下社会运动团体正努力着手的几个问题。



## 一 新自由主义和社会倾向

几年前,社会民主左翼主导了大部分欧盟政府。此后,他们几乎处处让路于自由派右翼。这种变化本身并没有带来政策的巨大改变——新自由主义路线渐趋明显。但这并不表明,民意有接受私有化和减少国家干预的趋势。社会民主派主导时,左翼所采取的“紧跟潮流”政策推动了这种趋势,阻碍抵抗运动的发展。但现在,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民意领域,一直拒绝接受挑战的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他们放弃选举投票和各类民粹主义的投票(一般为极右派),新的批判性左翼已经开始出现。

因此,突出的右翼分子,包括托尼·布莱尔的“新工党”和一些其他“社会党人”,已经加速废除战后建立的退休金、医疗保险、公共服务、工作权利、培训等社会契约,这在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法国、德国等许多国家遭到强烈的社会抵抗。但工会至今仍未能组织起欧洲阵线,主要原因在于许多人认为社会保障理论上是国家政策的一部分。此外,工会内部的门派分歧——如德国的 IG - Metall 内部、法国的 CFTD 和 CGT 之间、意大利的 CGIL 和 CISL - UIL——也削弱了运动。但是,传统工会外围的各类组织形式却有所增加,像法国“十南方组”(Groupe des 10 - Sud)和意大利“Cobas”这样的激进少数民众工会,教师与职业表演艺人(音乐家、演员和后台工作人员)的协调,以及“没有”运动——没有工作、没有住所、没有居留证的人,等等。

以法国和德国政府为首的一些政府颇含糊地表示,不应该遵守“社会稳定公约”(stability pact),因为它把欧洲大陆拖入持续停滞的困境,并且限制金融。然而,没有一个政府宣布社会保障网,甚至没有同意的计划出台。无所不及的新自由主义要求削弱各个

国家,通过大力鼓吹“社会倾销”<sup>①</sup>问题,胁迫各国把劳工标准降至“最低社会水准”,进而以此作为质疑社会问题“集体权利”(collective rights)概念的前奏。而另类的欧洲和社会逻辑则将把社会问题提升到最大的高度,并尝试通过种种机制来巩固劳工权利,例如,设立最低薪金和社会福利机制。这并不是不现实的,尽管近年来有负面趋势,但在各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层面上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在工会权利、跨国“联合生产委员会”、培训、反歧视和反骚扰法案等方面。

替代新自由主义的另类选择包括了赋予公共行动新的价值。欧洲主要共同政策——“共同农业政策”(CAP, 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由于法国总统希拉克与德国总理施罗德互相妥协才保持了现在的形式。但该政策如今受到明显威胁,迟早会被废除。将导致CAP解体的因素不仅有来自英国的新自由主义的敌意,更重要的,还有法国自己决心实施一个代表法国农业经营者工会联盟(FNSEA)利益的、以生产为基础、以出口为导向的农业政策,而不是农盟(Confederation Paysanne)在法国和全球农民联盟(Via Campesina)在国际上所倡导的可持续农业。法国在捍卫“老爸的共同农业政策”(Daddy's CAP)上所表现出的傲慢自大可能最终会使“共同农业政策”变得毫无意义。此外,欧盟东扩给这场争论带来悲剧性的因素——最终导致彻底取消“共同农业政策”,或维持逐步衰退的“共同农业政策”,从而导致更激烈的竞争和摧毁性的新自由主义。

---

① 社会倾销(social dumping)是指一个高工资的工业化国家进口相对低廉的外国产品,而这些产品之所以廉价是因为出口国没有提供合理的工资、利益及对工人其他方面的保护。通过利用廉价的和缺乏保护的劳工,出口国能够以远低于一般市场的价格在工业化国家销售产品,这就必然导致其社会问题“倾销”到进口国,从而使后者失去就业机会,或者必须降低工资和利益以使其价格结构更具有竞争力。“社会倾销”的核心问题是劳工核心标准问题。

关于“共同农业政策”(CAP)人们至少还有争论。而非农业结构基金的未来几乎没有人讨论过,除了对其管理而非存在合法性的批评——新自由主义发现它可以用来作攻击布鲁塞尔官僚作风的借口。非农业结构基金主要用于农业(如 FEOGA)和地区、社会发展(如 FEDER 和 FSE)的项目,其他预算项目则用来援助非欧盟国家的发展或给予帮助,特别是对弱势群体。因此,这些机构都只不过是执行必需政策的工具。但各国政府所采取的一般路线却不是增加资金投入,原因有多个:一方面,新自由政策预算紧缩,主要欧洲国家不希望向欧盟输送更多资金;另一方面,则是最富裕国家针对最贫穷者的自我主义心态。这些基金的安排、甚至管理受到影响,很大一部分原因要归咎于新自由派的构想。这些措施在执行中遇到严重的官僚主义,实际上应该说,主要问题更多出在成员国方面而甚于欧盟的官僚主义。

欧盟扩大本来应该增加结构性基金,但现在所采取的路线却是缩减资金。同时,由于必须为东欧寻找资金,所以与南方国家的合作(如与地中海国家的“泛欧地中海区”合作,以及与非洲、加勒比海国家的合作)受到冷遇。对于这个问题,左翼保持了出奇的沉默,既不批评欧盟预算决策和基金管理方法,也不捍卫这些基金所实现的计划,更没有要求扩大基金的范围。此类基金支持各国的发展提案、消除不平等和歧视的政策,并为关于科研、能源、交通等问题的绿皮书提供资金。而所有这些项目却都严重缺乏资金,而且导向混乱,在这些方面左翼本可以更积极地提出欧洲共同政策。

## 二 适应欧洲统一

现在,欧盟堪称世界最大经济实体。特别在与美国力量相对比时(如果不是对抗的话),欧盟的实力会更清楚地体现出来。但如果欧洲把自身实力用来建造一个新的欧洲帝国主义,我们的星

球将无法生存。欧洲列强的帝国主义无论在过去还是今天都仍是世界很多国家的苦涩回忆,对欧洲自己也是如此,他们并不真的希望在对抗美国霸权的前提下建立欧洲帝国。的确,很多人希望欧洲能有不同于以往的角色,有助于平衡国际关系,有助于世界未来的角色。而这样的角色无法单独通过某些国家的政治姿态实现(当然其作用也是积极的),更不可能通过外交游戏和“欧洲”三国协约(英、法、俄)、“大西洋”三国联盟(英国、西班牙、意大利)这样的政府间联盟实现。

不能想象老牌欧洲列强,特别是英、法两国的统治者放弃以往的地位,而给人以沦落为二等列强的印象。沿用英国战后政策的托尼·布莱尔与美国结盟,就是怀抱着这种不切实际的信念,即认为能够担任在华盛顿掌权的“得克萨斯蠢蛋”的启蒙老师。正如大家所看到的,阿富汗战争中布莱尔是这么做的,接着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布莱尔又试图担任英美进攻伊拉克的首席辩护者。这种姿态给布莱尔带来了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表象。与此同时,雅克·希拉克坚决反对布什的伊拉克政策。从全球来看,站在反战运动团体的立场上,希拉克起到了积极作用,尽管他并未改变不幸的结果。但希拉克的姿态更多的是演说技巧,而非名副其实的战略自主,因为法国几乎不具备这种手段。1989年以前,法国认为可以通过“法—德轴心”保持其实力。根据“法—德和解”(Franco-German reconciliation)历史阶段,这是和平的保证,也是建造战后欧洲的重要因素之一:法国“出色的政治和军事”可以与德国的经济和人口实力相平衡。现在,反对伊拉克战争的希拉克—施罗德联盟却已经不能再建立在这套陈旧的地理政治基础上——虽然法—德联盟还不能吸纳其他欧洲成员,从而成为遍及欧洲的、连贯的政治方针。

任何此类发展绝不应带有大国对小国的任何傲慢态度。但“大”的欧洲国家还是免不了显露出其对所谓的“小”国家的轻蔑之

情。首先就是希拉克在 2000 年尼斯峰会上的举动,他再次批评前社会主义国家在伊拉克问题上倒向美国。希拉克这种态度无疑会使欧洲陷于瘫痪。而且,如果是为了确定欧洲政策,也根本没必要嘲笑“小”国家。一方面,在布什发动伊战问题上的“欧洲分歧”毕竟是“大”政府之间的事(即当时的“布莱尔—阿兹纳尔—贝鲁斯科尼联盟”与“施罗德—希拉克联盟”)。另一方面,由沃龙(Waloons)和法兰芒(Flemings)两大民族(以及当时的自由—环保—社会主义者)组成的比利时和希腊两国,在很多重要问题上反而比“大国”领导表现出更多勇气和更强的欧洲主义感,尽管它是伊拉克危机时的欧盟轮值主席国,但毕竟他们还是“小”国。

这一点对于从前苏联解脱出来的新欧盟成员们特别重要。他们期待着至少可以部分地重铸像波兰记者康斯坦丁·吉尔伯特所说的“民族爱国主义”(national patriotism),他们期望得到尊重,这尊重不光是来自政府的,也是来自国民的。“小”国(不光是那些中欧国家)更加倾向 NATO,这种态度的转变是建立在他们潜意识里对遥远的美国的根深蒂固的偏好,而不是偏好伦敦、巴黎、可能将来还包括柏林的令人厌恶的大人物。如果要确定自主的欧洲政策,就必须撤出这场游戏:能够满足中欧人民的渴望,把中欧国家当权者从对华盛顿的奴颜婢膝中解救出来的自主的欧洲政策。

每个人都指责说欧洲缺乏统一、大胆进取的精神,但许多人却不得不让自己适应现状。这种态度甚至在抗议美国对伊战争的社会运动团体中也可以感觉到。人们既想赋予欧洲更大责任,也想处之淡然,保持冷酷的中立态度。也许客观上来说,后一种态度比宣布站在美国一边更利于美国的霸权主义。

### 三 欧盟与区域整合

欧盟扩大一直不是欧洲统一的问题,而是工具模式

(instrumental model)的问题,即一个恰好是不被人们认可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候选国必须要遵守的“共同利益”不是以政治、文化程序表现出来的,而是以适应主导经济模式进行的“结构性调整”,有着最低团结机制的“有竞争力的能力”的方式表现出来的。现在,这种团结比起希腊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爱尔兰人加入欧盟时要脆弱得多。但欧盟与日俱增的异质性,需要为共同的目标采取更多、而不是更少结构性措施。应该使候选国的民族特征得到强化,而不是被减弱。欧洲应该有优先考虑国家政策的民主程序,以及执行欧盟共同目标的手段,而不是竞争这一至高权利和普遍私有化的共同政策。

说到民主,欧盟政府对土耳其基本采取哥本哈根政治制约标准。但这最终证明只是模糊的障碍,是欧洲理事会控制会员加入条件的倒退。值得一提的是,与俄罗斯和车臣相比,欧洲理事会并不尊重自己的制约条件。出现模糊的部分原因在于欧盟自身成员在某些领域(如妇女权利、文化和语言权利、新闻自由、民主选举制度)的限制。而且,欧盟对申请加入国提出的条件对现成员国并不适用,意大利贝鲁斯科尼政府的明显违规就体现了这一点。显然,更坚决的新自由主义者不愿意把社会权利纳入民主问题范围,也可以解释这个问题。考虑到不同的价值观和历史,如何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批准申请国加入欧盟又是一个大问题。但现在,欧盟自身内部也是这样。

“欧盟边界”(Union's frontiers)也是一个容易产生混淆的问题,当然通常情况下这都是故意的。就目前的扩大趋势(批准希腊,否决克罗地亚)来看,欧盟似乎由天主教、新教、欧洲犹太人(Ashkenazic)这几种文化构成,而暂时把东正—西班牙(Orthodox-Sephardic)因素和穆斯林放在一边。这样似乎证实亨廷顿(Huntington)关于“文化的冲突”的论述。确实,土耳其问题就是“欧洲身份”的问题。自1963年起,土耳其就与欧盟联系在一起,

与其他申请国相比,土耳其与欧盟的关系更为久远。在这种情况下,对土耳其的加入申请说“不”,不仅给土耳其人,也给在巴尔干半岛的数百万欧洲穆斯林人,以及在法国、英国、德国等地的移民后代传递警号。如果欧洲坚持这么做的话,无法成为欧洲人的穆斯林团体将继续是局外人。在法国的葡萄牙移民或德国的波兰人与种族原产地的感情和巴黎的布列塔尼人或都灵的西西里人一样强烈,因为他们是而且将继续是该群体的一分子。至于“欧盟外人士”(extra-communitarians),如果欧洲国家要求的话,他们必须准备与出生国断绝关系。

对土耳其人和希腊人来说,塞浦路斯能否加入欧盟是个特别敏感的问题。这是对欧盟调解僵持了三十年的“种族”冲突能力的检验。特别是两国人民的运动证实,当前希腊政府、土耳其政府里的伊斯兰民主党人的态度将有可能使该问题在联盟的基础上得到解决。然而,土耳其军队和他们的领导人拉夫·登克塔士(Rauf Denktash)尽其所能阻止事情的解决。而2004年春季希腊方面的民族主义者的宣传导致事情进展倒退,在这样重大问题上,这的确是欧洲的失败。

对处于煎熬之中的欧洲国家来说,与欧盟的关系也是个大问题。伊拉克危机时,罗马尼亚现任总统、前共产党员伊利埃斯库(Ion Iliescu)和保加利亚前国王、现任首相西缅·科布戈夫斯基(Simeon Koburgovski)都是华盛顿在伊拉克危机中最忠实的盟友。对这两个国家,欧盟似乎保持着距离,而不是敞开怀抱。欧盟政府向巴尔干“非欧盟人士”(non-communitarians)所传递的欢迎信息远远算不上热烈。被称为最佳欧盟申请国的斯洛文尼亚脱离原南斯拉夫后以某种方式得到补偿,而它的脱离本身正是南斯拉夫问题的根源。前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其他民族却仍将继续保持二级区域的身份,即民众需要签证和检查。以前向往的融入欧洲事实上仍然未能实现,例如克罗地亚,因为这与巴尔干整合是相抵

触的。因此,融入欧洲的承诺持续使地区出现分裂。

1999年,欧洲人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来遏制分裂。东南欧所有国家共同签署了《东南欧社会稳定公约》(*Stability Pact of Southeast Europe*),成为营造巴尔干地区和谐未来的必要前提。不幸的是,欧盟似乎并不非常关心将其所宣布的、可能是整个欧洲大陆整合的一部分的地区的整合提案投入实践。这种“漠不关心”还体现在草拟欧盟损益平衡表(balance sheet)作为管理波黑、科索沃和马其顿保护国的主要结构。而该平衡表似乎对任何一方都没有什么好处。

谈到欧洲,前苏联成员国(巴尔干国家除外)也是不容忽视的。这里的问题包括疆界、人员流通、进出俄罗斯领土、彼得格勒、俄罗斯的“交叉少数民族”(crossed minorities)与巴尔干和白俄罗斯的波兰人、摩尔多瓦与罗马尼亚的关系等等。但这些问题更具有全球意义:整合的欧洲将与这些欧洲邻居保持什么样的关系?将有什么样的联系?目前,除了黑手党的整合高度发达外,欧洲的TACIS计划根本没有最终确定。就针对布什的对抗,巴黎、柏林、莫斯科之间临时达成的谅解也不能令人信服。因此,说到底,最强的东—西关系就是北约(NATO)的“和平合作伙伴关系”。

当人们看到欧盟是如何让其与南部邻居之间的关系屈服于自身战略计划时,又怎能想象它与东部邻居之间结成的是严肃而认真的联系呢?“欧洲—地中海区域合作协定”的最终版本于1995年在巴塞罗那确定,被称为“南赫尔辛基”协定(southern Helsinki),是有效保证地中海两岸相互合作与安全的动力,涉及经济合作、相互和平、尊重人权、文化交流等多个方面。实际上,该协议却受到了蓄意的破坏,被剥夺了金融手段(例如MEDA项目),丧失了一切与自由贸易无关的东西。破坏该协议的不仅有北方的欧盟政府,代表南方的阿拉伯政府也包括在内,特别是以色列问题更是如此,以色列人不仅和其他人一样藐视、违反协议中关于人权



的第二款规定,他们还系统地破坏欧盟在巴勒斯坦资助的一切公民基础设施。

然而,欧洲整合带来的希望远远超过了西欧邻居的范围。无论正确与否,许多人认为这可能是对美国的政治、军事统治以及新自由主义霸权地位的制衡。对最贫穷的国家而言,把欧盟与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国家联系起来的“洛美协议”似乎也在这方面带来了希望,虽然它明显具有法国指出的新殖民主义因素。但不幸的是,洛美谈判以及随后的“科托努协议”的进展只证实了与自由主义的世界结盟的趋势。欧洲成为帮助公平发展、帮助穷人的发动机的希望,仍然是一个梦想。

有时,关于真正的欧洲世界政策的谨慎愿望也会闪过。例如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呼吁“欧洲人(或部分欧洲人)”重新确定“反霸权阵线的计划”。以及,在例如环境(京都协议书)、国际法(国际刑事法庭)、公共健康(艾滋病)等关键问题上,有时会与大洲或大国(巴西、南非)结成联盟。在未来恢复世界平衡的努力中,印度和中国也可成为战略合作伙伴。然后,有必要继续深入,找到集体安全问题的明确解决方案,构建在政治上确定的国际公共秩序,真正地裁减军备进程,提倡谈判和调解,而不是权力关系,推动可持续发展模式。就欧洲各政府而言,我们距离这一目标还有很长的路。但从争取另一个世界的运动快速发展来看,也许公民们距离这一目标并不那么遥远。

#### 四 “解放的欧洲”?

由“欧洲制宪委员会”主席瓦雷利·吉斯卡·德·艾斯塔(Valéry Giscard d'Estaing)提交的“欧洲宪法”被称颂为“拉近欧盟与公民”的方式。但2003年2月到7月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的欧洲制宪委员会,并非是欧盟扩大前夕所需的真正“立法程序”。而欧洲人

民可以就伊拉克危机向其政府提问或提出其他建议的民主论坛，也不是“立法程序”。新自由派倾向的持久性，就如同欧盟对待美国变化无常的姿态一样。不幸的是，这些权力关系在批准“欧洲宪法”的宪法条约上得到保留，2004年6月举行的欧盟峰会历史性地通过了宪法条约。

比利时工会主义者、欧洲工会联合会(CES)前主席乔治·德布恩(George Debunne)强调，这是具有社会“危险性”的宪法，他还说：“只要在社会、金融领域有全体一致的投票权，并且有否决权的话，就应该尽一切所能阻止宪法内容的采用。”从政治上来说，这也是无法接受的。法国新闻记者伯纳德·卡森(Bernard Cassen)说，因为欧洲人民“真正关心的问题——社群政策的内容，以及伊拉克战争后欧洲独立的问题——在欧洲制宪委员会十六个月的工作中已经被放到第二位”。在未弄清要处理“什么”问题前，先决定“如何”和“由谁”来处理，这根本就是本末倒置，金融交易课税组织ATTAC(Association for the Taxation of Financial Transactions for the Aid of Citizens)创始人补充说：“这不是偶然的。这隐约假设所有这些都基本解决了，而以前各条约(‘单一行动条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阿姆斯特丹条约’、‘尼斯条约’)的深刻自由派逻辑根本无法修改，除了在一些边缘问题上。”

虽然如此，对制宪委员会及其成果的争论仍具有重要意义。但不幸的是，欧洲社会运动没有在制宪委员会的最后期限前充分动员起来。

对欧盟身份的界定，部分在第一章(Title One)对欧盟价值和目标的阐述中体现出来，部分由欧盟宪法中的“基本权利宪章”(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体现出来。这的确有一定的进步性。不管有什么缺陷，宪章是推动权利的政策基础这一事实有助于扩展权利，并防止业已取得的目标出现倒退。尽管如此，这进步仍有可以批评之处。它把竞争机制化，作为分配资源的基本手段，

还推荐“高度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旨在实现全面就业和社会进步、高度的社会保护以及改进环境品质”,说到底,这根本就是自相矛盾!公共服务既未体现在欧盟的价值中,也未包含在欧盟目标里。最后,某些基本价值,比如说和平,已经被“忘记”了——虽然包含在各国宪法之中,或者是国际宪章(包括欧洲理事会和联合国宪章)的目标。因此,欧盟的宪法计划比起多个会员国的基本法倒退了,而且里面也没有鼓励扩大、深化基本权利的明确条款。

宪法计划确定并阐明欧盟和会员国的不同权限,还界定了“有效多数”(qualified majority),至少代表欧盟60%人口的会员国数即为“有效多数”。但还有多个领域仍然需要“一致同意”(unanimity)。文化则是“一致同意”与“有效多数”妥协的产物。这不是件坏事,毕竟,对于扩大后的欧盟,所谓“一致同意”根本就是妨碍。

不过,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金融和社会政策不属于“有效多数”的作用范围,因此,金融和社会倾销仍将继续。为期六个月的欧盟轮值主席将被欧洲理事会主席取代,任期为两年半,而且只能连任一次。2009年,欧盟委员会成员人数将减至十五个,包括一个由欧洲理事会提议、欧洲议会选举的主席,一个由欧洲理事会提名的外交部长(欧洲理事会副主席),以及按照会员国轮流顺序严格挑选的十三个委员。权力有限的欧洲理事会主席,再加上欧盟委员会主席和外交部长组成一个三人领导小组,很容易造成竞争和混乱。欧盟委员会十三个委员由会员国轮流担任意味着,举例来说,就是马耳他的“代表权”将和德国一样,而马耳他将不会拥有一位十年内有五年投票权的委员。

2004年6月最终获得通过的欧洲宪法鼓励各国议会行使其对各自政府的控制权,换言之,也控制部长委员会和欧洲理事会的工作。因此,采用宪法条约必须进行新的安排,以确保欧洲议会不仅仅是一个记录投票的机关。但仅仅是民主化提议还不够。立法和

行政权仍然掌握在部长委员会手里。欧盟委员会将保留提议立法的专有权力。至于属于欧盟专有管辖权的事务(货币、商业和竞争等)决策,欧洲议会(和各国议会)没有得到可以参与的充分保障。会员国之间的更多合作将很容易受到不愿参与的会员国的阻碍。

在工会和欧盟其他组织的权力方面,宪法计划也不能令人满意。一方面是工会和各个组织,一方面是雇主,两者拥有的手段和途径完全不成比例,雇主游说的至上权力得到保留。可是,就欧洲共同利益而言,这是“使欧盟与公民更接近”的基本问题。相反,教会在宪法中得到明显体现。最后,至少与欧洲一千二百万“欧盟外人士”(extra-communitarians)移民相关的“居民公民权”没有丝毫进展:“凡拥有会员国国籍者,均拥有欧盟公民权。”

“经济与就业政策的协调”方面保留着欧盟当前采用的工具:欧洲中央银行(ECB)、一般经济政策、社会稳定公约与增长。操作手段(特别是独立的)和欧洲央行的唯一目标(稳定价格)已经列入宪法,任何机构无权禁止,任何多数人也不能控制。宪法计划未提到预算一致和预算协调事宜。但凡金融事务均须部长委员会成员全体同意才能达成决策。《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提出的欧盟预算上限得到保留,剥夺了欧盟的主要政治权利。宪法计划根本没有丝毫促进“社会欧洲”(social Europe),这体现出欧盟的恶劣关系。欧洲工会联合会向宪制委员会提出的关于构建社会欧洲的提案也没有采用。公共服务和现在一样,基本上仍受竞争规则支配。

这种制度上的严重不平衡使有害的机制延续下去,宏观经济协调有限,各国之间的竞争被“宪法化”(constitutionalized),所有这些都加深了社会、金融和预算的倾销,使公共服务更加缺乏,日益走向解体。

单就外交政策来看(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宪法计划规定:“欧盟是一个法人”;欧洲理事会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共同选举出欧盟外交部长;“必要的欧盟决策”须经欧洲理事会和部长委员会

全体同意。至于欧洲议会,须“定期”被咨询和被知会。无论何时,只要欧洲理事会全体一致“决定这么做”,共同安全和防御即开始运作,同时尊重“一些参加北约、考虑在北约框架内实施共同防御的会员国所承担的义务”。欧盟宪法努力协调法国与英国截然不同的立场。法国认为,世界安全不能只依靠美国的权力意志,而英国的看法却恰恰相反。

宪法草案加入了两种欧洲概念,并且和阿兰—勒考里克斯(Alain Lecourieux)指出的一样,忽略了第三种概念。我们可以在里面看到的“欧洲空间”(the European space)来自于英国人的主意,把欧盟变为与美国联合的自由贸易区。北约(NATO)是其唯一的政治维度。我们还可以从中看到“强大的欧洲”(powerful Europe)的萌芽,这一概念与法国的主流话语相对应,也和德国政府的“欧洲模式”(European model)相对应,不过,德国政府对“强大的欧洲”这一概念非常谨慎。对这个模糊的、双重的概念,法国—德国联盟站到一起,他们在政府间压力和分别来自法、德两国的社会压力之间左右徘徊。在宪法中,很难看出任何“解放的欧洲”(emancipatory Europe)计划的迹象,因为宪法计划的是以市场和竞争为特点的欧盟体系。这并未承诺对欧盟进行任何彻底的民主改造,也未将欧洲构想为政治实体。

## 五 欧洲的社会运动动员

上文说过,对欧洲的未来,我们处在面临抉择的重要关头。现在,欧洲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许多国家重新出现了频繁的政治和社会动员。动员的具体形式有:反对新自由政策的社会运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比利时、德国、希腊等国发生的大规模罢工和示威游行;强大的反战运动团体的政治斗争,特别是在英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等支持美国政策的国家,丹麦、匈牙利和荷兰

也是如此,但程度相对较轻。在与布什政府结盟的国家,群众运动也有蓬勃发展,法国、比利时、希腊、土耳其等都在此列。而在德国,红—绿联盟之所以在竞选关键时刻扭转局势,击败对手,最终获胜,就得益于其对华盛顿的态度。最终,全球抵抗运动发展壮大,并取得一系列胜利:热那亚(2001)和阿那玛斯—日内瓦(2003)反八国集团运动和反战示威;佛罗伦萨的“欧洲社会论坛”(2002);尼斯(2000)、哥德堡(2001)和萨洛尼卡(2003)的反欧洲峰会;坎昆会议前夕(2003.8)在法国拉扎克爆发的大规模集会;巴黎—圣但尼的社会论坛(2003.11);以及从布达佩斯到伦敦的许多本土论坛。

现在,欧洲社会运动发起的动员还不是真正的欧洲动员,但未来肯定会是。这涉及到各个国家社会团体之间的文化、历史差异,同时也牵涉到对“欧洲政治”的认知问题。对许多年轻的示威者来说,攻击尼斯和哥德堡欧洲峰会与抵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布拉格会议,以及热那亚或埃维安的八国集团会议没什么两样。但是实质上,这三种层面斗争是有本质区别的。首先,虽然欧盟并不是完美的结构,但其建立在本质上民主政治的过程基础之上。因此,欧盟是一个需要接管的工具,而不是个需要摧毁的堡垒。在第二个层面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贸易组织(WTO)则是国际机构,其机制令人怀疑(如IMF的符合资格的投票权),立场令人难以信任(如WTO的新自由教条)。所以,它们应该被取缔或在全球管理体系框架内(例如,有效的联合国)予以改革。而在第三个层面上,八国集团是缺乏合法性的组织,根本没有存在的正当理由。社会运动对抗前一类组织已经有十多年的经验,诉求日益增多,对抗此类机构的动员根本上也就是质疑它们的运作方式。而八国集团应该解散。人们混淆这三种斗争层面,令人感到不安,这与欧洲所有进步政策的定义背道而驰,因为执行这样政策的相关层面是整个欧洲大陆,尽管这并不是唯一的。

如果有包括欧洲机构(主要是欧盟机构)的特定欧洲战场,有必要在这一层面建立有效的阵线。但是,为什么这很难做到呢?应该辨别出到底是什么阻碍这样的阵线的建立。受制于不同的政治文化和历史特性的影响,各社会运动处理欧洲问题的方式是不同的。举例来说,欧盟里某些成员国,如爱尔兰、芬兰、瑞典和奥地利保持中立,分别有着不同的历史渊源,而这些国家部分左翼的中立行为(uncommitted behaviour)已经深深地根植在其政治文化当中。同时,自冷战结束以来,这样的中立就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通常会给人无能为力或虚伪的印象。例如,可以看到,在这些日子里,奥地利“中立”到了什么程度。主导的欧洲主义掩盖了在如何看待欧洲未来上的巨大矛盾,这不仅表现在欧盟初始六国的公共舆论上,也表现在政治阶层方面。举例来说,历史上的“大西洋主义”(Atlantism)不仅对英国人,对荷兰人、波兰人也都很自然,他们从不提出根本问题,尽管他们会激烈地批判美国的帝国主义,这可以从他们提出的软弱的替代方案看出来。

那么,分析一下当前对外围国家融入欧洲以及处于欧盟中心的各国的不同态度就显得非常重要。整合的动力来源于上述的特性,也来自暂时的政治理解,或任何时期各国不同的欧洲争论形式,如法国对欧盟的所有扩大趋势都持保留态度。仔细分析一下,我们就能更容易地理解欧洲各种历史、文化观点的拼合,以及似乎享有共同全球目标的社会运动之间的政治分歧。虽然历史和文化观点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仍将继续,但政治分歧却必须要弄清楚,加以探讨,并且,如果可能的话,予以解决。例如,世界社会运动中的著名立场——“全球化抵抗”(Globalize Resistance)这一地道的英语说法(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最先使用),应该在就某些特定的政治分歧——例如欧洲自身计划,不同联盟的本质,社会运动的不同组织形式、决策等方面争论前就得到确定。再举一个截然不同的例子,在“欧洲绿色联盟”(European Green Federation)中,

为达成一致意见所进行的系统探讨已经妨碍了对各个党派的个别特征的确认,而某些差异已经制造了联盟内部的争论。

在社会和经济事务方面,大家有必要草拟一份行动的损益平衡表,不管行动的成败。这包括欧洲工会联合会的行动、维沃德(Vilvorde)罢工和交通工人的罢工,还要包括产业农民工会和其他游说团体(包括公路运输者),以及任何可能反对他们的力量。但我们不应该忽略来自欧洲的反失业游行的支持,消除极度贫穷的欧洲网络的工作,以及 No-Vox 型的激进运动组织(如“住房权利”和法国的失业运动)时而发挥的作用。经济政策领域越来越被专家团体(如公共服务中的 CELSIG,欧洲经济和社会理事会等机构内部的某些学者)所占据,金融交易课税组织 ATTAC 的发展则表明各种“社会欧洲”的主题得到采用的趋势加强了。

至于反歧视斗争和抵抗排外意识形态方面,虽然欧盟的正式“移民论坛”(Migrant Forum)不出所料地未能满足人们的希望,其他形式的运动却在持续发展着,包括 UNITED 网络、争取罗马人权利的斗争、要求按居住地享有公民权、“没有”运动等等。同时,虽然性别歧视在整个欧洲仍然是一大问题,但是在部分国家,如波兰、爱尔兰,妇女在社会运动中的支持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最后,“少数民族”的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欧洲一些民族和群体无法享有文化、政治权利的问题,在多个国家表现非常突出(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法国)——尽管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已经在这方面取得进展。

最近欧洲大多数国家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战运动,但仍未在和平和安全问题上取得大的进步。如果真的取得了较大进步,欧洲的和平运动不应该满足于批评美国,而应该反思自身近年的历史,总结反对前南斯拉夫种族清洗战争的运动,争取“近东”(Near East)正义的、长久的和平过程中所积累的重要经验,以及在处理某些内部冲突(爱尔兰、巴斯克,以及问题明显没那么严重的科西



嘉)及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如阿尔及利亚、车臣、西非)冲突时遇到的困难。

欧洲和平与安全力量不会在彻底改造 NATO 的基础上发展,即使这会使中欧国家的公众舆论恢复信心。同时,考虑到伊拉克危机的可能后果,它们也不会从圣马罗过程(即英、法两国的欧洲防御协议)中得到发展。那么,它们会不会在 2003 年 3 月比利时首相伏思达(Guy Verhofstadt)的提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呢?这些提案很有意思,因为似乎它们代表的不是体现法国、德国或英国称霸欧洲的意愿的那些力量。

欧洲不同力量之间是不是围绕着主题和共同行动而逐渐统一呢?这就是“从下向上”构建的欧洲:在欧洲体制内执行坚决的、创新的行动,但却先天地(a priori)不去担心界限,同时确定清晰的目标,共同努力,将各种不同元素放到同一个运动平台上,提出方案,启发甚至颠覆“自上而下”的欧洲建构过程。当前,这“自上而下”的过程正陷于瘫痪,在虚伪的政府做作中泥足深陷。

## 六 展开新的欧洲政治经历

处于全新政治构建之中的欧洲人将如何应对当今时代的挑战呢?保持民主传统之精华,拒绝帝国主义遗产之糟粕,他们能把内部的社会运动放置于向世界宣言的欧洲公民运动之中吗?我们已经看到,在那些追寻另一个世界的运动中有这个迹象的出现,而且它们还在整个欧洲的层面上强化自身。有人提出了某些政治假设,我们前面已经引用过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的说法。巴里巴尔(Etienne Balibar)提出的独特的哲学道路,似乎与我们这篇关于欧洲现状和争论的文章很有关系:

“欧洲经历过毁灭性的苦难,使欧洲视自身为国际法原则的支持者——虽然这往往并不被运用于欧洲国家自身。它对‘他者’的

意识并不妨碍它系统地展开排外政策,结合文化标准、种族和经济歧视……一个基督教统治下的大陆上出现世俗主义(secularism)……更加深它对冲突的宗教普遍主义(首当其冲是伊斯兰教)的排斥,同时保护‘本土’宗派。受种族灭绝的负面影响,欧洲人对犹太教的态度非常暧昧,反犹太教的踪迹其实并未完全消除。它还自命为抵抗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体系(或者说容许如此阐释),即是说,它吊诡地成为身份认同话语的手段(means of an identity discourse),如果实际上算不上是准宗教的‘西方文化’的话。最后,对于民主,‘欧洲概念’认为这是一种在政治上表达了社会冲突的体系。可是,当国家干预减少、保护自身资源和劳动力的武器被经济全球化所剥夺的时候,欧洲已无法抵御市场的怪诞思想侵犯之际,民主也就(再一次?)蜕变成单纯的集团主义(corporatism)。

“即使如此,欧洲的经验对世界来说仍然非常有用,因为它的明显矛盾是尝试延长并更新欧洲政治经验的一部分,它的尝试是处于改变国际关系的计划之中。而要改变国际关系,虽然有赖于自身的力量(经济、文化和知识、社会和制度),但也有一些欧洲‘内部’的和‘外部’的因素并非来源于权力政治。这样一个计划较少程度上是为了建立新权力(甚至是新的‘超级权力’),而是推出一种新的权力政体,任何人对此都没有独霸的专属权力,哪怕是那些在历史上最有效地发展了自己的人。这样的权力本质上是关系性的,通过结构和权力关系的演化而展现自己,或通过日益增强的抵抗运动以及另类发展替代‘统治话语’。”

那么,这有可能实现吗?或者说,当前的危机敲响了某种欧洲政治整合概念的丧钟,留下的只有被分散且被削弱的国家政策?这样一种退步,远远不能建立反攻防御(counter-offensive)的新基础,只会巩固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和新自由主义在欧洲的

反社会道路。当然,这并非是无法避免的,特别是当美国继伊拉克之后向其他国家挑起攻势,并公开威胁要开展行动时,欧洲的责任意识在不断加强。

## 4 同一化的欧洲与多元化的社会运动

贝尔纳·德莱约诺

大部分欧盟成员国的公民现在都使用统一的货币。货币上的象征符号也会变得模糊不清,正如欧洲本身那样。欧洲的构成只是基于竞争和解除管制(deregulation),在1980和1990年代,所有成员国里,社会成果(social gains)和公共服务都受到了挑战。与这一种理念的欧洲对立,最近几年,各种不同的集体行动,不管是新旧、传统还是激进,都在发展。他们形成了多元、动态的组织模式,与一致站在新自由主义立场的传统政治力量相对立。无论如何,这些运动主要的目的是在欧洲层面上确立政治议题、呈现人民的斗争与需求。

### 一 改革、重建还是拒绝欧盟?

欧洲整合计划从开始执行到现在,通常被看做是以极端自由主义的形式推进全球化的发动机,而非刹车器。这个过程更不会被看做是通向另类全球化的一条道路。很多人相信,或多或少明确表示反抗极端自由主义,就等于反对其所代表的美国政策,以及其所伴随的欧盟政策。对2000年12月在法国尼斯集会的人而言,他们对欧洲峰会的抗议,承接了对布拉格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会

议和西雅图世界贸易组织峰会期间的“反全球化”抗议。

但是,也有很多人持相反的观点,认为欧洲整合能对解除管制起到平衡作用——换句话说,是建立抗衡模式的开始。对某些人来说,这些可以通过大规模修正目前欧洲的运作机制得以实现。而对另外的人来说,这却需要彻底推翻旧制度。但是,他们都同意在洲际层面挑战全球化是一个适当的政治空间,只在本地(或者国家)层面去对抗全球化是不够的。而欧洲的整合乃是民主和社会斗争的必要条件。

从这个观点出发,欧洲峰会上的政治势力,像在法国尼斯和瑞典哥德堡(Gothenburg)召开的会议,和在布拉格、西雅图、热那亚召开的不一樣。在尼斯,政府代表必须回答问题,例如欧盟内部的民主机制、欧盟的扩张过程、基本权利的宪章等等,因为欧盟理应是民主的政治结构,由(极少的)议会控制,决议过程不能通过政府顾问秘密谈判等。即在欧盟的框架下,抗议欧盟的运作方式。

在布拉格、西雅图和日内瓦,面对“非透明的技术结构”和政治上不负责任的专家,最重要的战役就是迫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包括八大工业国家)接受民主监管,改正组织框架与要求,并在新的基础上开展工作。

## 二 有关欧洲的争论的倒退

自从柏林墙倒塌以后,关于欧洲的争论出现倒退。与此同时,新社会运动浪潮开始兴起。人们可以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会议和每两年召开一次的欧盟峰会做比较,两个会议的要点都是建构欧洲。这个主题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概念十分模糊,包括那些很早便加入欧盟的成员国。在经历变革的欧洲公民社会中酝酿的社会运动,对这个概念也同样模糊不清。概念混淆不是由于分歧——尽管分歧是肯定存在的——而是因为社会活动家似乎对欧盟架构

的重要性有非常不同的看法。相对于“真实存在的”欧盟的政治立场,问题更大程度上是关于受国家背景影响的意识形态反应(那背景甚至是无意识的民族主义),这些反应的差异很大。因此,从欧洲的观点来看属于核心的问题,可以用非常不同的方式来理解,就如政治的反应那样(或缺乏这样的反应)。

这一点,可以从社会运动界或者政党从不或者绝少在欧洲的层次上讨论很多重大的欧洲议题,甚至他们之间也很少互相讨论上看出。例如,前南斯拉夫的种族冲突、欧洲与地中海关系、巴勒斯坦问题、与前苏联各国的关系、和平和安全问题、欧盟和北约关系、移民与自由流动的问题、文化和社会问题(例如大众服务或文艺创作的概念)、欧盟实体的权力、欧洲的司法领域等重大议题。对上述每个问题,有些国家会说,只能靠加强欧洲整合机制来实现,而另外一些国家则持相反的意见。即使他们都积极从事运动,具有相似的目标和活动计划,但却认为只有保卫国家主权才能解决问题。他们大部分人都难以在洲际层面上组织辩论。

### 三 新的社会协商

这一切都解释了过去十年,在很多情况下欧洲问题的争论都出现了倒退的原因,但同时,新社会运动的浪潮却在好几个欧洲国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开展。在1980年代的特殊脉络下,社会运动或多或少以新的形式或提出新的目标而兴起。那些年正是极端自由主义在欧洲盛行,伴随的是作为自由主义最高形式的撒切尔主义。不过她的解除管制的意识形态影响了当时还是左翼执政的法国,陷入“第一共和”危机的意大利,以及此后的德国的社会政策。欧洲各地由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基督教民主主义者推动的社会协商注定以惨败收场,先是英国上演了残酷的撒切尔革命,然后整个欧洲渐渐跟随。前苏联的所谓“真正社会主义”的崩溃,给予极端自

由主义者难以辩驳的合法性。虽然这本是可以预见的,但是激进左派、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自由主义者没有做应付的准备。

所谓的“模式”派不上用场,英国福利社会也被毁掉,欧洲大陆模式被彻底推翻了。曾经是“荷兰民主的珍宝”的“浮地模式”(Polders model),就是很好的例子。自从1945年以来,主要政党、工会和雇主共同商讨经济政策。以工资受控制与社会预算被削减为代价,工会在失业和社会服务的问题上,得到了政府和雇主的保证。但是过了几年,他们向荷兰工薪阶层的承诺发生了变化:社会保障网络仍然存在,尽管力度减少,特别是那些弱势群体,例如妇女、青年和移民。然而,这模式不再为就业的稳定性服务,而更侧重于就业的灵活性。

在北欧国家也能看到这样的发展趋势,尽管并没有引起社会分裂,同样的逆向机制仍然造成了社会的巨大变动,并加深了不平等现象。芬兰的社会保障制度也逐渐退化。由于大量的失业,人们对社会的依赖程度提高,日常生活问题变得更加尖锐。同时,社会开支被削减。即使如此,北欧国家仍然被看作是世界上最平等、最安全和最稳定的社会。芬兰的收入差距是最小的(即使工资在减少),实力强大的工会、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制度仍然得到很高的评价。而在西欧,同样的机制造成同样的影响;南欧的情况更糟糕,那里的社会妥协的根基并不牢固。

#### 四 反抗解除管制

为回应这些变化,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抵抗,抵抗的程度取决于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攻势有多厉害、不同国家人民斗争的传统,以及受益于新局势的中产阶级的比重(特别是那些周边国家,如爱尔兰和葡萄牙)。这些斗争主要是反抗由新世界经济组织造成的欧洲去工业化,还有解除管制和私有化政策。但是,总体上这种反抗没

有获得成功,英国矿工罢工就是这种运动失败的象征。

在一些权力关系允许的情况下,其他的斗争形式变成适应新环境,特别是大规模的失业。斗争的目标至少是为大多数人争取社会利益和提出新的妥协办法。典型的例子是在法国、意大利,特别是在德国,发起了缩减工作时间的抗争。1980—1990年代中,发起争取每周三十五小时工作时间的德国金属业工会(IG - Metall),一直主导着工会的政治策略。十年之后,在冶金业和出版业才实行每周三十五小时工作制。但是,斗争的结果并没有重新分配工作时间,也没有达成预期的新的社会妥协。1980年代期间,德国建立了一种政治霸权,但在1990年代,形势发生了变化。由于专注工作时间的问題,工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主动性。如今,商业利益主宰一切,市场和生产需求都要服从商业利益,随时做出灵活的调整。

最终,所有社会运动都没有阻止极端自由主义胜利前进的步伐。1990年代末,越来越广大的欧洲人民再也不打算接受解除管制的逻辑进行下去了。例如,芬兰大部分人仍然相信国家福利,并希望国家能继续实行福利政策。1999年3月的公众民意测验表明,十个芬兰人里面有九个认为公共服务对社会保障至关重要,所以应该维护公共服务。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社会福利已经被削减得太多了。另外的迹象是1995年,法国的健康、教育和交通等公共服务领域出现了巨大的罢工浪潮。

## 五 新的社会斗争形式

斗争的新形式和对主导模式的争议,在工薪阶层的传统社会斗争及一般工会组织形式以外发展起来。工会分子、社会活动家克里斯托弗·亚桂东(Christophe Aguiton)曾多次参与法国社会运动,把新社会斗争形式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欧洲工



会联盟试图把国家社会妥协上升到整个欧洲层面上,但是最后失败了;第二个阶段是抵抗解除管制,其中最重要的是铁路工人罢工;第三阶段是各种形式的自发斗争,重新启动社会运动的活力,例如失业者、无家可归者、无证居留者(Sans Papier)的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从1998到2000年,欧洲人大规模反对失业,并试图把运动的动力上升到整个欧洲大陆,特别是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和德国科隆峰会上。

这些运动反对各种形式的社会排斥。而传统的工会是不会处理社会排斥的,或者说关注得很少。他们只是考虑在经济稳定或受保护的部门中的工薪阶层。现在,社会遭受排斥的是生活不稳定的工人、失业者、无家可归的人、移民、无证人士——法国社会运动把这些人称做“一无所有者”。法国1996—1998年间,无证人士运动成为报章的标题,在其他国家,如瑞士,移民和难民发起的社会运动得到很大的支持。这些运动大部分都活跃了几十年,显示出坚持不懈的斗争精神,即使遭受了各种各样的挫折,特别是关于庇护权,这迫使他们把运动限制在较低目标的范围之内。

社会运动不仅处理被排斥的社会群体,也包括传统的议题,关注当前社会具有战略价值的部门。他们或是关注受到极端自由主义影响的公共服务——这些都是以前社会契约的核心内容(公共交通、医疗、教育、能源、饮用水供应等),或是关注整个欧洲的环境问题(交通、农业、能源、水资源和未来的金融服务),或是处理主要的意识形态(文化、教育等)等问题。因此,从各方面来看,1995年爆发的法国工人大罢工可以看作是新社会运动浪潮开始的标志,其最初主要针对公共交通问题,后来关注医疗问题,并进而视社会保障为重要的议题。

1990年代末,最活跃的社会运动是反对农业工业化,特别是法国农民联盟(Confédération paysanne)发起运动,挑战欧洲农业管理政策(从社会和环境双重角度来看)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条款

(在欧美农业经济大战的背景下)。运动的力量不限于法国。在瑞士,欧洲农民协会的成员组织(UPS)通过“农民之路”(Via Campesina),号召其成员参加欧洲第一个、甚至是世界第一个农民游行示威,即日内瓦反对世界贸易组织农业政策的运动。荷兰一些小组织,如NAV和NAJK,也举行类似的活动,而在德国和西班牙也有。因为疯牛病的爆发和口蹄疫危机,少数群体的运动开始受到了公众的高度关注。

伴随着这些新的或更新的社会运动,反对全球化及其效应的团体和联盟在许多欧洲国家发展起来。反对多边投资协议(MAI, Multilateral Agreement on Investment)的斗争使这些运动凝聚起来。具有象征意义的是,这次斗争把不同界别的群体团结起来,包括环保组织“地球之友”、“第三世界联盟”、“基督徒运动(禧年运动)”、女性主义者和激进分子(通常是自由主义者,在法国,有时是文化界的代表,例如电影导演协会等)。不久,各地爆发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私有化的运动,例如芬兰支持国酒(Koskenkorva)的运动。“征收金融交易税以援助公民联合会”(ATFTAC, the Association of the Taxation of Financial Transaction to Aid Citizens)推动的约束资本流通的课征托宾税(Tobin)运动,从在法国迅速蔓延到其他国家。瑞士的“人民世界行动组织”(People's World Action)在西班牙的会议期间成立,标志着近几年一连串动员和反全球化会议的历史里程碑。西雅图和阿雷格里港的大规模的人民动员,彰显了整体社会运动的多元化和活力。

## 六 探寻另类出路

这些运动到底蕴含多少可以替代目前主流制度的特质呢?这些运动如何影响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或者甚至要问他们愿意欧洲一体化吗?虽然决策者并未忽视社会运动,例如,欧盟贸易委员

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曾经提到 ATTAC 的斗士,但是社会运动还未整合为连贯的整体。

以德国的情况为例,由于缺乏可信的政治组织——红绿联盟仅仅关心为德国在世界市场赢得较好的位置——人们应否相信另类出路将会来自工会运动?再如西班牙联合左翼(Izquierda Unida)的曼努埃尔·莫那雷奥·佩雷兹(Manuel Monereo Pérez)提出的问题:人们应否相信社会斗争的日常实践能够为人民指出未来的方向?应否相信社会运动比那些成千上万的、精心设计却根本不能实际操作的计划更具有意义?到目前为止,阿雷格里港论坛促使工人运动的三大组成成员(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互相碰面,并且让批判的知识分子和另类的社会运动结盟。那么,阿雷格里港论坛是否回应了以上的问题呢?论坛提供机会,让各种对目前局势和未来策略的分析进行交锋,以及尝试把共享的价值观和原则演绎为可行的政治提案,还有尝试凝聚集体的、有动力的抗衡力量。这些努力包含探寻另类实践的答案吗?我们暂时只能如此希望。

1980年代,所有关于政治和社会的另类思想好像都蒸发不见了。到1990年代末,大部分西欧国家,由社会民主派主导的中间左翼替代中间右翼上台,他们有时甚至比右翼党派更倾向新自由主义。结果使社会群众更加边缘化。事实上,新千年开始的时候,另类出路似乎在走向相反的方向(像在奥地利和意大利发生的那样),因而有使负面影响加剧的危险。由于没有另类实践,各种反对现存的政治管理的异化形式都出现了:年轻人和工人阶级不参加选举,退缩到法团主义,排外情绪复现,拥护极端右翼,在社会被排斥的群体之间爆发激烈的暴力冲突。在某些情况下,社会解体刺激思维,背离“唯一的思考方式”,他们的论争逐渐言之成理。在有些国家,极端左翼和绿党取得了重大的选举胜利。如果他们认为更新政治思想只是将其放在新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脉络下变成

“可操作的”，那么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的话）。掌握主动权的是公民社会和社会运动，而不是政治本身。

这些运动究竟能够带来什么？他们能在何种程度上改变权力的关系，并把他们的提案付诸于政治？正如克里斯托弗·亚桂东（Christophe Aguiton）强调的，我们必须谨记这些运动的多样性，特别是他们激进的表现形式——西班牙自由主义极左翼或者德国自治运动，意大利社会中心的战斗者或者英国环保战士，他们全由来自英国、德国、荷兰的年轻人组成，或者由意大利、西班牙的年轻人和老一辈的干部组成。特别重要的是，要了解他们在何种程度上代表意识形态的深刻变化。法国杂志《跨越》（*Transversales*）的蔚维海（Patrick Viveret）指出，今天的公民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在1970年代却不是这样。最大的革新是，这些运动清醒地认识到政治议题是权力的一部分。基于斗争的原因，他们发觉自己在抵抗和试验的逻辑之间挣扎。当然，“最佳的激进改良主义”是最能够让另类实践涌现，远比革命的逻辑更能够推动变革，因为革命的逻辑太看重秩序的问题。随后，运动在斗争过程中是可以变为激进的（它们也确是如此），但他们马上要有解决现实问题的短期方法，所以要开始实验。

在欧洲历史上，这些运动出现在非常精确的时刻。根据蔚维海的分析，原始的电击（第二次世界大战）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逝，欧盟项目也逐渐淡化；和平的目标越成为老生常谈，欧盟项目就越失去动力，而国家的意识则开始占上风。这个拥有二十八个或是四十个成员国的“更伟大的欧洲”是一个混杂的系统，自然无法令人满意，但是却有共同的基础去缔造一块和平之地。尽管市场的逻辑占上风，但并不是唯一的动力。因此，以下的假设是可能的：有必要同时开展两个项目，即建立广阔的和平大地以及欧洲联盟，作为探寻世界民主的实验室。

然而,欧洲社会运动斗士很难就这个议题达成共识。当一个国家75%的立法都受到欧盟的指令直接影响的时候,显然,欧盟就成了最重要的战场。因为在修订和废除立法的时候,能够衡量各阶级和社会势力之间的权力关系,而政治计划正是如此形成的。但是这样的证据没有得到广泛的承认:欧洲社会运动不只在欧洲政治层次上面对有无代表的问题,而且还有能否代表欧洲的难度。大部分社会运动局限于国家或地区范围。政治是国家的。过去二十五年,欧洲各国社会运动(包括工会运动)之间的互动关系,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事实上,他们的关系经常倒退)。就算那些人人都承认的欧洲的基本议题(公共服务如交通和能源,流动和移民的自由,环境保护等等),也没法建成合作的平台。文化和历史事实表明,这样的状况将会长期延续下去。

昔日的国际主义运动主要关注宏大的战略问题,这种情况到今天还是如此。但是在欧洲层面上,多年来各运动更多关注本地的日常事务。所以,在欧盟层次上寻找互动、合作、代表和游说的新形式,变得更加紧迫。这些运动已不再属于国家事务,但也不再是昔日国际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这将关乎各种政治和社会力量在本地、国家和欧洲各个层次试验新的行动方式;通过各种课题来建立跨界的联系;探寻各国不同经验之间的互相启发,例如法国捍卫公共服务运动、德国本土自发运动、荷兰维权运动等等。

同时,社会运动也必须运用政治辩论。例如,某些政治家利用欧洲宪法的概念作为工具或威慑手段,而社会运动必须将其视为在欧洲层面上促进讨论的机会,包括讨论社会模式和公民权利,特别是经济和社会权利。对欧洲问题的关注,其意义比欧洲人本身更重大。正如蔚维海提醒我们的,欧洲正在被拉向解除调控福利制度的“信息资本主义”。因此,“福利国家”和“世界贸易组织或者多边投资协议”这两个模式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欧洲仍然处于这个矛盾的核心,但尚未倒向任何一边。

## 5 资本主义世界边陲的尴尬东欧

嘉芙连·萨马里

20世纪90年代,东欧国家以残酷的方式加入了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体系。这彻底地颠覆了东欧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也彻底改变了这些国家民众的思想意识。面对私有化的欺诈丑闻、集体主义的保护与团结制度的土崩瓦解、各项社会指标的相应滑落,重新组织民间运动、工会运动和政治抵抗都变得非常困难。和社会主义政权相关的所有政策都遭到抵制,加上西欧国家的强大吸引力,导致新自由主义教条在东欧占据了统治地位。然而,当地人民的斗争和各种形式的运动仍时有爆发。洞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并建立国际联盟,是重建进步政治和社会力量不可或缺的步骤。

### 一 陷落于资本主义体系的边陲

苏联解体十年后,东欧加入了全球化进程。这对其社会经济秩序产生了明显的恶劣影响。和所谓的“第三世界”或“南半球国家”这样的提法相比,很少有人知道“资本主义经济世界的边陲”这样的说法。东欧人民对目前经历的社会变革找不到任何表达方式来自述不同的看法,也没人听取他们的不同意见,如果要挑战这种令人窒息的意见,就要探究个中原因。他们以前习惯了自己国家

的一党专制和克里姆林宫的坦克,所以显然怎么也不会比以前更糟了,而任何人提及社会进步或社会主义价值都会被视为怀旧倒退。斯大林命令执行“社会主义”,向人民承诺社会福利,但是却钳制了任何批判社会压迫的分析,并且镇压任何形式的独立组织。因此,东欧人民获得的民主很少,如果能获得民主,他们就会和新教条主义作斗争,并且组织起来反抗新的压迫形式。新自由主义也声称,所有的人,不分阶级,都能享受人民福利和普遍自由。所以,民主咨询是没必要的:市场与专家好像已经知道什么对每个人是有好处的——就像共产党惯常所做的。更糟的是,那些原来的共产主义忠诚分子,现在却摇身一变成为了新的“世上独一无二的思维方式”和“反对共产主义”(在其解放的意义上)的拥护者。

20世纪90年代初,柏林围墙的倒塌和多元政治的引入,为进步的欧洲大陆重新统一带来了希望。可是,新阶段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使用更为残忍与压抑的方式迫使东欧变革,从而扫清了追寻另类社会的各种选择。而这,正是目前的问题所在。因此任何将东欧历史简约为古拉格(gulag)集中营的做法,我们都有必要进行反对,也反对这种观点的有效性与合法性。那些傲慢的西方专家的日常行为,流露出对东欧人民所珍重的历史、经验、知识和价值观的蔑视。他们的用词本身就警惕了我们,他们说:难道这不是重投欧洲怀抱的例子吗?西欧帝国主义的行为越来越像“美帝国主义”了,即美国对美洲的统治,正如欧盟对欧洲大陆的统治一样。欧洲左翼的称呼如果是名副其实的,就应该毫不留情地批判自己的帝国主义,并且抗拒那种忽略全人类利益的、霸权而又简单的思维方式。我们希望开始抵制不让东欧发出声音的主流政策及其意识形态。当然,我们不能宣称要处理所有的状况——特别是脱离苏联而组成的“独联体”(CIS,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但是,呼吁欧洲左翼知识分子离开主流的视角去审视人民群众的状况是很有必要的。主流话语把“后来者”,即巴尔干半

岛国家和“独联体”(波罗的海国家,即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国除外),与中欧的“好学生”区分开来。这些分类采取相对的、清晰的、比较的观点,一方面将作为欧盟候选国的波兰和匈牙利单独列出,另一方面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俄国、乌克兰命名为“后来者”。再者,我们还有必要用比较的观点来分析一些联盟的解体现象,例如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

波兰历史学家布罗尼斯瓦夫·盖莱梅克(Bronislaw Geremek)在描述波兰社会经济发展的时候,也指出东欧这些国家出现了相似的社会倒退现象。1990年代末,在索邦(Sorbonne)会议上,他语带苦涩地批评道:“我们的路实际上已经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在没有得到任何保护的情况下,被强行拉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实际上我们已经陷入了由强国和跨国集团利益所操控的边陲世界。这就意味着这些国家可能会重新变成半殖民地国家,70%的银行被外国资本控制,就像波兰那样。

在20世纪,各地爆发的革命试图推翻这种由外部资本控制的“低度发展的发展”(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的边陲地位。伊凡·伊维克维奇(Ivan Ivekovic)批判最近的加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进程,号召展开针对这种标准化和附属化的双重抵抗。反抗的基础是20世纪50和60年代的反殖民历程,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实际上具有的独立发展的经验。这种对抗洪流的精神意志,现在停顿了下来(可以称为危机),东欧国家张开怀抱接受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增长药方,这经常被东欧人民称为“回归正常”。人民普遍地希望至少开始朝着社会市场模式前进,像瑞典或是1960年代的德国那样。但是,这样的希望低估了后冷战时期的新权力关系。后冷战时期,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解放了。在19世纪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正常化意味国内和国际不平等的加剧。



## 二 中欧的成功案例

不得不承认,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加入欧盟的欧洲国家的经济普遍出现了高速增长。但是,即便一些中欧国家得到了改善,这也不是自由主义政策实施的效果,而是过去“非正统”的政策遗留的不平等所致。现在,捷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以及最古老与最富裕的南斯拉夫共和国,在等待成为欧盟成员的候选国家中,仍然是发展得最好的。

即便是在波兰和匈牙利这样的“先进”国家,过去十年造成的破坏程度也是惊人的相似。最近几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报告均指出,“华盛顿共识”操控了各地的医疗制度与政策。1999年的报告有一份柏林围墙倒塌之后十年的资产负债表,结果非常糟糕。的确,1990年代中经济有所增长,首先是波兰,然后是其他的中欧国家,例如匈牙利。但是这种增长是脆弱的——在波兰,仍然有外国资本带来的危机,而旧的“最佳”强国,如捷克共和国,则陷入经济衰退。

总之,20世纪90年代末期,只有波兰的国民生产总值恢复到了1990年代初的水准,斯洛文尼亚、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国民生产总值接近1990年代初的水平。除此之外,其余各国的情况都比过去差。各地的统计资料都隐藏了巨大社会变革所造成的影响。强制私有化的政策彻底加强了货币与市场的关系,其目的就是摧毁旧的保护主义。根据极端自由主义的原则,这通常意味着要挑战国家的基本职责。

中欧的复兴发生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声称可比作1930年代“大萧条”的那几年之后。报告引用了世界银行的资料,估计1989年整个东欧社会每天收入不超过四美元的贫困人口为一千四百万人。五年之后,这个人数则已达到了一亿四千七百万人。1990年

代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的标题是:“社会转型在杀人”。20世纪90年代,随着解除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进程,俄罗斯男子的预期寿命平均减少了七年。生活水准的巨大落差在各国蔓延(加上地区与性别的统计分析,差距更明显),工人大批失业,和过去相比,民众的医疗和教育均得不到保障。

### 三 社会抵抗及其局限性

当东欧以边陲的身份加入全球化的进程,我们该怎样去分析其社会、工会的抗争呢?他们的劣势在于,和那些有民主传统的地区相比,本地群众的声音得不到响应。群众意见被压制还有几个原因:第一,旧工会的官僚主义传统作风仍然存在,在旧政权下,工会是国家政府的传声筒;第二,新的独立工会的腐败现象,工会受到诱惑变成私有化政策的输送带;第三,所谓的左翼政党却执行右翼政策,并因此引致意识形态的混乱;最后,由于危机造成极严峻的状况,迫使那些靠种一小块地糊口,与打好几份零工求生存的人,没时间参加工会的运动。

这些都解释了为什么社会倒退却没有导致大规模运动爆发。然而,这些解释还是不够的。对旧政权机制的转变,以及倒向资本主义复辟的知识分子精英也都应该进行分析。但是,在抵抗运动所面临的困境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社会经济机制使反抗活动不断削弱。

首先必须承认,前苏联时期的国有大企业遗留下了不良的作风。当时的国有企业工人是社会化的,有时这些企业提供整个地区的社会服务。他们把工作场所和工作本身联系在一起,工人有住房、工作津贴、医疗保险,并且派发那些在商店里都买不到的东西。因此,从俄国到波兰,从匈牙利到斯洛文尼亚,国有企业最难重新改组,因为资本主义的逻辑是要求实行私有化,或者由当地政

府承包公共服务。这加深了贫困的程度,使当地政府的财政预算雪上加霜。重组也增加了财政支出和人力资源成本。企业重组通常出现以下情况:先是财政拨款,然后资本外流,企业发不出工资,工人被迫到处找临时工作。

除了分析普遍私有化、人人持股的现象,也需要从社会经济与心理层面分析民众面对市场的困境。“没有资本的私有化”(通过给工人和市民发券,让他们在自己的企业中拥有股份),目标是使民众接受私有化制度,同时摧毁工人所有的自治的权利。事实上,社会的抗争力量被转为接受私有化,同时促成第二个阶段,即财富集中的问题,手法依然是暗箱操作,并且与黑手党有关。

最后,除了资产旧有形式的角色与遗留,特别是大企业,以及没有资本家的“私有化”形式这两个问题以外,了解各式各样的、反抗资本主义逻辑的做法是很重要的。这包括维持和推广集体所有制的形式,其管理逻辑为反对削减公共财政。例如,从俄罗斯到匈牙利,农业合作社反抗各种法律形式的私有化的压迫。此外,远离那些有资本的、资本家复辟的、商店林立的地方,可以找到互助合作的形式,从生存的策略,到以团结为基础的本地生产的创新方法都有。

在斯洛文尼亚的私有化被“拖延”的背后,可以发现,实际上是反抗力量继承过去自治的经验所做出的努力。1990年出现的大罢工,阻挠了由杰夫里·萨克斯(Geoffrey Sachs)推动的第一轮私有化进程。由此可见,私有化有损企业中集体的利益,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俄国工人在几个不同的私有化方案中,绝大多数人选择集体所有制。

在所有的案例中,比较典型的是波兰。企业员工大部分都是股东,新政权或多或少地强制推行市场经济的逻辑,削减其社会功能,这使得反抗力量变得非常分散。再加上缺乏私有化银行的信用贷款,也没有公共资助,使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变得无法无

天,这是众所周知的。反抗活动仍然存在,但是没有工会或政治集团整合起来。在旧制度下,反抗活动仍然在绝望中苦苦寻找当地和中央政府的支持,政府徘徊于争取选民与屈服于新自由主义逻辑两者之间。而目前,后者乃是赢得国际信誉的唯一途径。

#### 四 危机的内外原因

在社会衰退的过程中,一党专制的旧政权曾经一手掌握国家命脉,而现在却要面对黑手党性质的私有化。那么共产党及其权贵现在的责任是什么?这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国际形势与新自由主义政策所强加的?在欧洲框架内外,抵抗或者另类实践的空间有多大?

拉塞罗·安道尔(Laszlo Andor)强调,20世纪70年代之前,东欧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距在缩小。但是他也记得,官僚政权——特别是前苏联——从扩大型发展转变为着重质量与生产力的模式的历程有多么艰辛。在内生发展的格局下,匈牙利改革从消费商品中获得了真正的利益。但是,安道尔也强调,国际因素同时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苏维埃阵营遭受到的“技术冷战”,即限制西方企业出口先进技术的禁令,特别是禁止出口到前苏联;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对贸易造成严重影响;在冷战后期,由里根政府开展的军备竞赛,给20世纪80年代初的苏联造成沉重打击;最后还有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

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性转折应该放在军备竞赛和债务危机的脉络中来考察。相关的大多数研究主要集中对南半球国家的研究,而对东欧国家所作的分析则比较少。外债给债权人和国际金融组织提供了强大的杠杆,逼迫东欧加入资本主义的全球化。1970年代大量石油收入曾经形成了大量的私人贷款,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在1980年代初抬高借款利率,引发了第三世界的债务

危机,而且加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干预能力。必须强调的是,欧盟大力巩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政策,将其强加于东欧各国头上,作为加入欧盟的入门条件,强迫他们接受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

但是,外部压力不能解释一切,还需要在当前的脉络下分析内部的能动力量。在精英阶层中,有些人出于信仰或个人利益,强迫自己的国家无条件地执行《华盛顿共识》;有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推动私有化(不是为了外国资本);还有些人在寻找“第三条道路”。但暂时说来,权力议题先于民主、伦理或者社会的选择。社会分化导致了新型资产阶级的涌现,他们掌握了国家经济的优势部门,搞出口生意(即创造外汇),或是在金融化与向国际经济打开市场的过程中,通过担当财政中介而谋利。

受债务危机影响的各国,包括国际债权国,做出的反应是不同的。显然,德国的统一要另外考虑,因其具有显著的象征性和地理战略的重要性。自从1989年以来,德国中产阶级每年要支付大约一千亿美元来抚平东西德统一带来的巨大震荡。由于这项支出大大超过当初预计的数字,联邦政府决定通过吸引国外投资来弥补赤字,并在1992年提高利率。这引发了1993年的金融危机和欧洲衰退。德国中产阶级同意并确实承担了统一政策的高额代价。但是,却没有哪个欧洲国家的中产阶级愿意为东欧其他各国加入欧盟买单。

然而,柏林围墙被推倒以后,在战略游戏中波兰成了一个特例。特别之处是20世纪80年代,一千二百万名波兰工人组成规模庞大的“团结工会”。许多给波兰献计献策的专家都是反社会主义者,并且实际上接受国外组织的巨额贿赂。但引发反对共产主义的第一次行动,是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的反共政变——镇压“团结工会”。然而,尽管有人以“社会主义”的名义武力镇压工会,但工会的呐喊并不意味着工人支持私有化。这实际上是美国工会要贿

赂团结工会的原因,正如同一时期爆发在乌克兰顿巴斯(Donbas)的矿工大罢工一样。

应该补充说明的是,美国在1990年代初免除波兰的债务,有助于其推行不得民心的“震荡疗法”。然而这并不能帮助巴尔采洛维齐(Balcerowicz)巩固势力,他在随后的选举中还是输掉了。这次取消债务,既是出于政治目的,也是一个特例,却帮助了波兰在1990年代中期重新崛起,尽管他们通常不承认这一点。

其他三个背负外债的国家——罗马尼亚、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各有其不同的经验。1980年代,齐奥塞斯库(Ceausescu)时期的罗马尼亚偿还了所有债务,但也爆发了社会运动,这位独裁者也因此丧命。匈牙利社会主义领袖的选择则不同。为了减少苛刻政策的社会成本,并设法保住自己的权力,他们决定把匈牙利最好的公司卖给外国投资商。此后,到1980年代末,匈牙利卖掉本国公司已经成为了惯例。1990年代初,匈牙利的确是唯一直接卖掉公司进行私有化的东欧国家。这些国家普遍缺乏资本积累,他们也很少有机会投资。这就意味买家只能是外国人。因此,匈牙利夺得了外国在东欧直接投资的一半——在1989—1999年间累计数额将近人均两千美元。而同期俄罗斯的人均收入却少于八十美元。也因此,到了2000年选举,反对跨国公司的社会运动在匈牙利爆发了。

1980年代初,由于石油价格上升并同时引起的利率上调,二百亿美元的外债给南斯拉夫带来沉重的压力。对于这个从60年代开始就停止开采煤炭的国家来说,一旦对国际市场打开大门便面临油价和外债利率上涨,南斯拉夫受到的打击特别沉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的苛刻政策引起了大规模的抵抗。1980年代,爆发了数以千计的罢工,但这些运动既不连贯也没有成效。在南斯拉夫和其他“兄弟国家”,对异见分子的镇压,包括自治的马克思主义左翼和自由主义者(有些是民族主义者,有些不是),导致大家

唾弃腐败盛行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南斯拉夫分裂为众多的共和国和省份,即分裂为众多的官僚派系。债务危机强化了“人人为己”的态度,并使南斯拉夫或者自称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领袖拥护私有化政策。这些政策根本就没有为社会带来和平与自由,却加速了旧有联邦的社会崩溃与民族解体。

## 五 从市场无边界到国家数目递增

对三个联邦——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的解体进行比较研究,具有启示性的意义。以前伊凡·伊维克维奇提出过的“种族民族主义”问题是内部因素,而来自西方国家及其政策压力则是外部因素(重要性对比,这与巴尔干危机特别相关,已有人曾用多种方法研究,本文就不再系统性研究[Catherine Samary and Jean - Arnaud Derens, 2000])。

例如,对于伊凡·伊维克维奇而言,强调资本主义经济世界出现的一般过程非常重要,譬如其近二百年的发展历史。经过1950和1960年代的反殖运动和前苏联解体激发的民众抵抗之后,似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新阶段(特别以构建欧洲为标志)成了旧有联盟的种族/民族分裂的必然结论或先决条件——巴尔干半岛再度成为“试验性”冲突地区。这尤其彰显了西方大国如何在后冷战时期的混乱之中,使自己在中东(伊拉克)和巴尔干(塞尔维亚)这些“实验室”以近似手法进行干预,以及建立地区聚集体(附属于自由贸易的区域性国家集体)的做法合法化。

伊凡·伊维克维奇的分析将会激发争论,这是有必要的。并非选择抗拒民族分裂,就是代表反抗自由主义的另类替代。1989年最后一届南斯拉夫总理安特·马尔科维奇(Ante Markovic)的计划,就体现了这一点。相反,这是南斯拉夫推行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计划。当时,南斯拉夫局势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和大部

分欧洲国家(德国和梵蒂冈除外,他们赞成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分离)的密切关注。这个计划的失败不能只归因于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力量的增强: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当局也想在各自的统治层面上,通过私有化来巩固自己的力量,并且更快更直接地加入资本主义体系和欧洲秩序之中。捷克共和国和波罗的海共和国的情况也是这样。

在这样的局势下,不管西方政府想不想这样(这一点值得讨论),都应该认真分析自由主义经济逻辑带来的瓦解与冲击——特别是将土地私有化和靠出口产业来换取硬通货的时候,富裕地区本来用于贫困地区发展的财政预算却被分掉了,并且酿成为敌对的仇恨情绪,并最终演化成为种族的民族主义。这些事件的发生是合乎逻辑的自然发展(包括因为自治权而与维持现有边界产生冲突,北约国家也用自己的方式和谨慎的态度维护现有的边界秩序),根本不用西方国家阴谋策划。

然而,这一论点难以确定:富裕地区寻求独立的情况与建立欧洲没有任何关系,而这一问题曾经使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和前苏联焦头烂额。欧盟内部关于预算的争斗可能为欧盟未来变得脆弱埋下伏笔。特别是欧盟因为不断扩大,需要大量资金。欧盟成员中的富裕国家不愿意为其他成员买单,正如斯洛文尼亚不愿意支付科索沃军费,或伦巴第对意大利南部的态度、法兰斯德对比历时其他地区的态度一样。

## 六 欧盟成员国的共同命运?

使人惊讶的是,在东欧研究当中,欧盟依然被东欧进步的抵抗力量视为唯一可靠的参照。他们对欧盟存有幻想,真诚地想成为欧盟一分子,即便他们知道欧盟的这些“缺点”: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会造成社会解体、与民主实践相距甚远。在整个分析过程



中,有一条主线贯穿始终,概括而言就是:不管欧洲计划的实质是什么,加入欧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加入欧盟然后尝试改革,胜过被排斥在外,处于边缘而又无力的地位。很明显,有必要与对欧盟的右倾民族主义态度保持距离,持这种态度的人认为要有效反抗自由主义全球化,欧洲空间不可或缺。

欧盟成员国中持左倾观点的国家,反对欧盟扩张和吸收东欧国家为成员国。他们认为,首先应该巩固自身,然后再扩张。不过,他们的这个观点值得商榷。首先,西欧国家左派抗拒扩张,他们认为这是为了防御“欧洲堡垒”。在这个堡垒里,柏林围墙倒下了,取而代之的,是富裕国家树立的申根公约铁丝网,和以能交多少税为基础的民主。还有,因为欧盟对东欧敞开大门,会增加对新条约的需求,即另外的欧洲大陆“安全”的概念,而不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框架。再者,会大量增加共同发展项目的财政预算,这样就多了一项资产税,而国家融合不以金钱为标准,而是基于社会和平等。

新自由主义在东欧试验了十年,而在世界范围则试验了二十年。在拉塞罗·安道尔看来,新自由主义遭遇“政治失败”,原因是其不适当的方针政策。这可由1990年代反复出现的危机以及不平等恶化的现象中看出来。他说:“左派的成功取决于开展国际合作的能力,以及维持本国工人阶级的生计。”他认为,欧盟基本上是一个维护欧洲的跨国大公司利益的工具”。所以,另类进步的政策应该把东欧国家加入欧盟视为“一项区域协议和发展的政策”。然而,他补充说:“假如新增的条款不能带来任何人们期待的好处,在签署条约后,人民应该保留自己的公民投票权和说‘不’的权利。”在构建欧洲的协议中,就应该包括“社会发展条约”作为合约的一部分。这实际上是与所有成员国都有关的社会和民主需求——并不只是针对新加入的成员国。它会促成建立另一个欧洲和另一种全球化的逻辑,而人民之间会采取相似的合作原则。

## 6 德国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抵制

——工会和其他社会运动的作用

托尔斯腾·舒尔腾

### 一 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德国

早在 1980 年代,德国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改造就开始了。保守—自由派的政府执掌政权达十六年之久,他们努力促进经济的自由化和私有化,促进劳动市场管理方式的改变,这些改变导致社会福利的削减,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对雇员的各种保障。然而,直到 1990 年代后期,新自由主义在德国都比较温和,有时候还自相矛盾,所以,德国福利的基本制度和劳动市场的组织体制仍然保持相对稳定。

1998 年,当社会民主党和绿党之间的所谓“红绿”政府联盟第一次上台执政的时候,人们希望他们可以给德国的政策来一个进步的 U 形转变<sup>①</sup>。从一开始,“红绿”政府联盟也受到从根本上改变德国的福利和劳动市场制度这一要求的强烈影响<sup>②</sup>。然而,在

---

① 绿党在很多社会运动诸如环境、和平、妇女运动方面具有历史渊源,社会民主党则一直同德国工会有着密切联系。

② 特别是社民党,该党有一派(包括总理格哈德·施罗德)强烈支持“新工党”的概念,宣称代表了更为激进形式的新自由主义和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新的“第三条道路”,该派于 1999 年春在奥斯卡·拉封丹(更具凯恩斯主义倾向)辞职后成为“红绿”政府中的主导势力。

社会经济政策领域,政府的大多数提案都仍然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话语的逻辑框架之内,即:按照这种逻辑,解决社会和就业问题有赖于进一步增强德国的国家竞争力。

因此,“红绿”政府确立了其救助公司的目标,即削减公司税、降低劳动成本、改革养老金和医疗卫生制度、使劳动市场更具灵活性、缩短失业福利并使其条件更苛刻(即所谓的“哈茨法”[Hartz-laws])。所有这些措施都表明,德国的福利和劳动市场体系发生了更为根本的变化。但是,按照德国雇主和各工商业联合会,以及保守派和自由派政党——他们在处于反对党位置时变得更为激进——的说法,对德国资本主义进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造还走得不够远。

## 二 反对新自由主义劳动市场政策的斗争

2003—2005年,对劳动市场改革的抵制处在德国政治斗争的中心。第一次超过十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示威游行2003年11月1日在柏林举行。这次行动主要由“反社会破坏同盟”(alliance against social demolition)组织,该同盟由来自不同的社会运动和组织的成员组成。这次全国规模的反对“红绿”政府劳动市场政策的示威游行产生了惊人的强大反响。此后,工会号召在2004年4月3日举行另一次全国性的示威游行,这次有五十万人参加,工会为一份名为“雇员要求一种不同的政策”的请愿书收集了超过七十五万人的签名,并把它呈交给德国议会。

2004年8月,反对劳动市场改革的所谓“星期一示威”(Monday demonstrations)<sup>①</sup>在德国许多城镇和城市开始。星期一

---

<sup>①</sup> “星期一示威”这个名字暗指1989年秋发生的反对前民主德国政权的著名的“星期一示威”。

示威在其高峰时有差不多二百个城镇和城市的大约二十万人参加。自2004年10月以来,星期一示威的参加者显示出持续下降的趋势。简单地说,到2005年春,当时看起来似乎针对劳动市场政策改革的抗议已经走向结束。除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修改,“红绿”政府无意对他们的政策作根本的改动。

### 三 工会的作用

最初,当新的“红绿”政府于1998年上台的时候,德国工会曾热烈支持该政府。由于工会反对一切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一揽子方案,2003年和2004年的劳动市场改革在社民党和工会之间造成了较为根本的裂痕。社民党在2003年春宣布了它的新劳动市场政策以后,失去了数万党员——其中有很多是工会成员。一些地方工会官员甚至参与了组建新的左派政党(“选举替代、劳动和社会正义”[WASG, Wahlalternative Arbeit & Soziale Gerechtigkeit])的工作。然而,这个党能否把自己建设成为德国的一支新政治力量,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当前德国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改造,受到各个政党不同程度的支持,工会是对这一发展趋势提出反对的最大组织。因此,工会饱受由新自由主义支配的媒体的批评,媒体批评工会阻挠“必要的改革”,认为工会已经过时了。此外,工会还在集体谈判方面受到来自雇主的强大压力。在持续大规模失业的背景下,集体谈判越来越采取了让步谈判的形式,工会遭到讹诈,被迫接受社会让步,以换取有限的工作保证。对这种政策的公开抵制——例如2004年10月在波鸿通用欧宝汽车厂发生的六天“野猫式罢工”<sup>①</sup>——还是相当少的。最后,德国工会不得不面临成员不断

<sup>①</sup> “wildcat strike”,未经工会批准的或自发的罢工。

减少的局面。1991—2004年间,德国工会联合会(Deutscher Gewerkschaftsbund,德国主要的工会联合会)所属的工会成员数从一千一百八十万下降到七百万多一点。

面对所有这些政治和经济压力,对于如何应对这种处境,目前在工会内部争论得相当激烈。很多人非常担心工会在政治上变得孤立,在议会里没有盟友。因此,部分工会看起来准备接受一定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并尝试加强与“红绿”政府的联系。如果从2006年大选的角度来看,那么这种观点甚至会变得更强大,因为保守派和自由派政党成了工会更大的威胁。另一方面,工会内部也有一部分人希望继续坚持对“红绿”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抗议,试图同其他社会运动和非政府组织建立新的政治同盟,例如福利组织、同宗教有关的团体、新的另一种全球化运动<sup>①</sup>。

#### 四 其他社会运动的发展

自从1970年代以来,德国的社会运动和组织形式日益丰富。这些运动和组织几乎在所有的政策领域都开展了积极的活动。最近,另一种全球化运动上升的势头很快。最为显著的例子是阿塔克(Attac)<sup>②</sup>。工会成员和其他社会运动代表之间的联系在阿塔克行动主义分子的一百六十多个地方团体中得到了加强。

最近几年里,在反对劳动市场政策领域改革的斗争中,代表失业者的协会、工会内部的失业者部门和所谓的“反哈茨同盟”已经

① altermondialist movement,同反全球化并不完全相同,使用这一名称的社会运动支持全球化的国际融合,但是认为民主、经济公正、环境保护、人权等价值应当放在纯粹的经济关切的前面。

② 阿塔克(争取征收托宾税援助公民协会)2001年在德国建立,此后已经拥有成员将近一万六千名。此外阿塔克还有一百二十多个作为成员的组织,其中有各种社会运动组织以及一些工会组织,例如德国最大的工会服务业总工会(Ver.di)。

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自己的地位。然而,它们仍然只代表了德国五百多万失业者中的很小一部分。

最后,最近几年里在德国许多城市举行的所谓的地方社会论坛,以及其他为争取经济另类替代而举行的代表会议使人清楚地看到,在包括德国工会的大部分在内的德国的各种社会运动之间,存在着进一步密切合作的机会。在此基础上,2005年7月,一次全国性的“德国社会论坛”(German Social Forum)首次成功举行。

## 7 意大利的全球正义运动

马西米连诺·安德烈塔

### 一 意大利全球正义运动:简短历史

在1999年11月的西雅图“第三次反世界贸易组织代表会议”成功举行之后,受其广泛同盟的影响,背景迥异的意大利各社会运动组织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为了采取共同行动而开始走到一起。于是出现了各种成功的协同行动。在2000年,各种社会中心,世俗的和天主教的团体、志愿组织,以及与传统左派更为接近的运动部门聚到一起,在热那亚发起对北约、经合组织以及一个生物技术展销会的抗议。此外,在2001年3月21日,还在那不勒斯举行了反对经合组织有关新技术的全球峰会的抗议。

这些经验成为2001年7月在热那亚组织反对八国峰会抗议活动的基础。八百多个团体聚集到热那亚社会论坛(Genoa Social Forum),该社会论坛的显著特色是结构非常简单,包容性极强。热那亚社会论坛竭力吸引那些之前拒绝支持类似的协同行动的组织前来参加。

自热那亚事件之后,尽管有起伏,各种地方社会论坛在意大利各城市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把那些批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倡导“全球公正”的组织和人士联结成网络。

2002年在佛罗伦萨举行的第一届欧洲社会论坛,六千名参加者——是预期数字的三倍多——参加了在巴索古堡(Fortezza da Basso)组织的三十场全体会议、一百六十场研讨会、一百八十场讲习课。大约一百万人参加了论坛结束时的游行。

人们对佛罗伦萨的抗议活动发出欢呼,认为这是社会运动得到巩固的时刻。

欧洲社会运动之后,意大利的“全球正义运动”走上街头争取移民权利(都灵,2002年11月30日),这一次又是工人发动的。此外,还发动了针对环境问题的行动,例如2003年3月在佛罗伦萨举行的有关水的论坛。

2002年2月15日,第一届欧洲社会论坛号召举行一次国际行动来抗议美国政府推行的所谓“反恐战争”。在罗马,大约二百万人响应了这个号召,他们举着和平的旗帜游行,要求停止战争。此后,在意大利许多城市发生了反战游行示威,最后一次是2005年2月在罗马,有五十万人参加。

## 二 从全球层面到国家层面的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

尽管意大利的社会正义运动以国际机构和国际行为为进攻目标,例如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北约和跨国公司,但是它们不得面对席尔维奥·贝卢斯科尼这样的巨头及其平庸的意大利力量党(Forza Italia)所领导的强大的新自由主义政府。不仅如此,该政府联盟还包括了仇外的北方联盟(Lega Nord)和后法西斯主义的民族联盟(Alleanza Nazionale)。

为在全球层面针对八国峰会向新自由主义发起战斗,聚集在热那亚的广泛的意大利人的联盟,在当时的新中右政府的压力下确定地得到了巩固。这个政府当时正蓄谋在“灵活性”这一新的囊括一切的口号下,对劳动市场、公共教育、公共服务进行重大



改造。

意大利的工会,特别是左翼的意大利总工会(CGIL),在与左翼支持的政府和雇主进行了大约十年的“合作”后,准备发动一场激烈程度类似于著名的1969年运动的秋季运动。

热那亚的抗议使政府确信,意大利的社会运动知道政府对社会骚乱的答复就是镇压。如果说这不是政府蓄意而为,那么当意大利警察向示威者发起残忍的进攻,并开枪打死卡罗·吉乌利亚尼(Carlo Giuliani)的时候,社会运动对于发生在热那亚的事情的确是这样理解的。

在为热那亚之后的第一次全国集会准备的文件中,意大利社会论坛宣称,在热那亚“警察被给予了进行系统的暴力镇压的白纸黑字的命令”,“我们认为在那些天里斯卡约拉(Scayola)部长(前内政部长)的声明是在这种意图下提出的:为以后的街头示威——特别是总游行——造成一种紧张和恫吓的气氛”(文件一)。

尽管如此,各网络还是协调举行了针对以下问题的全国性示威游行:移民权利、保卫公立学校、保护劳工权利、反对战争和恐怖主义。意大利的全球正义运动从2001年热那亚直到今天一直在进行动员,2002—2003年有十八次,2004—2005年有十六次(见附表)。这里,还没有包括热那亚之后建立起来的大约二百五十个地方社会论坛所做的地方性工作和举行的运动。确实,全国政府被认为是意大利的运动的主要攻击目标,这些运动已开始把国内斗争同全球问题联系起来——如果新自由主义需要加以抵制,那么意大利的国内舞台就是这种斗争应当进行的地方。如果我们看一看从2000到2005年意大利整个全球正义运动的各种事件,我们可以注意到,在总计五十六次的事件中,只有十七件是全球范围的,有二十六件基本上是全国的,有十三件是既在全球层次又在全国层次组织反对在伊拉克进行战争。值得注意的是,十七件“全球

附表 全球正义运动的抗议在意大利(2000—2005)

年份	2000—2001	2002—2003	2004—2005	总计
抗议次数	10	18	16	44
所针对的问题	全球	战争	全国	
抗议次数	17	13	26	56

(来源:笔者得自 [www.carta.org](http://www.carta.org) 的计算)

层次”的事件中,有九件是在2001年热那亚抗议之前组织的,即在中右联盟赢得全国大选之前。此后,发生了被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称为跨国运动“国内化”的情况。意大利政府成为全球正义运动的主要目标,因为它要实行特别严厉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这一点不仅清楚地表现在该政府对布什在伊拉克推行的战争的支持上,也可以在以下方面看到:向意大利保护工人免于不公正的解雇的“工人法规”发起进攻的企图、设立新的反动的菲尼—博斯(Fini/Bossi)移民法、推行学校和大学的改革方案、设立极右的辅助生殖法、进行劳动市场的改革。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意大利的全球正义运动与工会和动员人们反对新政府政策的中左党派结成了重要的同盟。

2002年3月大约一百万人在罗马举行了规模巨大的示威游行,抗议对工人权利的进攻。随后,2002年4月和10月以及2003年10月,发生了三次总罢工,人们借此表明,这种针对工人的法规改革将得不到任何支持。2002年9月的一次示威游行是为了反对贝卢斯科尼改革司法权力的企图。同年11月、2004年12月、2005年3月,又组织了三次全国性的大游行来捍卫移民权利,即反对新的法律对移民权利的限制,以及对没有证件的移民加强镇压措施的做法。2004年11月、2004年和2005年的5月1日,发生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目的是反对劳动市场改革,保卫受雇者和

失业者免遭“灵活性”口号——社会运动直接称之为“朝不保夕”——的侵害。

和反对伊拉克战争的强大动员一起,这些“来自下层的抗议”是对贝卢斯科尼政府的唯一真正反对,因为中左阵营仅仅运用议会政治抵制该政府的力量因其席位有限而被削弱。意大利的全球正义运动不得不从全球政治转移到国内政治上,来抵抗自家的新自由主义。

### 三 全球正义运动对意大利政治形势的影响

那么,这一轮抗议又有多大的政治效力呢?

要评估意大利的全球正义运动对政治形势的影响是比较困难的。其最重要的效果在于影响舆论。根据2003年欧盟民意调查机构针对全球化问题的特别报告,78%的意大利人认为全球正义运动“提出的问题值得讨论”,62%的人认为“全球正义运动增强了他们对全球化特定方面的意识”。当然,可以说由全球正义运动引发的这一轮抗议帮助了中左联盟,他们在工会的帮助下反对贝卢斯科尼领导下的中右政府正在推行的某些反工人的政策。我们还可以说,没有来自下层的动员,中左联盟要达到上次(2005年4月)地区选举的结果将困难得多,这次选举他们赢得了十四个地区中的十二个,引发了贝卢斯科尼政府的危机。当然,中左派别在政治上的胜利与中右政府政策所产生的社会不满大有关联,但是全球正义运动的动员使得社会弊病和政府决策之间的联系清晰可见,从而把不满变成了政治异议。

最后,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全球正义运动在地方层次取得了重要结果。很多意大利城市正努力在地方决策中建立替代性的公民接纳方式,例如“参与式预算”(participatory budget)和“参与式城

市计划”(participatory urban plan)<sup>①</sup>。的确,在意大利的全球正义运动深深懂得,必须在地方、全国和全球层面同时对新自由主义进行反抗。

## 参 考 文 献

Andretta, Massimiliano, Donatella della Porta, Lorenzo Mosca, and Herbert Reiter. 2002. *Global, noglobal, new global. La protesta contro il G8 a Genova*. Roma: Laterza.

Della Porta, Donatella, Andretta, Massimiliano, Mosca, Lorenza and Herbert Reiter. 2005. *A Movement of Movements. Transnational Activists and Protest Network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forthcoming.

---

<sup>①</sup> 如需了解意大利的此类经验,可参见:[www.focus-lab.it](http://www.focus-lab.it)。

## 8 英国：垮在投票箱上

希拉利·怀恩韦特

选举政治通常不会让人知道社会运动的情况。有时候，反倒是激进的抗议对社会产生很大的冲击，以致会通过政治制度这个歪曲事物的棱镜表现出来。英国的“简单多数票当选/赢家通吃”（first past the post/winner takes all）的选举制度对多元观点的压制尤为强烈。以致造成了这样的现实：两大主要政党之外的任何事物，如果能突破重围而出，无论采取何种稀奇古怪的方式，都表明了某种强有力的东西正在政治的表面之下激荡。而 2005 年 5 月 5 号大选的两个结果，则向我们展示了自 1970 年代工会运动全盛期以来最大的、最具多样性的社会运动的影响：反对伊拉克战争的运动（包括抗议对民主的限制）和抵制不断升级的种族主义和仇外行为。

在北伦敦，一位来自自由民主党——混杂着激进的不服从者、信奉自由市场的人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折衷主义党派——的百万富翁候选人，以反战候选人的面目出现（尽管实际上当军队进入伊拉克的时候，该党又支吾搪塞），击败一位支持战争的前内阁部长，赢得一个预先稳获的席位（胜出约一万张选票）。她取胜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一封信，这封信由反战老手、反资本主义老兵塔里克·阿里（Tariq Ali）撰写，由自民党出资送到他们挑选出的选民手里，呼吁他们投票支持自民党，赶走托尼·布莱尔。

在穆斯林高度集中的选区东伦敦,由于高调反对伊拉克的战争而被驱逐出工党的乔治·盖勒韦(George Galloway)的胜利,表现了英国穆斯林社群的政治动员。盖勒韦是尊重党(Respect)的候选人,这是一个由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和其他小的左派组织、独立左派人士以及各种穆斯林组织组成的竞选联盟。穆斯林社群通过清真寺,作为一个社群动员起来,他们放弃了传统上对工党的忠诚,转而支持尊重党,特别是支持乔治·盖勒韦。这一点也在伯明翰和伦敦东部的一些地方表现出来,在那里,尊重党的候选人体面地排在竞选榜的第二位。

作为布什最紧密和最需要的盟友,布莱尔的英国在反恐战争中起了关键作用。自从“9.11”事件以来,这一点已经成为英国多数行动主义者的中心问题,有时甚至是压倒一切的问题。对在反恐战争的旗下所施行的军事和政治行动的抵制,深入英国社会内部,产生了跨越党派和政治传统的新型联盟。在运动发展到高潮时,每一个都市、城镇和乡村都有某种反对战争的联盟,这些联盟通常后来成为如下一系列相互联系的运动的中心点:支持寻求避难的人,奋起反对英国国家党(British National Party),掀起声讨关塔那摩湾的运动,捍卫公民权利。在这类集会上,尤其是在小城镇举行的集会上,可以看到来自各种背景的年老的、非正规的行动主义者、如共产党人、托洛茨基派、左派社会民主党人、贵格会教徒以及其他激进基督教徒,同年轻的、满腔热忱的直接行动者,来自绿党的行动主义者、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一腔热血的年轻人,来自亚裔小区的领袖和青年,共同集会。停止战争联盟(Stop the War Coalition)组织了大部分全国性的游行示威,但是地方性的联盟也在各种名目之下到处涌现。在2月15日的游行中,人们感到存在着赶走布莱尔的真正机会,而赶走布莱尔又将使布什陷入脆弱境地——美国的舆论调查显示,大部分人反对美国单独作为入侵者的战争。遏制战争势头的动力成为使人们团结起来的巨大因素。

可是,一旦战争进行下去,运动也就分崩离析了。但是同时,战争也产生了许多新的倡议并强化了旧的倡议,其中包括:尊重党;“关注占领”(Occupation Focus,该组织同伊拉克流亡者和美国反战运动建立了联系);“反对占领军人家庭”(Military Families Against the Occupation);“黑衣妇女”(Women in Black),该组织继续她们每周一次为在中东及其他地区实现公正的和平而做的值守活动;“争取美国基地负责任运动”(Campaign for the Accountability of American Bases),等等。

比起尊重党、绿党或者专事选举的自民党的支持者所进行的没有什么效力的小修小补的工作,反战运动曾经有为向新工党发起更为广泛、更为有力的政治挑战提供基础的潜力。历史上,工党曾经垄断中左政治代表权的地位,但是它现在在独立左派当中却只剩下宗派主义、自我屈服这样的遗产。反战运动并没有开始克服这一点,但在苏格兰和较低程度上在威尔士则是例外。在那里,权力下放的议会以比例代表制为基础,导致政治主动权转到工党左派,即苏格兰社会党、苏格兰绿党、前进威尔士(the Scottish Socialist Party, the Scottish Green Party, Forward Wales)的手中。特别是在苏格兰,工党左派正在为各社会运动及其思想研究制定相对有效的政治代表形式。

有趣的是,英格兰边界地区存在的在选举上对新工党的另类替代方式,促使工党政治垄断的主要支柱——历史形成的同工会的组织联系——遭到侵蚀。2005年初,参与建立工党的两个工会——消防队工会(FBU, the Fire Brigades Union)、铁路和海运工会(URMT, the Union of Railway and Maritime Trades),与工党脱离了关系。在两个案例里,起作用的是两个工会在苏格兰的一些组织(隶属于苏格兰社会党)。

为了理解并评估出现在英国工党历史上的裂缝,我们需要指出,更早的时候,在“9.11”以前,就存在着抵制新工党的另一个动

力。但后来,这个动力被布什宣布的“文明战争”引发的不断升级的国家恐怖压过去了。假如9月11日那天,纽约一切如常,那么布莱尔就不得不应付每年在工会代表大会上聚集的工会运动,工会对布莱尔政府在“改革”和“现代化”等辞藻的掩盖下,对公共服务部门实行私有化的政策极为恼怒。公共部门工会的领导人受到来自本工会一些最积极的地方组织者的巨大压力,这些地方组织者领导掀起运动,反对对医院进行私人融资、出售市或郡建造的住房、对所有地方服务部门进行私有化等做法。在很多工会选举中,一些相对不知名的、激进的候选人赢得了领导权,给他们投票的会员曾因保守党的失败而燃起希望,又因新工党从根本上拒绝改变政府的经济政策而希望破灭。

然而,工会也不得不面临这一事实:它们的谈判力量很有限。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工会在工作人口中的组织率从差不多50%下降到接近25%。有时候这种状况导致了默认和消极。但同时也产生了创新,特别是对新的同盟和新的组织方式敞开大门。各种类型的“小区工会主义”(community trade unionism)以组织的形式扎下根来,例如东伦敦小区组织(East London Community Organisation)、保卫市郡建房(Defend Council Housing)、纽卡斯尔公共服务同盟(Newcastle Public Service Alliance)等。公共服务业工会(UNISON)对这一进程给予了支持。

在英国的工会中,新的、面向国际的开放,特别是在同欧洲的联系方面,是显而易见的。对欧洲社会论坛的广泛支持就表明了这一点,尽管形式上的支持通常不能同实际行动相提并论。

反对战争和占领的运动同反对私有化和新自由主义国际政策的斗争时有汇合。在选举日对布莱尔的不满的迅速增长就是一个例子。2005年7月,针对八国峰会的动员则是另一个例子。在这两个问题上的异议,比有组织的左派或者任何社会运动联盟始终努力关注或者试图寻找的政治表达的问题都要深刻。由于左派对



新工党的替代纲领比较软弱,后布莱尔时代的工党领袖,例如戈登·布朗将在暂时恢复工党的地位方面遇不到什么麻烦,尽管他是新工党式的新自由主义的设计师,并且在反对战争方面一声未吭。

## 9 波兰：不满现状的潜在力量

达溜茨·扎莱加

波兰人参加政党、工会组织或社会团体的比例很低，最多只有百分之几。正如在欧洲参加选举投票的人百分比很低一样，波兰也只有 20% 的人参加投票。这似乎可以表明，波兰社会对政治生活和公共事物缺乏兴趣。同样的，对“现实的社会主义时代”继承下来的社会化国家的残余部分进行“拆除”的工作，也没有遇到多少社会阻力。这样一种消极态度，无疑是由于 1980—1981 年波兰“团结工会”时期曾经出现的那种期望后来连连破灭所致。此后又经历了 1989 年的“改造运动”，以及后来的后共产党人与 1993 年重新回来执政的情况。然而，上述情况并不意味着波兰社会就必然支持 1989 年以来历届政府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的和亲美的政策。事实上，差不多有一半的波兰人现在仍然赞成政府支持那些不赢利的企业，90% 的波兰人仍然希望保持规模较大的社会服务事业，而四分之三的波兰人则对波兰参与伊拉克的占领表示反对。

### 一 走上街头

最近十五年间，波兰历届政府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强制操纵下，实行了自由化、私有化和削减预算的政策。目前唯一能动员群众起来反对这种政策的社会力量仍然是工会运动，尽管它自身

的弱点很多。例如2004年4月26日,七万名工会工作者举行示威游行,反对修改劳动法典。不幸得很,这方面的巨大潜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因而波兰的工会运动受制于两大总工会,即独立的独立自治“团结工会”和全波兰工会协议会(OPZZ)。这两个总工会一直把支持历届政府及其领导人这件事放在首位,其次才谈到保卫工人权利的问题。其中,独立的“团结工会”一直支持历届右派政府,而全波兰工会协议会则一直支持历届中左政府。然而,前一届右派政府和本届中左政府所推行的敌视工人的政策,却促使工会组织不得不逐步与政界保持距离,并且在内部作出规定,工会干部不得兼任国会议员。

2002年11月26日濒临倒闭的波兰奥扎罗电缆厂工人遭私方管理人员毒打事件,又掀起了新一轮波兰工人的抗议浪潮。波兰抗议委员会联合了波兰好几个大工厂的工会代表,他们开始公开反对政府的私有化政策,而不仅是反对该政策执行中出现的“弊端”。工人们过去只采取效果很有限的罢工行动,现在他们已扩大行动范围,把工厂作为后盾,向外开展示威游行,封锁道路,并成立罢工纠察队。

2002年波兰什切青年造船厂工人表示不满情绪的抗议行动,证明了情况在向这个方向变化。那一年,这座城市几乎每天都发生示威游行。波兰叶洛斯拉夫市食品厂工人起来抵制法国达能饼干厂的产品,他们在当地居民的支持下,反对该厂把生产单位迁往另一个地点。类似的斗争行动也在波兹南市发生,工人们起来维护受到瑞士雀巢公司威胁的本国制糖工厂。在海茨市,该市最大的纺织工厂(联合纺织厂)的工人不甘心罢工斗争的失败,决心自己起来办公司,来挽救自己的就业岗位。波兰国内超过20%的失业率,却是一个阻碍工人上街游行的巨大障碍。但一旦关厂决定下达以后,示威游行总会发生。

在工会会员入会率最高的一些部门,就发生了几场具有专业

性质的斗争:如护士们开展的反对过低工资和迟发工资现象的斗争,铁路工人要求保护劳动岗位并阻止取消某些铁路线的斗争,波兰工人阶级中组织程度最好的工人——矿工们起来反对政府关闭矿井的计划。另外,2004年10月,格利维茨市的奥波尔工厂(OPEL)工人举行了支援德国奥波尔工厂的友情罢工。这一行动得到了传媒方面的广泛关注,因为它首次证明了确有必要在各工会之间开展一项超越国界的协议行动。尤其是在企业生产过程日益走向非本地化的时刻,这一行动显得格外重要。

## 二 劳工世界之外

今天,波兰存在着好几十个失业者组织,但这些组织中的大多数都依附于各种政治势力,并依靠政府方面的捐助,而且他们对自己的处境缺乏总体的考虑。这些组织都有自己的主张,而其中某些组织更是采取了一种具有经济要求的立场。在许多城市中,这些组织为失业者争取到了在交通方面享受免费的待遇。某些组织还与反对失业的“欧洲进军网络”有联系。其中一部分组织目前正在争取建立一个有保障的最低收入制度。

尽管波兰人普遍反对对伊拉克进行干涉,但波兰的反战运动却没有能够把广大群众动员起来。这方面规模最大的示威游行,即2003年2月15日在华沙举行的示威行动,只集中了大约一万五千人。一些分散性反战行动也曾在许多城市中开展起来,参加人数从几十人到两千人不等。

尽管费了不少气力派遣波兰代表团参加欧洲各种社会论坛,但“另类替代世界运动”在这方面没有得到什么具体收获。这个运动取得的最大成功,要算是2004年4月29日在华沙举行的反对“欧洲经济峰会”的示威行动。尽管媒体进行了恶意的抹黑宣传,尽管警察当局做出了种种威胁,但仍有四千人参加了这次示威行

动。“另类替代世界运动”的原动力主要来自学生界和左翼青年界。最近在一次人们称为“劳工运动大会”的会议上,才开始看到失业工人组织和工会组织在一起联合行动。

然而,为反对新自由主义政策而开展的斗争至今未能取得实际成效这一事实,也使波兰目前对现状表示不满的潜在力量无法进一步动员起来。由于波兰的经济日益不景气,矿山和医疗设施实行私有化计划,宣布进一步削减社会福利的预算,右翼政府上台,预计新一轮的社会冲突不久又将来临。今天,对新自由主义政策表示不满的群众运动发起的主要挑战,是要“架设桥梁”,以便在工会组织、失业者组织、“另类世界运动”的青年组织及其国外的同行之间促进联合行动。

### 三 中东与阿拉伯世界

## 1 面对双重挑战的阿拉伯 社会民间组织\*

萨米尔·阿明

阿拉伯社会与民主现代性的关系是含糊的。这种含糊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建基于传统层级制度的独裁权威，二是政治的伊斯兰教，后者对抗使社会贫富两极化的资本主义，助长了暴力的反抗方式。在这样的背景下，主流话语所歌颂的成千上万的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其他行动者的行动，都不能说没有矛盾。这些组织的资金来源和国家独裁的结构，使其非常依赖外界同时又备受控制，而且它们能帮助的群众是有限的，受益者的参与程度也是存

---

\* 2001年，开罗阿拉伯研究中心(The Arab Research Center)的 Helmi Sharawi、另类实践世界论坛(The World Forum for Alternatives)的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和 Ali El Kenz 合办了阿拉伯社会运动的座谈会，这篇文章根据这次交流而写成。参加这次座谈会有：Jihad El Zein、Fahima Charaffeddine、Sana Abou Chakra(黎巴嫩)，Mounir El Hamasch、Michel Kilo(叙利亚)，Youssef Abou Al Hassan(阿拉伯联合酋长国)，Cherif Hettata、Ismail Sabri Abdalla、Ibrahim Saad El Dine、Fawzy Mansour、Shahida El Baz、Amina Rachid、Ahmad Baha Chaabane、Afon Aziz、Aida Seif El Dawla、Abdel Ghaffar Shukr、Mohamad Sid Ahmad、Mohamad El Sayed Said、Yousri Moustapha(埃及)，Haidar Ibrahim。

在争议的。总体来说,它们的活动强调国家政府在社会需求上应负起的公共责任,因此产生一种去政治化的效应。这些社会达到真正民主化的唯一可能性,存在和建基于共同利益的、有效的政治与社会抗争之中。

## 一 当代抗争之历史脉络

### (一)面对现代化性挑战的独裁国家

阿拉伯世界没有一个民主国家,只有独裁政权。但是,即使是独裁,阿拉伯政权在人民群众的眼里并不是没有合法性的。据色拉比(Hashem Sharaby)所说,国家权力是个人权力的同义词,这有别于界定现代国家的法治。这种韦伯式的判断需要修正,因为这些个人权力的合法性仅仅在于他们宣称尊重传统(尤其是伊斯兰教教法),以及别人也这样认为。色拉比检视了独裁政权与父权的社会价值之间的深刻关系。父权制度在这里的意思比一般所理解的大男子主义(使妇女在社会上被边缘化的思想和行为)的内涵还要丰富。父权制度是指那种强调在任何层面都要服从的制度:学校和家庭教育掐死稍有萌芽的批判意识,层级制度神圣不可侵犯,家庭如此(压制妇女与儿童),商界如此(雇员服从雇主),行政机构也如此(绝对服从上司),还有完全禁制对宗教的不同诠释,等等。

欧洲文艺复兴是由社会内部的动力所引起的:文艺复兴作为解决欧洲资本主义所产生矛盾的方法,与阿拉伯人说的文艺复兴不同——19世纪之“复兴”(nahda),那是对外来冲突做出的反应。

这里无法讨论“复兴”不同的方面及其怎样传播。一句话,“复兴”并没有与现代性所界定的传统割断。“复兴”没有抓住世俗性的意义——政教分离,假如政治是开创的自由,那么政教分离是必须的,这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复兴”的思想认为,由重新阅读宗教可以摆脱那种宗教蒙昧主义。到现在为止,阿拉伯社会仍然

不明白世俗主义不是独特的西方现象,而是现代性的必要条件。“复兴”仍然不懂民主的意义——恰恰就在于与传统割断的权利,因此依旧囿于独裁国家的概念:推崇专制君王是公正的,甚至不是“开明”的。两者的细微差别很重要,“复兴”无法表明现代性也使妇女渴望解放,以自己的权利去创造人生,并挣脱传统。事实上,“复兴”使现代性的意义化约为科技进步等当下某些引人注目的事物。

这是刻意简化的表述:这不是说我们没有察觉“复兴”里的矛盾,或者说某些前卫的思想家没有意识到现代性的真正挑战,如K·阿明(Kassem Amin)就认为妇女解放具有重要性,正如冉锡克(Ali Abdel Razek)承认世俗主义,卡瓦基比(Kawakibi)重视民主之挑战,但这些见解都产生不了影响力,相反,阿拉伯社会唾弃他们所追求的东西。故此,“复兴”在阿拉伯的土地上并没有孕育现代性,反而使其流产。

阿拉伯社会目前还没有实现现代性,尽管他们每天都承受现代性挑战的冲击,阿拉伯人仍然非常接受独裁政权的原则,独裁权力在某些方面或保留或丧失其合法性,但人民不会认同民主原则。假如独裁政权有能力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或者给人这样的印象,假如独裁政权让人看得见起码大部分人民的(甚至不是全部人的)生活条件的改善,那么独裁政权——变成开明的独裁政权——便肯定会受人民欢迎。这解释了阿拉伯社会没有追求现代性,并粗暴地排斥它的原因。这种拒绝的姿态,被认为是伊斯兰教大业最中心的意识形态,而且一呼百应,势力浩大。

独裁政权奉行非现代性的原则,从传统寻找合法的依据。在一些国家,独裁政权表现为民族与宗教的君主政体传统,比如摩洛哥的政党不会质疑这种君主政体之座右铭:“真主阿拉,国家,君王”;或者在阿拉伯半岛,独裁政权表现为部落君主政体。另外一种继承于奥图曼帝国的传统,称为“马木路克(Mameluke)政



权”，奥图曼帝国曾经统治从阿尔及利亚到伊拉克的土地，即阿拉伯世界中的一大块土地。

“马木路克政权”是个很复杂的系统(或多或少是层级制度或者中央集权,但又可以说是地方割据),把军人、商人和教士三者的个人化权力统合起来,他们全是男人,女人被排除在外。这三种群体的人不仅站在一起,而且完全融合为单一的统治政权。

阿拉伯世界现在实行的统治是否足以创新,以致以上所说已不合时宜呢?其实,独裁国家及其政治管理的形式仍然在运作,但却处于危机之中,越来越没有能力面对现代性的挑战,这大大削弱了其合法性。而这一切表现为,政治的伊斯兰教之兴起,政治冲突之混乱,以及社会抗争之重生。

## 二 政治的伊斯兰教

相信以下的论点注定是错误的:“政治运动能够兴起,吸引大量认同伊斯兰教的人民参加,乃是由于文化与政治上落伍的人民——不懂其他语言、几乎是复古而蒙昧无知的——突然崛起的必然结果。”但事实上,就像别的地方一样,回教族群与伊斯兰教的历史里,也有对理性与信念之关系、社会与宗教之间的互动改变和适应的不同诠释。可是,不仅欧洲中心话语,而且当代以伊斯兰教标榜运动也否定这个事实。两者同样有文化上的偏见,他们坚信自己人民的发展与宗教的特质是无形的、不可衡量的、跨越历史的。当代政治的伊斯兰教是西方欧洲中心思想的对立面,是颠倒过来的欧洲中心特性。

以伊斯兰教为名的运动的崛起,确实表达了一种暴力反抗,反对现存资本主义之破坏性的影响,也反对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未能实现的、被删削的、具有欺骗性的现代性。对于那些没有为阿拉伯人民带来福祉的体制,这是完全合法的反抗。

伊斯兰教话语被捧为替代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另类出路(不同的历史社会主义的现代性经验被抹掉内涵的细微差异,而同化于这一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这种话语是政治性的,跟神学毫无关系。原教旨主义经常被加在伊斯兰教话语上,但实际上,伊斯兰教话语其实极少提及原教旨主义,我们只能在一些当代回教徒的著作里找到,而且他们使用这些措辞只是为了西方的读者,而不是为了自己。

这种伊斯兰教是所有解放神学的敌人。政治的伊斯兰教呼吁服从,而不是解放。唯一从解放的角度阅读伊斯兰教的,是苏丹神学家马哈茂德·穆罕默德·塔哈(Mahmud Muhammad Taha, 1909—1985)。塔哈被苏丹喀土穆(Khartoum)政府判了死刑并处决,但在伊斯兰教运动里,不论是“激进的或温和的”,都没有人提及他,还有那些拥护“伊斯兰教复兴”或者愿意与这些运动“对话”的知识分子,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捍卫他。

现代的政治伊斯兰教是由印度那些为英国政权效力的东方主义者(Orientalists)发明的,随后由巴基斯坦人赛义德·毛杜迪(Sayyid Abul Ala Mawdudi, 1903—1979)接手拿来的。他挑战解放的现代性概念,反对民主的最重要的原则——社会自由制定法律、建构未来的权利。可以理解的是,这种论调很受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西方权力的欢迎。

当代的政治伊斯兰教并不是对所谓的世俗主义的负面的响应,不幸的是,很多人都这样说。除了前苏联,现代时期没有一个伊斯兰教社会曾经真正世俗化,或者又受到无神论者的猛烈攻击。凯末尔(Mustafa Kemal)时期的土耳其,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 1918—1970)时期的埃及,复兴党(Baathist)执政时的叙利亚,都是半现代化的国家,都满足于驯化教士(以前也这样做),强行提倡一套使其政治选择合法化的话语。

从这一基本观点看,政治伊斯兰教所谓的激进浪潮,与那些所

谓温和的派系没有什么不同,两者都有相同的计划。伊朗也不例外,尽管人们混淆了它的成功根源:伊朗国王独裁政权使社会倒退,政治上亲美国,伊斯兰教运动的壮大与反对伊朗国王独裁政权的斗争是互相结合的。

全球化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政治伊斯兰教的话语并没有冲突。相反,两者互为补充。美国式“社群主义”意识形态的说法很流行,它铲除了社会意识与斗争,并以代之以某种所谓的集体“身份认同”,不为人民所认识的身份认同。这种意识形态被资本的主导策略所巧妙利用,因此将现实世界中的社会矛盾与斗争转化成了抽象的东西,并说这是文化的、跨历史的与绝对的。政治的伊斯兰教正是这样的“社群主义”。

出于一贯的犬儒态度,美国政府从政治伊斯兰教获得另外的好处。美国培植的异类——例如塔利班(其实不是异类,是美国大计的组成部分)可以被利用,只要帝国主义觉得有利可图便会介入,如果需要会粗暴干预。那些被七大工业国极度谴责的、唯一声称是伊斯兰教的政治运动:黎巴嫩真主党(Hexbollah)和巴勒斯坦的哈马斯(Hamas),成为反帝国主义斗争的一部分(源于客观的本土情境)。这并不是偶然的。

## 二 政治冲突与社会斗争

### (一)“复兴”和民粹的民族主义

乍看起来,今天的时局并没有什么改变。“马木路克政权”的势力犹在。现在与当年独裁的“马木路克政权”极为相似的是,商贸势力与政治权力的相互渗透。事实上,严格来说,没有所谓的“私人部门”,很少有自主的资本家能保证享有商业的拥有权。

其他相似的地方,是利用传统保守的宗教合法性。马木路克一买办政权越是屈从于主流帝国主义的利益与迎合自由主义全

全球化的要求,便越是要对丧失国家合法性进行补偿,而采取所谓宗教话语中强硬的路线。

其实,“独裁、好战、重商”(马木路克—买办—股东)这种模式,在文化和宗教上很保守,应被理解为“低度发展的”产物,并非发展的“落后阶段”,而是全球资本扩张导致的两极分化的结果。后者没有产生现代化(以及有潜能的民主),相反却产生了独裁和贫富悬殊的现代化。争取真正现代化与民主化,只有反对世界体系的主流势力,而非跟在其后头。

在阿拉伯世界,一百年或者五十年前,都难以想象马木路克独裁政权会在今天复活,照说它早应完全结束。阿拉伯世界——至少在埃及和叙利亚——似乎早期曾投身真正的资产阶级现代化。穆罕默德·阿里(Mohamed Ali,1769—1849)和19世纪的“复兴”也设计好了这条道路。到了1919年,埃及革命达到高潮。这场革命的主张几近于世俗主义,在阿拉伯世界从未出现过,他们高举的旗帜是:“宗教属于真主,国家属于每一个人”,选择了那面有新月(伊斯兰教)与十字架(基督教)的旗帜。

在奥图曼帝国统治期间,塔兹玛特(tanzimat)实行了类似西化的做法,即使奥图曼帝国死亡,阿拉伯地区仍然继承甚至弘扬资产阶级现代化,包括宪法、民事法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党、议会选举等,尽管有不足之处,但是人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觉得社会的发展方向是对的。从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来说,成绩非常薄弱,这是因为当时的帝国主义者勾结本土反动分子,所以本土的资产阶级难以与之较量。结果社会危机日趋恶化,导致了阿拉伯世界第一阶段资产阶级现代化的流产。

第二阶段是1950—1970年代的民粹的民族主义。纳赛尔主义(Nasserism)、阿拉伯复兴主义(Baathism)与阿尔及利亚的革命胜利,似乎能够同时从两方面来化解社会危机,一是靠更坚决地对抗帝国主义(得到苏联的帮助),二是靠推行积极的经济与社会政

策。这全是过去的历史,我们不能够对此深究:这是制度内部的矛盾和限制的合成物,也是世界经济与政治事态的逆转。

今天的社会危机比一百年前,或者五十年前更加严峻,并不是社会变得更贫穷,相反以平均收入来算是有所进步的,而且社会财富比以前更加平均分配。事实上,真正的改变是这样:埃及的中产阶级在五十年内占上层阶层的人口百分比从5%增加到了30%,而占全人口的百分比则从10%增加到了50%(根据G·阿明[Galal Amin])。但是,现代化也包括了贫穷的现代化。

危机的深度主要来自阿拉伯世界的城市化,阿拉伯人口一半以上是城市居民,但是这么大规模的城乡人口转移,却不是双重的农业与工业革命的结果,或多或少类似于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或者苏联和中国近半世纪所走的路。相反,这是由于缺乏农业与工业革命,凋敝的农村只不过变成无法被工业和现代活动所吸纳的市镇。这个危机所呈现的社会阶级架构不再与百年前或者五十年前的阿拉伯世界相关。在那个时期,危机从政治生活、意识形态、组织的形式中呈现出来,也通过不同的社会抗争表现出来。

一旦民粹的民族主义时期结束,声名狼藉的一党专制便让步给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不同政党,世界主流传媒对此欢呼说是为民主发展揭开了序幕。他们说,这显然是开放市场后自然的结果,一如时尚教条所说的。不过,这里倒有个悖论:不同政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同时,政治上却是大倒退到马木路克模式的独裁政权。

## (二)现实社会的“第三部门”

“第三部门”是当代时尚话语中流行的词汇之一,像其他表述词一样,某词由另一同义词取代(就像“公民社会”),其意义含糊不清,它指出现实中某些东西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却不并费力去辨别两者的差异。

阿拉伯与伊斯兰教世界的历史很相似,古老制度的痕迹至今

犹在。宗教制度不像天主教或者东正教那样有自己的机构,非常受国家政府操控——即最高统治者哈里发(caliph)或者本土的苏丹(sultans)。在什叶派(Shiite)的伊朗,这个宗教制度像教会,受到伊朗国王(Shah)的国家的密切监视(像18世纪的萨法维王朝Safavids)。伊朗革命简单地颠倒关系,使国家政府隶属于宗教制度。

在逊尼派(Sunnite)世界,宗教制度没有自主的组织,这些自主组织喜欢发展“兄弟会”(例如苏菲[Sufi]等),尝试在国家政府权力下保持自主。后者尽可能打压他们,或者将其收编。即使在凯末尔统治的、被视为世俗/政教分离的土耳其,伊斯兰教制度也在国家政府的统治之下,这并非人们常说的镇压或者忽略。因此,凯末尔主义有着和奥图曼苏丹制(Ottoman sultanate)相同的目的:利用宗教,使它服从于自己的目标。

现在我们看见资本入侵,企图占领新地盘,那些新地盘恰恰是到目前为止仍在市场之外的范围,他们可能是属于国家政府,或者由宗教和社区制度经营,扣连不上协会的生活(associative life)的标准。这些协会(非政府组织)的成长——融入或者置身于宗教制度之外——怎么样与市场经济的价值和范畴相联结呢?公共服务和市场理性的概念怎么样互相交合或者互相排斥?这些都是反国家政府的措辞所掩盖的,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

推行自由主义理论的人有两个简单的观点,使他们觉得自己理直气壮,可是他们并没有建基于任何科学或者实证的辩论之上。根据他们的观点,社区(界定社区生活的人)和私人商业比公共部门更有能力提供社会所需要的社会服务。他们认为国家政府实际上是荒谬的官僚制度的同义词,这已经是最好的评价了,通常往往是独裁政权,还经常不负责任地浪费公共资源,很多服务于本身的成本都算入国家财政。相反,社区和私人部门却一定会算好账目,因为钱是他们的,他们知道怎样去做。他们本身很灵活,懂得怎么

满足不同的需要。因此,协会和私人部门与国家政府相比,更有效率实行民主的、透明的、问责的制度。这种民主的目的是自由,海耶克(F. A. von Hayek)说出了这种独特的价值:这是最强者的自由。不过,这却忽视了公平的问题。没有公平,哪有民主?

事实上,比起协会、特别是私人部门提供的服务,国家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素质确实优良(但话说回来,比较是没意义的,除非在相同的社会里作比较,而各个社会一般发展和财富也差不多)。再者,公共服务比较容易保证透明度、财政问责,因为前者会被议会提问及质询,但是后者却被商业秘密所掩盖。

### (三)协会生活:是真正让人欢欣的景象,还是烟幕?

过去二十年,阿拉伯世界像其他地方一样,社区组织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统计数字显示(大概很接近,往往低估实际数字),在阿尔及利亚,注册的非政府组织有五万五千个,在埃及有一万五千个,在摩洛哥有一万八千个,整个阿拉伯世界,大概超过十万个。根据国家的统计,过去二十年里这些数字倍增的系数是从五到了十。

有一半的非政府组织通过年度拨款或者项目拨款从国家政府获得资助,又由公共服务部门提供人手和场所(阿拉伯国家有五分之一是这样)。与整体资源分配相比,这些资助几乎总不会少得可怜,往往相等于那些大型非政府组织支出的一半(这些组织提供社会服务[家庭援助、教育、健康],或者实施城乡发展计划)。

大部分非政府组织(几乎所有调查的案例都是)获得了本地私人资助(即不是海外)。这些资助相当多,都拨给大型组织从事教育、健康及其他社会服务。这些资助来自摩洛哥清真寺财产(habous)或者伊斯兰教经济制度网络(包括伊斯兰银行),或者捐助者实际上是伊斯兰教国家/商业界的百万富翁,有一部分来自波斯湾,只有与伊斯兰教相关的组织才能获得。

第三种财政收入来自服务销售,有三分之一的非政府组织受惠,其中最重要的是从事教育和健康事业。很多非政府组织做纯粹的商业活动,即使他们把自己说成人道捐助者,这在伊斯兰教不同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活动之间经常引起混乱。

最后是外来援助,来自外国政府(或者外国机构)或者与国际组织相关的机构(特别是世界银行、联合国发展计划署、欧洲发展援助)。他们的记录也好不过其他的资金来源。有三分之一的非政府组织由此受惠。阿拉伯国家政府进行着严格的控制,原则上任何外国的资助要经政府批准后才能获得。可是,像埃及那样,主要赞助者是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与埃及签订“特殊”协议,资助中型的非政府组织,提供服务与发展计划,使政府受益(他们从公共资助那面也受益),也使伊斯兰教受益(他们很多人宣誓对它效忠)。再者,欧洲社区的赞助者(特别是荷兰)在北非、黎巴嫩、巴勒斯坦也非常活跃。

这些受资助的非政府组织肯定不讲求透明度和问责制。与一般的说法相反,他们搞的一系列机构和活动,都比公共部门的机构和活动更难以捉摸,后者的财政预算至少公开发表,容易获知。

非政府组织都在政府严密监视下进行运作,虽然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并非如此。根据民主原则,可以自由成立协会,而国家政府没有权力干涉(甚至严禁),除非事出有因,要依据法律审理以及由法庭监察,在阿拉伯世界却不是这样。相反,任何事件都要预先得到国家政府批准,乃是普遍原则。

非政府组织在不同的领域从事活动,其活动分为五大类:

第一类非政府组织介入的领域,通常是国家政府的强项(教育、卫生、社会服务)。这一类从协会获得最大部分的资助(占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在阿拉伯国家所做调查显示,第三部门所提供的社会服务很重要,名列榜首的是教育与培训,包括普通学校、大学和各种专业培训,紧随其后则是关于卫生、儿童、家庭计划等社



会服务。

公共资助和外国赞助投入教育和卫生的比较多,原因是这些计划被视为当下流行的“对贫穷开战”。伊斯兰运动除了表明支持这些计划,但也不掩盖其控制的目的。

第二类非政府组织从事特殊的发展计划,占了注册协会的15%,他们有一半在城市推广计划(像小规模的手工艺生意与合作社、专业培训等),另一半则推广农村计划。在这一方面,公共资助和外来资助都占大比例,而伊斯兰运动则比较少。

第三类非政府组织从事捍卫人民权利的活动,包括一般所说的人权,特别是工人权利,以及妇女的权利和需求。

第四类的非政府组织关注及捍卫所谓在国际“社区”中少数民族群的文化或政治权利,虽然这些协会和机构拒绝使用这个词,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国家社会的一部分,例如摩洛哥有很多本地组织推动北非原住民“帕帕尔人(Berber/amazigi)文化”,埃及教会(the Coptic)及其他教会也一样,成立了许多协会以巩固与社区的联系。

第五类是商人协会,它们在阿拉伯国家是新生事物,但势力强大。

赞成或反对这些协会的辩论都耳熟能详,既适用于阿拉伯国家,也适用于其他地方。辩论内容大都围绕这些活动能否开创新局面,它们在当代阿拉伯具体社会情况下的限制,他们所运用的政治势力,独裁国家政府所允许的有限自由,他们提议怎么样超越这些限制等问题展开,很多讨论都过于宽泛而没有多大用处。此外,我们还要注意这些协会极其纷繁多样。

### (三)协会运动的特征

我们根据阅读的材料及听到的讨论内容,得出以下的观察:

第一,生态问题没有进入阿拉伯世界,我们甚至想不出一个值

得提及的阿拉伯国家环保运动。虽然有几个类似的组织,但只是小团体,绝不是真正的运动,他们由外国机构推动,由少数人把持。

第二,女性主义并未成为一股力量足以应付阿拉伯社会所面对的挑战,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要把妇女运动的真正意义(运动的目的是改变现存状况)与“妇女参与发展”模式混淆起来。那些捍卫现存制度的人十分强调统计数字,其实这没有多大意义。事实上,那些推动教育与健康卫生的活动使男女一样受惠。

伊斯兰教介入使情况更加恶劣。阿扎·卡赫里尔(Azza Khalil)指出,在埃及,伊斯兰教介入的策略,目的就是使妇女屈从于现存的法律,以换取一点物质条件,他们当作是在做慈善事业,而非让妇女获得应有的权利。

第三,很多人认为协会活动针对主流生活方式和社会行动如政府、政党和工会所忽略的群众。无可置疑,今天的阿拉伯社会与五十年前非常不一样,社会危机——国内贫富两极化、伴随全球资本主义扩张而来的自由主义横行——导致了三分之一至一半的城市人口卷入到非正式经济之中,即使推行了所谓现代化,伴随来的也是贫穷加剧,假如使用世界银行的标准,有三分之一的城市人口受到影响。现代城市贫穷加上传统的农村贫困(其实不是由于传统,也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产物,特别是因为选择了自由主义政策),影响了更多的农村人口。

因此,问题是是否应有另外的经济、社会、政治策略,能够重新吸收被挤到边缘的人,或者能否努力修正与改变现存状况,从而使之被接纳?主流话语让我们相信第二个选择是现实的。

同时,那些话语称,根据观察现实,得出重要的实际结论。传统的社会斗争形式,在正式的工作场所发展,而且往往集中(工厂、行政服务、专业、合作社),但是没有影响一半以上的人口。所以可以说,他们失去了影响力与可信性。这是对的,但只是部分而已。另一方面,新的社会结构把人们的住所——邻里——置于动员活

动的中心,这也不是错的。

不过,在非正式的社会环境真正开展的工作却可以被批评,许多协会活动都以这非正式的社会环境为目标,但调查显示,这些计划没有寻求受惠者的积极参与。在埃及和其他国家,有一半受访的组织者承认没有尝试寻求受惠者的参与,另一半觉得协商有困难(积极参与的例子非常少)。解释的原因很普遍:那些受惠者无知,不知道什么东西是对他们有好处的等等,这就是“群众自发的运动”在协会以外发展,而且被视为“非法”行动的原因。

关于“草根行动”的话语仍然只是话语而已。不必惊讶的是,那些受关注的人的行为像“顾客”,加强了协会领袖裙带的心态,这种态度促使有关的人们“去政治化”,对政治敌视(可见于协会之间的关系或者国家政府与协会之间的关系)。他们只能再生产独裁的民粹主义传统,为政治的伊斯兰教所接受的传统。

第四,研究的大部分行动(五种介入的方式)都不是独立于国家政府,因此这种“协会式的生活”大多只是装饰而已,例外的是那些推动人权、社会权利、妇女权利的组织。

研究显示,公民社会中大部分协会没有投诉国家政府,差不多70%的协会对“自由主义”满意,换言之,支持“自由主义”。他们对整体政策做出判断并不感兴趣,甚至一无所知。他们不会批判经济的自由主义或者全球化。现存无数的协会与国家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不单是公共财政的支持,而且是行动的规划,与擅长于此道的政府行政系统很一致。协会失去了独立性,但其领袖却不认为有问题,这可能因为他们没有这种想法,或者从一开始就没有独立自主的理念。

最后,政府控诉非政府组织代表帝国主义建了一个特洛伊木马,这样的控告很奇怪,因为特洛伊木马其实就是独裁的马木路克政府本身。政治伊斯兰教话语也用同样的口吻来指责公民社会的肢体(即说他们是西方的预报者),这也莫名其妙,因为实际上,伊

伊斯兰教徒接纳了全球化的自由主义。那些拒绝接受自由主义策略的人(公民社会中的抗争与斗争的组织)受到国家政府、政治的伊斯兰教和外国机构抨击。

### 三 结果与另类实践

阿拉伯的公民社会反映了不同地区的国家政府与政治社会的状况。将被判定是“坏”的国家政府与政党,看成是与主流话语中拥有美好特质的所谓公民社会是对立的,是很幼稚的想法。

从各方面来看,公民社会的行动还未证明是否比公共服务更有效率和完善。我们逐个例子检视,发现大部分由赞助者(特别是世界银行)干预的计划,规划十分差劣,不符合当地的条件,根本无法解决真正的问题,失败的情况数不胜数。与之相比,国家政府的服务质量,尽管受到种种批评,但还是不错的。

即使以影响大部分行动的话语来看,这些成绩只能算是平淡无奇,贫穷人口不断增长,从这些政策获益的人只占一小部分,至于“增权”只存在于那些夸夸其谈的人的脑海里。

这些大部分的行动都不比国家政府的行动更“有效”或成本更低,而且他们做事没有透明度或者问责制度——比公共部门的做法更隐蔽,最后,管理也不见得更加有效和民主。

如果这是真的,那是因为这些行动所采用的基本策略和国家政府一样。简言之,那是资本的策略,主导着世界层面以及地方层面,并没有解决受到影响的人的困难。

以上批评只适用于那些建基于(虚伪的)共识原则,并迎合主流自由主义的、所谓公民社会(及国家政府)的行动。对比之下,那些政治与社会的斗争,不论是否支持或反对政党、工会和专业协会,争取民主、人权、工人和妇女权益,都打开可能的另类实践局面。政治和公民社会中的创新层面,即介入改变社会关系的斗争,

就是构筑另一个未来的基础——那个未来的世界更加平等,每个人、族群、国家都享有更多的自由。

现在,政治和社会斗争零星分散。民粹民族主义被侵蚀,以至最终崩溃,加上现存社会主义的崩溃,都造成意识形态的真空,使这些斗争——现存的发展状态——缺乏令人信服的另类替代前景。主流话语鼓动人们放弃斗争,只满足于如何过好日子。后现代主义给出这种投降意识形态的“学者版”,“良好管治”是一般的说法。

另类实践一定要建基于有效的斗争。但是,理论的反思不能够代替在草根层面的争论。两者同样不可取代,唯有互相结合才有效。重组社会(阶级)斗争——界定这种辩证的目的——意指走在一起,建基于群体认同的真正相同利益,辨明目的,一步一步地向前迈进,改善群体在物质与精神上的条件。抗争一定要以这个目标为前景。与此同时,这种抗争鼓吹必需的民主行为,以及促进真正植根于人民经验的、发展的新方向。

## 2 以色列社会的内部矛盾

米歇尔·华周斯基

当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冲突成为头条新闻的时候,以色列内部的矛盾,特别是沙龙(Ariel Sharon)执政以来,愈演愈烈。本文着重分析这些矛盾,揭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对以色列社会(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造成的影响——即使这和对其他国家造成的影响不太一样,以色列近现代史的特殊背景让新自由主义对其产生特殊的影响。本文也分析和平进程,特别是《奥斯陆协议》(Oslo Accords),因为这属于区域统合计划的一部分,而以色列站在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立场。本文建立在史实分析的基础上。

### 一 前 言

在全球化的概念普及以前,全球政治与经济就界定了以色列国的现实。假如一些大国没有认识到它对全球化政治与经济的重要性,那么犹太复国计划就不可能成功地建立犹太主权国家。高度发达的以色列经济、军事力量和持久的自我防御能力——这一切都离不开国际援助。显然,这些援助不是免费的,但是作为交换条件,帝国主义势力成为这个犹太民族国家的教父。

本文不对历史做详细陈述,而是旨在探明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以色列在资本主义阵营里如何担当区域警察的角色,

抵抗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的危险,同时成为帝国主义集团与苏联对峙的前哨——兼任这双重角色,以色列国得到了空前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每年平均四十亿美元,20世纪80年代以色列的常住人口是四百万)。经过四十年,国际援助使以色列变成真正的地区霸主,完全融入美国军事体系,并在国际经济事务和贸易关系中享有特权。

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时代的终结,以及20世纪70年代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的衰落,要求以色列对其政治和军事角色做出调整。海湾战争使中东,包括以色列,加入世界新秩序。

## 二 海湾战争和世界新秩序

1990年帝国主义军事集团对伊拉克的联合进攻形成了巨大的军事同盟,把大部分阿拉伯国家纳入到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共同体之中。以色列被排挤在这个联盟之外,以军无权反击伊拉克军队的进攻,这使以色列的统治阶层清楚地看到,世界局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必须马上调整政策,并反思犹太民族国家在后冷战时代中的地位。

阿拉伯政权继续效忠于美帝国主义,成为保护其利益、打击民族运动和其他有可能威胁华盛顿统治的政治运动的忠诚护卫,以色列的军事地位正在被逐渐削减。佩雷斯(Shimon Peres)和追随者在20世纪80年代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局势。在单极化的国际环境中,世界完全由一国的市场及其法律主宰,以色列逐渐失去其军事重要性,转而在经济领域中逐渐占据重要地位。

为了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时代担当这个经济角色,以色列需要与相邻的阿拉伯国家恢复正常外交关系,并由此结束与巴勒斯坦的对抗。这是1991年马德里会议和1993年8月签署的《奥斯陆原则宣言》(the Oslo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的主要目标。对

于佩雷斯及其政党而言,《奥斯陆协议》的主旨没有涉及太多巴勒斯坦问题,而是更加关注与阿拉伯国家恢复正常邦交并打开市场的问题。与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协议一经签署,已经加入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阿拉伯邻国便愿意立即与以色列恢复正常外交关系。这样,其他的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将会纷纷效仿,为其大开方便之门,例如巨大的印度尼西亚市场。

在以色列裔美国人看来,战争与和平手段应该联合使用,来巩固美国市场和新自由主义的专制统治。海湾战争建立和巩固了大部分国家与美国的区域新秩序,而马德里会议把这个不可反抗的政治—军事胜利落实到几个区域经济计划上去,以色列在这些项目中担任主角。从一支地区军事力量兼美国第六纵队的排头兵,以色列逐渐成为一支经济生力军,成为美国、欧洲和日本跨国公司的区域中心。凭借强大的科技力量和基础设施建设,以色列理所当然地担当了经济霸主的角色。

20世纪90年代初,调整以色列政策成为统治阶级迫在眉睫的主要任务。私营经济,特别是高科技产业得到大力支持,这和国际市场的需求紧密相连,因为这出于投资和销售的双重考虑。由于开拓市场对新生的资产阶级具有重大意义,而赢得市场不能靠战争,只能依靠和平。以色列统治阶层中的现代化力量需要稳定的局势来吸引投资,同时也需要实现和阿拉伯世界的邦交正常化以赢得市场,也包括那些由于阿以冲突拒绝以色列资本进入的国家。

与阿拉伯世界缔结和平是以色列融入世界金融体系的重要一步。以色列统治阶层的主要部门因此热爱和平,并相对地接受以色列的非军事化。这绝非偶然。过去的十年,促进和平的任何政府行为都得到媒体的大力宣传,当然媒体是受以色列工业协会和大银行赞助的。奥斯陆会议和1994年的《开罗协议》(the Cairo Agreements)以后,还有卡萨布兰卡经济会议(the Economic



Conference of Casablanca), 以色列在卡萨布兰卡受到热烈欢迎, 包括埃及、约旦和阿拉伯—波斯湾附近的各国。

### 三 新中东

海湾战争后的五年里, 从以色列经济的角度看, 一切进展顺利: 外国投资大量涌入; 以色列高科技企业在西方证券交易所上市; 与突尼斯、摩洛哥和其他海湾国家, 特别是卡塔尔(Qatar), 签署经济协议; 与印度尼西亚建立半外交经济关系。同时, 以色列和约旦签署了和平协议, 照此情形, 叙利亚和黎巴嫩也会跟紧脚步。由于在黎巴嫩受到的强烈民族抵抗, 以色列原本就想撤军。约旦效仿埃及, 允许以色列资本进入, 特别是在纺织行业, 廉价劳动力成为巨大吸引力。在以色列资本进入约旦之前, 巴勒斯坦的劳动力价格比约旦贵五倍左右。

对于佩雷斯和以色列贸易而言, 这一切只是开始。在他们的想象中, 新中东是等待以色列科技振兴的一片大沙漠。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犹太复国运动想要“通过种植松林、番茄, 紧接着种棉花, 而使沙漠开花(在他们眼中显然是指巴勒斯坦)”。而21世纪的犹太复国运动是“通过前苏联移民后裔开发制造的计算机、计算机应用软件和医疗扫描仪, 而使这片浩瀚沙漠走上文明之路(这总存在于他们的种族主义和东方主义幻想之中)”。随着国际劳动分工框架的形成, 以色列资本成为美国资本年轻的合作伙伴——仅次于欧洲资本——在最先进的行业, 特别是生物技术方面占据优势。由于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建设, 以色列成为跨国公司投资进入整个区域的窗口。

在实行这些区域计划的同时, 佩雷斯及其政党也要解决持续的剥削制度, 即伴随以色列几十年的占领, 在新政治体系下以色列资本剥削巴勒斯坦劳动力的问题。换句话说, 该如何把分裂局面

与剥削制度结合起来。佩雷斯的解决方案是“在现今的以色列领土和巴勒斯坦自治区域交界处设立工业园区,以后将成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州”。

这些园区实际上是自由贸易区,既没有社会立法,也没有相应的劳动就业法。所以对以色列及其他国际公司来说,来自加沙或西岸的劳动力惊人的便宜。经过三十多年的时间,经济学家莱尔(Sarah Roy)将其称作以色列占领的“未发展的”地区。对几千名巴勒斯坦劳工而言,在这些自由贸易区域工作就意味着生存。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他们是以色列建筑、轻工和服务业的真正建设者。

《奥斯陆协议》不仅是一个旨在压制巴勒斯坦抵抗的政治计划,同时也是经济计划,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里,使以色列在帝国主义联盟建立的新政治—经济秩序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对以色列资产阶级的新生部门而言,约瑟夫之坟或是纳布卢斯之门(the gates of Nablus)的主权远远不如几十亿美元重要,而赚得利润的关键在于以色列和中东各国联合融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在此前提下,在挪威首都签订、由美国国务院完善的政治框架有效建立起来,在框架建立过程中,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对建立新中东秩序的各种抵抗运动——有时是非常激烈的抵抗形式,没有被纳入到考虑范围之列。

早在几年前,格里殊(Alain Gresh)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France Inter)的一次电台采访节目中就做了预言。他警告那些以为《奥斯陆协议》进展顺利的人们,“《奥斯陆协议》的确是在以巴、全球化进程和以色列资产阶级的框架内进行的,但仍有失败的可能,因为社会和政治力量出于经济或社会的原因,或是由于国家和文化的原因,反对全球化进程”。过去三年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位眼光敏锐的《外交事务》记者的话,那些乐观地相信全球化进程和美国霸权一样势不可挡的人们,受到了事实的嘲弄。

#### 四 阿拉伯抵抗运动

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的反对者,反对《奥斯陆协定》进程。他们拒绝接受强者对弱者的强迫统治,作为对侵略者的奖赏,帝国主义强迫阿拉伯世界接受锡安(Zionist)<sup>①</sup>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强权政治的殖民统治。在海湾危机期间,尽管美国成功地把绝大部分西部阿拉伯国家纳入到主战阵营中,却并不能改变这些国家的公民与伊拉克人团结在一起的感觉,他们也清楚地看到世界新秩序——战争把中东作为威胁和侵害他们尊严的武器。与某些民族主义领袖所说的相反,如果萨达姆不是萨拉丁(Saladdin)<sup>②</sup>,那么海湾战争更是一场现代的十字军东征,在本土买办的帮助下,西方人想把自己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特别是资本主义市场和跨国公司的产品——强加给阿拉伯世界。

在阿拉伯民众看来,承认以色列及其在中东的霸权地位是新中东秩序的核心,只会使以色列更加傲慢,并激起阿拉伯民众的反抗——即便这种反抗是被动的和出于文化差异形成的。拒绝和以色列恢复邦交正常化表明了他们对新中东的抵抗,而新中东正是世界新秩序的区域缩影。基于马德里会议的大区域计划还只是一个帝国主义之梦,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的投资和以色列—阿拉伯合资企业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只有实现以巴关系正常化,阿拉伯资产阶级才能与以色列恢复正常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如果新中东秩序一旦得以运作,奥斯陆进程就会收到良好的效果,这一点非常重要。但是,新中东计划从一开始就受到各种形式的激烈抵抗,到2000

① 以前指犹太复国主义,现在指力图建立地区性以色列霸权的意识形态。

② 公元12世纪阿尤布王朝建立者,曾击败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

年底,整个计划不得不中断。最强烈的抵抗来自巴勒斯坦民众,而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有机会和以色列坐下来商讨“历史性和解”的问题,但巴勒斯坦人民理解为这不是要他们妥协,而是彻底投降。抵抗运动最初由民族主义左翼势力领导,以伊斯兰原教旨运动为主,而从2000年9月第二次的武装起义(Intifada)以后,成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全国运动。

当然,在奥斯陆进程规定的经济和政治秩序中——特别是巴黎草案制定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经济、金融和商业关系中(某些政治军事领袖垄断了权力;以巴资本在某些领域的融合;以及各种特权,写入一系列条款如VIP1、VIP2等之中,这些条款是以色列当权势力对愿意融入新中东秩序的人做出的让步条件),有许多巴勒斯坦人能够找到一席之地。然而,即使某些巴勒斯坦人获得特权,以及买办阶层兴起,仍然不足以让巴勒斯坦民众放弃抵抗,加入以色列为巴勒斯坦人规划的新秩序中。同以色列人合作障碍重重,以色列也不准备付出最低的代价。正如殖民主义会衍生出盲目的傲慢,以色列统治阶层以为花几件廉价的首饰就能让至少部分的巴勒斯坦领导层放弃抵抗而臣服于班图斯坦化的殖民统治(bantustanization)<sup>①</sup>。所以,正如佩雷斯在书中提到的,以巴关系正常化(奥斯陆进程)中断了(起码暂时如此),以致新中东秩序与全球化进程的宏伟目标无法实现。

## 五 以色列的抵抗

如果说以巴和谈创造了经济开放的机会,那么是什么原因阻止以色列资产阶级——特别是其现代化部门采取必要的政治手段和让步(这些政治措施对以巴和平进程是至关重要的)呢?在以色列

<sup>①</sup> 指南非种族隔离期间为黑人设置的定居区。

列内部,又是哪些社会、政治力量阻碍着奥斯陆进程,即区域融合的实施呢?这些问题的答案理所当然地引导我们对犹太民族国家和以色列社会存在的社会、政治、文化矛盾做出分析。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一个新兴的社会政治集团创立并逐渐挑战着执政党代表的旧势力(自从20世纪30年代工人运动时期以来形成的政权)的领导地位。

如同许多其他的新兴精英势力一样,新集团是政治—军事集权组织,目标不仅是建立国家,而且要积累资本,特别是外部资本,伺机吞噬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财富再分配。以色列资产阶级,特别是重工业部门,是由工党所创立的,工党执政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现在他们仍然和工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社会大众特别是那些犹太—阿拉伯裔的民众,逐渐在反对党中找到席位,首先是利库德集团(Likud),以色列右翼党派的政治联盟,然后是沙斯党(Shas)<sup>①</sup>。这些党派的文化是犹太—阿拉伯的。工党的失势既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文化方面的原因:政治上的原因是工党成员逐渐成了富人;文化上的原因是工党、特别是其左翼,公开排斥和嘲讽非西方文化和世俗化的任何方面,至少是在支持犹太人复国运动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兴资产阶级和美国及国际货币组织的压力下,以色列像其他国家一样,逐渐瓦解福利国家措施,成为把工业和社会服务私有化的国家。经过了两代人的“先锋意识形态”(标榜国家利益与金钱、贸易对立),以色列完全陷入全球化及其价值观的阵营中。赚钱、赢得市场、利益最大化和个人主义取代“国家利益”的集体主义责任感,取代均富和提倡节俭生活的主张(至少以前的公开宣称是这样)。富人厚颜无耻地自肥,自诩代表了“美国制造”的进步。因为财政预算更多地投入到要彰显

<sup>①</sup> 1984年成立的代表东方犹太人的正教派政党。

国家势力的工业部门,也因为社会服务私有化,穷人变得更穷。

这就是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社会分化的背景,两极分化使以色列社会形成政治上的两个集团。一方面有工党和锡安主义左翼势力,富人阶层推崇西方的模式,宣传完全复制美国模式的社会,达到滑稽的程度,并想拥有“地球村”的特权;另一方面,一部分人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上被完全排斥,包括犹太—阿拉伯人、宗教社群和穷人。

美国公共关系专家芬克尔斯坦(Arthur Finkelstein)于1996年提出新政策,使右翼领导人能够组织所有反对奥斯陆进程和反对工党的民众一起创立大型的社会团体。像“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对犹太人有利”、“我们要一个犹太民族国家”等竞选口号,说明利库德集团能够把所有的人都团结起来,这些人包括在意识形态上反对阿拉伯人和出于文化的原因(宗教或身份认同)感觉以色列犹太民族特质受到威胁的人。内塔尼亚胡在选举中获胜,表达了人民对以奥斯陆协议为代表的新的中东秩序的反抗,和对建立更团结、更犹太式国家的期望。内塔尼亚胡深受美国共和党及撒切尔主义的影响,实际上比他的工党前辈更加拥抱私有化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鼓吹的“结构调整”,可是在支持他的广大民族主义者民众面前,他的反对阿拉伯的论调听上去像是回归失落天堂的承诺。

“佩雷斯在向约旦人和埃及人出售我们的工厂吗?”“随着工厂纳税人的钱都流进加沙地带了吗?”他这样煽动说。成千上万的工人面临失业,特别是纺织厂的倒闭,对于这些工人来说,他们的困境是因为与巴勒斯坦的和谈陷入僵局,但实际上,以色列在阿拉伯国家的投资依然不多,加上面对亚洲国家的竞争,亚洲国家对投资商的吸引力比约旦和埃及大多了。

## 六 原教旨主义的选择

富人阶层和工党集团彻头彻尾地拥抱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而由民族主义右翼领导的、反对富人和工党的计划逐渐呈现,而且撒下未来宗教分裂(schisms)的种子。这是民族主义与宗教的反动计划,即绝不让步的原教旨主义与变本加厉的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结合在一起。这会导致宗教分裂,因为它超越了右翼在国际背景下认为合理的政治解决方案,也因为内塔尼亚胡及其同道不会质疑重新调整结构与私有化的进程。

由沙斯党领导的阶级斗争和强大的民粹运动迟早都会在右翼集团内部发生,推进某种以色列“伊朗化”进程和神权民粹政治。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右翼由于阶级的利益,将会被迫与工党重组,共同向着“全球化”的方向努力。背离利库德集团的人和工党左翼的奥斯陆设计者瞬间联合起来,有可能最终成为以色列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力量。在反对以色列资产阶级重组的运动中,沙斯党会成为大多数无权无势阶级的汇聚点——沙斯党体现了他们被剥夺了的尊严,体现了团结的价值观,也具有对私有化毁灭性影响的实际解决方案(他们对私有化的体验是诊所、学校和托儿所昂贵得荒唐的收费)。

事实上,上述这些服务往往附带严格的原教旨主义洗脑,对人们来说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实际上,在以色列最近的两代人中,这种做法提供了身份认同,提倡了某种价值观,中止了困扰以色列社区的犯罪率急剧上升的问题。

正如在其他许多国家一样,社会主义与国际主义都不是另类出路;相反,对以色列全民族来说,原教旨主义、社区和民族主义反而可能是对付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威胁的解决方案。“锡安主义左翼”主张取消国家福利、实现私有化和市场垄断,是新自由主义的

先锋,显然不是民众的另类选择,无法领导工人阶级运动。而工人阶级至今未能利用其社会力量来创造政治身份认同。温和的非锡安主义左翼花费大量的时间反对占领,而忽略了社会问题,以及低下阶层对社会、经济、文化等问题的关注,以致左翼的未来前景不明朗。

## 七 年轻一代反抗全球化

最近两年出现新的现象,既源于外部政治局势,又完全独立。这预示群众真正第一次反抗新自由主义计划及其经济、社会、生态和政治效应。成千上万的以色列年轻人意识到的问题不尽是巴以冲突,而更大程度上是社会问题(贫困、环境、歧视、外来劳工),他们受到国际激进思想的感染,组织起来抵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这些年轻人一般不超过二十五岁,不知道黎巴嫩战争及其大规模的全民动员,甚至对第一次起义也一无所知。他们在“和平进程”的过程中成长起来,并同样感受到以色列—阿拉伯冲突的结束。

通过互联网,这些年轻人和各种国际动员运动(西雅图、布拉格和米洛)的参与者取得联系。有些人甚至回到以色列参与活动,与年轻人分享他们的战斗经验。过去两年,这些年轻人组织的游行示威活动日益反对资本主义,游行标语还包括生态问题,例如反对新的跨以色列高速公路,抵制麦当劳,并且扩展到反对教育私有化,以及抗议关闭南部的纺织厂。

新一代战斗者的主要问题是他们对以巴问题的无知或冷漠。2000年9月巴勒斯坦最近一次起义——这次被看做是真正反对全球化的运动仅仅团结了一小部分巴勒斯坦人。而老一辈左翼政治力量比年轻一代更有威望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知道如何团结巴勒斯坦人民,把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斗争和动员人民为自己面临的社会问题抗争结合起来。人民解放和反抗新帝国主义秩序斗争



之间的密切关系显而易见,以色列必须与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运动团结一起,才能实现全国解放。

我们期待这个犹太国家能够第一次真正把反资本主义与反殖民主义结合起来,在真正的国际主义框架中展开反抗运动。只有这样,才可能组成真正的以巴阵线,共同抵抗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锡安殖民主义。

### 3 以色列:反对占领运动和社会斗争的联结

米歇尔·华周斯基

与巴勒斯坦人的冲突完全占据了以色列的社会政治舞台,在军事外交领域也一样。如果这一冲突引发了一场反对占领和殖民化运动的话,那么这一运动就与以色列社会沾上了边,例如 2005 年 3 月 19 日有近万人参加“现在就和平”的示威活动。十天前的极右翼的反对派发动十多万人示威,反对从加沙地带和平撤离。如果这确实是已成为政治争论和动员中心议题的话,那么要指出的是,这是以沙龙和一个政府党为代表的右翼与同样参加政府的极右翼的争论。而首相自己在党内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今天的左翼工党,或退一步说,是工党某些成员,和社会民主党一起,使右派在议会中占了大多数议席。

至于以色列人民阶层,不仅被剥夺而失去了政治领导,同时也失去了可能孕育产生反对政府运动的政治社会前景。这不是不将经济社会政策重新拿出来讨论,而是在被占领土的殖民化、军事绥靖以及建筑隔离墙等方面花费太大了。为了执行当前的殖民政策需花掉数十亿美元,而在教育、卫生、救助老年人和多人人口家庭方面则缺少与此相同的美元预算。社会预算从来不被重视,而且还横加指责。这一政策影响了绝大多数的以色列家庭。如下数字能足够说明问题:以色列三分之一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削减预算来自新自由主义计划。这是一个极端主义的、狂妄自大的、史无前例的计划。以财政部长本亚明·内塔尼亚胡为代表,以色列的新自由主义可以说是全球最野蛮的一种。它排除了一切或近或远与贫困阶层有关的考虑,甚至也排斥了最“资产阶级化”的总的集体福利。“一切私有化”和“尽快搞到钱”是国家新宗教的两条教义,加上不仅要取消现存的少得可怜的公共部门,而且还要开展为证券商和投机者谋利的非工业化进程。这一国家“新宗教”充满着对被这一类致富手段排斥在外的人的蔑视,并傲慢地对待正在与日俱增的穷人。

真的,这种对大多数人生活水平的无视有许多反映,但他们是分散的而且是无领导的,以色列唯一的工会——以色列总工会曾把预算方案说成是“吃人的”,特别是家庭津贴水平,并提出某些修正提案,但它完全放弃了涉及以色列劳动者整体利益的反对取消公共部门的斗争。它特别拒绝把抗议绝大多数人生活水平恶化的斗争与在被占领土上争取另一个政策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因此,就在最近反对预算的示威中,人们听到了“打倒内塔尼亚胡、沙龙万岁”的声音,而这两个人都来自同一个政党,并在同一个政府中任职。这说明要做到把(沙龙)政治与(内塔尼亚胡)经济联系起来还差得很远。

从社会动员的黑暗处已经可以看到一线闪光,给中期带来希望。这是因为已经出现了十多个协会和倡议组织。这说明年轻人为社会问题已经动员组织起来。这些社会问题包括移民工人、另类的人民教育、环境、救助失业人员等。还不应忘记种种妇女组织,不管它是不是公开的或不公开的女权主义运动。同样还应强调的两个变化是:为社会问题动员起来的阿拉伯人组织日渐增加,关注社会问题的人们和因与占领有联系的问题而动员起来的人们之间已逐步建立了联系。

这两种现象的出现要归功于地方社会论坛的举行,在论坛上

“政治”组织和社会运动层面寻求合作。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论坛的世界进程对以色列运动的影响是极为积极的,它推动了各类运动投入网络,并第一次使一些组织聚集在一起。这些组织当中有为反对占领而进行斗争的组织,也有另一些为建立一个更民主的、更关心社会的、更女权主义的和更关心生态的以色列而动员起来的组织。

## 4 以色列—巴勒斯坦：视角的缺乏

米歇尔·华周斯基

黎巴嫩的战争证实了以色列国内所存在的一个相当广泛的政治共识。与1982年不同，这场战争没有遭到大规模的反对。因而，只有区区几千人谴责这次新的流血冒险，是正常情况中的例外。这种新的共识由前工党总理巴拉克提出，修正了对所谓和平运动的认识。巴勒斯坦人不再是占领、殖民化和军事镇压的受害者，但以色列却陷入被拖垮的危险之中。在文明冲突的环境中，伊斯兰教徒是主要的行动者，而巴勒斯坦人则是直接的工具。

在2000年7月的戴维营谈判中，巴拉克成功地描述了巴勒斯坦人的真正意图：他们想把犹太人扔进大海里。自那时以来，以色列不得不进行一场永久的预防性战争，防止一种对某些人来说是愤世嫉俗的结果，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想象的威胁。在将近四分之一的世纪里，占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一直是政治争论的目标，乃至导致1995年以色列总理拉宾被暗杀。现在，这在温和的以色列人看来不再是问题的核心，就像撤出所占领的领土不再被认为是以色列与邻国之间和平的关键一样。问题变成了以色列的生存和解决无休止战争的办法。正如巴拉克所说：“我们是位于丛林中心的别墅”，言下之意是说，和平只不过是一个陷阱而已。

## 一 原始的反伊斯兰主义

因此,以色列国内的新共识相信,以色列没有可以信赖的伙伴,并且阿拉伯世界——事实上是穆斯林世界——全都准备要摧毁犹太人的国家,因此,犹太人必须把自己封闭在一堵隔离墙的后面(更明确地说,把巴勒斯坦人监禁起来),并且进行预防性的战争。这种观念完全符合北美的全球永久战争战略,并且确实得到了这两个国家新保守派的精心阐述,就像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那样。黎巴嫩的战争没有遭到大规模的反对,对被占领领土的再征服和恐怖运动也是如此。这就证实了以色列新保守派的欺骗性话语所造成的破坏。

然而,尽管以色列存在这种共识,并且拥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但黎巴嫩战争仍然是政治上的惨败和军事上的失败,以致成立了许多调查委员会,试图理解这个明显的悖论。但是,我们真的需要调查委员会来理解这种完全的失败吗?以色列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期望国际社会的一些国家会支持黎巴嫩真主党的中立化,因而把以色列融入永久反恐战争的战略之中,并且沾染上文明冲突论哲学和原始的反伊斯兰主义。因此,他们确信自己的军事优势,发动了没有准备、没有明确目标和没有行动计划的战争。

在以色列,殖民者的傲慢早就取代了政治思考和军事准备。这种傲慢遭遇到了黎巴嫩真主党和人民的反抗。与特拉维夫的思想当然相反,黎巴嫩人民支持反抗那些袭击黎巴嫩人民和基础设施的侵略。这简直是一目了然,因而所有的调查委员会都是多余。

肆无忌惮的新自由主义的破坏性效应对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新自由主义使以色列领导人——包括各军种的司令官——更关心的是中饱私囊,而不是追求公共利益。以色列的许多领导人参与腐败和挪用公款,尽管由于不够狡猾而没有被送上法庭。

腐败和商业影响了以色列。因而,这种国内腐烂的风险最终伤害的,与其说是对战争威胁和对恐怖主义袭击的回击,不如说是犹太人的国家。

## 二 国内危机与生活条件恶化

尽管权力关系中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但正是这种国内危机成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之间的公分母。因为巴勒斯坦社会也正经历着一场严重的内部危机。尽管这种严重的内部危机由于以色列的占领而进一步加剧,但它不可能完全归咎于此。在巴勒斯坦人的眼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存在着三重的失败:它不知道如何把自己的人民从以色列的占领下解放出来;它在一种迅速变得虚伪的谈判过程期间变得荒谬可笑;它无力用效率最低的管理来解决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的日常生活难题,它的一些领导人也因为腐败而声誉扫地。

由于这个原因,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失去了公众的信任,因而公众在抗议性的投票中转向了哈马斯。没有人——包括哈马斯自身在内——预见到这种转变的规模将会多么大。通过选举一个哈马斯政府,巴勒斯坦人承认了谈判进程的僵局,并且期望公共事务的廉洁和自己生活条件的相对改善。但是,他们并没有认真对待伊斯兰主义者的(民主)胜利所遭到的来自国际社会的反对。

在以色列和布什政府的压力下,国际社会——包括一些阿拉伯国家——决定惩罚巴勒斯坦人民的“不良投票”。国际社会联合抵制的,并不是以色列对国际法的全面践踏和对联合国各项决议的蔑视,而是巴勒斯坦人民。加沙地区遭到了经济封锁,造成了一场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巴勒斯坦人民尤其是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人陷入了一种戏剧性的境况,并且哈马斯政府也无力改善三百多万巴勒斯坦人的生

活条件。这促使法塔赫的强硬派试图强行改变巴勒斯坦选民的民主选择。2006年9月期间加沙地区的武装冲突表明,美国和以色列造成了巴勒斯坦的社会动荡,如果无法挑起一场内战,起码在法塔赫的内部派别里,已经找到了巴勒斯坦的代理人。

当人们求助于他们的部族血统的时候,任何政治洞察力的缺乏和生活条件的恶化都会使巴勒斯坦变得原子化,因而巴勒斯坦将会增加内部冲突的风险。巴勒斯坦还存在伊斯兰化得到加强的风险,与巴勒斯坦人原来的民族和世俗倾向背道而驰。伊朗总统内贾德及其极端激进话语的流行不容置疑地取得了成功。同时,当与以色列军队对抗的时候,黎巴嫩真主党越来越被视为效仿的榜样。

在过去的十年里,几届以色列政府成了巫师的徒弟,推动巴以冲突的去民族化(denationalization),并使之具有宗教的性质。因而,巴以冲突存在着地区化的巨大风险。对巴勒斯坦人来说,黎巴嫩战争成为把他们的问题和斗争地区化的重要步骤。以色列对此无疑会感到后悔,只是为时已晚。



## 5 巴勒斯坦人民组织和社会运动

纳萨尔·易卜拉欣

### — 巴勒斯坦人民组织<sup>①</sup>

巴勒斯坦人民组织和力量的存在与发展,总是同巴勒斯坦的实体和存在联系在一起。因此,它们曾经面临和正在面临的挑战与问题,同任何正常社会的任何人民组织所遇到的挑战和问题,在性质上都是不一样的。

在1948年的灾难(Nakbah)之后,数百万巴勒斯坦人成了难民,以色列国得以建立。1967年6月,以色列完全占领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人民运动和其他人民组织(学生、劳工、妇女和教育)发现自己面临着巨大的政治任务和职责。它们全都致力于维持和保护巴勒斯坦的国家身份,致力于结束占领和创建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斗争。

这一现实使所有巴勒斯坦组织成为建立和组织所有政党(法塔赫、人民阵线、民主阵线、共产党[Fateh, Popular Front, Democratic Front, Communist Party],等等)的起源和基础。

由于这一现实,这些人民组织的主要目标和职责以及它们优

---

<sup>①</sup> 本文小标题为译者所加。

先考虑的问题,都集中在政治斗争上。因此,社会维度在极大程度上被严重忽视和边缘化了。这些组织发现自己处在不同的巴勒斯坦政治势力和党派之间的严重政治斗争之中,因为这些政治势力的影响力,是由它们扩展、控制和影响该国当前人民组织和劳工运动的能力而确定的。

这一事实导致巴勒斯坦的人民运动和组织工作及任务出现了历史性的偏差。

这种偏差的第一个表现就是专门集中于政治维度,以至于几乎排斥了所有的社会维度和其他维度。第二个表现是由形形色色的右派和左派政党建立了各种不同的私人的联盟和组织,这必然导致混乱和动荡的局面。第三个表现是在决策中有影响力的团体和个人广泛渗透,导致这些人民组织的独立性及其社会角色被控制它们的领导层的强大政治力量吞噬了。

以色列的占领政策怂恿和加强巴勒斯坦社会基本结构中的扭曲和混乱,由此给予巴勒斯坦人民运动以一幅错误的图像,对这种偏差的扩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以色列的侵略和政治压迫政策,清晰地表现在巴勒斯坦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中,这些政策通过鼓励上述组织中的独裁而加剧了上述偏差,以色列竭力将它们的注意力从自己的目标即政治斗争上转移开,从而使它们的社会角色边缘化。

所有这一切都伴随着针对所有巴勒斯坦力量和政治组织的法西斯主义政策。由于支配着巴以冲突的巨大挑战的存在,以色列的这一政策带来了完全相反的后果。

这样,由于这些巴勒斯坦力量面临着以色列的侵略政策,它们在巴勒斯坦社会中的作用增强了,在各种协会和组织中的存在变得越来越具有影响力,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样就使得它们的政治作用同社会作用相比重要得多。

由于巴勒斯坦人民组织和协会是各种政治运动的发源地,这

些运动就能够把它们的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思想施加到各种人民组织和协会中去。这一事实通过其历史作用产生了这一现象：各种政治势力和力量在政治上利用人民组织。当这些势力感觉它们的作用和地位处于危险中的时候，或者政治领导受制于政治压力的时候，它们就试图利用人民组织来减轻它们所遭受的压力。最好的例证是 1987 年的第一次起义（Intifada）和 2000 年的第二次起义。

在第一次起义中，当巴解组织的领导层发现它被边缘化、它在国际上和阿拉伯世界上的作用被忽视了的时候，政治力量把人民运动推上街头，他们利用了随着第一次起义爆发而来的政治局势和巨大压迫。所以对第一次起义的最好评价就是，它具有人民性，大多数群众参与其中，因为它是由人民引导和监督的。

当领导层有机会成为政治谈判中的一员的时候，它开始号召起义平和下来，甚至把自己置于大规模群众起义的对立面，运用一切手段来终结起义，直至加入了和平进程。在 2000 年的第二次起义时期，巴勒斯坦当局及其领袖亚西尔·阿拉法特就发现自己处于同以色列和美国谈判的死胡同中。

当局看到自己处于政治包围的势态中，这种势态迫使当局转向群众，并在大街上进行鼓动。从 1994 年签订奥斯陆协定到第二次起义和创建巴勒斯坦当局这一时期，由于当局所采取的社会政策以及腐败盛行，在人民组织与协会一方与当局一方之间，发生了碰撞和社会冲突。

所以我们看到，人民运动和组织以及各种协会，被当局和政治力量在必要的时候作为后备牌来利用；而当当局和政治力量不需要它们的时候，它们就又被边缘化了。

这种对人民组织和协会的不健康操纵，导致在巴勒斯坦的人民运动和政治力量的经验中出现了真正的危机。这一危机清楚地表现在民族解放纲领同社会纲领（设想用来保卫人权和巴勒斯坦

群众)之间的矛盾上。我们总是注意到,政治解放纲领被优先考虑,社会斗争和社会权利则被牺牲。

在政治纲领和社会纲领之间建立健康的关系和一致性是必要的。两者之间不应该互相矛盾。当群众和他们的组织被错误地用来给这些矛盾火上浇油的时候,局面就更加危险。这些天里,这一矛盾在哈马斯和巴勒斯坦当局之间清楚地表现出来。每一方都不顾死活地把群众和人民组织推向街头,以显示自己的力量和权力。这最终将导致人民运动陷入更大的混乱和冲突之中,从而牺牲他们的社会和政治利益,牺牲它们把土地从以色列占领下解放出来的斗争,牺牲它们改善人民的社会经济形势的斗争。

## 二 作为平衡力量的左派

在这种局势下,巴勒斯坦的左派必须显示出自己有效的作用。这些左派力量必须作为一种平衡力量来改正错误,校正轨道。巴勒斯坦左派的舞台必须表现人民的成熟和主观精神。这支进步的民主的左派是巴勒斯坦社会唯一的合乎逻辑的选择。

巴勒斯坦的人民运动和组织是广泛的运动,拥有丰富而深刻的经验。它们能够成为有影响力的运动,但是左派仍然需要这样的一个政治运动,这个政治运动能够并且愿意革新它的纲领,以一个清晰的视野立即生气勃勃地进行行动,来影响各个人民运动,并切实对它们产生影响,积极改造它们的角色,以满足巴勒斯坦的社会需要和政治需要。这种角色必须被左派和进步的巴勒斯坦力量采纳。这些力量具有很长的历史,获得了群众的尊敬。然而,长久的历史和尊敬并不意味着对任何人的任何保证,除非能够转化为真正强有力的领导,这种领导能够针对当前巴勒斯坦的局势做出反应,特别是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和西岸正在遭受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困境(教育、劳动、医疗、服务、失业、发展,等等)的关键阶段。

总之,我们如果不在历史的、全面的和与当前的形势紧密联系的视野下,并在由以色列的占领强加的挑战和困境中来考虑问题,我们就不能谈论或者评价巴勒斯坦人民运动、协会和政治力量的状况。不过无论如何,这些运动和政治力量已经成为并且仍然是巴勒斯坦斗争和经验的支柱和基石。

换句话说,它们是巴勒斯坦问题的社会和政治支柱。在这个意义上,巴勒斯坦的社会运动是能够发展和前进的,但是它们必须对自己的经验重新进行解读,检查自己的矛盾和弱点。

所有这一切都有赖于巴勒斯坦左派领会自己作用的能力和发现自己视野、纲领与表现的能力,以便在面对占领的巴勒斯坦社会创造出一种平衡状态。

为了能成功地起到这一作用,左派必须在政治解放的职责和民主的、社会的职责之间关系问题上,解决自己的矛盾和长期扭曲。

## 6 阿拉伯世界的社会运动

阿扎·卡赫里尔

新自由主义常常会公开、明显地影响大部分群体的利益,尤其是那些在全球秩序中属于最贫穷并处于边缘地带的群体的利益,这是大家普遍认可的事实。于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即:这种利益的侵害,对于这些群体保卫他们的利益所产生的影响,究竟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今天,在阿拉伯世界,大部分人所承受的来自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压力与日俱增,加上社会背景,使他们没有空间能够更有效地保护自己。所以,细心研究阿拉伯社会的社会运动,初步的目的就是随着阿拉伯世界的社会结构发展,对社会运动所具备的那些特征进行阐释。为此,需要将重点放在对这些运动的兴起、表现方式、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动力、出现变化的前景、潜力,以及所受外在的、全球环境所影响的程度的分析上。

本文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研究独立后国家中社会结构发展所依赖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第二部分主要研究这一地区的主要社会运动,第三部分则讨论社会运动及其抵抗新自由主义所面临的挑战。

### 一 独立后的国家的社会运动处于危机之中

阿拉伯解放运动达到独立的目标之后建立起的新型国家,被

称为独立国家。其首要任务就是强化独立自主,巩固国家的身份认同和统一,同时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摆脱落后,并顺应在独立斗争中被动员起来的社会群体的需求和渴望。

因此,这些国家都喜欢采用严格的集权制,并视之为维持独立的手段,对抗外来的挑战,包容国家内部社会与阶级的分裂,减少斗争源头。统治精英们(由技术专家官员、高级公务员以及军队和民族主义者组成)发现,摆脱一直以来处于落后的经济体制以及建立工业化的、民族经济体制的关键是,需要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定社会现代化计划,并动员公众在极短的时间内彻底转变。建设国家的优先性高于发展民主,统一高于多元化。这最终退步为专制主义国家,渴求独裁权力<sup>①</sup>。大部分阿拉伯国家宪法保护的,是建立在不平等权力之上的独裁统治,给予行政者以特权,并使权力集中于总统一人之手。社会与经济机构的力量薄弱,没有什么影响力,特别是与军队所发挥的作用相比,更是如此<sup>②</sup>。这仅仅是加强了经济与政治领域内家长式的统治,并使得个人权力得以巩固——尽管平民百姓受益于这一体制的程度各不相同。

独立国家采用进口代替和中央计划等政策措施推行工业化和扩充基础设施及教育,为此这些国家还实施农业改革,获取所需要的资本投资基础。虽然工业化和发展在最初的几年里是成功的,但是危机也开始侵蚀真正的成果。融资就是问题。国家要么试图通过通货膨胀来消灭赤字,造成物价上涨;要么通过降低服务品质来削减公共支出,而这样则会使生活标准降低。否则,就只能是借款,而借款的结果就是债台高筑。军事失败的打击使得国家所具有的合法性被逐步削弱,而民众所感受到的,既不是发展,也不是独立。

① Ali Aoumleel, in Saad EI - Din Ibrahim(1998), pp175、176.

② Amany Kandeel(1995), pp184、185、186.

于是,反对的声音以社会运动的方式出现了,这些运动有的是学生运动,有的是工人运动,有的则是民主运动。正如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所说,中产阶级用其所依赖的独立性使其统治得以合法化是不可能的<sup>①</sup>。面对这些危机,许多国家试图与西方结盟,并被迫实施受国际赞助机构支配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反过来,新结盟和新政策也必须采用以政治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新的合法形式。这种情况是在家长制传统及权力中心化的影响下出现的,并且这些国家继续不断地从伊斯兰教、帝制及族长等传统中推衍其合法性(Samir Amin,2003)。

随着实行市场经济,出售国有企业的重要部门成为私有化的措施,并且最初明显地以分包的方式来扩充私营部门,接着是银行业和服务业,程度较少的是农业和轻工业。私营企业同时获得外国公司的特许经营权,特别是跨国公司。这一快速的扩张为其进一步的发展埋下了隐患,最为重要的是地产投机、经纪和佣金,导致上层社会中非正规部分的增长。此外,高级公务员、军官及安全部门人员在退休前及退休之后公开参与私营部门活动。血缘关系加强了经济精英与政治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于是政治权力便开始在经济活动中扮演关键的角色。这类经济被称为投机资本主义或非生产性资本主义,其以分配关系为优先考虑因素,导致了分配性经济而非生产性经济的产生<sup>②</sup>。

商业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已经破坏了自由主义在阿拉伯社会的真实性,除此之外,其中的经济精英并非是独立的,因为他们依赖于对全球市场直接或间接的服务。对于他们而言,国家市场是积累资本的手段,而这些资本是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一部分所必需的。中产阶级隔绝于周围的环境,而在这种环境里,大部分人生活贫

① Samir Amin(1991),p136.

② Bourhan Ghaliouen(1994),p127.Saad El-Din Ibrahim(1998),pp275、276.



穷,分配格局单一,非正规经济发展蓬勃。中产阶级似乎永远不会欢迎民主自由伴随着他们赖以生存的经济自由而来。同时,他们也不会致力于寻找国内的社会基础去支持自由企业,而是依赖国际机构所施加的压力。依附资本主义持续存在的两个主要原因是与外国势力的联合以及专制政权的建立,尽管社会上的反对持续不断<sup>①</sup>。

于是,阿拉伯国家的政权制度便处于西方盟国和债务机构的压力之下,并不得不开始采用某种形式的民主,来减少国家在经济和文化精英的利益当中所起的社会和经济作用,同时促进自由企业的价值和全球化的必然性。这当然不会增加广大人民和组织团体对政治和经济决策施加影响的机会。在这一背景下,特别是表面上民主的国家,政治多元化便是在上位者给予的礼物,但如果错误使用,便可能被收回。因此国家独裁主义的性质有微小的转变,从绝对专制形式转向监督者<sup>②</sup>。实际上,这种政治多元化倒退了一大步,回到马木路克(Mameluke)独裁统治体制,原因是独立进行组织的人民力量被严重削弱(Samir Amin, 2003)。例如,在埃及,20世纪70年代后期,采用限制性立法(即当地人所共知的“声名狼藉的法律”),允许对政治犯施用无期徒刑。另外,危机法成为政治范畴中不变的特征。

专制气候是破坏多元化政治性及知性思潮的重要因素。此外,自由主义的危机也因为缺少社会基础而加剧,这是由经济精英性质所导致的。随着苏联的解体,左派的危机加剧了。尽管不同种类的伊斯兰政治派系之间的冲突迭起,可是这些趋势有一部分承载着政治分量,具有相当大的谈判权力。各政党在政治游戏中找到了角色,当然,他们并没有参与游戏规则的设计。随着时间的

① Bourhan Ghaliouen(1994), p128. Ali Omleel(1999); Samir Amin(2003).

② Amany Kandeel(1995), p51.

过去,他们已经经验丰富,懂得在对抗的边缘上,与在没有实质性决策权力的情况下参与议会。政权和政党活动之间有一点明显相似,即尽管自由诉求和民主实践被铭刻在政党的规章之中,但是现实却迥然不同。大多数政党领导人都曾亲自严守决策过程,并严格限制底层及中间阶层参与政治。<sup>①</sup>

因此,各类精英都认识到,变革完全是通过权力集中而来的,并且因承受外部的压力才得以推行。于是精英们所采用的变革策略,就是通过激起全球的公众舆论和外国权力中心来攻击家长体制。这是 NGOs 领导者们所采用的抵抗途径。在赞助机构和国际组织的支持下,他们的数量在 20 世纪 90 年代大幅度增加,而这些支持,是为了巩固朝新自由主义的转向。

但是,社会运动能够以满足群众利益的途径朝着变革的方向发展吗?这也是以下章节所要讨论的内容。

## 二 阿拉伯社会的主要社会运动

新自由主义在阿拉伯社会引发诸多问题,关乎能否修正阿拉伯世界长期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在暴力事件频发的情况下,这些问题显得更加突出。观察家认为,这一地区目前处于变革的边缘,尽管在通常情况下很难预测和衡量。政治和社会力量将会满足于继续扮演指定给他们的角色吗?广大民众在当前这种环境下能够坚持更长的时间吗?(Mohsen Marzouk, 2003)在此,让我们看看较为重要的社会运动及其背景。

### (一)工人运动

许多国家在独立早期重视工业化,使新的工人阶级队伍得以

---

<sup>①</sup> Amany Kandeel(1995),p134.

壮大,无论是在品质还是数量上都与独立前的工人阶级有所不同。这一变化也反映在工人运动上。尽管殖民化曾经赋予工人运动以民族主义观念,但民族主义国家作为最大的雇主,影响了政治与经济之间的争论以及国家和工会之间的关系。

阿拉伯国家采取政策让工人获益,但同时限制工人的独立行动,包括立法限制或禁止独立工人组织的权利,禁止任何形式的抵抗,并在有必要的时候使用安全体制和暴力。最为明显的例子是在叙利亚和埃及,尽管每一个国家的政治都具有不同的效用。埃及的工人领导阶层试图逃脱国家霸权,最终工人运动出现在官方工会之外。而叙利亚则有所不同,工人是通过官方渠道来施加压力的。

埃及独立以后,最大的工人运动发生在1968年,活动在官方工会之外进行,与政府对抗。公共部门的工人担任领导角色,他们有许多成长于20世纪40年代的共产主义运动时期。在工会代表被解职之时,工人对官方工会的否定态度变得非常明显,并且在1975年Shoubra EL-Kheima的罢工中,拒绝与他们来往。

1963年,随着叙利亚社会党(the Baath Party)兴起,工会成为政治集团,而工人阶级实际上成了政府的伙伴。经过低层工人的压力以及积极参与国际工团联合会,再加上左翼的活力,如马索克(Shebel Marzouk)博士,工团联合会(the Union of Labour Syndicates)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可是随着政府实行政治及经济改革,工人运动究竟会怎样持续下去,还存在着疑问。<sup>①</sup>

突尼斯的经历,展示了工人运动和国家之间的另一种关系。国家对“总工会(General Labor Union)”的收编使得工人运动暴露在其他政治机构面前。工人运动成为政治制度的参与者,不得不接受制度本身固有的矛盾。20世纪70年代,“突尼斯工人联合

<sup>①</sup> Saber Barakat(1998);Kamal Abbas(1998);Moustafa Magdy EI-Gamal(2003);  
Sawsan Zukzuk(2003).

会”为重要的反对力量充当保护伞,并成为最有力量的公众机构。这使得工会运动大力推行符合公众利益的社会计划,并支持国家制度民主化。但是,哈比比·阿绍尔(Habib Ashour)(当时的工会领导人)卷入了布尔吉巴(Bourguiba)连任的斗争之中,使他关注个人利益。于是,工会的保守力量出于利己的考虑而引起冲突,最终破坏了工会,并于1987年沦落为新政府的“附庸”(Mohsen Marzouk,2003)。

另外的鲜明例子出现在苏丹,国内民主制度与军事制度之间的交替轮换,造成了工团和工会组织的快速转变。有些时候,他们会通过公众反抗和起义来推动改革,如1964年的革命和1985年的起义,而有些时候,他们进行秘密活动,如1970年之后的Numeiri执政期间。<sup>①</sup>

在大部分阿拉伯国家里,左翼政治力量和工人运动之间的关系在使工人运动政治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使工人活跃分子的独立问题更为严峻,并且滋生出派系差异,破坏工人运动应有的团结。这一点在埃及尤为明显,这种危机又碰上刚开始推行的结构调整政策,后者让工人阶级处于守势,力量被削弱。<sup>②</sup>

这些行动暴露了阿拉伯社会机构的父权制度,影响了民族主义国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有些成果是以镇压独立行动为代价而获取的,同时容许左派势力控制运动。父权进一步通过这种形式而突现出来,即一个人便能够决定整个社会运动的前途。例如,在突尼斯,布尔吉巴的个人主义政策暴露出对执政党以及工会的控制,他在工人运动领导者连任的问题上,鼓动恶性个人争斗,而这也许显示了失去的历史机遇。

由于阿拉伯政权开始实施结构调整政策,工人被剥夺了国家

① Othman Serag El-Din & Akram Abd al-Qayum Abbas(2002).

② Saber Barakat(1998);Nasser Gaby(2003).

赋予工会的权力,这些工会曾经采用社会主义政策和保护工人权利的措施。因此,工人运动遇到四方面的阻力:

第一,雇主趋向像合同商那样在非正规部门经营,几乎无视法律和传统的雇主—雇工关系。他们也通过血缘关系和多重利益网与执政党关系密切(Ahmed Thabet, 2002),并因此侵蚀工人的权利,削弱工人的力量。

第二,政府趋向反对独立自主的工人运动,因为工人的利益与现行法定政策不一致,而工人运动有能力成为反对这些政策的社会力量。

第三,工人运动一直受到同盟的影响,受左翼力量影响更为显著。左翼势力当前是软弱的,其政治力量受到侵蚀及对社会的影响有限,因此削弱了工人运动的影响力。

最后,阿拉伯国家通过经济活动进行结构调整和转换,改变了工人队伍的成分。

公共部门的工人队伍大幅缩减,但在私人部门却增加了。同时,工人队伍加入新的成分,例如埃及工业城市新工人。结果,具有民族主义热情的工人数量减少,但随着消费价值观念的上升,取而代之的是与工人运动及其理想没有任何联系的工人。再加上非正式部门里不受合法保护的劳动者,使劳动者的统一与团结能力受到损害。(Kamal Abbas, 1998)

这些障碍都导致了工人运动的瘫痪,并将运动化为一系列不连续的、零散的抗议活动,主要性质都是随机、短暂的。这使劳动事务的问题增加,例如运动结构的民主化、通过正式工会工作的限制,以及增加工会数量的限制。于是,许多埃及工人的活跃分子希望工团中心的增加能够使工人运动得到解放,实际上他们也一直在努力,以图在官方工会中建立起独立自主的组织,但政府一直控制“工团联合会”,并设下障碍(Saber Barakat, 1998)。在阿尔及利亚,工团多元化并没有帮助工人运动走出防御的处境,原因是这些

工团是在工人运动处于极为脆弱的时候创建的。我们必须考虑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运动的关系,为工人运动解决团结和独立领导的复杂问题。

近年来,有些团体将工人活跃分子、以前的工人领导和 NGOs 组织起来。他们的重点是捍卫因新自由主义政策而受侵害的工人利益。在阿拉伯国家,这类团体大都相互合作、相互协调(例如,埃及与阿尔及利亚之间互相合作)。虽然他们的活动近年来比较活跃,但仍旧依赖于具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和人权活跃分子的参与,并且受制于狭隘的民主的局限,尤其受到工人运动的制约。

## (二)农民运动

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在独立之后开始实施农业改革,民族主义的中产阶级企业努力根除大地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影响,并为国家的工业化获取盈余。埃及在 7 月革命后不久,于 1952 年 9 月通过一系列农业改革法案,限制农业用地的所有权,并为小农户重新分配一些土地。这些法律仅仅影响了 7% 的农业用地,只有 5% 从事农业的家庭获得了分配土地。

这一时期出现的农民运动反抗大地主对剩余土地的不平等占有,抵制农村富人控制土地的企图。在农民与大地主之间发生了多起对抗行为。农民运动中有人为此付出了生命,包括萨拉·胡森(Salah Hussein)、迪斯奇·阿迈德·阿里(Dessouki Ahmed Ali)和阿布杜·哈米德·加多尔(Abdel Hamid Ghandour)。随后,官僚行政机构与大地主及“社会主义联盟”(the Socialist Union)等机构进行勾结,侵吞了由农民创造的财富,而合作社(co-operatives)也转化成为偏袒他们利益的机构。从 1960 年到 1965 年,政府侵吞了近乎 11% 的农业剩余价值。由于在 20 世纪 60 年代,发展过程步履蹒跚,加上“门户开放政策”,在 1976 年,农村银行开始替代联合劳工机构。由于高额利息,借贷成为农民的负担,导致生活品质下

降。这使大量农民涌向城市和海湾地区储油丰富的国家。

新自由政策与1992年的立法是有关系的,该法免除农业用地的租金,并剥夺租用土地种植的农民的权利。于是,地主拥有设定租价和土地使用合同的自由。最后,许多土地租用人失去土地,并加入到农业或手工业劳动队伍当中。与农业有关的经济援助的废止、与农业贷款有关的利率放宽以及小地主免税制的废止等,都与自由化政策有关。这使得垄断力量控制农业,又导致农村失业人数增加,并使得农业劳动的条件变差。因此,越来越穷困的农民和国家及大地主之间的关系便变得矛盾重重。

为了抵抗这种发展,民族主义、进步的 Tagamuu 党于1983年建立“农民协会”。研究中心、非政府组织(NGOs)以及政治党派也开始关注农民问题。他们的工作简括如下:复兴中央合作会,在服务农民利益方面发挥实质作用;为农民建立合作社银行;公开反对世界银行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协议;抵制与以色列建立正常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农民反抗运动开始向官方和媒体投诉。此后运动继续发展,数以千计受冤的土地承租人签名,召开至少二百次农民大会——大部分是由反对党组织的。运动随后演变公众游行以及在合作社总部前静坐。自1996年后半年开始,要求废除农业租赁法的运动曾经扩展到农村各个领域;该法自1997年首次施用,一直严重损害农民的利益,正是那一年发生了数起暴力事件。

但有些因素减缓了紧张局面,并促进农民接受新法律。有些农民不明白这一法律对他们的影响,同时,土地所有者与承租者之间也达成共识。此外,一直以来都有针对农民运动的新闻封锁。尽管分析家对于运动的规模、效用及可持续性等方面有不同看法,但一致的看法是,运动是越来越贫穷的农民,尤其是农业劳动者的期望。(Hanan Ramadan,2003)

1967年5月,面向苏丹农民的首个农民总会是在军事统治下

建立的,虽然在此之前,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穆罕默德·阿明(Muhammad Amin)在独立前领导着农民协会。设立第一个总会的目的,是使其能够代表农民参与苏丹唯一的政治组织——“社会主义联盟”,不过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随着现政府于1992年掌权,总会开始向所有的农民开放,直接成员有五百六十人,来自苏丹各省份,根据各省的农业人口密度来分布代表。

苏丹政府压低农作物价格,损害农民的利益,因此,许多农民放弃农业生产,迁移到首都喀土穆(Khartoum)。农业企业在1992年同样私有化。总共二十个农业机构被廉价出售,在二千二百二十九名工人当中有四百九十二名被解雇。农民协会却没有能力采取行动。

### 三 反全球化运动

在各种社会运动的影响下,反全球化行动在阿拉伯地区开始。非政府研究中心在促进反全球化当中起着重要作用,并拥有多个中心,分别以劳工为目标(工团服务中心, the Centre for Syndicate Services)、以农民为目标(埃及的土地中心, the Land Centre)、学生运动(突尼斯学生大联盟),以及文化的、国家民族主义的或者倡议的运动(阿拉伯研究中心、希斯汉姆·穆巴拉克法律中心, the Hisham Mubarak Law Centre)、埃及反正常化委员会、联合抵制委员会、叙利亚支持伊拉克与巴勒斯坦的文化论坛与委员会,妇女组织同样在宣传反全球化行动方面发挥了作用。

提供经济和社会另类方案来替代新自由主义的团体包括国家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以及民主拥护者。如成立于1979年的埃及人联盟,牵涉一百多名不同政党和工团的个人,这些人批评“门户开放政策”。随着国际上反全球化话语的增强,这些活动在本质上具备了社会经济的性质,吸引了新一代积极投身行动,并与活跃的



老一代并肩而行。

有些机构侧重于批评全球化,而有些更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尽管很多委员会建立起来,抵制以色列和美国的商品,使用反全球化的措词,但第一个明确的反全球化组织——“埃及抵抗全球化团体”,直到2002年才成立。该团体旨在对抗经济和政治领域一切形式的新自由主义,同时抗议由此而产生的贫穷、失业以及国家从公共服务和社会部门的退出。该组织在埃及的各个地区均有讨论会和工作组,出版简易小册子,协调运动。

其他研究中心,例如建立于1999年的“埃及社会主义学习与研究中心”,许多成员都是青年学生。叙利亚则有“国家抵制帝国主义商品与利益委员会”,是几名知识分子在2000年发表声明之后建立的。<sup>①</sup>

近年来,有人想协调完全不同的反全球化工作。许多组织参加了2001年10月在开罗召开的泛阿拉伯大会。该会议旨在响应同时有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大会。会议代表来自叙利亚、巴勒斯坦、约旦、塞内加尔、尼日利亚以及亚非国家的组织。随着阿拉伯组织代表对“非洲社会论坛”、“亚洲社会论坛”以及“世界社会论坛”的参与,越来越多的注意力集中在阿拉伯世界成立国家性或地区性的社会论坛。但是,有一点必须注意,这些活动只有少数知识分子和民间社会积极分子参加。

## 四 抵制全球化社会运动所面临的挑战

### (一) 新旧之间的社会运动

从前面的分析可得出结论,所谓的“旧”社会运动或阶级运动如今由工人和农民运动所代表。就拿阿拉伯世界来说,这些运动

<sup>①</sup> Mhamed Ismail(2003);SAWSAN Zukzuk(2003).

只是零星的抗议活动,或者是采取分散的、反抗的、自发的行动,妨碍了它们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反抗活动。另一方面,倡议团体、宗教组织、妇女团体的活动,因其不以任何阶级身份为基础(除了从事工人和农民问题的倡议团体,以及左派反全球化委员会),可以称为新社会运动。这些新的运动有不同的组织结构,大部分都是通过与其他各种决策机构打交道来达致诉求,而不是尽力改变社会和文化方面的霸权主义,或者致力改变社会模式。仅有少数几个组织以这种方式开展工作,其中包括部分妇女组织、宗教组织和人权机构。<sup>①</sup>

## (二)父权制及其与国家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

在阿拉伯世界,凌驾于社会行为之上的国家霸权主义各式各样。直接的例如有工团,国家不可能让其采取多元政治,间接的例如在倡议组织当中,霸权仅在冲突中可以见到。国家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通常是“零和游戏”(zero-sum game),即一方的份额增加,另一方的份额则减少。当国家处于弱势之时,民间社会团体则会变得强大和兴盛,比如在埃及,从穆罕默德·阿里(Mohamed Ali)的出现到1919年革命,或者是1967年战败以后,就一直是这样<sup>②</sup>。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各式各样的,但这种冲突关系却延续下来。当民间社会试图胜过国家或者与国家谈判时,并不是标志着两者之间斗争的消失,只是反映了权力的平衡,但在这种平衡之中,国家尽管弱了,却依旧具有霸权,民间社会还是较弱。

社会行为的中心不是积累权力。面对父权制霸权主义和这种斗争关系,新的社会运动首先关注的是生存。要做到这一点,他们要么与政治权力机构打交道以推动变革,要么与国外具有影响力

<sup>①</sup> Alan Scott(1990), p18.

<sup>②</sup> Mohamed El-Sayyed Saeed, p9.

的权力中心结盟,并与国内权力机构发生冲突。这些组织机构很少通过争取民心的合法性获取更多的社会权力,而是发动支持者保护他们自己的特有身份<sup>①</sup>。今天,社会运动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打破父权体制框架以及增强公民民主气氛以达到“自给自足”——这种民主气氛反映在与政府、外国合作伙伴及其他政治力量之间的相互来往及作用上。这一点对于工人运动来说是最为基本的一步,目的在于寻求多元化模式,巩固与改善其抗议的分散及缺乏团结性质。自给自足需要一定的自信,并且对广大民众在促成变革和保护切身利益方面的能力要有信心。

### (三)对身份认同的定义

当社会行动试图对他们的身份下定义时,便出现了许多重要的问题,例如,他们对于相互分离的感受以及在整体中的位置。这需要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在此,可以辨别出另一种挑战,各种不同的霸权关系使辨别运动和政府,以及分辨运动与政治活动家都变得很困难。

另一个问题是,这些背景在多大程度上能确保运动的群体投入参与以保护自身的利益。即是说,这些运动应该取决于与参加者的身份认同,称为农民运动还是工人运动,抑或是为工人或农民利益而呐喊的团体的运动。而这些团体本身不受这些利益的影响。这正是挑战之所在:将运动背景里的身份认同与隶属于它的人民联系起来,并支持广大民众组织起来。专业主义和志愿主义两者之间的争论也有关联:虽然专业的活跃分子很宝贵,但他们通常妨碍组织变成积极的抵抗运动,特别是在专业人员慢慢变成雇员之时。

身份问题同样引出国家身份与全球身份的问题。必须注意,

<sup>①</sup> André Gunder Frank 与 Marta Fuentes(1991), p148.

将本土行动背景看作全球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并不需要否定他们可以代表国家身份。相反,国家身份使得本土组织能够与全球运动之间发生平等的相互作用,反过来也有助于遏止那种将外在的互动模式转接到本地的趋势。

#### (四) 社会行为的政治内容

这一问题关系到改革社会运动战略的争论。关于全球社会运动的多项研究指出,这些运动在行动之中建立他们的观点和位置,从外国引进的战略和战术并没有价值<sup>①</sup>。这些社会运动提出的另类方案常常与寻求保护他们身份有密切的联系。在阿拉伯地区,意识形态的真空源于种种因素:首先是外来势力的侵蚀,然后是群众路线、民族主义事业的崩溃,接着是社会主义的衰退,这种状况妨碍了现有政治及社会冲突产生可能的另类选择(Samir Amin, 1991)。结果,各政党无法提出另类替代选择来丰富社会运动斗争,或者是影响他们的思考。相反,政治活跃分子要求社会行动者尽其本分。这一情况对政治家和社会行动者均提出了挑战。

#### (五) 组织背景与社会行动框框的精英特性

阿拉伯世界的社会遗产包括自发运动,其中以农民运动最为突出,其次是工人运动,反动、临时与热烈是这些运动的共有特征。与之对比,大部分社会运动都是建立在严格的层级上,个人举足轻重,取代了运动的内部规范。个人的权威无处不在,并且领导者与基层之间的关系是父权制度模式。在地位平等的阶层中竞争是激烈的,并且最终都依赖于垂直关系。在这种环境下,很少会接受他者以及集体行动,这是中断公共社会行动实验的关键因素。实际上,这种对权力的服从,在改变基层的权力关系中起着重要的阻碍

<sup>①</sup> André Gunder Frank 与 Marta Fuentes(1991), p149.

作用。有人相信,活跃分子以在政治组织(现在及过去的)里的经验来参与社会运动,对将专制的传统转变为社会行动框架具有重要的作用。这就提出了挑战,即如何打破这种传统,以及其他肆虐于社会政治体制中的相关特征。

但是,传统的长期存在并不意味着社会已经接受了某种不可变更的文化特性。这只是表明,阿拉伯社会还没有打破旧的框架与关系,还没有在他们的处境里创造出新事物。在阿拉伯世界,这两者同时存在,时盛时衰,阻碍了社会真正前进。

随着特定人群(包括知识分子精英)越来越渴望脱离这一体制,培养民主关系的时机已经成熟,为集体行动、对话以及接受他者等铺平了道路。这将打破旧的禁锢性传统,使得愿意面对挑战的社会活动者拥有舞台。从这一点来讲,无论我们是否称此类集体的社会行动是社会运动或者其他名称,都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不管是在全球或地方的层次,打开界域,让处于边缘的人能够团结一致。

## 参 考 书 目

卡玛律·阿巴斯(Kamal Abbas)提交给“另一种意识形态研究发展计划”的未发表论文《今日埃及工人运动:主要问题》(1998)。

安沃尔·阿布·阿尔-马拉卡(Abd al-Malak, Anwar)《埃及的复兴:埃及民族复兴(1805—1892)中的思想和意识》,开罗:埃及书籍总组织 1983。

尤斯里·阿布·阿尔-迈基德(Youssri Abd al-Megid)《本地及全球运动之间的埃及人权运动》,未发表论文,阿拉伯研究中心 2003。

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论全球秩序的外围:民族解放的结束》,选自《伟大的混沌世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编辑,伊

萨姆·卡发吉和阿迪比·尼玛翻译,贝鲁特:法拉比出版社 1991。

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阿拉伯世界的基层群众组织》,选自《反全球化:基层群众组织的全球性运动》,萨米尔·阿明和弗朗西斯域·霍塔特编辑,开罗:“阿拉伯研究中心”和“另类意识形态世界论坛”,2003。

萨伯·巴拉卡特(Saber Barakat)《1946年后学生及工人运动》,选自《埃及民族主义运动当中的工人与学生运动》,伊萨姆·阿尔-迪苏奇,开罗:Marusa 出版社 1998。

塔里克·艾尔-比谢里(Tarek El-Beshery)《1945—1952年的埃及政治运动》,开罗:Shurouq 出版社 1983。

穆罕默德·阿比德·艾尔-加比里(Mohammed Abed El-Gabry)《现代阿拉伯思想当中的真实性与同时性:阶级斗争或文化困惑?》,选自《阿拉伯论坛》,贝鲁特:阿拉伯联合学生中心 1984。

纳塞尔·加比(Nasser Gaby)《民族主义国家危机和社会分裂之间阿尔及利亚的社会运动》,未发表论文,阿拉伯研究中心 2003。

穆斯塔法·马基德·艾尔加玛律(Moustafa Magdy El-Gamal)《埃及的工人运动》,未发表研究性论文,阿拉伯研究中心 2003。

塞萨尔·弗纳迪兹(Cesar Fernandez)《私与公:拉丁美洲的三个部分》,选自《公民参与的全球联盟:支持全球民间社会》,开罗:全球联合出版社 1995。

鲍汉·加里奥恩(Bourhan Ghaliouen)《阿拉伯民主:危机与思想视野增长的根源》,选自《论民主的选择》,鲍汉·加里奥恩等编辑,贝鲁特:阿拉伯学生联合中心 1994。

安德鲁·冈德·弗兰克和 Marta Fuentes)《当代全球史当中的社会运动》,选自《伟大的混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恩等编辑,伊萨姆·卡发吉和阿迪比·尼玛译,贝鲁特:法拉比出版社 1991。

阿布杜拉·汉纳(Abdullah Hannah,)《当代阿拉伯国家中的民间社会》,贝鲁特:阿拉伯联合学生中心2002。

萨德艾尔丁·伊布拉辛姆(Saad El-Din Ibrahim)编《阿拉伯世界的社会与国家》,大马士革:阿尔-马达出版社1998。

穆罕默德·伊斯梅尔(Muhammad Ismail)《民族主义机构及社会抗议机构当中的埃及知识分子的运动》,未发表研究报告,阿拉伯研究中心2003。

阿曼尼·坎德尔(Amany Kandeel)《民主变革在埃及:1981—1993》,开罗:伊比恩·卡尔杜恩出版社1995。

阿扎·卡拉姆(Azza Karam)《舒拉特·阿尔阿拉姆的生命:妇女反对妇女》,选自《妇女、伊斯兰主义运动及国家》,开罗:基塔伯·苏特尔2001。

莫森·马苏克(Mohmoud Marzouk)《社会运动在突尼斯:搜索缺席者》,未发表的研究报告,阿拉伯研究中心2003。

穆罕默德·米姆达尼(Mahmoud Memdani)《非洲社会及其民主运动研究简介》,穆罕默德·米姆达尼编辑,希尔米·色拉维等译,开罗:文化最高委员会,即将完成。

阿布杜拉·莫希·艾尔丁(Abdullah Moheny El-Din)《社会运动在黎巴嫩》,未发表研究报告,阿拉伯研究中心2003。

阿里·奥米里尔(Ali Omleel)《合作的概念》,未发表研究报告,1999。

汉纳·拉马丹(Hanan Ramadan)《埃及的农民运动》,未发表的研究报告,阿拉伯研究中心2003。

阿兰·斯科特(Alan Scott)《意识与新社会运动》,伦敦:Unwin Hyman 1990。

奥斯曼·斯拉格·艾尔丁和阿克拉姆·阿布·阿尔卡乌姆·阿巴斯(Othman Serag El-Dinand Akram, Abd al-Qayum Abbas)《社会运动在苏丹:一份文献性、分析性的研究》,未发表研究报告,阿

拉伯研究中心 2002。

希斯哈姆·沙阿拉维(Hesham Shaarawy)《民间社会在北非》，未发表研究论文，阿拉伯研究中心 1999。

希斯哈姆·色拉比(Hesham Sharaby)《家长制与阿拉伯社会的倒退》，贝鲁特：阿拉伯联合学生中心 1993。

阿布·艾尔阿齐兹·穆罕默德·艾尔谢拉维(Abd El - Aziz Mohammed El - Shenawy)《奥马·马克拉姆：平民反抗的英雄》，选自《大阿拉系列丛书》第 68 号开罗：阿拉伯作家出版社 1967

伊马达·塞亚姆(Emad Seyyam)《社会运动在埃及：在宗教根源与民主侵害之间》，未发表的研究报告，阿拉伯研究中心 2003。

阿米德·塔比特(Ahmed Thabet)《埃及的商业精英》，一份提交给“阿拉伯世界精英与社会研究会”、“阿拉伯研究中心”和“应用经济学发展中心”的论文，阿尔及利亚 2002。

阿米德·扎亚德(Ahmed Zayed)《政治及社会精英》，一份提交给“阿拉伯世界精英与社会研究会”、“阿拉伯研究中心”和“应用经济学发展中心”的论文，阿尔及利亚 2002。

萨沙·祖克祖克(Sawsan Zukzuk)《社会运动在叙利亚》，未发表的论文，阿拉伯研究中心 2003。



## 7 阿拉伯世界的反全球化团体

阿扎·卡赫里尔

### 一 什么是反全球化运动

我们这里指的是那些在阿拉伯世界主要致力于反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团体。我们认为,反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任何负面影响的行为应该都符合这个定义,而不论这类团体或者运动提出的替代性方案具有什么性质。

这样,我们面对的是很多这样的团体,它们的活动差异极大,它们的成员数量总是在不断变化。甚至这类团体的结构由于一些行动主义分子的加入、另一些行动主义分子的退出,而在不断变化。有些团体直接高举反全球化的大旗,例如反全球化埃及小组(The Anti Globalization Egyptian Group)以及叙利亚、也门、巴勒斯坦、黎巴嫩的反全球化行动主义分子和阿塔克(ATTAC)<sup>①</sup>在突尼斯和摩洛哥的组织。另一些团体反对全球化的军事方面,例如叙利亚争取与伊拉克和巴勒斯坦人民团结一致的一些团体,埃及与巴勒斯坦人民团结一致委员会(Egyptian Committee for Solidarity with the Palestinian People)。还有一些团体为保卫专门

---

<sup>①</sup> ATTAC,争取征收托宾税援助公民协会。

的社会和经济权益而行动,例如摩洛哥的失业大学生全国委员会(the 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Unemployed Graduates in Morocco)、吉萨的人民委员会(Popular Committee in Giza,反对废物收集私有化),以及一些研究中心和人权组织(保卫行动主义分子,反对侵犯人权)。也有一些团体致力于维护劳工权利,例如劳工司法援助组织(Legal Assistance for Labor),埃及的劳动、工会权利和自由协调委员会(the Coordination Committee for Labor and Union Rights and Freedoms)。这一类的组织还包括产生于某些抗议运动——例如埃及石棉工人罢工、摩洛哥围绕居住单元分配发生的斗争(米赫拉兹[Mihraz]地区),以及反对埃及某些村庄的土地租赁法的行动——行动主义分子团体。我们在这里还应当提到在开罗、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的大学里发生的学生抗议运动。

也存在着一些由独立于政党的政治行动主义分子推行的集体运动,例如在埃及有3月20日运动(the 20th March Movement)、人民争取变革运动(the Popular Campaign for Change)、埃及争取变革运动(Egyptian Movement for Change)。也存在着一些产生于受政府或者伊斯兰教组织支配的职业人士联合会的独立团体,例如民主派律师组织(Democratic Lawyers)、争取自由委员会(the Committee for Freedoms)、民主派会计师组织(the Democratic Accountants)、民主派工程师组织(the Democratic Engineers)、支持巴勒斯坦就地起义委员会(the Committees for Support of the Palestinian Intifada)以及在记者和药剂师联合会里的一些组织。

## 二 反全球化团体的浮沉

在过去五年里,阿拉伯地区发生了一系列政治事件,导致了此类团体的兴盛。它们一开始不为人所注意,后来随着条件的恶化,它们获得了发展的契机,并随着事态的严重化也表现出盛衰浮沉。

被占领的西岸和加沙局势的恶化,以及激起2000年9月28日阿克萨起义(Intifada of Al Aqsa)的以色列的挑衅,可以看做是阿拉伯各国首都一系列自发团结宣言的起点。阿拉伯卫星电视台播发的悲惨画面,以及由于群众生活状况恶化而导致的群众长久以来的不满,引发了一小群(可能有十个)学生在行人众多的地方一边游行一边呼喊口号:“埃及军队在哪里?”这种行为,尽管规模很小,是自发的,但是表现出群众的不满在不断积累,表现出群众拒绝把失败当作确定的命运接受下来。这种情感后来在埃及与巴勒斯坦人民团结一致人民委员会(Egyptian Popular Committee for Solidarity with the Palestinian People)的大规模活动中表现出来,该组织把一般的政治口号变成任何人都能够参加的团结一致的集体行动,在开罗和各省都有数量众多的人参加。

这使得无数对任何正式的或者秘密的党派丧失希望的政治行动主义分子和那些以前没有采取激进行动的人产生了一个新现象:独立的行动主义分子。2002年在埃及的大学里发生了很多示威游行,遭到当局的残酷武力镇压(在亚历山大一名学生被杀害,另五名由于被橡皮子弹击中而失明)。

2003年3月20和21日,为表示与伊拉克人民团结一致,在很多阿拉伯国家首都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20日,开罗解放广场发生了大约二万人的示威游行,吸引了很多从未参加任何政治行动的群众。第二天,警察使用空前的暴力镇压示威者,逮捕了一千多人,包括议员在内。然而,巴格达实际上未作抵抗就陷落了,这对人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失望,从而提前结束了支持伊拉克的示威游行,因为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人民曾对伊拉克人民和军队的抵抗寄予厚望。

示威游行期间,来自群众的反对统治政权的自发口号以及对诸如失业和物价迅速上涨等问题的关切,使得政治行动主义分子注意到一般的民族主义口号没有作用,认为有必要解决具体的民

生问题。这些行动主义分子也认识到,在出现了解决问题的希望的时候,单靠他们孤立的努力是不足以解决群众面临的艰巨任务的。这一点体现在致力于解决特定问题的委员会和达到特定目标的运动的若干行动上,例如取消紧急状态,反对穆巴拉克总统任期延续下去,以及其他问题,例如联合的自由。这里要指出,这种行动吸引了新的“独立人士”,他们参加特定的运动,但是如果该问题得到部分解决,他们就抽身后退,不再参与积极行动。另一方面,这种群众行动仍然处于胚胎状态,并没有汇合起来,产生出某种形式的长期互动。另一个特征是,在这种行动中缺乏持续的群众性参与。

2004年,成立了一些小团体,它们的目标是致力于长期持久的任务,例如为某些政治冲突,或者在发生严重侵犯人权事件的地方,提供法律或者信息援助,例如石棉工人罢工,又如在埃及塔巴两家酒店遭到汽车炸弹的袭击后阿里士和西奈的其他地方大批人员被逮捕。

政治气候的变迁可以用来解释如下情况:2000年和2001年大量行动主义团体出现,然后在纽约“9.11”恐怖袭击之后它们的活动减少了,随后又出现了新的行动,截至2003年3月出现了更多的团体,在2003年4月巴格达陷落后遭到了挫折,出现了活动的间歇期,然后又出现了新的活动,2004年又形成了新的团体。除了行动的振兴,我们还注意到,出现了特定的运动、集体的行动,以及放弃一般的政治口号并致力于解决特定问题的一种趋势。这种新形式的斗争遭到警察和当局的严厉镇压,例如摩洛哥的失业大学生委员会的活动,或者争取农村生活基本舒适度的群众性抗议,对该国电力供应私有化政策进行的反对行动,都遭到此类镇压。

反全球化团体在采取诸如小型示威、围绕专门问题的斗争时使用了各种手法,例如针对当局采取法律行动,建立网站,组织地

方的或者国际的会谈,参加地方的、有时是国际的抗议活动,发布出版新闻信件和其他出版物,组织展览,在职业联合会或者人权组织内或者在公共场合静坐,参加竞选,支持某些作为协同工作团体的职业联合会。

### 三 反全球化团体之间的关系

摩洛哥树立了一个卓越的榜样,在该国建立了一个全国社会论坛,显示了很大程度的聚合和力量。这个论坛举行了两次全国性会议,第一次在2002年1月举行(有四百位参加者),随后十二个城市举行了地方论坛;第二次全国性会议在2004年7月举行(有一千位参加者)。有人说,这两次会议具有精英主义的色彩,缺乏真正的地方动力。他们还说,论坛活动的目标主要是缓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弊病,一小部分参加者赞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观点,另一小部分参加者强调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必要性,而大部分参加者接受了有些含糊的自由主义观念,即不号召进行任何社会冲突或者斗争(阿希和巴希尔[Al - Aasi Al - Bashir])。

谈到阿拉伯民族的内部关系,一些行动主义分子认为他们之间不存在正式的接触,他们之间唯一的来源源于他们活动的相似性,而这又是由于相似的结构或者共同的文化遗产。类似团体之间的协调则只是偶然的和个人的。

从国际捐助者那里得到某些财政援助的组织,拥有更好的机会同它们在国际事件中碰到的其他运动建立较好的联系,因此具有较大的互相协调能力。然而,由于国外援助部分地要依靠地方政府的批准,因此运动愈是激进,获得此类援助的机会就愈少,由此导致它们只能依靠贫穷支持者的贫乏资源。一个行动主义者认为,他们从那些温和的行动主义者那里艰难收集来的资源用于在

某些边远省份扩展活动上,这比购买昂贵的机票参加国际活动好得多。他们认可同其他行动主义分子交换经验的价值,但是认为,把他们的活动扩展到他们自己国家需要的地区是更有成效的事情。

另一位行动主义分子指出了阿拉伯民族的内部关系比较薄弱的另一个原因,即各团体所代表的利益具有地方性质。大多数运动希望获得其他运动对自己做出团结一致的支持,但是对于他们同行的问题,却很少注意去给予团结一致声援。这种自我中心的关切的一个例子是,在埃及,没有行动主义分子打算对萨达姆·侯赛因倒台前给予在他的专制统治下付出牺牲的人们以团结一致的支持行动,或者表态反对驱逐阿尔及利亚的民选政府的行为。另一位行动主义分子坚称,在采取阿拉伯民族层次的共同行动之间,地方行动必须达到一定程度的成熟,这样两个层次的行动就可以互相增强。

在开罗、孟买和贝鲁特进行了长久的协商之后(筹备委员会在孟买),第一届阿拉伯社会论坛(Arab Social Forum)创建起来。该论坛最终通过了2005年1月6日在开罗公布的宣言。进行创建工作的组织者被劝告说,正式的成立还应当以耐心的、持续的努力来进一步推进,以便克服所遇到的任何反对或者个人的不同意见。这个忠告是非常中肯的,因为在邀请函发到众多行动组织手里以后,很多组织并没有做出积极回应,甚至有一些组织在一开始做出积极回应后,又对最后的大会进行抵制。

确实,在阿拉伯社会论坛上人们反驳了某些批评意见,他们指出,社会论坛是一个场所,在这里,行动主义分子聚集在一起,交流经验,号召就他们致力于解决的问题采取团结一致的行动。阿拉伯社会论坛一开始就被认为是一个上层结构,是由精英主义团体事先设计好的,然后采取一些措施来吸引各行动组织前来参加它的建立工作。这是传统的建立政治同盟和阵线的程序,但是对在

性质各异的社会运动之间建立同盟这一点上并无裨益。另一些人指出,邀请函主要发给了那些没有给政府带来多少麻烦的组织,或者政府支配的工会,目的是避免同国家发生任何对抗,结果较为激进的组织被忽视了。这就意味着,阿拉伯社会论坛更多的是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协调网络,而并不是反全球化的前线行动。这种批评使我们想到以同样的原因对摩洛哥社会论坛提出的批评,尽管摩洛哥的政治气候表现出其他阿拉伯地区不可比拟的强大活力。

阿拉伯行动主义分子聚会的另外场合是区域性的论坛,例如欧洲地中海论坛(Euromed Forum)、欧洲地中海公民论坛(Civil Euromed Forum)。前一个论坛得到叙利亚和埃及的一些行动主义分子以及摩洛哥社会论坛的支持,与此同时有些行动主义分子认为,把地中海当作一个区域就忽视了阿拉伯成员,并破坏了对伊拉克和巴勒斯坦的军事占领进行积极反对的行动。这还有可能助长该区域的帝国主义霸权政策,大中东计划(the Greater Middle East Project)就是明证。这类行动主义分子愿意选择另一种形式的合作,例如一个欧洲—阿拉伯论坛(European—Arab Forum)。

至于欧洲地中海公民论坛,上述反对意见由于以下事实进一步加强:该论坛与欧洲各国政府具有紧密的联系,而欧洲各国政府位于资本主义全球化——这正是这类论坛旨在反对的目标——的主要实施者之列。那些声称反全球化是它们主要目标的团体正努力在埃及、叙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创建某种类型的相互合作,这可能会采取共同论坛的形式。

阿拉伯世界的全球化团体同外部世界的同行之间的关系是相当薄弱的。例如在叙利亚,政权垄断了对外关系,尽管如此,反全球化行动主义者同阿塔克(ATTAC)和取消第三世界债务委员会(CADTM)还是有一定的联系的。在埃及,一位行动主义分子说,这里比阿拉伯世界的同行与全世界反全球化团体的关系要密切一些,还说,近来这种联系时常是在欧洲团体的倡议下进行的。反全

球化埃及小组保持着这种联系,并在开罗和贝鲁特举行了一些成功的会谈。在这种联系中,我们还要指出阿塔克在突尼斯和摩洛哥拥有分支机构,同时亚洲的一些运动同阿拉伯的一些运动也进行着合作。

在本文结束时,我们要指出,尽管反全球化团体近年来在成员和活动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增长,但是他们在街头民众动员上的效力依然相当软弱。尽管阿拉伯群众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恶化,但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在该区域的进攻也在不断加强。为了对付阿拉伯世界群众不满的日益增长,当局采用了更为高压的措施,尽管他们对外部世界竭力展现出一幅民主的画面。

## 参 考 文 献

Hamad, S. A., *Hisham Mobarak Center for Human Rights*, Interview on 26/1/2005.

Bilal, A., *An Arab Social Forum, for Whom?* Nov. 2004. <http://www.kefaya.org,htm>.

Salem, A., *Do we need an Arab Social Forum from Above?* from the constituent meeting of the ASF in Cairo, 4-6 Jan. 2005.

“Ahdath” Moroccan periodical, 24 Nov. 2004.

The Egyptian Popular Committee for the Support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http://www.ageg.net/declaration.htm>.

Fishawy, K., *The Challenges the Egyptian Movement against Globalization and War has to Meet*, 28 Oct. 2002, <http://www.albadil.net.htm>.

Omar, K. A., *The Issue of Social Security*, <http://www.ageg.net/dossiers/pensions.htm>.

Aly, K., *Activist in the Coordination Committee for the*



*Defense of Labor and Union Rights*, personal interview on 18/1/2005.

Fishawy, K., *Towards a World Forum for Peace and Democracy*, <http://www.albadil.net/movement.enwsfor.htm>.

Hishmat, D., *The Social Insurance Money Belongs to the Insured*, <http://www.ageg.net/dossiers/pensions.htm>.

Hishmat, D., *We Shall Resist*, <http://www.ageg.netnews/beirut.htm>.

Baath, R., *From the WSF 4*, <http://www.ageg.net/mumbai/qalb.htm>.

Keila, S. (Syrian A. G. activist), personal interview, Cairo, 10/2/2005.

Amin, S., Interview with Dina Hishmat, <http://www.ageg.net/news/mumbai.htm>.

Al - Bahrawi, S., "AGEG", Qadaya Fikriya, 21, Cairo, 2005, Madbouly.

Al - Bachir, A., *The Moroccan S. F. between Neo Liberal Logic and Renewed Struggle*, Al - Monadel Periodical, 2 Oct. 2004.

Abdel - Latif, *Spotlight on the Anti War Movement*, <http://www.maroc.attac.org/peges/debat.htm>.

Khalil, K., *The Popular Movement in Egypt*, Paper presented to the 2nd Continent Conference, Cairo, 14 Dec. 2003.

Mohammad, Lahlo and Khoya, *Report on Sit in of Unemployed Graduates in Morocco*, <http://www.kefaya.org/reports.htm>.

Fact Finding Committee, Egyptian Lawyers Syndicate, Jan. 2005.

AGEG, <http://www.ageg.net/news/tahrir.htm>.

Al - Agati, M. (activist, AGEG), personal interview on 1/3/2005.

Wakid, M. (activist, AGEG), personal interview on 29/1/2005.

South Center for Human Rights, Constituent Declaration, <http://www.southonline.org.apraswan28112004.htm>.

ASF, Report on Plenary Meeting of preparatory Committee, on 27/28 May 2004.

Ezzat, M., *Activist in National Committee for Support of Palestinian Intifada in Journalists Syndicate*, interview on 10/2/2005.

Melhem, M., interview with Dina Hishmat, <http://www.ageg.net.htm>.

## 8 阿拉伯世界公民社会的发展与对民主的需求

萨拉·本·内夫沙

毫无疑问,阿拉伯国家民主化的外部压力——尤其是来自美国的压力——激活了公民社会,并且增强了它们对于本国政权的力量。然而,在2000年,一次研讨会<sup>①</sup>上公布的阿拉伯国家公民社会状况却相当模糊。与工作在基层的行动者和组织相比,尤其是与那些同伊斯兰主义运动有关的社会组织相比,“倡议性”的行动者和组织存在着许多缺点。这些缺点包括:成员的精英主义;成员和领导的低更新率;内部民主的缺乏和官僚化;大量的内部冲突和权力的个人化;与本群体的沟通不足;与本国当局以及外国和国际组织的对话有限;一些组织充当政权不通过选举过程收编新政治人员的来源,所带来的负面结果剥夺了阿拉伯国家精英的能力,这些精英在公民社会内从“卑微的”政治角色中获益;最后,从这些国家的民主和人权保护状况来看,几乎没有出现显著的、具体的结果。

自从2001年9月起,这一判断不再成立。在新的地区和国际

---

<sup>①</sup> 这次讨论会的名称是“阿拉伯世界的非政府组织和治理”,并且由 Unesco - Most 项目、宗教与民主研究所、金字塔政治和战略政策中心与开罗经济、法律和社会文献研究所于2000年3月共同在开罗举办。

形势下,这些“缺点”已经成为积极的因素,使阿拉伯国家的公民社会更容易地积极参与所谓的“一场关于阿拉伯世界民主的全球性争论”。阿拉伯公民社会积极分子的特点;最上层的精英;他们对当今国际主流语言的了解;他们的实践、经验以及同外国和国际行动者交往的能力;他们在各种网络中运作的方式;他们对资金来源的了解等等,这一切推动着他们调整自己的话语和运作方式来适应新的地区形势,并且使他们能够讨论阿拉伯民主政体是否是阿拉伯防御性政权的替代,以及能否成为外国行动者尤其是美国人的政体的一种替代。

事实上,我们可以说,这些来自公民社会的行动者——非政府组织、记者、人权积极分子等等——已经成为阿拉伯内部事务的真正参与者,并且变得比公认的政党更重要。即使后一种情况确实存在,这些行动者的活动也曾经遭到了极权主义政权的阻碍,并且沦为本国政治议程表和选举时限的牺牲品。它们或多或少地向执政精英“妥协”,并且受到本国政治估算的限制。在当今的阿拉伯世界中,正是这些行动者使公民社会占领了民主要求的领域。埃及的经验就是证明。在2004年和2005年,除了非政府组织、独立媒体的记者以及像凯雅法(Kifaya)这样的运动和法官之外,重要的政治行动者都尚未成为公认的政治力量。

这一复兴首先加强了不同阿拉伯国家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其基础是积极分子和民间组织在民主优先性与彻底改革本国政权的要求上所达成的普遍共识。阿拉伯公民社会的行动者谨慎地表明自己在“议程上”与美国政府的不同,公开批评后者的极端模糊性,但却意识到了自身的弱点。然而,他们却获益于国际社会对阿拉伯国家政权的指责,进而肯定了他们自己的立场,乃至在某些国家获得了以前并不存在的行动自由。

围绕着政治改革和民主的人民动员主要归功于阿拉伯国家的人权组织网络。事实上,我们可以说有一个负责动员阿拉伯公民

社会的埃及人—摩洛哥人联盟,尤其是开罗人权中心和摩洛哥人权保护组织。这两个组织的周围几乎全都是有关人权的阿拉伯组织和积极分子,包括那些来自海湾国家的组织和积极分子。它们的主要目标是不仅在政治改革上,而且在该地区的一些关键主题上,就恐怖主义、伊斯兰主义、巴勒斯坦问题、伊拉克、苏丹和最近的黎巴嫩等最重要的冲突,提出一种能够替代各阿拉伯政府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的阿拉伯话语。许多会议组织者的第二个目标是强调阿拉伯政治领导人在各种建设“大中东”峰会和会谈期间提出的政治改革的真正本质。

重要的是要指出这种替代性的话语究竟以何种方式表述出来。在阿拉伯国家联盟组织的各种会议和峰会期间,各种民间论坛也同时举行。<sup>①</sup> 阿拉伯人权组织在参加这样的民间论坛时提出了上述问题。事实上,重要的是,阿拉伯国家联盟没有邀请非政府组织参加它的活动。<sup>②</sup> 此外,正是阿拉伯民间论坛的积极分子要求阿拉伯国家联盟的代表参加他们的会议;反之,除非受到联合国的压力要求他们邀请阿拉伯民间论坛的积极分子,否则阿拉伯国家联盟就不会这样做,例如在修改1994年阿拉伯国家联盟发表的人权宪章时就是如此。<sup>③</sup> 正是在某些阿拉伯国家首都所组织的这些会议和论坛期间,起草了各种共同文件和宣言。<sup>④</sup> 这些共同文

① 第一次民间论坛于2004年在贝鲁特召开,并且发表了一份题为《第二次独立:阿拉伯世界政治改革倡议》的宣言。

② 一个非政府组织不可能成为阿拉伯国家联盟的顾问,因而不可能参与常设的阿拉伯人权委员会的工作,除非该非政府组织在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成员国成立或注册,并且该国对此予以同意。除了少数例外,只有那些与政权关系密切的组织才能获得阿拉伯国家联盟的顾问地位。

③ 以国际标准而言该宪章有重大缺失。它只是表面确保权利,对于确保的权利留有很大的限制和特免空间,而最重要的是缺乏监控人权的实质机制。

④ 参见下述宣言《第二次独立:阿拉伯世界政治改革倡议》、《阿拉伯世界改革的重点和机制》等;登录网站:www.eihrs.org。

件和宣言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那些签署者想把自己与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区分开来,后者以陈旧的民族主义话语来反对“外部强加的改革”。这些文件说,正是阿拉伯国家政权拒绝聆听国内的改革要求,才招致了外来的干涉。这些文件还公开批评阿拉伯国家政权以文化、宗教和经济上的借口以及巴勒斯坦问题而拒绝进行变革。此外,由于极权主义的态度,阿拉伯国家政权还因为鼓励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而受到指责。

这些文件要求尊重宗教自由、妇女权利以及“民族”和宗教少数派的权利,并且要求提高工人和移民——尤其是在海湾国家——的地位。

在“支持本地区公民社会和促进民主”的环境下,阿拉伯公民社会的复兴得到了国际组织和地区组织的经济资助与道德支持,比如说,世界银行、联合国、欧盟和各种其他的外国公共组织,尤其是美国的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了阿拉伯世界人类发展的报告<sup>①</sup>。这给予了阿拉伯公民社会以相当大的道德支持。尽管如此,阿拉伯公民社会仍主要是从欧盟获得物质和资金上的帮助。欧洲的资金似乎是对欧盟缺乏真正取代“大中东计划”政策的某种弥补。这在阿拉伯世界中已经成为国际行动的参照点。毫无疑问,在这一地区,美国的官方援助带来了一种可能难以承受的政治代价。

除了国际和外国的援助外,阿拉伯公民社会还得到了西方重要的民间组织——尤其是欧洲地中海人权网、国际人权联合会——和西方其他许多基金会和组织的资助和支持。

然而,尽管阿拉伯民间组织与西方和欧洲的民间组织建立了

---

① UNDP 有关阿拉伯世界的人类发展报告由该地区最著名的专家撰写,对阿拉伯世界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状态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判,报告发表时引发了很多国际与地区争论。

稳固的联系,但由于以下原因,我们几乎不能说它们之间存在真正的合作。第一,阿拉伯公民社会的动员和复兴主要集中在民主和政治问题上,然而对于与现实的联系仍然胆小怯懦。对阿拉伯世界来说,政治是重中之重,因而除了阿拉伯社会运动和工会的软弱之外,还难以在该地区组织社会论坛。此外,阿拉伯世界与西方之间的冲突关系作为一个更广泛的环境,也影响了阿拉伯民间组织与西方民间组织之间的关系。即使在“9.11”事件之前,深深的误解已经困扰着它们之间的关系,而“9.11”事件肯定使之更加恶化。阻碍之一就是伊斯兰主义问题,不论是在阿拉伯国家还是在西方和欧洲国家都是如此。同样地,恐怖主义袭击、法国近来的郊区危机、先知漫画事件、哈马斯选举胜利后的近东地区形势问题和黎巴嫩的战争,都加深了双方的猜疑。最后,或许最重要的是,尽管最近几年有所复兴,但阿拉伯公民社会的效力仍然有限,并且缺乏真正的社会基础。这仍然是伊斯兰运动的自留地,就像阿拉伯世界的最新选举结果所表明的那样。而且,黎巴嫩真主党对以色列军队的胜利大大加强了这一点。

不同国家的伊斯兰运动从强大的社会组织中汲取它们的力量,但它们在主流的国际话语中并不被视为“民间的”组织。

## 9 阿拉伯半岛:社会的觉醒与石油君主的改变

法提哈·达兹 - 埃内

20世纪90年代,阿拉伯半岛发生了一系列地区性事件,例如1991年科威特解放战争和由于低油价(直到1998年初每桶石油的价格才上升到十一至十三美元)而导致的经济严峻时期。这些事件激起了阿拉伯半岛各国政权和社会的集体意识的觉醒。因为对两者来说,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这些福利国家通过石油收入再分配来购买社会和平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现在,我们不用再把自己局限于古典的方法之中,强调阿拉伯半岛六个君主国的极权主义性质,或者支配这些社会的保守的部族和宗教现实。研究这六个专制政权适应本国社会日益高涨的要求而产生的变化,会很有指导性。(Dazi - Héni, 2006)

自从阿拉伯半岛的部落领地变成世袭的王朝之后,它们的社会契约一直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因此,这些社会如何成功地迫使本国的统治王朝就它们的社会契约重新谈判呢?在过去的十年里,阿拉伯半岛的君主国取得了不同的进步。在这一地区中,各个统治家族重新进行了权力谈判,以便整合当地的精英。这些精英曾经被排除在政治之外,而现在却倾向于利用自己的力量提出新的经济政策意见。

20世纪初,阿拉伯领土变成了主权性的民族国家。这些国家



最初由旧的部落酋长进行统治,然后通过大英帝国的保护条约变成了世袭王朝。(Zahlan,1998)石油收入的使用权和分配由各国的统治家族控制,帮助加强了这些食利国家的专制主义性质。由于殖民化,这些国家变成了皇室政权。在这一方面上,科威特社会学家哈勒顿·阿尔-纳基卜(Khaldun al-Naqeeb)对该地区国家和社会的分析是主要的参考文献(1990)。此外,他还指明这种制度性法团主义如何改变了公民社会自治的企图。哈勒顿·阿尔-纳基卜被认为是阿拉伯和国际学术界中的权威。据他所言,这一地区在起源时就缺乏民主<sup>①</sup>,今天依旧如此。

## 一 呼吁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

在这里,我们尤为关心的是公民社会借助哪些方式来证实自身。这显然不是那种深入研究大量文献的政治研究,比如说,关于极权主义,尤其是中东国家的文献,更不用说关于阿拉伯半岛国家金字塔结构的文献了。1986—1988年间发生的第二次石油动荡和90年代的地缘政治氛围强烈地影响了阿拉伯半岛的君主国,它们决定应对本国青年(二十五岁以下)所要求的变革。在这些国家的人口中,青年平均占到了将近70%。20世纪90年代期间,阿拉伯社会仍然完全由国家控制,但社会行动者逐渐增强了自主性。在这六个国家(沙特、阿曼、卡塔尔、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中,极权主义政权被迫应对这种新的发展,尽管各自有它们自己的方式。

在科威特战争之后,不管是在科威特还是在沙特和巴林,对民主化和治理透明度的要求越来越迫切。不过在阿曼,这一要求并不是那么迫切。相比之下,在卡塔尔和阿联酋、尤其是迪拜,新一

---

<sup>①</sup> 关于这一点,也可参见 Gh. Salamé (1991), *Sur la causalité d'un manque: pourquoi le monde arabe n'est - il donc pas démocratique?*

代的王子们主动促成了重大的变革。然而,除了这两个国家之外,社会—人口的发展是最有效的杠杆,迫使这些极权主义政权适应新的要求和继续实行经济自由化。

有一些明确的迹象表明,尽管直到当时仍然被排除在决策圈之外,但社会行动精英开始产生了影响。其中的许多人来自中产阶级,作为“食利者的子孙”,他们受益于慷慨的石油收入再分配政策。他们是新社会契约谈判中的核心力量。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些新社会契约开始在沙特、阿曼(程度更小)、卡塔尔和迪拜发展起来。作为这一地区政治发展的先锋,从20世纪70年代(巴林)和80年代(科威特)起,巴林和科威特的政权就已经开始接纳来自中产阶级的大学精英。

阿拉伯半岛大部分保守的王朝政权一直运用古典的统治形式。现在,这种统治形式已经变得难以为继。新的时期发生了流行的变革。将来,这些变革会对阿拉伯半岛君主政权的永久统治能力产生决定性的冲击。<sup>①</sup>在科威特战争之后,这些君主政权被迫采取结构性调整的措施,既是为了应对强大的社会—人口压力,也是为了使它们的经济能够吸引更多的外国资本和投资。显而易见,在1987年石油价格暴跌之后所产生的经济危机,使这些政权在几年后反思它们的运作模式。沙特前王位继承人阿布拉杜王储1998年5月18日的讲话可以由此来解释。当时,他提到了要结束沙特的福利制度。<sup>②</sup>

在更大和更小的程度上,阿拉伯半岛的这些政权都面临着人

---

① 关于阿拉伯半岛君主政权历史和政治发展以及它们的永久统治能力的研究,参见 M. Herb (1999), *All in the Family: Absolutism, Evolution and Democratic Prospects in the Middle Eastern Monarchies*.

② 这篇讲话的摘要于1998年5月20日发表在沙特《祖国报》(*al-Watân*)上。该报由哈立德·费萨尔·沙特亲王(阿西尔省省长和外交大臣沙特·费萨尔的弟弟)于1998年创办。

口的约束,并且面临着石油储备和政治凝聚力的变化。这一切都限制了各自国内共识的说服力。这些结构上的差异将影响到领导人的变革能力和意愿。放弃福利政策和人民已经习惯的国家援助,就意味着国家将不再是国民新工作岗位的主要雇主和创造者。国家正在鼓励私人部门分担以前由国家独自承受的负担。这些都是阿拉伯半岛君主政权必须应对的挑战。

## 二 王朝政权的适应

在这六个国家中,这种转型并不包含同样水平的风险:转型模式并非千篇一律。然而,它们的统治者全都面临着建立新社会企业的要求,尤其是要采用例如私有化的自由化措施来促使经济的转型。这意味着放弃那种被称为“喀菲拉”<sup>①</sup>的资助人制度。直到本世纪头十年初,这种制度阻止了外国公司完全拥有阿拉伯半岛国家的资产。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The Cooperation Council for the Arab States of the Gulf)<sup>②</sup>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中并未获得多少成功,但在经济一体化方面却取得了进展:人员、财产所有权和共同投资机构实现了自由流动,并且从2010年起将实行共同的货币。经济组织的重组标志着阿拉伯半岛君主国的历史进入了新的阶段,因为这种重组主要在于在没有颠覆传统联盟的情况下与其他

---

① 这种控制性原则阻止外国投资者在某家公司拥有绝大多数的股份,并且严格控制分配权利。因此,这一原则保证了当地精英对商业活动的垄断,包括像国防这样战略性和繁荣的部门。在非免税区,这一原则仍然普遍存在。但是,由于阿拉伯半岛六国中有五个国家支持海湾合作委员会(参见上文),并且沙特也即将支持这个多边贸易机构,因此这一原则最终注定要消失。

② 海湾合作委员会(GCC, The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由阿拉伯半岛的六个君主国建立,并且于1990年更名为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Cooperation Council for the Arab States of the Gulf)。本文继续使用该机构的缩写“GCC”。

类型的联盟签订契约。

这一过程在迪拜尤其突出。在那里,新的酋长接过了父辈关于城市发展的现代化构想。阿联酋首相兼迪拜市长穆罕默德·本·马克塔姆王子收编了当地在新加坡和美国培训的技术官僚,成功地实施了他的城市—世界计划。这些技术官僚已经成为了变革和迪拜模式成功的先头部队。一些人强调这种方法的独裁性质,并且他们说的并没有错,但对例证的兴趣完全在另一个领域之中。因为这些技术官僚现在在新迪拜占据了支配地位。此外,极权主义机制由新精英中产生的新客户构成,而那些新精英则与领导的远景规划有关。这种极权主义机制也并非迪拜所独有。

在这种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沙特的情况也是令人瞩目的研究对象。沙特政权目前正处在社会契约谈判阶段。1998年,在阿卜杜勒国王(当时任摄政王)的领导下,这种社会契约谈判开始进行,到“9.11”事件的时候重新获得了活力,尽管这种谈判更多地处在过程加速的阶段之中,而不是引发了全国社会契约对话和重新谈判机制。然而,由于美国对沙特王国施加压力,要求它放弃瓦哈比派的意识形态,地缘政治环境强化了对变革的抵制,即使这种地缘政治环境成为变革过程的一部分,也不一定导致重大的危机。

1991年科威特战争之后的情况远不止如此。在2001年9月11日之后,公民社会崛起,反映了大多数国民的观点。他们希望在与本国领导人平起平坐的基础上,讨论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问题(安全、公共开支或诸如青年失业这样的社会问题)。阿拉伯半岛地区的政权最关心这种发展,美国也是如此,尽管出于不同的原因。事实上,对变革的渴望在阿拉伯半岛的所有国家并非同样强烈,就像要在政权和社会之间找到一种新协议的谈判参数并不相一样。因为把这组国家说成一曲文化、经济和政治上的历史大合唱已经成为陈词滥调。不过,尽管那里存在着这些相似性,但这种明显的一致性掩盖了复杂而又多样化的经验。

因此,沙特王朝将更难以新社会契约找到一种理想的解决办法,原因还在于数量庞大且分裂成对立派别的皇室家族必须都意见统一地进行决策。目前,这是巴林、卡塔尔、迪拜、阿曼和阿布扎比暂时面临的一种约束。沙特国王的去世保证了连续性,因为沙伊赫·哈里法继任成为阿布扎比的埃米尔和阿联酋的国王。然而,这种连续性阻止不了对立的阿勒·纳哈部族的强大竞争。2006年1月15日,科威特埃米尔贾比尔去世。科威特议会令人吃惊地废黜了年老多病的埃米尔的当然继承人谢赫·萨阿德,并且一致支持科威特政权的第三号人物谢赫·萨巴赫·艾哈迈德按照科威特宪法成为埃米尔。

专制主义的统治策略保留了旧的联盟,并且按照法团主义战略进行统治。这种统治策略将会逐渐让位于协商和谈判,以便把其他社会群体(技术官僚和新商人)纳入到政权之中。在将来,这些其他社会群体即使不会取代旧的联合精英,也会与皇室家族共存下去。

## 参 考 文 献

1. Al - Naqeeb, Kh. (1990), *Society and State in the Gulf and Arab Peninsula*, London: Routledge.
2. Dazi - Héni, Fatiha (2006), *Monarchies et Sociétés. Le temps des confrontations*, Paris: Presses de Sciences Po.
3. Herb, M. (1991), *All in the Family: Absolutism, Evolution and Democratic Prospects in the Middle Eastern Monarchi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4. Salamé, Gh. (1991), "Sur la causalité d'un manque: pourquoi le monde arabe n'est-il donc pas démocratique?" in *Revue française de Science Politique*, Vol. 41—3, June 1991, pp 307—

341.

5. Zahlan, R. S. (1998),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Gulf States*, London: Ithaca Press, 2<sup>nd</sup> edition.

## 10 埃及的公民社会和新社会运动

埃曼德·希亚姆

围绕公民社会的作用进行的争论,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范围内都正在日益增多。这一争论是围绕公民社会在建设新力量方面的可能作用而进行的,这些新力量将使得各种新的社会同盟来取代当前的同盟,这些新的同盟能够在国家层次上推行较为公正的社会政策,致力于对抗导致人民贫困化、边缘化以及环境退化的霸权、资本主义和全球化政策。

在这种背景下,关系到公民社会在埃及如何影响各种冲突、互动和社会平衡,帮助社会走出综合危机的能力的基本困境浮现出来。这主要是指:

1. 无论是在公民社会组织内部还是和国家机构一起,以参与、负责任和公民互动的原则为基础,建设社会和政治关系的民主模式。

2. 保护它们所代表的群体的利益,增强这些群体为了他们的直接和间接利益动员起来的能力。

3. 公民和国家之间的积极中介(为谈判和造成压力的能力)。

这些能力或者特征将赋予公民社会新的作用,这将取代一贯的理解,即公民社会主要是与救济作用相关。这种情况使公民社会日益壮大的运动发生了深刻的争论,争论的目的是为了克服各派别潮流之间意识形态的冲突,集中普遍的和共同的观点。这一

争论本质上反映了一种由左派和右派的广大思想家发起的自我批判,他们在面对同他们采纳的意识形态不符的现实证据时,并不感到有什么问题,这一点反映出他们意识到由于社会面临综合危机而产生的变化。这个危机督促每一个人都采取更为团结一致的、能够作为出发点的立场,而每一个人都发现这一点在建设和增强公民社会运动上是必需的,即使每一个派别为自己设想了不同的角色。

自由主义左派(他们源自1970年代的左派组织和学生运动)把公民社会看做是能够做成以下事情的最佳工具:重建失去的公共领域的多样性,找回失去的作为社会契约的公民身份概念,这种公民身份概念认为个人有能力进行自我治理,并且是通过他们自己治理。

另一方面,伊斯兰教的右派(特别是伊斯兰兄弟会)把公民社会看作不过是一种召唤行动(为伊斯兰教召唤)和扩展政治力量的框架,也就是说,仅仅是一种政治动员的框架。

公民社会在其中得以建设的社会和政治背景增加了形势的复杂性,这些背景概括起来主要如下:

1. 国家从教育、社会和医疗卫生领域日益撤退,这令人感到混乱,同时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而公民社会组织形式各不相同,在作为处于市场驱动的经济和国家之间的中间地带来保护被边缘化的人民免于受害时软弱无力。

2. 政治制度仍然坚持专制手段,同时公民社会组织无力鼓励群众实行政治参与,或者无力将自己变成真正的能够吸引越来越多的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的参与性组织。

3. 依靠国家的思想仍然盛行,个人主义倾向于占据支配地位,缺乏集体工作和独立创新的精神。另一方面,公民社会组织鲜有能力在人民中间培养责任感并鼓励他们对自己肩负起责任,对那些与他们共同组成社会的人肩负起责任。



这些问题和挑战确定了公民社会组织作用的性质,它们不得不从一种结构性的方法着手:把社会和政治转型过程中公民社会运动和组织的贡献作为考虑的问题。公民社会的作用就是要使目标群体的能力最大化,捍卫他们的权利,赋予他们以力量。即使公民社会组织提供了若干形式的服务,它们基本上仍然是表达一定群体的利益,并力求保护这种利益的团体,这样就向公民社会提供了其要求的合法性,并使得公民社会的改善成为改善社会结构本身这一过程的一部分。

对公民社会作用的这种理解要求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要求在处理同国家、当地和国际的社会力量之间关系时采取不同的方式。这就使公民社会组织添加了一个议程,该议程主要围绕以下目标进行:

第一,找到一种宪法上的框架,使得公民社会组织有组建和行动的自由,保障它们在面对国家霸权和专制时的独立性。

第二,建设一种社会文化,这种社会文化支持采用计划的和集体的行动,来解决利益方面的焦点问题和保障利益这种思想。

第三,提供一种内部的民主氛围,这种氛围将支配公民社会组织的工作规则、资源利用和内部管理,保证公民社会在较大程度上具有透明性和参与性。

第四,采用目的是为了赋予目标群体以力量,并增强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的行动手段和策略。

最后,为造成公民文化的优势而工作,这种公民文化支持不同类型和差异性的价值,尊重宗教和思想的自由,尊重公民权利和公民之间的平等。

如果公民社会能够成功地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就会为它成功地变成社会变革进程的火车头这种可能性提供一个真正的起点。这就是深刻的民主转型这个问题被视为首要问题的原因,特别是公民社会的目标不仅有改变实际的政治体制的结构和基础,而且

还有改变埃及政治精英的思想意识和行动的手段与策略,埃及政治精英中最重要和最有能力的那一部分正是由公民社会中的精英行动主义分子构成的。

## 一 公民社会:进步指示器

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和政治性的伊斯兰教组织之间的纷争达到了实际冲突的程度,与此相伴的是政党、传统思想和传统派别(民族主义、纳萨尔主义、马克思主义、伊斯兰教、自由主义)在显而易见地持续不断地退化,导致它们无力使国家从危机中摆脱出来,这使得一种新的潮流开始出现。

这种新的潮流属于一些积极活跃于公共领域的框架或者机构,尽管形态各异,但它们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从属于公民社会的各种运动。这种新潮流力图影响大部分群众。这些框架或者机构具有如下特征:

1. 几乎所有这些组织都对公共问题(政治性质的问题、发展问题、文化问题、社会问题等等)感兴趣。

2. 进行把群众牵涉进来或者以群众为目标的活动(讲习班、研讨会、书籍、杂志、研究项目、训练计划、组织对话、实施发展项目、发布反映一定立场的声明)。

3. 其中的一些框架和组织同某个宗教机构或者某个流行的宗教文化有组织机构方面的联系,或者属于这些宗教机构和文化,从那里获得其合法性。然而,这些组织的政治和文化话语不能被说成是一般的宗教话语。

4. 这些框架和机构中的行动主义分子和行动者,属于见证了或者领导和参加了1968年开始的埃及大学里学生运动的那一代人。这场运动经由7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初,参加者包括马克思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纳萨尔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伊斯兰

教徒。

5. 这些行动主义分子和行动者中的绝大多数人曾经在思想上或者组织上同埃及的主要政治力量有关系,无论这些政治力量具有合法性还是不具有合法性,并且其中的一些人至今仍同政治力量保持某些关系,但是这些人对政治力量持批判态度,他们寻求改善和更新政治和思想话语,为政治力量建设一种真正的政治效能。

6. 在这类框架和组织所进行的活动(其目的在于从他们活动受益的群体中间培育出批判性的意识)的出现和埃及社会、政治和经济形势的恶化(伴随着经济机构中的结构调整政策和私有化政策的实施,年轻人中的失业问题上升,国家和伊斯兰兄弟会组织及伊斯兰圣战组织之间暴力的增加)之间,存在着时间上的关联。这个国家在90年代经历了所有这些变化,这些变化的影响至今仍然可以感受到,特别是这个国家正在经历的经济危机、不断蔓延的腐败和民主制危机的不断加深。

7. 在这些框架和机构中的行动主义分子和行动者当中,存在着程度非常高的合作和共同活动。

8. 在过去的十年里,可以说行动主义分子和行动者相互之间只要能够进行对话,就在以下问题上创造了共同的政治和思想话语:

a. 民主:建立政党的自由,对选举进行司法监督,废除钳制自由的法律。

b. 人权:公民权利,思想和宗教自由,同一切形式的拷打、肉体暴力和精神暴力作斗争,同一切形式的对女性的歧视作斗争。

c. 社会正义:每一个公民都有获得体面生活的权利,在这种生活中,工作、教育、医疗和真正的住宅得到保障。

9. 行动主义分子在其中工作的各种框架和机构遍及埃及各省。它们表现为若干种形式,如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研究中心、政府研究中心、非营利性的公民公司、文化搜集和分类组织、职业人

士的俱乐部和小组、非政府培训和咨询中心、政府的和反对派的报纸和杂志、公民组织的网络、学校和大学、宗教机构、职业人士的和工人的行业联合会……

10. 这些积极分子的政治话语和实际活动都依赖于寻求建立公民身份、完全平等的概念,寻求克服在宗教和性别方面的任何形式的歧视。

11. 在这些框架和机构内部对话一直在继续,在针对它们所属的思想和政治派别坚持自己的批判性立场方面更是如此。

## 二 埃及争取变革运动——“够了”

埃及争取变革运动被认为是公民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阶段。该运动由中年人代表,自1990年代初开始,在随后十年里提出了具有独特特征的政治和思想话语,严肃地寻求克服原教旨倾向的宗教潮流和政治潮流,寻求建立反对专制主义、新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具有民主和人道性质的新社会运动。

与这种情况同时出现的是政治统治精英中表现出的另一种非常明显的势头:谋求使当今埃及总统的儿子继承统治。这种势头遭到了大规模的抵制,特别是在各种政治派别联合起来并一致认为有必要进行政治和民主改革之后,情况就更是如此。这一非组织的抵制——并没有破坏勇敢和坚强——得到群众的广泛默认,迫使居于统治地位的政治精英暂时退却,提出一个替代方案,即把现任总统的任期拓展到第五年。这一事件促使那些中年人尝试着把自己作为公民的民主潮流组织起来并以此出现在公众面前。于是发表了一份致埃及民众的宣言,这份宣言包括他们的基本要求,即实行民主和政治改革;修改宪法,特别是修改那些有关总统选举的条款;强调在一个以上的候选人中进行直接选举的必要性,认为这是影响民主转型进程、打破僵化的现行政治体制(总统享有绝对

的权力)的关键因素。

这份宣言得到大约二千人的签名,包括知识分子、艺术家、职业人士、大学教授、学生和工人,他们都表示支持其中提出的要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属于中年人,同许多公民社会组织有关系,而且他们几乎代表了埃及所有民众的情绪,代表了各种政治和思想的潮流。

很快,在一次由签名者参加的大集会上,这份宣言成了“埃及争取变革运动”(Egyptian Movement for Change)的成立宣言。在集会上他们宣布自己恪守所提出的声明,把“够了”(Enough)作为运动的口号,这个口号反映了他们对现行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的抵制。他们抵制的对象还包括寻求世袭统治权或者为当今总统拓展任期的做法。选出了一个促进委员会,包括大约三十五名成员,代表了多种多样的经验、实践和职业的技巧,并且代表了大部分思想和政治潮流。这个委员会负责为运动的活动制订计划,委员会定期开会。委员会内部在成员之间根据他们的经验以及他们的职业和政治背景有任务分工。

开展这个运动的群体做出了如下规定:

1. 民主和透明原则,各项决定在讨论之后通过投票做出。人人遵守由多数人做出的决定,任何签署了宣言的人均可参加会议。
2. 克服通常施加给政党和政治组织成员的那些政治上和法律上的限制。这些限制也是政党和政治组织的话语、纲领和同群众关系的障碍,阻碍了在群众中发展政治同盟的可能性。也要克服国家施加于政党和社会组织的限制,国家可能通过动用紧急状态法完全钳制这些政党和组织的活动。该运动克服这些问题的办法是承认个人基础上的成员身份,每一个成员可以保持自己的政治倾向。
3. 完全依靠埃及成员为运动活动提供资金,以此克服对收取国外资助的指责。另外还决定,在运动的领导层不允许收取任何

国外资助组织的负责人或者头面人物的资助,即使是为了发展性的项目。

4. 克服组织结构上等级制的负担,克服与之相伴的官僚主义,克服产生各种争斗和政治专制主义的可能性。途径是建立与网络类似的结构,即在许多活动中,依靠一个积极的、变化的中心,以及若干个积极的和有效的亚中心。中心和亚中心在成立宣言时宣布的原则下联合起来,协调行动,特别是在施行诸如公共抗议这样的现场活动时更是如此。该运动的抗议是埃及现代史上第一次直接针对当权总统及其继承者的抗议活动。

5. 寻求广泛接近群众,无论是在户外还是通过不受国家监控的媒体。接近群众的方法,例如在位于埃及一个主要广场的最高法院前举行公众抗议,本来试图举行为当局所禁止的政治集会,结果变成了大街上的抗议和集会,还建立了网站,上面登载了运动宣言,通过这个网站签署宣言的人不断增加,并且各种有关宣言的言论也在网站上贴出来。另外还有一个论坛,人们可以就若干问题在那里交换意见。除了使用没有被当局控制、广大埃及人收看的阿拉伯和外国频道之外,这些声明和文章也刊登在独立的埃及报纸上。最后,还有数百万份带有粘胶的印着“够了”的标签——这是现在埃及最著名的政治口号。

6. 打碎警察国家的专制主义,在该运动组织普通法律未加禁止的和平活动时,不从安全机构那里获取许可。这一点被认为是克服紧急状态法施加的专制主义的机制之一。

尽管出现不久(因为该运动才成立几个月),但该运动仍力图证明自己在埃及公众中的行动范围,这表现在以下方面:

1. 运动受到双重夹击:一方面来自政治体系,包括政府方面的报刊,另一方面是支持政府的独立报刊,指出该运动同美国人对埃及制度施加的压力有可疑的联系。

2. 享有合法地位的政党对该运动的活动采取完全漠视的态

度,甚至不在它们的报纸上提到该运动,而且还阻止它的成员参加该运动的活动。

3. 一些处于非法地位的政治力量和派别试图把它们的行动方式和口号强加给这个运动,如果做不到,它们就不再参加该运动的活动,即使它们不公开宣布退出。

4. 安全部门企图对该运动的行动主义分子及其活动造成围攻和恐怖主义气氛,例如阻止政治集会,绑架并殴打该运动的著名成员、记者阿卜杜勒·哈力木·坎迪尔(Abdel-Halim Kandil)。

尽管埃及争取变革运动在形成公民民主的一极——能够在埃及建立新的不同性质的社会运动方面起火车头作用的一极——方面取得了部分成功,在这里公民社会也构建了自己的生态范围,但是仍然存在若干需要面对的挑战,其中最重要的有:

1. 该运动吸引放弃了任何变革希望的沉默的埃及群众的能力。吸引这些群众需要创造新的、形式多样的、影响直接行动的手段。

2. 建设和加强集体的、和平的民主手段的能力,这不仅从当前政治制度的弱点及该制度面临的危机这一视角来看是有益的,而且从所有支持该抗议运动的合法的和肯定的政治形势来看也是有益的。

3. 发展和改善该运动组织结构的能力,以便将来该运动能够囊括一切形式的社会组织(行业联合会、体育俱乐部、公民社会协会、宗教机构等)。

# 11 埃及：对社会正义和民主的要求日益高涨

阿扎·卡赫里尔

埃及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拆散了公有部门，并且为跟随跨国公司的资本和支持者脚步起舞的私有部门大开方便之门，从而实现了自己在经济领域中的主要目标。然而，政治领域却没有实施类似的自由化，对公共自由的束缚也没有任何松动，尽管埃及不断声称要给予全体公民以真正的自由。

这可以由如下事实来解释：新的经济精英（新兴的商人阶层）把本国市场简单地视为他们能够实现原始积累的地方——依靠他们同政府部长和国有银行行长之间的密切的或家族的关系，同时他们又作为某些跨国公司或其他公司的小伙伴获取相当可观的利润。既然他们在政府中有自己的代表，因此他们不再向本国的阶级盟友寻求合法性，而是向他们的跨国公司老板寻求政治支持。

不用说，如果没有被压迫大众所施加的巨大压力，任何统治政权都不会给予自由。由于缺乏这样一种大众的压力，某种形式的自由可能给予某些政治力量。这些政治力量从大众那里博取了一些合理的信任，从而遏制了大众对统治政权实施的贫困化政策的自发性抵抗。在埃及，经过数十年的权威主义统治之后，情况已经变成这样：现在统治精英可以自由地选择政治候选人，然而任何一



个政治候选人都没有群众基础。因此,要想应对日益增加的大众抵抗,埃及似乎并不需要任何的民主退让,而是需要更残酷的镇压措施。

通过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美国开始了所谓的反对伊斯兰“恐怖”的行动,同时又无限制地支持以色列攻击巴勒斯坦和黎巴嫩人民。就像美国这些在该地区所发挥的积极作用那样,外部的因素变得越来越重要。因而,面对美国以促进民主的幌子对自己盟友内政的干涉,地方的统治精英正在失去他们的控制力,而促进民主则被美国视为防止伊斯兰“恐怖”蔓延的唯一壁垒。这样一些形式的虚假民主旨在限制对国家恐怖的公开运用,同时促进某种程度的政治自由,以便把那些支持美国所倡导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政治力量推上权力的舞台。然而,这些有限的民主形式导致了伊斯兰“恐怖”的崛起,例如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和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因此,美国再次回到老路上,鼓励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赤裸裸的镇压政策,同时支持非法地和毫无根据地进攻黎巴嫩。在埃及,为了支持对任何代表自由的大众行动进行暴力镇压,所谓民主的话语缄默不语。

在地方上,还有一些人拒绝旧的游戏规则,不管这些游戏规则来自生活陷入空前贫困化的大众,还是来自那些早在四十年前就已享有某些特权的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这些旧游戏规则之所以遭到拒绝,原因之一就是反抗以色列侵略者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屠杀和美国对伊拉克人民的类似侵略。网络和一些阿拉伯媒体破坏了所有压制信息(在巴勒斯坦或伊拉克所犯下的罪行或者开罗街头上的镇压行为)的企图,从而也推动了大众的这种拒绝。在维持各种大众抵抗力量以及他们与某个公共部门之间的联系时,网站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 一 日益高涨的社会正义和民主要求

到2003年,许多呼吁变革的潮流开始合流。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之后对伊拉克的侵略对此产生了推动作用。随着威胁扩散到叙利亚和伊朗,美国对伊拉克的侵略预示了进一步的危险。显然具体的行动是必要的,因而大量的行动委员会开始成立,汇入到来自一些合法和非法政党的积极分子、独立的政治积极分子、人权非政府组织、研究中心、艺术家和文学家,以及例如记者、律师、工程师和大学人员等活跃于各自协会的专业人员的努力之中。一些行动委员会集中全力要求民主变革,而其他行动委员会则强调在各自协会中积极行动的必要性。社会和阶级主张也开始出席复苏的迹象,要么以有组织的精英主义形式出现,要么以大众自发的零星爆发的形式出现。

这些要求来自各种各样的运动,例如“20世纪进军行动”(20th March Movement)、“大众变革运动”(the Popular Movement for Change)以及“埃及变革运动”即凯法雅运动(the Egyptian Movement for Change, Kefaya)。凯法雅运动是最活跃的运动,它催生了各种衍生性的运动,例如“艺术家和作家运动”(Artters and Writers for Change)、青年变革运动和学生变革运动。一些女权主义运动也采用了类似的主张,例如,妇女变革运动、Shaefinkom等等。

最突出的民主要求集中在修改宪法上,以便保障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对行政机构的真正独立、总统的自由选举和对其特权的限制。在这个方向上,反对把总统的儿子作为总统职位当然继承人也被列为突出的议程之一。这样一种宪法修正议程非常及时,因为总统的任期应于2005年结束,并且重新当选规则的变化已经显示出来。

2005年初,埃及宪法第七十六款修正案已成为法律,允许举行总统大选,但对总统候选人却施加了许多限制条件。政治积极分子开始走上街头,反对这个宪法修正案,但却遭到了最残暴的镇压。许多积极分子联手抵制总统选举,认为它是一场闹剧,而且选举结果确实表明了政府公开干预的影响。在一年后,埃及举行议会选举。在这些选举中,政治积极分子要么参加竞选本身,要么充当选举过程的监督人。选举的结果再次表明政府一贯的严重干预,因此许多反对党候选人——尽管他们深受自己选民的欢迎——由于公开的欺诈而落选。此类干预的副作用之一就是许多法官的反抗——他们负责选举过程,但却受到警察的围攻。他们强烈地反对这种滥用权力的行为,并且把自己的合法要求与法官的真正独立性联系起来。所有积极寻求变革的群体都表明了它们与法官的团结。这大约持续了一段时间,一直到2006年。对法官的镇压非常有限,警察行动的全部冲击都落在了支持性积极分子的身上。最终,某种妥协得以达成,因为埃及当局非常清楚这种冲突可能蔓延到其他职业人员的领域——他们的不满比法官更强烈。同时,由于巧妙避开了政府所设置的全部阻碍,非法的“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赢得了20%的议席。这证实了埃及政权的如下主张:唯有穆斯林的恐怖才会取代其统治。

一些非政府人权组织积极地保护那些曾经遭到警察袭击的积极分子,发表声明谴责他们的镇压行为,并且向海外和在国际媒体中发表此类声明。一些人权组织还走上法庭,控告内政部的残暴行为。网站被用来进行这样的一种公开宣传。同时,许多博客对此也积极参与,在网站上传播他们的抗议以及对民主和社会要求的呼吁。与网络空间中的这种活动遥相呼应的是,类似的街头行动(包括公开的和无声的示威)、身着黑服的守夜活动以及在媒体和大众集会上用旗帜和表演来宣传这些行动,等等。有时,政府当局为了表明被容许的“民主”程度,允许这样一些示威活动;但是只

要示威活动的规模大到赢得了更多大众的支持,政府当局就立即采取镇压措施。

## 二 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受害者:工人和农民

工人和农民是受到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最不利影响的阶级。私有化意味着公有部门将近三分之一的劳动力下岗。到目前为止,超过一半的工厂被私有化,并且私有化的过程正在加速。恶性通货膨胀很快吞噬了下岗工人所获得的可怜补偿,同时影响到其余所有公共部门工人以及私有部门工人的工资。由于缺乏合法的工会行动来捍卫自己的生活标准,工人常常诉诸各种形式的罢工和产业行动,尽管按照目前的法律这些行动仍然是犯罪行为。罢工发生在许多私有化的公司之中,例如卡里布纺纱厂、米斯里电视厂和德尔塔纺织厂。在苏伊士运河,机械装卸公司和艾迪尔家电公司还采取了产业行动。与此同时,Oramisr 和 Capri 等私人公司中出现了大量的罢工和抗议。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工人行动的起因是工资的减少或者未能按期支付工资。劳资双方常常达成一些妥协,但这些妥协从未完全满足工人的合法要求。

为了解决正在恶化的局势,许多非政府组织一直努力帮助工人捍卫自己的生活标准和工会权利,例如,捍卫工人权利协调委员会(the Coordination Committee for the Defence of Workers' Rights)、全国保卫工人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Defence of Workers)、工人争取变革组织(Workers for Change)和马哈拉工人意识委员会(the Committee for Workers' Consciousness in Mehalla)。这些非政府组织都宣传工人的行动,利用合法的手段来捍卫工人的权利,努力捍卫工人阶级的事业。它们还捍卫工人在工会内部不受政府干涉的选举权利。然而,这些组织本质上是精英主义的,并且未能与工人阶级建立起稳定的有机联系。

农民的状况可能更加糟糕。按照修订后的土地使用期限法律,地主有权驱逐租户,并且有权按照自由市场的规律来提高租金。由于抗议这种驱逐,萨兰多、布胡特、卡马谢兹和其他村庄都发生了许多冲突。在每一种情况下,警察都对抗议者和所有表示支持的积极分子使用暴力,以“破坏社会治安”的罪名把他们送上法庭。

最近,埃及政府采取的政策,不仅把公共健康保障体系私有化,而且把诸如高等教育这样的公共服务也私有化了。工人和农民并不是这些政策的唯一受害者。政府还接管了巨额的社会保障基金。实际上,这些社会保障基金是工人和雇主为了在未来支付自己的养老金而在五十年里积累的资金。因此,政府是在没收私人的资本,因而违背了它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为了反抗政府的这些企图,积极分子们成立了许多组织,例如捍卫社会保障委员会、捍卫公民权利委员会、捍卫消费者大众委员会和失业者联合会。这些委员会诉诸合法的行动,并且使用报纸和网站进行宣传。然而,除了捍卫社会保障委员会之外,它们都没有成功地对群众进行广泛的动员。

### 三 职业协会内外的积极分子

各个积极分子团体在主要的职业联合会中成立,目标是激活这些组织,并且帮助它们在捍卫本会会员利益和支持全国性目标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影响了法官俱乐部以及工程师联合会、医师联合会、律师联合会和记者联合会——后两个联合会尤其活跃。其他团体的成立宗旨是激活各个联合会的行动,例如“民主律师”、“民主工程师”、“争取变革工程师”、“反对没收的工程师”、“3.9大学独立运动”、“争取变革学生”和“革命学生”。这些团体吸收了政治观点各异的成员,但其基本目标是使它们的联合会摆脱

政府及其执政党的监护。

其他在任何组织之外的团体都自发地诉诸行动来捍卫它们的权利。具体的例子包括空中交通管制员的变相罢工、扎加齐格医院医生的罢工、塞得港和开罗律师抗议警察袭击他们的一位同事、梅耶省校长罢工和西奈校工罢工。2005年8月开罗从事公共紧急服务的四位工人,登上了无线电天线塔,然后威胁说,除非他们的独裁经理去职并同意他们的要求,否则他们就将自杀。所有这些行动都来源于经济不满,并且没有任何政治上的联系,但它们在埃及全国到处发生,有时表现出高度的战斗性。

然而,尽管存在这些对民主的要求,但任何一项重要的自由——例如政治和工会行动自由、表达自由和权力的自由更替——都得不到保障。对于那些呼吁变革的力量来说,留给他们的唯一自由就是(在某些条件下)大声抱怨的自由。这种自由有助于减少公共紧张,并且充当了防止革命的安全阀。我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评价,原因在于大多数争取变革运动的精英主义性质,并且缺乏与大众之间的有机联系。只有大众才是实现变革的真正力量。

不过,最近,埃及政府倾向于只使用暴力镇压来对付大众的变革要求,并且强制实施虚伪的法律和命令。这表明安全阀正在失效。相比之下,更多大众团体正在逐步获得勇气,并且试图遵循“争取变革运动”的先例,诉诸积极的行动来实现它们的主张。确实,这两种孤立的潮流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实现更多的融合,因为它们越来越意识到这种融合必要性,因而最终会实现这种融合。

## 12 摩洛哥的社会运动、 全球化与民主

卡玛尔·拉比卜

关于全球化的问题,摩洛哥社会运动还远未像其欧洲和北美的伙伴们那样被广泛动员起来,关于向国际市场开放的后果的讨论还很有限,而且观点非常对立。然而,社团运动却很活跃,但其斗争重点是尊重人权——政治权利、公民权或与妇女相关的权利,以及享有社会服务的权利和保障就业。

### 一 摩洛哥“处在休克的边缘”

摩洛哥是1994年世界贸易组织的创始地,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对其影响已经凸显。政府与欧洲签署了商业和安全方面的合作协定,还同美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这是小布什尝试于2013年前建立美国—中东自由贸易市场计划的一部分。摩洛哥还主办了阿拉伯世界改革会议——未来论坛,这是美国实现其“大中东计划”的一部分。

一方面是公共事务管理一团糟,结构调整计划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另一方面是摩洛哥投入到自由化进程之中,引用哈桑二世的话就是国家“处在休克的边缘”:失业,文盲,基础服务设施不足,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污染,城市地区社会阶层的加速分化,以及

成千上万的绝望者移民国外……直布罗陀海峡因此成为摩洛哥最大的坟场。

这样的社会现实成为各种身份运动、民众运动和原教旨主义运动的温床,2003年5月16日的恐怖袭击就是血腥的证明。此外,自由化进程及其灾难性的后果更导致了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激烈斗争,而该领域一直被不劳而获、任人唯亲、腐败、操纵选举和镇压任何微小反抗的形势所笼罩。社会运动是在这种形势下发展的。

## 二 社团空间扩大

近二十年来,我们在摩洛哥见证了一个真正的社团膨胀时期,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1998年,政治自由化进程导致建立了一个所谓“协商性更替”<sup>①</sup>的政府,社会运动,特别是环境社团利用这一时机发展壮大,并进入一些政党过去的专属领域。自1956年独立以来,抗争第一次逐渐发展到各社会阶层:工人、农民、学生、小商人、教师、卫生工作者、残疾人(在国家的历史上属首次)、政治和民事囚犯。尤其是大学毕业生失业者表现出了极大勇气,以及内心的极度失望。妇女不仅参与到司法斗争中,她们还在萨累、拉巴特和卡萨布兰卡的纺织厂里组织了特别坚决的罢工……

群众运动还采取了新的斗争形式。与以往不同的是,示威游行已不再是大学生和中学生的专利,凯里弗拉小商人和拉巴特残疾人的抗议行动,菲斯和拉巴特多个街区居民抗议水电涨价的行动,以及最近人权人士和记者的大规模动员都证明了这一点。此外,还有黑暗年代受害者协会组织的多次静坐或纪念请愿性集会,

---

<sup>①</sup> 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USFP)1998年大选获胜,但被迫接受了由国王控制国家核心部门(警察、军队和外交)的政体。



以及有数十万人参加的支持巴勒斯坦被占领土起义和伊拉克人的游行。

这些行动,特别是妇女和人权协会的行动伴生了许多精神产品、建议,以及现场的实际行动(从行善行动到政治行动),并采取群众参与的方式(扫盲运动、公民意识教育、对社团干部和地方被选举人的培训、支持乡村女童入学、困难群体享受基础服务、小型项目等)。政治环境和不同立场的交织(一方面是世界银行和美国援助署等机构对于政治生活的立场,另一方面是政府的立场)使得社团运动取得了一些胜利,为推动民主进程作出了贡献。<sup>①</sup>

### 三 未来的巨大挑战

社会运动尽管在发展,但也存在许多不足。带有独断和官僚色彩的左派传统文化的影响仍然存在。更严重的是,社团的活力受到原教旨主义者的强势冲击。这些人政治上保守,特别是在大城市的平民区,拥有重要的社会基础。城市民众对民主化进程的不彻底和轮流当政的政府无力改善社会条件感到失望。进步力量同原教旨主义者正在进行一场赛跑,目前还不清楚谁能获胜<sup>②</sup>。由于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USFP)与王室不断贴近,政府的更迭并没有导致对机制和宪法进行真正改革,这使得此项任务变得更加复杂。更不用说辛苦获得的自由空间受到了直接的威胁<sup>③</sup>。

① 比如公共自由权利法典(结社、新闻和游行)的修订与成立“公正和和解”机构处理严重侵犯人权问题。这种做法在阿拉伯世界和马格里布地区是绝无仅有的,目的是不忘过去,保证同过去的行为彻底决裂,并避免在摩洛哥的将来再发生同样的事情。

② 皮埃尔·波德和弗朗索瓦·莱古耶《非洲社会运动的挑战和局限》,2003年。

③ 在2003年5月16日恐怖袭击后,通过了新的反恐怖主义法令,授权警方可以拘禁嫌疑犯八天,而无须联络律师或其他人,并且可以未经许可搜查房屋和商铺。最为严重的是,该法律还把所有扰乱公共秩序行为定义为恐怖主义。

在将来,社会运动应在政治上进行自我定位,寻求重新建立社会和政治联系的方式。尽管面临这样的挑战和被工具化的危险,社会运动的团结和公民战略已经成为建立政府制衡力量的基础,使得公民行动以其丰富的内涵和对多样性的尊重成为一种“抵抗压迫的力量”。相信摩洛哥社会论坛(2002年和2004年)带来的活力能够有助于提供讨论空间,并酝酿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影响的新行动。

## 13 摩洛哥：希望、恐惧与“静坐战”

卡玛尔·拉比卜

由于一切斗争都由各种不同的社会力量发动，因此，现在我们难以预测摩洛哥目前的这种趋势将会带来何种结果。摩洛哥的动荡正在持续，充满了模糊性和矛盾性，并且正在损害民主转型带来的收益。这一切由于如下因素而正在加剧：恐怖主义的幽灵；正在侵蚀政治制度并使政治行动和机构声誉扫地的腐败；无力减少不平等和不公正，并制定出结束豁免权的政策。

经济全球化以及国家地位随之而来的下降——尤其是在公共服务中——正在造成结构性的巨变，使人们生活于其中的制度受到了怀疑。国际危机进一步加剧了如下状况：伊拉克战争；以色列人入侵黎巴嫩，对加沙施行暴力；巴塞罗那进程承诺建设一个共享财富和稳定的地区，但却受挫；与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议；面对越来越严重的、致命的非法移民问题，欧盟想在摩洛哥扮演宪兵的角色。尽管国家采取措施消除贫困，数十亿欧元的补偿金用来维持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以及保持仅仅 2% 的通货膨胀率（即使能源费用暴涨），上述一切都对摩洛哥的社会和政治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 一 大众动员与“静坐示威”

对这些新情况的集体反应已经发生了变化。首先，它们全都

始于那些抗议生活成本提高的大规模城市示威活动。新的社会运动由于它们的参与者和具体行动形式而不同于旧的社会运动。它们并不是自发的运动,但也不是政党和工会的工具。它们带来了在媒体投射下的不同行动形式:新的占领街道方式;请愿;申诉;诉诸司法;全方面地利用网络;诉诸吸引媒体注意的壮观的行动形式;例如失业的大学毕业生(他们的静坐示威成为首都街头场景的一部分)也尝试了自焚,等等。

这些抗争的原因基本上与购买力有关:反对交通价格的上涨,公立医院随意收取的医疗费用和不断攀升的水费和电费。在一周的时间里,摩洛哥发生了四十六次静坐示威活动,动员了全国数千人来抗议各类食品价格的最新上涨。

然而,一些示威活动是关于不安全问题的,但仍然有其他示威活动得到了“国家人文发展计划”(National Human Development Initiative)<sup>①</sup>的鼓励,要求制定村庄开放的社会发展计划。这些示威活动、静坐与和平游行甚至影响了那些偏远无名的村庄:韦德泽姆、蒂泽、姆里特、伊泽尔、阿格巴奥、布迈亚、拉卡卜、塔塔;在这些地方,“捍卫委员会”支持所有城镇居民改善社会状况的要求。这些一直被遗忘的偏远地区曾被归于“无用的摩洛哥”的一部分,现在却正在大步前进。一些地区——例如海尼夫拉(Khénifra)王国——克服了1973年残暴镇压行为造成的冲击和恐惧。

保卫环境的斗争也冲出了死气沉沉的研讨会框架,并且被地方团体动员起来的人们所接受。这种斗争的范围,从公开谴责建筑公司对海滩沙子的掠夺,到抗议工厂和市政当局倾倒垃圾对地下水的污染,同时还包括反对磷酸盐矿灰尘排放的斗争。

静坐示威活动不仅是政治性的,而且也是精英主义的。这类

---

① 作为一项复杂的长期任务,社会的改善不可能通过一次性措施或自发的慈善活动,或者通过伦理上的关切或更广泛的意识来实现。

活动的组织者是左翼政党和各种抗议社团。后者反对国家暴力对人权的侵犯(一个“反对公共当局对公民过度侵犯的全国性网络”已经建立),反对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反对美国国防部长访问摩洛哥,反对举行北约峰会,反对在最近改选三分之一议员的选举期间收买候选人和“男性选民”的丑闻。尤为重要的是,摩洛哥国内发生了一次代表真理和正义、反对豁免权的静坐示威。这次示威活动发生在“Poste Fixe 3”前面。Poste Fixe 3 是摩洛哥最重要的秘密拘留中心之一,许多争取正义和民主的斗士都丧命于此。

静坐示威变得相当普遍,因此,新闻媒体使用“静坐战”来表示伊斯兰主义者与民主力量之间的斗争。这些静坐示威还反对一份转载丹麦漫画的周刊,并且反对摩洛哥人权协会代表“廷杜夫被关押者”(他们被认为是邪恶的人)所提出的建议。最重要的是,这种静坐示威可能会传播到卡比利亚地区(阿尔及利亚),因为阿尔及利亚亚柏柏尔语协会组织了各种示威活动——对非洲次撒哈拉地区来说摩洛哥是一个中转站,因为该地区的仇外和袭击、失业青年对欧洲梦的沉迷和撒哈拉地区人民的反抗,因为难以与那些数年来被边缘化的里夫游击队实现和解,等等。

“黑客激进分子”(hactivists)兴起的原因应该归于全球化和新技术。这些新一代的“网代络战士”对美国 and 以色列的网站发动了各种各样的病毒袭击,因而了参与了抵抗。尽管对美国大公司的网站发动了袭击,但一位年仅十八岁的资深黑客只被判处了二年监禁。此外,2006年6月,“邪恶小组”(Team Evil)对以色列的网站发动了八百五十次攻击,宣布“只要你们杀巴勒斯坦人,我们就摧毁你们的网站”。现在,网络示威者的群体相当积极地参与信息战,反对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和美国占领伊拉克。2006年4月,他们已经攻击了大约七千六百零五个网站,其中一些是非常大的网站,例如以色列生物研究所网站和麦当劳的以色列网站。这是新一代斗士,他们满足于技术成就,受到阿拉伯半岛电视台的影

响,认为纳斯鲁拉拯救了阿拉伯人的荣耀。

## 二 民主取得进步,但社会分化日益加剧

所有这些抗争表明,自由领域的扩大取得了进展,而且斗争者的行为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不仅没有远离1981年和1984年的爆炸,也没有远离与国家的全面暴力对抗。有时,抗议运动遭到了镇压,有时得到了批准和期待,有时得到了容忍。事实上,通过公平和调解组织(Equity and Reconciliation Body),新家庭法的实施也取得了进展。在媒体的公开听证会上,公平和调解组织提出了针对恐惧的真正集体治疗,这些恐惧源于争取消除性旅游业和腐败斗争乃至反豁免责任(impunity)斗争。城市的安全组织因为对公民犯下的暴行而被解散,同时狡猾的国会议员和那些王室周围的人被送上了法庭。这些都是重要的成就,增加了政府自1999年共识“更替”之后成功获得的信誉。

尽管有这一切的努力——政府的行动、皇室的行动、国际和全国对公民社会的资金支持,摩洛哥尚未成功地克服社会分化。生产因为摩洛哥对新自由主义的坚持和随后对公共服务的私有化加剧了社会分化。生产的增长如果最终成为“生产拜物教”,那么就失去了意义。尽管反抗是一种合法和有益的现象,但也预示着一场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暴力和国家的安全方法可能是解决社会不满的表现形式:这只会煽起普遍的怨恨情绪。所有处于转型阶段的新兴国家都普遍存在着这种困境:国家陷入以下两者之间的困境之中:一方面是本国绝大多数人民对体面生活标准的渴望,另一方面是国际金融机构的一系列指令。

在这些矛盾的背后,是如下困扰着我们的根本问题:如何“动员草根阶层”,以便带来有利于社会发展的重大社会变革和制度变革。在这个全世界社会经济重组的时期,应该采取何种形式的斗

争行动。毫无疑问,由于民主阵营成员的软弱、分裂、老化以及思想封闭,如果不对其加以重组就启动民主过程,那么获益者将会是那些知道如何利用民主原则来摧毁民主制度的原教旨主义者。

## 14 叙利亚民主运动的挑战

苏珊·赞克赞克

叙利亚民主斗士对 2000 年 7 月 17 日巴沙尔·阿萨德总统在人民委员会(议会)特别会议上发表的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总统宣誓就职演说并不感到震惊。巴沙尔是在掌权长达二十九年的父亲逝世后继任总统的。在自从 1963 年 3 月 8 日实行紧急状态以来没有进行过自由公正选举的社会里(巴沙尔·阿萨德就任总统前,至少有三十七年),这位总统宣布政治生活自由化的意愿给公民的社会带来了希望。一直到 2001 年 9 月,在称为“大马士革的春天”的日子里,公开争论开始出现,光天化日之下指责腐败,并做出了许多有利于结束紧急状态、回归权利国家、恢复多元化和释放政治犯的举措。

但是,由于许多人们殷切期望的措施已没有意义,国内开放的进程放慢了,紧急状态始终存在,甚至通过恢复司法活动而得到了加强。例如,把某些民主运动杰出活动分子移交给国家安全最高法院(CSS)审理。这个最高法院拥有特权,它可以通过对案件进行假设和在没有证据和复核的情况下进行审判。何况,1972 年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Baas)和一些小政党建立的全国进步阵线(FNP)的宪章只承认这是一个形式上的联盟,仍然在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政党的托词下把领导权交给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把一切决定权交给全国进步阵线主席,也就是国家总统,而这个职位只有阿



拉伯复兴社会党总书记担任。

人数很少的政治犯被释放出来。在宣布释放反对派分子和要他们回国的官方文告里,宣称将在国家安全局办公地欢迎他们,这些保安措施是要制服正在进行的民主运动,以降低它的创新力和拒绝新的不公正的应变能力。

这种在自卫立场上后退的最显著例子,是在反对废除 49 号法令中诞生的学生运动,这个法令规定由国家颁发综合科技学院毕业证书<sup>①</sup>。在学院内部独立于一切政党的一些学生动员起来,在民主青年联盟的一些学生和世界替代主义分子的支持下,为争取撤销废除令而斗争。但这一学生运动被控放弃对废除 49 法令的指责,只把它们的要求局限在要求取消被大学开除的某些学生的惩罚上。其中两名学生被移送到国家安全最高法院。这样,一场旨在合法保护集体权利要求的批评性和建设性的运动,变成了一场只要求取消对最优秀活动分子不公正惩罚的运动<sup>②</sup>。

如果这些保安措施对当前为叙利亚社会民主公正而斗争的社会运动构成了最大障碍,那么丝毫也不能降低其他挑战的重要性。

现行叙利亚社会制度以宪法第八条为依据。这条规定使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成为“领导国家和社会的党”,这意味着现在政权至高无上的权力是宪法所赋予的。正如一个叙利亚知识分子指出的:“一切试图在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内改革权力的努力只能把事情弄得更坏,它无助于解决当前叙利亚的问题。相反,只能使问题根

---

① 在学生眼中,废除 49 号法令意味着国家放弃它对学生应负的职责,反映了国家抑制公共部门发展的政治路线,从而加重了叙利亚青年的失业危机。

② 这些新的要求已不能应对该运动积极分子被惩罚的局面。实际上既不涉及撤销开除学生的要求,也不提及逮捕学生(Alep 大学学生穆罕默德·阿拉伯和大马士革大学学生穆罕默德·达巴斯)的问题,而这二名学生是由于参与该运动的活动而逮捕的。

深蒂固,更难解决。”<sup>①</sup> 同样,“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改革派”认为,“领导国家和社会”<sup>②</sup> 的责任归于党。一个垄断一切权力的党,一个在社会称霸,并在这个社会的保安机关中起主要作用的党,怎能与社会民主运动和民主力量进行联系呢?

另一个挑战是民主运动各个组成单位之间的对话,因为在叙利亚缺乏进行正确而公开的政治工作的条件。这不仅是因为缺少各政党应遵循的法律,也是特别法和紧急状态法占统治地位所导致的。在上述“大马士革的春天”时期内,当政府转向反对并关闭进行争论的论坛时,政治舞台上的积极行动就销声匿迹了。这些组织本身的讨论也停止了。这就分散了力量,有害于民主化的共同目标。

这种对话的挑战也涉及与穆斯林兄弟会的关系。穆斯林兄弟会于1979—1982年举行了起义,遭到政府的血腥镇压,但他们仍坚持斗争。某些民主取向的团体认为它是一支政治力量,实行对其他组织开放的纲领,并主张通过和平道路实现政权转变;而某些团体认为它只是一个具有教派色彩的政党,它确定多数派与少数派的观念仅仅是通过派别的宗教所属。因而,叙利亚所有民族民主力量都强烈反对一切引发教派冲突的做法。

最后,还有外部威胁的挑战。特别是美国和法国提出的由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1559号决议和美国企图颁布的“解放叙利亚”的决定。在这种威胁面前,特别是当“假定的解放者”是美国时,政府就担负着“祖国保卫者”的角色,而在叙利亚人民和民主力量眼中,美国的形象是负面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少数派能从美国干涉行动中看到一种从专制政权中解放出来的有效途径,那就不是同情美国,而是为新的开端更好地准备先决条件。

---

① 穆兹尔·拜德尔·哈鲁姆,2005年4月11日 *As-Safir* 日报。

② 哈里发·吉哈德,2005年4月25日官方日报 *Tishrin* 社论。

这些重大的挑战不是只对民主运动,而是对整个国家提出的。今天叙利亚所面临的内部、地区和国际形势是如此的错综复杂,以至于很难预见它的未来,至少在近期是如此。

## 15 阿尔及利亚：从社会的 严密管制到新的大众运动

阿布德因埃瑟·德贾毕

最近一段时间，阿尔及利亚爆发了大量非组织化的抗议运动。然而，它们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果，而且充满了或多或少的暴力，重要的是最终它们没有任何的政治视角。到目前为止的几年时间，阿尔及利亚北部和最南部的城镇几乎每天都发生大量的大众“造反”，不仅方式类似，而且要求也相同：饮用水、社会住房、工作等等。面对这些“造反”，政府、政治社会和国家却袖手旁观，任由局势一天天地恶化。对于参与这些运动的人来说，这种“对聆听的拒绝”变得更加困难，因为金融形势持续改善，并且恐怖主义行为大大减少。在国家与这些非组织化运动这两个主角之间，公民社会、工会和政党似乎陷入了瘫痪状态。它们似乎失去了分析能力，无法理解这种持续的社会动乱，因而没有任何明确的行动战略。

这种状况基本上可以由布迈丁(Boumedienne)最初的国家计划来解释。该计划要求严密地管制社会、工人和青年力量。尽管这些力量(持有或多或少的批评立场)支持布迈丁的国家计划，但它们都剥夺了自主的政治表达。这尚未推动作为公共利益保护手段的民主集体行动的发展。同时，这也是如下悖论的原因所在：那些越不倾向于捍卫民主和多元主义的社会力量，越是受益于那些长期争取阿尔及利亚民主化的运动。

## 一 工会运动和工人运动

自从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工人举行了许多抗议运动。有时这些抗议运动采取了工人罢工的形式<sup>①</sup>,而有时则采取了非集体行动的形式。这些形式相当准确地反映出如下两者之间的权力关系:(1)早期的工人运动,(2)独立后执政的新社会力量。难怪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大部分提出各种要求的工人运动都发生在私人、国有和外资的部门。在那里,工会的经验抛弃了它们在殖民占领时期的起源。这些罢工和抗议运动很少能够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它们的主要动机可以说是“经济主义的”,即改善工作条件。

由于公共部门的发展、庞大的劳动力、现代技术和不同性质的人力资源管理,私人部门的工人被迫把主要行动者的地位让与国有部门的工人。公共投资获得的回报是一种促进新工人阶级形成的产业结构。在最新的一次失败之前,这种工人运动已经知道什么可以叫一个“力量和希望的时代”,或换句话说,一个“进攻”的时代。工人运动的要求发生了变化,并且罢工也变得激进化,持续的时间更长,并且参与的工人更多。与此同时,在一些拥有地区分公司的大型企业中,公共经济组织把罢工变成“全国性的罢工”。工人的罢工获得了谈判的能力,这表明工人运动及其要求变得更加成熟了。<sup>②</sup>

---

① 参见拙著 *Algeria in movement: a socio-political study of the workers' strike movements*, Dar El Hikma, Algiers, 1999(阿拉伯文)。

② 然而,尽管出现了这种成熟性,但工人运动却未能建立各种联盟,不管是工人内部还是外部的联盟,乃至与那些客观上接近工人运动的力量之间的联盟,比如说公共部门的管理干部和某些合格的行政机构的雇员,许多工人对他们持有一种排斥的态度,而这种排斥态度则来源于那种影响着工会实践的“工人”心态。因此,工人运动没有成功地在工人世界中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阵营。当工人运动后来处于防御阶段的时候,这无疑会提高它们的地位。

随后,由工人和工会组成的工人世界进入了防御阶段。这一阶段持续的时间超过了十年。事实上,这碰巧遇到国家在独立后所采取的发展模式陷入了危机之中。这一变化是20世纪80年代初之后经济不景气和生产缺乏公共投资的直接结果。结果是大量的工厂和生产单位关闭,因而工人大规模失业。失业和非正式经济不断扩大。阿尔及利亚的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因为那些无限支持工人运动的政治派别陷入意识形态上的困境。因此,宗教派别开始重新回到政治领域的前沿:尽管它们是保守的和新自由主义的,但对工人世界一无所知,当时它们事实上并不公开地敌视工人世界。

1990年,当工人运动仍然处于防御阶段的时候,工会的民粹主义得到了承认,但它无助于工人摆脱防御阶段。公务员(教师、医务人员和行政人员)迅速地成立了他们自己的自治联合会。这些自治联合会并不附属于阿尔及利亚工人总联合会(CUAW, General Union of Algerian Workers),后者的代表性持续下降。一些“自治联合会”是在激进伊斯兰主义等意识形态的直接影响下成立的。即使自治联合会得到了政府的正式承认,并且其中有一些具有真正的代表性,但在成立十多年之后,仍然没有能成功地使国家承认它们有权参与全国性的社会谈判。这些社会谈判始终是在如下三方的参与下进行的:政府、商界领袖和阿尔及利亚工人总联合会。

## 二 学生运动:从精英主义到教育民主化

学生运动没有从学生数量的增加和大学网络的扩张中获益,因而不得不放弃许多活力和自主性。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学生运动集中在少数的大城市中,并且被认为是最有影响的社会运动之一。学生运动提出了许多既是国家的又是国际的政治问题,并且它的观点并不必然是政府当局的观点。不过,学生运动失去了它的政治和组织自主性,也失去了它的精英主义性质。20世纪

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阿尔及利亚的政权重创了工会运动。在此之后,学生运动立即遭受了同样的命运。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学生运动发生了文化上和政治上的分裂。教育的民主化使农民和中产阶级的子女都可以进入大学,恰恰当时整个阿拉伯化问题变成尖锐的问题。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因为它对学生运动产生了一种“文化上的”影响。阿拉伯化进程的开始恰巧遇到了如下首次出现的迹象:阿尔及利亚在独立后所采用的经济发展模式开始失去了活力,因而这种挫折为柏柏尔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等某些反对力量提供了机会。因此,关于1962年之后所遵循的正确社会经济选择的官方话语变得越来越站不住脚。阿尔及利亚首次出现了“大学生失业”的现象。在提升大众阶级子女的社会地位上,大学制度已经不再能够发挥它的作用了。

在承认多党制与工会民粹主义之后,学生运动失去了对政治领域的大部分影响。政治对抗的舞台彻底地远离了大学。新的大众社会运动基本上不再依赖学生运动的支持,即使在大众运动被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趋势控制之后也是如此。于是,学生运动开始维护它与社会运动的联系,但显然是追随社会运动。这与学生运动长期处于先锋地位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 三 妇女运动:以“发展”促进解放

在阿尔及利亚独立之后,占主导地位的官方话语表面上是一种“现代主义”,但却帮助掩盖了在妇女权利上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在这个问题上,国家政权中的权势集团和半合法的反对派达成了一种总体性的意识形态共识。由于这种共识,阿尔及利亚的妇女不应该脱离一般社会问题来提出她们的特殊问题。在阿尔及利亚历史上的这一时期,重要的妇女运动因此是难以产生的。

在独立后,对女子的教育得到快速发展。<sup>①</sup> 尽管如此,社会上长期处于支配地位的保守价值观使妇女进入工作世界的渴望变成一种空想。<sup>②</sup> 然而,阿尔及利亚的经济危机——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的经济危机——迫使许多家庭减少了对妇女走出家门工作的限制。在整个经济的自由主义变革之后,阿尔及利亚的非正式经济蓬勃发展。现在,妇女在非正式经济中从事低技能的工作已经司空见惯。然而,劳动力市场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妇女,也带来了消极的后果。她们经常被剥夺正式劳动力市场所提供的合法保护,从而使她们的社会地位变得更不稳定。

最终,阿尔及利亚妇女使她们的要求的合法性得到了部分的承认。这与过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过去,在那些支持妇女解放的派别中,妇女被剥夺了独立的自我组织的权利。然而,妇女运动还不能够从政治多元主义中获益,加强自己在社会中的影响。尽管组织形式已经多样化,并且许多妇女也已经能够脱颖而出,但妇女运动基本上仍然是精英主义的。一些妇女已经担任了重要的职位——政府部长、议员和政党领袖。不过,尽管女学生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妇女组织仍然尚未成功地在学生中建立它们的影响力,在女性的职业环境中也是如此——尽管在理论上女性的职业环境更愿意分享它们的思想。至于在农村,妇女运动完全忽视了它,因为妇女运动从未离开过大城市——尤其是在其首次发生的首都。

## 四 新社会运动:宗教与文化

### (一) 宗教

新社会运动使新的行动者城镇和平民区的青年登上了政治舞

① 在 2006 年高中毕业会考的大约五十万名考生中,女生占到了 60%。

② 妇女只允许从事那些学历要求高的工作。



台。他们使用不明确的新政治语言来批判自己的生活条件，经常谈到伊斯兰教的宗教遗产。由于同传统社会运动（工人、工会和学生）的话语进行了决裂，他们发明了一种蕴含着新的要求的语言。这种新语言具有极其强烈的影响力，并且不久就成为一种动员人民的有效方式——这是一种中产阶级无法发动的动员。中产阶级基本上都说法语，并且为传统的社会运动提供了大部分的成员。

这些新大众社会运动的一个特征是它们包罗一切的话语。在这种话语中，道德与宗教是难以区分的，集体与个人也同样如此，因为它们全都被纳入到同一个难以分解的体系之中。另一个特征是它们的激进主义。激进主义使新社会运动赢得了大众阶层中早已准备好的听众。这就说明了青年为何能够支配充满空前热情的大众行动。在被原教旨主义倾向控制之前，这些新社会运动集中在生活条件的方方面面（住房、工作、教育）上。不久，它们占据了除工厂和大学之外的社会空间，而工厂和大学一直是传统社会运动的领地。在自己的影响扩大到清真寺之前，新社会运动占领了运动场和那些位于重要城市边缘的平民区。同时，除了一种高度政治化的反对派话语之外，它们还给自己带来了新形式的宗教狂热。

由于想起了它们过去对国家的管理，“民族主义”运动绝不可能招募这些大众社会运动。当这些新社会运动开始的时候，它们可能被认为是天然的。它们也不可能落入不同的左翼——精英主义和说法语者以及城市中产阶级的——运动的手中。在一开始，宗教运动甚至招收不到青年人。宗教运动的原教旨主义趋势已经在大众中具有支配地位，并且确立了牢固的地位。它们把青年视为普通的乌合之众，认为他们的宗教纯洁性太有问题了，因而不值得支持。但是，当这些新社会运动在1988年10月的事件期间达到顶峰的时候，它们做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决定，要加入伊斯兰拯救阵线（ISF, Islamic Salvation Front）原教旨主义派所代表的激进宗

教运动。

通过收编新社会运动,激进宗教运动使自己的话语具有包罗一切的特征,把神圣与世俗结合了起来。首先,激进宗教运动使自己获得了新的视角——道德和宗教。这是新社会运动所缺乏的东西,因为它们最初是诞生于城市居民——尤其是青年——的日常困境的“现代”运动。激进宗教运动使这些抗议运动变成了暴力对抗——不仅是与国家及其各种机器的暴力对抗,也是与其他社会力量的暴力对抗。由于排斥主义的话语和实践,其他社会力量脱离了激进宗教运动。结果,暴力活动不断发生,为一种盲目的恐怖主义提供了土壤,而大众阶级则成为主要的受害者。

## (二)文化

从编年史的角度来看,阿尔及利亚社会运动的历史无疑会提到柏柏人的文化运动(BCM, the Berber Cultural Movement)。早在具有宗教倾向的大众社会运动产生之前,柏柏人的文化运动就已经存在了。尽管国家政权对其施加了种种限制,并且官方的国家发展模式也获得了声誉,但是,即使只是部分地通过“社会主义力量阵线”(FSF, Front of Socialist Forces)和“文化和民主联盟”(UCD, Union for Culture and Democracy)等一些反对党,有时甚至通过传统的社会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等),柏柏人的文化主义运动也成功地产生了自己的影响。

法国的柏柏人移民在传统上非常强大,也都受过教育。他们深刻地改变了卡比尔人保守的农村社会。这两种发展影响了该地区的社会运动。自从1980年4月的起义(通常被称为“柏柏人之春”)之后,卡比利亚地区的社会运动向来以优秀的干部和精英对社会运动的参与而著称。在卡比利亚地区,文化上的社会运动始终是“阶级间”的运动,被动员起来的是工人和农民以及小店主、学生和商人。有时候,“社会主义力量阵线”和“文化和民主联盟”成

功地把该地区的特殊的紧急事务与其他更具有全国性的问题(例如选举、伊斯兰恐怖主义、安全局势)联系起来。因此,文化上的社会运动属于更广泛的意识形态运动,后者的标志是城市中产阶级以及妇女的强大影响:他们要求民主和人权,有时甚至呼吁争取世俗主义的斗争。

2001年和2002年的暴力起义震动了卡比利亚。这些起义即使不是大众文化运动的失败,也是其危机的明确标志。大众文化运动失去了它以前的许多特征——比如和平主义,也失去了它的组织框架。在暴力起义期间,大众文化运动的自我表现并不是在政党(FSF和UCD)、工会和社团的传统环境中,而是在阿齐斯(Arches)的新运动和邻里关系委员会里。新一代领袖取代了老一代领袖。前者不仅更重视地方认同,而且更加激进。这种激进主义表现为要求解散宪兵队及其在农村的组织。2002年,阿尔及利亚的宪兵试图阻止卡比利亚地区举行立法选举和地方选举。

由于过去十多年持续积累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卡比利亚地区过去五年里所经历的动乱和不安全变得更加严重。在国内经济危机和对欧洲边境日益严格控制的作用下,传统的向法国和其他国家的移民流已经干涸。这使该地区的人口结构发生了更根本的变化。国家的谨慎鼓励促进了这种回归“地方”和走向“文化、准族裔”的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尤其如此。这就是在民族国家本身、领导精英及其话语全都出现深刻的危机时所发生的事情。

## 16 土耳其：另类替代世界议程、集权化遗产和身份认同斗争

埃尔迪·居林·勒朗代

在中东，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在所有领域中能够跟得上西方全球化的节奏。土耳其就是其中之一。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和欧盟等国际机构的领导下，土耳其竭尽全力适应和融入世界经济之中。土耳其国内更深刻地感受到结构调整政策所带来的负担，因为经济危机与 2001 年的资本逃逸及包括大型公共企业在内的私有化项目有关。

在民众当中，被压迫导致的游行的发展招致了各种各样的反抗。这些反抗既与国际金融机构和美国的影响有关，也与土耳其的欧盟候选国资格有关。从类型的角度来看，它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围绕着反动的和民族主义的情绪而形成的，强调面对外部敌人时的国家荣誉；而另一类则从全球化和其他国家的社会斗争来解释土耳其的社会和政治问题。2005 年和 2006 年，土耳其的各个城镇都发生了抗议活动。但是，这种正在高涨的抗争同样可以用如下两个因素方面来解释：一方面，土耳其出现了一个“温和伊斯兰主义”政党——正义发展党（AKP）；另一方面，土耳其在公民自由上进行了重要的司法改革，成为土耳其加入欧盟进程的一部分。

## 一 反对战争和全球化

社会、政治和文化上的抗争围绕着三个主要问题进行。第一类抗争就发生在“9.11”事件之后,随后由于反对美国霸权战争的广泛抗议运动而改变,转向捍卫受到美国进攻国家的人权。处在抗议活动中心的是全球和平与正义联盟(Coalition for Global Peace and Justice)。在最近两年里,这一抗议运动发动了许多斗争,比如说,争取关闭(土耳其南部)切利克美国军事基地的斗争;与其他国家在2005年3月19日和9月24日同时组织的反战行动日;在全球和平与正义联盟的支持下,最近在土耳其召开的人民伊拉克法庭(Peoples' Tribunal on Iraq)。

第二类抵抗集中在反资本主义、国际金融机构以及全球化给工人和农民带来的问题上。这一趋势引发了反对土耳其石化公司、TEKEL烟酒公司和SEKA造纸厂等国有企业私有化的重大行动。SEKA造纸厂的私有化和关闭使七百四十三名工人及其家人占领了工厂二十二天。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上,在2005年4日至6日亚洲发展银行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第38届大会期间,土耳其爆发了反对亚洲发展银行的行动。

这些斗争基本上是由工会,尤其是土耳其公務员工会联合会(KESK)和土耳其进步工会联合会(DISK),和工程师职业协会(TMMOB)组织的。尽管如此,2005年6月成立的伊斯坦布尔社会论坛和土耳其社会论坛也在这些抗议行动的组织 and 协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土耳其的两个政党也积极参加这种社会和政治斗争:自由和团结党(ÖDP)与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DSIP)。这两个党的斗士也是全球和平与正义联盟同土耳其社会论坛中的主要倡议者。土耳其自由和团结党是一个反资本主义的左翼政党,整合了各种反资本主义的倾向;而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则是一个类似

于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托派政党。

生态斗争,尤其是那些反对核能和基因改造生物体的生态斗争,也成为这第二类抵抗的一部分。在核问题上,生态主义运动设法阻止了土耳其的一项核工厂建设计划。至于反对转基因生物的纲领,生态主义运动在安纳托利亚的许多城镇中发动了一项运动,旨在提高农民对转基因生物威胁的意识,并且征集到了大约十万人的签名。生态运动还在议会中组织了一次信息会议,并且在议会的转基因生物调查委员会中获得了一席之地。这对土耳其来说是一项新的发展。

## 二 认同斗争

这两个主要问题涉及土耳其的替代性世界运动。第三个主要问题涉及认同斗争。最有象征性的认同斗争是库尔德人的运动和穆斯林妇女争取戴面纱自由的运动。库尔德人的要求基本上由最近成立的土耳其民主党(DTP)来表达。该党的创始人是雷拉·泽娜(Leyla Zana)和奥尔汉·多安(Orhan Dogan),他们以前曾担任国会议员,曾经被监禁十年,于1995年出狱。但是目前,由于土耳其民主党与库尔德人工人党(PKK)领袖阿卜杜拉·奥贾兰(Abdullah Öcalan)的关系,使它在土耳其获得合法性上受阻,而阿卜杜拉·奥贾兰正在伊斯坦布尔附近的小岛上服终身监禁的刑罚。事实上,2006年3月和4月迪亚尔巴基尔爆发的骚乱可以归为奥贾兰和库尔德人工人党对库尔德人运动的控制。如果库尔德斗士的要求要想被人民视为可信的和合理的要求,他们就必须解决民主化问题以及放弃暴力和等级性制度问题。

穆斯林运动处在一种与库尔德人相当不同的境况中。在土耳其,伊斯兰主义尽管出现在政治制度里,但受到了严格的监督。伊斯兰主义支持反抗国家世俗主义的霸权,后者常常被视为对个人

自由的限制,例如大学禁止戴头巾就是证明。所以,在某些运动中,一些左翼和伊斯兰主义运动温和派走在一起,共同反对一种两者都视为压迫性的权力。<sup>①</sup>

### 三 集权化遗产

土耳其的社会和政治斗争深受国家政治制度极端集权化的影响。应该指出的是,政治文化乃至社会运动和政治力量的经验并不是热衷于“一个开放和横向的空间,帮助社会运动、工会、非政府组织和各类社团。其中每一个组织都以自己的方式且按照自己的方法来参与行动领域”(Lelandais and Baykan,2004)。这就是大部分斗争都是在政党、工会和职业协会的框架内进行的原因。此外,土耳其严格的国家/政治倾向使激进左翼组织难以创造出连接国家与全球的环节。土耳其的传统规范崇尚组织崇拜,因而,灵活而非等级性的协调机构的形成也必须重视这种传统的遗产。

在土耳其组织地方和全国论坛的努力推动了对这种事态的质疑。这种类型的集会越来越吸引公民社会组织的注意,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平台,使公民社会组织在国家机器之外找到了听众,而又不使后者真正感受到威胁。同时,这又使各个社团重新开始讨论它们的组织形式,因为它们看到了欧洲的和其他的例子。

现在,另类替代世界运动(the alternative world movement)是工会争取社会权利斗争的启示来源。长期以来,社会斗争被限制

---

① 从在新自由主义框架内经济和国家转变的角度来看,这些边缘性的力量要么必须把自身组织起来,要么消失。由于最初是为了给予自主的帮助而成立的,新的伊斯兰运动已经成为抵制和取代物质主义的源泉。因此,那些传统上属于社会公共服务的领域常常被私人会所和那些由穆斯林协会创办的诊所接管。在当前的环境中,伊斯兰不仅是一整套宗教仪式,而且是一种社会黏合剂,连接那些被新自由主义国家所抛弃的“社区”(Pasha,2001)。

国家层面上,也被局限于罢工和同政府的谈判。今天,由于替代性世界运动,土耳其的工会开始同其他国家的工会建立永久性的联系,越来越多地开展那些与全球性主题相关的行动。

但是,土耳其的替代性世界运动反映出了斗争的国际性或不同国家问题之间的联系。它也提出了关于土耳其社会自身内部关系的问题。在地方上,通过斗争来谴责美国的霸权反映在对国家霸权的谴责之中,这并非巧合。这两种体系存在着隐匿的共谋关系。所有的这些社会斗争都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罪责归于一种独特的社会控制。这种社会控制通过具体的行动者——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土耳其国家,即使不是军队——指向了所有的社会生活部门。

#### 四 民主要求的局限性和模糊性

尽管最近几年社会和政治斗争增加了许多,但它们尚未真正地找到自己在土耳其社会中的位置。大众的支持仍然非常有限。这部分应归因于土耳其的社会和政治制度,部分应归因于公民社会的内部问题。自由化、民主和尊重人权等要求激起了国家机器的防御反射,以便维护它对政治和经济的垄断。经济自由化没有遇到大量的阻碍,就像土耳其工商业协会(TÜSIAD)所指出的那样,经济自由化特别受益于政治精英与商业界之间的联系。尽管如此,但政治自由化的进展却相当缓慢,主要原因在于它可能表达了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社会要求(Lelandais,2004)。

土耳其还有一个特有的矛盾:由于担心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那些更愿意接受现代化的群体往往把自身列为国家的支持者,即使这意味着民主的停滞。尽管如此,但保守派却经常准备好支持民主,希望减少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因此,所谓“进步性的”公民社会组织向国家靠拢,而“保守的”组织则更倾向于批判国家。



## 参 考 文 献

1. Pasha, M. Kemal (2001), *Globalization Islam and Resistance*, in Gills, Barry K. (ed.)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Resistance*, New York: Palgrave.

2. Lelandais, Gülçin and Baykan, Baris (2004), *Cross - readings of the Anti - globalisation Movement in Turkey and Beyon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Making*,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No. 182, December.

3. Lelandais, Gülçin (2004), *La société turque dans le défi de l' altermondialisation*, *CEMOTI*, No. 37, January/July.

